采访100多位当事人·增补约20万字·配以近300幅鲜见历史图片



全景反映"四人帮"兴亡的唯一纪实文学作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读本。

"四人帮"兴亡 1 初起

SIRENBANG XINGWANG

（增订版）

叶永烈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人帮」兴亡 ① 初起 叶永烈 著

「四人帮」兴亡 ② 兴风 叶永烈 著

「四人帮」兴亡 ③ 横行 叶永烈 著

「四人帮」兴亡 ④ 覆灭 叶永烈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采访100多位当事人·增补约20万字·配以近300幅鲜见历史图片



全景反映“四人帮”兴亡的唯一纪实文学作品，
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读本。

“四人帮”兴亡 1

SIRENBANG
XINGWANG

（增订版）

叶永烈 著

初起

被告人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人帮」兴亡 ① 初起 叶永烈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人帮」兴亡 ② 兴风 叶永烈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人帮」兴亡 ③ 横行 叶永烈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人帮」兴亡 ④ 覆灭 叶永烈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总目录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1册)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2册)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3册)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4册)

目录

增订版前言
序
引言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韦德发现中共高层领导人“步调不一致”
“四人帮”中的“四结合”
第一章 江青之初
江青的身世之谜
李家是个不安宁的家庭
李云鹤的学戏生涯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最初的爱侣黄敬
19岁加入中共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黄敬来上海寻找江青
江青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孙达生介绍江青重新入党
第二章 影剧明星蓝苹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崔万秋晚年忆蓝苹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唐纳其人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
婚变使唐纳在济南自杀
王泊生使蓝苹大失所望
蓝苹想以“得脑膜炎死了”赖账
蓝苹的心病所在
蓝苹终于与唐纳重回上海
“唐蓝事件”满城风雨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蓝苹终于告别大上海
第三章 成为“第一夫人”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博古同意蓝苹进入延安
黄敬先去了延安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成为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他乡遇故知”—康生
亮相于延安舞台
指导员兼“网员”的双重身份
从“二姨太”到“大红鞋”
江青初识毛泽东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
风姿绰约的才女吴莉莉
“吴莉莉风波”
贺子珍后悔终生
江青乘虚而入
关于毛、江“约法三章”
江青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生了女儿李讷
整风运动中康生保江青过关
江青变娇变骄了
江青与周恩来的“惊马事件”
江青借牙病飞往重庆
唐纳在重庆拒见江青
江青写信慰问赵丹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第四章 张春桥之初
华蒂社的中坚
“文坛恶少”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崔万秋其人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的真面目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鲁迅再驳狄克
红皮白心的张春桥
第五章 张春桥的发迹
狄克钻进延安
张春桥告了邓拓一状
晋察冀之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取恽逸群而代之

张春桥坐镇《解放日报》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第六章 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姚文元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姚文元结识张春桥
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姚蓬子被捕使姚文元跌入低谷
姚蓬子本是阔少爷
象征派诗人姚蓬子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姚蓬子出任左联执委
与丁玲创办《北斗》
鲁迅写诗《赠蓬子》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转入秘密战线—中共特科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精明的投机商
姚蓬子为姚文元操碎了心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姚文元跨进《萌芽》编辑部
第七章 江青“偶尔露峥嵘”
江青飞往苏联疗养
贺子珍顾全大局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
出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第一次匿名信事件
“游泳池事件”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政治夫妻”
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旁人眼中的江青
“骄杨”风波
“桂花酒”之谜

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
又一封令江青坐立不安的匿名信
江青之兄李干卿惹风波
江青的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跟王光美比高低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人帮”兴亡（第一册）（增订版）（全四卷）/叶永烈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7（2016.4重印）

ISBN 978-7-5154-0409-7

Ⅰ.①四… Ⅱ.①叶… Ⅲ.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Ⅳ.①K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0527号

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未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特向未署名的摄影者致歉；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与本社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

出版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克川　陈立旭　柯琳芳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胡志华　袁又文　章文岚　叶敏娟

责任校对　康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旗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96印张　9插页　插图253幅　2168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5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增订版前言

《“四人帮”兴亡》是我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也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1980年观看中央电视台转播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实况节目，触发了我写这部长篇的计划，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

《“四人帮”兴亡》题材庞大，最初分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本书，在1988年初版，此后多次修订再版。由于“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分成四本书来写，部分内容重复，而且是把这个“帮”拆散了来写，没有整体感。到了2002年，终于把四本书合为《“四人帮”兴亡》，即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在《“四人帮”兴亡》完成之后，搁置多年，未能出版。

2008年，《“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人帮”兴亡》共182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我庆幸能够在许多“文革”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倘若我在今日才动手写这部长卷，那就无法获得那么多极其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

《“四人帮”兴亡》出版之后，我花费很多时间对全书进行大修改，大补充，而且还进行了许多补充采访。放在您面前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便是补充了2002年以来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最新成果的版本。由于新增了十几万字的内容、增加了与“四人帮”成员及历史背景有关的图片，增大了整书的篇幅，原来分上、中、下三卷的做法不利于读者阅读；同时考虑到“四人帮”从产生到灭亡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因此，增订版按照“四人帮”的兴亡历程，分为初起、兴风、横行、覆灭四卷。这样既方便了读者阅读，也勾勒了“四人帮”兴亡的脉络。另外，增订本还逐一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本书初版的错误之处。

在今天，出版《“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可以说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让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了解那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很多年轻人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上，更谈不上汲取“文革”的沉痛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防止“左”的顽症卷土重来。

二是近年来沉渣泛起，为“四人帮”翻案者借助网络推波助澜。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为“四杰帮”，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

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

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了解所谓“文革四杰”的真正面目，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对《“四人帮”兴亡》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早在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就多次与我联系，期望出版《“四人帮”兴亡》。这次，他们得知我完成《“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再度热情约稿。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当代中国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感谢。

《“四人帮”兴亡》是一个大题材，涉及中国当代诸多政治人物与重大事件，需要不断修改、增订。我愿继续对本书进行修改，以求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叶永烈

2012年10月7日上海沉思斋

序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苦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地带，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冤狱众多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幕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485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130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

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时，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传》，20万册；

《张春桥传》，15万册；

《王洪文传》，13万册；

《姚文元传》，5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不同的历史影响

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脉络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20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

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485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的保管处于相当混乱状态。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时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份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6时离家，8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大资源库。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221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现，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明显带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5000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30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亲口叙述。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

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借住房东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要

求她，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能接待采访。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才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20世纪30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了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image]

■ 叶永烈采访张耀祠将军，江青就是他拘捕的。

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采访了她们。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当年在沪时的团支部书记，江青进入延安又是她介绍的，是极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北京，我还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江青前夫黄敬（即俞启威）之胞妹俞瑾；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江青秘传》作者，曾经为毛泽东、江青看病），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教授（她向我讲述了“批《水浒》运动”的由来）……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

在美国，我采访了当年的红卫兵领袖、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他是红卫兵的倡议者之一，也是所谓红卫兵“三论”，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

[image]

■ 老作家施蛰存致叶永烈函（关于姚蓬子）

在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夏其言；《文汇报》原总编陈虞孙，《文汇报》原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长、著名杂文作家罗竹凤；上海图书馆原参考书目部主任葛正慧；中共上海市委原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迹。

[image]
■ 叶永烈访问秦桂贞

[image]
■ 叶永烈采访毛泽东儿媳刘松林

[image]
■ 叶永烈采访徐明清

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

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还介绍我去采访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对姚家的身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采访，姚公埠的老邻居以及诸暨县档案馆给予热情接待；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张春桥18岁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时，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量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电影《东进序曲》中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统战部原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深感遗憾的是，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了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我还采访了当年的“文革”大员们：

我多次采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回忆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经过，回忆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的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经过，他与第一副组长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毛泽东痛斥的经过……

[image]
■ 叶永烈采访陈伯达

[image]

■ 叶永烈采访王力

我多次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他的回忆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他还把诸多手稿交给了我。

我还多次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

我访问了当年《红旗》杂志编辑、“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林杰。

我实地走访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年在上海的住处，走访了江青进入延安时所去的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江青生活或者学习过的延安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以及中共中央党校旧址、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走访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江青住处。我还采访了江青秘书阎长贵和杨银禄。

虽然我终于完成了长卷《“四人帮”兴亡》，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写作已经画上了句号。我仍将继续采访、补充、修改，以求写出更加丰富、充实的《“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

2002年4月22日初稿

2004年9月10日二稿

2005年6月6日三稿

2008年7月5日四稿

于上海沉思斋

引言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韦德发现中共高层领导人“步调不一致”

“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10月11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这期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位置，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

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

主题—毛的遗孀被捕

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

报纸都很注重抢新闻，尤其是抢重大新闻。《每日电讯报》在全世界报纸面前，抢到了一个第一：第一个独家披露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其他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9月16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刊载所谓的毛泽东“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9月18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

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韦德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间，存在严重的政见分歧。

不过，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在当时的中国，活动深受限制。他设法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雇员打听消息。

终于，在10月10日，韦德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获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标语，热烈欢呼“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天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韦德立即找来这篇社论，细细琢磨，发觉社论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 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是谁在背叛毛泽东？是谁在篡改毛泽东指示？“两报一刊”的社论虽然没有点明，显然是有所指的。

“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最权威的地位。韦德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韦德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的遗孀被捕”！“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说的背叛毛泽东、篡改毛泽东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遗孀”及其同伙。

于是，韦德在10月11日写出独家新闻《毛的遗孀被捕》，并立即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

韦德写道：

>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
> 这一逮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
>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1971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翌日，《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韦德的报道，世界为之震惊了！

10月13日，世界各报纷纷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使这家报纸和韦德出了大风头……

由于第一个报道江青被捕，韦德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四人帮”中的“四结合”

本书名为《“四人帮”兴亡》，理所当然在开头，对于“四人帮”的来历以及“四人帮”中的“四结合”，略表几句。

“上海帮”，是对于“四人帮”的最初的叫法。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最后，人们称之为“四人帮”。

所谓“四人帮”，也就是指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一词，是对于江青反革命宗派集团的一种简明、通俗的称呼。

在“四人帮”中，最年长的是江青，最年轻的是王洪文。

江青，生于1914年；张春桥，生于1917年；

姚文元，生于1931年；王洪文，生于1935年。

在1976年，这四人的年龄分别为：

江青，62岁；张春桥，59岁；

姚文元，45岁；王洪文，41岁。

在这四人之中，江青是首领。但是，在四人之中，江青的职务并不最高，她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江青是毛泽东夫人，亦即“第一夫人”，所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她成为“四人帮”中的首领。

在四人之中，职务最高的是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洪文虽然职务最高，但是在“四人帮”之中，资历最浅，年纪最轻。

“四人帮”中的“智囊人物”是张春桥。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城府很深的人。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姚文元，人称“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在中国文坛上以“大批判”起家，进而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是一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工作。

[image] [image]

■ 王洪文

■ 张春桥

[image]

■ 江青

[image]

■ 姚文元

“四人帮”中的四人，通常按王、张、江、姚为序，称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那是按职务高低为序排列的。

实际上，“四人帮”是这样实行“四结合”的：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

“四人帮”的确切的“排名序列”应该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在“四人帮”之中，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其实处于核心地位。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一定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张春桥遭遇的两次炮打危机中，都是由于江青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闹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四人帮”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

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

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

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四人帮”最初被称之为“反党集团”，这表明他们是中共党内的反对派。后来在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时，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一词是精确的法律名词。

第一，以江青命名，表明江青是首领，而不是最初称之为“王张江姚‘四人帮’”，容易给人以王洪文是首领的误解。

第二，指明性质是“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要受党纪处置，而“反革命集团”要受国法制裁。

“四人帮”一词，最初是谁首创，不得而知。

“四人帮”最初被叫作“上海帮”。“上海帮”一词，最初是谁首创，也不得而知。

有人说，首创权属毛泽东。固然，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上，可以查到是毛泽东最早提到“上海帮”、“四人帮”，但未必就是毛泽东首创的──因为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听了某人反映的情况，这四人关系不正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拉帮结派，人们称之为“上海帮”、“四人帮”，于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人提出了批评。这“某人”已经很难考证，但是毛泽东的讲话记录倒是可以查到。

常在一些书籍、报刊上，写及1966年“文革”之初“四人帮”如何如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中，也说老帅们在“二月逆流”中如何跟“四人帮”作斗争……

其实，在1966年、1967年，还不存在“四人帮”！

“四人帮”是在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才形成的。毛泽东本来寄希望于王洪文，把这个年轻人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谁知王洪文到了北京，就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警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上海帮”的话。

毛泽东最初称他们为“上海帮”，显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名词。因为“上海帮”带有鲜明的地域概念，容易造成混淆，把在上海工作的干部都算进“上海帮”；再说，有了“上海帮”，就容易引出“北京帮”、“山东帮”、“广东帮”之类，更会造成混淆。

另外，“上海帮”给人的印象是由上海人组成的帮派，而江青是山东

诸城人，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他们四人之中，无一上海人。除了姚文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拉”都不会说。他们只是在上海生活过，或者原本在上海工作。所以，称他们为“上海帮”，并不太确切。

倒是毛泽东所说的“四人小宗派”，极为确切。

毛泽东显然发觉“上海帮”一词的涵义不准确，所以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便改称他们为“四人帮”：“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小宗派”，便被称之为“四人帮”。

当然，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人生道路上，上海的一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

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戏”，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克”—张春桥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亭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1948年入党，1957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追溯“四人帮”中四个“伙计”的“结交史”，也都是在上海。

在“四人帮”之中，江青与张春桥应该最早认识。

江青、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都生活在上海。据沈醉回忆，他在《大晚报》副刊主编崔万秋那里，既见到过穿蹩脚西装的张春桥，也见到过殷勤倒茶递烟的蓝苹（即江青）。当然，那时候的蓝苹是否与张春桥有过来往，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张春桥与姚文元相识。他们在上海当时都住在香山路。先是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团

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此后，姚文元与张春桥有了诸多接触。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在1963年从北京前来上海，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1966年1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安亭拦截火车，造成京沪线中断。张春桥奉命从北京飞往上海，赶往安亭。在那里，张春桥结识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王洪文，给予“鼓励与支持”。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那么，四人结成“四人帮”，是不是从毛泽东在197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批评“四人小宗派”算起呢？

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第一种见解—

主张以毛泽东的这一批评，作为“四人帮”出现的日子。

第二种见解—

以为四人结成“四人帮”，应该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算起：在四人之中，王洪文最后一个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当然，在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已经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但是，那不能说已经形成“四人帮”。“四人帮”，应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四人小宗派”，所以应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算起。

王洪文在1973年8月3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所以，“四人帮”应从1973年8月算起。

第三种见解—

王洪文并不是刚一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王洪文进入中

共中央政治局起，逐渐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小宗派”。到毛泽东批评这“四人小宗派”时，表明“四人帮”已经正式形成。所以，“四人帮”大体上形成于1974年。

这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

在笔者看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也许比较妥切：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开始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形成“四人小宗派”，亦即“四人帮”。

不论这三种见解如何不同，但是都一致认为，在1973年8月底之前，亦即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还没有形成“四人帮”。

接下来，书归正传。让我们循着“四人帮”每个成员的初起、发迹，以及如何狼狈为奸，横行一时，最后走向覆灭的轨迹，回顾“四人帮”的兴亡史。首先从“四人帮”的第一号人物江青讲起。

第一章　江青之初

江青的身世之谜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20世纪30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1972年跟美国的那个露克珊·维特克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露克珊·维特克写作“江青传记”（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20世纪30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1936年7月10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1930年—引者注）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俞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

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1936年7月1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1933年7月，当她拎着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时，不过是19岁的山东姑娘而已。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1914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3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露克珊·维特克自述身世。

江青，生于山东诸城东关街（也有的说是诸城府前街上秩沟）。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潍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诸城曾经出过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作家王愿坚、诗人臧克家等名人。诸城人称诸城有四大家族：一是孔老二的女婿家（公冶长，孔子侄女婿）；二是毛泽东的丈人家（也就是江青家）；三是康生的姥娘家（也就是康生家）；四是李清照的婆家。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

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是做车轮的木匠。江青说，“山东的木制手推车是很有名气的”。李德文雇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的元配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名叫李建勋，后来改名李干卿，生于1901年3月13日，比江青大13岁。女儿名叫李云露。

李德文五十多岁了，嫌发妻年老色衰，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作妾。

这个小老婆生下的一个女儿，便是本书的主角之一—江青。据说，本来李德文盼望生个男孩，事先取名“李进男”。可是，待孩子出生，方知是女孩，便以“李进孩”作为她的乳名（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另外，由于这个女孩是第二个女儿，在家中也叫“二妮子”。

不久前发现的江青与母亲在1936年的一帧合影，是江青母亲唯一存世的照片。

江青的出生年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通常说成“1914年3月”，因为江青1944年在延安填表时是这么写的。1950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

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67岁，亦即1914年生。

另外，江青对美国记者维特克也这么说：“我1914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3月生的……”

[image]
■ 江青（右）与母亲的合影

[image]
■ 关于江青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1968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1912年。

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彼得·弗拉第米洛夫在他1942年12月3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1912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有可能生于1912年。有人猜测，江青后来又改口说成1914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不过，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4年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

委员大辞典（1921—2003）》第267页，却说江青生于1915年。原文照录如下：

> 江青　女，汉族，1915年生，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又名李鹤、李云古、蓝苹、李进，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

在关于江青出生年月的三种不同说法之中，本书作者以为第一种说法（即1914年出生）更可靠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也采用第一种说法。

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不少报道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按照中国传统的命名法，她的母亲便叫“李栾氏”。

江青出生时，父亲已60岁。江青说，虽然她的妈妈当时也已年过四十，但在记忆里，妈妈比爸爸仍要年轻许多，两人有明显的年龄和体态的差距。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所以关于李云鹤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维特克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在此之前，她还曾如此说过：“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薛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薛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薛焕登为李进孩取名李云鹤，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属“云”字辈—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就叫李云露。

其实，“云鹤”倒也有出典之处。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为：

>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翩然一只云间鹤”，不断地“飞来飞去”，后来不是“飞”进了“宰相衙”，而是“飞”进了中南海！当然，这是后话，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由于本书主角的名字颇多，笔者经过一番查证，开列于下：

李进孩—乳名。

二妮子—乳名。

李云鹤—从上小学开始使用的学名。她去世之后，墓碑上刻着李云鹤这一名字。

李鹤—1933年7月她从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晨更工学团任教员，用李鹤这一名字。

张淑贞—1934年6月，她第二次来到上海，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当教员，化名张淑贞。

李云古—1934年10月，她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工总部逮捕，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看守所，化名李云古。

蓝苹—1935年春节，她第三次来到上海，进入影剧界，取艺名蓝苹。

江青—1937年8月，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李进—1951年6月，参加山东“武训历史调查团”，化名李进。不言而喻，此名源于她的乳名。1951年9月，她参加湖北农村土改工作组，亦用此化名。后来她发表摄影作品，用李进作为笔名。

高炬—1966年5月8日她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时所署笔名[1]。

峻岭—1971年在《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发表林彪学“毛选”的整版照片时所署笔名。

李润青—1991年住院时使用的化名。

此外，还用过李淑贞、李淑珍、李素浣、李青云、李维芳、李惠芳、兰淑孟等名字。

李家是个不安宁的家庭

李家是不安宁的家庭，“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

李家充满暴戾的气氛，其原因有三：一是大老婆、小老婆争斗；二是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们身上；三是江青的母亲李栾氏个性极强，不论在与大太太的争斗中，或者在与丈夫争吵时，不肯退让半步。

江青曾说，“由于我们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这种行为使他赢得了“骂街艺术家”的绰号。

就这样，江青的童年是在家庭不断争吵中度过，在贫苦、压抑和不幸中度过的。江青的个性极强，极为好强，一方面可能是母亲“遗传”的性格，一方面也由于家庭环境所造成。

维特克根据江青的自述，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 尽管无论什么时候他（指江青的父亲—引者注）感到气不顺，他就打孩子出气；但是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
> 他的有些狂暴之举是难以忘记的。那是个“花灯节”发生的事，适逢正月十五那天，一些地主家挂出了许多彩灯。似乎是受到这种超出他所能达到的富裕程度的炫耀的刺激而使他疯狂起来，江青的父亲抓起一把铲子冲向她的母亲。先是打她的后背，接着又击她的手，她的小手指都给打断了。当江青冲到她母亲身前以保护母亲时，她的嘴巴也被打着了，还打掉了一颗牙。正如江青所描述的这个强暴的情景，她母亲的手指留下残疾，她还用食指掀开自己的上唇让人们看她儿时被打碎的牙。
>
> 像一种思想上的反省一样，她谈道：“最初我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为我父亲就欺侮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事实上，导致他作出这种行为的根源是那折磨人的贫穷。”
>
> 无论他有天大的理由，这件事对于她母亲来说，终于使她不能再忍受这最后一击。她把江青绑在背后，娘俩逃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江青故弄玄虚地又说，虽然还仅仅是个孩子，但是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学着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随后独自在夜间行路。
>
> 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但还没有男性子孙的地主收留了江青母亲，作他们家的仆人。江青虽然最初拒绝和母亲一道去，不过随后还是同意了。她记得从那时候起，她母亲就一直被一些男人所包围。她母亲参与家务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使江青很为难，下面这些话为此提供依据：
>
> “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能够上学。只是因为学费和书

本是免费的，我还能够读完小学。但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挨饿或者吃冷饭。最终造成慢性胃肠炎的疾病。”

她记得在勉强吃下乡亲们救济给她的冰冷薄煎饼以解饥饿之痛以后，她呕吐了，很长时间始终感到恶心。她说，自童年起，她就患上了消化方面的疾病，且长期受此疾痛。

作为一个孩子，她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她讲到这里时明显地带着怨恨的语调）。

“所有的衣服都是一个哥哥传给我的。”

她的头发总是梳着两条小辫，这也招来麻烦。她母亲做工那家地主有一个小女孩，没事找事要嘲弄江青那奇妙的发辫式样。一次，那女孩正在辱骂的兴头上，突然猛揪江青的头发，这下激怒了江青，她竭尽全力将那女孩推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家里的其他成员一齐出动来整治她这个胆敢抗争的孩子。结果，她母亲只好带着她离开了这家。

不久，她母亲又找到一份工作。这一次是一家“破落地主”。那时财富的损失也就意味着要挨饿。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呆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框，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炕是中国北方家里用石头砌成的大床）。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江青大吃一惊，娘俩都直立在那儿，她母亲突然放声痛哭，一把将江青搂入怀中。她递给江青一块大饼，可是江青太疲劳了，一口也没吃就睡在母亲的怀里。母亲也一点没吃，轻轻地将这点宝贵的食物包起来，留着以后分享。

“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她多次重复这个事实，就是要留给她的听众一个很想知道的悬念，即她母亲找到的工作是夜间做事。在夜晚独自对想知道的事的想象，成为江青回忆童年往事的主题。江青接着说，别人在夜间走路都怕遇到妖魔鬼怪或神仙；而她却从未有过这种恐惧。但是有一样东西她害怕，这就是那些恶狗。

多年来，她常与摆脱不掉的恐怖为伴，它们穷追不舍，甚至要吃掉她。想到令人不安的恶狗，又使她回想起另一件事。

那时她住在一个叫陈庄的村子里，这里的人跟她家一样都姓李。那天她就吃上一顿饭，受饥饿折磨的驱使，她漫游到街上走入一条小巷寻找她母亲。在这个人口稀疏的村子里，恶狗猖獗。突然她受到一群贪婪的恶狗的攻击，而且一口咬在她的腿上。

回忆此事时，她撩起裤角，让人们看就在她脚踝上部的依稀可以看出的疤痕。由狗的狂吠声发出警报，她母亲奔跑过来，一把搂过江青拉入她的怀里，随后把孩子背起来回家去了，眼泪顺着母亲的面颊流了下来。

如江青自述的那样，在那年元宵节，由于父亲李德文满肚子的气，在盛怒之下，打了她的母亲以及维护母亲的她，她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

这样痛苦、屈辱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没有说出李德文在元宵节大打出手的原因：李栾氏不甘于在李家做二房，要求独立门户，以求与大太太平起平坐。李德文不愿一家分成两家，李栾氏坚不让步。于是，爆发了一场家庭大战。

大战的结局是李栾氏带着女儿离开李家，去自立门户了。

江青曾叹道："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尽管江青从小就对她的父亲毫无好感，对充满暴戾的李家并无好感，然而，江青与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倒相处甚好。尤其是跟比她大11岁的姐姐李云露，感情甚笃。

当然，江青从小最爱的，还是她的生母李栾氏。

江青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张家的小少爷，名唤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此人生于1898年，比江青大16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家原本不在诸城，而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大台庄。

张家四兄弟，大少爷张宗彝，二少爷张宗开，三少爷张宗儒，四少爷便是张宗可。

1915年，17岁的张宗可娶胶南县陈家庄的陈宜为妻，后来，生一子一女。儿子叫张玉珉，又名张子石，在"文革"后期曾成为杭州市负责人之一；女儿叫张玉瑛，在青岛烟厂当工人。

1917年秋天，张家在胶县遭到土匪抢劫。为了日后安全，旋即迁往诸城，从此定居诸城。这时候，张宗可改名张叔平。

张叔平在诸城县小学当教师，后来当校长。

1924年，张叔平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

长兼秘书长。自1930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1933年7月，张叔平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Ш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四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1937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对江青鼎力相助—这是后话。

由于江青和康生同为“大左派”，在“文革”中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政治关系非常亲密，于是有人就由后来推测当初，把江青与康生的关系想象为从小就“非常亲密”。

有的书描绘张叔平当年“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着打这里经过的李云鹤”。还有的书甚至描写在上海的时候，康生与江青如何有着“性关系”。也有的说，“康生虽然知道李云鹤也到了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其实，赵容（康生）是在1933年7月中旬，与曹轶欧一起前往苏联，从此离开了上海。而李云鹤匆忙从青岛逃往上海，恰恰也是在1933年7月，与赵容交错而过。怎么可能会有“性关系”？怎么会想接近“却无法接近她”？

这种由后来推测当初的推测法，近乎荒唐！

1937年8月上旬，当江青从上海到达延安，才过了三个多月──11月29日，康生也从苏联随王明飞回延安。

所以，江青与康生真正有了政治上的联系，那是在1937年11月底康生回到延安之后。在这之前，江青与康生是否认识，都不得而知──因为康生离开诸城的时候，江青只有10岁而已！江青在面对维特克的采访时，谈起自己的童年，也从未提及康生……

李云鹤的学戏生涯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教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1926年，12岁的李云鹤小学没有毕业，就失学了。

关于她失学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江青自己所说的冒犯了修身课老师，而她又个性很强，不向老师认错，被学校开除；另一种说法，则是说江青的母亲无法负担江青的学费，使得江青失学。

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李德文病重，而大太太已经去世，请求二太太李栾氏回家照料。

李栾氏终于又回到李家━因为李德文一死，她可以分到一笔遗产。

不久，李德文病死。

翌年—1927年，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李云露家。

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在天津，李云鹤第一回看到了电影，尽管当时放的是默片━无声电影，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她给姐姐家做家务━拖地板、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以及上当铺等等。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这么记述：

> 江青说："不过，体力劳动也使我更强壮起来。然而我非常想继续上学。但是，这里的所有学校的学费都是非常高的，我根本就付不起这笔学费。除此之外，我姐夫又失去了工作。"
> 第二年━她记得就是北伐军就要到来的时候（北伐军是1928年6月6日到达天津的），她决定离开家，打算到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当一名工人。那时，香烟还是靠手工制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是由

童工完成。

但是她姐夫阻止她去卷烟厂做工，尽管这种窘迫的状况已使她去当铺典当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姐夫告诉她，进入一个地方工作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小官僚”（这是一个她难以解释的名词）。由于他的反对和阻止，最后她遵从了姐夫的意愿。1929年姐姐全家迁往山东省会济南，江青和她的母亲也一同到了那里。

那是在1929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笔者曾在济南寻找过此屋，这年久老屋已经拆除）。

老是在姐夫家吃闲饭，毕竟非长久之计。江青听说济南有所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正在招生，便去报考。

关于江青考入山东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江青自己则曾这么对维特克说：“1929年，我在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所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那时我只有15岁。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另外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相当于60美分）。由于学校倾向于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而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的女学生太少的缘故。尽管我在这儿只学习了一年，但是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学习了到达我艺术之路的每个方面。我黎明前就起床，试图尽可能多地学到一些东西。”

[image]

■ 山东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院长是赵太侔。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学戏剧，李云鹤从此走上文艺之路。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侔（1889—1968）颇有声望，是著名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他原名赵海秋，曾用名赵畸，太侔为其字，后来即以字行世。赵太侔是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他在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8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

1925年5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后来赵太侔投身北伐，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北伐军进入山东之后，赵太侔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并于1932—1936年、1946—1949年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还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王泊生为教务主任。

王泊生（1902—1965）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江青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学习生活：

> 她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
>
> 虽然她的老师很喜欢她，但是这位男老师却是一个顽固的维持训练纪律的人。为了调准她弹出的节奏，老师用指挥棍敲打她的手腕，她哀叹这种教师的技巧。由于她受的训练太少，所以她只能做些基本练习，还没有达到一定等级水平。
>
> 江青所在的班级只有三个女孩，她的年龄最小。那两个女孩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都看不起她。因为她经常穿着补过的衣服。校长夫人是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在那

所学校学习过）。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是校长的妹妹，是一个“反动分子”，不断欺侮江青。但是江青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并设法用自己的方式作弄别的女学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她坦率地承认，她是轻松愉快地回想这些往事，而不纯粹是带着怨恨的。

这座学校建在一座陈旧的孔庙里，那些房间在夏季非常闷热。下课以后，学生们经常到巨大的厅里乘凉。江青还生动地记着坐落在大厅中央巨大的孔子塑像。那尊塑像孔子头戴一顶大帽子，前后装饰着缀有含珠的帘布，同在两侧的是他的七十二个门徒。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到那个大厅睡觉，不小心碰倒了一只破旧的藤椅，那两个女学生闲逛着走进来，她们命令江青马上起来，为她们把椅子弄好。江青决定以她自己的方式做这件事。她首先提出把灯举起来帮助她们，然后将把椅子推进大厅给她们使用。就在她们得意地坐下时她突然带着灯溜出了大门口，然后将身后的门砰地关上逃走了。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可怕的卧室里，那两个女孩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乞求来人救救她们。

王庭树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也这么写及：

山东实验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只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和陈崇娥，她们三人住一间宿舍。男同学较多，内中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赵荣琛等。

顺便提一笔，1929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1935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迫害。

另外，还有一位男同学，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名演员、名导演，那便是崔嵬。

《江青同志》一书这么描述江青的学艺生涯：

有一次，学校上演由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一部“资产阶级的戏剧”──《湖上的悲剧》这部实验作品。田汉创建的南国剧社在那个

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有很大影响的戏剧团体。她的那个校长夫人妹妹的同学被指定为领衔主角。江青每星期一扮演一个轮换的角色。那时观众通常是很少的。江青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流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致更多的泪水流出。这就是按照“自然主义”流派表演所产生的效果（正如她随后解释的，自然主义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放弃）。当她表演完后正在卸装时，学校的校长和她的老师大踏步地走进更衣室赞扬她的表演水平，并且高声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被他们的褒奖弄得不知所措，她感动得又流出了热泪，然后从更衣室里猛地冲了出去。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平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我没有告诉母亲就起程了，只是在火车开出前在火车站给她发了一封信。

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我们家最好的棉被子带来了，但是我仍冷得发抖。因为棉被的棉絮经多年使用已经变薄了。在北京的那个季节，正是多风沙的日子，猛烈的带沙风暴搅得人心烦闷，到了夜晚更是凄凉。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是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江青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凑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榘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从北平回到济南之后，江青有过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曾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这样写及：

> 1928年前后，我那时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有一个山东实验京剧团到北平（那时北京刚改称北平）演出，记得我曾去看过《打金砖》，演的是汉光武的故事。这出戏唱词很多，特别在最后凌烟阁自责一场。主角就是该团的团长王泊生，其他的演员姓名，都没有刊登海报，是否有女角李云鹤登台，我就无从查考了。
>
> 但李云鹤当时确是该团刚培养出来的小旦，而且当他们回到济南后，不久就由媒妁之言，和一个后生结婚了。……大概是因为嫌弃新结婚的小丈夫太“土头土脑”吧，也许那时自认为是“江上有青峰”，怕长期隐没在白云之中？总之，这个小女人是逃出了家庭，偷偷到了青岛，投奔赵老师求助。自然，她的学历是不够上大学的，无可奈何，赵太侔给她在该校图书馆安排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位置。没多久，她竟和正在山大（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改名山东大学—引者注）读书的赵教授的内侄黄敬，由卿卿我我而正式宣布同居。[2]

江青的那位“小丈夫”究竟是谁？徐铸成没有说及。美国罗斯·特里尔所著《江青正传》一书，根据江青当年的老同学、后来在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写及了这一段往事：

>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
> 有个姓费[3]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又名《湖上的悲剧》—引者注）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也很像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惨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
>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拮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1930年底，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
>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

> 十时）才起，“像个指使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4]

那个“费君”—裴明伦，是江青三叔李子明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且是独子。他跟江青的婚姻非常短暂。江青1931年5月嫁给富家子弟裴明伦，7月，便与裴明伦离婚，可谓闪电结婚、闪电离婚。

江青与裴明伦离婚之后，从济南前往青岛。她后来的经历表明，她的每一次婚姻的破裂，总要离开原先居住的城市，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番新的生活。

王庭树这么说及江青从济南来到青岛：

> 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侔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
>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国立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

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振声（又名杨金甫），教务长便是赵太侔[5]。

[image]
■ 作家、教育家杨振声

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江青在梁实秋手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对于江青来说，她在青岛大学所受到的影响，深刻地决定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她曾这么自述：

> 1931年的初春[6]，我来到青岛。寒冷的大雾和港湾里带着盐味的海风，多奇妙啊！我从前的一位姓赵的老师，也是我的一个街坊（他曾任山东实验剧院的导演），现在是青岛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在文学系任教授。既然有这层关系，他就安排我到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在一张青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1931年全馆工作人员合影中，既有戴眼镜、穿棉袍的馆长梁实秋，也有穿西式大衣、打扮入时的助理馆员李云鹤（见后面）。

根据江青的回忆，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

> 虽然赵先生的邀请使她的心情轻松些，但是要搬到青岛这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仍使她感到不适意。为了鼓励她，赵先生应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她感兴趣的艺术系，而且答应支付她的青岛的旅费。她的那些实验艺术剧院的同学们都极力主张她接受邀请。最后她同意了。
>
> “实际上赵先生属于国民党的改良派。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观

点与胡适的那些观点很接近。我曾很欣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意识，”她带着一丝笑容进一步地说，“那时胡适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包括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他们试图把我拉到他们那边。闻一多是我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我旁听了他的许多门课。”

“我们最大的反面教员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以后，我国东北三省（满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外国的奴隶。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到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高潮。许多学生举行罢课，或者到政府权力机构请愿，而且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这场运动吸引了广泛的各阶层人民。

“这种形势唤醒了我，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想参加请愿活动。’他把我顶了回来，‘那么你也想惹麻烦吗？’我被吓得哑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于是我调转身走开了。我完全清楚，他对我的行动感到极为不快。我独自走上了一座小山，在树林中徘徊，深深陷入思想混乱之中。按照他说话的含义也就是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制造麻烦’。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在青岛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了我老师给予我的更多帮助。于是我加入了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成为一名图书馆职员，我的工作就是填写卡片。与此同时，我还继续旁听大学课程。每个月我可挣到三十元钱（约合九美元），并给我母亲寄去十元。由于青岛的生活费用非常高，所以我留下的二十元钱是不够我花销的。正如你们所知，我不能只养活我自己，我还必须掏腰包为抗日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用—没有人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帮助。当我们把演出送到工厂或农村时，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欢迎和帮助。但是他们也很缺钱，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解放全中国必须依靠穷人才能夺取胜利。”

[image]

■ 1931年在青岛大学做图书管理员的江青（左三），图中戴眼镜者（右三）为梁实秋先生。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1981年1月13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道《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间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8]，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2004年5月28日，笔者在旅美画家李斌、王亚卿夫妇处看到一帧从未见过的江青17岁时的照片：这是四人合影，李云鹤（江青）17岁（前左）。前右为邓宛生，后左为邓译生，后右为杨蔚。

[image]

■ 江青1931年秋在青岛的照片

邓译生和邓宛生为姐妹，青岛大学校医主任邓仲纯之女。邓译生又名方瑞，后来成为剧作家曹禺的夫人。杨蔚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作家杨振声之女。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为1931年秋，地点为青岛黄县路7号。那是一幢米黄色外墙、二层带阁楼的洋房，住着杨、赵、邓三家。杨即杨振声，赵即赵太侔，邓即邓仲纯。

当时，李云鹤住在赵家。

李斌先生告知，这帧照片是在香港邓宛生女士家翻拍而得。他当即致电83岁的邓宛生女士，征得她的同意，把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供我收入《“四人帮”兴亡》一书之中。

据江青自述，17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曾经非常仔细地修改过她的习作，使她在写作上大有进步。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众所周知，从抗战开始，由于沈从文与左翼作家们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成为批判对象。1949年后沈从文一直处于逆境之中，只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古代服饰。然而江青一直记得他。1973年，江青曾经特意安排沈从文在人民大会堂看演出，但是沈从文只愿意坐在一个角落里。

就在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19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江青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太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

俞珊乃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氏，望族名媛，1908年生于日本东京。俞珊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来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及南京金陵大学。她天生丽质，精通英语，才貌双全。

1929年，田汉带领南国社剧团到南京金陵大学演出话剧《湖上的悲剧》，发现该校女生俞珊有一双“金色的眼睛”，而且有演剧才华。应田汉之邀，俞珊加入南国社。当时，田汉正在筹划演出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田汉早在1925年就翻译了《莎乐美》剧本，田汉聘请俞珊主演，自任导演。

21岁的俞珊初出茅庐，一炮而红。1929年7月29日至8月5日《莎乐美》在南京、上海演出，引起轰动。当时的评论认为，俞珊“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出版的《插图中国话剧史》一书，还把这张剧照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封面和封底上。

1930年，俞珊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卡门》的改编者仍是田汉。她，成了名演员。就连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倾慕俞珊，在自己上海四明村的书房里挂起一幅俞珊在《莎乐美》中的剧照。

在俞珊的热心观众之中，还有梁实秋。《莎乐美》在上海首演时，梁实秋就是捧场者之一。梁实秋与俞珊相识。

就在俞珊在演员之路上登峰造极之时，遭到父亲俞大纯的激烈反对。俞大纯以为，女儿当戏子有损名家门，警告俞珊，倘若再上舞台，他就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无奈，只得遵从父命。

1930年，俞珊在上海患疟疾和伤寒。待身体稍好，医生劝她到风景宜人之处休养。正巧，梁实秋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执教，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青岛当然是风景宜人之地。于是，俞珊随梁实秋前往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职，权且休养。

俞珊的到来，引来赵太侔的追求。赵太侔与原配妻子离异，爱上比自己小19岁的俞珊，并与俞珊结婚。“蜚声戏剧界之名闺俞珊女士与赵太侔君新婚”，在当时的青岛，一时间成为新闻。

江青在青岛住在黄县路7号赵太侔家。江青翻阅着俞珊的剧照相册，对俞珊极为羡慕。虽然俞珊只比江青大6岁，但是江青称她为师母，而且喊得很亲热。

在赵太侔、俞珊那里，江青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据邓宛生女士在电话中告知笔者[9]，当时她还充当信使，在江青与俞启威之间传递情书。

最初的爱侣黄敬

俞启威成了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俞家乃名门望族。为了详细了解俞家身世，笔者几经周折，于1988年11月3日在北京访问了俞珊的胞妹俞瑾。当时年近古稀的俞瑾，眉目清秀，个子瘦弱，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身老式的蓝卡其衣服，独居于一幢很普通的宿舍楼。步入她的住屋，墙上竟挂着从1985年起的一本本挂历—过时了她也不取下。她说从未有人前来采访。看罢我的介绍信，她陷入了回忆。她谈吐缓慢而清晰，思维很有条理。面对我的录音机，她谈起了她的三哥俞启威……

俞家是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鲁迅的同乡。

祖父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清朝翰林，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

俞明震曾随台湾巡抚唐景崧赴台任职，适逢甲午战争，与日军作战，受伤返回内地，撰《台湾八日记》。因精通军事，为清廷派往日本考察军事教育，返国后任南京水师学堂督办，亦即校长。1898年，18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就是俞明震。

[image]

■ 俞明震

鲁迅在《朝花夕拾》一书中，这么写及他的老师、“新党”俞明震：

> 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俞明震著有《觚庵诗存》四卷。俞明震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俞明震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那房子人称“俞庄”。俞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也都置有房产。

俞明震三兄弟，他是长兄。

他的小弟弟俞明熙曾任湖南陆军小学堂（原武备学堂）总办、清军

协统，热心维新运动。

俞明熙之妻曾广珊也是名门闺秀，乃曾国藩的孙女，曾纪泽之女，书香世家，擅诗文。

俞明熙的长子俞大维，也是名人。

笔者于2010年3月1日在金门访问了“俞大维先生纪念馆”。纪念馆里的《先生家世》，写明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1896年12月2日出生。绍兴俞家，是名门望族。《先生家世》中写及俞大维之父俞明熙，清军协统。俞大维之母曾广珊，为曾国藩孙女。

其实，金门“俞大维先生纪念馆”的《先生家世》把俞大维的出生日期写错了，俞大维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应为1897年12月25日。

俞大维18岁入复旦大学预科。19岁，考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后因病辍学。两年后，插班考入圣约翰大学，三年后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18年10月，至美国哈佛大学，专攻哲学数学。1920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希尔顿旅行奖学金。

俞大维后来成为导弹专家。俞大维不是国民党党员，却先后任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部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

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

97岁高龄之际，俞大维在台湾接受香港《新闻天地》社长卜少夫的采访，思路非常清晰，还提及在南京四条巷的故居，提及当年堂侄女俞珊在南京演话剧《莎乐美》，导演是田汉……

1993年7月8日，俞大维在台去世，享年97岁。

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俞大维另一个妹妹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嫁给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化学家曾昭抡。

俞明震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算起来，俞大维是俞启威的堂叔，一个成了国民党政府大官，一个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

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任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据俞瑾回忆，俞大纯在日本学化学，回国后在南京家中制造炸药，不慎爆炸，幸未受伤。在当时，私制炸药要判杀身之罪，俞大纯赶紧躲往德国，直至几年之后才悄然回来。

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

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长兄俞启孝出生于北京，后来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

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

老三便是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在兄弟姐妹之中，唯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

老四俞启忠，学农，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大姐俞珊其实是老大，小妹便是俞瑾，妇产科专家，博士生导师。她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退休之后，独自在家看看电视。她告诉笔者说，她看过印着姐姐剧照的画报，也看过姐姐演的戏，觉得姐姐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

俞瑾记得，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

在俞明震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1930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image]

■ 俞瑾教授

据俞瑾回忆，三哥黄敬（由于俞启威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相称）从小就与众不同。他没有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那时，有一个名叫小亭的佣人专门伺候他，三少爷待小亭如同手足。三少爷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一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

俞瑾记得，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1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59号鄂家大院。那是一幢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1898年生。191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校长便是徐特立。1917年随舅父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结为挚

友。1922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1925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戏剧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1927年，扩大为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他本名谢伟伯，中共地下党员。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1930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弢（后来改名王林）同住一屋。这位王弢，便是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

虽说王弢已经注意到黄敬思想左倾，不过，并没有马上发展他加入中共，其原因是黄敬的家庭背景颇为复杂，需要对他进行考察。当时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当时化名李春亭），向王弢说过这样的意见。这样，当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尚不是中共党员。

19岁加入中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江青和黄敬，都投入了学生运动。

江青在对赵太侔说：“我要参加请愿”被认为是去捣乱后，便决定参加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

江青说，1931年她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并在第二年参加了反帝国主义联盟。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江青跟黄敬的相爱，倒是真心实意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这么回忆：“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侔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同时我和她的爱人俞启威则共一宿舍，所以对他们两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image]

■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黄敬

江青自己则说，她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使她有机会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在下班时间里，她读了她的“第一部马列著作”—列宁的一篇文章，这使她开始对中国的另一种可能出路—社会主义有了兴趣。

2001年3月，笔者来到位于青岛八大关的青岛大学旧址（今山东海洋大学）。江青当年工作过的图书馆仍在。那是一幢两层的欧式建筑物。在青岛大学，闻一多的住处已经辟为纪念馆，而梁实秋的住处前立了石碑，上刻“梁实秋故居”。

江青和黄敬志同道合。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江青也参加了。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黄敬、江青外，还有王弢、崔嵬、王东升、张福

华，王弢为社长。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文艺新闻》，称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预报暴风雨的海鸥”。海鸥剧社和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人赵铭彝取得了联系。

[image]

■ 叶永烈寻访江青当年在青岛大学工作过的图书馆（身后的楼房）

江青和黄敬结合，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新潮人物，不拘泥于这些礼仪；另一方面也由于俞家是名门望族，择媳择婿总希望门当户对，江青出身低微，这样的婚事难以得到俞家父母的认可。

江青曾这样谈及自己当时生活的困境：“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很高，除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

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1932年春夏之交，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弢成了密探追捕的对象。

“到上海去躲一躲，我的家在上海。”黄敬对王弢这般说道。

于是，黄敬秘密地陪伴王弢前往上海。安顿好王弢的生活之后，悄然返回青岛。

黄敬接替了王弢的空缺，担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他是赵太侔的妻弟，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党员。

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青岛地下市委屡被破坏。1932年12月上旬，中共上海中央局派李俊德到青岛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当时，李俊德化名“老王”，于1933年3月成立中共临时青岛市委，李俊德任书记，王经奎任组织委员，黄敬任宣传委员。

江青曾说，1933年初的一天，三个共产党员被安排去假装在青岛的街上偶然碰到了江青，她被引导着在一个男学生的陪伴下沿着一条特定的路线散步，这两个人靠得很紧，似乎是一对恋人，但事实上，他们走得很小心，警惕着密探，并注意接头暗号。这次策划成功了，她与党的直接代表联系上了。

1933年2月，经黄敬介绍，江青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江青曾说，当她在青岛秘密参加共产党时，她几乎不知道党的组织机构，也不知道除了她周围的几位同志外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她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得很少。作为一个生活在被男人统治的世界里的女子，她还很脆弱。

然而江青后来却多次说起，李大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就连跟美国

记者维特克谈话时，江青也说，1933年她入党时李大章是介绍人。

李大章，亦即李俊德，亦即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老王。

其实，江青的入党介绍人应是黄敬，而江青入党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李大章批准的。由于入党介绍人需要两名，而江青只有一人，所以就加上了李大章为第二介绍人。在“文革”中，江青已经成为“中央首长”，在公开场合不便再提黄敬，因为黄敬毕竟是她的前夫，所以她只说李大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不过，李大章为人低调，即便是江青显赫之时，也从来不提曾经批准江青入党之事。

李大章是资深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章原名李畅英，号如章，1900年生于四川省合江县，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跟邓小平是两位刻蜡版的好手，油印的《赤党》月刊便出自他与邓小平之手。

李大章在1925年起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执委会秘书长。同年下半年转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国共青团旅莫斯科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北军（国民联军宋哲元部）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7月起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被捕入狱，1930年出狱。1931年初到上海入中共中央培训班学习。1932年5月到香港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工作。1932年底调任中共青岛临时市委书记。1934年起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工作，任上海中央局秘书长。此后，他还担任过刘少奇秘书……

解放后，李大章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副书记、四川省省长。

在“文革”中，李大章一度被作为“走资派”打倒。1968年3月15日20时至16日0时30分，为了解决四川问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四川省军政领导以及造反派头头，其中李大章“是中央决定他参加的”。

在接见大会上，根据当时的记录，江青与李大章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 江青：我认识你（指李大章）是1932年还是1933年？
> 李大章：1932年底。
> 江青：主要是触及自己灵魂，揭发，群众是会原谅你的……还可以揭发刘少奇，北方局你是知道的。
> 李大章的问题不知说了多少次了，到现在站不出来。李大章同志，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要保持革命的晚节。

由于有江青的这番话，李大章很快就得到“解放”，成为“三结合”中

的革命干部。1968年5月至1975年10月，李大章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8月16日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75年11月起，李大章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1976年5月3日，李大章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在江青入党之后不久，在1933年7月，一桩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是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密探逮捕。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江青曾经这样自述这次坐船的经历：

> 我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

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一位28岁的青年前来接她。

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17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19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1925年，23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1946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江青说，到达上海的那天晚上，偶然碰到了她的另一个朋友。这人属于一个与俄国联合的戏剧社团。这个戏剧社当时正在排一部有关中国农村的“进步戏”。这个朋友邀请他到一家公司吃快餐，这个公司是当时

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饭店的沉静被一阵从街道上传来的女人的尖叫声打破了。“怎么回事？”她警惕地问。“只是一个妓女在拉客。”他回答说。这就是她对上海有名的街道生活的第一次观感。

江青还说，那天晚上的谈话对她以后在上海的四年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她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新成立的春秋剧社，那时这个剧社是左翼戏剧活动的主要力量，由戏剧家田汉领导，他也同时是左翼剧作家联盟的头领。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贯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田汉在1932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江青说，在寻找田汉和春秋剧社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中度过了自己在上海的最初日子。找人，建立联系，对她来说都是极困难的。她终于得知，田汉是两兄弟中的长者，他的弟弟田沅被指定来与她联系。他带她去见他的哥哥田汉。田汉那时正在为了避免遭受政府的扣押而不停地在他的几所住处搬来搬去。她被带到一个田汉母亲住的地方，田汉母亲慈祥地接待了她，江青和田汉母亲一起住了几天。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1930年5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24岁罢了。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一天，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

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1972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10]，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被成千上万次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image]
■ 深知江青历史的徐明清（叶永烈　摄）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1977年3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1989年9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米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1941年12月16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1911年5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1926年底加入共青团，1929年秋由团转党。

1984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15位在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15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1928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1930年4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

[image]

■ 30年代的陶行知

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1932年10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

根据晨更工学团柴川若的回忆，写道：

> 晨更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筹办的第一个普及大众教育的组织。从表面上看，它政治上不偏不倚，提倡教育救国，实施实验教育，实际上它是我党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大都是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核心的组织和团结作用。晨更工学团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工农大众及其子弟，包括纱厂女工、小店员、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
>
> 工学团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有全日制的工人子弟学校，也有各种业余的夜校。[11]

正因为田汉之弟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当时叫李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又名徐瑛，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陈企霞之子陈恭怀在《我的父亲陈企霞》一书中说："当时和父亲一起在工学团工作和任教的有柴川若（现北京市委离休干部）、徐瑛（即徐明清，工学团团长，现中央农村工作部离休干部）、李鹤（即江

青）、王洞若、王东放、袁超俊（又名严皋）等人。”[12]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泾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

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

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1932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1933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13]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由徐明清为介绍人，加入共青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后来，江青向美国记者维特克这么叙述自己初到上海的经历：

> 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带我去见了田汉。田汉叫我哪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就信任我了。
>
> 过了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

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

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他们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晨更”与陶行知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

“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你把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你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

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到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

黄敬来上海寻找江青

1933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黄敬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泾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儿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1934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

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黄敬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泾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黄敬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黄敬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泾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江青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1923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江青对维特克还这么自述：

> 我到了北京。我在北大旁听不要钱。那时一个月花七元钱。
> 北京图书馆是全国最著名的，我从朋友那里搞了借书证，带烧饼进去，一整天不出来。有几个月学会了脚踏车，尽闯祸。
> 有一天，我和赵丹、崔嵬一起骑车，赵丹在前，崔嵬在后，来了个流氓把我逼下车来，崔嵬、赵丹把他揍了一顿。

几个月后—1934年5、6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14]。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江青曾经这样说及当时自己的经历，她是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安排到浦东的。江青分配到了一间位于厂区的宿舍，她自己在后面还有一间房子。前面的房子用作教室，女工们住在附近的另一间房子里。刚开始时，由于是新手，工作效率不高，她感到很扫兴。比如，在参加演出和

政治活动的同时，她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备课，还要批改学生作业，结果总是筋疲力尽，没有时间睡。在她的记忆中，那段日子最主要的感觉就是非常疲惫。

江青说，与那些女工相比，这又是微不足道的。她的学生大都来自中国人经营的日本纺织厂，其他的在英国烟厂，尤其是英美烟叶公司。这些人早晨6点开始工作，为了准时到厂，她们4点就得起床，摸黑往厂里走。英美烟叶公司的工作条件如同地狱一样，女工的最高工资是每月17—18元。童工也很多，但挣得的钱却很少。夏天，天气很热时窗户仍是关的，车间闷得像蒸笼。而冬天，窗户又是打开的。为什么？因为雇主认为太舒服了工人就会变懒，所以用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来控制工人。车间里脏得让人一看就恶心。

1960年5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 1934年，我18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指徐明清—引者注）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引者注），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
>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曾这么自述：

>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
>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
>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

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image]

■ 从江青住地查出的饶漱石专案组提供的关于黑大汉的资料

在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则是这么记述的：

搬到新的住所后，她有一天在去寄信的路上碰到了一位青岛来的老朋友，江青清楚地记得他穿一套白制服。谈话中，那人说他在国际住宅区的上海邮局工作，但是他显然属于左翼的某个组织，在邮局工作只是一个幌子。他多次强调，很高兴见到她，她会对他的工作感兴趣并帮助他吗？她愿意替他给她任教的学校里的人送信吗？她对他的这些提问感到迷惑和害怕，她说她“还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她向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汇报了这次意外的相遇，组织对她如何再去见面给出了建议。几天后，她去兆丰公园散步，这是一个由外国人建的公园，但是她可以进去，因为她买了一张季票。在那里，她又一次碰到了她的朋友，根据教育家联盟党组织的指示，她交给他一封信，尽管她不知道信的内容。他们交谈了几句，她告诉他不应该再见面，他似乎理解她的处境，但又很明显地不想与她失去联系。

几天后，他给她送了一份左翼的出版物《世界知识》，仍然表达了对她的好感，并邀请她一块吃饭，她有些害怕，说是没有时间，谢绝了他的邀请。

为了缩短路程，她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了公园。那条道在一片住宅区旁，她在那又碰到了一个原来在青岛当秘书的女朋友。那女孩邀她到她的屋里谈话。江青不敢耽误时间，拒绝了，继续往回走，那条道上没有公共汽车。

在离开那女孩后，一阵男人的叫声从她背后传来，她看到有两个人在追一个人，向她这个方向跑来，另一个人在骂：“你们这些蠢猪！”过了一会儿，她感到两个人紧紧跟在她后面，她转过脸去，看到其中一人是工人模样，另一个像商人—都是特务伪装的。没等她说出话来，那两人就抓住了她。

平生第一次遭到“绑架”，她很气愤地告诉那两个人，在外国人住地进行这种绑架是非法的，但是这种争辩是没用的，她被鲁莽地带到了警察局。主管人不在，那两个人不能像以往那样搜身，他们没有让她脱衣服，只搜到了那份《世界知识》，这刊物本身是没有争议的。

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把她扣在警察局，那两个人还是决定把她送出市区。江青害怕被送到陌生的地方，便告诉那两人她在夜里找不到出城的路，而且她的穿着也不合适做这种旅行。那两人没有被她的话打动，为了让她尽快离开，他们给了她一件亚麻布长袍，若是平常，她是绝不会穿这种衣服的。但现在，她将它套在了自己的身上，又在上面加了自己的外国风格的礼服，还有一件毛织马甲。

就这样，她穿着奇怪地离开警察局，走进黑夜中。

像她生活中其他恐怖的事情一样，江青描述这次夜行时用了许多夸张和奇怪的词语，她走得很快，能跑则跑，路上有次差点又被拦劫，她都逃了过去。很快，她到了城市边缘，乡村就在前面，她累得气喘吁吁，继续往前走。突然，有一双手从身后抓住了她，她尽力去挣脱，但是失败了，她大声地叫“有人遭绑架了！”但是没有用，在城外是没有人会听到，来救她的。她以为抓她的人是警察，但是，当她仔细看时，发现他们是身着便衣的密探。逃跑是不可能的，为了给自己壮胆，她显出很生气的样子，她指责那些人像是畜牲。她的话起了作用，其中一人放松了她，显出一点骑士风度。

她被押到了一个地区警察局，锁进了单人牢房里。她听到他们在打电话汇报说他们抓住了一个嫌疑犯。

在审问的时候，她对每一件事都装得很无辜的样子。他们看到了她在公园里出现和她与一个年轻人的约会—显然，是那人告密（她已经多次被盯梢了）。她说，去兆丰公园散步是她的习惯，因为她喜欢在那儿看小孩子玩。她编的故事让那些人相信了，但仍受嫌疑，从地区警察局转到了市里。她很气愤：“你们应该把时间花在抓真正的共产党员上面！”

牢里的大多是政治犯，其中有一个有经验的共产主义分子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建议。打量了一下江青的外表，她告诉江青不该留短发，那样会让人觉得她很激进，她自己就留着长辫子。但别的狱人唱革命歌曲时，她唱京剧！（江青说，那段日子，她确实很懦弱。）不管她尽力装得多么迟钝，警察还是没有停止对她的调查。她后来知道，警察之所以不肯放过她，是因为牢里的另一个“女叛徒”告了密，说她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迟钝。

不论是江青的回忆，还是维特克的记述，毕竟离历史真相相差甚远。江青“用了许多夸张和奇怪的词语”。

了解这一历史真相的是徐明清。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15]，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1934年10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1934年6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6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10月下旬，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干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142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10月26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上海的中山公园，离北新泾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

阿乐在兆丰公园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季英于1976年10月20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 1934年10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1934年11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1935年1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覃晓晴，则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履里路（今上海建国西路—引者注）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朱大启在解放后被捕。1958年5月19日，朱大启在狱中写下的供词中，有这么几句：

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他（她）谈过话。

朱大启写这一供词时，并不知道“李云古”是江青。

朱大启在1968年2月20日，在供词中又一次涉及“李云古”：

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1935年初（注：应为1934年10月）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

这时候，朱大启仍不知道“李云古”正是当时（1968年）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江青。倘若他知道“李云古”即江青的话，他断然不敢这么写的。

朱大启这两次写下的供词，也正因为他不知道“李云古”是谁，所以他的供词比较接近于真实。他的供词表明，他确曾参与处理江青被捕一案，但是他并没有对“李云古”在狱中的表现说过什么。

在江青倒台之后，专案人员提审了已经在1975年获释的朱大启。专案组告诉他“李云古”即江青。面对专案组，朱大启在1977年1月18日写下一份材料，全文如下：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1934年下半年被国

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1934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朱大启所写的这份材料，后来收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成为定江青为“叛徒”的重要依据。

不过，当时定江青为“叛徒”的证据并不充分。正因为这样，在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没有审判江青的“叛徒”问题：

1980年9月10日上午，王文正[16]和参加“两案”预审的人员在秦城监狱听取了对于法庭上是否审判江青“叛徒”一事的传达。负责传达的是王洪文预审组组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传达的是9月8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的内容：江青的叛徒问题，在审讯中未被追问，“两案”审判的是刑事犯罪，四五十年前的叛徒问题纵然核实，也不能判刑，只是党籍问题，现党籍已开除。江青的历史材料已被她销毁了，现在能够证明她是叛徒的材料和罪证都不足。如果在法庭上提出，江青必然反咬一口，反会冲淡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这一点要向中央报告一下。

根据这一情况，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对江青都没有起诉有关叛徒问题，特别法庭在法庭上也未对此进行审判。[17]

不过，江青对于她在上海曾经被捕一事，讳莫如深。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曾经写及与江青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说起江青在上海曾经被捕一事，江青急忙掩饰：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即陈丕显夫人—引者注）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

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此处似误，黄赤波的公安局长任期为1957年3月—1967年1月—引者注）、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18]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19]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国民党的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脚下。如今，那儿成了牛头山水库。

从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费，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子里的亲友都友好地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然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这里简直是个“保险箱”。四面环山，只有村前一条路。有谁来了，远远地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朝山后的小路上一逃，躲进大山之中，纵有几千人马也难以寻觅。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徐明清便回到家乡，躲过灾难。

江青初来时，天天发低烧，双颊红润。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亲，他是北平军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徐明清请他为江青看病。他断定江青得了肺痨（即肺结核）。经他诊治，江青低烧渐退，肺痨渐愈。

徐明清的父亲也为江青诊治，徐明清的父亲是老郎中，用中草药为江青治病。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徐明清说，江青那时停经多日，这时候也恢复月经了。

黄敬不时写信来。从信中得知，黄敬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那个远离十里洋场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简直过着疗养生活。空余时，打打毛线衣，如此而已。她的脸色由黄转红，人也变胖了。

在南坳村住了两个多月，江青想离开临海，上北平找黄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徐明清因母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况且春节即将来临（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2月14日），希望在家里再住些日子。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黄敬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给了她路费，并一直送她到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走后一个多月—1935年3月，徐明清见母亲恢复健康，离开了临海，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东，在那里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这时，剧联的成员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里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了他。

孙达生介绍江青重新入党

北京的迎春花在几天内黄灿灿地都开了。1993年4月，当我住进位于玉渊潭公园之中的望海楼宾馆，便置身于一片黄色的海洋之中了。那里离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的住处不远。当我给她打了电话，她马上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已经八十有二的她，身体还不错，不时外出开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说走路时已显得蹒跚。

这一回，徐老除了向我补充讲述了有关江青的一些情况之外，特地向我推荐了她的老战友孙达生。她说，孙达生也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建议我去采访孙老。她告诉我，江青本人也曾把孙达生列为历史证明人之一。

她给孙达生打了电话，于是，我跟孙老约定了见面时间。

孙达生住在北京的西北郊。年已八十有二的他，瘦削而灵活，确实有点"孙大圣"的风度[20]。

说起他的名字的来历，孙达生哈哈大笑，用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对我说道：江青被捕后，曾向中央专案组提及有个名叫"宋介农"的人，可以证明她的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可是，专案组查来查去，查不到宋介农其人。后来，还是从徐明清那里得知，宋介农就是孙达生。再一查，孙达生的工作单位在"文革"中已内迁到四川。赶快派人赴四川，到了那里，才知孙达生正在北京治病。于是，重返北京，才找到这位"孙大圣"！

孙达生确实姓宋，1911年出生于吉林双辽县，原名秉全。后来，他在上海学习农业专业，遂改名宋介农。193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江青—那时叫李云鹤，从山东来到上海，所以她只知道他叫宋介农。

[image]

■ 叶永烈采访江青在上海的入党介绍人孙达生

至于他怎么会叫"孙达生"，内中有一番趣事：那是中共地下组织考虑到他是东北人，便派他前往张学良的东北军工作，需要改名换姓。改什么名字好呢？当他请张学良的好友杜重远先生写介绍信时，杜重远给他起了个名字"张万发"。介绍信写好时，他细细一思量，觉得姓张不好，因为他是东北人，姓张容易叫人误以为他是张学良的什么亲戚。杜重远以为言之有理，拿起毛笔沉思了一下，把"张"字略加改动，变成了"孙"字，从此他便叫"孙万发"！

这位孙万发持杜重远的介绍信去见张学良将军手下的军长王以哲，马上就被任命为少校秘书，人称“孙秘书”。凭着少校军衔，他免费乘坐火车软席，往来奔走，做着中共地下工作。

后来，在西安事变之后，他生病需要住院。这时张学良在南京被拘，他这位孙万发秘书也引起注意。住院时填病历卡，刘澜波替他写上“孙达生”。他问刘澜波为什么给他取名孙达生？刘澜波笑谓：“孙达生”，孙大圣的谐音也。你瘦削机灵，身份又千变万化，不正是孙大圣吗？

不久，他来到延安，就用“孙达生”这名字。不料，这名字一用竟用了一辈子，以至现在身份证上都写着孙达生。他的本名只有在填写履历表时才提到。

在说罢“孙达生”的来历之后，他跟我谈起了江青。

江青是在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江青匆匆离开青岛前往上海时，未带中共组织关系。在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见她表现不错，便发展她为共青团员。田沅在那里教日语。孙达生也在那里工作，结识了江青。

孙达生记得江青那时在工学团教唱歌，排练话剧，刻蜡纸，印传单，颇为活跃，工作也积极。那时的生活颇为清苦。有一回，江青说施展手艺，炒了一盘青菜，孙达生和朋友们吃了都说味道很不错，后来才发现他们半个月的油都用光了。

江青提出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并向徐明清、孙达生说明了她在青岛加入过中共。可是，由于无法得到证明，徐明清、孙达生认为还是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为好。

那时，孙达生担任左翼教联常委兼党团组织委员，由他出面找江青作了两次谈话，并准备由他作为江青的入党介绍人。

孙达生把江青的情况向左翼教联党团组织作了汇报。他记得，1934年9月左翼教联党团组织已经同意吸收江青入党。

就在此后不久，江青突然失踪了。

孙达生许久不知江青音讯，后来才知道她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据了解，特务们跟踪的是阿乐，偶然抓住了她，并不知道她的底细。她在狱中只说自己是女工学校的教师。过了一个多月，特务们审不出什么名堂，也就准备放掉她。孙达生得讯，忙于营救。

孙达生以为她的案情很平常，不必找上层关系出面保释，由女工学校出面即可。谁知女工学校是一所未经教育局登记的补习学校，不能作保。于是，孙达生请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开具证

明，为江青作保。

出狱时，要办理例行手续。江青在印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决不参加共产党活动”之类句子的单子上签了“李云古”。然后，她交保获释。

当时孙达生用的名字是“宋介农”。所以，江青把宋介农列为她的历史证明人之一。

孙达生说，由于江青突然被捕，而出狱后组织上要调查她在狱中的表现，所以关于她重新入党之事，也就搁了下来。

笔者问孙老：“江青在被捕前夕，即1934年9月，左翼教联党团组织既然已经同意吸收她入党，那么江青算不算已经重新入党了呢？”

孙老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从组织手续上说，当时我作为党组织的代表，而且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找她谈了两次，就算办理了重新入党的手续。在当时，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召开支部会议讨论新党员的入党问题，由党组织的代表找入党申请人谈话，就算是办理这一手续。一旦入党申请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就是党员了。江青的申请，当时已经获得上级党组织批准，所以可以说她已经重新入党。但是，江青本人还不知道党组织的这一决定—她在获知这一决定之前被捕了！在她被捕之后，党组织听说她在狱中的表现不是很好，所以在她出狱之后，没有让她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她的重新入党问题，也就搁置下来。正因为江青本人不知道在她被捕前上海党组织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所以后来她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时，她并没有说起在上海的这一段特殊情况……”

按照孙达生所说，江青入党经历应是这样的：

1933年2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江青匆忙逃往上海，失去组织关系。

1933年秋，在上海由徐明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1934年9月，经上海左翼教联党团组织同意，孙达生为入党介绍人，重新吸收江青入党，但是党组织还没有通知江青本人。

1934年10月，由于江青在上海被捕，她的重新入党问题被搁置。

1937年10月，由黄敬、徐明清等提供证明，江青在延安恢复党籍。

也就是说，江青1933年7月从青岛匆忙逃到上海，失去了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关系，直到1937年才在延安恢复了这一组织关系。

江青出狱后曾辗转多次躲避。此后，改用艺名“蓝苹”，步入上海影剧圈，成了明星。由于江青脱离了教联，也就和孙达生联系不多了。

后来，在1938年12月，孙达生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见到江青。这时，江青已经与毛泽东结婚了。江青仍喊孙达生为“老宋”——她并不知道当年的宋介农，已经改名孙达生。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他，约他到中央军委合作社，吃点东西，叙叙旧。

他去了。记得，那天江青向他谈了别后的种种情形。孙达生提醒她道：“延安和上海不同。你现在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你可要注意呢！邓颖超可以同周恩来一起出席报告会并解答问题，刘群先可以和博古一起在晚会上对口唱无锡景，孟庆树可以和王明一起骑马郊游，可以在晚会上男女二重唱苏联歌曲……你跟这些夫人相比，革命资历要差得多，务必谦虚谨慎。”江青听罢连连点头。她说：“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多加注意。”

分别时，江青紧握着孙达生的手，显得十分激动。

那时，孙达生在延安柳树店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讲课，跟张浩住得很近。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曾向孙达生问起江青在上海的表现，孙达生如实作了答复。

1939年5月，孙达生上前线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江青。

孙达生回首往事，对我说道：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江青后来变坏了，以至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但是她最初还是走过了一段革命的路……

[1]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不是江青写的。

[2]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1988年6期。

[3]此处误译为费，应为裴，即裴明伦。

[4]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5]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校长杨振声辞职，赵太侔暂代校长职务。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调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6]应当是1931年7月江青与裴明伦离婚之后。

[8]1990年1月2日，叶永烈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于上海。

[9]2004年5月28日，叶永烈电话采访香港邓宛生女士。

[10]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11]陈恭怀：《我的父亲陈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12]陈恭怀：《我的父亲陈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13]《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14]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15]1989年9月1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徐明清。

[16]王文正，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

[17]沈国凡：《江青三十年代当过叛徒吗？》，《百年潮》2008年第4期。

[18]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9页。

[19]1993年4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孙达生。

[20]1993年4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孙达生。

第二章　影剧明星蓝苹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江青终于第三次前往上海。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来上海。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1937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的姐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

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陵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21]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时的心态：

> 1935年的春天。
>
>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
>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22]，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娜拉》，挪威19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当时，她曾说：“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琢磨着。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江青曾这么自述：

> 1935年春夏之交，教联又去信要我到上海。因为剧联点名要人演《娜拉》。我不喜欢剧联，但可以找党。剧联的人瞧不起我。我夜里不睡觉下功夫读剧本。我住的亭子间下面是裁缝，他夜里干活，我就读剧本。我一举成名之后，他们都对我巴结起来。

美国记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根据江青的自述，这么写及：

> 她突然收到教育者联盟的一份通知让她返回上海，并允诺她可以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这个消息使她兴奋不已，因为娜拉是她久已仰慕的角色。当抵达上海，她在联盟中的联络人介绍她加入了一个由现代话剧演员组成的著名团体。在以后的几周中他们制作了几部易卜生和雨果的戏剧，她扮演一位女英雄。她还出演了根据狄更斯小说《双城记》改编的剧本。她承认，她对小说中译本的熟悉程度超过改编的剧本。尽管小说中表达的观点是“反动的”，但她认为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史料。
>
> 至于她扮演的娜拉这一角色，报界和新闻界一致给予了热烈的赞扬，但她却怀疑她在上海文化界中一些有身份的朋友是否影响了这些评论家们的言论。只有张庚两年前在上海曾担任过她的导演，后成为党组织上海分部的一名重要成员—对她的演出风格持批评态度，认为她的演出“太自然主义了”。作为一名严厉而传统的人，他永远也不会接受江青对娜拉性格的理解，因为江青认为娜拉是一位女性的反叛者。这一理解已超出了易卜生原著中对人物的刻画，江青认为她把这一人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观众对她的演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这里提到的张庚，据江青自云，张庚曾爱上她。根据江青的回忆，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这么写及：

> 尽管导演张庚曾批评过她的演技，江青说，但他却迷上了江青，而他对江青的追求毁掉了江青的政治生活。他在上海党组织中任领导职务。在无人可与之抗衡的情况下，他开始将上海作为自己的私有地盘。江青承认，关于张庚的回忆是痛苦的，因为她曾备受他那种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的折磨。当江青作为一名女演员正红之际，他曾说：江青是“他的人”，“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她处处使他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会同意与他一同回家。一次他斗胆向江青求婚，却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出于报复，他四处散布说，江青是托派分子。

崔万秋晚年忆蓝苹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1933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
>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
>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新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
>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
>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
>
>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
>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23]

崔万秋从1948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1952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1964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1967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1971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24]：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型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当然，当然。”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说：“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我笑答：“当然，当然。”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哪一县？”

“诸城。”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份，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

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露克珊·维特克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金城大戏院（现名黄埔剧场）坐落在上海北京路上。北京路与南京路平行，都是东西向的主干道。北京路最初叫领事馆路（Consulate Road），因东端设有英国领事馆而得名。上海人俗称北京路为后大马路。1865年正式定名北京路。

金城大戏院是在1934年1月1日落成，是当时上海第一流的影剧院。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影片《渔光曲》，1934年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在1934年1月，田汉的《回春曲》、《水银灯下》也是在金城大戏院由舞台协会首演。

1935年6月27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上海《晨报》在1935年7月2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
>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

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因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21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演娜拉，蓝苹从此在上海文艺界立足。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娜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后来，她在1939年9月13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
>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
>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1935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戏剧史

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蓝苹加入了上海的青年妇女俱乐部，在那里结识了年轻的演员郁风。郁风曾经这样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蓝苹[25]：

> 这些人中只有我年龄最小，只有19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比我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我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我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她也到善钟路我家来找我，再一同走到吕班路去。我的印象是：蓝苹参加我们的青年妇女俱乐部，把我当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如何对付特务的跟踪之类。
>
> 有一阵她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常是约好同去俱乐部开会先到我家，善钟路上一座花园小洋楼，我父亲的公馆。我几次提出要到她的住处去，都被推辞。只有一次大约是为了去取东西带我去了。记不起那路名，很旧的弄堂房子里，一间简陋的亭子间，还有一位记不起名字的女演员和她同住，我才知道她的生活很穷苦。我印象中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强，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说话，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千人，难以出大名。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

[image]

■《中华》画报封面上的蓝苹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1933年3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1933年11月13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引者注）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
>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紧接着，1933年11月16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26]。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28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149种著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33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1934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34年12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1935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405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王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
>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了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

界有名之士。”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湄。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1935年8月28日至9月1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民报》记者李成采写），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21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

现照录原文如下：

蓝苹访问记

8月4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一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大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

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刘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蓝小姐府上哪儿？”

“山东济南。”

“府上还有谁？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只有一个白发年迈的老母，父亲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可怜的姐姐和她底两个孩子。”

“蓝小姐今年芳龄……”

“一百岁。”她自己不觉破口大笑起来，接着又反问我：“你猜？”

“……”我摇了摇头答她。

“告诉你吧，老了，已经有二十二岁了，哦……”长叹了一口气：“真的，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吗？”

“哪里？年轻得很，你是有极大的前途的！蓝小姐，进‘电通’已有多少时候了？”我一边勉励她，一边又问她。

“在公演《娜拉》以前，虽然已经进电通了，但那时还是临时演员，完全是试验性质的。正式签订合同是在公演《娜拉》以后。”她说话底声音很低，在她底心中若有所思似的。

“每月报酬多少？可否告诉我？”

“那有什么不可以？很少，只六十只大洋一个月，我只得住在公司里，就是想节省几个钱。因为家里边的生活费还需要我负担呢。每月我总得要寄回去四十元，余下的二十元作为我自己底零用。”说到这里，她把托在额下的两手伸张开来，愁眉不展地硬装着笑容：“家里他们除了我以外，谁都没有收入。我的姐姐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所以也和我一样没有什么特长的技能。我想自己以后有机会，总得再多学习一点东西，多读点书。”

“蓝小姐对于各报上关于《娜拉》演出底批评有什么意见没有？”

“他们对于我都太客气了，实际上我有什么，完全是瞎闹的，不过我总觉得‘娜拉’底个性太和我相近了，所以我很喜欢演这个脚色。就是对于‘娜拉’底台词，我从没死读过。告诉你，我还只念过两遍，不知怎地，连我自己也都觉得莫名其妙，竟会很自然地从我底口中背出来。不消说，现在我还都没有忘记会背得出来。至于尤娜女士在自由谈上批评我在骂柯乐克的时候，以及觉悟后对于滔佛底反抗态度还欠凶，这是我不同意的。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已经太凶了。还有她批评我在娜拉出走时候的瞬间的高潮表现得不够，这一点我是接受的。虽然我已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拼命提高嗓子和精

神，但这大概是因为我演得时间太久而疲倦了的缘故吧，始终只允许我达到这个地步。”她越说越起劲，但她底态度可脱不了像那“小鸟儿”一般天真烂漫。接着她真的好像娜拉已觉悟后似的由懦弱而转为强力的富于理智的反抗精神，把眉头皱了一下，咬紧着牙齿兴奋地说道：“不过我自始至终相信在高唱‘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声浪中演出《娜拉》，正如吴湄女士所说的，的确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了；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是的，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子底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底生命为男子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

“蓝小姐近来作何消遣？到上海后看过什么影戏？”

“很少出去，因为钱的关系。到上海后，我只看过瑙玛希拉底《闺怨》，虽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总感不到兴趣。还有茂利斯布佛莱底《风流寡妇》，真的我很喜欢那女主角麦唐纳底态度和表情的活泼。”想了一下：“对啦，我记起了，还有我在北方看过凯丝琳·赫本底《小妇人》，虽然她长得这样丑陋，但我也很喜欢她那副天真烂漫、活龙活现的态度和表情。华雷斯皮莱底《金银岛》，我也看过，但这里他底演技却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不过听说他在《自由万岁》里是演得很成功，因为经济关系买不起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哈哈！”突然大笑了起来，“真好笑，这些片子还都是轮映到三等戏院，只花两毛钱才去看的。”

“对于国产片的意见呢？”

“从前在济南的时候，看得很多，什么《火烧红莲寺》、《空谷兰》之类的片子，我也以为很不差，相当有趣味，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劫》、《姐妹花》、《重归》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员，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底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欢喜。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至于胡萍和胡蝶她们底经验当然是够丰富，修养工夫也很充足的了，但和我都是无缘的；我不喜欢看她们所演的戏，并且她们底演技看起来也老是停止在这步似的，一年一年都是这样，总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哈哈，得啦得啦，不要说了吧，真的，我自己发了疯不是！试问我自己懂得什么？居然批评起人家来了，那不是笑话吗？对不起，李先生，请不要见怪，我是瞎扯的，胡说八道的。”她低着头在沉思着，好像在懊悔说错了话似的觉得有点难为情，两颊上绯红着。

“这有什么关系，各有各的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表。蓝小姐……”不想她等不到我说完，就抢上来说道：“真的，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得。告诉你吧，那真好玩，就是我拍《自由神》的戏，连自由也都莫名其妙。当初我以为是也像舞台戏一样按照顺序系统地拍下去的，不想是无头无尾地在东拍几个镜头，西拍几个镜头，所以我相信自己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涂，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可不要说了。不过我也并不因此而灰心，我正在想：假使以后有机会，任何性格的角色，我都得要尝试一下。”

“蓝小姐会跳舞吗？”我问。

她就笑眯眯地把头摇，说道：“不会。不过我到过跳舞场一次，那是朋友硬把我拖进‘大光明’戏院隔壁的那所跳舞场去，但什么名字我可记不起来。因为我最讨厌看见那丧心病狂的舞女舞客，所以我只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一个踱了出来。”

“蓝小姐已经结婚过没有？”

看上去她好像很怕羞似的，低着头笑嘻嘻地说道：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还没等她说完话，我就抢上去问她：

“蓝小姐可否把爱人底名字告诉我？”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底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他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蓝小姐进过什么学校？”

[image]

■ 蓝苹访问记（连载）

“我因为从小便和母亲寄养在姐姐家里，虽然得到姐夫底帮助曾受过高小教育，但从姐夫去世以后，我也就再没有升学的机会了，所以我也只得在家里自修了。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说。真的什么书都看过，从《西游记》、《红楼梦》起，到《呐喊》、《羔羊》、《虹》，还有从外面翻译过来的小说，现在叫我背还都背得出来。但在我最坏的地方，就是死也不肯看科学的理论书，以前我曾进过王泊生先生他们主持的山东实验剧院，大约有一年多。”

谈到这里，我就向她告辞出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大概已经有五点半钟了。

这篇《蓝苹访问记》，除了真实地写出21岁的蓝苹的生活、处境，还写出了她的泼辣，她的勃勃野心。至于她公然向记者所宣称的：“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这是她的恋爱信条。她说这番话是在1935年8月4日。此后，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闹得沸沸扬扬，便是她的恋爱信条的实践结果。她“根本反对结婚”，为的就是不受婚约的束缚，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业是当大明星，她把恋爱、同居当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唐纳其人

初入电通，蓝苹并不得意。在《自由神》一片中，她所演的是第七号人物。男女主角是周伯勋和王莹。她，只是配角的配角，在影片中没有多少镜头。

演《娜拉》时，她是第一号主角。如今落得个配角的配角，她心中窝囊。虽然她不过21岁，却早已懂得“演员不捧不红”的出名诀窍。

江青开始了她新的恋爱。这一回，江青把她的爱，奉献给在上海电影界颇有影响的影评家唐纳，赢得了他的“捧”。

> 蓝苹到上海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华龙路的小公寓里，那公寓的二房东是个罗宋女人，下面是一家罗宋大菜馆。她的吃饭问题，天天在这罗宋餐馆里。她的原籍是山东，到上海的目的是投身银幕。当然罗，一个漂亮的女人，何况她又有各项具备的条件，国语也说得好，早年在山东国立戏剧学校读过书，舞台经验也颇熟悉。当她踏进了电影界以后，第一个男朋友是唐纳。那时唐纳正为《晨报》的每日电影撰文，于是便大捧蓝苹，蓝苹就在这基础上奠定了她艺术的生命……[27]

这是当年《海星周报》上《女明星时代的蓝苹》一文中，关于蓝苹同唐纳结合的报道。作者已把话说得很明白：蓝苹爱唐纳，为的是借唐纳之笔作为“天梯”，以便能够爬上大明星的宝座。

唐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几乎已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

其实，唐纳并不姓唐。他原名马骥良，后来改名马季良、马继良、马耀华。用过笔名罗平。后来客居巴黎，名唤马绍章。

唐纳跟郑君里夫人黄晨[28]同乡，苏州人氏，他跟黄晨、江青同岁，生于1914年5月7日，属虎，甲寅年。

唐纳之“唐”，据云是由于他的奶妈姓唐。父亲马佩甫是铁路职员，给唐纳取了奶名“仁倌”。叫“×倌”是苏州的习俗。

唐纳的母亲姓倪，苏州平江路朱马高桥人氏。

唐纳四岁时，父亲去世。不久，他过继给大伯父马含荪。

唐纳在苏州私立树德中学上学时，用的学名是马继宗。

他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高中。当时，胡绳（即项志逖）、袁水拍（即袁光楣）也在这所中学求学，比他低一届。这时的唐纳，已开始喜爱文艺，思想也转为左倾。他是学校戏团的主要演员，演过左翼话剧《工场夜景》、《活路》、“SOS”等。[29]

1932年3月，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到国民党警察局的大搜捕。唐纳也受到警察注意，不得不从苏州逃往上海，落脚表叔陆尹甫处。经陆尹甫介绍，进入上海大陆银行当练习生。

1932年夏，唐纳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依然爱好戏剧，成为学生剧团中的活跃人物。

唐纳入圣约翰大学读书，英语流畅，中文文笔也不错。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笔姚苏凤是唐纳同乡，约他写影评。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就为《晨报》写些稿子，从此与电影界结下友谊。影评署笔名“罗平”或“唐纳”。由于影评不断地出现在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专栏里，这个18岁的小伙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他也给《申报》的《电影专刊》、《新闻报》的“艺海”、《中华日报》的“银座”、《大晚报》的“剪影”撰文。

唐纳的影评，文笔流畅，而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颇有见地，在读者中很快就赢得信誉。尤其可贵的是，他思想倾向进步，执笔常赞誉左翼电影，抨击那些精神鸦片。

给人留下颇深印象的是，他参加了反击“软性影片”的论争。

那是1933年12月1日出版的《现代电影》第6期，发表了《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鼓吹只有“软性影片”才是“观众的需要”，说“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宣称“我们的座右铭是，‘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

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夏衍等人领导之下，决定迎头痛击“软性电影论”。反击的第一枪，便是唐纳打响的：1934年6月10日，唐纳在《晨报》上发表《太夫人》一文，尖锐地批评了“软性电影”。6月12日，唐纳又发一文，即《“民族精神”的批判：谈软性电影论者及其他》。翌日，夏衍便以笔名“罗浮”发表《软性的硬论》，与之呼应……

这下子，姚苏凤便受到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在6月28日登出反驳唐纳、夏衍的长文《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从此，唐纳不再为《晨报》的“每日电影”写影评了。

1934年秋，唐纳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这时，艺华正在拍摄阳翰笙编剧的影片《逃亡》。导演岳枫为了使影片增色，决定配上主题歌和插曲，可是无人作词。正巧唐纳来了，岳枫便请唐纳写词。唐纳居然一口答应下来。

唐纳写了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聂耳与他合作，配上了乐曲，使这两首歌广为流传。现摘录《塞外村女》片段：

暮鸦飞过天色灰，
老爹上城卖粉归，
鹅毛雪片片朝身落，
破棉袄渍透穷人泪。
扑面寒风阵阵吹，
几行飞雁几行泪，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够缴还租免祸灾。

唐纳长得一表人才，有如奶油小生，居然被电通影业公司的导演袁牧之所看中，要他当演员！

那时候，袁牧之正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找不到合意的男主角。在袁牧之心目中，男主人公李梦华是一个贫穷潦倒而又富于痴情的知识分子；他一见到眉目清秀的唐纳，仿佛是扮演李梦华的本色演员。虽说唐纳从未上过银幕，而这一回要领衔主演，他又居然一口应承下来。

于是，1935年，唐纳从艺华调入电通，当起演员，同时主编《电影画报》。

多才多艺的唐纳，演戏也演得不错。在影片中，他神魂颠倒地追求由张新珠饰的女主角张小云。特别是在演出失恋时饮毒酒自杀，简直演得活龙活现！

[image]

■ 《都市风光》的演员们（自上而下第二人为蓝苹）

1937年6月10日的《影与戏》，这么形容唐纳："提起唐纳，大凡是略微关心一些影坛的人，谁都晓得他是一位很活跃的影评人。他，可以说一个身子，半个站在电影圈里，半个站在电影圈外。"

1936年6月30日的《时报》，曾以《青年作家酷嗜电影》为题，简略地介绍过唐纳身世："唐纳现年二十二岁。原籍苏州。曾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自幼即嗜电影，且爱好文艺，笔名'罗平'。为文简洁流畅，颇得一般人之好评。当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时，即大负声望。影界友好多怂恿其实行入电影界工作，唐亦不能自持，乃于前年秋季入艺华公司担任编剧事务。去岁经袁牧之介绍入电通公司，主演该公司声片《都市风光》。初上银幕，即大露头角（时其爱人蓝苹亦在该片中充当重要角色）。唐除在该公司担任演员外，并主编《电影画报》，工作颇称努力。惟任职不久，电通公司即告歇业。本年6月1日改入明星公司，仍担任编剧职务。"

唐纳颇帅，一表人才，又多才多艺，时而影评，时而编剧，时而演员，何况在圣约翰大学学的是英语，能著能译，是一位“评、编、演、著、译”的全才。

不过，唐纳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影评。他是《晨报》影评专栏的主要评论家，与《申报》的石凌鹤旗鼓相当，人称“影评二雄”。

除了以《晨报》为据点之外，唐纳还涉足《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时报》等影评专栏。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唐纳的评论对于影片、对于演员的影响：“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

唐纳的为人单纯、热忱，但性格有点如同吴语一般软绵绵的。他思想倾向进步，活动于左翼电影界人士圈子之中。

从20世纪30年代起，人们向来以为唐纳即马骥良，马骥良即唐纳。

其实不然！唐纳是两人合用的笔名。另一人是谁？

当我得悉唐纳挚友夏其言在沪工作，便于1986年8月4日前往拜访。

炎夏酷暑，柏油马路都有点酥软了，我叩响一幢小楼的房门。我以为，倘若夏老不去黄山、青岛避暑的话，定然在家午睡。

出乎我的意料，夏师母告知，夏老上班去了！他和唐纳同岁，也属虎，当时已是七十有二了，照样天天去报社上班，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

几次打电话跟夏老约时间，他不是接待外宾，便忙于业务。这次总算他有了空余，与他得以长谈。

除了听觉差一点之外，夏老身体甚健，记忆清晰。他谈及了世人莫知的奥秘：唐纳乃马骥良与佘其越合用的笔名！

佘其越，我从未听说过的陌生姓名，究竟何许人也？

夏其言如此深知唐纳身世，说来纯属偶然：夏其言高中毕业之后，正值刘鸿生开办的中国企业银行招收练习生。夏其言考上了。跟他一起考上的，有个青年名叫马骥善，意气相投，遂结为好友。

马骥善之兄，即马骥良。马骥良常到银行宿舍看望弟弟，跟夏其言结识了。夏其言也随着马骥善喊马骥良为“大哥”，虽然他跟马骥良同龄。

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夏其言呢？正追求进步，悄悄地在读马列著作。正因为这样，他跟马骥良相见恨晚，非常投机。

一天，马骥良神秘地对夏其言说：“我有一个朋友，很有学问，可以教你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不过……”

说到这里，戛然而止，马骥良用双眼看着夏其言。

夏其言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说道：“我不怕风险。”

马骥良这才轻声地说：“他没地方落脚，你敢不敢收容他？”

夏其言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几天，上海长乐路怡安坊，多了一位青年“房客”。

正巧，这位青年也属虎，跟马骥良、夏其言同庚。

怡安坊离“十三层楼”不过咫尺之遥。十三层楼，即如今的锦江饭店。夏其言的父亲，在那里掌厨。他家住石库门房子，独门进出。

那青年房客跟夏其言住一间小屋。此人足不出户，终日闭门幽居，邻居从不知马家有房客。所谓“房客”，只不过夏其言对父母的遮掩之词罢了。

房客叫小琳，常用的笔名为史枚，真名佘其越。此人跟马骥良同乡、同学，总角之交（即少年朋友。总角，少时所梳之小髻也）。

佘其越乃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杨树浦活动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往苏州反省院。

那时，苏州反省院有所谓“假释放”制度：如果有两家铺保，“犯人”可以“假释放”两个月，届时自回反省院，仍旧关押。“假释放”的本意，是让“犯人”体验一下“自由”是何等舒坦，以促使“犯人”早日“反省”。

然而，佘其越却趁“假释放”之际出逃了！

佘其越请马骥良帮忙。神不知，鬼不晓，他隐居在夏其言家里。国民党警察局急得跳脚，也不会查到夏家，因为在此之前，佘其越跟夏家毫无瓜葛。

佘其越擅长写作。在隐居中，写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纳，由马骥良送出去发表。马骥良自己写的文章，也署名唐纳。于是，唐纳成了佘其越和马骥良合用的笔名。

马骥良本来以“罗平”为笔名，常用“唐纳”之后，渐渐地，人们以“唐纳”相称，以致后来变成“唐纳＝马骥良”。

佘其越跟夏其言朝夕相处，教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他走上革

命之路。在佘其越的影响下，夏其言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佘其越隐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马骥良，以下该称之为“唐纳”了，以适合广大读者的习惯。

至于佘其越，以下该改称为“史枚”，因为他的真名已被伪警察局记录在案，他改名史枚。

当唐纳跟蓝苹相爱之后，蓝苹也成为夏家的常客。

唐纳、蓝苹、史枚、夏其言是同龄人，然而，不约而同以史枚为长。因为他是C.P.（共产党），而且学者风度，老成持重，唐纳、夏其言尊敬他理所当然，蓝苹在他面前也颇恭敬。就连她跟唐纳吵了架，也常常要到怡安坊来，在史枚面前告状—此是后话。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

追溯起来，在蓝苹主演话剧《娜拉》时，唐纳便和她相识。那时，唐纳在业余剧人协会负责宣传工作。不过，他们只是相识而已。

关于他们如何由相识发展到相爱，后来客居法国巴黎的唐纳，曾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泽东传》作者R. 特里尔说及。

特里尔如此记述：

[image]
■ 蓝苹剧照

他说，他迷上蓝苹，是从金城大戏院看她主演《娜拉》时开始。他发现了她坚强的、激动的、性感的魅力。和她会面，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闷热的晚上，唐纳步行到电通影业公司去，他兼任公司出版的杂志编辑。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引者注）上挤满了散步者、卖吃食者、互相搂抱的情侣、叫花子等各色各样的人。在那里，唐纳看见蓝苹在霓虹灯下，穿着蓝色绸旗袍，梳着刘海头发，拖着改组派的脚步走过来。这是她儿童时期缠足的遗产，是无可救药的。

蓝苹认出他是唐纳，唐纳也知道她是何人。两人都踌躇了一下。唐纳咧嘴微笑，好像一只活泼的猫，蓝苹伸出了她的手。唐纳说，他非常钦佩她演的娜拉；蓝苹说，她久仰他的文名。

她对这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左翼文化人，突然讲出一句："我是革命党人。"对于这位奇异的、武断的、言不择时的女子，唐纳觉得她了不起，对她更加迷恋。

"这事使我非常兴奋。"唐纳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位从山东来的，富于诱惑力的新进女演员，在霞飞路上，对我宣称她是革命党人。"

也许因为唐纳写的影评左翼色彩很浓，蓝苹误以为他是同志，故初次见面，在霞飞大路上竟唐突地说出自己是革命党人。其实，唐纳和共产党毫无关系，虽然承认他自己左倾。

第二天，蓝苹到电通影业公司访问唐纳。这时期她是自由的。自从和俞启威分手后，她未和男人同居。她仍然漂流在上海的人海中，她积极地接近唐纳，她的新鲜、活泼的态度，使唐纳陷入情网。

唐纳回忆当年的印象说："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

蓝苹、唐纳相继进入电通，特别是同在《都市风光》剧组，朝夕相处，由相识而相爱了。

当年的《电影新闻》，这样报道了唐纳跟蓝苹结合的情形：

> 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的出去，剩下来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
>
> 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
>
> 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满面春风的回来。
>
> 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这一晚的晚饭，就在这样纷乱喧嚣中过去。

这是1935年秋在拍摄《都市风光》的时候。

《都市风光》的编导为袁牧之，摄影师为吴印咸，音乐为吕骥、贺绿汀、黄自。影片中穿插的一段动画，由著名的万氏兄弟设计，即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

这部影片属音乐喜剧片，通过几个公民的眼睛，从西洋镜里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唐纳主演，饰无聊的知识分子李梦华，蓝苹演配角。

就在蓝苹和唐纳同居不久，1935年12月7日的《娱乐周报》上，已有人指责蓝苹的行为了："据该公司有人云，蓝苹已经不是一位未嫁的小姐了。在北平，她早已有了丈夫了。如果此事属实，不是要闹出一场醋海潮了吗？好在他们不过是同居而不是结婚，否则蓝苹不是要犯了重婚罪？"[30]

[image]

■ 六和塔婚礼照。后排居中者为沈钧儒，前排居中一对为蓝苹、唐纳。

怪不得，蓝苹早就公开声明"反对结婚"！

然而，就在蓝苹和唐纳同居了半年多之后，忽然上海许多报纸刊登消息：蓝苹和唐纳要结婚了！

1936年4月26日上午8点半，杭州钱塘江畔，八辆黄包车逶迤而来，奔向六和塔。

为首的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风度潇洒、西装革履的青年；最末压阵的车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长髯飘拂、礼帽长袍的长者；中间六

辆黄包车，三男三女，喜气洋洋。

那青年即郑君里，长者为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三对男女乃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

三对男女朝六和塔进发，为的是在那里举行婚礼。郑君里负司仪之责，手中拿着照相机，兼任摄影师。沈钧儒为上海著名大律师，证婚人也。

到达六和塔前，最忙碌的是郑君里。他让证婚人居中，三对情侣列于两侧，接连拍了许多照片。

三对情侣为什么远道从上海至此举行婚礼？

这是“秀才”唐纳的主意：六和塔又名六合塔，高高矗立于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建议六人来此举行集体婚礼，当即一致通过。

文人雅士如此奇特的“旅行结婚”，顿时传为新闻，纷纷刊登消息及塔前婚礼照片。

沈钧儒诗兴勃发，于塔前口占一首：

情侣浪游在沪杭，六和塔下影成双。
瑰丽清幽游人醉，沉酣风波会自伤。
拾级蜿蜒登高塔，居高一览钱塘江！

老先生吟罢，诗兴未尽，又作一首：

人生何处是仙乡，嘉偶良朋一举觞。
到此应无凡鸟想，湖山有福住鸳鸯。
塔影湖声共证盟，英雄儿女此时情。
愿书片语为君祝，山样同坚海样深。

几天之后—5月5日，晚8点，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餐室，又一度成了新闻中心。三对新人在此招待亲友。

这座大楼迄今仍在上海八仙桥。笔者曾到九楼实地观看。如今所用的电梯，仍是当年的电梯。这电梯格外地小，每次只能乘坐三四人而已。楼里倒很宽敞，直至今日仍在经营餐饮业。

那天，新郎一律西装，新娘一律旗袍。“蓝苹的身上是一件新的白地方格的灯笼袖旗袍。小叶蓝地红花的旗袍。小杜是白地红花的旗袍。”

据上海老影人钱千里先生告诉笔者[31]，他当时也应邀出席蓝苹婚礼。他回忆说：“上海电影界很多人都去了。招待很简单，每位来宾一份点心，还得自己去拿。因为人多，招待小姐实在忙不过来。蓝苹当时给

我的印象不错。她很用功，很努力。一个山东姑娘能够在上海的电影界站稳脚跟，是不容易的。”

影星汇聚，连电影皇后胡蝶也到会祝贺，吸引了众多的记者。在掌声中，人们要新娘蓝苹当众发表感想。蓝苹只说了三个字：“很快活！”

晚会在《六和婚礼贺曲》声中结束。

这贺曲由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

偎情郎，
伴新娘，
六和塔下影成双；
决胜在情场，
莫忘胡虏到长江。
喝喜酒，
闹洞房，
五月潮高势正扬，
共起赴沙场，
同拯中华复沈阳。

次日，上海各报又纷纷刊登消息，有的甚至用半版篇幅详加报道。

向来关心报纸的唐纳，读着大报、小报，秀气的脸上漾着微笑。

他的笑，只有他知，蓝苹知：他真诚地爱着蓝苹。在蓝苹之前，虽说他也曾追求过别的姑娘，但那只是追求、恋爱而已，并无其他。正因为他真心实意地爱着蓝苹，所以他不愿只是同居。一而再，再而三，他向蓝苹提出要求结婚。然而，遭到了蓝苹的坚决反对。她，不愿意结婚……

当他得知好友赵丹、顾而已都有了心上人，提出了“六和塔婚礼”的建议。赵丹、叶露茜、顾而已、杜小鹃、唐纳，已经五票通过。迫于孤立，蓝苹只得点头—唐纳还编造了一条理由，一旦正式结婚，他可以向苏州老家索一笔钱。

然而，蓝苹只是答应举行婚礼，却绝不签署婚书。

唐纳无奈，依了蓝苹。

这样，在三对新婚夫妇之中，唯独唐纳、蓝苹是没有婚书的！

唐纳是笔杆子，跟各报社广有联系。他煞费苦心，广请记者。“六和塔婚礼”在那么多报纸上登了报道，唐纳出了大力。

唐纳得意地翻阅着大报小报，用剪刀一篇篇剪下婚礼报道，精心地

贴成一本。

他想，这些婚礼报道，不就是印在报纸上的“婚书”！？成千上万的读者都知道蓝苹跟唐纳结婚了，这比婚书的威力还大—难道你蓝苹能够撕掉这些印在报上的“婚书”！？

唐纳笑了！

可是，唐纳笑得太早了！

婚变使唐纳在济南自杀

六和塔婚礼结束后，蓝苹和唐纳相处尚可。蓝苹曾随唐纳回他苏州老家住了半个月。那时，蓝苹跟唐纳的生母、嗣母相处，也还算可以。

可是，回到上海环龙路住所之后，蓝苹就不时和唐纳发生口角了。

口角迅速升级，以至酿成轰动上海的“唐蓝婚变”新闻……

那是六和塔婚礼整整两个月后—1936年6月26日。

晚8时，蒸汽机车冒着黑烟、喷着水汽，疲惫地拖着长长的平沪快车（那时北京称北平），驶进济南站。

从车上下来一个疲惫的男人，他的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梳，个子修长，一身西装。他的手中除了一只手提包之外，别无他物。

下车之后，他雇了一辆黄包车。

“先生，上哪家旅馆？”

“不上旅馆，到按察司街27号。”

彤云密布，下起淅淅沥沥的冷雨，衣衫单薄的他在黄包车上打了个寒噤。

黄包车刚刚在按察司街27号前停下，他就急急跳下了车，砰砰连连敲门。

门开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出现在门口。

“请问，蓝苹小姐在吗？”

“先生贵姓？”

“我是阿仁！”

“喔，妹夫，快请进！”

来者阿仁，便是唐纳。阿仁是他的小名。

这儿是蓝苹的家。唐纳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岳母、姐姐，他什么礼品也没有带—他是在极度仓促、惶恐之中跳上平沪快车，赵丹和郑君里送他上车。

“云鹤不在家！”蓝苹的母亲、姐姐，这样答复专程赶来的唐纳。

“她上哪儿去了？”

“她不在济南！”

“不在济南？她在哪儿？”

“她没说，俺不知道！”

“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

“十几天了！”

当唐纳不得不告辞的时候，雨更大了。黄包车早走了—车夫以为已经送他到家。

冰凉的雨点，打在他消瘦、白皙的脸上，他反而觉得舒坦一些，清醒一些。

雨水和夺眶而出的泪水，混在一起。

他浑身湿漉漉的，走进商埠三马路济南宾馆。

茶房赶紧让他住进楼下5号房。

很快地，茶房发现这位先生有点异样：茶房把一盆热水端来，放在他面前，他竟然双眼发直，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雨，通宵下着。5号房的灯，通宵亮着，从敞开的窗口望进去，茶房发现，那位上海来客在灯下写信，一边写，一边不时抹去脸颊上的热泪。

翌日，那上海房客一早就出去了。

大清早，唐纳敲开了蓝苹家的门。

蓝苹真的不在家！

尽管蓝苹的母亲、姐姐已经再三说明蓝苹不在济南，痴心的他还是不信。中午、下午，他又去敲按察司街27号的门，依然不见蓝苹的影子。

他怏怏地独自踯躅于济南街头。

忽然，他记起那部他跟蓝苹一起演出的影片《都市风光》。在影片中，他饰李梦华，追求小押店主的女儿张小云，失恋后喝下一杯又一杯

药酒自杀……

他不由得步入药店，买了一磅消毒用的酒精。他又买了好几盒红头火柴。

晚上，他脸色惨白回到济南宾馆，就连茶房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毫无反应。

茶房见他神色不对，特别留意起来。

晚8时许，茶房见他歪倒在地，桌上撒着没有药头的火柴棍—他喝下了那一磅消毒酒精和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已不省人事。

茶房喊来了黄包车，把唐纳送往小纬二路万达医院急救。

吴启宪大夫赶紧给唐纳注射解磷剂。

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吴大夫通宵守在唐纳床边，三次注射解磷剂……

茶房在唐纳的房间里，找到一封遗书。那是他昨夜含泪写成的。

人们读着唐纳这封“26日夜远处传来鹧鸪啼声和着雨声时”于济南宾馆写给蓝苹的信，才知道他因遭蓝苹的遗弃而自杀。

摘录唐纳遗书如下—

阿苹，我最亲爱的：

想不到你竟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

带着万分之一的侥幸，“也许还没走”的希望，我跨上了车，整整二十八个小时，过去一切甜蜜盘踞了我的脑海—在电通，我们初恋的时候，我写过“你再不睡就对不起我”的留条；在倍开尔路（今惠民路—引者注），我们有过通宵的长谈，在街头漫步，一直到深夜二时，我才陪你绕过一条黑黑的弄堂送到你门口；在麦克利路（今临潼路—引者注），因为要看画报的校样，隆冬的夜未央，我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你给我披衣穿袜的一种说不出的怜惜；在南洋路（今南阳路—引者注），外面下着大雪，没有木柴，我和你用一大叠报纸生起火，当你病得最厉害的那夜，屋里一点水也没有，你的“给我水呀，我要喝水呀”的可怜的哀求；在福民医院里，你一定要我休息一下，睡在你满身痛创的身旁；在临到苏州去的前几天，你伤心的流着泪，说只有你的妈妈不欺骗你。我当时痛苦得哭泣了。你就立刻向我道歉：“我说错了，纳，我下次不了！”在苏州，我生着气，想回申的时候，你就流着眼泪，婉转的叫住了我；我从南京回来，你是那样紧搂着我。阿苹，呵，想不到这些竟成了我的心底最锐利的尖！

临走的时候，你说要买山东绸给我做衬衫，你还指指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引者注）橱窗里陈列的拉领衫，要我买几件去游泳时穿，你还说过苏州时要买枇杷回来，你还说要送我一个表。在你领到薪水以后，你告诉我顶多一个月就回来。快到一星期，你来信还说十号左右回来。后来又说因为天太热，等下了雨来。阿苹，一个月来，我几乎无日不望着你会有意不告诉我日子，要使我惊喜你突然的归来。阿苹，深夜梦回的时候，我揣想你这时也许在辗转反侧。清晨街上小女孩的叫唤，我以为是你回来了，在窗下叫我。你上次从苏州突然赶来时不也是出乎我意外地这样在窗下叫我吗？记得你那次来，我是怎样的惊喜，怎样的快慰。你说，我好像永远绕在你身旁哭，阿苹，你这个时候想像我是在怎样地痛苦！一个月来我希望你的回来，比希望中头奖要超过不知多少倍。在公司里，茶房叫我听电话，我希望这是你打给我的。有时我望着天，看着远远的北方，有云堆在那里，我希望这时济南正在下雨，你在整理行装，预备回来了。有时我从公司里出来，我想这时你正在屋里等我，我偏跑东跑西地到朋友处闲谈，想使你也多些等人的痛苦。我回家的时候，望着屋里的灯光，我猜想你一定正在和之静他们畅叙。到后，我推门的时候还存着这样的希望，然而照例是给我一个失望。自然，我想这些小失望将来总有偿付的一天，我打算在你回来的时候，拧你的小嘴，重打你的手心，呵你痒，要你讨饶。但是阿苹，现在呢？这一个月来的希望是被击得这样的粉碎！……从你回家（指回济南—引者注）后，一方面想减少寂寞的痛苦，一方面想在回来时夸耀，我是尽了我的负重，我写好了三个剧本，筹备了一个公演，还有很多。朋友们说这时我正可玩玩，没有人管，可是我没有。这一点是对得起你也对得起我自己的。

我想丢了家，丢了名誉地位和所爱好的电影事业，追随你去……但是已经迟了，你姐姐告诉我已经走了十多天了。

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苍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

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谁能再真正爱我像你一样？

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什么害处，我再能作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我死了，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更奋力，因为可以常常使你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你最后的一面和那两个圆圆的笑窝！

王泊生使蓝苹大失所望

唐纳自杀于济南，消息传出，轰动了京、沪、鲁的报刊。

众多的读者异常震惊：这位六和塔婚礼的筹划者，为什么在婚礼后的第60天就要自寻短见？

其实，就在《六和婚礼贺曲》回响耳际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为蜜月的时候，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他们婚后的住所，已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了。

[image]
■ 唐纳济南自杀后的媒体报道

[image]
■ 婚变新闻满天飞时所刊唐纳照片

唐纳和蓝苹在争吵的时候，常常到长乐路怡安坊，各自在史枚面前，夫说夫有理，妻说妻有理。史枚在他俩心目中却如同长兄，史枚毕竟是地下党员。

蓝苹跟唐纳吵架，其中的主要原因，据1936年7月11日《娱乐周报》，蓝苹说得颇为冠冕堂皇：“自己在上海，度着跑跑舞场、吃吃咖啡的颓废生活，感到环境移人，意志消沉。所以，离沪北去，参加救国运动的工作……”

蓝苹的“台词”，比唱还好听。

电通影业公司在拍完《都市风光》之后，支持不下去了。唐纳于6月1日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在编剧股当秘书。蓝苹则与明星影片公司签署了合同，准备在《王老五》一片中饰王老五之妻。

就在从电通转往明星的时候，蓝苹忽然说母亲生病，要去济南探视。

5月底，唐纳在上海车站送蓝苹上车。火车徐徐启动之际，唐纳挥动双手，滚下热泪。他的耳边，响着蓝苹的声音：“不要难过，6月10日我就回来！”

不料，蓝苹一去不复归。任凭唐纳等得心焦性急，一封一封长信催她，一连寄去十几封信，她却不理不睬……

蓝苹究竟在济南干什么？

1936年6月17日《辛报》所载张牛的“济南特约通讯”《蓝苹和王泊生》，披露了蓝苹在济南的若干情况：

一个朋友告诉我，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以前实验剧院的同人名义，临时凑合举行三个独幕剧的联合公演了。

实验剧院解散后，所有人员你东我西，很少有大家齐聚在一块儿的机会。不想这会也巧，因蓝苹（李云鹤）的回家探母，王泊生忽然兴起，经过三几天的“热炒热卖”，就凑合着演出了。

这次联合公演的消息，是很诧异的。在事实上说，也许是很勉强的。因为曾经骂话剧不是艺术的王泊生，也会在《婴儿杀害》里扮演了一个卖破烂货的，这不是很使人惊异的吗？

公演日期，是本月7日。卖座的纪录，打破了历次公演的盛况。这也许是蓝苹的魔力吧，王泊生一定要破涕为笑了，当场就挂出了牌说“十号晚再演一场”。和我同去的朋友说：“王泊生卖了蓝苹了。”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公演的节目是菊池宽的《父归》，朱春舫的《一副喜神》，还有山本有三的《婴儿杀害》，由李一非、吴瑞燕、王泊生分别导演。蓝苹在《父归》里饰女儿，演得比别人好。在《婴儿杀害》里饰女工，也很卖力气。

值得附笔的，是在公演前，近蓝苹的人问起她：“听说你和唐纳结婚了，生活上觉得怎样？”她很爽快的回答：“那不过是开玩笑而已。”问的人当时一愣，想：怎么女明星也拿同居马里马虎的呢？玩笑是随时随地随便可以开的，大概蓝苹女士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吧。

原来，在蓝苹看来，六和塔婚礼，“那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然而，唐纳在上海，却翘首以待，一片深情在等待她的归来。

《大光明周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蓝苹在济南演出的内幕：蓝苹“与唐纳的事发生之后，回济南去住了一个相当时期。因为生活有问题，曾向王泊生借尸还阳的‘山东省立剧院’接洽以演剧补助。可是王泊生是个著名的吝啬鬼，不念师生之谊，也不对她刮目相看。三天戏的代价，只送给她廿元。在上海已经变了红的蓝苹哪里还会将这区区之数看在眼里呢！她一怒而加以拒收……”

蓝苹本以为，这次演出，她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钱。结果，大失所望。此后，蓝苹在济南销踪匿迹。

就在报上接连登出王卓所摄蓝苹在济南历下亭含笑伸腰、在大明湖畔依树凝思之类照片之际，蓝苹女士早已不知所往……

蓝苹想以“得脑膜炎死了”赖账

6月23日，唐纳正在上海环龙路家中，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以为是蓝苹南归，唐纳喜出望外，赶紧开门。

门口站着的是二哥郑君里。前额沁着豆大的汗珠，手中拿着一封信。

刚一进屋，郑君里就对唐纳说：“三弟，蓝苹托我转给你一封信，你赶紧看一下……”

蓝苹托郑君里转这封信，她大抵已经充分估计到这封信的威力—唐纳读了信，照他的脾气，一定会跳脚，会发疯，会跳楼……郑君里在旁，会劝住他的。

蓝苹声称“说不定这是我最后一封信”，正因为这样，读着这封信，唐纳的脸色由红转灰，由灰转白。

蓝苹的信，是这样写的—

> 纳！当你看到这封信，为了我走起来顺利起见，筹划好久的这件事，迟迟到今天才告诉你，我想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
>
> 自从我跑进影圈，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我苦恼，我绝望，我想毁自己，可是我遇到了你，你使我暂时消灭了我所有的苦恼，但是更深的矛盾却也在这里生了根。我不愿林黛玉式的忧愤死，我知道怎样使得我言行一致，我更知道怎样使我自己死得有价值些，因此我决绝的离开你，还有那个大的诱惑—风头、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
> 在我计划回家的那几天里，我竭力企图和你过几天快活日子，可是你那几天的脾气却特别的坏。有时你非让我下不来，而且使我非常伤心。虽然在搬家时候，我忍不住和你闹过几次，可是过后我马上懊悔了，懊悔得想痛哭。我曾经在雨地里走了很久很久，那种悲哀是说不出来的。我想我和你分别，我想起你所说的—我是固执的爱着你；我想起南洋路—这些使得我心跳，像是跳在咽喉里似的一样闷塞；浑身剧烈的抖着，一步都走不动了。后来叫车到阿丹家去的，这个是我永远不能忘掉的。
>
> 其实呢，你那些天的坏脾气给了我很大的便利，现在想起来真是应该感谢那个坏脾气。不然，我也许永远永远沉埋在那环境里了……
>
> 我呢，爱事业是超过爱人，这个我是坦白的告诉过你了，所以牧之的话是对的。“要是你们两个没有一个屈服，将来一定是个悲剧。”

××××缺少教员，请了很多朋友去，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人家差不多已经走光了，只有我，还有点犹豫的我，迟迟在现在才走。纳，不要悲伤吧。在将来的新生活里，我们这种矛盾会自然而然消失的。

说不定这是我最后一封信……

关于我这次的走，你也许会说我太自私，但是我的话是早讲在头里了。在你初恋我的时候，我曾经警告过你，爱我是要痛苦的。你却说你愿忍受这个痛苦。接着我还说过，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你说，不会的。纳！想来不至于忘了吧。就连结婚，我也曾说过于你，是不利的，却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经济，逼我们走上这条路。

为了应付你的社会关系起见，我不能不想一个法子补救。想了又想：是有一个法子，就是说我死了。这样，又可以应付你周围，说是于我以后的生活，也不无补益。纳！反正我是离开这个环境了，就算死了吧。希望你不要骂我做事走绝路。我认为一个人必须走一条路，同时也应该绝了所有的路，免得犹豫和退却！

和你这信，同时发许多消息，说我得脑膜炎死了。关于我的没有死，只有你和君里知道。希望你要他保守秘密。我相信他是可以做到的……

上海银行债，我相信我宣布死了，是不会累在你身上的。我想赖了！

读罢蓝苹的信，唐纳的冷汗浸湿了上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

唐纳这才明白，怪不得蓝苹早就口口声声说过：“爱我是痛苦的！”

她真是想得出，做得出，想用“得脑膜炎死了”，赖掉她在上海的欠债！

郑君里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唐纳的一举一动。

久久地，唐纳用双手捧着脑袋，心痛如绞。须知，就在刚才，他还写了一首思念蓝苹的诗呢！

唐纳抓起桌上的诗笺，一把扯得粉碎。

他霍地站了起来，对郑君里道：“二哥，事不宜迟，我要火速赶往济南，抢在她出走之前！”

“行，我马上给你去买火车票，你收拾一下。”郑君里也站了起来，说道：“我顺便把这消息告诉四弟。”

郑君里说的“四弟”，也就是赵丹。

6月25日，郑君里和赵丹一起送唐纳上火车。他俩千叮万嘱唐纳：“到济南看一下，马上就回来。明星公司有好多事等着你呢！”

蓝苹的心病所在

“蓝苹死于脑膜炎”的消息尚未见报，而“影星唐纳自杀”的消息却各报竞载了。就连南京的《中央日报》也刊登了《轰动济南之唐纳自杀事件》。

唐纳总算“不幸中之大幸”：由于茶房发现得早，大夫抢救及时，在28日晨8时终于清醒，脱离危险。

第一个赶到万达医院看望唐纳的，是文友马吉峰。马吉峰的笔名为马蜂，曾与张春桥一起在济南的《国民日报》编副刊“燕语”，也曾与张春桥一起创办华蒂社。唐纳在文坛交游甚广，跟马吉峰有点文字之交。

上午11时，经吴启宪大夫检查，以为唐纳已无危险，可以出院。马吉峰当即喊来黄包车，拉着唐纳前往纬三路东鲁中学宿舍马家歇息。

唐纳异常怠倦。午饭后，倒头便睡。正在酣梦之中，忽听见蓝苹之声。

唐纳一惊，霍然坐起，睁眼一看，站在床前的并非蓝苹，却是蓝苹之姐。

原来，趁唐纳午睡，马吉峰跑到蓝苹家，把唐纳自杀的消息告诉蓝苹的母亲和姐姐。

她们大吃一惊。蓝苹的姐姐赶紧拎着一篓苹果，跟随马吉峰风风火火来到东鲁中学。

“唐先生，妹子实在对不起你！”蓝苹的姐姐再三向唐纳道歉。

“只要你能把你的妹妹叫回来，我就什么也不计较了！”唐纳说道。

直到这时，蓝苹的姐姐才说：“唐先生，如果你能原谅我的妹妹，我愿照实相告……”

唐纳非常诚恳地说：“如果我不原谅她，我就不会到济南来了—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接她回上海，我们重新团圆……”

蓝苹的姐姐看着在一旁陪坐的马吉峰，犹犹豫豫，欲言又止。马吉峰看出不便，就借口给唐纳冲牛奶，走开了。

直到这时，蓝苹的姐姐才在唐纳耳边，说出实情：蓝苹到天津找小俞去了！

如五雷轰顶，唐纳顿时呆若木鸡，半晌讲不出一句话来！

哦，怪不得，蓝苹早就把话“讲在头里了”：“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

哦，怪不得，蓝苹只愿跟他同居，不愿正式结婚！

唐纳在跟蓝苹初恋时，蓝苹从未讲起过自己的婚姻历史。直到同居之后，唐纳才从当年蓝苹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事那里听说起小俞……

幸亏蓝苹的姐姐一再说，她马上打电报到天津，要蓝苹火速回济南，唐纳这才宽了点心。

他连连催道：“你快去打电报！”

蓝苹的姐姐起身告辞。

她走后，唐纳的心中充满愤恨之情。他这才发觉，自己一片痴情，受人欺骗，受人愚弄！

他奋笔疾书，给二哥郑君里写了一封长信，向他痛诉蓝苹之狡诈、虚伪，济南之行的可悲、可叹……信中说出了蓝苹出走的真正原因，说出了她究竟躲到何方。

正是这封信，后来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十·八”抄家，以郑君里家为真正目标，就是要查抄这封信。张春桥受江青之托，几次三番要郑君里交出来的，也正是这封信。因为江青曾听唐纳说起，给郑君里写过如此这般的一封信，早就记在心中，恨在心中……

江青除了追缴此信之外，据香港《大公报》1980年12月13日的《江青百般寻觅，“小俞”何许人也》一文，也提及江青追缴郑君里手头其他与“小俞”有关的信件：“（1980年）12月10日晚七时半，北京电视台播映了江青昨天（9日）出庭受审的详细实况。市民争相观睹……法庭宣读郑君里给江青的书信，信中提到了‘小俞’与她有书信往还的事实。人们立即敏感到‘小俞’，就是江青千方百计要查抄书信中的主要人物。这个人是谁已有一些说法，但最后仍有待将来写江青外传的人解答了。”

给郑君里寄出了长信之后，唐纳出了一口闷气，心境总算平静下来。本来，他猛一听说，蓝苹去找小俞，他气得要马上离开济南；可是，当蓝苹的姐姐说能召回蓝苹，他又心软了，在济南等待着……他的性格的软弱，正是导致了他的爱情的悲剧。

他在悲伤、痛苦、激愤却又夹杂想念、企待之中，坐立不安地在马吉峰家度过了一天。

蓝苹终于与唐纳重回上海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下“小俞”—黄敬的行踪。

1935年秋，原本是旁听生的俞启威，正式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跟北平学界蒋南翔、姚依林等认识了。但是，这时他仍未接上党组织关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俞启威和姚依林等成为学生领袖。这时，俞启威为了便于在外活动，改名黄敬。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陈伯达告诉笔者[32]，黄敬在“一二·九”那天，还未恢复组织关系，翌日被确认为中共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

1936年4月，黄敬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学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36年5月，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黄敬来沪，住在八仙桥青年会大厦。5月底，黄敬出席了在上海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借用那里作会场）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黄敬来上海时，临时改名“黄文山”。他和胡乔木、吴砚农、刘江陵、张惠民五人组成了筹建全国学联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小组，由他任组长。

沙千里在他所著《漫话救国会》[33]一书中，这样回忆道：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简称“全救”。
>
>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即“五卅”纪念日的第二天，在上海开幕。大会共开了两天。
>
> 会议是在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引者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一间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可容纳几十人。这个地方是由吴耀宗安排的。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
>
> ……
>
> 出席会议的代表：北平的代表有黄文山（黄敬）、刘江凌（陵）、陆璀、李家宗（董毓华）……

真是无巧不成书。

蓝苹等三对新婚夫妇5月5日在上海招待亲友时，是在上海八仙桥青

年会九楼餐室，而那时黄敬正住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内！

蓝苹等三对新婚夫妇的证婚人是沈钧儒，而黄敬来沪却又正是和沈钧儒商议筹备成立全国救国会！

黄敬对蓝苹和唐纳的婚恋清清楚楚，而唐纳根本不知道蓝苹的前夫就在上海，就在咫尺之内！

黄敬悄然和蓝苹见面，劝她离开上海回北平。她毕竟跟黄敬有着很深的感情，决定以回济南探望母亲为借口，离开上海，离开唐纳。唐纳呢，全然被蒙在鼓里！

蓝苹的姐姐对唐纳说，蓝苹去天津了。其实，她在北平！

翌日—唐纳处于高度兴奋之中。

一大早，马吉峰就拿着一张报纸进来，高声呼喊："唐纳，唐纳，看报，看报—你成了济南的新闻人物啦！"

唐纳一瞧，嘿，"唐蓝事件特刊"！唐纳接过报纸之际，马吉峰神秘地笑了。

那特刊全文刊登了蓝苹写给唐纳的最后一封信，唐纳26日写给蓝苹的遗书，还有唐纳在自杀之际致郑君里、袁牧之、赵丹、徐怀少的一封长信……

唐纳抬起头来，马吉峰仍在神秘地笑着。

唐纳恍然大悟，正是他面前的这位文友把这些信件捅到报社去，印出了这份特刊！唐纳哭笑不得，只好由他去了。

唐纳细细地看着特刊，读着他"26日夜远处传来鹧鸪啼声和着雨声时"写下的遗书，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正在恍惚之际，马吉峰说有客人来了。

唐纳丢下报纸，站了起来，以为蓝苹来了。出乎意料，却是郑君里从上海专程赶来！

原来，唐纳自杀以后，茶房除了在他房中找到致蓝苹的信之外，还找到致郑君里等的信。人命关天，济南宾馆当即按信封上的地址，给郑君里发了电报。

郑君里接到电报，奔往赵丹家，大家都为唐纳自杀惋惜不已。他俩一商量，决定由郑君里赶往济南，料理唐纳后事，而赵丹则赶往大律师沈钧儒先生处，要求他为唐纳之死申冤。

郑君里含泪踏上北去的火车。刚到济南，他直奔济南宾馆，方知唐纳已经脱险，当即破涕为笑。

他终于找到马吉峰家，兄弟团聚，悲喜交集。

“昨天我还寄信给你呢！”唐纳对二哥郑君里说道。

“信里讲些什么？”

唐纳附在郑君里耳边，说出了蓝苹姐姐告知的消息。

郑君里也愣住了。这位六和塔婚礼的主持人，怎么也想不到，新娘蓝苹如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蓝苹来了，我要当面跟她算账！”唐纳愤愤地说。

“三弟，你千万冷静。”郑君里年长三岁，为人处世到底比唐纳老练、沉着，他叮咛道：“你千万不可当面戳穿蓝苹的隐秘，她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说得出、干得出的女人。如果你不愿再跟她和好，我们现在就回上海去；如果你还要跟她共同生活，那你就别声张，当作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

唐纳无言以对，久久地缄默着。半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过天津，经德州，蓝苹接到姐姐的电报，终于从北平赶来济南。

当天下午，蓝苹在姐姐陪同下，唐纳在郑君里陪同下，在东鲁中学宿舍见面。

向来健谈的唐纳，此刻嘴巴像贴了封条。

向来伶牙俐齿的蓝苹，一脸尴尬，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双方僵持着。

“阿蓝，回上海去吧！”郑君里打破了难堪的沉默，说道，“阿蓝，你不是对三弟说过，等下了雨就回上海。济南已经下过雨了，你该回上海了！”

“你们先回去吧。我收拾收拾再走。”蓝苹说道。

“不，我们一起回上海。”郑君里一手拉着唐纳，一手拉着蓝苹，要往外走。

蓝苹抽回了手，说：“今天就走？”

郑君里斩钉截铁一般说道：“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蓝苹拗不过郑君里。当晚，他们就踏上了驶往上海的火车。

“唐蓝事件”满城风雨

1936年7月1日，《辛报》：《唐纳·蓝苹合离记》；

7月2日《大公报》：《唐纳蓝苹，昨已携手回沪》；

7月2日《立报》：《表演一幕悲喜剧后唐纳蓝苹昨晨抵沪》；

7月4日《大公报》：《唐蓝珍闻？》；

7月4日《娱乐周报》：《六和塔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唐纳在济南自杀》、《唐纳蓝苹和解回沪》；

蓝苹“导演”的这部“悲喜剧”，成为上海一大社会新闻。

唐纳和蓝苹返回上海之后，借住在南京路上的一家饭店。《大公报》记者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 记者于昨晚七时半，接到了唐纳的电话以后，便驱车急赴某某饭店。一进门，就看见那个一向很好动而又顽皮的蓝苹，她还是那副顽皮的神气，不过精神很萎顿。房间里虽然开了风扇，她虽然只穿了件很单薄的黑绸旗袍，但她还是满口嚷着热。
>
> 记者一走进门，便紧紧地和唐纳握了握手说：“应当恭喜你们，看见你们两个一块回上海来。”
>
> 唐纳听了这句话，只是很深沉而又轻微地笑了笑，但那是一个愉快而又满意的笑啊！
>
> 唐纳用了半嘶哑的嗓子和记者谈话。记者问他什么时候碰见蓝苹的，什么时候离开济南的？他说一路上没有好好地睡觉，所以嗓子变得哑了。他是二十九号会见蓝苹的，当夜便乘平沪车直回上海。
>
> 唐纳又说，这一次上海许多朋友都很关心他们，他都很感激。尤其是朋友中有人特地赶到济南，这真是使他感谢不尽的……

也就在这个当口，面对记者，蓝苹女士慷慨陈词：“离沪北上，参加救国运动的工作，后来知道唐纳自杀的消息，便即赶回济南，和他同回上海来了……”

蓝苹所说的“参加救国运动”，其实也就是回北平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当时，黄敬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的指示，正在北平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郑君里呢？当他在大东茶室里惬意地品茗之际，记者追来了。

郑君里只笑眯眯地说了这么一句："唐纳自杀，只要来问我好了，我什么事情都知道。"

[image]

■ 媒体对唐纳、蓝苹婚变的追踪报道

可是，说罢，他除了笑之外，什么话也没说。

他是一个嘴巴颇紧的人。回沪之后，他才收到唐纳从济南寄出的那封信。

一点也不假，他是个"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人，然而，他不过说说笑笑罢了，从未对人透露蓝苹去天津的底细。

恰恰因为郑君里对"唐蓝事件"的"什么事情都知道"，后来"旗手"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蓝苹和唐纳闹得满城风雨，记者们蜂拥到他们借寓的饭店。

不得已，她跟唐纳悄然离开上海，在苏州唐纳老家小住几日，然后搬到上海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又开始同居生活。

当时的报纸，对于"自杀案两主角"，作了如下评论，倒是勾画着两人不同的性格：

> 唐纳—他虽然具有着很前进很积极的思想，但是在性格上，却显得非常的软弱。对人总是笑嘻嘻的。没有看见他发过一次脾气。
>
> 蓝苹，他的这个恋爱对手的个性，却正同他相反。
>
> 一个豪放而带着孩子气的姑娘。在她的生命中，是没有畏惧，没有屈服的。刚强、豪爽，简直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风度。
>
> 她还有着一个非常热诚的性格。只要性情相投的人，不必有多少次的会面，她就可以熟悉得像多年老友一般的无所不谈。
>
> 关于她童年时顽皮的事迹，她说得最为起劲。每当冬日之夜，几个人围坐在火炉旁，她竟会毫不疲倦滔滔不绝地谈上一两个钟头。
>
> 大概在她的生活过程中，所受的刺激太多了。神经衰弱的病症竟降临到这么一个天真、热诚的姑娘的身上。一些的刺激，都足以引动起她神经的反应……

唐纳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人们对他的印象如此，而他实际上也确如此。

蓝苹却有着她的隐秘。这个看似"天真、热诚"的女人，却有着颇为复杂的背景。

"唐蓝事件"，甚至引起陶行知的关注。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诗

《送给唐纳先生》：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得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拼命。
若是为意气拼命，
为名利拼命，
为恋爱拼命，
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34]

陶行知的诗，写得恳切、真诚，今日读来，仍发人深省。

当然，即便在“唐蓝事件”的报道满天飞的时候，谁也未曾提及“小俞”来沪之事—他化名“黄文山”出现在上海，谁也不知道他就是蓝苹的前夫，就连沈钧儒也不知道！事隔半个多世纪，笔者在查阅有关全国学联和救国会的史著时，反复核对黄敬在沪的时间、地点并访问了有关当事人，这才终于弄清蓝苹出走上海的真正内幕。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唐纳和蓝苹总算有了暂时的安静。唐纳埋头于写作，他从评论转向创作。

这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建一厂、二厂。二厂的人马，大都是从电通转来的。二厂的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唐纳、卢敦协助。

此刻，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力，才花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写成了剧本《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紧接着，他又致力于写作剧本《陈圆圆》。

设在天津的《大公报》要开辟上海版，聘请唐纳为影剧记者兼影剧版主笔。

于是，唐纳写了许多影评。他继续参加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当艺华拍了“软性电影”《化身姑娘》时，唐纳参加起草《向艺华公司当局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民报》的“影谭”副刊上，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正直。

朋友有难，他也挺身而出。他的好友夏其言向笔者长谈唐纳其人时，说及一个有趣的故事：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如今，夏其言年逾古稀，他指着他的夫人笑道：“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

一向不甘寂寞的蓝苹，比唐纳更加忙碌。她脚踏电影戏剧两条船，一心一意朝着大明星进军。她明白，尽管经过六和塔婚礼和唐纳济南自杀两出闹剧，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然而在影剧界，她毕竟不过是三四流的演员，明星的地位不是争风吃醋、打打闹闹所能确立的，却在于演出的实绩。

说实在的，论话剧，她只在《娜拉》中挑过大梁。此外，不过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演过小木匠的妻子罢了。就电影而论，她不过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中演过不起眼的角色，还从未演过主角。

尽管她目空一切，就连电影皇后胡蝶也不在她的眼里。然而，胡蝶早在1926年就任电影主演，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她凭《自由神》、《都市风光》这两部影片的次要的配角，能跟胡蝶匹敌？

她终于挤进联华影片公司的《狼山喋血记》摄制组。这部影片由沈

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主角刘三由刘琼饰演，而蓝苹饰演刘三的妻子。

后来江青曾经这样说起《狼山喋血记》：

> 《狼山喋血记》通过讽喻表现间接批判。
>
> 表面上《狼山喋血记》只是一个恐怖故事：一群狼袭击村庄，吃掉大批居民、余下的人陷入恐慌。熟悉这十年来伊索式语言的观众，毫无疑问会辨出狼象征日本人。村民对侵略者的反应不同。女英雄小贞德（小玉）和她的父亲倾向复仇。迷信的茶庄主人赵耳则认为狼受到山神的控制，因此是不可摧垮的；唯一逃脱的办法是用钟把它们罩起来。老张无所畏惧，孤身一人出去冒险打狼。刘三，像他妻子（江青饰），害怕狼群。
>
> 当小贞德、她父亲和勇敢的老张出外打狼时，一群提着一只死狼避邪的捕兽人加入进来。
>
> 父亲赤手空拳，被狼当场吃掉。当晚狼群又袭击村庄，杀死了刘三的儿子；自身的不幸激起他们最后的反抗。当狼群在光天化日之下涌上街道，小贞德、老张和刘三组织全村抵抗。刘三的妻子，一度被狼吓倒，现在勇敢地加入了打杀狼的行列。高举火把，村民们边行进边唱着《杀狼歌》：
>
> 我们不顾生死走出家门。
> 打击豺狼，保卫村庄。

[image]

■ 蓝苹主演的《狼山喋血记》广告

> 我们的兄弟血流成河，
> 我们的姐妹尸冷如霜！
> 尽管豺狼凶恶，
> 我们决不退缩。
> 我们决心消灭豺狼，
> 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家乡。

蓝苹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二主角的地位。不过，在影片开拍之后，蓝苹才知道，这个“第二主角”徒有虚名。就连导演费穆为她而写的《蓝苹在〈狼山喋血记〉中》一文，也不得不这么说：“这里我只介绍蓝苹女士。其理由是蓝苹女士所演的角色，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一个……”“在《狼山喋血记》中，差不多是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这种场面多数是一个镜头的场面，很少连续到三个镜头以上……”

虽然，导演的文章本来想夸奖蓝苹的演技，可是说来说去，却成了叫观众不要“忽略”那“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出现“一个镜头”的女演员。

其实，每一个电影导演的目光都是很尖的。导演们深知，演员的成败将影响影片的成败，导演总是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担任主角。对于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导演们斟酌再三的。蓝苹可以拉人写影评，把她吹得天

花乱坠，可是却难以征服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首先考虑的是影片的成败。

看来，蓝苹虽然算打进电影圈了，可是凭她的演技，离大明星的宝座还远着呢。

她又想在话剧舞台上杀出一条路，她毕竟本是话剧演员，何况已在《娜拉》中饰演主角。

就在这个时候，《赛金花》话剧剧本发表，蓝苹大吵大闹要演主角，又在影剧界掀起一场风波—她是一个永不安分的女人！

这场风波发端于1936年4月《文学》杂志第6卷第4期，里面推出了新创作的国防戏剧剧本《赛金花》。作者的名字，是上海影剧界人士所陌生的：夏衍！

虽说在今日中国文坛不知夏衍其人其名者恐怕无几，然而，在《赛金花》剧本发表之际，人们确实不知夏衍何许人也！

在1936年6月出版的《文学界》第1期上，刊载了《〈赛金花〉座谈会》，就连影剧界台柱人物洪深、于伶、凌鹤，也不知夏衍为谁！

据说，夏衍乃“北方的新作家”！

其实，夏衍—沈端先，早在1932年，便已打入上海电影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他不断地化名：他第一次到明星影片公司出席编剧会，化名“黄子布”；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他改编茅盾小说《春蚕》为同名电影，署名“蔡叔声”……他发表《赛金花》剧本，第一次用笔名“夏衍”，当然难怪读者不知其人了。

夏衍在1985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写作《赛金花》的经过：“其实，我写这剧本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触动。当时我独居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除看报外别无他事。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赛金花晚年的一些不幸遭际，特别是在一篇杂记中看到她入狱时对革命志士沈草的一段讲话，的确使我产生了当时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远远不及一个妓女这样一种感想。这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中抑制不住地对她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剧本算是我的第一个多幕剧……”

《赛金花》剧本发表后，尽管剧作者系“无名之辈”，但看得出作者的功力。那传奇的色彩、变化跌宕的剧情，马上引起影剧界的注意。

蓝苹一看，争着要演《赛金花》主角。虽然八字还没有一撇，当时导演人选都尚未确定，她就请一位“么哥”在《时事新报》上抢发消息，以求先入为主：

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指《赛金花》—引者注），那自然是好

现象，但怯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好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才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

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的导演人才，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

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二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然也不致错的。

至于导演等人才，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

不过，光是抢发消息，想占山为王，也未必那么容易。

渐渐地，局势明朗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过筹备，已准备上演《赛金花》了。

就演员阵营而言，业余剧人协会是够强大的了，拥有王莹、金山、郑君里、赵丹、施超、胡萍等，蓝苹也是其中的一员。

令人不解的是，业余剧人协会居然在报上发出广告“招聘赛金花的扮演者”。

业余剧人协会的女演员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招聘女主角呢？蓝苹不是早就声言要演赛金花了吗？

毛病就出在演员阵营太强：蓝苹要演赛金花，王莹也要演赛金花！

王莹和蓝苹曾一起演过电影《自由神》，此刻为了争夺《赛金花》主角翻了脸！

业余剧人协会无奈，只得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样王莹、蓝苹的矛盾也解决了。

然而，王莹、蓝苹剑拔弩张，谁来当女主角，谁就会受到王莹、蓝苹两边夹击，谁也受不了！

就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导演章泯、于伶得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原来是沈端先，于是便把矛盾“上交”到剧作者那里。

[image]
■ 蓝苹将演《赛金花》的报道

[image]
■ 蓝苹（右）与王莹（1935年）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出于无奈，我出了一个糊稀泥的主意，认为可以分A、B两组，赵丹和蓝苹，金山和王莹，

让他们在舞台上各显神通，这个设想章泯同意了，而于伶则面有难色。”“因为于伶知道蓝苹不论做戏还是做人，都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担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闹的。后来事态发展果不出于伶所料……”

真的，蓝苹不屑于充当B角！她依旧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就在王莹、蓝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政变”：金山、王莹从业余剧人协会中拉出一支人马，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已暗中与金城大戏院签订合同，于1936年11月19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尽管在11月15日，蓝苹、赵丹、郑君里、唐纳等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大东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天之后，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

《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不过，各报竞载“赛金花纠纷”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

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后来，她成为“旗手”，便在“文革”中置王莹于死地。这是后话。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作为左翼电影演员，蓝苹曾参加鲁迅葬礼，并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35]：

>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
>
> 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深心里喊出：
>
> “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我张大了眼睛期待着。但是他没有理睬我，仍旧那么安静的睡在那儿，像是在轻轻的告诉我：“孩子，别吵了，让我安静一下，我太疲倦了！”于是我带着两汪泪水，一颗悲痛的心，悄悄地离开他，攒进了那个广大的行列。
>
> 这种难以言喻的哀痛，在不久以前曾经苦恼过我一次：在看复仇艳遇的新闻片里，我看到另外一位斗争到死的伟人——高尔基。我看到高尔基生长的地方，又看到他老年来那种刻苦的精神，最后那个占领全银幕的，紧闭着眼睛的头，使我像今天一样的噙着眼泪恳求着：“高尔基！再睁一下眼睛吧，那怕只睁一下！”但是……
>
> 我像一个小孩似的，在戏院里哭了。
>
> 由于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链一般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
>
> 太阳像是不能忍受这个哀痛似的，把脸扭转在西山的背后。当人们低沉的哀歌着“请安息”的当儿，那个傻而执拗的念头又在捉弄我：
>
> “复活了吧，鲁迅！我们，全中国的大众需要你呀！”
>
> 没有一点儿应声，只听见那刚劲而悲愤的疾风在奏着前夜之光。
>
>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
>
> 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应当说，22岁的蓝苹，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表明她确实是左翼电影阵营中的一员。

当然，在“文革”中，说30年代的蓝苹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这又未免言过其实了。

后来江青在与美国记者维特克的谈话中，这么吹嘘道：

> 鲁迅在《申报》“自由谈”里称赞我，我没有见过他。他是看了我的戏。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但“四条汉子”，就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搞分裂，想搞死我。你知道，中国有个女明星叫阮玲玉被迫自杀了。他们想逼我当阮玲玉第二。
>
> “四条汉子”提出国防文学，是典型的汉奸文学。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于是他们围剿鲁迅，我也是当事人，被围剿……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鲁迅是革命文艺旗手，是对我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的革命女性……
>
> 哎，真惨啦，在那个时代，鲁迅贫困交加，生了肺病，国民党迫害他，“四条汉子”围攻他。
>
> 1936年鲁迅病逝了，我们组织上万人的大游行，也就是送葬行列。我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一排人手挽手，昂着头，你想想，那有多么神气。我一点都不害怕国民党特务……

她明里是左翼演员，然而，暗里又与右翼文人眉来眼去。

1982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20世纪30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当蓝苹在1935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5月，从济南来到了上海。

1936年1月1日，蓝苹在崔万秋主持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谈论演员与天才的关系：

随笔之类

> 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当听人家说到“天才”二字，不知怎的，就会莫名其妙的竦然起敬！不过，在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头脑里，却

又时常起伏着以下的疑问：天才？天才是甚么呀？难道是天给的才？那么，天又是谁给的才呢？

最近和朋友们重又谈到了“天才”问题，争辩所得的结论是：一认为“天才”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人的本质上分着高低而已，光靠先天的赋与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的！

很明显的例子：何如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但是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

[image]

■ 蓝苹及她写的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

因此，一个人如果专靠着美貌，或是一点儿聪明去做一个演员，那是危险的！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的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同时，一个演员，更应该尽量的使自己成为一个多方面的演员，决不要把自己封锁在一个狭窄的圈圈里！因为一个演员要是只能扮演那种比较适合自己的角色，那就谈不到演技，那只是一种自我的表现而已！

就在蓝苹文章发表后的两个多月，3月15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大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话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

外，可说寥寥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挥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1933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1935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耐人寻味的是，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36]：“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

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他们不断地到怡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蓝苹也并不讳言她跟唐纳之间的打闹。她在那《一封公开信》中写道[37]：

>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蓝苹的公开信，活脱脱地勾勒出她的鲜明形象。

值得提到的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成员们（除江青之外），联名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信，说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并说“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38]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听说蓝苹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尚在，“阿妈”是深知蓝苹内情的。

我去寻访这位历史的见证人。

我托好几位朋友代为寻觅。费尽周折，1986年7月26日，我终于找到了那位“阿妈”—当年许慕贞家的保姆、蓝苹的好友秦桂贞。

那一回，她谈了一些，有的情况她没有谈。我把她谈的情况写入《江青传》初版本。

1995年10月，笔者再度采访了她。由于她已经请别人给她读了笔者的《江青传》初版本，以为那本书为她出了心中的冤气，所以有了信任感，毫无保留地谈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

竟有那样的巧合：秦桂贞生于1914年，也属虎！这样，蓝苹、唐纳、黄晨、史枚、夏其言、秦桂贞六人同年。

在1995年第二次采访秦桂贞的时候，我和妻用车接她到上海环龙路，去寻找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

我们一起来到了当年的“上海别墅”。她拄着拐杖，旧地重游，不胜感慨。她告诉我，历经四十多年没有去那里了。她熟门熟路，带着我们来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层楼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

她来到底楼的灶间，说她当年当佣人，每天在这里烧菜，而蓝苹住在二楼的亭子间，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底楼的灶间。有的报道误称秦桂贞是蓝苹的女佣，其实，蓝苹当时的收入菲薄，怎么雇得起佣人？

秦桂贞说，她是许家的女佣。许家住在三楼。许家是二房东，把二楼的亭子间租给了蓝苹。

秦桂贞如今上楼，每走一级楼梯，都要歇一口气。她说，当年她每天飞快地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光是每顿饭，就都得由她从底楼送到三楼许家。她总是把楼梯擦得干干净净。

秦桂贞带着我们上了二楼，来到蓝苹所住的亭子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直角三角形的房间。三角形的顶端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装了一个坐式抽水马桶。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米而已。有一扇窗。秦桂贞回忆

说，当时，窗下放一张书桌，桌上有台灯。三角形的直角处，放一张双人床。床下放着皮箱。另外，还有两把椅子。这便是蓝苹住处的全部陈设。由于人们不喜欢住这三角形的房子，所以租金最廉。也正因为这样，底楼的那间三角房子，作了灶间，而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成了佣人秦桂贞的住房—她与蓝苹的房间只隔着一层楼板。

秦桂贞忽地想起，在二楼楼梯口，有一间几家合用的大卫生间，便带着我们去看。那卫生间里有个搪瓷大浴盆，秦桂贞认出是当年的"原装货"。她说，蓝苹就在这里洗澡，她也用这个浴盆。只是经过半个多世纪，那浴盆底部的大片白瓷已经脱落。

浴盆依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仍在用这浴盆洗澡。他们听说原是江青用过的，都显得非常惊讶。

秦桂贞回忆说："那时候，我喊蓝苹为'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为"阿妈"。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充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小姐怎么不吃水果？

"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秦桂贞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

"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image]

■ 秦桂贞带领作者来到江青当年居住的"上海别墅"（叶永烈　摄）

[image]

■ 当年江青在上海别墅所住的亭子间（叶永烈　摄）

在秦桂贞的印象中，唐纳斯斯文文，讲话软绵绵，有点娘娘腔。他常常坐在窗口那张桌子上写东西。秦桂贞大字不识，看不懂他写什么。

蓝小姐讲起话来呱哒呱哒，笑起来咯咯咯咯，声音很响，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气变化无常，喜怒无常。

“一个苏州人，一个山东人，他们俩在一起真热闹！”秦桂贞一边回忆，一边笑着。

半夜，秦桂贞常常被楼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声所惊醒。那是蓝苹在喊她。秦桂贞一听，就知道他俩在吵在打，赶紧下楼。她总是每次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角色。

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因为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

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

“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这么感慨道。

蓝苹究竟为什么跟唐纳离异呢？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

1937年5月27日，蓝苹、唐纳再度成为上海滩上的新闻人物：距唐纳上次在济南自杀—1936年6月27日之后整整11个月，忽然从上海吴淞传出消息，唐纳跳海自杀！

幸亏被人及时捞起，送往吴淞医院抢救。口吐白沫的唐纳，总算又一次免于一死……消息传出，又轰动了上海报界！

报上报道唐纳二度自杀，只是提及蓝苹遗弃了他。其中详情，外人莫知。

直到6月14日，记者们获知在尤竞家发生的一幕悲剧，这才了解唐纳跳海自杀的真正原因：

尤竞，亦即于伶，章泯之友。那天，于伶家仿佛成了“临时法庭”—那是章泯借他家办理离婚手续。

章泯，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四川峨眉人。1929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是上海话剧界声望很高的导演。同时，他还是一名多产的剧作家，创作过许多剧本。另外，他也是一名艺术理论翻译家，曾与郑君里合译过《演员自我修养》等书。

1931年，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论悲剧》、《论喜剧》，在戏剧界颇有影响。

赵丹称章泯为“严师诤友”。章泯死于“文革”中的1975年2月4日。1980年2月春节时，赵丹写下《怀念严师诤友章泯》[39]一文，内中回忆道：

> 章泯原名谢韵心，是我参加左翼剧联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但凡我思想上有什么疙瘩，或是什么大事的决定，都听他的。此后虽然剧联组织宣布解散了，然而我们一直还保持这种关系。他是我的严师诤友。
>
> 他为人正直、严肃，不苟言笑，待人诚恳，绝少低级趣味。他是党内的一位理论家，在同志间有威信。他也写过一些剧本，但在介绍世界名著与戏剧理论方面的建树更大。我也正是从他那里才第一次听到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瓦格坦柯夫、梅耶荷特、泰伊洛夫、雷因哈特……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也才得知在话剧领域内原来也有这许多不同的派别，并且各个的主张自成体系，他们之间又往往相抵相悖。……

> 1934年早春的一天（应为1935年—引者注），金山陪同章泯来找我，邀我参加易卜生的《娜拉》的演出。一开头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喊几句口号，流出几滴眼泪的表演水平阶段了，我们要提高左翼戏剧的演技水平……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这样，我们就在《娜拉》的排演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起史丹尼方法了。老实说，在这之前，我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只凭一点直感在演戏，能有这样一次有目的的学习机会，真是珍重如宝……
>
> 章泯同志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他非常尊重别人的创造和劳动，他与演员一同工作，完全取平等探讨的态度，总是从理解演员的创造意图、向往和可能出发，善于将演员的创造意图纳入到他自身的导演工作中去，成为他再创作的起点……
>
> 他最蔑视一个人的自满和沾沾自喜的低级情操。他不止一次地教育过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一次的创造，都只是一次艺术上的探索，一个重新的起步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什么成功或是失败可比。"

从赵丹的文章之中，足以看出章泯在戏剧界的崇高声望。

章泯，本来有着幸福的家庭：妻子萧琨女士是著名的诗人萧三的胞妹，和他是结发夫妻。结婚多年，感情不错，他们已有几个子女。

然而，由于一个比章泯小七岁的第三者插足，使章泯神魂颠倒，家庭崩溃。萧琨忍无可忍，只得与章泯离婚。

离婚仪式在于伶家举行。章泯和萧琨双方亲友到场作证。

章泯脸色铁青，当着众亲友，在离婚书上签字，然后把孩子们领到自己一边—孩子归他抚养。

萧琨大哭。颤抖的手，执着颤抖的笔，在离婚书上签字。泪水浸湿了纸头。写了好几分钟，她才写好自己的名字。

孩子们挣脱了章泯的手，扑到萧琨怀中。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章泯上前拿起离婚书，一扭头，走了。

那个造成夫妻离婚、母子离异的第三者，不是别人，正是蓝苹！

蓝苹早就认识章泯。早在1934年1月，上海成立无名剧人协会（又名"无名剧社"），当时叫李云鹤的她就参加了。左翼剧联指派了尤竞（于伶）、章泯来指导这一剧社。这个剧社组织两次公演，李云鹤都参加了。

顾而已、赵丹记得，一天晚上，他们去观看无名剧社演出的《锁着的箱子》。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顾而已、赵丹看来，那个剧社演技平平，但是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演员，不论对白、动作都还可以，似乎受过专门的训练。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演员叫李云鹤。

1935年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筹排《娜拉》时，章泯作为三位导演中的一位，跟蓝苹朝夕相处。这时，赵丹也和那位改名为蓝苹的女演员第一次同台演出。

不过，那时的蓝苹，只是把话剧看作一块跳板，要从舞台跳上银幕。所以她跟唐纳同居，希望借助唐纳在影评界的影响发迹。何况唐纳的结拜兄弟袁牧之、郑君里、赵丹都是电影界的顶梁柱，都会助她一臂之力。

电影是块放大镜，演员的才、貌，在银幕上，纤毫毕露。蓝苹貌不惊人，演技平平，在电影界成不了大明星。

她又打话剧的主意。她找章泯，为她主演《赛金花》出力。

王莹夺走了《赛金花》。蓝苹再入电影界。1937年上半年，她终于争得电影《王老五》一片的女主角。该片编剧、导演为蔡楚生。蓝苹在影片中扮演王老五之妻。

后来江青这样说起电影《王老五》：

> 王老五，是一个35岁的穷苦单身汉，他尽管政治觉悟不高，却有着劳动人民的“良心”。他爱上了漂亮的女缝纫工（蓝苹饰），她却没有回报他的爱。但因为她父亲死时，他对她表示同情，出于感激，她嫁给了他，和他一起住在一间典型的上海棚屋里，并生了四个孩子。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处境的悲惨使他变得十分颓废，开始酗酒。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加剧了他的颓废，他喝得更凶了，这个家庭不幸也加深了。工头想笼络王老五为他服务，他暗地建议他在工棚中间放一把火。头脑简单的王老五通常是很容易受骗的，但这一次他凭直觉拒绝了，不畏工头，在人们面前斥责他是个叛徒。恼羞成怒的工头为了报复，把王的茅舍变成了火海，他的妻子和孩子勉强逃生。然后，他（指工头—引者注）煽动人们反对王，反而把他（指王老五—引者注）挑出来作为“该死的叛徒”。他的妻子因此站在人民面前，脸上流着泪，乞求人们不要再迫害他。阴险的工头放的火引起敌机的警觉：村庄被轰炸，日本人从四面包围了他们。最后一幕，王的妻子俯在她丈夫的尸体上。人们的血泪在她周围旋绕，她无畏地抬起头，痛骂外国敌人和中国叛徒。

这一回，不像《狼山喋血记》，女主角是名副其实的，镜头很多，绝不是“隔几百尺片子，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

蓝苹期望着《王老五》上映，会使她在影坛名声大振—这是她平生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使蓝苹大失所望：

《王老五》完成以后，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大为不满，说什么“中国是没有汉奸的”！胳膊拧不过大腿，编导只得删剪了两本影片（亦即剪去20分钟影片），使全片大伤元气，变得残缺不全。这部影片一直拖到1938年4月才在上海上映，那时日军已占领上海。电影院观众寥寥无几。

蓝苹在电影界努力的同时，也寄希望于舞台。话剧毕竟“立竿见影”，排演几天之后，便可跟观众见面。

她终于打章泯的主意了。她深知，一旦有了章泯这把梯子，她就可以爬上舞台明星宝座—因为章泯是上海举足轻重的话剧导演。

她再也不顾什么章泯比她大七岁啦，章泯是有妇之夫啦……

她白天拍《王老五》，夜里跟章泯鬼混。

章泯正在筹备排演俄国19世纪著名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大雷雨》，蓝苹博得了章泯的欢心便出任女主角—扮演卡嘉玲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37年5月中旬，唐纳写了一个剧本，托钱千里交给蓝苹。钱千里是电影导演，跟赵丹、顾而已、朱今明是江苏南通崇敬中学同班同学，也是唐纳好友。

钱千里曾告诉笔者[40]：“蓝苹所住的那一带，住着许多电影界的朋友，诸如陈鲤庭等等。那天我正好要去那里，唐纳就托我带剧本。”

[image]
■ 江青20世纪30年代主演的影片《王老五》剧照

[image]
■ 蓝苹饰演《大雷雨》中的卡嘉玲娜（1937年）

本来，送一个剧本，犹如邮递员送一封信，普普通通。然而，钱千里在无意之中，却在蓝苹家里见到章泯。

当时的《影与戏》，作了如下报道：“钱千里从来没有去过。那天去得太早，大约蓝苹还没有起来。钱千里敲门敲了很久，以为她昨夜拍戏拍得太晚，现在还没有回来。本来打算走了，哪晓得蓝苹又轻轻地开了门，伸出一个头来。钱千里就把一个剧本交了给她。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就顺手推了门进去，哪晓得章泯正睡在床上，钱千里弄得有点难为情，两人互相点了点头，钱千里就轻轻地走了……”

5月22日，唐纳知道这件丑闻后悲愤欲绝。

5月27日，怒气填膺的唐纳在吴淞跳入波涛之中……

蓝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跟章泯公开同居。

章泯夫人萧琨实在无法容忍，终于与章泯离婚。

直到后来蓝苹去了延安，章泯到了重庆，章泯又和妻子萧琨复婚。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蓝苹，害得唐纳跳海，害得萧琨夫离子散。这时的她，不过23岁而已。这时的她，已有过三个丈夫，已入过党、坐过牢、写过自首书，已上演过“六和塔婚礼”、“唐纳济南自杀”、“争夺《赛金花》主角”和“蓝苹、章泯同居”这么四出轰动上海的闹剧……在生活的舞台上，她已经演得够淋漓尽致的了！

生活，生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各式各样的灵魂。

然而，就在蓝苹的第四出闹剧进入高潮之际，她居然在《光明》杂志发表了《我们的生活》一文。文末注明的写作年月为“1937年5月14日”，正是唐纳跳海前的十多天。

“演员的生活像谜一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章一开头，蓝苹就故弄玄虚。

在文章中，蓝苹除了大谈演员“身体的训练”、“丰富的知识”、“操纵自如的精神活动”之类。忽然写下了这样的“醒世名言”：

> 因为戏剧艺术本身的艰难，再加上现社会许多不利于我们的客观条件，一个演员的生活是很容易有着以下的危机的。
>
> 生活的糜烂—这糜烂的生活是演员的艺术之最大的敌人，它毁灭着演员本身及他的艺术。一个演员在目前这样社会中，是很容易走上糜烂的道路的，这一半是由于那恶劣的环境促成的，不过演员个人的自暴自弃也是重要原因。环境固然可以影响个人，同时个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的阶段。将自己溶化在纯正、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她的话，说得是那么漂亮，那么动听。

她并非后来成为江青、成为“旗手”，这才说大话、假话、谎话。她年轻时，就已经大言不惭了！难怪连她自己也说，“处于言行不一的深深的痛苦之中”—这倒是一句老实话。

她的朝三暮四，还不光是“生活的糜烂”。她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每“爱”一个男人，都是为了实现她的一着棋。

夏其言清楚地记得[41]，一天，当蓝苹跟史枚、唐纳、他一起闲聊，蓝苹随口说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

这，大抵就是蓝苹为人处世的“诀窍”。正是这句“名言”，她征服一

个又一个男人，朝着“高居人上”的目标走了一步又一步棋。

不过，她的棋走到丢唐纳、取章泯这一步，她的真面目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即便在当时那样的上海，她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就在1937年6月14日章泯与萧琨夫妻被蓝苹拆散之后，翌日，《时代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

虽然半个世纪过去，迄今重读此文，仍觉得作者分析颇为精辟，入木三分，把蓝苹的灵魂暴露无遗。大抵由于担心报复的缘故，作者没有署名。但是，作者如此敢言，抨击蓝苹的丑行，颇为难得。

现全文照录，以飨读者。看得出，这位作者对于蓝苹，是相当熟悉、了解的。

> 大都市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住在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那干出来的事，无论如何也会带一点神秘性的。在不久的以前，报纸上曾刊载过女演员被强奸的新闻，但事后据悉，那是事先计划这样作的，因为要使那部影片被人注意，才想出这种打官司当宣传的妙法来，这里面还带了一点生意眼。
>
> 出风头，成了都市的生活条件，因之每个人都在想法子出风头。据说蓝苹和唐纳这次交恶，其中也有着特别作用的。
>
> 蓝苹，本来是一个貌既不惊人，而又没有相当地位的女人。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前途，是颇为关心的，她觉得在大都市里，假使不引起人的注意，是没有出路的。可是，自己又的确没有惊人的地方，虽然在《娜拉》一剧中演出，是颇博到好评，究竟不能像别的女人一样。那时候，她更想在电影界中露露头角，苦的却是没有人替她捧。这个问题一直苦闷在心里。
>
> 侥幸，那个时候，唐纳正在感到女人的需要，蓝苹又是一个扮演过“娜拉”的，对于男人，她是颇有把握的，而且她也知道唐纳在过去电影界里是曾以写影评出过风头的。
>
> 她知道仅使利用唐纳，也许可以使自己在电影界红一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人很快地毫无条件的就结合上了。她的原意，是想唐纳可以捧她成为红星。
>
> 那晓得希望并不变成事实，蓝苹当时是颇为苦恼的。后来她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她曾回到济南去，表示和唐纳分开。但据说这里面是有原因的。蓝苹知道唐纳那时正热恋着她，一定会演出什么惨剧来的。那稿子报纸上一登，自己不是可以大出风头吗？所以，唐纳到了济南，开始她拒而不见。果然，唐纳闹了自杀的把戏，报纸盛传，她以为密计已酬，便决心跟唐纳回到上海。
>
> 谁知报纸上虽然登过，蓝苹的电影地位，并没被人注意，因之使她感到格外灰心，更明白唐纳已经是无用的了。她便转移念头，想在话剧界露头，不能不先被人注意，于是蓝苹的计划又来了。
>
> 她看准章泯在话剧界上，是颇占势的。她下个决心，想以爱情

来感化章泯，希望章泯替她吹嘘。果然章泯可中了她的计，不但抛弃了共过患难的糟糠之妻，更不顾了许多孩子，死恋着蓝苹。蓝苹的企图是想章泯的妻子一定会吃醋，和她演了一番什么反戏，报纸一登，她不是便可以乘机出了风头吗？又谁知这个计划，又失败，竟引起唐纳的自杀，而反遭到许多人恶感的批评，这在蓝苹是意想不到的！

蓝苹的爱唐纳，爱章泯，都带有副作用的。可惜唐纳一点不明白，居然以命来争，想不到硬性的影评人的出路是如此，真使人感到特别的失望。

蓝苹和唐纳的交恶是如此，蓝苹和章泯的结合也是如此，这应当谁都想不到的吧！

这篇评论，除了作者不知蓝苹的北平之行，未能准确分析蓝苹离沪北上之外，可以说是蓝苹在上海滩混了两年多的一份小结。作者压根儿没想到蓝苹日后会成为“旗手”，却可贵地看透了她的本性。

至于《青春电影·半月刊》7月号对蓝苹的抨击，虽然只短短几句，火药味却够浓的：

> 蓝苹的脾气很骄，架子很大。有人说，“谁讨了这位女人，前世里总是作了孽。”由这句话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她一点轮廓了吧！
>
> 最近她和唐纳闹翻，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牢骚文章，原因是她另有所欢，爱上了章泯。不过害得章泯和他的夫人萧琨实行离婚，这一点在道德上讲起来，蓝小姐手段未免太辣。尤其他的夫人萧琨和章泯已有孩子了。

萧琨离婚之后，只身离沪，前往延安，投奔胞兄萧三去了。

萧三是毛泽东的密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就是他写的。此书在1949年初版，1979年再版。再版时，萧三在序言中写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 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在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别十多年后的三十年代末期，复在延安相处六年余，过从颇密。
>
> 以后在阜平，在平山西柏坡……我备受阳光雨露的哺育。[42]

蓝苹终于告别大上海

舆论越来越不利于蓝苹。她的不道德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

蓝苹我行我素，依然跟章泯公开同居，而且在报上放出空气："悲剧闭幕，喜剧展开。蓝苹章泯，蜜月旅行。"

然而，在影剧界，稍有正义感的人，都对蓝苹的行径嗤之以鼻。

就连演话剧时，蓝苹刚一步上舞台，台下"嗡"的一声，人们议论纷纷，对她说三道四，剧场秩序顿时乱哄哄的。

电影厂的导演们对这位又刁又辣却又没多大本事的演员，也直摇头。

蓝苹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她而去。

她形单影只，感到空前的孤立。瞻望前景，不寒而栗。她自己毁了自己。

她明白，她已不可能在银幕上或者舞台上成为一颗"红星"。赛金花之争，作为第三者插足章泯家庭……这一系列事件使蓝苹感到在上海很难再待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就在这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华大地。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处于绝望之中的蓝苹，决计离开上海，她筹划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一天，吃过早饭之后，秦桂贞[43]照例来到蓝小姐的亭子间，替她扫地、拖地板。秦桂贞发觉有点异常，蓝小姐在那里收拾东西。

"蓝小姐，你要搬家？"秦桂贞问道。

"远走高飞！"蓝苹眉飞色舞地说。话刚出口，她立即压低了声音，对秦桂贞说："阿桂，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要替我保密，对谁都不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蓝小姐回山东老家了。"

蓝苹还对她说，要为妇女的翻身而斗争。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秦桂贞的心。

"还回来吗？"秦桂贞问。

蓝苹摇了摇头。她一边从抽斗里捧出一堆照片，扔进小皮箱，一边对秦桂贞说："阿桂，你不要扫了，反正我今天就要走了。"

"什么时候走？"

"等天黑了，不声不响地走。"

秦桂贞放下扫把、拖布，拿出刚发的工钱—她每月的工钱只有两元！

她上街，想给蓝小姐买件纪念品。她花了两元钱买了一本照相册。她想，蓝小姐那么多的照片，需要用照相册贴起来。

当她把照相册送给蓝苹，蓝苹高兴得紧紧搂住秦桂贞，连声说："阿桂，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

蓝小姐拿出了自己的照片送给秦桂贞，作为纪念。

当天晚上，蓝苹吃了秦桂贞端来的蛋炒饭，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悄然拎起那只黑色的皮箱，消失在夜幕之中。

蓝苹在上海神秘地消失了。

在蓝苹离开上海的时候，前去送行的有章泯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戏剧理论家葛一虹。

后来，秦桂贞才知道，蓝苹几度婚变，在上海影剧界受人谴责。她无法在上海立足，想溜了。

蓝苹究竟何往，人们茫然无知。

直至1938年元旦，《戏》杂志的《男女明星近况如何》一文，才用几行字报道了蓝苹的行踪：

> 蓝苹，平常高谈阔论，思想偏激，今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与政府军相同的站在民族战争的最前线，蓝苹为之大大兴奋。听说在二个月之前，蓝苹即已离沪赴陕北，希望一见毛泽东，并报名在"红军大学"念书……

哦，"希望一见毛泽东"！

[21]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新学识》第1卷第5期，1937年4月5日。

[22]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23]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1986年5月30日《国际日报》。

[24]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99—100页。

[25]郁风：《蓝苹与江青》，收入《巴黎都暗淡了》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6]夏衍，原名沈端先，笔名丁一之、丁谦之、蔡叔声、黄子布、王老吉。

[27]雷雨：《女明星时代的蓝苹》，《海星周报》第23期，1946年8月6日。

[28]1986年6月16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黄晨。

[29]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1989年第3期。

[30]三友：《蓝苹与唐纳同居，在北京的丈夫怎么表示》，《娱乐周报》1936年第1卷第23期。

[31]1995年10月4日，叶永烈采访钱千里于上海。

[32]1988年12月19、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33]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34]陶行知：《行知诗歌集》，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225页。

[35]蓝苹：《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绸缪》第3卷第3期，1936年11月15日。

[36]蓝苹：《一封公开信》，《联华画报》第9卷第4期，1937年6月5日。

[37]蓝苹：《一封公开信》，《联华画报》第9卷第4期，1937年6月5日。

[38]向继东：《江青秘书阎长贵眼里的江青》，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39]赵丹：《怀念严师诤友章泯》，《大地》1980年第3期。

[40]1995年10月4日，叶永烈采访钱千里于上海。

[41]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夏其言于上海。

[4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43]1986年7月26日、1995年9月30日、1995年10月3日及4日，叶永烈多次采访秦桂贞。

第三章　成为“第一夫人”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当时的延安，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无数左翼青年。仅在1938年5月到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江青就是这众多左翼青年中的一个，而且她去延安的时间比较早—1937年8月（此前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名为“红军驻西安联络处”）。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纭。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该书第二卷的第60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同年9月（指1939年—引者注），‘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1938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1939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1963年2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剧照，说明词写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却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1980年8月的第二版上，那剧照说明词中的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44]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1935年4月20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莫仲乔，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1936年6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1933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李鹤。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李鹤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蓝苹在生活上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1936年7月，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蓝苹"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那时，唐纳刚和蓝苹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

雨。

徐明清打听到蓝苹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蓝苹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蓝苹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蓝苹。徐明清想，蓝苹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蓝苹。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冰，你上哪儿去？"蓝苹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蓝苹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蓝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徐明清一直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蓝苹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蓝苹没有联系。她没有给蓝苹去过信，蓝苹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她是在西安见到原来临海女子师范的同学李佛古，知道李佛古的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借助于这层关系，来到西安北大街幼稚

园工作。

过了一年—1937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蓝苹！

博古同意蓝苹进入延安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蓝苹的气色好了一些。蓝苹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了——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徐明清问蓝苹，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蓝苹说是王洞若告诉的。蓝苹在晨更工学团工作时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蓝苹得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之后，就起程来到了西安。

蓝苹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蓝苹："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蓝苹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蓝苹要去延安。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蓝苹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蓝苹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蓝苹跟唐纳闹翻了……

蓝苹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蓝苹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蓝苹说道。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蓝苹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蓝苹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蓝苹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蓝苹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蓝苹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徐明清当时是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联系的相关工作。她与当时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都很熟悉。

在安排蓝苹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蓝苹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办事处谈一谈。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于是，徐明清陪着蓝苹，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联络处。

她俩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蓝苹介绍给她。蓝苹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蓝苹，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蓝苹第一次见面。

[image]

■ 作者采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江青就是从这里前往延安的。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蓝苹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此后，蓝苹到联络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蓝苹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蓝苹进行口头审查。蓝苹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不久，蓝苹就搬到联络处去住。

一天，蓝苹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就这样，蓝苹从此走进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带—延安。时间是在1937年8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忆，把蓝苹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蓝苹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至于蓝苹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黄敬先去了延安

虽然蓝苹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1936年春夏之交，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蓝苹姐姐发来电报，蓝苹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钊之子李葆华。1937年2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45]："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会议定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5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46]

斯诺夫人还说："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5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47]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

1937年4月21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笔者在美国旧金山采访了王福时先生[48]。

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4月30日，抵达延安，斯诺夫人说“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5月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

在延安，黄敬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看重黄敬。2001年11月，笔者在旧金山伯克利采访年已九旬的王福时先生时，他回忆说，他当时陪同斯诺夫人多次采访毛泽东，“两黄”在座，即黄敬与黄华。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5月20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5月20日离开延安的。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蓝苹以影响。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49]，据他回忆，黄敬此次与他同行。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1937年9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1937年11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

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据蓝苹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有人给她找来一匹马，但她从未骑过马，不知怎么骑它。她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马背。那匹马只是低头吃草，一动不动。她下马去折了一枝柳条，又上马，并用柳条鞭策着马。于是马疯跑起来。她感到自己似乎随时都会被摔下来，要摔成碎片。终于马跑累了，速度慢了下来……她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80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洛川是从西安到延安必经之地。笔者曾经在1992年3月、2006年9月、2011年3月三度访问洛川。洛川县是陕西境内少有的地势平坦的地区，俗称洛川塬，是陕西重要的农业区。洛川苹果闻名全国。

很巧，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我到洛川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在开会。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深恐会在他们面前晕过去。但是组织上还是决定我去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见面。他们大家都出来问候我。我鼓励自己不能在他们面前垮下去，此外，我必须笔直地站立着。于是就这样我同他们大家都握了手。他们当时正在开的会议很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他们大家都出来问候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蓝苹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在洛川，蓝苹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1937年8月底。

另外，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当时，叶子龙在洛川见到了蓝苹（此事在后文中将会详细叙及）。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蓝苹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50]。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则是这样解释江青所说“江青”这名字的含义：

> 从字面上讲，是“江河青翠”之意。她解释说，第一个字“江”与她的姓“李”没有关系。但是，“江”反映了她爱悠长和宽广的长江，她在上海看到过长江的入海口。“青”表示她爱青山碧海，而且在中国画中都被表现作青色，这是自然的色彩。中国人认为，青蕴含于蓝色之中。青即是一种特别的蓝，如江青所引用的古诗所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此，江青说人们应该能读明白她的名的含义。
>
> 她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很是有意思。江青的“青”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她的旧名蓝苹的“蓝”。而江青的“江”，意味着河水；很能使人联想起“阴”。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阴便是女人。在神话与历史中，女人要为河流泛滥和洪水灾害而受到惩罚。直到现在中国老百姓中仍有这么一种说法，即“女人是祸水”。
>
> 她名字中这种明显的“阴”性正好与毛的名字的明显的“阳”性相匹配。在革命的宣传画中，毛被象征为太阳，是宇宙的基本能量，“阳”便是男性之意。在这些图画中，太阳的象征意义总是积极的，是统领一切的，无论是文字的注释还是人们口头所咏唱的，都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维特克的解释显得啰唆，倒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时的原始记录说得清楚[51]：

> 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江水也是蓝的，清清的江水。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1933年2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7月，当黄

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记录有：“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至10月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1937年9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1937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

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对笔者说[52]：“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竟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198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1933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不过，黄敬是在1937年9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11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10月。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出身书香门第，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1938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

据黄敬胞妹俞瑾告诉笔者[53]，黄敬与范瑾1939年在延安结婚，翌年生长子俞强声。后来，又生次子俞敏声，三子俞正声，长女（排行第四）俞慧声，小女（排行第五）俞慈声，共三子二女。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成为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江青离开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东郊桥儿沟。那里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中央党校的学员，一律都是中共党员。进入党校学习，意味着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月14日）50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党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董必武为校长。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5月，罗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这年11月，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

据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回忆：

> ……学员不再按原工作性质编班，也不再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
>
> 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党中央也在这里设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54]

江青被编在第十二班，亦即“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

中共中央党校设有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江青到了党校，很快成了活跃分子。俱乐部的主任是李剑白。当时，男“歌星”要算王任重，他唱《大刀进行曲》博得一阵阵喝彩；女“歌星”则是跟江青同班的许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泪下，由此得了个绰号叫“松花江上”。

生活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

江青毕竟是来自大上海的明星，能够不畏艰苦，投奔山沟沟里的延安，确实不容易。正因为这样，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为之感动。1938年8月2日，白求恩在加拿大报纸撰文介绍延安时，提到“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江青：“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文章最后问道，“她快乐吗？”白求恩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淘气”。

不过，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嗤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延安上空忽地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那时的延安，除了蒋介石飞机前来轰炸之外，难得听见飞机的引擎声。

那是一架苏式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山脚下简陋的机场上。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在那里迎候。

这架飞机是从莫斯科飞来的，途中曾在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加油。飞机是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

从飞机上下来三位要员，即王明、康生和陈云。

王明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了。他是在1931年10月18日和妻子孟庆树一起从上海坐船赴苏，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image]
▪ 康生是江青的同乡

康生比王明稍晚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陈云则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此时，和王明、康生同机回国。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的。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具体原因第一章已详加分析，此处不再赘言。

康生在17岁那年（1919年）在诸城和胶县陈家庄大户陈玉帧之女陈宣结婚，生一子一女。后来到上海，结识有夫之妇曹轶欧。康和曹，一个抛弃了妻子，一个抛弃了丈夫，结合在一起。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三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

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

李维汉这么回忆："我离开中央党校后，即由康生接任校长。一天夜里，他把我找去，说：'你应该办移交！'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来作校长，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现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长秘书罗青长手里，教务处是王学文管的，管财务的有五人小组，每月开支由小组审查签字，有问题再找我。康生没有纠缠，说：'不必另办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央党校最后的工作。以后听说，康生一进学校就宣布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江青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亮相于延安舞台

对于江青来说，1937年11月通过党籍审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顿时感到无比轻松。这表明，她在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组织上的承认，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对于江青来说，进入延安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亮相”，便是登台演出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

那是在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延安文艺界从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六七十位文艺人才，排练演出话剧《血祭上海》。

话剧《血祭上海》由任白戈编剧，朱光和左明担任导演。

话剧《血祭上海》在延安可谓“重磅出击”，演出阵营非常强大，几乎囊括了当时从上海、北平以及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文艺精英，主要演员有沙可夫、朱光、李伯钊、赵品三、徐以新、任白戈、左明、孙维世等。江青也是其中之一——她不再以在上海时的艺名“蓝苹”加入演出，而是使用江青这一新的名字。

《血祭上海》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海一个家财万贯的资本家与情妇不和，这个女人爱上了司机。那司机是一个爱国者。他把一车运给日本人的弹药开进了黄浦江，自己也牺牲了。江青扮演剧中的情妇—姨太太，16岁的孙维世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女儿—大小姐。

在《血祭上海》上演之后，江青也就被戏称为“二姨太”，而孙维世被称之为“大小姐”。

话剧《血祭上海》从1938年1月28日起，在延安公演20天[55]，观众上万人，用“轰动延安”来形容并不为过。随着这“轰动”，江青也在延安“轰动”起来。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观看了话剧《血祭上海》。毛泽东也看了《血祭上海》。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给予《血祭上海》以充分的肯定。

1938年2月21日，边区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简称）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血祭上海》一剧。到会的有二十余人，其中有周扬、艾思奇、沙可夫、吕骥等。有人对《血祭上海》提出批评。

周扬在座谈会上发言说[56]：“批评不能单凭印象，印象不常常靠得住。应该客观的从下面各方面来看才对：一、观众是否欢迎；二、是在

怎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三、一般的倾向是否现实的。根据这三个条件应该给予这剧以较高的评价。一、这剧获得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二、这剧是在极困难的技术条件下于短促的时间写成与演出的；三、一般的倾向是现实的，不管是否能好好地把握住现实，但正因为这戏已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赞贬，批评就应当严格一点，找出成功与失败的要素。这剧的缺点：一、‘一·二八’各界民众反日斗争，这个中心主题没有把握牢，没有正确地发展起来，恋爱的穿插占了主要的地位，使主题模糊和多少走入岔路了。带上半团圆主义和传奇性。人物没有活跃的个性，离典型也很远。脸谱主义是相当存在的。”

《血祭上海》座谈会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全体演出人员，江青也参加了宴会。那时候延安没有像样的饭店，宴会是在延安的机关合作社举行。

宴会之后，《血祭上海》剧组就要解散。在这充满惜别的宴会上，有人说，话剧《血祭上海》凝聚、汇集了延安的文艺人才，这个班子散掉很可惜，建议以这个班子为基础，在延安建立一所艺术学院。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于是，当场组成了艺术学院筹委会，开始酝酿筹办工作。

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经过讨论，这所艺术学院以鲁迅的名字命名，叫作鲁迅艺术学院。

就在宴会之后一周，由沙可夫主持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公布，发起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

《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指出[57]：

> 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
>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
> 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鲁艺教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的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曾于1938年2月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据当时曾与江青共事的钟华女士在1992年6月来信告知笔者：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原厅长徐特立调中央工作，新调来的厅长是陈正人。陈厅长到职不久，又来了一位女干部，即是由蓝苹改名的江青。她来后不久，就到延安县去视察教育工作。当时听说她是个老党员，她下乡时陈厅长还照顾她给个毛驴骑。回来后她向陈厅长汇报工作时，受到表扬。我当时也认为她这么个从大上海来的明星到延安后很快就下乡，是值得佩服的。因为当时延安乡下卫生条件很差，我下去时都发怵。这说明她刚到延安时还是可以的。没多久她被调走，调走的原因是延安准备成立平剧团，江青会演平剧（京剧）。

其实，江青被调走，是调到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作为话剧《血祭上海》主要演员之一，极想调往鲁迅艺术学院工作。

江青曾经这样谈及自己是如何进入鲁艺的：光有过去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经历是不够的。政治资格才是最重要的。当她在鲁艺的官员们面前陈述她的情况的时候，当时的组织部负责人、中央委员之一陈云会见了她。知道了他亲自负责录取工作时，她竭力地使他对自己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热诚产生深刻的印象；她不容他有戏剧是她的唯一兴趣这样的想法。她告诉陈云，她是带着行装来的，她是如此渴望进入鲁艺。她的表白必定使他确信了她愿意服从组织的决定，因为他直接录取了她。陈云实际上从不曾是她的戏迷。在他录取她进入鲁艺后不久，他去观看她的表演，然而他又对她所演的戏不感兴趣，使她很是失面子。

1938年3月14日，鲁迅艺术学院首届学员开始上课，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任命沙可夫为副院长，主持工作，院长人选暂时空缺。毛泽东出席了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并发表讲话。

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迅艺术学院，那是不确的。鲁迅艺术学院是在1938年4月10日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1939年8月3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指导员兼“网员”的双重身份

鲁迅艺术学院最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设文学系。各系除设置专业课外，以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为共同必修课。各专业的学制最初规定为六个月。

鲁迅艺术学院人才济济，有周扬、何其芳、沙汀、冼星海、华君武、王实味、周立波、严文井、陈荒煤、朱寨、孙犁、王朝闻、穆青、康濯、姚雪垠、冯牧、贺绿汀、刘炽……

江青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担任什么工作呢？当时的江青，可以说“高不攀，低不就”。让她当学员吧，她在上海就已经是明星，在中共中央党校当党员说得过去，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当学员显然把她看低了；然而，让江青担任教师却又显然不够格，她的学识肤浅，无法在戏剧系开课。

量才而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给江青安排的工作是“指导员”。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系主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指导员江青”。

其实指导员只是江青的公开身份。她的秘密身份是“网员”。所谓网员，也就是秘密情报员。

决定让江青担任网员，而且与江青保持单线联系的，是杜理卿。

杜理卿何许人也？

此人非同寻常，他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是资历颇深的中共党员。1923年，20岁的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到达陕北之后，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他改名杜智文，随周恩来到西安，出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的秘书长兼军警督察处三科上校科长。1937年5月，杜理卿被调回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副处长。1938年初，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同年，中央成立了中央保卫部，任部长。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派他到华北工作，化名许建国。此后一直用许建国这一化名，以至他在解放后被任命为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均称许建国。只有毛泽东见到他，仍喊杜理卿。

本书在介绍了他的身世之后，按照1939年3月之后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统一称之为许建国—虽说他在1938年与网员江青保持单线联系时名为杜理卿。

许建国选中江青担任网员，是出于这么几点：一是江青在1933年2月入党，在当时也算是有一定党龄的人；二是江青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三是江青在上海演过戏剧、电影，有着正儿八经的演员经历，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和防范；四是江青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能够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许建国给江青规定的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分子”。

许建国还规定，江青每周要向他当面汇报一次。

江青二话没说，接受了许建国交给的任务，表示一定会不折不扣地完成。在江青看来，能够担任网员，表明了党组织对她的信任。只有非常信得过的党员，才可能担任网员。

许建国还提醒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应当以灰色的面目出现，要低调，这样才能跟那些“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分子”接近，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就这样，江青在鲁迅艺术学院，明里是指导员，而暗地里是网员。

从“二姨太”到“大红鞋”

在鲁迅艺术学院，指导员其实是个闲职。江青这个指导员，严格地说只是女生指导员，工作很清闲。

至于网员这一任务，是属于“地下工作”，默默无闻的工作。

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张扬的。她不愿意清闲，更不愿意默默无闻。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江青所热心的是当演员，是演戏。

当时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还没有正式开学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就准备排演节目，在延安演出。有人提议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提议由江青演主角。可是江青不愿意演，说街头戏谁都可以演。

江青提出演一场京戏，以体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实力，因为演京剧要有一定的功底，会演话剧的人不一定会演京剧，所以当时延安的街头戏、扭秧歌、话剧之类有，而几乎没有演过京剧。江青说，可以演一出《苏三起解》。江青过去在山东学过平剧，亦即京剧。她演过京剧《苏三起解》。

在一个周末，《苏三起解》在延安上演。人们这么形容当时的江青：

> 一把京胡响起过门，“苏三”江青登台，轻盈、飘逸，一个亮相，大伙儿忍不住齐声喝彩“好！”
>
>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江青高声唱了起来，嗓音甜润，一招一式婀娜中透着潇洒，一阵阵掌声响起来。

江青在上海曾经演过话剧，这是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同事们都知道的，但是江青演京剧演得这么好，出乎他们的意料。

《血祭上海》的人马，聚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戏剧系以王震之为团长组建了实验剧团，既演话剧和歌剧，也演京剧和曲艺。江青成了实验剧团中的活跃分子。

实验剧团开始排演新戏《流寇队长》。

话剧《流寇队长》的编剧为王震之，全剧3幕，描写抗日战争初期某游击队队长袁占魁打着抗日的旗号，但不改旧军官的流寇意识，纵容部下到处抢掠，坑害人民群众，走上歧途，终被惩处的故事。剧本通过一支游击队的命运，揭示了流寇意识对部队的危害性，形象地说明了抗日游击队成长初期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性。

江青主动要求饰演《流寇队长》中的“大红鞋”一角。“大红鞋”是暗娼、破鞋、日本间谍姚二嫂的绰号。“大红鞋”借自己的姿色，勾引那个流寇队长。江青把风骚的“大红鞋”演得惟妙惟肖，以至人们对她的称号从“二姨太”改为“大红鞋”。

那时候，江青忙得很。她在参加排演话剧《流寇队长》的同时，又排演新编京剧《松花江上》[58]。在话剧《血祭上海》、《流寇队长》中，江青只是演配角，而在新编京剧《松花江上》中，江青是女主角。

在实验剧团中，既能演话剧又能演京剧的演员不多，而江青却兼跨这两个不同的剧种。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由于懂京剧的人不多，所以并没有设立京剧专业。美术系的学员阿甲倒是学过京剧，也加入了实验剧团。

新编京剧《松花江上》是由王震之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

《松花江上》反映东北松花江上一对渔民父女奋起抗日反汉奸的故事。剧中相当于《打渔杀家》中萧恩的赵瑞由阿甲扮演，相当于桂英的赵女由江青扮演，相当于李俊和倪荣的张恩和孔武分别由李纶和张东川扮演，相当于丁员外的汉奸团总由崔嵬扮演（后由张冶接替），相当于教师爷和丁郎的大小狗腿子分别由金仲明和成荫扮演。其中的崔嵬是江青在山东实验剧院时的同学，也是在那里学过京剧。

《松花江上》彩排那天，江青的老乡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康生说，正式演出的时候，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戏，江青听了非常高兴。

1938年7月7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大会。那天上午，延安各界群众冒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毛泽东作报告。

那天下午在延安南关街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老城府衙门旧址）举行文艺演出，其中有三幕歌剧《农村曲》、三幕话剧《流寇队长》，而压轴戏就是新编京剧《松花江上》。

果真康生请了毛泽东一起来看戏，坐在前排。毛泽东观看了《流寇队长》，给予此剧很高的评价，称赞此剧为抗日斗争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可以教育群众。

那天江青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她刚刚演完《流寇队长》中的“大红鞋”，又上台演《松花江上》的赵女。

在《松花江上》演出时，康生不断为江青鼓掌叫好。

演出结束之后，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经康生介绍，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江青。

毛泽东还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了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在当年的延安，没有电视，也几乎看不到电影，所以观看戏剧成了延安难得的文化享受。毛泽东从小就喜欢看戏，不论是在韶山冲跟随母亲，还是在湘乡唐家坨跟随外婆，毛泽东在山村的祠堂、寺庙里看过各种各样乡间小戏，养成了毛泽东对戏剧的浓厚兴趣。

毛泽东最喜欢的戏剧是京剧。在井冈山，有人把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上新词，演出新编京剧《毛泽东空山计》，表现毛泽东在反“围剿”中用“空城计”与国民党军队周旋的情景。毛泽东看了，非常喜欢，甚至学会了新编京剧《毛泽东空山计》中的唱词。在空闲时，毛泽东会哼了起来：

我正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定，
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我是内无有埋伏外无有兵，
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
来、来、来……
请上井冈山来谈谈革命。

毛泽东爱看戏，江青爱演戏。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江青在钓鱼台宾馆看电影时，得意地对秘书说：“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

就在江青热衷于演戏的时候，却受到了尖锐、严厉的批评！

这批评来自许建国。许建国要求江青作为网员，必须灰色，必须低调，可是江青却成了鲁迅艺术院的活跃分子。最使许建国不满的是，由于江青忙于演戏，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按照规定，江青必须每周向许建国汇报一次，可是到了汇报的时候，江青却说不出什么。

许建国对江青说，你老是爱出风头，怎么能够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呢？

江青多次向许建国检讨，却依然故我。她从此对许建国产生抵触以至反感的情绪。

江青初识毛泽东

江青曾经对张颖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即使一个人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英雄，也要嫁给一个英雄。”

江青也曾对郁风说过类似的话：“英雄创造历史，我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身伴侣。”

江青还有一句“名言”：“不要忘记，美丽不如权力重要。”

关于江青如何结识毛泽东，曾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

传说之一，是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

这一传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徐明清不是跟江青一起进入延安，而是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来月才到那里，不可能在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去见毛泽东。

另外，笔者在采访徐明清时，她说她没有带江青去见过毛泽东。虽说王观澜跟毛泽东颇熟，去见毛泽东时不可能随便带一个陌生人同去。

传说之二，是上海《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的《萧桂英进宫》[59]一文：

> 我有一位朋友，是中共的老党员，抗战初期就在陕北打游击。他说，他在延安住过的那段时间，曾有幸看过那位过气影星的京戏，演的是《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萧恩的是解放后主持戏改工作的阿甲（十年动乱中大受批斗，可能这也是“罪状”之一）。据说这两个人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
> 据说，也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出戏，她跳进龙门，受了特达之知。据说“明皇”那天也去参加晚会，看了这出戏大为激赏，很鼓了几记巴掌，这就使台上的桂英大为感动，大受鼓舞。她灵机一动，第二天即去找那位“李莲英”，说是自己对文艺问题，有些心得，想当面求教于“导师”；“李莲英”也看到这是他讨好固宠的好机会，三方心里相投，一拍即合。从此，就“一朝进入深宫（其实是窑洞）里……”

不言而喻，徐铸成所说的“过气影星”，就是江青。“李莲英”，则指康生。

跟江青同台演出的阿甲，本名符律衡，江苏武进县埠头镇人氏。他自幼酷爱京剧，亦喜绘画、书法，教过书，做过工，当过编辑。1938年

初，从山西临汾进入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不久，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平剧研究团团长，和江青同台演《打渔杀家》。据云，演出时康生为江青敲边鼓。

《打渔杀家》是一出有名的“水浒戏”，是京剧传统剧目之一。《打渔杀家》说的是梁山好汉阮小七在梁山水泊失败之后，化名萧恩，隐迹江湖，重操旧业，与女儿桂英打鱼为生。他本想平安度日，却因恶霸丁员外勾结贪官吕子秋一再勒索渔税、欺压渔民，实在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痛打教师爷，杀死丁员外，远走他乡。这样的反抗官府的戏，当然在延安很受欢迎。江青早年在山东实验剧院就演过《打渔杀家》，所以驾轻就熟，在延安稍加排练，就能上台。

此外，也有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陈绍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被糟踏了的人》。

陈绍禹即王明，是1937年11月29日飞回延安的，欢迎晚会当然也就在此后数日。然而，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是由崔嵬编导的，他在1938年春才进入延安，不大可能在欢迎王明的晚会上演出《被糟踏了的人》。

崔嵬也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同乡，而且又同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同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他进入延安后，参加了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成为中共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首任院长为毛泽东，后来由吴玉章、周扬担任院长。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踏了的人》，由江青演女主角。崔嵬在1938年7月加入中共。

还有一种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看江青主演的话剧《锁在柜子里》时，注意起江青。

又据当年在延安、曾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60]，1938年8月13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本书作者查考延安资料，查出“七七”一周年大会，鲁艺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主演为丁里；然后演三幕话剧《流寇队长》。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

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曾在“文革”中当过江青护士的周淑英回忆说[61]，江青曾对她说，她在延安演戏时，主席曾到后台看她，见她衣服穿得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不过，遗憾的是，江青没有对周淑英说及，当时毛泽东来看她演出的什么戏。

至于传说之三，那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香港星辰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了珠珊著《江青秘传》。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珠珊[62]，即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据朱仲丽告诉笔者，“珠”即“王”、“朱”也，由王稼祥和她的姓组成；“珊”也是“王”字旁，“册”乃两人之书也。《江青秘传》中这么写及毛、江初识：

> 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地方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许多平房；最近又添建了新屋和新窑。学员们全是中共党员，来自国民党地区、各个根据地和各方面军。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
>
>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
>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
>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
>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
>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
>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三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

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1933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1937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来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笔者注意到曾任毛泽东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63]，他以亲历者、目击者的身份，非常具体又细致地记述了江青初识毛泽东的经过：

1939年2月，当我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贺子珍已经走了一年多，还没有回来。然而，就在这时候江青出现了。

1939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党校，由吴玉章老人任校长。毛

泽东曾与吴老商量过，校址设在桥儿沟，这里有些房子和窑洞，又有一座天主教堂，可作大教室和会场。准备工作就绪后，学校要举行开学典礼，吴老邀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欣然答应了。

开学那天，吴老身体欠佳没能去，周扬和另一位副校长来杨家岭接毛泽东。我和李德山陪同前往。

下午一时左右，我们来到了会场。会场设在天主教堂，比较简陋，没有桌椅，只有作为主席台的前面放一个长条木桌，桌子后面有七八个小木方凳。六七十名学员席地而坐，大家已端端正正地坐好。

周扬和副校长陪着毛泽东进来时，学员们起立，热烈鼓掌。毛泽东向学员们摆手示意，让大家坐下，然后坐到桌子后面中间的方凳上。周扬坐在毛泽东左边，副校长坐在毛泽东右边；我坐在周扬旁边，李德山坐在副校长旁边。

大会开始了。按会议程序，毛泽东作报告。精彩的报告不时地被学员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毛泽东讲话时，我发现最前排有一位装束特殊的年轻漂亮的女同志。她头上戴着毛泽东到陕北时戴的那种八角帽，帽子戴得往后，帽子下是乌黑浓密的头发；身上穿着上海阴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用布条打的草鞋，上面有朵大红缨；娇美的脸上涂了一层薄粉和胭脂，手里拿着一个小红笔记本。她一会儿抬起头，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毛泽东，像在领会报告的内容；一会儿又低下头，在笔记本上记着。看样子，她听得聚精会神。

会场里六七十名学员，女学员还不到三分之一，她在这些朴实的学员中很显眼，她是谁呢？

在学员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毛泽东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结束了。

为了庆祝开学，散会后，学校准备会餐。教堂里摆上几张桌子，刚才的会场变成了餐厅。学员们十来个人围一桌，站着兴致勃勃地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

毛泽东被学校领导热情地挽留住，与学员们一起会餐。这是一张大圆桌，周扬和副校长分别陪坐在毛泽东身边，我、李德山和司机老梁也坐在这张桌子上。

周扬和副校长为毛泽东斟了满满一杯酒，刚要端起敬给毛泽东时，那位装束特殊的女青年已端着一杯酒轻盈地来到桌前，声音又娇又脆地说："主席，您好，您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您一杯酒。"说完，她把酒送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接过酒，有礼貌地道一声谢。她见毛泽东没说什么，便微笑着转身离去。

她回到饭桌后，同桌的人让她代表大家给毛泽东敬酒。这样，她第二次来到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您的，您一定得喝呀！"

"谢谢大家！"毛泽东稳重地接过酒，表情依旧。

待她走后，毛泽东问周扬："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名字，她从哪里来的？"

周扬回答：“她叫蓝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哦。”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一面与周扬饮酒，一面打听这些学员的情况，都来自何方。然后，他们又畅谈党校的建设和发展的远景，谈兴很浓。

学员们见蓝苹很活跃，因此，这个桌选她当代表，那个桌也让她给毛泽东敬酒，她又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微笑着问她：“蓝苹，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主席，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后，鼓励她好好锻炼。

会餐结束了，周扬和副校长陪着毛泽东来到了办公室，畅谈半个多小时后，又将毛泽东送出屋。正在我们准备回去时，忽见蓝苹从侧面的屋子奔出来，急步走到毛泽东面前，认真地说：“主席，您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新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主席给解答。”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教员研究，也可以去找校部和校长。”

“那还解决不了呢？”蓝苹偏着头，做出天真的样子。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的嘛。”随后，毛泽东上了车。

说者无意，听者留心。蓝苹果真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请教”来了。

4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收发室的同志送来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中央党校学员蓝苹要见毛主席”。我一看就知道是那个上海演员，把条子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让她先等一会儿吧。”

过了一会儿，蓝苹来了，还是穿着开学典礼时的那套衣服，外面披一件咖啡色的风衣。

……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毛泽东通知公务员，让我把蓝苹领去。进屋后，我发现屋子虽然收拾得比较利索，但是桌子上已经空空如也，文件全部收到了后面，而且用报纸盖上。这和党内其他干部来是不一样的。

蓝苹在毛泽东屋内大约呆了两个多小时，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谢谢您，蒋参谋，再见！”说完，她又向收发室走去，向那里的同志打了声招呼，然后姗姗离去。

下一个周日，蓝苹又来了，在毛泽东那儿呆了一段时间离去。她以后就经常不断地来，大部分时间在周日。

蓝苹比较聪明，也很有社会经验。这时期，她对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乃至公务员的态度都是和蔼的，先笑后说话，给我们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这样，她与我们很快熟悉了，从中了解了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规律。她有时来并不说找主席，而是到警卫排或收发室那儿看看，然后去毛泽东那里。

在蓝苹精心安排下，由桥儿沟党校到杨家岭毛泽东窑洞的这条道路打通了。她来的次数越来越多，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在这里吃完晚饭才走。

蓝苹与毛泽东谈恋爱了。

……

这时的蓝苹很会体贴人。她每次到毛泽东这里来，一面与毛泽东说着话，一面手脚勤快地收拾屋子，一会儿就把屋子收拾得利利索索。她反应快，又善解人意。当毛泽东要吸烟时，她立即把烟拿来，放在毛泽东手里，而且亲自点燃。当毛泽东要看书时，她马上把书取来，翻到毛泽东要看的那部分。她发现茶水凉了，轻轻地换上热的，把茶杯放到伸手可取的位置，而且杯正对着手的方向，拿起来非常方便。吃饭前，她主动拿来毛巾，含情脉脉地帮助毛泽东擦擦脸和手。

恋爱初期蓝苹学会了骑马。

桥儿沟离杨家岭不算近，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而且中间要经过空旷的飞机场。

晚上，蓝苹离开杨家岭时，为了安全，毛泽东让警卫战士送她。她不会骑马，也不敢骑马，警卫战士就从马厩里选出一匹最老实的马，让她骑上，战士在前边牵着马缰绳走，把她送到桥儿沟后，战士再把马骑回来。

这样，时间不长，蓝苹不仅敢骑马了，而且学会了骑马，只是晚上由杨家岭回桥儿沟时骑，平时不骑。为了安全，我们嘱咐护送她的战士，转告蓝苹，绝不能跑马，要慢走，速度与步行差不多。

光阴似箭，从春到秋半年时间过去了。1939年秋季，传出蓝苹要和毛泽东结婚的消息，中央政治局有些领导不同意，说蓝苹在上海的一段历史不清楚，应当查清，没有问题再结婚。

这时，蓝苹与毛泽东吵了一架。

蒋泽民的回忆如此详尽、生动，但是违反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毛泽东与江青在1938年11月就已经结婚。这一结婚时间，见诸权威性的著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年谱》中册第97页。

如果说是蒋泽民对于时间的记忆有误，把1938年误记为1939年，然而，他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期是不可能记错的—他是在1939年2月才来到毛泽东身边，他的目击、他的亲历，当然是发生在1939年2月之后。因此，他的这一段回忆不存在对于时间记忆上的错误。

至于他的回忆在时间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错和矛盾，不得而知。

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比如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在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以朱仲丽的说法比较准确，即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初见毛泽东的时候，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1997年10月，笔者在湖南召开的传记文学研究会上，结识从北京来的王凡先生。他赠笔者新出的《知情者说》第二册，内中根据他对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的采访，对笔者的《江青传》作了补充。

王凡先生在书中写道：

> （1937年）8月20日，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叶子龙独自散步，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两位女性。
>
> 萧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
>
>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
>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
>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夫人的姐姐。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
>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萧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
>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丽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王凡先生记述的叶子龙的回忆和朱仲丽的这一描述，为江青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说法。

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叶子龙回忆录》，更加清楚地叙述了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形[64]：

> 1937年8月下旬，中央洛川会议结束当天的傍晚，我正在院子外边散步。这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萧也是湖南人，比我年长十几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熟悉，别看他30多岁，但他已是个久经沙场

的红军将领了。萧劲光看见我，紧走了几步，拉着我的手指着那位青年女子说："子龙，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叫李云鹤，艺名叫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我与她们握了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李云鹤微笑着对我说："萧司令只说对了一半，我是从山东来的，而且早就是党员了。"

朱仲芷接过话头："叶科长，我们请你吃西瓜好不好？"

萧劲光马上说："对，吃西瓜去！"

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我与毛泽东坐一辆卡车，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我和一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坐在车厢里。李云鹤（不久后改名江青）也和我们坐一辆车，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坐在车厢的前边。

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她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

这是毛泽东与江青第一次见面。

以上种种传说，都是他人之说。江青本人是怎么说的呢？

江青的说法有点离谱，说是毛泽东主动给她送了马列主义学院举办的讲座的入场券！

维特克是这样记述江青的回忆的：

谈到江青的延安时代，很自然地，外国记者想知道她是怎么遇见毛的，又是怎么进入毛的私生活的。对此她没有回答，但是在那张众人熟知的面孔上，显然闪现着浪漫思绪的光彩。

还在上海时她就听到过关于红军神奇领袖毛泽东和他的著名搭档朱德的许多传言。零星的新闻报道及穿梭于红区与白区的旅人所描述的毛的形象，既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也是一个用现代军事意识武装起来的人民的保护神。对毛的外貌她只略知一二，对毛的个性，她则是一无所知。同许多其他新来者一样，江青也深深地为领导同志中间个性与地位的差别所吸引，并且她也逐渐地意识到了毛的高踞奥林匹斯山之巅的清冷的光辉，一些人私下里把毛比作了宙斯神。但在她到延安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的生活主要是受那些掌管着延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机构的领导人的左右的。

然而在她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知道了她叫蓝苹，是位女演员。对此她又是如何说的呢？毛找到她，给了她一张他将在马列主义学院举办的讲座的入场券。她吓了一跳，谢绝了，然后又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羞赧，接受了这张票，并且前去聆听他的讲座。

他们约会往来的方式对领导层来说是不显眼的，你很难把他们的交往同群众场面区分开来。她不想让事情公开，传统的观念与革命的条规都不允许她公开她与毛恋爱与婚姻的细节。

值得提到的是，《张国焘回忆录》中写及一个细节，他在延安时，曾在毛泽东处看过蓝苹的电影《王老五》、《琅崖碟血记》[65]（具体

名字记不清了），是毛泽东从什么地方搞的拷贝。

张国焘是在1938年3月离开延安的，那么看电影必然是在此之前。可见，1938年3月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看过江青的电影，知道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

走笔至此，该写一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17岁—1910年中秋时节，出生在江西井冈山之侧的永新县城。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她的奶名叫“桂圆”。父亲贺焕文曾花钱捐了个举人，当过江西省安福县县长。

贺焕文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之后，贺焕文娶广东梅县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氏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1926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受哥哥贺敏学影响，贺桂圆、贺银圆也分别在1926、1927年加入中共。

贺桂圆自取了“自珍”之名，意即“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为“子珍”，也就用“贺子珍”为名。贺银圆改名“贺怡”。

贺子珍在1927年3月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调往江西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这年8月，她随哥哥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一起上了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在会见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首脑们时，惊讶地发现，内中居然有一位瓜子脸、大眼睛、挎着盒子枪的17岁姑娘—贺子珍！

在共同的战斗中，毛泽东跟这位俊俏的江西姑娘产生了爱情。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回忆：“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1928年4、5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66]

[image]

■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

此后，贺子珍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嫁给了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贺怡最初在1929年5月和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翌年8月解除婚姻关系。1931年7月20日和毛泽覃结婚，当时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工作。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1929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当时战争正忙，出生不久，只得寄养在龙岩一户老百姓家中，给了十五枚银元作抚养费。后来，贺子珍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龙岩寻访，据告，孩子已不在人世。贺子珍得知，泪流满面。

第二个是儿子，1932年11月出生于福建长汀，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贺子珍把毛毛交给毛泽覃、贺怡夫妇，因为他俩当时被留在江西。毛泽覃把毛毛寄养在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后来，毛泽覃在1935年4月阵亡，毛毛亦不知下落。

第三个孩子也是儿子。1933年早产，由傅连璋接生。这孩子没有成活。

第四个是个女儿。1935年在长征途中生于贵州，生下后就送给当地老乡，以四枚银元为抚养费。后来渺无音讯，不知是否成活。

第五个也是女儿。1936年冬出生于陕北保安，是唯一成活的孩子。孩子小名“娇娇”。那是因为她出生时又瘦又小，邓颖超抱着她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也就称她为娇娇。1948年，当她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

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贺子珍希望不要再生孩子，希望参加工作、学习。娇娇才四个月，就被托养在老乡家去。贺子珍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期待着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她在抗大过着集体生活。

这时的贺子珍，显得精神振奋，心境愉悦。

但一场意外的打击朝她袭来：她在长征中生孩子，失血太多，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从此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回，她晕倒在抗大的厕所里，不得不被送回家中。

回家休养后，发生了令她不快的事：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自1937年初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史沫特莱带来一位女翻译，名叫吴莉莉。采访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引起贺子珍的误会，对那位女翻译十分不满。

风姿绰约的才女吴莉莉

吴莉莉，本名吴宣晨，又名吴广惠、又叫吴光伟。她的英文名字为Lily Wu，被译为“吴莉莉”或“吴丽丽”。通常，大家都喊她吴莉莉。

吴莉莉生于1911年，比贺子珍小2岁，比江青大3岁。

吴莉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在2岁时随父母迁居北平。父亲在北平担任盐务局局长。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吴莉莉在北京的教会小学、中学上学，然后到上海一所商学院学习英语，再从上海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这样，她能讲流利英语。

吴莉莉漂亮而活跃，喜欢戏剧。她在排演歌剧《茶花女》时，结识在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的张砚田，陷入热恋，并于1934年3月1日结婚。婚后不久，1934年8月，张砚田考取日本帝国大学，前往日本留学。吴莉莉毕业后，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然后也去日本。

1935年10月，吴莉莉考取国立南京戏剧学校。1936年初，南京戏剧学校排演俄罗斯文豪果戈理的名作《钦差大臣》，吴莉莉扮演市长夫人，非常成功。但她的思想左倾，不愿在首都南京演戏“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毅然离开南京，回到北平。

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影响，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1936年夏，吴莉莉与从日本回国的丈夫张砚田从北平前往西安。张砚田在杨虎城将军手下当参议，吴莉莉在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从事妇女运动。

她的友人朱汉生曾经这样描绘当时的吴莉莉风貌：“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砚田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著名的西安事变。张砚田倾向于国民党，而吴莉莉倾向于中共，两人由于政治见解不同而协议分手。吴莉莉曾经这样写及她当时的生活：“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中共中央是在1937年1月13日随红军总部从保安进驻延安。

[image]

■ 吴莉莉（右一）与毛泽东（左一）、朱德（右二）在一起

[image]

■ 吴莉莉（左一）与史沫特莱（右一）等在一起

就在吴莉莉来到延安不久，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考虑到吴莉莉精通英语，受命出任厄尔·利夫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这样，吴莉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富有幽默感而且思想深邃，给吴莉莉留下深刻的印象。

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吴莉莉又成了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当时，史沫特莱多次采访毛泽东与朱德，使吴莉莉再度有机会接近中共领袖。

史沫特莱曾在她关于朱德的长篇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序曲》中，这样写及吴莉莉："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吴莉莉与史沫特莱形影不离。史沫特莱穿羊皮大衣，戴貂皮帽子，着高筒马靴，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的女干部之中显得非常突出。

吴莉莉也很突出。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还涂着浓艳的口红。

这么两个浪漫打扮的女性出现在延安街头，"回头率"极高。

吴莉莉当时还是延安活跃的、光彩照人的演员。她虽然在延安前后只半年时间，却多次踏上延安的舞台：她曾经在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她最为轰动延安的是，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演出的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剧《母亲》中出任女主角。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

海伦·斯诺由翻译王福时先生陪同，在1937年4月21日一起从北平乘火车前往郑州，从那里转往西安。笔者在旧金山采访王福时先生时[67]，他回忆说，黄敬也乘这趟车，在不同的车厢里，而且装成与他们不相识。他们从西安来到延安。

海伦·斯诺在延安惊讶于吴莉莉高贵优雅、多才多艺。海伦·斯诺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

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吴莉莉风波”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那是东邻延安城墙的一家地主的院落。后来，史沫特莱迁往凤凰山东麓一排五孔的窑洞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毛泽东与贺子珍也住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离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窑洞很近。由于史沫特莱采访毛泽东，而吴莉莉居中翻译，因此吴莉莉跟毛泽东有了许多接触，毛泽东也经常到史沫特莱、吴莉莉的窑洞里去。

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经这么写及：“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珍妮斯·麦金龙、斯蒂芬·麦金龙所著的《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则根据史沫特莱的记录这么写及：“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她（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正是吴莉莉“唤醒了”毛泽东的“青春幻想”，所以毛泽东对吴莉莉充满特殊的好感。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继续写道：“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

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因为吴莉莉在离开延安时含泪烧毁了毛泽东的诗稿。

吴莉莉也能写诗。她以毛泽东写给她的诗的韵脚所和的诗，也没有流传下来，同样因为吴莉莉在离开延安时含泪烧毁了她写给毛泽东的诗稿。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披露："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这表明，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诗，不止一首。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细节：其一，在毛泽东一生中，只为杨开慧、丁玲、吴莉莉、江青四位女性写过诗词；其二，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37年写给吴莉莉的诗词之后，再也没有诗兴，中断了六年之久，直到1943年为悼念国民党军抗战殉难烈士戴安澜做了一首诗。

海伦·斯诺在她的《延安采访录》一书中，有一节《同毛泽东共进晚餐》，内中写及"莉莉"，即吴莉莉：

> 今天是（1937年）5月31日。我在门外的小炉子上烤了两块白薯，要了两筒菠萝罐头。翻译莉莉小姐炒了辣椒和鸡蛋。史沫特莱还在餐厅要了白菜汤。除了小烧饼外，还有大锅饼。
>
> 傍晚，景色非常美丽，就像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的油画，是那样的清晰，那样蔚蓝。毛泽东看着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给她的花浇水，并闻了闻两盆玫瑰花。他问我，美国人最喜欢栽种的是什么花。我说是玫瑰。
>
> 两只小狗不见了。史沫特莱的卫兵和另一个卫兵打起架来，那个卫兵打过他的狗。他经常打架（指的是她的小鬼）。她的特务员患过肺炎，身体很虚弱。她想给他一些牛奶和可可粉，可是他不要。她那位新来的特务员看起来像J. E. 布朗。我问他是不是爱尔兰人，他说："不，是陕北人。"他干活很利索，脸上有一对酒窝，总是挂着微笑。
>
> 连队住的山坡下有一个广场，操练拼刺的喊杀声响彻整个山谷。"那是回声，"艾格妮丝说，"你站在山顶上可以听见毛泽东演讲。"他们唱《狄克西兰》，一直唱了半个小时。我想给他们教教《斯特恩之歌》，莉莉会这首歌。我们经常在一起唱许多古老的歌曲。
>
> 毛泽东躺在炕上，枕着史沫特莱的铺盖卷（吉姆·贝特兰曾经使用过。我把吉姆给我的那件红衬衣送给了王汝梅）。饭菜弄好后，我们喝了白干。莉莉喝得太多了。毛泽东说，他也喝得太多了。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显得并不陌生。史沫特莱一直在咳嗽，可她不想去治疗。她屋里经常备有优质红茶，是利普顿牌的。
>
> ……
>
> 艾格妮斯经常用扑克牌玩单人纸牌游戏、算命，非常有趣。除

了丁玲外，我们在延安找不出一个“危险的”妇女可以同莉莉相匹敌，丁玲可算一个，不过她现在也太胖了（原注：莉莉是个女演员，留着长长的卷发，非常漂亮。她最近刚到延安，当英语翻译。我写了她的生平）。艾格妮斯和我假装争夺徐海东，把毛泽东逗乐了。[68]

在海伦·斯诺笔下，“整个晚上，他同莉莉拉着手，她依在他的膝上”，表明毛泽东与吴莉莉的关系非同一般。

终于，贺子珍忍无可忍，爆发了“吴莉莉风波”。

史沫特莱曾经把“吴莉莉风波”告诉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史沫特莱去世后，在日文版《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讲述了这一风波。斯诺先是写及贺子珍与史沫特莱之间产生的矛盾：

> 延安的妇女们开始注意到男人中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她们怀疑史沫特莱是主要祸根。比如，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用那么多时间同她们的丈夫在她窑洞里谈话实在是怪事。……
>
> 正是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两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
>
> 史沫特莱有个习惯，常讽刺年轻的共产党官员们怕老婆。她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从妇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解放全中国……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
> ……
>
>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还写道：“我还没有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可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69]

史沫特莱在延安首倡舞会。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及：“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毛泽东对于跳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毛泽东说，“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

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位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70]

斯诺在日文版《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写及了吴莉莉其人：

> 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她也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她的特长是扮演西方戏剧中的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
> 史沫特莱与大多数领袖谈话都是吴做翻译。史沫特莱和她是女搭档，亲密朋友。通常当高级领导人不带妻子去拜访吴时，史沫特莱就充当吴的女伴。
>
> 红军正在享受几个月战争间歇的和平。春意融融，嫩禾染绿了红色的土地，海棠花竞相开放。终于摆脱了连年战争的毛泽东，阅读大量书籍，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诗以指导吴莉莉。太阳一落山，毛在开始工作前，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毛和史同年，他详细询问了她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
>
> 史沫特莱谈到了她和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两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
>
> 史沫特莱后来对我（指斯诺）说：“他（毛泽东）孩子般的好奇使我惊讶。”还有，“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吴莉莉好像在他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热望。她（吴莉莉）总是在毛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而我们可以假定毛向史提出的某些问题是直接对着吴莉莉的。吴莉莉是那么生气勃勃、敏感、优雅，每当史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是说给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莉莉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莉莉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的诗篇。[71]

斯诺在日文版《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详细写及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甚至发展到打了吴莉莉，发生了“吴莉莉风波”：

有一个夜晚，史已经睡下，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到敲门声，门打开又关上。她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你想欺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

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自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作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情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莉莉。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贺骂道："舞厅的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莉莉的头上流了下来，吴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毛的妻子又转向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家里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么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

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力，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不甘罢休，不肯起来，毛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离开了。他们下山时，毛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72]

王行娟在她所著《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一书中，这么写及这场风波：

在史沫特莱和女翻译（即吴莉莉—引者注）来到延安之后，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毛泽东是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觉得同史沫特莱和女翻译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就多了些。

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多事的人把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传到贺子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给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有些看不习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去。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以后回家，经过一个窑洞，发现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她料到毛泽东就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走。毛

泽东果然在里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译。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们三人谈兴正浓，神采飞扬。

贺子珍一见到这般情形，曾听到过的传言顿时涌上心头，脸色阴沉下来。

屋里本来热闹的气氛霎时消失，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极尴尬的局面。那位活泼的女翻译想打破沉寂，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贺子珍想摆脱对方的拉扯，但摆脱不开，不由得使了点劲，嘴上还说："你少来这套！"她最后那一下子，力度大了点，不仅把女翻译的手甩开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稳，几乎摔倒。于是这位女士叫嚷了起来，连哭带闹的。

不知她叫嚷时用的是什么语种，也不记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其结果是那位女洋人出来打抱不平，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气势汹汹地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他应该去拉那两只要打人的手，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血，黑了一圈。

正当她要挥出第二只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又对那位洋人说："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说完，他把贺子珍带走了。

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每当人们问她你的眼睛怎么样啦，她都不愿说出真情，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

贺子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说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子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73]

关于"吴莉莉风波"，与史沫特莱、吴莉莉相邻而居的李德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1932—1939）》[74]中也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1937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1958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

> 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1937年至1938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也写及吴莉莉（吴丽丽）引出的风波：

> 在1968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丽丽这个人。她是位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并且无疑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三十年代后期吴丽丽作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延安。后者是一位记者，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吴丽丽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分，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都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带来的）。1937年5月毛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丽丽、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吴丽丽崇拜毛。当他们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
>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要比斯诺夫人看到的要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她正式指控吴丽丽使她丈夫移情别恋。毛否认了这一指控。据斯诺的说法，其结果便是吴被流放出延安。
>
> 难道被放逐的吴丽丽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尽管江青没有专门指明她与毛交往的时间，但毛的对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1938年早春杨从上海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她被安排和贺子珍住在一个房间。一脸病容的贺向她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子烈问她为什么不在延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一起。贺说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泽东对我不好”，她解释说，“我们总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摔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吴莉莉风波”引出严重的后果。珍妮斯·麦金龙、斯蒂芬·麦金龙所著的《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这么写及：

> 翌日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不得不重视它，他召开了中央会议，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听凭中央作最后裁决。会议决定将此事当作“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夫人，她召集了许多延安夫人，以求得她们的支持，还要把史沫特莱和吴丽丽驱逐出延安。事情在闹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后，毛找到史沫特莱，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令人不愉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
>
> 毛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

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丽丽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她决定离开延安。

史沫特莱所说的“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似乎是不确切的。贺子珍离开延安时，并没有与毛泽东离婚。

不过，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引用斯诺的著作，有类似的说法：

> 她（指贺子珍—引者注）正式指控吴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别恋。毛否认了这一指控。据斯诺的说法，离婚因而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维特克称吴莉莉是“江青的先锋官”，意即为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铺平了道路。

史沫特莱在即将离开延安时，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起，告别了延安。

“吴莉莉风波”的后果是导致三个女人离开延安：

1937年8月底，吴莉莉离开延安，去了西安；

1937年8月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后来辗转去了莫斯科；

1937年9月初，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去了北平。

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时候，1937年8月底，一个比贺子珍、吴莉莉更加年轻的女性进入延安，进入感情蒙受打击而处于郁闷、孤独的毛泽东的世界。她就是改名江青的上海影剧演员蓝苹。

那三个女人的离开延安，并非江青引起，与江青无关。然而那三个女人的离开延安，却给江青创造了难得的“真空”。

海伦·斯诺曾经这样评论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喜欢女人的男人，但不是普通的女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气氛，他欣赏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忠贞。他不畏惧有独立头脑的人，不拒绝口红和卷发。”

正因为这样，当“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忠贞的吴莉莉之后，另一个“美丽、漂亮和才智”以及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忠

贞的江青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理所当然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难怪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贺子珍、吴莉莉和江青："贺子珍的争强好胜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她是悲哀的；吴莉莉曾经与毛泽东是那么接近，但她的命运不济，她是可怜的；江青是幸运的，吴莉莉为她创造了机会，江青也把握了机会，终于与毛泽东白头偕老。"

顺便提一下，几年之后，当曾志（当时任中央妇委秘书长，陶铸夫人）从广东来到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贺子珍，毛泽东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75]

不言而喻，毛泽东在跟曾志谈话时，略去了"吴莉莉风波"。

据说，吴莉莉是"被礼送"离开延安的。毛泽东在与吴莉莉离别时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

又据称，"吴莉莉风波"使吴莉莉引起中共情报部门的注意，怀疑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其实是子虚乌有），强制她离开延安，不让她再与毛泽东见面。

就在吴莉莉被中共情报部门怀疑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时，她一到西安，却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货真价实的"共谍"，把她逮捕。

这时，曾经与吴莉莉协议离婚的张砚田正在西安担任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从狱中救了出来，复婚。

吴莉莉与张砚田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张小芒，女儿叫张小菲。

然而，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据香港媒体报道[76]：

> 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
>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是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缎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又据称，吴莉莉与张砚田感情不好。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砚田在外面与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1949年，张砚田一家在成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率领下，东西夹击，合围成都。张砚田带着两个孩子乘飞机前往台湾，而吴莉莉坚持要留在成都，拒绝同行，躲到好友雷锦章家。

据朱汉生称，张砚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

张砚田在台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还曾担任“经济部政务次长”，著有《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等书。1986年病逝于台湾。

吴莉莉则在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1975年病逝于台湾，终年64岁。儿子张小芒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则移民美国，成为经营中药材的富商。

张砚田在与吴莉莉结婚之前，曾经在13岁时与一位年长他4岁的女子结婚，育有一子，名叫张依群。张依群在中国大陆长大。据张依群在《我的父亲张砚田》一文中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他有这样一位父亲，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备受煎熬。“文革”之后他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担任了河北省乐亭县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他还担任电力部的攻关课题组主持人，获得过电力科学研究院的技术进步一等奖。

据朱汉生称[77]，吴莉莉离开成都时，有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存放在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家。其中装着毛泽东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诗词和一本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毛泽东在《聊斋志异》上写着“润之赠吴莉莉”。成都解放之后，中共有关部门派人到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家，把毛泽东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他们：“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朱汉生说，雷锦章喜爱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可惜在“文革”中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以及书信抄件不知去向。

在笔者看来，由于吴莉莉有相当好的文学修养，毛泽东赠线装书《聊斋志异》给吴莉莉是可信的。毛泽东曾经写诗给吴莉莉，也可以从史沫特莱的著作中得到佐证，但是毛泽东写给吴莉莉的信有四十多封之多，恐怕系讹传。

史沫特莱称，毛泽东与吴莉莉的交往，仅限于精神层面。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对于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而言，吴莉莉只是一颗匆匆而过的流星。然而毛泽东却深深烙在吴莉莉的心中，成为影响她一生的一颗恒星。

贺子珍后悔终生

对于“吴莉莉风波”，后来贺子珍在向王行娟回忆往事时，并不否认：

> “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大姐（指贺子珍—引者注）谈到这里时很激动，说道：“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
>
> 她提起这段“公案”，使我想起了人家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于是问道：“大姐，说有一回你看见主席和一个外国女记者谈话，上去就给那个女记者一个耳光，是这样的吗？”
>
> 她笑了笑，未置可否，又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此后，便是日日夜夜、无止无休的思念，以及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失望的梦幻了。

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作为第三者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尽管江青在上海干过第三者拆散别人家庭的事，而贺子珍去西安，却跟江青毫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

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1937年9、10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1937年9、10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1938年5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1937年10月。

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从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所以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张闻天夫人刘英，当年曾与贺子珍一起去苏联。刘英这么回忆：

> 我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1937年11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
>
>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打通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交通线，有条件把我们这些病号、伤号送到苏联去治疗。我们这一行中，蔡树藩打仗时被炮弹片削掉了右胳膊；徐梦秋冻坏双腿截肢；钟赤兵在长征中右腿负伤锯了。他们都要到苏联去配假胳膊、假腿。我在长征中犯下了肠胃病。这时又染上了肺结核，延安没有

药治，送到苏联去。

我们一行到兰州时，遇上王明回国，斯大林派专机送他们，也到了兰州。王明架子大，要陈云同志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电报同延安联系飞机着陆等事，顺便看望我们，送我们一百美元改善生活。我们交给了办事处主任谢老（觉哉）。

在兰州，我们乘上运军火的飞机到迪化。这时，邓发已从苏联回国，担任迪化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从他那里知道，苏联1937年起肃反搞得很厉害，同被捕的苏联人稍有牵连的中国人不少被抓。同行的徐梦秋，听邓发讲了苏联情况很害怕，盛世才又留他，于是他就没有继续走，在迪化当了新疆的教育厅长。后来此人跟着盛世才叛变了。

从迪化坐汽车到阿拉木图后，我们就搭上了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直达莫斯科。在柳克斯公寓，王稼祥同志（这时他代替王明任驻国际代表）来，交代我们千万注意，不要同过去认识的苏联人和中国人随便接触、联系，不然要惹麻烦的。后来，为治疗方便，稼祥又把我们安排到郊外东方大学分校住。看病由苏联同志陪着，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即皇宫医院）。

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有很大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却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在后面花园里。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78]

贺子珍是在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不久，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她听说毛泽东重新结婚了，但是她一直将信将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1949年回国之后，她才确信自己走后被江青钻了空子，铸成大错。她大哭了一场。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江青乘虚而入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朱仲丽曾这么写及江青给毛泽东写情书的情形：

早春的延安，春寒料峭。

江青穿着海蓝色长毛绒大衣，头上戴了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脑勺，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那双眼睛流露出扑朔迷离的光芒。

她从宝塔山下往山上的边区医院走来，一眼看见正下山的、手中拿着听筒的朱仲丽，便停步："喂，朱大夫！"

朱仲丽猛一抬头，也停止脚步，正好和江青打个不远的照面，对这位似曾相识的女同志打了一个招呼。

江青笑道："朱大夫，我认识你，而且即将成为你的病人了。"

朱仲丽惊问："你是谁？不舒服吗？"

江青表情丰富地动着脖颈："我是来住外科病房的。"她指着鼻子，"我要把这讨人厌的鼻息肉割掉呀！"

朱仲丽点点头，匆忙地回答："啊！原来是这样。那好，我现在急于去城内看门诊，再见。"她活泼地往山下快步走，一双红绒线织成的草鞋带着沙土滑了下去。

延安边区医院，外科病房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地在半山腰中，伴着雄伟的宝塔山。

这天傍晚，朱仲丽穿着白大褂，颈上的两只短辫，不时地跟着脖子摇动。她照例左手握着听筒，愉快地迎着偏西的太阳到邻近的山坡上去查病房。走至山坳处，抬头看见美国内科医生马海德。

"喂！又碰见你了，到内科查房吗？"朱仲丽主动打招呼问道。

马海德不高不矮，身穿八路军军服。头发黑卷，手中提着听筒和血压表，"哈罗！朱大夫，你下了门诊又去查外科病房，看，快吃晚饭了！"

他俩表情丰富地边笑边走。走到一岔路口，朱仲丽说："好，我们分路了，再见。"

马海德："再见，祝你好。"

朱仲丽口中哼着歌儿，活泼地滑下山坡。

朱仲丽跨进外科病房，立即向四位病人问好。

走至江青病床前："江青同志，你开刀后，只能用嘴呼吸，鼻已塞满了纱布，一定会难过的，不要紧，两三天就能取出来了。"

江青点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早点出院。"

朱仲丽手握听筒站在江青病床前："可以的。其实，你该早做手术，外面的条件比陕北好。你好好休息吧，不要写信了。"

江青忙把腿上的信纸叠好，放在一本书里，回答道："你该相

信，我完全是因为太忙，水银灯下，舞台生涯，你可以想象，哪有治病的时间呢？”

“那我倒相信。”朱仲丽说完猛一抬头，发现病房门口站着个人，那人穿着灰色军服，向朱仲丽微笑。“啊，是你！警卫员同志，你是来看病的吗？”

警卫员：“不是，”他手指着江青，“我等回信。”

朱仲丽恍然：“啊，知道了。”说完回头看了一眼。

江青半躺在病床上，以两腿为桌，继续低头写信。

朱仲丽走出病房窑洞回头问警卫员：“小王，你是……”

小王答道：“我是送信来的。”

朱仲丽回看江青一眼，江青正情意绵绵地忙着写信。朱仲丽感到奇怪地问：“是毛主席叫你送来的？”

小王聪明地只点点头，偷看江青一眼，抿着嘴笑。

朱仲丽走出了窑洞门，回头又轻声对小王说：“请代我向主席问好。”小王会意地笑了。[79]

由于江青与毛泽东热恋，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话，倒比较客观：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80]。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指导员。

1938年8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关于毛、江“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另外，张闻天收到了王世英等的一封长信，反映了江青当年在上海的复杂历史情况。

王世英（1905—1968），山西省洪洞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资深的情报工作负责人。解放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省长。

当江青在上海被捕时，正值王世英在上海，曾组织过营救江青的工作。此后，江青在上海所闹的“唐蓝风波”，王世英也一清二楚。

王世英在1938年奉命调往延安，得知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大吃一惊。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信中详细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种种情况，认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与这样的女人结婚不合适。

王世英写完信之后，觉得一个人署名，分量还不够。他在延安找到当年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陈雷（后来曾任黑龙江省省长）、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余宗彦[81]等，共同署名，而且一一摁了指印，表示郑重其事[82]。

王世英后来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南汉宸后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也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王超北在1962年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了近20年……

在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之后，消息传出，向中共中央去电、去信反对这一婚姻的还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中共江苏省委；严朴……

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扬帆传略》一文披露：

> 1939年，扬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他指着报纸问扬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扬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扬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83]

[image]

■ 蓝苹成为江青之后，上海报纸刊登《蓝苹的往事》

扬帆，20世纪50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扬帆。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1912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1932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1937年3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8月加入中共。

扬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1989年出版的《扬帆自述》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 那是在1939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84]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为了这份电报，扬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1937年扬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1990年发表《刘晓在上海》忆及刘晓的情况：

> 1979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两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

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引者注），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1939年周总理（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1949年才成为总理—引者注）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1927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1932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他参加了长征。1937年5、6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1937年11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85]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86]（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生于1898年。他反叛家庭，于1925年加入中共。1928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

1935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1938年3月回到延安。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在延安。虽然李德对毛泽东始终存在偏见，但是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写及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的情况，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87]：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

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引者注）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1938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1932年或1933年由康生（应为黄敬—引者注）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是大陆很多书刊流传的：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是台湾李凤敏著《中共首要事略汇编》中的《江青事略》以及玄默《江青论》所载：“（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是老龙著《江青外传》[88]：“（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89]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记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曾经在王世英反对毛泽东、江青结婚的联名信上签字的余宗彦也说[90]：“听说，中央有决定，江青仅仅是照顾毛主席的生活，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想，这大概与世英同志发起的联名上书有些关系，总算达到了部分目的。”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当时，王若飞担任中共华中、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八路军副参谋长。从1941年冬起王若飞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崔万秋在1971年退休，隐居美国。1990年7月病逝于旧金山。崔万秋晚年，在美国潜心写作《江青前传》一书，于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细读了《江青前传》，发觉除了写及他自己在上海与蓝苹的直接交往之外，广征博引，极其详尽引用海外尤其是台湾方面对于江青的研究资料，对江青的早年身世进行详尽考证。可以说，如果他不是长期关注江青，在美国很难收集如此众多的关于江青的报道、专著、研究论文以及国民党的内部文件。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

崔万秋就“约法三章”加的按语原文如下：

>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于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

据笔者查证，王若飞确实有记日记的习惯。倘若把现存于大陆的王若飞日记加以比对，缺少1938年日记的话，也将间接证明那一时期的王若飞日记确实落到国民党军队手中，现存于台湾。

据崔万秋称，他所引用的"约法三章"，源于陈绥民著《毛泽东与江青》（台湾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

陈绥民曾名陈大勋，是崔万秋的好友，这可能是由于他们都从事特殊而又秘密的工作。陈绥民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总干事。社会工作会是国民党三大情治单位之一，陈绥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

陈绥民是胡宗南的亲信。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刊载了署名陈大勋的回忆文章《片断的追忆，永恒的怀念》，详尽记述他在胡宗南手下工作的经历。此外，中共党员熊向晖奉周恩来之命埋伏在胡宗南身边，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在熊向晖的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陈大勋，亦即陈绥民。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8月13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夕，陈绥民奉命指挥伞兵部队空降北平，使国民党部队得以抢占北平；更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任命的延安市长便是陈绥民。正因为这样，陈绥民在延安读到王若飞遗失的日记，也就理所当然。作为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他，注意到王若飞日记中记载的"约法三章"，同样理所当然。

陈绥民不仅是国民党情治系统高官，而且与崔万秋一样，勤于动笔。陈绥民曾经就延安之役写过《延安的克复与失落》，内中写及中共地下人员如何获取胡宗南机密情报。此外，陈绥民还在台湾出版了《迷惘：台独往何处去？》（台北天人出版公司1984年版）以及写了一些研究分析大陆对台军事动态的重要文章。他的《毛泽东与江青》一书，可以说是他长期对毛泽东、对江青进行情报收集的成果，堪与崔万秋的《江青前传》相提并论。陈绥民晚年在台湾淡江大学担任教授。

陈绥民的《毛泽东与江青》，内中详细记述了从王若飞日记中所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时距离1947年3月陈绥民随胡宗南进入延安，已经29年。这表明陈绥民不仅精心保存了当年缴获的王若飞日记原件，而且当时还从王若飞日记中抄录了"约法三章"。

王若飞日记所记的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可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所以文字相当严谨。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笔者多次前往台湾，曾经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史研究室请教，希冀能够查阅王若飞日记原件。据云可能归入大溪档案。所谓"大溪档案"，收入1921年初至1949年间蒋介石的重要档案，由"总统府"机要室掌管，从大陆迁往台湾之后因存放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的大溪宾馆而

得名。1979年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迁往阳明山的中兴宾馆，国民党中央的党史资料以及大溪档案也都集中在中兴宾馆的地下室里，从此对外改称“阳明书屋”。笔者也曾来到阳明书屋，到了那里的地下室，空空如也。据告，大溪档案已经再度转移。由于大溪档案的管理人员不多，因此查阅相关档案仍是相当困难。但是王若飞日记作为重要档案，势必得到妥善保存。有朝一日从台湾保存的王若飞日记上查到王若飞亲笔所记“约法三章”，这一悬案也就水落石出。

当然，是否存在“约法三章”，其最终的结论还有待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证实。

也有人以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可能对江青作出“约法三章”，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江青谈话，如果她与毛泽东结婚，对她规定了几条必须遵守的原则，后来被传为“约法三章”。

否定“约法三章”之说的最有力的证据，是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在北京三座门他办公处的会议室，跟张闻天传记组成员谈话时说：“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活动。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问过陈云，我说那时你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91]

但是，杨尚昆说及关于陈云这样一件事：“陈云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2001年第4期《党史博览》杂志发表阎长贵先生的文章《历史事实必须澄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对于“约法三章”表示否定。

我在2001年第12期《党史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也谈“约法三章”》，提出不同看法：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中央有无“约法三章”？我对此不持肯定态度，也不持否定态度。

我持不肯定的态度，是因为至今已经公开的中共中央档案中，没有关于“约法三章”的记载。前文中虽然提到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日记曾记载“约法三章”，但是，台湾方面没有公布王若飞日记的手迹，因此不足以作为肯定的证据。

我持不否定的态度，则是由于“约法三章”颇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合时，贺子珍仍是毛泽东夫人，而且江青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女人—江青不仅男女关系复杂，此前有过四次婚姻（裴明伦、黄敬、唐纳、章泯），上海大报小报对她的桃色新闻炒得沸沸扬扬，而且她曾经被捕，不明不白地出狱。“约法三章”正是针对毛贺、毛

江关系以及约束江青而提出的，合情合理。

阎长贵先生作出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有‘约法三章’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样的结论，我以为过于绝对了。

阎长贵先生以毛泽东的卫士长等人的回忆录没有谈及“约法三章”为依据，否定“约法三章”。其实李银桥是在1948年才来到毛泽东身边，而“约法三章”是在十年之前作出的，更何况李只是卫士而已，怎么可能知道中央的秘密决定？我也曾经三次访问过张耀祠，他说自己在解放后才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知道“约法三章”。张耀祠所说的“不知道”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不能以张耀祠“不知道”就作为否定“约法三章”的依据。

其实，不论对于毛泽东还是江青，“约法三章”毕竟是不愉快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约法三章”。所以，不能以毛泽东或者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没有听说“约法三章”，就否定“约法三章”。

我要提及一项重要的佐证，那就是陈云秘书刘家栋的回忆。刘家栋是在1938年5月担任陈云秘书，而毛泽东与江青正是在此后数月结合的。

陈云当时对于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持反对态度。当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曾经找江青谈话，并对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作过了解，审查过江青的党籍问题。我在《陈云之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中，专门写了一节《批评了“大明星”蓝苹》，内中引述了刘家栋的回忆：

> 陈云同志身为组织部部长，对当时的很多人的情况，有着比较多的了解。由于工作性质决定，还容易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反映。他就是根据自己对江青的了解，根据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不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意见。
>
> 但是，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多数同志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只是附有一个条件，就是结婚后，江青不得干预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就坚决服从中央书记处会议决议。这反映出，陈云同志既坚持了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92]

刘家栋的回忆说明，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而且作出了“决议”，附加条件是“结婚后，江青不得干预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工作”。这附加条件虽然只一条，但是与流传的“约法三章”精神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还要顺便提及：2001年1月，我在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所查阅资料时，发现在1969年出版的台湾《中共年报》第五部分第24页关于江青的生平介绍中，有这么一段写及毛泽东

与江青的结合：

> 江以中共中央军委案卷管理员身份，与毛同居。当时毛妻贺子珍尚养疴苏联，遂遭张闻天、陈绍禹等人之反对，认为贺女为一“优秀的党员”，不但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且在“长征”途中，负伤多次，应该受到尊重。但一部分毛之亲信，则主张毛既为一党领袖，不宜过分予以束缚，并认为毛、江之结合，纯系基于毛之“生活上与工作上之实际需要”。后经时任“鲁艺”副院长之柯庆施及主持特务工作之康生从中奔走疏通，取得中共中央谅解，承认毛与贺的分离以及毛与江的结合，确系出于“组织上之安排”。同时提出一项决定指出：“江青同志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料理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预政务”。这一事实，亦可说明“文革”以前二十多年来，江青始终未能出任中共党政要职的原因所在。

台湾方面的资料所说的“一项决定”，也类似于“约法三章”。这一资料表明，在江青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就已经有类似于“约法三章”的说法，并非在江青倒台之后才流传“约法三章”。

阎长贵先生在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文，再度表达对于“约法三章”的否定。

他的观点又一次遭到否定。在2008年第12期《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一点补充和思考》、文史学者郭汾阳的《也谈“约法三章”及其他》，都表示不同意阎长贵先生的意见。

金春明教授在《一点补充和思考》中谈及了关于“约法三章”研究的最初情况：

> 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我很想趁这个机会把问题搞清楚，可是档案馆进不去，我不久又生病做了手术并休息了半年多，把机会错过了。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

这个问题，但作为历史研究，它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悬案。

金春明教授在文章中谈及：

> 一位从上海来的省部级班学员（大概是市委常委，曾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谈到一个情况：193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曾发给上海市委一份电报，了解江青在上海时的情况，并征求对江青同毛主席结婚的意见。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刘晓、刘长胜等同志复电中央，如实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情况，并认为江青不宜和毛主席结婚。不久，中央电告上海市委，江青已同毛泽东结婚，“如有同志问及此事，可告以江青主要照顾毛主席生活，不参加政治活动”。我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且是可信的。

总之，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结合时，中央有无“约法三章”，现在还不宜作定论，因为不论是予以肯定或者完全否定都还缺乏有力的证据，姑且暂作“悬案”挂起来。

最可靠的证据将在中共中央的档案（诸如中央会议记录）之中，而目前这些档案并未全部公开。

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学员做关于“革命与恋爱问题”的专题报告，提出了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三项原则，即“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与江青的婚姻，符合“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这三原则。

江青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现代史大事记》，该书记载：“1938年11月20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938年12月20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11月20、21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1990年8月20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1938年11月20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只黑乌鸦（指日军飞机—引者注）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20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

去吃晚饭。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93]。

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这里要说明一句的是，徐明清记得毛泽东请客那天，张闻天在座。但是，张闻天夫人刘英则说，由于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所以毛泽东没有请张闻天吃喜酒。

刘英是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之后从苏联回到延安，她回忆道：

> 我对贺子珍是很爱怜的。她十八岁在永新城偶遇毛，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她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现在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中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我随口对毛主席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听我这样一说，毛主席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
> 回到家里，我同闻天讲了去看毛主席的情况。闻天连忙说："你可不要管，江青的事你不要管！许多老同志有意见，不是反对毛主席同贺子珍离婚，而是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闻天告诉我，毛、江要结婚时，议论纷纷，反映很多。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
>
> 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

> 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94]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请喜酒还有另外的回忆。

那是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前去看望毛泽东。

贺龙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正遇江青从里面走了出来。贺龙并不认识江青，也就没有跟她打招呼。不过，贺龙已经风闻毛泽东新婚。

贺龙见到毛泽东，故意问道："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也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得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叶子龙则是这么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婚：

> 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五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
>
>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
> 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
>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
> 延安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吃饭以小米、各种豆类等粗粮为主，很少吃得到荤腥。这一点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记得1943年，有一次毛泽东邀请当地的2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吃饭，为他们祝寿。在枣园的一片树林里摆了几张桌子，几样家常菜，喝着本地产的味道很冲的白酒，大家还一起跳了秧歌舞，气氛欢快而热烈。临了，有几位老太婆要带些吃剩的东西回去给孩子吃，毛泽东没有同意，说：这是专门慰问你们的，只许吃不许带走哟。可见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
>
>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当时一元钱能买200个鸡

蛋，我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让我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正吃饭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滕代远的极力劝说下，毛泽东当天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那天，我正在发高烧，没有随毛泽东搬过去。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传下话来，说他吃不上饭了，让我赶快搬去，我马上让管理员买了不少菜送去。第二天也搬到杨家岭的山沟沟里。

[image]

■ 毛泽东、江青在延安杨家岭窑洞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处在半山腰，一半石头，一半土的。窑洞后墙有防空洞与我住的窑洞相连。

日本飞机从11月20日至21日，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住的窑洞被炸塌。在清凉山的新华书店附近牺牲了几个同志。他们的遗体埋葬在宝塔山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葬礼。[95]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

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爸爸娶江青时，45岁，那时江青24岁。婚后不久，江青从鲁艺调到了爸爸的身边，任军委档案秘书。听爸爸说，他们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住在三孔新窑里。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了白灰。窗门是木制的，糊上纸，可透进光线。门外有一小块碾过

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别为起居室、爸爸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

开始爸爸和江青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江青的主要工作是照料爸爸的饮食起居。……[96]

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几个月之后，斯诺在延安与江青有过短暂的见面。斯诺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江青是一个苗条而又富于吸引力的少妇，“她扑克打得很好，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厨娘”。

在延安的高干夫人们之中，江青与她们相比，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当时人们这么形容江青：“口还没开就先笑。”意即说话前先是满脸堆笑。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1939年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1946年7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织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她就在延安搜集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地砖，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不同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江青这种“直率而客气”的形象，同样深深地留在范明的印象中。

范明，本名郝克勇，中共在国民党三十八军的地下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在1942年7月，毛泽东曾电令郝克勇前往延安一谈。郝克勇在1942年12月，来到了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地。

后来，郝克勇曾写下回忆文章《枣园初见毛主席》，内中主要写毛泽东，但是也写及江青。他的回忆颇为真切、生动。

现把郝克勇（范明）的回忆文章有关江青的部分摘录如下，读者可以从中看出当时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的生活情景：

> 1942年12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钟，欧阳钦同志奉命陪我到枣园去见毛主席，我好像是冲开笼子的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快马加鞭，来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地。只见一个由土墙围着的小门前，既无卫兵把守，又无其他人员来往，在一棵大枣树掩映下，显得格外优雅肃穆。
>
> 我随着杨清同志（即欧阳钦）静悄悄地走到门内一座茅草房（传达室），坐下和胡乔木等同志寒暄。言犹未了，从窑洞里走出了两位女同志—毛主席夫人江青和叶子龙夫人蒋英，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说：“主席还没起床，先到里面坐。”
>
> 我们走进石窑里面，只见一个方方正正的炕桌摆在窑的中央，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四个小方凳。江青和蒋英让我们坐下，倒了茶，解释说：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四时起床，要我们等一下。
>
> 说着，江青取来一副扑克牌，让我和她当对家，杨清和蒋英当对家，打起所谓统一战线扑克来。江青洗牌很快，分牌也很快，出牌也很刁，可是我也能得心应手地配合得好，一下子把对方赢了五百分。
>
> 蒋英不服，说我和江青有暗号。江青对蒋英说，没有暗号，他是作统战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一定会知道。
>
> 蒋英如获至宝地说：“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肯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处当什么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
> 我当时由于作秘密工作的警惕习惯，有些为难。这时，在一旁的杨清同志会意地说：知道的话，说说无妨。
>
> 我于是告诉她，蒋听松确在卫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蒋英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说：这就好了，我被打成特务羔子的帽子可以摘掉了，请你写个证明吧！我望了望杨清，杨点头说：“可以！回头由组织部出面找你再写。”蒋英千欢万喜地向杨和我致谢。
>
> 正当大家谈论热闹之际，毛主席身披延安呢子上衣，和蔼可亲地从窑洞后间走到我们的面前。两位女同志即时退了出去。[97]

在谈话中，毛泽东建议郝克勇在进入延安后应该改名，并为他取名“范明”，这个名字竟然一直沿用至今。

在与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之后，郝克勇又写及江青：

> 接着主席又问了关于统战工作的其他一些事情。不知不觉之中，几个小时过去了。这时，主席点燃一支香烟，站起来反复踱步后，略有所思地走到窗口，向外望了望：“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饿了，该吃饭了，喂饱肚皮再说。”江青应声端上了菜饭：一盘辣椒炒肉片，一盘辣椒糊烧豆腐，一盘辣椒炒土豆，一盘辣椒红烧延安河里的小鱼，中间放了一盘菠菜豆腐汤。主席把手一挥说：“请吃饭吧！朱夫子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咱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饱肚皮，请放开肚皮吃饭，回去好好睡觉，明天再谈。”大家也都笑着拿起了碗，随着主席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饭，埋头吃了起来。

郝克勇所记述的江青，在客人来的时候热情招待，而客人与毛泽东谈工作时则赶紧避开——那时候的江青，给人们留下不错的印象。

另外，毛泽东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江青和毛泽东新婚的情形，也对江青最初的印象不错：

>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那短暂的一段时间，生活还是平静的。
>
> 每周六晚上，江青由党校回来，周一早上再回去。开始是步行来，步行归，以后改为警卫员用马接送。
>
> 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
>
> 单调而又冷清的窑洞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
> 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火红的晚霞中，苍茫的暮色下，毛泽东和江青并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着他们缓缓而行的背影，我从心里祝福他们。
>
> 这时，江青对我们或公务员的态度还可以，仍是先笑后说话，比较礼貌。每逢周六她从党校回来时，周少林师傅总是高兴地撑起大勺，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其实也没什么精米细菜，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做碗红烧猪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尚比较满意，有时背后议论：别看江青是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看起来好伺候。[98]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三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

新婚不久，1939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她跟八位女同事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织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织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她也常常拿出剪刀，给女同事理发。她毕竟来自上海，剪的发型特别好看，很受女同事们的欢迎。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1922年10月，毛岸青出生于1924年夏，毛岸龙出生于1927年2月。内中毛岸龙早夭，1931年5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1936年6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

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4岁的娇娇在1940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完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1948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20万大军进攻延安。3月19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image]

■ 毛泽东、江青与李讷在延安（吴印咸　摄）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泯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1943年她在延安做了流产手术。当引产出来的竟是一个男孩时，江青后悔不已，对医生护士哭喊：“你们还我的儿子！你们还我的儿子！”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江青自己动手给李讷做棉衣，织毛线衣。不论是裙子、连衣裙，还是棉衣、棉裤，江青都做得不错。江青给李讷织的毛衣，能够织出灯笼袖，还能变换各种花样，是一个尽心的母亲。

整风运动中康生保江青过关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太闹太杂了。

1942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5月2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

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但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面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

>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99]。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

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1933年入党，硬说我是1935年！”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100]，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

"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了，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的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扭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午后，我去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这种时候我只需听，无需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

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儿心事，冒一两句。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101]

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非常形象地勾画出当时的情景。

江青无法求助于毛泽东，就求助于她的那位同乡—康生。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康生又一次保江青过关。用朱仲丽的话来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后来，康生甚至把谁告发她、告发些什么事情，都告诉了江青。当江青“露峥嵘”的时候，那些曾经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也就一一受到了狠狠的报复。

[image]

■ 康生（右）与毛泽东在延安

当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后，又倒过来帮了康生的忙。共产国际联络员彼得·伏拉迪米罗夫在他的《延安日记》的1943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

江青不仅只是毛主席的个人秘书，而且还负责毛主席所有的秘密联系。她最亲密也是最信任的朋友是康生。康生尊重她的婚姻，因为这可以给他一个接近毛主席的通道。

江青变娇变骄了

[image]
■ 江青在延安的时候

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江青渐渐显示她的本性。一桩小事，露出了她的强横。

据参谋蒋泽民回忆，一天，江青听说，在另一位首长家中，有个小保姆的名字，居然也叫江青！

江青极为不悦：一个小保姆，怎么可以跟她同名同姓呢？

依照江青的猜测，一定是那个小保姆听说她叫江青，也就模仿她的名字，叫起江青来。

她托蒋泽民去找那个小保姆，要小保姆改名。

然而，蒋泽民前去细细一问，得知小保姆原本有个小名，嫌不好听，到了那位首长家，首长给她改名江青。

蒋泽民再一打听，得知小保姆改名江青，比江青还早。也就是说，小保姆并不是模仿她才叫江青的。

在中国，同名同姓本是常有的事。可是，江青绝不能容忍那个小保姆也叫江青，仿佛“江青”这名字已经成了她的“专利”。

毕竟江青是“第一夫人”，那个小保姆拗不过她，只得改名。

江青对于自己身边的小保姆，也开始摆架子，动不动就呵斥了。

她对伙食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啧，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

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不过，美国《纽约时报》的通讯员梯尔门·杜丁先生，还是敏锐地注意到江青吸烟。1944年，他这样写及对于江青的印象：“在她身上还是发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质—‘一个来到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画美人’。她的穿着和普通的中国妇女别无二致。只是在裁剪和用料上更为得体一点；她的头发剪成苏联式短发，这是一种在西北革命领袖人物夫人们之间颇为时髦的发式，而这使她本人更为漂亮（30年后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头发剪成的都是这种样式）。那些日子里她就吸洋烟了，并且是美国舞曲音乐迷。一个与她跳过舞的美国人发现她的英语‘不是不能讲的’。”

杜丁在报道中说，江青与毛泽东主席结婚之后，患上了肺结核病，病情延续到1944年还没有好。虚弱的病体并没有阻止她在鲁艺继续授课。江青在鲁艺学院讲授的课程是戏剧艺术，此外她还导演了一部宣传人民抗日的保留剧目。

在延安，常有外国人访问毛泽东，江青以主妇身份招待客人，她给外国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苏联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彼得·伏拉迪米罗夫，在1942年至1945年住在延安。

伏拉迪米罗夫除了对外发出许多关于延安的报道之外，还每天记日记。他的日记在30年后才公开出版，书名为《延安日记》。

他在日记中这样描绘1942年的江青：“她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软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禀性，她毫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

哈里森·福门，是一个美国新闻记者。他与毛泽东及江青相识于1944年。

福门写下这样的报道：

>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接迎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六个普通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护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女电影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艺学院从事戏剧艺术教育。毛泽东对戏剧的兴趣使他们走到一起，并于1939年春不事铺张地结为伉俪。
>
>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绑在她那样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土布上衣，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我

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块铺地、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家具的窑洞。时间已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一只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几支点燃的烟头上。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了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存在。

[image]

■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大卫·巴利特上校是美国观察小组成员。他在1944—1945年派驻延安。他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一次军事展览会上，向他介绍夫人江青：“巴利特上校，这是江青。”

巴利特惊讶地发现：本来想象中的痨病患者看上去却十分健康，而且神情欢愉。

巴利特这样描述江青：“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他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罗伯特·佩恩在1945年访问毛泽东的时候，对江青的印象是这样的：“毛泽东的夫人进来了，穿着黑色女裤和一件毛衣。‘你好！’她招呼道，带着一种典型的北京腔儿。这使你一下猛地意识到她那张脸美丽而有丰富的表情。同时，伴着她那款款移来的脚步，一股高原地区野花的清香也飘进了屋内。”

江青并非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倔强。在“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之后，她渐渐显露本色，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跟毛泽东发生口角。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闭嘴！”一听这话，江青才收敛了一些。

最使毛泽东不悦的是，她骂他“土气”、“土包子”。这句话可能反映了她灵魂深处对延安的鄙视，她还是向往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明星生活。

江青与周恩来的“惊马事件”

她喜欢骑马。本来，她不会骑马。正因为这样，她在从西安到洛川途中，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她不得不骑马时，显得神情异常紧张。如今，她把骑马当成一种很好的消遣，喜欢在延安招摇过市。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啵，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聚焦的目标一样。

苏联摄影师罗曼·卡门，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1939年5月，奉斯大林之命，到达延安，拍摄一部关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电影。

卡门第一次遇见江青，是在1939年5月25日，是在他去与毛泽东举行讨论会的路上。“他那艺术家的眼睛一下就被她俘虏了”。卡门遇见了江青，为她拍摄了骑马的英武照片。“江青着装华丽，头发梳成辫子，这使她看上去更像个斯拉夫人”。这张照片如今被印在许多关于江青的书中。

卡门写下这样的回忆：

> 在我们去看毛主席的路上，我们骑马穿过延安城。新近开放的“女子政治大学”是为数千名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妇女而建立的。学校位于一座小山上，恰好在鲁艺与抗日军政大学的后面。我们两次蹚过溪流。
>
> 在我们第二次过河之后，我们被一位女骑手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我们时她一下停住了，勒紧缰绳，用一种带有野味的姿势快活地欢迎我们，她就是毛泽东夫人。像成千上万年轻的中国人一样，几年前她来到了延安这个特殊的地区，并在政治大学学习。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员。现在，她已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工作是做毛主席的个人秘书。她为他安排活动日程、记录演讲内容、抄写文稿并照顾其他各种各样的杂务。现在她是刚刚从毛主席派她去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意气风发地坐在她那矫健小巧、神气十足、不停腾跃嘶咬的马上，两条辫子用缎带绑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光脚穿着一双木底草鞋。

[image]

■ 喜欢骑马的江青

“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来了。”她说着猛地掉转马头，向后挥了挥右手，身体微微前倾，旋即消失在一阵灰尘之后。

由于江青喜欢骑马，引出关于周恩来惊马的种种传说。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60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关于周恩来坠马，传说颇多，照列于下：

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着周恩来出去。一条狗突然从路边窜出，吠叫着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拨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她的马撞到周恩来的马上，周恩来一头摔下来，右臂就摔断了。在延安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102]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想能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人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比周恩来小十五岁的江青（应为小十六岁—引者注）不像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103]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104]

其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载，“周恩来坠马，是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着牙关。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这一段记述，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蒋泽民1985年3月20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当时在场的另一警卫人员王来音1979年6月口述材料而写成的。这一段记述，没有提及江青。

其五，1992年4月5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1965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

> 周恩来惊马，是在1939年7月10日晚。他去中共中央党校，为的是给“华北联大”师生送行。
>
>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7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
> 7月7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1939年7月7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
> 7月10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
>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跶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
>
> 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

成仿吾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可供参考。他于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

江青借牙病飞往重庆

在充满“土气”的陕北生活了将近八个年头，江青终于有机会重返那灯红酒绿的所在。

1945年8月28日下午1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有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下午3时半许，一架银色专机从天而降。舱门打开之后，一位穿着蓝灰色中山服、个子魁梧的人物，手持白色巴拿马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

“毛泽东！毛泽东！”他的出现，使机场沸腾了。

陪同毛泽东一起由延安飞往重庆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此行，为的是和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史称“重庆谈判”。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山洞林园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便下榻于林园。

林园有三楼三底的西式房子四幢。毛泽东住在二号楼。蒋介石也住在林园，跟毛泽东比邻而居。据云，为的是便于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重大政治活动，与江青无干。可是，她竟在毛泽东去重庆之后，也去重庆了！

江青去重庆的借口，乃是牙疼。她的龋齿发炎，这本是小毛病罢了。不过，“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她哼哼唧唧不已，非要去重庆治牙病不可。毛泽东总算同意了，只是说好了条件，即在重庆不能公开露面。

于是，她搭上周恩来飞往重庆的飞机，带着女儿李讷，从延安飞到了重庆。

1968年3月15日，江青在与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四川省有关领导时，说起自己跟四川省的渊源：

> 你们是远方来客，你们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很遥远。解放前我跟总理去过一次，是治牙。四川七千万人口，是天府之国，就是不要变成了独立王国，如果变成独立王国，群众不允许就是了。各个地方都不能允许。七千万人口，是个大国，在欧洲就了不起了。

当时，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属于四川省。也就是说，1945年去重庆看牙病，是江青唯一一次去四川。

在她来到重庆时，毛泽东已从林园迁至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而江青则和李讷一起住在张治中家桂园。

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一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

在重庆，她的身份当然瞒不过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她逢人便要指指牙齿，说自己是为治牙病而来，似乎也生怕别人议论。

她当然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

一个多月前—7月1日至7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六位参政员，即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延安参观、访问。内中的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见一见江青，被毛泽东婉拒。

左舜生此人，跟毛泽东同庚，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左翼团体，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左舜生为评议部主任。不久，内部分化，左舜生倒向右翼，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他和崔万秋颇熟。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7月5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即李讷，当时五岁—引者注）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image]

■《时代》周刊刊发的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时期的照片

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江青前往重庆，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1946年2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在《毛的一家》一文中，这样描述江青：

> 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
>
> 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统区，是上海的电影明星，名叫蓝苹。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1939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期《时代》周刊还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左手夹烟，侧身注视江青，而江青则身着臃肿的棉衣，双手插在裤兜里，咧嘴微笑着。

唐纳在重庆拒见江青

江青来到重庆之后，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105]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1942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1937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1938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很巧，笔者在1998年2月21日，得以采访年已古稀的陈璐。

那是我应邀去武汉签名售书，上午10时，当我来到汉口图书城准备为读者签名售书时，一位中年男子已在早早等候。他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壮实，一表人才，知识分子模样。他说从昨日的《长江日报》上见到我来武汉的消息，特地赶来。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唐纳的儿子红儿，你在《江青传》里写到我……”

我马上关切地问：“你的母亲陈璐女士呢？”

他答道：“她在汉口，已经78岁了。”

我在写《江青传》初版时，在上海曾请陈璐的友人回忆她以及红儿，但是未能采访她本人。所以一听说她就在汉口，离我所住的璇宫饭店不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采访机会。于是我问：“她的身体好吗？能够接受采访吗？”

他说，母亲除了患气喘病之外，没有别的病，能够接受采访。于是，我当即与他约好，晚上去看望他的母亲。

入夜，我在他的陪同下，来到他母亲家。三房一厅，刚刚装修一新。陈璐女士虽然年逾古稀，但是眉清目秀，穿一件花格毛衣，仍可见到当年演员的风韵。她演过许多话剧，如《雷雨》、《日出》、《风雪夜归人》、《少奶奶的扇子》等等。她在话剧中总是演正面人物。在话剧《红楼梦》中，她甚至担任林黛玉的A角和薛宝钗的B角。她也担任过电影演员。在电影中，她却总是演反面人物，要么演女特务，要么演堕落的舞女。

她不仅口齿清楚，而且思维也清晰。面对我的录音机，她娓娓话当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

由于日军进逼武汉，唐纳与大批文化人一起，从武汉退往重庆。重庆是当时中国的陪都──由于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从1937年11月起迁往重庆，称重庆为“陪都”。

在山城，老朋友赵丹为唐纳牵红线，使唐纳结识了18岁的女演员陈璐。

陈璐是武汉人。当唐纳在武汉组织演出《中国万岁》时，初出茅庐的陈璐在武汉演《放下你的鞭子》。尽管都在演艺圈内，那时，陈璐并不认识唐纳。

当唐纳前往重庆，陈璐也来到重庆，先是参加四川旅外剧团，后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工作。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汉口摄影场，也是从武汉迁来。许多左翼电影工作者加入了中制。赵丹也来到中制，认识了陈璐。

看到唐纳在山城孤身一人，赵丹有意把陈璐介绍给唐纳，便对陈璐说：“我有个好朋友，想见一见你。”陈璐问他，这位好朋友是谁？赵丹便向她介绍了唐纳的身世、为人……

陈璐记得，1938年3月的一天，由赵丹做东，请她和唐纳在重庆冠生园吃饭。

当赵丹带着她来到冠生园时，唐纳早已等在那里了。陈璐一进去，唐纳的双眼便紧紧盯着她。陈璐不好意思起来，对唐纳说：“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唐纳一时语塞，就明知故问道：“你就是陈璐小姐吗？”赵丹抢着说：“这还用问？”这时，赵丹和唐纳都哈哈大笑起来。在笑声中，唐纳和陈璐算是认识了。

唐纳跟陈璐开始聊天。过了一会儿，唐纳的好友顾而已也应赵丹之邀来了。不言而喻，赵丹是请顾而已一起来敲边鼓的。顾而已当然不辱使命，在陈璐面前，替唐纳美言了一番。那天，四个人在冠生园笑语飞

扬，演了一台热热闹闹的《喜相逢》。

唐纳年长陈璐6岁，跟陈璐一见倾心，坠入爱河。唐纳频频约她去骑马，去重庆南温泉游泳。唐纳亲热地喊她“璐璐”，她则叫唐纳“罗平”。他们以闪电的速度结婚。为了纪念他们的相识之处，婚礼也是在冠生园举行。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们赶来，向这对新人表示祝贺。

蜜月是在日军隆隆的轰炸声中度过。唐纳和陈璐起初住在一家旅馆里。在空袭警报声中，这家旅馆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无可奈何，他们只好借住到赵丹家里。那时，赵丹在山城的临时住处也很局促，只有一个房间。于是，权且在房间里拉上一道帘，这边住着赵丹和叶露茜，那边住着唐纳和陈璐。空袭警报声频频响起，他们不时要翻山，躲进防空洞。

1938年10月，唐纳与陈璐经越南河内，到达香港。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乘船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和陈璐住在海格路（今华山路）、江苏路口。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却已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虽和陈璐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千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

陈璐在上海当演员。唐纳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的含义是与“蓝苹”相对。

唐纳带陈璐去苏州老家。唐纳的母亲十分喜欢陈璐。陈璐记得，唐纳的母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颇有文化修养。

陈璐怀孕了。唐纳从海格路搬到瑞金一路。那里是法租界。婆婆来到上海，照料临产的媳妇。婆婆说，苏州老家院子里的大树上，正巧结了一个鸟窝，是个吉兆呢！婆婆盼望媳妇生个儿子，早早地开始做小男孩的衣服。

唐纳从来没有做过父亲，当然更加细心地照料着陈璐。他听说私人

医院的服务比公立医院更加周到，就安排陈璐到上海美琪大戏院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检查。开设这家医院的丁明泉医生，曾留学德国，医术高明。

1940年5月1日清早，陈璐感到腹痛。婆婆和唐纳急送陈璐到那家私人医院。陈璐上了产床，婆婆坐在一侧陪伴着她。临产时，婆婆紧紧捏着她的双手。上午10时，陈璐在那里生下一个男孩，唐纳和婆婆高兴得手舞足蹈。

分娩后，卫生员用担架抬着陈璐到了病房，放下担架时动作稍微重了一点，向来细声细语的唐纳，这时大声吼道："你们怎么这样粗心！她刚生完孩子，浑身'散架'，一受碰撞，将来骨头合不拢，还得了！"陈璐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

唐纳为儿子取了奶名，叫"红儿"。按照苏州人的习惯，叫作"红倌"——唐纳本人的奶名，就叫"仁倌"。不言而喻，这"红儿"、"红倌"，都是从唐纳为陈璐所取的艺名"红叶"演绎而来的。

由于儿子出生于5月1日，正值国际劳动节，唐纳为儿子取名"马均实"，意即"均分劳动果实"。

儿子的出生，使唐纳沉浸在欢乐之中。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以便专心照料陈璐母子。唐纳的母亲则按照苏州习俗，每天炖冰糖桂圆汤给陈璐吃，总共吃了一百天。

当时的上海，在日本的统治下，进步文化人只能在租界里活动。即便这样，也不能演出或者拍摄宣传抗日的作品，只能以《木兰从军》这样以古喻今的作品间接地进行抗日宣传。那时的租界成了"孤岛"，进步文化也就成了"孤岛文化"。

陈璐在唐纳的帮助下，进入"孤岛"电影界，在上海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乱世风光》直面租界"孤岛"生活的现实：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奸商骄奢淫逸，一面是穷苦百姓水深火热。

影片结尾时，响起柯灵作词的主题歌：

让新的生长，
让旧的灭亡，
我们是青年一代，
我们是人类的栋梁……

这部影片公映不久，受日军的威胁，连租界当局也不得不下令禁映《乱世风光》。

除了拍电影之外，陈璐主要是担任话剧演员。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后

台，陈璐有一间专用的化妆室。

当时，陈璐并不知道唐纳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常常行踪机密。有一回，唐纳对她说：“如果我被捕，牵连了你，你就说‘我早就跟唐纳离婚了’！”陈璐听了愕然。

后来，突如其来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清早，她所住的三楼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那时，唐纳不在家，他离沪秘密前往重庆了。陈璐和红儿以及保姆留在上海。保姆开了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法国巡捕。巡捕问：“陈小姐在家吗？”陈璐应声而出。巡捕说，要她去巡捕房一趟。陈璐吃了一惊，连忙推说：“孩子还没有过早呢！”所谓“过早”，是道地的武汉话，意即“吃早饭”。巡捕却坚持一定要她马上就走。

陈璐下了楼，见到巡捕房的汽车停在楼下。她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到了那里，巡捕倒显得很客气，一边给她喝咖啡、吃三明治，一边说希望她能好好合作。陈璐“过完早”，巡捕带她到另一个房间去。一个大块头巡捕开始对陈璐进行审问：“你是唐纳太太吗？”陈璐知道事情不妙，就按唐纳的嘱咐说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了，不再是唐纳太太了。”大块头接着问：“你知道，唐纳在哪里？”陈璐答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大块头面对这位一问三不知的陈小姐，只好放她回去。

陈璐庆幸唐纳事先为她编好对付巡捕的“台词”，所以也就顺利过关。她来到兰心大戏院，全身心地投入《天罗地网》的排练。她万万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巡捕又来找她。

这一回，她来到巡捕房，大块头板起了面孔。原来，巡捕经过暗中调查，得知她根本没有跟唐纳离婚。所以，当她又一次声称自己跟唐纳已经离婚，大块头也就不客气了。她被关押在巡捕房。她说，唐纳不在上海，到底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强调自己正在“上戏”。她如果被关押在巡捕房，不去剧院，戏没法上演，剧团的经济损失谁负责？

审了几回，从陈璐嘴里得不到关于唐纳的线索，巡捕房把陈璐关押了三天之后，只得又一次把她放了。

回到家中，陈璐很快就发现，家门口有人盯着，直到夜里熄灯之后，盯梢的人才离去。白沉（后来在1955年担任电影《南岛风云》导演）来看望她，劝她赶紧把唐纳放在家中的进步书籍转移。陈璐找唐纳的把兄弟张静林商量，悄悄把这些书籍转移到他家。

过了半个多月，大约没有发现唐纳回家，楼下那盯梢者这才消失了。

唐纳从重庆回来了。

陈璐把那场虚惊告诉唐纳。唐纳笑道，他事先替她拟好的“台词”，

还是派上了用场呢！他并没有把巡捕房为什么这样“关注”他的原因说出来。直到好多年之后，她才知道唐纳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才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

经历了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日子。这时，重庆的“要员”们纷纷争着从重庆赶到上海“接收”（当时人们称之为“劫收”），而唐纳却奉命又一次从上海前往重庆。

临走，陈璐为唐纳整理行装，并送他上路。陈璐记得，分别时彼此间并无龃龉。意想不到，唐纳这一走，竟是她和唐纳八年夫妻生活的终结。

唐纳到了重庆之后，起初还给陈璐来信，渐渐的，信越来越少了。后来，陈璐才知道，唐纳在重庆已另有所爱。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材晋用》一文报道：

>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
>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
>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道，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康健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唐纳。1938年，由沈西苓导演、洪伟烈摄影，在重庆拍摄了电影《中华儿女》。康健在影片中演刘二嫂一角，而演刘二哥的则是赵丹。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矶）回忆：1945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偕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106]

据陈璐告诉笔者，唐纳母亲去世时，她携红儿前往苏州奔丧。婆婆平素待陈璐不错，她和红儿披麻戴孝，为婆婆送行。按照苏州习俗，每来一位吊唁的亲友，媳妇就得当场大哭一通，而且那哭声时高时低，时长时短，颇有节奏感。在苏州，陈璐为婆婆哭了一回又一回。

唐纳这次来到重庆，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那里举行举国瞩目的重庆谈判。

江青借口治牙，也来到重庆，只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江青曾打电话约见唐纳，却被唐纳一口回绝。唐纳深知，江青此举，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107]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1984年9月29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108]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面对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是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因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主要是出于炫耀。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3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1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唐纳与康健因性格不合，终于分手，从重庆回到上海。这时陈璐已经与一位盐商结婚。

唐纳很爱红儿，他把红儿接走。那时，唐纳住在上海北面的虹口，与电影界朋友毛羽住在一起。唐纳在报馆工作，经常上夜班，到天亮才回家，白天则睡觉，正好与红儿的生活时间相反。红儿独自在家过夜，很害怕。这样，他不愿在父亲那里住。小小年纪，他从虹口换了几趟电车、公共汽车，回到母亲陈璐身边。

唐纳也知道自己照顾不了红儿，但是他思念红儿。他常常一大早用"的士"把红儿从陈璐家中接出来，陪他吃早点，然后送他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思南路口的明德小学。

后来，唐纳离开上海，去香港了。红儿在母亲陈璐身边生活。

1948年的一天，8岁的红儿在母亲家已经睡着，突然听见父亲急急的叫唤声。他醒了。父亲唐纳随即带着他外出。红儿记得，父亲带他到上海西区颇为僻远的凯旋路附近的二叔家。夜已深，父亲让红儿睡在二叔家的沙发上，然后和二叔外出。清早，当红儿醒来，父亲和二叔刚从外面回来。看得出，他们通宵未眠，在外面办事。父亲亲热地把红儿搂在怀里，同时向二叔交代一件件要办的事。

紧接着，父亲送红儿到母亲陈璐那里。他要走了，他亲了亲红儿的脸。这时，红儿见到热泪滚出父亲的眼眶。这是红儿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了。

父亲匆匆地走了。红儿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他竟然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

江青写信慰问赵丹

1946年1月29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1月27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嘉玲娜的丈夫奇虹，卡嘉玲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1938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1938年4月，杜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茜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这样，1939年6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出乎意料之外，1940年5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刊载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

1937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1945年4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江青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江青此信，在20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1980年12月10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

>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致于死命，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缢于奉贤干校，赵丹曾名列抄家对象第二号。
>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1946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 袁鹰说，1946年春，他初次当记者（二十二岁的袁鹰当时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引者注），有一天，总编辑安排他访问赵丹，他俩在DDS咖啡馆畅谈了一下午。赵丹从三十年代初上银幕，讲到抗日的号角声中走向大后方，从新疆的五年铁窗生活讲到回重庆，又回上海。
> 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
> 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20年后，也就是1966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待。
> 他俩重逢（1977年）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待，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

江青写给赵丹的信，究竟什么内容？《世界晨报》不易查找，笔者倒是在1946年2月17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查到了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全文。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编者加了一段按语："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

以下是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原文：

阿丹：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image]

■ 1946年已经成为江青的蓝苹致函赵丹（刊于《时事新报》）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紧握你的手！

江青

1946年2月7日夜

其实，就江青写给赵丹的这封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发表这封信，并无"政治阴谋"可言。20年后追究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其实大可不必。

江青从1946年2月中旬飞回延安之后，没有再去重庆。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被炮火撕毁。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内战全面爆发。

1947年3月13日，延安上空出现成群的飞机，机翼上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炸弹倾泻而下，浓烟冲天而起。延安结束了平静。

屈指算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已经近九年。这九年的生活虽说是艰苦的，但毕竟是安定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平静地度过。说实在的，江青进入延安以来，还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就在国民党的飞机涌向延安的那一天，胡宗南部队的16个旅，共约23万人，分两路朝延安发起了攻击。

炸弹在毛泽东窑洞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朝窑洞袭来，震碎了门窗，把家具也震得吱咯吱咯响。毛泽东毕竟久经战火的考验，对于隆隆飞机、轰轰爆炸声，置若罔闻，依然在窑洞里工作着。江青带着李讷躲进防空洞，大声地唱着歌，借歌声壮胆。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强大攻势，毛泽东避其锋芒，于3月19日放弃延安。从此，江青跨上马背，随着毛泽东开始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这时，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为两路。刘少奇、朱德率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则留在陕北作战，组成中共中央前委。

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如前所述，意即“离得胜”。

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取“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则化名“郑位”，取“政委”之谐音。

为了保密，江青从那时候起，不再称毛泽东为“主席”，而是叫“老板”。直到解放初，江青仍叫毛泽东为“老板”，后来才又改称“主席”。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每逢行军休息，周恩来总是活跃人物，他会用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腔调讲“吃花生仁不吃花生皮”，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江青已是主席夫人，不再当众唱一段，倒是出谜语给大家猜。7岁的李讷在江青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讷会唱京戏，来一段《打

渔杀家》，一派江青风度，会博得一片掌声，连毛泽东也夸奖她：“讷讷成了我们陕北小名旦啰！”江青呢，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这“口琴”代替京胡，为李讷伴奏。听见毛泽东夸李讷，她得意地笑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带着孩子行军诸多不便。毛泽东和江青商量，让李讷随着中央机关一些家属、子女一起，东渡黄河，到山西去。组织上安排李文芳照料李讷。

当时担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这样回忆江青：

> 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109]

江青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在靖边县一个名叫小河村的村庄，曾认一位陕北姑娘为干女儿。

江青随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小河村，只住了几天，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逼近，就离开了。

不久，毛泽东和江青又来到小河村。这一回，住的时间长。当地老百姓并不知道毛泽东，只晓得他叫“李家”，身后常常跟着警卫，是个“大官”。

江青倒是跟村里的妇女混熟了。

后山卜学忠家的姑娘叫卜兰兰，聪明伶俐，十六七岁，常来“李家”串门，江青很喜欢她，认她为干女儿。

如今，卜兰兰仍清楚记得往事。她曾经这么回忆跟干妈江青相处的日子：

> 毛主席进小河村时，我在崖畔摘桑叶，我们家喂了三四升蚕。
> 他们头一次来住过几天，第二次见他拄拐棍，我想一定来了大官，回去撂下桑叶，就去串门，走到毛主席住的窑院━那时我不知道他是毛主席，我先碰到江青，她一把拉住我，问我叫甚名？我说我叫兰兰。她说这个名字起得好。问我家有甚人？我就一个个背给她听，有大、有娘、有哥……她笑了笑，拽我进屋，抓了一把糖给我，还给我冲黑糖开水，甜得巴嘴皮。她抱我，抱得我发疼，很紧。
> 玩了一会，我要回去。她叫我明天再去，我回家给娘说，那院子来了个小婆姨，个子高高的、白白的，细得很。娘听后说有空去看看。

第二天摘罢桑叶我又去。江青问我认字不？我说不。她说不识字不行，以后你天天来，我教你认。后来，我天天去，她就教我，到她们离开小河时，我就认下六百多个字。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里住的是中央机关，也不知道这里还有毛主席，乡亲们都称他李家，他不多说话，可爱笑，笑起来咯咯有声，我们就常逗他笑，好听他笑。

毛主席也挺喜欢我，我去了他们就炒鸡蛋、煮海带叫我吃，我挺爱吃海带，我没吃过那东西。

[image]

■ 江青（左二）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7年）

[image]

■ 江青（毛泽东左侧）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我娘一阵就同江青认识了，她们是纳鞋底混得亲热的。说她有个女儿不在身边，怪想孩子的。后来听一个写《黄土地红土地》的作家同志说，江青和我娘接触太多，汪东兴还让人调查过我们家。他们见咱父亲是个老实庄稼人，娘虽很风流，出身没问题，毛主席安全没影响，就让他们来往了。

我去得多了，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兰兰，你当我的干女儿吧，我真想有个女儿在身边。我想她对我好，人挺随和，就说好。跑回家给我大、我娘说，他们也都同意。其实，他们根本没把这当回事。这样，我就把江青叫干妈，把毛主席叫姨父，时间一长，混熟了，说话也随便了。

我问："姨父，你多大了？"

他伸出五个指头说："五十了。"

我一听："那么大？"

他瞪着眼又咯咯地笑了。

村里让我家给部队推磨，就是用小麦磨面，一头骡一天磨三四斗麦，一斗麦二十斤面，其余我们落下，麦子和骡子是部队上的，我们见部队用荞麦喂牲口，就拿我们磨面落下的麸皮换来荞麦，做成荞麦面饼、荞麦饸饹，送给部队吃，李家也爱吃。

江青很喜欢我，一天见不到我就跟丢了魂似的。找到我，就亲热地问我做甚？叮咛我好好帮娘干活，说我娘年老，当女儿的要勤快。她说她是很小时从家里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十五岁当演员，二十岁跟李家结婚。

部队离开小河时，毛主席、江青都想让我跟他们走。尤其江青，说让我给她看小女儿，供我上学，等于她生养了两个女儿。她还说李讷七岁，当我妹妹。

可我大、我娘就我一个女子，要离开，他们说啥也不同意，拦住不让我走。我哭着要走，跑到他们窑里，江青望着我直叹气。这时候，毛主席看弄成这个样子，安慰我说："兰兰，你不要哭，我们回到延安，就写信让你大把你送来，好吗？现在你大、你娘不让你走，我们硬把你带走，别人会说闲话哩。"

我哭着点头。江青把一条裤子、一双洋袜、一个银调羹和一些

鞋面布送给我，她也哭了。[110]

从卜兰兰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在农村，江青还是能够跟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

这时，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从苏联回来了。

1947年10月8日，毛泽东在致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这么写道：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即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当时从苏联回来—引者注），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1947年10月8日[111]

这里提及的李讷“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便是指李讷托寄在山西。李讷画的画，使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得到欣慰。

毛岸英是1946年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他随中共中央宣传部撤离延安，来到陕北瓦窑堡一带。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江青的职责仍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有一次，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十几户人家，贫农薛老汉腾出两间半窑洞，其中一间给毛泽东和江青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要开会，只能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毛泽东要江青避开，因为这个会议是军事会议。江青不得不搬到别处去睡，被臭虫叮得浑身又红又痒。

对这类事，江青非常敏感。有一回，毛泽东起草好一份军事电文，她想看一下，毛泽东当即收了起来，使她颇为难堪。

不过，到了后来，有一些并非十分机密的文件，如果秘书没有空，毛泽东也叫江青抄写—特别是以毛泽东名义所写的信件。

为什么毛泽东喜欢让江青抄写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信件呢？

江青当年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每天要抄写图书卡片，练过

字。跟毛泽东结婚以后，她刻意摹仿毛泽东的字体—“毛体”。江青相当聪明，一学就会，而且摹仿到足以乱真的地步！

毛泽东写文章、写信，写毕之后总要修改。文章圈圈改改没什么，反正最后是以印刷体印出来。信件则不同，倘若圈圈改改太多，未免有点不恭之嫌，毛泽东需要重抄一遍发出。在事务繁忙的时候，毛泽东无暇重抄，便叫江青代劳。

毛泽东在1949年4月2日写给傅作义的信，便是江青用“毛体”抄写的。这封信后来被当为毛泽东手稿收藏。在“文革”后，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毛泽东事迹展览”时，把这份江青的抄件作为毛泽东手稿公开展出。

在众多的参观者之中，唯有一位火眼金睛，断定这份毛泽东手稿出自江青笔下。

此人来自中央档案馆。

笔者曾在中央档案馆采访，那里有一个手稿组，专门负责保管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手稿。毛泽东的大批手稿，便保存在那里。

手稿组里有一位鉴别毛泽东笔迹的专家，名唤齐得平。他长期跟毛泽东手稿打交道，练就一身识别毛泽东手稿的真功夫。

那天，他仔细端详，发觉那份毛泽东手稿尽管笔迹酷似毛泽东，但是由于刻意摹仿，笔画显得僵硬。他由此断定，乃是江青的摹仿之作。

另一份毛泽东诗词手迹，也是被齐得平认出是江青摹仿的作品。

虽然江青摹仿毛泽东的手迹，逃不过专家的眼睛，但是毕竟瞒过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这起码可以说，江青摹仿毛泽东手迹的功夫已经相当不错。

在不断的宿营、行军、再宿营的流动生活中，从1947年12月起，到1948年3月，毛泽东总算得到暂时的安定，一直住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

杨家沟也是一个小村庄，但是比王家湾要大，二百来户人家。看中这个小村，是因为小村不靠大道，来往的人不多，不易暴露目标。另一桩原因，是小村里有个扶风寨—地主庄院。这扶风寨在陕北那穷山沟里，是难得的豪华型窑洞。屋外，一排玻璃走廊，颇有气派。屋里，那窑洞四壁，竟漆着浅绿色油漆！那炕的四周，居然还雕龙刻凤……毛泽东和江青，就被安排住在扶风寨里，住了四个月。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村，一时间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1947年底，就在这个扶风寨，中共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

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反反复复，改了好多回。最后交给江青誊清。毛泽东关照她在誊抄时，要做到“五不”，即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这清楚表明，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份报告，以求付印时不错一个字。这篇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确实，这篇报告极为重要。毛泽东指出，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 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12]

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匪帮”了，毛泽东笑谓，蒋介石咒骂共产党为“共匪”，骂了那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剿匪”，如今轮到“原物奉还”，称“蒋总统”为“匪”了！

毛泽东断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确实，毛泽东已稳操胜券。此后，才一年多时间，中共便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1948年3月21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3月23日东渡黄河。

3月25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15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对干部们讲话，这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4月2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即席作了讲话。据当年《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告诉笔者，他当时正好坐在毛泽东左边，作了详细的记录。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根据纪希晨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吓。

由于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所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在《毛泽东生活散记》[113]一文中，李银桥在《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谈及此事。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彼此的回忆有些出入。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夜里，毛泽东起草通知，通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清晨，毛泽东工作毕，卫士李银桥给他服了安眠药，照料他就寝。这时，江青正起床，她住在毛泽东隔壁房间。聂荣臻也起床了，散步回来，遇上江青。聂荣臻住在后面的一排房子里。毛泽东刚刚入睡，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声。这里离北平不大远，跟延安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敌机一入境，马上用电话通知延安，那里老早就拉空袭警报。而这里只能在看见敌机时才拉警报，听见警报声时敌机已光临了。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们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

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他俩犹豫不决，便向江青请示。正好，聂荣臻也派范秘书来。商量的结果是不叫醒毛泽东，而是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找了一副担架放在毛泽东门前。一旦情况紧急，马上把他从床上放在担架上，抬往防空洞。

空中出现三架敌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8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卫士们也摸透敌机的脾气，知道这一回来者不善，也就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坦然，一边穿衣服，一边还要抽烟。

“快快快，走走走！”听见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响，江青尖着嗓子喊叫。

毛泽东仍要吸烟。这时，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四卫士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毛泽东往外跑。

聂荣臻也赶来了，指挥大家去防空洞。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这时，又是一批炸弹扔下来。这一回炸弹猛烈爆炸，把毛泽东住的院子炸得黑烟冲天。

如果毛泽东晚一步离开那里，那就有性命危险……

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事后才查清，城南庄潜入了国民党特务，名叫孟宪德，当时担任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大丰烟厂副经理。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前，孟宪德已在那里。他最初想谋害聂荣臻，就收买了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只是未得机会，刘从文没有把毒药撒在小伙房军区首长们的菜里。

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

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江青明知是国民党特务作案，事隔20年，在“文革”中却诬指聂荣臻谋害毛泽东，欲置聂荣臻于死地。

不过，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1988年采访陈伯达时[114]，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1971年9月13日夜，陈伯达被突然押送秦城监狱时，在监狱门口大呼“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狱警不知他做过什么“好事儿”，向上汇报，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记起阜平城南庄的一幕，陈伯达当年为了救他确实做过“好事儿”。毛泽东关照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宽待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在那里生活上得到特别优待，吃得比家里还好。

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5月26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5月29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几百个人围在打谷场四周看热闹。

这时，已是国共大决战的前夜。从7月开始，辽沈战役打响。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铺天盖地。毛泽东坐镇西柏坡指挥这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西柏坡这原本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从此载入史册—因为它是继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1948年岁末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开头，毛泽东便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44]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

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45]1988年12月19日下午，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46]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47]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1979年第5期。

[48]2001年11月20日，叶永烈采访王福时于美国旧金山伯克利。

[49]1988年12月19日下午，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50]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1937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51]据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52]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

[53]1988年11月3日下午，叶永烈采访俞瑾于北京。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55]也有许多文章说连演10天，是不确的。笔者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实》44页所载，应为20天。

[56]1938年4月1日出版的丁玲和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

[57]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实》，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61—62页。

[58]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常常被说成是新编京剧《松花江》。经查证，应是《松花江上》。

[59]徐铸成：《萧桂英进宫》，1980年10月15日《大公报》。

[60]1992年5月21日，叶永烈采访翟林椿。

[61]向继东：《江青秘书阎长贵眼里的江青》，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62]1991年7月8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朱仲丽。

[63]蒋泽民回忆、吕荣斌撰文：《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副官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

[64]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

[65]应为《狼山喋血记》，1936年11月由上海联华公司摄制。

[6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页。

[67]2001年11月20日，叶永烈采访王福时于美国旧金山。

[68]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6页。

[69]据云汀、张素兰：《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7页。

[70]据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71]据云汀、张素兰：《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9页。

[72]据云汀、张素兰：《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210页。

[73]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3—34页。

[74]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7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76]朱汉生：《吴莉莉后来的故事》，香港《开放》月刊2007年第1期。

[77]朱汉生：《吴莉莉后来的故事》，香港《开放》月刊2007年第1期。

[78]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

[79]朱仲丽：《我知道的毛主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80]江青喜欢骑马，这一爱好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她住在钓鱼台仍在空闲时骑马健身。

[81]余宗彦：《王世英，他没有看错江青》，《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82]王凡：《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83]伟斯、兆琼：《“神剑”与沉镣—扬帆传略》，《大江南北》1989年第4期。

[84]《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85]陈修良：《刘晓在上海》，《大江南北》1990年第1期。

[86]B 1988年10月30—31日，叶永烈采访严昭于北京。

[87]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88]老龙：《江青外传》，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4年版。

[89]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90]余宗彦：《王世英，他没有看错江青》，《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91]据李明三：《江青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凤凰周刊》2011年第6期。杨尚昆的这一段话，引自李明三对阎长贵的访问。

[9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93]本书作者于1993年4月2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

[94]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95]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96]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91页。

[97]范明：《枣园初见毛主席》，《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98]据蒋泽民回忆、吕荣斌撰文：《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副官的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

[99]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1947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100]此处指李大章，当时化名“老王”，任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书记。李大章是当时批准江青入党的上级领导。《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明确指出：“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101]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6—137页。

[102]何廉：《今天一定要到达—周恩来乘飞机秦岭遇阻纪实》，《啄木鸟》1990年第2期。

[103]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29页。

[104]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105]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1989年3期。

[106]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1989年第3期。

[107]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1988年第6期。关于江青到重庆治牙一事应是在重庆谈判期间。

[108]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第45卷第6期。

[109]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10]萧思科：《知情者说》之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11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1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113]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1987年第1、2期合刊。

[114]1988年12月19、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第四章　张春桥之初

华蒂社的中坚

张春桥此人，在小小年纪的时候，便有一番不凡的来历。

张春桥乃山东巨野人氏，生于1917年。家住巨野县城城隍庙前街张宅—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22间房子。

张春桥的曾祖父叫张在文，祖父叫张协中，父亲叫张开益，都跟县衙门有点瓜葛：张在文是巨野县衙状班“老总”，后来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张协中袭任了“八柜柜书”。从清朝进入民国之后，他任国民党政府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后来，又当过日伪维持会主任，于1948年病死。

张开益，字晋青，生于1899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1953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张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1955年，张开益还收房租。

在张春桥的笔下，他的父亲却成了这样的形象：

> 父：小职员。（张春桥1939年填写人员登记表）
>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张春桥1944年写的反省自传）
> 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张春桥1952年填写党员登记表）

本来，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这是自己所无法选择的。在填表的时候，如实地写，也就可以了。张春桥却不，像变戏法似的，他不时变动着自己的家庭出身：

> 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

产阶级。（张春桥1944年写的反省自传）

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张春桥1952年填的党员登记表）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张春桥1973年填写的中共十大代表名册）

[image]

■ 张春桥1944年填写的反省自传（部分）与1952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部分）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妹妹叫张佩瑛，死于1974年3月30日，当时为上海某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宋蕙卿生于1896年。1977年，她得悉儿子张春桥身陷囹圄，在绝望之中，于4月1日自杀于上海。

关于张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在关于张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见到某人在1958年8月1日所写的关于张佩瑛家的材料。当时，张春桥尚未显赫。这份关于张佩瑛的材料，写得相当真实：

张佩瑛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搞卫生方面的，是一个处长。她家有自备的洋车。张佩瑛有时就用洋车上下班。因为我的家到办公地方去，要经过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佣人。

张佩瑛长得很漂亮，家中有钱，所以她当时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丝袜、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为玻璃小姐……

另一个人在1957年4月15日写的材料，这样谈及解放前的张佩瑛：

我们在一个科工作。当时对此人的看法是，非常爱出风头，大家公认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风很成问题，成天爱打扮，似个交际花，素日常与有钱有势之流接近。究竟哪一个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难使人知道，因为见谁也能谈情说爱，一块下饭馆、看电影。据她自己在闲谈中讲，在空军俱乐部跳过舞，跳得腿酸。……在马路碰到时，很少是自己，身旁总有另一异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说是“张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当年的张春桥，也是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小小年纪，已经参与了种种政治活动。

1931年，14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1933年，年仅16岁的张春桥，就已经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还可从1934年上海《文学》月刊7月号所登《济南》消息中，查到16岁时张春桥的“足迹”：

> 华蒂社：成立于1933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
>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这里提到的马蜂，亦即马吉峰。1934年天津的《当代文学》第1卷第5期所载《济南通讯》，署名露石，内中写道：

>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
>
> 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image]

■ 1934年的《当代文学》济南通讯指出张春桥曾是华蒂社中坚

[image]

■ 《文学》杂志的报道证实张春桥是华蒂社发起人

关于这个华蒂社，其首领李树慈在1976年11月13日曾作过如下交待：

> 我是1933年在济南由黄信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信棠。三三年春夏，黄信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信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信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16岁的张春桥舞文弄墨，在《华蒂》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子于在192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叫《银铃》）。在第二集《华蒂》月刊上，发表了小说《秋》。

可以说，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

“文坛恶少”张春桥

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噗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 1932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信棠、范贯三等接触。
>
> 1933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会、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为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16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1934年夏，17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目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臧克家发动进攻了。

看看这位17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下《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115]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发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日前友人访于其家，谈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于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116]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

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117]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猬。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为怪。这个“狄克”之狂，初入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1934年11月29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

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猬，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1934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1934年7月6日《新诗歌》第2卷第2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诗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4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1934年8月2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一文，发表于1934年9月15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插一脚，写篇文章。

这时候的张春桥，也曾去学过戏剧。

那是戏剧教育家阎哲吾先生来到济南，担任山东民众教育馆推广部指导员，开办了戏剧训练班。

当时，张春桥进入这个训练班，开始学习戏剧。只是张春桥后来并没有从事戏剧艺术。

班上有一位同学叫陶金，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陶金在1947年和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主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又与白杨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名震全国。

前些年，香港出版了陶令昌、金义著《陶金—舞台银幕五十秋》一书，内中引述阎哲吾先生的话："我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陶金，一个是张春桥。"

这本书披露了张春桥曾师事阎哲吾学习戏剧，是陶金的同学，使读者颇感惊奇[118]。

1935年3月，当著名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也去参加，拿出本子起劲地记，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于1935年3月24、31日，分两次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1934年7月26日的《中华日报》上，张春桥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这样谈及他自己"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萧寄语、张春桥、黎曼、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

该报8月7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17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21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24岁。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1935年5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18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30元。

当时的青年作家周楞伽，与张春桥相识。周楞伽这样记述对张春桥的印象：

> 张春桥是王梦野介绍我认识的，他俩感情似乎很好，常常同出同进，张春桥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不像后来削骨瓜脸，戴眼镜，相反倒有点痴肥臃肿，他的名声不好，代上海杂志公司标点“国学珍本丛书”，自己看不懂，点了破句，反说原书有误，被辞退出来，文艺界传为笑谈，因此我有点轻视他。张春桥性格比较阴沉，不大说话，但一旦开口，言辞十分激烈。[119]

周楞伽原名周剑箫，1911年生于江苏宜兴，比张春桥年长六岁。他当时出版了长篇小说《炼狱》，并主编《文学青年》杂志。解放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担任编辑，1972年退休。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汇集之地，人称“文化街”。1924年，11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11年后—1935年5月，18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325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1924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1935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325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1935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作“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1935年9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120]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1936年1月10日出版的《书报展望》第1卷第3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1935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是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18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1935年11月18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
>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
>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
>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的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
>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
>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

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18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为此，《国闻周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

崔万秋其人

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上海各杂志的汇聚之处。校对之余，张春桥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

1935年6月6日，张春桥来上海还不到一个月，《大晚报》就登出署名“张春桥”的《行之端》一文。

1935年7月18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张春桥的《土枪射手》一文，回忆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紧接着，1935年8月15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刊出张春桥的《我控诉》，文末署明的写作日期，为“7月21日午”……

此后，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发生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

欲写清楚狄克公案的来龙去脉，不可不写一写这一公案的幕后导演—《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指使狄克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向鲁迅射来冷箭的，便是崔万秋其人。

[image]

■ 崔万秋主编的上海《大晚报》副刊刊登许多吹嘘蓝苹的文章

《大晚报》是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创办人为张竹平。起初，它仰仗国民党政学系的津贴来维持。到了1934年，改换门庭，拜倒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神爷”孔祥熙脚下。崔万秋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崔万秋此人，有着明暗双重奏。

明里，他是“火炬”副刊主编，人所皆知。

他也喜欢动动笔头，写写散文，发表小说，算是个作家—而且还算是个左倾作家。

他活跃于上海文坛，广交作家，出入于文学阵营之中。每当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作家们发表宣言、声明，在签名者的名单中，往往可以找到“崔万秋”三个字。

至于他暗中的身份，他的不可告人的地下活动，他与张春桥的秘密来往，直到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才终于“显影”……

崔万秋与姚蓬子同庚—生于1903年，比张春桥大14岁。他与张春桥有着同乡之谊。张春桥在来到上海之前，是否认识崔万秋，不得而知；但是，张春桥一到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知己，却是确确实实的。

原军统特务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当年的崔万秋，有着与沈醉相似的秘密身份，所以他们常来常往。沈醉在崔家见到了“四人帮”中的二分之一—蓝苹与狄克，足见崔万秋此人来历不凡。

崔万秋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关于此人的身世，很少见诸文献。我在1934年的《十日谈》杂志上查找《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时，很偶然，“崔万秋”三字跳入我的眼帘！细细一看，竟是一篇署名“蕙若”所写的“作家印象”，篇名便叫《崔万秋》，刊登在1934年第32期《十日谈》旬刊上。

从这篇“作家印象”中，今日的读者仍可获得对于崔万秋其人的大致印象。文章全文如下：

> 崔万秋是个山东老乡，家住大明湖畔，数年前在日本留学，和樱花味的日本姑娘，大谈其恋爱，佳话很多。
>
> 中等身材，看去还算英俊，讲的蓝青官话。头发疏疏的几根，有点秃顶了，脸孔上也有皱纹，可谓“少年老成”（他已三十岁了）。
>
> 以前和曾今可很要好，在《新时代》月刊上，也发表过几篇创作，他和曾今可互相标榜。在去年，因为利害冲突，就反了脸，还在报上登过启事，大骂曾今可。（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北伐。1931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出版《新时代》月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申报》特派员身份前往台北，逗留台湾。任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二十年，并编辑《正气月刊》。1971年病逝于台湾—引者注）
>
> 他和曾虚白很要好（曾虚白，原名曾焘，乃曾朴之子。1894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父亲曾朴同办真善美书店，主编《真善美》月刊。1932年，上海《大晚报》创刊后，任总经理兼总主笔。1938年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49年赴台湾，翌年任中央通讯社社长—引者注）。现在他在《大晚报》上编“火炬”“三六影刊”二副刊，常常拉些名家，替“火炬”撰稿，所以在黎烈文脱离“自由谈”（“自由谈”为《申报》副刊，黎烈

文曾任“自由谈”主编—引者注）以后，“火炬”大有“取‘自由谈’而代之”之概。

近来，他因为职业关系，常常写点电影方面的稿子，电影明星如阮玲玉、叶秋心等，他也时常去拜访。有些人造他谣言，说他是风流编辑。

他这个人，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体去和他接洽，他的话说得很恳挚，没有文人骄傲的习气。关于这，他许有点是沽名钓誉的。

他的作品，大都是恋爱的故事，文笔朴直，格调方面，不无陈腐，内容是很空虚的。如《新路》那部创作，已经比较有点意义了。近来常和左翼诸公有所来往，鲁迅、茅盾诸氏的文章，也常在“火炬”发表；有人说他最近的思想有点左倾，但是他愿意做一个“尖头鳗”，不愿意冒大险，使得脑袋搬家。至于登左翼诸公的文字，无非是学时髦，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心理，一方面不被人骂作落伍，一方面又可以讨好左翼诸公罢了。

以上可以算是关于崔万秋的特写。虽然只写及崔万秋的公开的一面，但是毕竟为当年的崔万秋，留下了一幅剪影。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混迹于文坛，不光是作为编辑，而且他也算是个作家。

我在发黄的旧杂志中，寻觅着崔万秋的踪迹。除了他的一些言情小说之外，我查到他写的一些散文。特别是他早年所写的散文，往往也反映出他的“自我形象”。

1929年12月4日上海《新文艺》杂志在《编辑的话》中写道：

> 散文一栏里有穆罗茶先生的《林》和崔万秋先生的《钱》均是隽永蕴藉之作。崔先生还有《忆故居》和翻译日本“普洛”派巨子叶山嘉树的散文三篇，但因来不及编入本期，只好留待下期发表了。

崔万秋的《钱》，篇末注明“11月2日在广岛”，显然是1929年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开头，引了一句日本谚语：“一钱使人哭，一钱使人笑。”

下面便是他的散文《钱》，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风格：

> 钱之可贵，要没有钱的人才痛切地感得出来。我便是痛切地感得钱之可贵的人们中之一个。特别感得钱之可贵的经验，印得满脑子里最深的，有下列几件事。
>
> 民国十六年秋天，一位受洋大人、官大人、党大人三重压迫的苦朋友写信来告急，说是初到东京，人地生疏，没有现钱竟不能吃饭，现在每天只吃七个铜板一块的面包，有时有一杯热水吃，有时竟不得不喝凉水。我看了以后心里难过到万分，想到朋友那里借几块钱寄了去，但是结果只赚几个轻视的冷笑。借钱不到，正在没好气，房主人却凑热闹地来催房金。刚忍着气把房主人敷衍着下了楼，有一位官费欠发的朋友来向我借钱搬房子。搬房子好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位朋友是忍受不住那房主的轻蔑中国人，与之口角，为争一口气，不得不搬家的—那时我想：“钱是真可贵。”
>
> 今年暑假以前，足有三个月我手里几乎一文钱都没有。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到东京去，但没有路费，虽急得心焦如焚，也竟无可奈何。7月22日午后我从商业专校领到了我一个月劳苦所得的“月给十五圆也”，先到理发馆把长得和南洋土人似的头发剪去，把满脸的黑胡子剃了，对镜一看，我居然也像一个人。到“汤屋”里洗了个澡，浑身轻松舒快。又到牙齿医生那里把消毒消了三个月的龋齿补上一块橡皮，左边的牙齿也居然能嚼东西了。狠了狠又到冰店里花费了十钱吃了一杯冰淇淋，真是凉沁心脾，浑身清爽。到了夜晚八点，提着手提包便坐到东京行的火车上，从车窗望着将行圆满的月光了。托了这十五圆纸币的洪福，我竟那样舒服起来，使我不能不想

到："钱是真可贵。"……

从崔万秋的散文《钱》中，也可以大致觑见他当年留学日本时的生活情景。

在1930年第1期《新文艺》上，刊出崔万秋的散文《怀旧居》，同样记述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文末注明"11月19日于广岛"，当是1929年的事。

《怀旧居》分为三段，现将"其一"摘录如下：

> 一楼一底的一座小房子，位于广岛市的南端之海岸近处，那便是我的旧居了。
>
> 房主人姓坂本，夫妇两人。还有一位小女孩，才两岁。他们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
>
> 这处小房子，在我住过的十几家中，印象最深，可追忆的往事最多，所以不忍离开它；但坂本君他迁，我一个人住不起便不得不洒泪而别了。
>
> 这房子大门正临小巷的通路，对门是町总代向西氏之居。左邻为一军人，其家之大小与我寓相等，右邻为一木屐商人，姓尾前，因是别邸，颇为宽大。
>
> 门前的小巷，西通海岸。东通往大街上去的电车道。每朝每夕，有往山中、进德两女学上学下学的女学生通过，市女的学生（"市女"为校名简称—引者注），虽也有经过的，但比较少得多。
>
> 在这小巷内，我每天早起行深呼吸，吃过晚饭照例在这近处散步。冬天便站在巷内晒太阳。有时在夕阳将坠的暮时，和儿们游戏，也有时站在门前和左近的女人们闲话。也有时抱着房主的小女孩子在巷内蹀躞。
>
> 因为门前便是路，所以没有树木，不免有些寂寞。
>
> 可是房子后面和右边，因为全是别邸，树木花草，都很繁盛，从我那小楼上往下看去，很可以悦目。
>
> 小楼太狭了，只有四叠半席，一张高脚写字台，一只椅子，便装得很满，除了"床之间"内堆了几十部书，靠墙放一只书架外，其他两箱书，都不得不堆到壁橱内。
>
> 小楼向南，光线很好；南北两面开窗，空气也很流通。我在这小楼上住着很舒适，所以颇做了一些事。尤其是写作方面，这小楼更可纪念。武者小路的《孤独之魂》，系搬来不久译成的。夏目漱石的《草枕》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我那本幼稚的创作小说《热情摧毁的姑娘》中之《他的新年》、《邂逅》两篇，也是在这里写的。
>
> 这小楼还有一件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便是有一位女性曾于6月1日来过一次。这位女性是我平庸生活中一点点缀，是我的昙花一现之恋爱的对象。6月1日那一天，是我二十几年来平庸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小楼便也成了我所住过的寓庐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处。她那天来时为我带来的花儿；由她亲手插在我书架上那花瓶里；为纪念她，我一直到搬家那天为止，没有忍得动它一动，虽然

花儿早已干枯了。

我于十七年11月14日搬进来，十八年11月1日搬出去。中间除了借友人彦超住了两个月外，我差不多都是住在这里。

在《怀旧居》的其二、其三中，崔万秋分别回忆了在广岛M.K家和大手町八丁目藤田家的生活。他曾和湖北的夏卓人同住。“我的留学生活之最苦的时期，便是这两年。我在这两年中，因穷苦回国两次，但因国内局面乱似鹅毛，失学青年如鲫，欲谋一饱而不可得，且备受向来以我为有望者之冷嘲与白眼，所以我仍不得不回到这凄凉的异国，继续我那人世所难堪的苦日子。我那时写的几本《穷留学之日》，现在我自己不忍重读呢。所以在藤田蛎田氏家住时的穷状，我不忍重述。”

崔万秋作为作家，他除了写过许多散文，也出版过长篇小说《重庆睡美人》，还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史》等学术著作，并翻译出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井上靖、林芙美子的戏剧、小说。

崔万秋的真面目

主编着《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崔万秋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发表着散文和小说，崔万秋是货真价实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当时鲜为人知。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我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image]
■ 崔万秋是军统上海站情报人员

这便是他的军统特务的铁证。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后来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说明；

> 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
>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凭借着复兴社之桥，“华蒂社中坚”张春桥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万秋的怀抱。

崔万秋是从张若谷手中接任《大晚报》的“火炬”副刊的。张若谷的前车之鉴，使崔万秋倍加小心。

1933年6月17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曾发表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为杨村人大鸣不平，斥责鲁迅对杨村人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柳丝”何人？杨村人的化名！鲁迅写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锋芒直刺杨村人，顺便也给张若谷带了一笔。因为杨村人在《文化列车》杂志1933年第3期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九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

鲁迅针锋相对地答曰：“先生似乎是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可怜，自诩为“小说作家”、“火炬”主笔的张若谷，竟然连挨鲁迅之“嘘”，还不够资格！

崔万秋自知比张若谷还不如。他对鲁迅笔锋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张若谷的覆辙。

然而，鲁迅雄踞上海文坛，高举左联大旗，却又是崔万秋的眼中钉。

崔万秋想找个打手，哦，张春桥来了，正是求之不得……

[image]

■《大晚报》副刊主编崔万秋曾是军统特务的证据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自然，崔万秋深知，对鲁迅正面强攻，说不定会掀翻《大晚报》上的“火炬”。

比较妥切的办法，是打拐弯球：批田军，批《八月的乡村》。田军是鲁迅扶植的，《八月的乡村》是鲁迅作序的。批田军、批《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是批鲁迅—却不是直接展开笔战。

张春桥成了崔万秋的打手。他，当然不敢用真名，最初，张春桥化名“水晶”，在上海杂志公司所办的《书报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2月10日出版）上发表。这是张春桥射出的第一支冷箭：

八月的乡村

水晶

这是本悄悄地出版的书，我现在公开地来谈它，不也大可不必么？我想，纯粹的读书人的立场客观地来说几句读后感，先生原谅吗？

《八月的乡村》告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

可是我认为美中不足的，一是司令陈柱底个性不大显明，二是萧队长那末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刻画得不够力，三是李七嫂之受日军蹂躏后，竟能够马上执枪从众，尤其是一个聪明的朝鲜女安娜，懂得下命令、裹伤口、教唱歌，给大家讲种种有意识的言论，事实，却会因为萧同志（也许是他吧）而要求“回上海”。我不是说她们不会转变（到底是没落的知识分子），我说的只是毫无线索地突然转变得那末快而已。法捷耶夫在《我的创作经验》里说：

“例如昨天某人还是一个懒家伙，但今日已变成一个突击队员了。艺术家的任务，就在表明，这个人怎样由落后转而加入突击队。为什么要这样呢？”

本书的作者就犯了这末的一个毛病—“把主人公内在阅历表现得很薄弱”，“很少观察人们的改造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希望作者在“一定还在写，写，写—”的时候，能够谦虚地参考一下法捷耶夫底《我的创作经验》一文。

张春桥摆出一副“小说专家”的架势，颐指气使的派头，在那里指点田军，把《八月的乡村》说得一塌糊涂。

[image]

■ 张春桥化名狄克写信给鲁迅并在《大晚报》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

不过，《书报展望》只是上海杂志公司为了推销书报所印行的杂志，印数不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有限。所以，水晶的这支冷箭，尚未引起鲁迅的注意。

在崔万秋的策动下，张春桥再狠射一箭：1936年3月15日—星期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冒出了一篇寒光闪闪的文章，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作者是谁？署名“狄克”。

虽说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狄姓。然而，狄克却是取义于英文“Dictator”—独裁者的字头“Dic”，足见他对法西斯蒂的崇拜。

文章一开头，便引述了一段“语录”：“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约瑟夫。”

“约瑟夫”何许人？斯大林也。这个“狄克”一上阵，便“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却吓唬别人”。

好在文章不长，况且今日的读者很难见到半个世纪前的《大晚报》，故全文照录于下，也可以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当年的狄克笔法：

>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
>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大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
>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动作者，对于他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
>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

意见。他已经在自做了！假如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①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用写另外一部，②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③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唉，狄克19岁时写的文章，以"语录"开头，以许许多多带惊叹号的口号结束，后来"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竟与他如出一辙！

周楞伽曾这么回忆张春桥写作《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时的情形：

3月初的一天午后，昭俭和我正在看书，王梦野和张春桥走了进来，桌上正好放着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于是我们便以东北作家为话题谈开了。我说除了李辉英的文字表达力较差外，其他几个作家都写得很好，尤以《八月的乡村》最为出色，所以很畅销。

张春桥一面孔妒忌地摇摇头说："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实。"我说何处不真实，他就翻开一页来给我看，是写人民革命军攻克一个村庄的情况，说："这就写得不真实。"

我说："你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怎么知道他写得不真实，世事往往出人意料，譬如我们都称东北义勇军，他这里却写作人民革命军。他从东北来，必有根据，你能说不真实？"

这时王梦野插进来说："田军就是不该早早从东北回来，要不然可以写得更好一点。"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王梦野写了那么多的文艺批评，却没有一字推荐《八月的乡村》，原来他是不欲成人之美。

这场谈话就此结束，想不到张春桥就根据这场谈话写出了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用狄克的笔名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上。[121]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狄克之谜，本来唯有张春桥知，崔万秋知。崔万秋自然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天机。万万料想不到，道出狄克底细的，竟是张春桥自己！

1936年3月15日，狄克在《大晚报》上向鲁迅放了一炮之后，鲁迅当即“拜读”了狄克的“大作”。鲁迅横眉冷对狄克，于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鲁迅把文章交给了设在新钟书店里的《夜莺》月刊编辑部。《夜莺》编辑当即把鲁迅的这一讨狄檄文，排入5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上。

《夜莺》月刊是委托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按照上海杂志公司的规定，委托发行的杂志在印出样本（清样）之后，应该马上送一份给该公司，以便老板了解内容，预估销路。

老板看毕，让人把样本送还《夜莺》编辑部。

送样本者何人？张春桥也。

《夜莺》编辑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样本，忽然发现印着鲁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页已被撕去。

“谁撕的？”编辑问。

“我！”张春桥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为什么要撕掉鲁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来仔细看看。”

“为什么要仔细看看？”

“鲁迅在骂我！”从张春桥嘴里，终于蹦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狄克？”编辑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瘦骨伶仃、戴着圆形近视眼镜、山东口音的青年。

张春桥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在激动的时候说走了嘴，泄露了天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么样呢？”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于是，《夜莺》编辑部知道了狄克之谜。

于是，鲁迅知道了狄克是谁。

于是，魏金枝、于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以上魏金枝先生的回忆，是关于狄克的秘密的一种说法。

周楞伽先生的回忆，则又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当时的情况。尽管周楞伽的回忆，在有的细节上与魏金枝先生的回忆不尽相同，但是周楞伽所说，周昭俭曾向鲁迅反映过张春桥的言行，使鲁迅对这一“文坛小卒”有所了解，这一点却是十分重要的。

> 有一天，我去四马路文化街，顺道进同安里看一下，见这新钟书局只租了一间前楼，完全是个皮包书店，可是却意外地在里面遇见了张春桥，原来他和庄启东很熟。听说新钟书局要出《二十六史》，来钻庄启东的门路，要求交一部分给他圈点断句，捞一笔生活费。庄因他苦苦央求，只好对新钟书局经理卢春生说了不少好话，把《晋书》一部分交他圈点，于是他便成了新钟的座上客。
>
> 4月的一天早上，我把过去发表在报刊上的小说编成两个集子，一本交北新书局，一本送到新钟书局，定名为《田园集》，路上遇到方之中，我问他去何处？他说去新钟。我十分诧异：“怎么你也和新钟打交道？”原来新钟代新国民奎纪印刷所拉生意，承印书刊，从中赚取回佣。方之中是把《夜莺》的稿子托他们去承印，于是我俩结伴而行。
>
> 到了新钟，方之中从皮包里拿出《夜莺》第三期的稿子来，摊在台上。我见第一篇就是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不觉好奇心动，仗着和方之中是朋友，不会见怪，便趁他和卢春生接洽业务的机会，先拿过来看。原来正是斥责张春桥的檄文，剥茧抽丝，层层痛斥，笔锋犀利之极。顿时我想到张春桥和王梦野的言行恐怕都由周昭俭向鲁迅作了反映。鲁迅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否则鲁迅怎么会在病中对这么一个文坛小卒狄克奋然作文反击呢？
>
> 王梦野对《三月的租界》中所说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一语确实大伤感情，说：“这老头子疯了，到处放流弹！”同时气得咯血了。
>
> 当我在看的时候，庄启东也凑过来看，我就把《田园集》原稿交给他，开始洽谈起来。
>
> 此时，张春桥施施然从外面进来，我忍不住说：“鲁迅批评你了！”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我说：“在《夜莺》第三期。”张春桥望望屋里的人，露出想要看又不敢启齿的神情。后来还是我和李雄商量把稿子拿了过来，我怕翻乱稿子，只抽出其中两篇鲁迅的文章。我谈《写于深夜里》，张谈《三月的租界》，无意中我偷看了一下张春桥，只见他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拭脸，天不热，不知哪来这么多的汗，脸上的神气十分尴尬狼狈，他见我看他，便涨红了脸又强作不在乎地自我解嘲道：“鲁迅先生误会了，我要去信解释一下。”
>
> 后来他果然给鲁迅去了信……[122]

周楞伽作为当事人，在这里把“张春桥—新钟书局—《夜莺》第三期—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说清楚了。

“狄克即张春桥”，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艺界暗暗传开，传入了《辛报》编辑姚苏凤耳中。

姚苏凤是苏州人，曾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当时《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编，后来日渐进步。

姚苏凤是一个笔头很快的人。此后，上海滩出现一本《鲁迅先生轶事》，透露了“狄克即张春桥”这一秘密。这白纸黑字，成为后人查证“狄克”为何许人的重要依据。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姓名。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点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

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表明跟姚苏凤关系密切。这本书是唯一透露狄克之事的书，成为三十多年后上海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

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2月，而这年9月张春桥离沪去济南。当年的张春桥是否看到过这本书，就不得而知了。

且说张春桥撕下《夜莺》样本上鲁迅的文章，固然是为了“先睹为快”—他万万想不到，鲁迅先生会这么快地对他还击，写得这般尖锐。更重要的是，他急急地朝《大晚报》编辑部赶去，把撕下的那页交给了崔万秋。

鲁迅再驳狄克

崔万秋从张春桥手中，拿过那从《夜莺》样本中撕下的《三月的租界》。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倒显得有点得意。他预料到鲁迅会予以反击的。果真，鲁迅的文章，力透纸背，鞭辟入里：“至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

不错，狄克的文章正是要“抹杀《八月的乡村》”，进而抹杀鲁迅。

崔万秋看罢《三月的租界》，和张春桥细细计议，决定由狄克出面给鲁迅写信，再攻鲁迅。

鲁迅办事细致，看出狄克的信颇有来历，不作复，却把信留存起来。迄今，这封信的原件，仍收存于鲁迅博物馆。一看原件便可一清二楚，一手张春桥笔迹！只是信末的“狄克”两字写得过分端正，显得很不自然，看得出是化名—因为人们签署自己的真名时是非常流畅、自然的。

现将狄克的手稿，全文照录于下—

敬爱的先生：

> 头几天，偶然地到新钟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关于我的。这使我心里不安好几天了；经过几天的思索，我才写这封信给先生。
>
> 关于我那篇文章，所以要写它，是由于当时读到《新文化》以及其他刊物上对于某些作品的忽略或批评的不够，先生知道的，是一片“好”。我希望我们底批评家多做一点工作，对于读者作者都有益的。
>
> 固然在这连投枪也很少见的现在，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是应当给以最高的评价的。然而，敬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掷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呢？如果说要的话，我底意见便在这里。我希望这投枪更加尖锐、雄壮，绝没有想把它折断。对于田军，像对于每个进步的作家一样，我是具着爱护心的。写那篇文章也似乎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
>
> 但是，先生，对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是有理由的，现在却不必说了，因为他和萧红已经回来了，从那血腥的世界跑到这个血腥的世界里来了，而又献给了人们《八月的乡村》这部书，我还说什么呢？说出来，只能使我们当中有了误会和

隔膜。—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什么误会太大的地方。

我所要说的话，似乎就是这些。总括一句就是希望先生能够明了我底原意，虽然《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

同时，我还有意见告诉田军，也想在下次信里说。

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

祝福你底健康！

狄克

信末没有写年月日。不过，从1936年4月28日鲁迅日记中查到“午后得周昭俭信，得狄克信”。因此，狄克寄出此信当在4月26日或27日。

《夜莺》三期的出版日期为5月10日。狄克早在4月26日左右便看过了《夜莺》样本，还进到编辑室，出版《夜莺》的新钟书店看过了鲁迅《三月的租界》的手稿，足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神通颇为广大。

这里要顺便提一笔，自从笔者的《张春桥传》出版以来，由于书前附有狄克致鲁迅那封信的影印件，有些细心的读者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image]

■ 张春桥化名狄克写给鲁迅的信

[image]

■ 张春桥“1976年2月3日有感”手迹

湖南省塑料工业公司技术科师德培、云南思茅县通商路萧龙云、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矫逸阁以及张汉成、张晶、蔡晋萍、夏合社等读者给笔者来信，提出了疑问：

“张春桥的信写于1936年，为什么会有二十几个简体字—头、几、书、里、关、这、过、当、读、对、点、庄、从、说、为、只、们、会、还、伤、时、诉、许、报、坛？”

这些读者怀疑书中所附的原件手迹不可靠，也许是抄件，抑或是伪造的。

在这里，我先要说一说那份原件的来历：张春桥当时化名“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不仅被鲁迅保存了原信信纸，还保存了信封。信封上写着“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转交周豫才先生启狄克缄”。这信封原件也在鲁迅博物馆保存着。

另外，也不妨把狄克1936年这封亲笔信与他写的《1976年2月3日有感》手迹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笔迹完全相同，可见狄克的笔迹即张春桥笔迹。

读者们提出的简体字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答复。《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固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23次会议通过，在1956年1月29日公布，但简化汉字并非直到那时才有的。

其实，简化汉字自古便有。为了书写的方便，古人已经开始简化汉字，尤其是草书。

例如："禮"字写作"礼"，"從"写作"从"，"東"字写作"东"，"聲"字写作"声"等等，古已有之。

1923年的《国语月刊》曾出版《汉字改革号》，钱玄同先生便呼吁进行"汉字革命"，主张"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陈望道先生也在1923年6月18日《民国日报》发表文章，主张那些"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我们都可以在各种正式的文章上用起来，而且应该依此方法把原来没有简体字的添造出简体字来，使得写也便利些，学也便利些。"

1935年，陈望道先生在他主编的《太白》半月刊第11卷第11期上，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一文，主张把"手头字"（书写体）变成印刷体，因为"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太白》杂志刊登了"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张春桥所用简体字，亦即当时书写时已经通行的"手头字"。巴金、胡风、郁达夫、老舍等二百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推行手头字"，《太白》率先用"手头字"排印。

由此可见，张春桥写给鲁迅的那封信的原件是真实的，不论从笔迹、从原件及信封加以查证，还是从当时流行的"手头字"加以考证，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至于解放后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的大多数是已经流行的"手头字"，符合广大群众的书写习惯，所以很易推广，为大家所接受。

如今，即使在香港、台湾，人们书写时也常用简化的"手头字"，只有报刊上的印刷体才用繁体汉字。不过，不久前我接待台湾作家黄海先生，我发觉他送给我的名片上，那"台北市"也印为简体。

另外，发表于1935年第2卷第1期《太白》上著名作家、画家丰子恺先生的《我与手头字》，此文与张春桥给鲁迅写信的时间相近。从丰子恺先生的手稿中，亦可看出，他也用了许多简化字，如头、气、时、与、沪、么、压、应、声、虽、归、虫、丰、旧、医、边、丽、写等。

由此可见，狄克写给鲁迅的信，确实出自张春桥之手。

狄克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可爱：他对《八月的乡村》的批判，只不过"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

末了留言"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倒

是和盘托出这个狄克跟崔万秋的亲密关系。

尽管狄克非常“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鲁迅知道此人的来历和背景，不予复信，却又著文挞伐之：4月28日鲁迅“得狄克信”，30日便写《〈出关〉的“关”》一文，再一次批驳了“狄克”。

当时，鲁迅正在病中，“骤患气喘，我以为要死”，体重剧降至37公斤。半年之后，鲁迅沉疴不起而永辞人世。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其中的两支便是张春桥射来的。

5月4日，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又一次提及了狄克：“4月11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鲁迅所说的“作二文反击”，这“二文”便是《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可见，鲁迅对于“不绝的来打击”的“狄克”“这一流人”，是何等的愤慨和轻蔑。

5月19日，鲁迅收到某人于18日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再一次提及张春桥。信中说：“为了加强文艺家协会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很希望先生参加，而且负起领导的责任。为了使先生知道我们的愿望，我又提议由文学青年社负责联络青年文艺社和上海青年文艺界救国联合会，共同签名写一个信给先生。当然大家都是赞成的，于是当场推定王梦野和张春桥等负责办理这件事情。……”

5月25日，鲁迅在致一个名叫时玳的文学青年的信中，谈及了“文艺家协会”之事：“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生病，俟愈后，重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触接触，就会明白的更多。……”

5月23日，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则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红皮白心的张春桥

一张时间表：

1936年4月16日，鲁迅作《三月的租界》。

1936年4月30日，鲁迅作《〈出关〉的“关”》。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中国文坛主帅倒下。

哀音不绝。左翼作家们痛悼鲁迅的离逝，痛斥在鲁迅重病中“不绝的来打击”的“狄克”之流。

人们常常惊讶于魔术师的化身术，演员的变脸术，岂料19岁的张春桥便已谙熟化身术与变脸术，在鲁迅辞世之后，作了“精彩”表演。

此时此刻，张春桥居然也挤出了鳄鱼的眼泪，赶紧把自己化装成“鲁迅的学生”。这个文坛无赖，竟也写起悼念文章来了。

主意是崔万秋出的。发表的场所，自然又是《大晚报》上那“火炬”副刊。发表张春桥“痛挽”鲁迅的文章，既为狄克洗刷，也为“火炬”添点“革命”的色彩。

那是在鲁迅溘然而去后的第二十天—11月9日，《大晚报》上“火炬”耀目，赫然刊出了《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署名“春桥”。

这样冠冕堂皇的文章也很值得一读。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张春桥从唱白脸一下转为唱红脸时，功夫也很地道：

> 从万国公墓回来，虽然两只腿已经很累了，精神并不感到疲倦。躺在床上，望着堆在屋角的书籍，“鲁迅”那两个字，发着光，而且站立起来了。那是一位巨人，他手里握着一支笔，眼睛向前面注视着。他准备战斗。
>
> 我不能把死和这位巨人联在一起！
>
> 他没有死！
>
> 但是三天来的事实（此处“三天”指鲁迅死后三天出殡，即十九日去世，二十二日安葬—引者注）却告诉我们，他底肉已经不能再跳动了，血脉不能再流了，他安息在土地里了。
>
> 在殡仪馆里，替那些人缠黑纱或者领着他们往灵前致敬的时候，我一直被理性压着：不要感伤，不要流泪，他没有离开我们呵！
>
> 当夜色浓厚地压在四周，灵堂里沉寂了的时候，夜来香散着沉重的压得人不能呼吸的气息。

我们脚步放得轻轻的，一点声音也不得发出来，走向灵前，先生静静的躺在那里，好像还在呼吸，不，好像少微休息一下身体，那倔强的头发，粗野地，像一根根投枪一样长着，两撇胡须下面，嘴唇闭着，好像正思索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

他没有离开我们呵！

为什么送这些鲜花呢？为什么送这些挽联呢？

“失我良师”，“我们底朋友”，“鲁迅老师精神不死”，“鲁迅先生永远存在大众底心里”。

我望着那些字，心里的情绪，是说不出来的。

—为什么要说他“精神不死”呀，先生底肉体不是还安静地躺在那里吗？

从灵堂出来，水银灯照得我们底脸发着惨白的颜色，草地上整齐的草，和边上的树，都像挂了霜一样。

在灯光下漫步着，空气凉起来了，我们才回家。

21日下午三点钟，我们站在灵前，看着换了衣服，抬在棺里，我无论如何压制不住情感了，我底头埋在手里，听着四周哭泣的声音，手绢湿了。

这里，我发觉到并没有盖棺，和我们隔得不远，只是一层透明的玻璃，先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休息。

哭了，狄克哭了！写得多么虔诚，多么感人。小小狄克，两面派手法已经颇为到家了。难怪，他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明里是人，暗中是鬼，对于这种化身之技，变脸之术，他早已颇为精通了。

稍过些日子，“春桥”又在1937年3月的《热风》杂志上，发表另一“纪念”鲁迅的文章，名曰《速写红萝卜》。其实，他本身便是白心红皮的红萝卜，居然替别人“速写”起来：

……本来，一位战士死了，他底论敌，那些苍蝇们，就嗡嗡地响起来了，围绕在战士底身边，或者胆怯地从他身上飞过去，说：“他曾经有过错呀！”并不足怪。而且，耳耶在《鲁迅底错误》（发表在当时的《嘤鸣杂志》—引者注）里已经说过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对于苍蝇们，我们是认识的，他们底本领就是如此。最讨厌的，却是那些披着战士的衣裳的苍蝇们，他比较聪明，他会比较多样的本领，他能够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噔声。……

[image]

■ 张春桥在《大晚报》以及《热风》发表的文章

这里所说的“摇身一变”、“化个名儿”，不就是这位“春桥”夫子自道吗？

最妙的是此文结尾一段，简直写得出神入化了：

我们作读者的，只能紧紧地盯他们的梢，看看他们到底作什么

鬼把戏，不过，要记着，他们是最会变的，最最会化名的（林彪的习惯语“最最”，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已“应用”了—引者注），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的。我们记着这一点，什么都好办，把手里的苍蝇拍握好。把棍子拿结实，把从角落里爬出来的，鲁迅先生还没有打死的落水狗、苍蝇瞄准确。

记得神话里常常提到那些怪物都有一张“皮”，可以因为披与不披而变化无穷，我们就记着那张皮吧。

幸亏有人盯张春桥的梢，知道这个“最最会化名的”、用过“狄克”的化名，还曾化名何闻、子渔、李怀之、蒲西、安得、路宾、何泽、龙山、子执、吴松、齐索……

倘若那个狄克被滑走的话，那么，留下来的只是那些署名“春桥”的堂而皇之的“战斗文章”，张春桥俨然就是“革命战士”了。

难怪，在“炮打张春桥”浪潮中，揭穿了“张春桥＝狄克”这一老底，张春桥怒发冲冠了……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下，1987年12月19日香港《文汇报》曾在“旧闻新编”栏目内，发表《萧军怒打张春桥》一文。虽说内中情节是否准确尚有待查证，不过，写得幽默风趣，倒是值得一录：

鲁迅先生逝世后，正在日本的萧红立刻赶回到上海。当天就和萧军到鲁迅先生墓前拜祭。他们在墓前焚烧了先生生前倾注大量心血编辑的几本刊物和萧红在东京为先生买的画册，寄托哀思。

这次祭扫，不知怎么竟让狄克得知，从而引起一场文坛武斗。

这狄克乃张春桥化名，在当时的文艺界还算不得一个作家，曾放暗箭，攻击《八月的乡村》和鲁迅先生，遭鲁迅先生著文《三月的租界》痛而击之。狄克外表斯文，却是个无事生非之徒，他听得二萧拜墓焚书，便又在《大晚报》上攻击二萧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烧刊物是传播迷信”等等。狄克当时以左翼自居，却和敌人一鼻孔出气。这使萧军很气愤。

萧军找到由国民党出钱、雇狄克打着“左派”旗帜为他们说话的《大晚报》社址，冲进编辑室，对狄克和他的走卒马吉峰说：“我没功夫和你们拌嘴，我就是要揍你们。你们能打过我，以后悉听尊便，不再找你们。如果打不过，你们再出这样文章，我是见面就揍你们三通！”

一场文坛武斗便开锣了。某月的晚上八点，双方都按约而来。萧军一对二。狄克用拳护住脸，学着西方拳击的样子，两脚上下摆动就打来一拳，萧军轻轻一挡，顺势一个扫膛腿，狄克跌了个仰面朝天。高个子马吉峰忙护着狄克，把他抱到一边大树下去喘气，回来朝萧军就一拳打来。这小子虽有点功夫，焉是萧军的对手，三拳两脚，这小子就趴下不动了。

这小子不服，又爬起来再战，不出一个回合又趴下了。连打了三次，马吉峰终于告饶啦！“萧先生，我服输，以后再也不敢

了。”“那么，文章呢？”萧军问。“再写那样文章剁手指，本来也是他（指狄克）叫我写的。”

这文坛武斗传为美谈，后人写有打油诗一首，以为赞：

萧军怒打张春桥，狄克三魂吓出壳。
狗头军师结“四帮”，老萧为此险遭刀。

[115]张春桥：《另一个问题》，1934年7月16日《中华日报》。

[116]张春桥：《济南文艺界简报》，1934年7月26日《中华日报》。

[117]张春桥：《关于臧克家》，1934年11月29日《中华日报》。

[118]蒋星煜：《陶金与张春桥的恩师阎哲吾》，《世纪》1998年第4期。

[119]周楞伽：《鲁迅写作〈三月的租界〉前后》，《上海文史》1993年第1期。

[120]1988年9月8日下午，叶永烈采访施蛰存于上海。

[121]周楞伽：《鲁迅写作〈三月的租界〉前后》，《上海文史》1993年第1期。

[122]周楞伽：《鲁迅写作〈三月的租界〉前后》，《上海文史》1993年第1期。

第五章　张春桥的发迹

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1935年5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1937年9月3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1938年5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1卷第5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1938年3月17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1950年亲笔填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1936年4月入党，怎么到了1938年8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 我1932年9月被捕，1935年7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1936年4、5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

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在1976年10月18日所写的证明也清楚表明：

1936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

1976年10月18日

原来，张春桥在1936年4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跟江青相差无几，因为1937年8月13日，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30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37年10月4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16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上海山阴路—引者注）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20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1938年4月5日《战地》半月刊第1卷第1期上的《韩复榘》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9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1937年9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1937年12月25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子当为1937年12月18日。

在济南，张春桥度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里，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卿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18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弼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弼。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1905年，比张春桥长12岁。后来，他用赵福成这名字。

赵福成颇有来历：1930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1936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东关分局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1976年11月13日，赵福成写下这样的材料：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君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县人，家庭地主。

1930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1931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1936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邱县长，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1936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校调查统计室主任王泰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

我参加复兴社后，回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1939年9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

内有两只密令。

第一只密令写：

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承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连［联］络人员去取情报。

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章）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

第二只密令写：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赵福承

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里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

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

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秘。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1937年12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春桥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

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

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听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

1976年11月13日[123]

1950年，赵福成在劳改队曾写下这样的亲笔供词（节录）：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赵福成写

1950年6月16日

[image]

■ 赵福成在1950年关于张春桥的交待

赵福成的这一供词，是在张春桥倒台之后，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案卷中查出的。

在供词中，"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颇为奥妙。1976年11月14日，赵福成对他1950年在劳改队亲笔供词写下说明：

关于我1950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所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

解放后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1937年9月，复兴社秦启荣密令

我留下，准备打入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之后，张春桥就果然去我家居住了。这年12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

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件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赵福成
1976年11月14日

就在赵福成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东关分局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1976年12月20日，胡彰武作如下的交待：

1937年7月我经秦启荣介绍在济南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充当机要交通员，经常为复兴社传送机要文件。1937年9、10月间，秦启荣在指挥巷十八号会客室，交给我两封密信，叫我给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给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转给赵君弼（注：赵福成）的。秦启荣考虑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还叫我嘱附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济南，参加日伪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单，填好年月日，听候命令。我将这两封信都交给了柏俊生。柏将给赵的那封信收下后说："我交给君弼吧！"然后，柏将秦启荣给他的那封信拆开看，这时，我就把秦嘱附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关于秦启荣给赵君弼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124]（原名胡宪文）
1976年12月20日

赵正平也口述了证明材料《秦启荣要我给赵君弼传信的情况》：

1937年秋天，日寇侵入济南前，我为秦启荣转过一封信给君弼。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赵君弼来我家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的。[125]

赵正平　口述（章）
柏良　整理（章）
1976年11月26日

张春桥在日本侵占济南前离开了。后来，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

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1987年10月13日，95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image]

■ 张春桥填写的干部登记表否认自己曾经参加反动党团

>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1937年的12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
>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从张春桥一路上跟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接触，表明当时的张春桥的思想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也错综复杂。不过，复兴社的山东头目赵福成那句“我知张，张不知我”，表明张春桥已经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大门口，而他的脚尚未迈入。不然，那就是我知张，张亦知我了。

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
> “欢迎陕公（即陕北公学—引者注）唱歌”！
>
> “欢迎党校唱歌”！
>
>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
>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
>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张春桥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借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1938年8月16日，主编便是邓拓。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1948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37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邨”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摩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 战争年代，大家忙于战争，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捷径，就是寻章摘句。
>
> 马列主义的精华，在于每篇文章的警句。寻章摘句，就是摘马列主义的警句，背马列主义的警句，用马列主义的警句。这是最节省时间、效率最高的学习方法。
>
>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的。我的文章中，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的警句，就是这样“寻”来的……

抽着用废报纸卷着的土烟卷，张春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自己的“寻章摘句”法。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社长兼总编邓拓，听着听着，双眉紧锁。邓拓没

有作声，因为作报告的毕竟是副总编。

张春桥作完报告，又把“寻章摘句”法写成文章，要登在《晋察冀日报》上推广。

邓拓不能再忍耐了，他，压下了张春桥的大作。

狄克发怒了，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

一封告状信，送到了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那笔迹，跟当年狄克写给鲁迅的信，一模一样。

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信任邓拓，使狄克告状失败。历史的现象，常常周而复始。“文革”开始之际，狄克伙同姚文元整邓拓，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只是这时狄克已经得势，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下去。

晋察冀之恋

1943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26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干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北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嗯。”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的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巾帼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中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17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 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她投奔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1943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10月1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1944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1943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1944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杳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写有“李岩兄”那熟悉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1945年5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1943年12月8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27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般的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挨。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颜面。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历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image]

■ 张春桥妻子文静所写的交待

1945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 爱人姓名：文静。
>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 （注二）是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1945年8月25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炮声隆隆，一彪人马朝城里杀来。

国民党军队稍战即溃。石家庄落入了晋察冀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手中。

《石门日报》在石家庄出版了。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尽管文静对于石家庄有着痛苦、恐怖的回忆，生怕重新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露面，会被过去的熟人认出“东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随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庄深居简出，唯恐在街上遇见当年她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节目的观众。

张春桥在石家庄却很得意，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邓拓，而是情投意合的“柯大鼻子”。

柯大鼻子只因长了个大鼻子，得了这么个雅号。当面，人们则总是用亲切而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庆施同志”。

早年，柯庆施的雅号叫“柯怪”。那时候，柯庆施还不是“首长”，人们当面直呼“柯怪”，他倒也答应，不以为怪。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

那是1923年，“柯怪”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

>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柯庆施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人氏，比张春桥年长15岁。

论革命，柯庆施的资格是很深的：1920年，18岁的他，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20岁的他，“团转党”，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

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

1935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

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

就在张春桥来到石家庄不久，柯庆施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在当时，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

《石门日报》易名为《石家庄日报》。作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长，张春桥跟柯庆施有了密切的接触。

46岁的柯庆施很快就发觉，31岁的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人。张春桥被柯庆施看中了，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在张春桥看来，柯庆施是一把梯子。柯庆施与中共上层领导有着很深的渊源。在《晋察冀日报》社郁郁不得志的张春桥，把政治腾飞的希望寄托于柯庆施。

在石家庄的这一段共事，后来成为张春桥“跃龙门”的契机。

1948年9月13日起，石家庄的天空上连续五天出现“下蛋”的“铁鸡”。国民党空军对石家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狂轰滥炸石家庄，国民党军队期望正在猛攻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师北援。

可是，9月16日夜，济南城外还是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回师，而是对济南发动总攻。八天之后，济南城头升起了红旗。

济南解放才十几天，济南的《新民主报》忽然登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张春桥的《寻人启事》：

> 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作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南作医生……

其实，张春桥完全用不着刊登《寻人启事》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那么多的亲友去济南，在巨野，写信问一声，也就“寻”到了。何况，济南已经解放，通过组织查问一下，这么个颇有身份的张开益，是很容易“寻”到的。

张春桥与其说是刊登《寻人启事》，倒不如说在报上向当年的华蒂社、复兴社的故朋旧友们发表声明：我张春桥如今已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已经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了！

1948年10月，张春桥衣锦荣归，与文静一起来到济南。当他举杯与父母庆贺团圆时，脸上漾起了平日难以见到的笑容。

取恽逸群而代之

阔别大上海十二载，狄克终于回来了！

这一回，不再在福州路当张静庐手下的小伙计，却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走马上任之后，张春桥才意识到这个“副”字，太碍手碍脚了。

正局长何人？大名鼎鼎的范长江，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震动全国的系列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有着很高的声望。

刚进上海，范长江还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在范长江之下、张春桥之上，还有个副局长恽逸群。

比起张春桥来，恽逸群的资历要深得多：早在1927年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张春桥还不过是个10岁的娃娃。1935年，恽逸群铁笔一支，为上海《立报》写评论。在那几年之中，他“每天写的四五百字的评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人民的主要参考材料，从那里揣摩时局动向和斗争的方针、方法。塔斯社奉命要逐日一字不漏地电告莫斯科……”后来，他进入解放区，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有着这么两个在中国新闻出版界广有影响的人物在前，张春桥当个“老三”，做个“配角”，心中不是个滋味。

总算范长江走了，调往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而恽逸群成了正局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

在张春桥看来，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

最使张春桥感到不快的是，恽逸群跟邓拓一样的嫉恶如仇，不留情面。诚如恽逸群在其自述中所言：“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对表里一致的人本是平常的事，但对于心中有鬼者，就必然既怕且恨，就要置我于一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是个“心中有鬼者”，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苦于没有机会。张春桥对《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宁可不要副局长的空名，巴不得拿到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恽逸群绊了一跤，张春桥趁隙而入，夺得了那把金交椅。

事情发生在1951年9月3日凌晨。

9月2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到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日本宣布正式投降。于是，9月3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51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纪念日。

这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9月2日电讯，醒目的标题为：《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

然而，当人们翻开同日的上海其他报纸，发觉比《解放日报》多了一条电讯：《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

奇怪，《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呢？《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于斯大林大元帅有看法？

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上海新闻界，顿时议论纷纷。

消息飞快地传入恽逸群耳中。他风风火火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调查其中的缘由：

>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上海新闻界，通讯设备非常落后。新华社的电讯，要靠新华社华东分社接收、油印，然后派通讯员分送到各家报社。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先发，所以到了9月2日夜间，电文稿已分送到上海各报社。可是，斯大林的复电，是9月2日上午九时二十二分从莫斯科发出的。这时，相当于北京时间十四时二十二分，亦即下午二时二十二分。经过俄译中，再经过译成电码，发到各地，又花费不少时间。当新华社华东分社把斯大林复电稿送到上海各报社，已是9月3日凌晨三时。《解放日报》社总务科的一位同志收了电讯，以为是一般公文，没有在意，于是，9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便漏登了斯大林的复电。

本来，这很明显是一桩因一时疏忽造成的新闻事故。为了挽回影响，恽逸群采取补救措施，在9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补发新华社9月2日电讯：《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

这“九三事件”，到此应该可以画上休止符。

可是，过于正直敢言的恽逸群，得罪过一些人。此时此刻，他们抓住“九三事件”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便是张春桥。

面对种种责难，磊磊落落的恽逸群承担了“九三事件”的全部责任。

9月5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左下角，刊登了恽逸群的公开检查：

关于本报漏登《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电文的检讨

9月3日，新华社于晨十二时四十分截稿（应为零时四十分—引者注），三时又补发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的稿件，这时，编辑部同志都已回宿舍，而总务科值夜班的同志又将稿件压下未通知编辑部同志，致将这一重要稿件遗漏了，造成严重政治错误。这是因为我们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保证不重复同样的错误，除在此预先向读者致歉外，我们正遵照华东局的指示，继续进行深刻的检讨，并听候党委的审查。

社长　恽逸群

恽逸群的公开检讨，本来意味着“九三事件”的结束。不料，事态进一步扩大。几天之后，竟导致了他的下台！

张春桥取而代之，走马上任，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

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

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

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压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点一两个部、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名。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狄克今非昔比，成了上海的大员、要员。

那个被撬下台的恽逸群，从此蒙受了一连串的打击。

几个月之后，他受到“三反”运动的猛烈冲击，开除党籍，降为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1955年，受潘汉年冤案牵连，他被捕入狱达11年之久。

1966年冬，他才终于出狱，被派往江苏阜宁县中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每月工资仅37元。他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文革”风暴又把他卷入无休止的批斗之中。直到1978年9月，73岁的他，才算被调往南京，在国家第二档案馆工作。他仅仅过了两个多月的人的生活，便于12月10日油尽灯灭，溘然去世。

在这位老革命、优秀中共党员、优秀新闻工作者、优秀学者离世几年之后，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1973年7月8日，身处逆境的恽逸群在致胡愈之的信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话语：“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圭未蹈虚愿。”

就在恽逸群一步步跌进地狱之际，张春桥直上青云。

张春桥坐镇《解放日报》

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9点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309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9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126]，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30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板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滋滋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惊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9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道地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粽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已打了好几处补钉了……

他的楼下，住着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姚文元。曾经先后与张春桥、姚文元为邻的王维，对两人作了有趣的比较[127]：

>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
>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
>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文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大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作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1967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唯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予以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标准付给稿酬。

1954年1月，张春桥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真理报》代表团成员，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益发得意了。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1954年秋，上海香山路9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

王维记得[128]，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1949年10月1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1958年10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28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5月11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柯庆施、张霖之。

1949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1954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柯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入京的消息。

柯庆施与张春桥曾在石家庄共事，相处不错。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柯庆施问道。

“是的，调令已经下达，调我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这下子，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工作，跟党中央那么的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了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浪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此人30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里。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9号。

[123]《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第20—21页。

[124]胡彰武，1960年判刑，1962年保外就医。

[125]胡彰武将秦启荣的密信交柏俊生后，由柏的老婆赵正平转交赵君弼即赵福成。柏良，赵正平之子。

[12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127]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128]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第六章　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姚文元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上海是个人才济济的大都市。一个文学青年想在文坛上“冒”出来，并不容易。

文学青年姚文元虽然在文学的道路上行进多年，但是在上海的文坛上显露头角，却是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

大约由于胡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艺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约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彭柏山、王元化等（后来他们都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抵制对胡风的批判，于是上海的批胡风运动如同温吞水一般。说冷吧，报上稀稀拉拉也登一点批胡风的文章；说热吧，那些文章如同隔靴搔痒。

1955年初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便是一壶温吞水。会议在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中进行。

忽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由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姚文元同志发言……”

一个24岁的青年拿着一叠厚厚的发言稿子上台了。姚文元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批判调子唱得最高，鼎沸了！

这也难怪，他因为写《论胡风文艺思想》，熟知胡风观点，如今“反戈一击”，便也显得更加深刻！

姚文元不时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念着发言稿：“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他口口声声都似乎是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或崇拜教条的人，可能被他给党中央报告中堆积满篇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吓倒。他的理论的危害性首先就在这里。披着羊皮的狼比满口鲜血的狼是更容易害人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在作了这番“剥去‘外衣’”的开场白之后，姚文元“揭穿”了胡风“歪曲

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曰“断章取义”，二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三曰“硬搬教条”。

于是，姚文元给胡风“上纲”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这种现象并不是从胡风才开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都曾经这样做过，胡风先生不过是因袭他们的那套笨拙的策略而已。……”

台下，老作家魏金枝听了姚文元这番“宏论”，拍了拍姚蓬子的肩膀，微微一笑：“令郎大有出息！”

姚蓬子听不出这话饱含冷嘲，得意地咧开了嘴巴。

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很注意听着姚文元的每一句话。他向来是一个擅长幕后活动的人物，总是自己出主意，让打手写文章。眼下，他正为发现了一个“左”字号的打手而暗暗得意。

虽然事先在屋子里关着门，把发言稿念了几遍，然而，姚文元上台之后，念得还是结结巴巴。他不时瞪大了眼睛，口沫不断地溅到稿纸上……好不容易，他总算结束了发言—这次批判会上最长的发言。

这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亮相—一副标准的“左”派嘴脸。

由于某人的提议，姚文元的发言稿被转到《文艺月报》编辑部，“登一下吧”！

《文艺月报》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主编为巴金，副主编为唐弢、王若望。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唐弢和王若望对姚文元其人，都眼生得很—虽然他们都认识姚蓬子，却并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的公子。

姚文元呢？他对《文艺月报》倒是颇为熟悉的，已经不止一次向这家有声望的文艺杂志投稿了。

唐弢主管理论文章，他已一次次给姚文元退稿。他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个通病：充满空洞的政治口号，缺乏理论深度和独到的艺术见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上海巨鹿路675号那幢小楼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要找王若望。

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也是《文艺月报》编辑部办公的地方。

年轻人收拢八字脚，尽可能使自己的双脚笔直地在楼道上走过。

“我叫姚文元，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工作证，然后毕恭毕敬坐在对面。

王若望[129]这才第一次知道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不知道来者何意。

“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年轻人打开了拎包，拿出一大叠稿子和信件，放在王若望面前。刚放毕，他的手就缩了回去，规规矩矩放在两个膝盖上。他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王若望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非等闲之辈。王若望原名王寿华，只因崇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取“约翰”法语谐音“若望”为笔名。王若望用目光扫了一下那些信件，上面都盖着《文艺月报》编辑部公章，一封封都是退稿信。

“您看，能不能选一篇登一下，扶植一下青年作者？”姚文元遇上紧张的气氛，讲话不由自主地有点结巴起来。他退了一步，又说了一句：“或者把几篇稿子合并一下，并成一篇，登一登？”

看着姚文元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王若望说道：“你把稿子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姚文元连声说“谢谢”，倒退着走出编辑部的门。

姚文元走后，王若望把这一大叠退稿，又转给唐弢。

这一回，唐弢仔仔细细地又“拜读”了一遍，唉，满篇枯燥的政治术语，哪是文艺理论文章！

“还是退稿！”唐弢实在挑不出一篇来，也无法“并”出一篇，只得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退还给“青年作者”姚文元。

由于有着这么一番经历，姚文元对《文艺月报》敬而远之。

这一回，由于上海作协某领导的提议，要求刊登姚文元的发言稿，况且那时《文艺月报》又正缺批胡风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在1955年3月号上刊登，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了。姚文元要以“青年文艺理论作者”的身份，在堂堂的《文艺月报》上露脸，他喜不自禁了。

姚文元结识张春桥

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笔者说[130]：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给他打来了电话。

“王老师，我的文章的清样，能不能多打一份给我？”姚文元问。

“对不起，我们《文艺月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王若望很干脆地回绝了。

“是这样的……”姚文元解释道，“春桥同志要看一下清样。”

一听说张春桥要看，王若望只得答应下来：“那就破例吧—我们多打一份清样，直接送张春桥。”

“谢谢！”电话挂断了。

张春桥怎么忽然关心起姚文元来了？王若望望着桌上的电话机，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张与姚，在“四人帮”中占了一半。张、姚在“文革”中，几乎“齐步”前进：当张春桥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充任组员；在“一月革命”中，当张春桥夺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宝座，姚文元则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张、姚双双作为“文革派”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在中共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勾结，其实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张春桥跟姚文元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的“友谊”渊源于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条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几条中的一条。它全长不过二百米长。

林荫夹道，闹中取静。

香山路属卢湾区。当年姚文元所住卢湾区团委的宿舍，在香山路2号。上海的《解放日报》社虽然坐落在外滩附近的汉口路，而报社领导却住在香山路9号。当年的张春桥，住在9号内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底楼

住着副总编王维。姚文元的住处与张春桥的住处，相距不过几十米而已。

做着作家梦的姚文元，听说《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就住在咫尺之内，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会议上，姚文元见到过张春桥，听过张春桥的讲话。不过，张春桥并没有注意这个卢湾区的通讯员。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叩开张春桥的家门，张春桥的态度是冷淡的，敷衍着跟他谈话。

姚文元就像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样，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卢湾区团委宿舍里，跟你是邻居。”

张春桥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嗯、喔”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

姚文元似乎也发觉张春桥的冷淡，于是，他终于说起自己见过鲁迅呀，说起了父亲姚蓬子。

一听说面前的年轻人是姚蓬子的儿子，张春桥站了起来，从柜里拿出几颗淡黄色的粽子糖。

姚文元提及了父亲是“鲁迅的战友”，本意是借此引起这位张总编对自己的重视，想说明自己并非一般通讯员，而是出自“书香门第”、“作家之家”的“新苗”。

张春桥确实因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这才看中了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混迹于上海文坛的张春桥，当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张春桥很喜欢那些有着“小辫子”可以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听计从。

若干年后，当姚文元成为张春桥手下颇有名气的“棍子”时，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张春桥忽然讲起了“白蚂蚁政策”。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说道：“白蚂蚁会从内部蛀空大厦，这是谁都知道的。国民党居然从白蚂蚁身上得到启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政策，本来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后来，改变了政策，诱逼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叛变，再放回去。这些叛徒就成了白蚂蚁，从内部蛀空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蚂蚁政策’，是从姚蓬子开始的……”

讲到这里，张春桥用眼睛瞟了一下姚文元，只见姚文元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

后来，姚文元即便因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名震全国”，即便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始终对张春桥俯首帖耳，成为张春桥的“亲密战友”。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那天，张春桥言语不多，留在姚文元脑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理论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政治家。要随时随刻注意政治风云的变化。我这儿消息灵通。有空，过来坐坐……”

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破天荒，一辆小轿车停在中共卢湾区委门口，说是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社开批判胡风座谈会。

姚文元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礼遇，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宣传部办公室。

1955年3月15日，姚文元的大名赫然印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而是整整一大版。那文章的标题，显得颇有气派，十足的“革命”味儿：《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

这是姚文元从发表处女作以来，惨淡经营了六年之久，第一次发表的“有分量”的文章。

当天晚上9点多，姚文元就来到张春桥家里，说了一番出自心底的感激的话。确确实实，没有张总编的支持，当时的无名小卒怎能在堂堂的《解放日报》上打响这一炮？

“吃，吃，吃粽子糖。”张春桥又一次端出了搪瓷碗。

“粽子糖真好吃。”姚文元又用两个手指撮了一颗粽子糖，塞进了嘴巴。

“跟胡风的斗争，还会升级。”张春桥吞云吐雾，透过袅袅青烟，把重要的动向告诉了姚文元，“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央会有新的部署。在上海，敢碰胡风的人不多，尤其是硬碰、真碰的人不多。你还可以给《解放日报》写几篇！”

铭心刻骨，姚文元感激张春桥的栽培。

张春桥果真对来自中央的消息非常灵通。经过他的亲自安排，姚文元以反胡风的“英雄”的姿态，在5月份的《解放日报》上出现了。

5月7日，刊出姚文元的《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

5月9日，《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

5月11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

如此隔日一篇，姚文元名声大振。

最令人震惊的是，不早不晚，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几整版的篇幅，刊出关于胡风等人的第一批材料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发表了毛泽东以编者名义所写的那著名的《编者按语》。批判胡风，不再是学术性的批判，而是提高到“反党集团”（自6月10日起改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

多亏张春桥提供了重要信息，姚文元能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表的前夕，抢先抛出三篇批判文章，戴上了“先知先觉”的光环。

紧接着，5月17日，姚文元又在《解放日报》上登出《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那是“看了5月13日《人民日报》上舒芜所揭发的胡风反党活动的材料”，姚文元“感到愤怒”，于当天深夜赶写此文。姚文元写道：“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更可以看到一个极端黑暗极端无耻的灵魂，一个被狂热的唯心主义和最下贱的政客手段所养育着的丑恶的灵魂……”

姚文元对胡风泼尽污水，最后，发出如此“誓言”：“我表示：我要尽一切力量继续投入斗争，我也希望进一步动员我们的思想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卑鄙的罪恶行为，两面派恶劣手腕，给以十倍的还击。”

一星期后，《人民日报》登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同时刊出毛泽东写的《驳“舆论一律”》。

又过了一星期，6月1日，姚文元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的文章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这篇文章是经张春桥审定、推荐，而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当《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张春桥当即嘱令《解放日报》于6月3日转载。

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的调子唱得更高了：

>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目的，他们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和使反革命政权复辟的阴谋，现在是赤裸裸完全暴露出来了。
> ……
> 我要求把胡风反党集团全部阴谋活动彻底追查清楚。
> 我要求对党的死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胡风依法予以惩办！

1955年上半年，对于姚文元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他发表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半数登在《解放日报》上。他作为“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于是乎，他给自己插上了一根美丽的羽毛，曰：“青年文艺理论家”！他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就这样，姚文元靠着批胡风起家，靠着张春桥往上爬。他所写的

《论胡风文艺思想》，竟奇迹般变为他批胡风的资本。

从此，他把见风使舵当成看家本领，把“反戈一击”当作“成功秘诀”。他成为文坛上的投机商。

姚蓬子被捕使姚文元跌入低谷

反胡风运动，在1955年6月，达到了高潮：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20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

照理，作为反胡风“英雄”的姚文元，此时此际应当鼓噪而进，再发表一批讨胡“檄文”。

出人意料，姚文元突然偃旗息鼓，从报刊上消失了：从1955年6月至1956年6月，姚文元整整沉默了一年，连“豆腐干”文章也未曾发过一篇。

意气正盛的姚文元，怎么会一下子收声敛息？

哦，这里用得着一句中国谚语：“大水冲了龙王庙！”反胡风斗争，反到了“英雄”头上来了！

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难忘的一天。他正在机关写批胡风的稿子，忽然有人告诉他，说是他的母亲来了。

脏衣服不是在星期天已经带回家洗掉了嘛，母亲来干什么？

姚文元匆匆奔出大楼，只见母亲周修文神色紧张站在大门外。

她悄悄附在姚文元耳边说：“爸爸给抓去了！”

姚文元一听，脸色陡变。略微镇定了一下，他说：“你赶紧走。我下班以后回家。这消息对谁也别讲！”

“你放心。”母亲说，“我怕别人知道，才来机关找你。我怕打电话会被总机听见……”

周修文说罢，急急走了。

下班之后，姚文元悄悄回家了。直到夜深，姚文元才若无其事地回到机关宿舍。

这一次，姚文元蒙受了沉重的打击。

解放之后，姚蓬子仗着有23万元（即旧人民币23亿元）的资本，仍然开他的作家书屋，当他的老板。

不过，他没有宣铁吾那样的靠山，不能再做纸张投机生意了，收入

远远不及纸贩子的年月。

令人头痛的是，作家书屋里的职工成立了工会，工会成了他的对头。

工会一次又一次跟姚蓬子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

姚蓬子总是打“太极拳”。实在没招儿了，这才像挤牙膏似的，增加一点工资、福利。

1955年，在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作家书屋并入了全民所有制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作家书屋的职工，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职工。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资料员—不过她实在干不惯，做了一年就洗手不干了。

姚蓬子在作家书屋关闭之后，干脆，宁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无业游民”。

他倒有点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有着叛徒历史和奸商劣迹，又是地主、资本家“双料货”，在共产党手下别指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他庆幸自己在解放前夕，狠狠地在经济上捞了一把。如今，不仅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有一笔可观的存款。即使夫妻双双不去工作，光拿利息、定息，就足以维持生活。

他乐得在家逍遥自在，大可不必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去当一名编辑。

他也庆幸在解放前夕，让儿子姚文元挤进了共产党。从此，儿子有了比大学文凭更重要的党票，有了比利息、定息更重要的政治资本。

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点课，讲讲中国文学史，讲讲《水浒》研究，拿点讲课费。

不过，这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他并非该校正式职工，可以不参加该校的政治运动，依然十分自由。

他的算盘打得蛮不错：有了钱，生活无忧无虑；有了自己的房子，像蜗牛有了硬壳，政治风浪来了，可以躲进“避风港”；成了兼课教师，对外人可以自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会像“无业游民”那么叫人瞧不起。

万万想不到，冰凉的手铐会突然戴在他的手上！

姚蓬子的被捕，原因诸多。其中之一在于胡风事件：当反胡风运动的调门越唱越高，胡风被定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姚文元成了反胡风的“英雄”，姚蓬子却大倒其霉。由于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著作，他曾跟胡风有过许多交往，在清查“胡风分子”的时候，便查到

了他的头上。他被列入“胡风分子”嫌疑名单之中。

原因之二在于潘汉年。潘汉年是姚蓬子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对姚蓬子的叛党经过，一清二楚。姚蓬子每当看见报上登着“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字样，便触目惊心，惶惶不安。他曾私下里对人说：“只要潘汉年在上海，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1955年4月底，出差去京的潘汉年突然在北京饭店303室被捕，罪名是极为可怕的：“内奸”！后来，潘汉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文革”中死于监牢。直至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宣布“潘汉年事件”乃是一桩冤案。

潘汉年的被捕，也牵涉到姚蓬子。因为当年姚蓬子担任中共特科联络员时，顶头上司便是潘汉年。潘汉年既然是“内奸”，那么姚蓬子也有“内奸”之嫌—唉，不论潘汉年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使姚蓬子的日子过得不安宁！

于是，姚蓬子作为“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分子”的双重嫌疑，由公安部六局拘捕审查，押往北京。

经过审查，姚蓬子既定不上“胡风分子”，也够不上“潘汉年分子”。不过，七审八查，却查出了他的叛变问题。《中央日报》上那《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白纸黑字，姚蓬子无法抵赖，不得不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长篇交待，交给了公安部。

姚文元是党员，家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他理应向党组织汇报。他却不声不响，想瞒天过海，不想因为反胡风的“英雄”有着这么一个父亲，而让锦绣前程付诸东流！

其实，姚文元是在1953年12月知道父亲姚蓬子的叛徒问题。事情的起因，倒不是当时要审查姚蓬子，而是当时上海普选人民代表，姚蓬子作为统战对象，被列为候选人。当时，姚文元也一直向组织上宣称，父亲是“党外民主人士、进步作家”。然而，卢湾区的统战部听说姚蓬子在解放前曾经是中共党员，便向姚文元了解相关情况。姚文元知道一点父亲在解放前的情况，但是并不详细、确切。他知道父亲在解放前跟冯雪峰过从甚密，而冯雪峰在解放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于是便给冯雪峰写了一封信，请他介绍父亲姚蓬子的历史情况。

[image]
■ 姚蓬子关于叛党问题的交待

姚文元写给冯雪峰的信，迄今仍未见披露，但是冯雪峰在1953年12月15日写给姚文元的信，却已经见诸报端。冯雪峰的信至为重要，全文如下[131]：

姚文元同志：

你的信收到。谢谢你关心我的身体。

你是一个党员，我在你入党时，就知道的。你既是一个党员，我当然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把你父亲的事告诉你。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加入过“左联”，也做过一些党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后曾编过一个国民党的小报纸，但自首时尚未破坏过党的组织，这是后来调查过的。抗战时在重庆，他又和进步文化界接近，那时进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上尽些力。此时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逐步脱离。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政治上仍是无所谓，但对进步出版界（如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等）也帮过一些忙，所以说他现在还是统战的对象。

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是因为怕死，这大概是真的。他胆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牺牲，而同时也不敢做大坏事（这总还算好）。他选择了开书店的职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弄形成了商人的习气，他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而且，据我所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觉得什么什么似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糊涂的人。我们因为过去是朋友，后来他也还帮忙我，掩护我，所以常常严厉地劝戒他，刺激他。他有几次在我面前流泪痛哭，好像他也很心痛，但我觉得效果很小，仍然爱钱和糊涂。在解放后，我曾尽过稍微的力，使他和各方的关系不致太坏，这也不是为私谊，为他个人，是为了他也仍可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前一月，上海方面要我证明他曾经掩护我的事，我已经证明了。

以上是大概的、扼要的情形，想你可以明白的。你不要难过，你应该学会冷静地去看问题，深刻地去了解过去社会的复杂性。你知道他的弱点，应该好好地帮助他，他虽然年龄大了，也应该帮助他改变他自己的种种错误的想法和看法。我认为你简单地疏远他，离开他是不对的，应该去接近他，把关系搞好，以便说服他。过去的事（自首），你不可再去提，以免刺痛他。问题是现在，他应该很快走“公私合营”的路。看样子，他现在出书，销路很好，他正在“走红”，正在“私热”中，似乎一下子还扭不过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这方面去帮助他、去说服他。

但我的意见，只供你参考。你自己细心地研究后行事。也可以和组织上讨论。我的信给组织上也可以的。但没有必要时也不必给组织上看。匆匆忙忙，写得不能满你意，也说不定。

祝你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

冯雪峰

十二月十五日

冯雪峰作为长辈、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给姚文元清楚地说明了姚蓬子的历史情况，其中尤其是“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使姚文元极

为震惊。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势必影响自己的前途。

姚文元深知隐瞒毕竟无济于事，便把冯雪峰的信交给了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部长，以求表明自己对党组织忠诚，同时也表示要跟父亲“划清界限”。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回家，很少跟父亲见面，以表明“划清界限”。

好在当时只是涉及姚蓬子能否当选人民代表的问题，并未对姚文元本人的工作造成多大影响。然而，这一回姚蓬子被捕，问题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没多久，机关里开展肃反和清查“胡风分子”，姚文元心中如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姚文元跌入了泥泞中。

起初，区委宣传部里查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而此人跟姚文元来往密切，涉及了姚文元。

接着，有人检举说，姚文元“宣扬过胡风文艺思想”。

紧接着，姚文元被列为清查对象—清查他跟胡风的关系。一个反胡风的“英雄”，落到这种地步，可谓惨矣！

最使姚文元伤心的是，对象吹了。

那时候，姚文元热恋着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金英，而金英正举棋不定。眉清目秀的她，看到姚文元接连发表那么多反胡风的文章，有点动心，可是她又觉得组织部里另一位男青年风度潇洒，一表人才，远在姚文元之上。

金英是上海民本中学地下党员，1948年1月入党，她在党内职务比姚文元高。在肃反运动中，金英成为区委机关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她，一副冰冷的面孔，代表组织找姚文元谈话，要姚文元交待跟父亲姚蓬子的关系，交待怎样宣扬胡风的文艺思想……

望着金英铁板般的脸，姚文元心似刀绞。

完了，完了。父亲被捕了。不能发表文章了。受到审查了。恋爱告吹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姚文元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得了中耳炎，从右边的耳朵里不住地流出脓水。他只用手帕擦一擦，没有心思去医院看病。

常常在宿舍里默默地看天花板，吃不下饭，看不进书，写不成文

章，睡不着觉，他的心灵受着难言的折磨。本来，有一段时间，他生怕金英嫌他脏，曾勤洗勤换过衣服、枕巾、被单，如今“复辟”了，一如往常那般懒、脏、杂、乱。

终于，一天晚上，在上海南昌路102弄10号—当年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所在地的小天井里，召开了一个帮助姚文元端正思想的会议。

姚文元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住地用手绢擦着从右耳流出的脓水。

按照那时会议的程序，末了当然要被帮助的人表态。只见姚文元低垂着头，长叹了一声：“我有病，但是我不想去看病。我今天24岁，能够活到30岁，也就差不多了……”

会议不欢而散。

回到宿舍，叹气已毕的姚文元却又对人说：“我在死以前，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955年12月11日，中共卢湾区委肃反审干领导小组正式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为自己辩解道：“我向来以为父亲是‘三进步’—进步作家，开进步书店，卖进步书籍。父亲的问题，我是在后来才知道的。我受父亲的蒙蔽。我，我，我今后保证跟父亲划清界限……”

12月20日，中共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写出了关于姚文元的审查报告，现摘录这个报告原文于下。虽然这个审查报告是用当时的政治语言写的，现在用历史的目光审视并不见得准确、正确，但却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反胡风“英雄”姚文元当年的尴尬和狼狈：

> 姚（文元）的父亲与胡风、彭柏山、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见过面；但这些情况姚一直未交代过，而且一直强调自己与家庭关系恶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组织汇报，这次反胡风斗争开始，姚从未把这种具体情况进行揭发。
>
> 解放后姚文元在他自己家里见过胡风并从他父亲口里听到胡风对党不满，骂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见过胡风。同时在家里也见过胡风分子梅林（原名张芝田—引者注），也从他父亲口里听到梅林发牢骚，对解放后的现状不满，但这些问题姚从未揭发过，也未向组织汇报过。
>
> 解放前，姚经常阅读与研究过胡风的书，如希望、泥土、蚂蚁等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解放后姚文元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籍。如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展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
>
> 姚文元同样认为胡风是进步的，路翎写文章很有“才华”。对1947年、1948年，胡风诬蔑香港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逃兵”来反攻党对他的批评，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1955年12月20日

姚文元其实也深知姚蓬子与胡风、彭柏山等人的关系。他曾采取过“以攻为守”的策略。他1955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一文，曾激烈地攻击过彭柏山：

> 如果不是党中央坚决展开这一斗争，这些潜伏在党内的胡风集团分子要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经爬到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去了，胡风要通过他来开辟岗位，企图通过他和刘雪苇来“顶住”华东和上海，一直到对抗“上面”—党中央！彭柏山还企图让胡风“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使胡风能直接攫取华东地区文化事业的行政领导权，这阴谋多么毒呀！

无奈，这般的“以攻为守”还是无用，他的“两面派”手法无济于事，中共上海卢湾区委还是要他交待与彭柏山的关系。

一次一次地“挖根”，检查家庭影响；一次一次地交待，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变得灰溜溜的。

当姚蓬子获释以后，当肃反、反胡风的浪头过去之后，姚文元如释重负。他，想方设法要调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他在这里挨过批判，抬不起头，何况要当大作家，这儿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对于姚文元来说，父亲姚蓬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姚蓬子本是阔少爷

或者像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20世纪20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1949年9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即周扬—引者注）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蓬子于1927年底加入中共，1933年12月被捕，不久叛变，于1934年5月14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这样，云谲波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蓬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来自他的另一个名字“蓬生”。他的本名叫姚方仁、姚杉尊，字裸人。他又名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有时也写为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他还用过很多笔名，诸如丁爱、小莹、梦业、慕容梓。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笔者在1989年11月16日，曾前往姚公埠作实地采访。

据说，当年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池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绝代佳人西施的故乡，人称“浙东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早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民国以来，诸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这里原本水路四通八达。有了公路之后，交通更加便利。特别是浙赣铁路建成后，贯穿诸暨全境。诸暨盛产大米、黄金、茶叶。1989年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热闹庆祝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内中军人多，文人多，科学家多，商人少。就以20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浣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作“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分为上村、中村、下村。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浣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像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笔者在诸暨档案馆见到《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内中记载着姚文元的家谱。那里的姚家宗祠，则是清朝光绪年间重立的，写着对联："红霞晚映，鸢飞鱼跃。"

在姚公埠下村，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像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院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讳志纯，乃姚蓬子之父[132]。姚文元的祖父，有田120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姚西曜的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image]

■ 1989年11月，叶永烈在姚文元家乡浙江诸暨姚公埠采访姚家老邻居。

[image]

■ 浙江诸暨姚公埠姚家老屋（叶永烈　摄）

笔者注意到姚克先生一篇遗作，题为《"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内中涉及姚文元的祖父。姚克先生是电影《清宫秘史》的编剧。在"文革"中，《清宫秘史》曾受到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的猛烈"批判"，成为"炮打"刘少奇的一颗重磅炮弹。

姚克晚年，客居美国。1976年底，他在美国加州会晤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维特克女士，谈起江青，也谈到姚文元。后来，他把那天的谈话写成《"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此文在姚克去世后，于1996年发表于第12期《上海滩》杂志。

姚克写道：

>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说他的祖父姚汉章，多年前曾任中华书局的编辑。我这才发现，我当年认识左翼作家姚蓬子原来是姚汉章的儿子。
>
> ……
>
> 姚汉章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在我同辈分的弟兄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中举之后科举就废了。他因为是个举人，特别受亲属的重视，所以隔了六七十年我还记得他，别的从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和姚蓬子认识的时候，从来没有互相展问邦族；我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是我从堂哥哥的儿子，他也绝对想不到我会是他父亲的从堂弟弟，因为我是先父晚年的儿子，年纪和姚汉章相差至少二十岁上下，而且我说话带一点苏州口音，更不像是他们的本家，如

果我和姚蓬子交往得长久一点，彼此也许会发现出亲属关系来。可是经过鲁迅先生的劝告，后来我就和姚蓬子疏远了。若不是最近报纸上透露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父子是我的本家亲属。

民国初年间，姚汉章就在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当年中华版的教科书，有不少都出于他的手笔，60岁以上年纪的人也许曾经读过。

很遗憾，姚克先生没有注明他所见到的那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究竟发表于什么报刊，作者是谁，文章的篇名叫什么。

笔者在浙江诸暨档案馆查阅了《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并复印了姚文元的父亲、祖父那一页，没有见到姚文元的祖父叫姚汉章的记载，只查到他的祖父“名西曜，讳志纯”。姚西曜是否另有名字叫汉章？尚待进一步查证。

就连姚克本人在《“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中，对此也有所怀疑：因为姚汉章之父讳文俊，姚文元倘若是姚汉章之孙，不可能是“文”字辈—岂有曾祖父与曾孙同辈之理？

姚克写道：“姚汉章是个旧社会的人，当然不会替孙儿取一个与自己父亲犯忌讳的名字，姚蓬子虽然曾一度做过左翼作家，也不至于糊涂得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20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让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133]“翻译”成公历，也就是1906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又叫蓬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绵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8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134]。梁实秋先生于1974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1948年冬从北平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

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另外，在老舍的1951年3月28日的日记中，也提及姚舞雁："约王庚尧、姚舞雁、屈凌汉、隋育楠、易德元、席征庸，吃东来顺。"

红学专家冯其庸在1994年《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出版时，称姚舞雁为"版式专家"："决心彻底全面重校重排，所有文字都用原书一一核校，我还请版式专家姚舞雁先生重新划定版式，并由她作复校，最后由我定校。经此番努力后，从版式到文字、分段、标点以及眉评、回后评等等，皆认真定，面目为之一新。"

姚西曜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土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曜就把儿子送到诸暨县立中学上学，不久转往绍兴越材中学（现名建功中学）上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越材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上海中国公学，然后前往北京大学。

1924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18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曜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菜，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伫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幔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抬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

名姚鸣雁。

1937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80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周修文。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像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姚蓬子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1924年盛暑，他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他踏进了上海文坛开始了文学生涯。

脱去长衫，穿上西装，姚蓬子昂首阔步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那时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是商业街，而四马路则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马路，姚蓬子如鱼得水，以为中国虽大，唯此街于他最直。在四马路上，中华书局、梁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比肩而立。自四马路转角往南，棋盘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武学书局、公民书局、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局鳞次栉比。不远处，有着会文堂书局、新民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千顷堂、蟫隐庐。

这里是书的王国，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书商的市场。

1924年6月，四马路上一家名叫“光华药店”的铺子，被新创办的书店买下，挂出了“光华书局”的招牌。

光华书局给四马路增添了气息，它是那里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籍的书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张静庐，浙江镇海县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乡。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商报》。后来，他想在《商报》办个出版部，印行书籍。张静庐与郭沫若相熟。当他来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应给他两部书稿—《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张静庐开始印郭沫若的这两部书，便打出了“光华书局”的牌子。正巧，四马路上有一家光华药店支撑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张静庐就租了下来。于是，“光华药店”变成了“光华书局”。有趣的是，开业之后，仍不时有人进来问：“卖药吗？”

郭沫若的两本书为光华书局打响了第一炮。此后，郭沫若等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也都由光华书局印行。光华书局与创造社结下了深缘。

头一回去见张老板，姚蓬子西装笔挺，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才几天，他就扔掉了领带，又过了几天，解开了衬衫领扣，再过几天，连西装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个随便惯了的人，受不了束缚。不修边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爱激动。一旦激动起来，他就不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突然跳下床来，写下抒发自己激情的诗句。

他是感伤的青年。他是苦闷的青年。他是变态的青年。他彷徨徘徊，忧心忡忡。他又不甘于沉沦和寂寞，不屑于堕落和潦倒。

迷惘的他，卷入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潮。那是19世纪末发端于法国的新浪潮。象征派的诗人们以为，写诗应当“主观”，应当“唯心”。在他们的目光中，世界是双重的叠合，现实世界痛苦而虚幻，另一个世界则真而美。他们用诗暗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亦即“象征”。悲观的情调，颓废的色彩，成为他们的诗的主旋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象征派诗潮风靡欧洲。接着，冲击着中国。与姚蓬子一拍即合。

诗是内心的独白。姚蓬子的诗，映照出他的一颗苍白、凄冷的心。

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姚蓬子仿佛觉得整个世界在坠落，在枯萎。现在可以查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便是《秋歌》：

黄叶，无声地飘堕着，
像梦一般的，
或叹息似的，
负着露和泪坠落在地上了。
远寺的钟，
滞重得有如病驴的蹄声；
听新蹄声淹没了旧的，
我欲低泣。
秋的情调凄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遗址，
都沉入旧情的回忆！
奄奄的叹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哦，诗人面对凛冽、悒郁的秋风，不住地叹息着，低泣着。

诗人低头吟叹，见到墙角的一张破琴，又是一番悲凉的惆怅的感触，袭上了心头。

姚蓬子来回踱着方步，哼成了一首《破琴》：

零落的琴，

比掩在黄草中的歌唇还要寂寞，
比古庙的钟，更寂寞。
残弦迸裂在秋风中了，
它褪色的襟角与裙边，
都睡满了尘丝，青苔。
再不会，梦见了诗人，
曲调未成，就拍翅向他飞奔；
晨露上，也再不见琴声驻停。
孤独地，看春花换成黄叶，
看月缺又圆；
秋月下，偷顾影子，活像架枯骸。

大抵诗与杜康如影随形，姚蓬子也总离不了酒瓶。他写《酒后》，如同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

靠在老旧的绒布枕上，
一个缺嘴的酒瓶
和几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灯火打睡在纱罩里，
几只饿鼠，得我允许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残肴。
飞向青年诗人那里去了吧，
梦之神，我几回凝视，
瞧不见她翅子的一羽。
沉郁的乡思，凄凉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颜色的奴才们；
此刻是，风样的，影踪都没有了。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诗人姚蓬子，不时向“处女的纯洁的心”献上自己的情诗。大抵因为向往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缘故，他喜爱法国作家果尔蒙的小说。他一边写点短诗，一边埋头于翻译果尔蒙的长篇小说《处女的心》。

姚蓬子写过一首总共只有六行的《小诗》。诗虽短，情颇浓：

我将装饰花环在你发上，
珠练儿在你白嫩的颈项上，
轻纱的衣服在你身上，
金钏儿在你手腕和足胫上；
更将我灰白的颤抖的唇儿，
装饰在你猩红的唇上。

月下，花前，窗口，床边，姚蓬子一次次为Rose—玫瑰花儿一般的“露丝”，写下了热恋的诗句。

啵，蓬子的《今晚》：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弱似飘泊的幽魂哟，
又似墓头花的悲寂。
露丝，今晚的我俩。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
在忍痛的撒手前。
有如喝醉了浓酒，
露丝，忘去一切吧，
莫让忧思爬上你芳颜。
或者像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姚蓬子写下的《蹀躞》，则把满腔情思献于菲菲。他把一片痴情化为诗行。值得说明一句的是，诗中的五行“……”是原文如此，并非引录者的删节。

透过了半开的窗，
灯光洒在草地，
冬霜般凄白。
我知道菲菲，
……
在楼头忸怩地窥望；
怕横空飞过的夜鸟，
知道了伊底偷窥；
处女的娇羞的情，
灰白的夜幕下，
放花在伊底心窍了；
又像被捆在魔绳里啊，
伊圣洁的视线，
夜的幻美诱它不住，
石榴子似的星也不，
总离不开草地的瘦影；
处女的纯洁的心，
（爱的责任命令她了，）
担心露水的苍白

将染白了我微红的面颊，
风将吹我生病；
但一夜不见，
焦急又煮碎了伊底心；
夜的游虫都已家睡，
夜莺也放下了笛时，
伊还焦思着：真病了。
每晚每晚，
我满装了虚幻的欢情，
被爱的骄矜漾在我心，
不管风寒露重，
含笑蹀躞在伊后门。
直到西风吹我病了，
才知一脉芳情，
从不曾飞进伊底心；
我夜夜的相思，
夜夜都死在伊门外。

诗抒情。罗曼蒂克的诗人姚蓬子，用他的诗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扉：他的苍白，他的凄凉，他的烦闷，他的情思。

这些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晦涩、灰色的诗，在这六十多年间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只是为了勾出当年姚蓬子的形象，我才从发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找出了这些诗。

遥夜沉沉，他期待着黎明；昏昏欲睡，他谛听着无声处的雷声。他的心境是芜杂的，他的心态是多元的。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姚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姚蓬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徜徉在四马路上。1925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1924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1925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1925年冬，19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1927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

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到了1927年8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image]

■ 姚蓬子译《处女的心》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装。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1926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像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邃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不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1925年，他才19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1927年2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

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在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21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135]，姚蓬子在1927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自从成为C.P.，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汉年的影响下，从灰色的阴影中迈上了光明之路。

1929年12月号的上海《新文艺》杂志上，刊登了水沫书店的“水沫丛书”新书广告—蓬子诗集《银铃》出版。广告是这么介绍《银铃》的：“蓬子先生是研究着象征派的法国文学的人，所以他（的）诗也完全有着象征派的法国诗风。《银铃》一集是他以前的诗底精选集。据作者自己说，以后的诗格又要改变了，那么这集将成为他的诗艺上可贵的遗产，爱读作者之诗的人不可不购一册。”

他的《银铃》，自1929年3月初交上海水沫书店刊印，才十几天—3月15日，就出现在上海各书摊上了。初版印了1000册，薄薄的65页，定价3角。

《银铃》共收入蓬子早期诗作38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蹀躞》、《悼—》、《寄S. M.》、《黄昏》、《痴》、《从此永别》、《小诗》、《古城》、《红灯憔悴后》、《重来》、《岁暮》、《荒村》、《春情》、《银铃》、《田间》、《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诗》、《医生》、“To Mary”（即《致玛丽》—本书作者注）、《自从我死去了母亲》、《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苹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涩的眼光》、《我愿我的心是一条可爱的小径》。

他选取了其中的一首《银铃》，作为诗集的名字。这首《银铃》如下：

新雨之后荒园是泥泞地，
啄木鸟儿丁丁地伐木园树上，
更啄落了潮润的新鲜的红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宽大的木屐，
独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后的荒园。
我心儿忽地疼痛，流注着血般。
“什么东西刺伤了你？”我禁不住自问。
“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
啄木鸟儿抛下树皮在她们帽檐。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如今郁金香依旧似旧的娇美，
啄木鸟儿依旧丁丁地伐木园树内。
但流亮的，清丽的笑声沉默了！
再听不见一串银铃儿的摇荡！

哦，《银铃》，原是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久久难忘的她们的银铃儿般的笑声！

姚蓬子在1929年3月为《银铃》所写的《自序》，倒是他自己当时思想的真实剖析。这篇《自序》，写及了自己往日的烦闷，后来的沉默，今日的奋进，可以说是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思想日渐进步的印证。

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颇为难得，故全文照录于下：

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梭罗古勃革命后不再写什么文章了，苏德曼寂寞地度着他凄凉的暮年。从这两位去年刚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殁落，我们可以证明历史是不会对任何人徇私情的。

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宜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有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闪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彼·阿尔志跋绥夫等等，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日下，时代已不允许你叹气；除了推着时代的轮子往前跑，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催促历史早点完成它的使命外，还有说什么空话的闲暇，所以，我是沉默着已三年了。

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

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间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能够意识到旧中国是座坟墓，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小诗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发生了跃变。正因为这样，他才自认诗集《银铃》是“无聊的小册子”，并劝说读者“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平生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际，他没有沉醉于自我欣赏之中，而在自序里来了个自我否定。

确实，自《银铃》诗集出版之后，蓬子的“诗格”变了。他从忧伤转为激进，从彷徨转为前进，他再也不写那样灰溜溜、酸溜溜、娇滴滴、冷冰冰的诗。他从月儿花儿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从爱呀蜜呀吻呀唇儿呀转向时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赏银铃般的清脆，而是热衷于那鼙鼓的洪亮，他的诗从颓废中振奋起来。

姚蓬子出任左联执委

1930年3月2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今上海多伦路145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室（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2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孚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24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1930年4月《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像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今常音译为“沙龙”—引者注），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
>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

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鲁迅一口气列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1863—1938），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1895—1925），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1894—？），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1891—1967）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4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image]

■ 姚蓬子译《妇人之梦》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忡忡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姚蓬子又译为"果尔

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30年2月付排，1930年3月就出版了。

姚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438页，从1930年11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1931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1937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姚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 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lexey N. 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 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 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 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 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译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
> 第一，要将1921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迻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像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璧，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珂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
>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1931年6月，蓬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1932

年10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与丁玲创办《北斗》

1931年盛暑，格外地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27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显宦门第，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23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1930年5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经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11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当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月7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音译—引者注）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1903年，卒于1970年，现代作家、翻译家。1920年起到日本求

学，1927年回国。1929年再度去日本。1930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引者注）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要刊物《北斗》。

1931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9月20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星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25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像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像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像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像一缕柔软的青烟，像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的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里；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第1卷第2期（1931年10月20日出版）上，发表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圈，秋大衣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街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
>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

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肥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淡的哀愁。

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1卷第4期上，姚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末注明“12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

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党部委员等，带了雄赳赳的武装兵士，乘了汽车上车站来劝阻学生进京请愿，叫了学生代表去听训话。他的意思，以为学生进京请愿，不仅会耗费时间，精神，于事实没有丝毫的帮助，同时学业上的损失亦甚巨，甚大，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也会受到影响。……

不耐烦地等待着列车，一面又想到了白天教育局长他们那一番训话，于是在郑华心里又掀起了一些气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连你们也说，这是国难临头的时候了，那末还教我们回去努力读书，这用意到底在那里呢？如其说，外交你们自有办法，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仅东北的劳苦民众早已水深火热的被践踏在铁蹄下面了，同时日本的刽子手还在到处继续屠杀，日本的军队还在继续向关内开动，预备在华北暴动，日本的兵舰也不断的开到长江上来示威，而你们，除了教民众坐以待毙的镇静之外，又还有半点准备反抗的表示吗？……啊啊，民众是不会再上镇静论的冤枉当的，为要解除他们自己的桎梏，为要避免奴隶的悲惨的运命，他们已经自己起来直接行动了！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篇《白旗交响曲》就艺术性来说，显得粗糙，却迅速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11月26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上万学生涌向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目击着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烧，姚蓬子感到激动不已。他，拿起了笔，在几天之内写出这篇《白旗交响曲》。他不再那样缠绵悱恻，他变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响曲》写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样的呢？

面对带血的刺刀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左联同仁对姚蓬子留下一个疑问。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见《丁玲文集》第五卷），记载了姚蓬子这段小插曲。

> “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过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楼适夷和杨骚打旗子（还有张天翼打旗子—引者注）。开群众大会时本来内定由沈起予讲演。但特务包围了会场，沈不敢上台，没有法，冯雪峰跑上台去讲演。他本来是不应该暴露的，事后同志们对他这种赤膊上阵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大会开得很有声势。会后，游行队伍包围了张群的房子。我们派人进去谈判。反动军警在墙上架起机枪，并向游行队伍开枪。等逃散的群众再度集合起来，左联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姚蓬子。

姚蓬子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见了呢？

后来，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词，回避了人们的追问。

小插曲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是这小小的插曲却是一个征兆。

1932年，在《北斗》第2卷第1期举行《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时，发表意见的有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姚蓬子。

姚蓬子的意见如下：

>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果然不振么？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移转到大众的眼下了。
>
> 近来广大的反帝剧本的产生，街头剧团的开始活动，大众文艺的逐渐增多，工厂壁报的普遍建立，这些，不都是新兴文学的萌芽么？自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
> 因此，一个文学必须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到工厂、到农村、到街头，去生活大众的生活，这是为要产生真正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文学的正确的路径。
>
> 同时，我们必须从大众中间，尤其是劳动者中间，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作家。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已成为文学界当前第一个急迫的任务。

《北斗》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个新生的婴儿还不满周岁，就在1932年春天勉强出版了第2卷第3、4期合刊之后，被迫停刊了。

鲁迅写诗《赠蓬子》

1932年2月20日付排，居然在3月18日就出书了。姚蓬子的中篇小说《浮世画》，交给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列入赵家壁主编的《一角丛书》，作为第二十九种，飞快地印行了。

小小的六十四开本，定价一角，第一版就印了四千册。这是姚蓬子小说的第一个单行本。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姚蓬子的《浮世画》，画的依旧是上海滩的世俗之情，桃花之运：

> 谁曾想到呢？一个穷教授会和大学校里的一个皇后要好起来。一个是被绅士公子们捧成了金丝雀，红鲤鱼，画眉鸟的摩登女郎，而另一个却是只在私立宏德大学担任了几点钟西洋文学史和西洋哲学史的穷教授。所以在他们最初认识了之后，西音和她通信的消息传到了朋友们耳中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一个熟人不背了面讲他笑话，见了面又寻他开心的。
>
> “老西，听说你新近交了桃花运，真的吗？”一个熟人笑着问。
>
> “老西，看你不出有这一手大本领，连王小姐都会和你讲起爱情来？”另一个熟人狡猾地拍拍他底肩膊。
>
> “朋友，不要寻开心，好吗？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的造出风浪吧。”窘笑着回答了朋友们。
>
> 对的，这是句真话，对于这女人，至少西音是不曾发生过野心或幻想的。一、他不是小白脸，没有一个擦满了雪花粉的小旦似的面孔；二、他不会吹牛，没有当着女人面前将她捧上云雾里去的勇气；三、他没有钱。拿教书的钱是只够维持个人生活也还不是顶宽裕的，有什么剩余可供一个摩登女郎底挥霍呢？自己底够不上追求女人的资格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要挤进那些体面的绅士们和豪贵的公子们中间去当一名蕙如底候选人，那是他认识蕙如之后所不曾梦到，不敢梦到，同时也不必梦到的。
>
> 正如他自己告白给朋友们，他们底关系只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在一个朋友的筵席上认识了如，觉得很媚人，后来就借了一个原因写信给她了。信发出之后心中不无后悔的，不是怕她没有回信，而是怕她当作一个笑话传开去。但出乎意外的不到二天回信居然寄来了，虽是短短的几句平淡的客套话，但仿佛也很尊重自己的，希望自己时常有信寄给她。
>
> 西音是被一种单调的寂寞的生活追随着，到如今已有五年了。挟着皮包，从家内搭车到学校，念一些连自己也觉得无意义的讲义。于是又回到家中，在几架旧书中间坐下来，看几本哲学书，或者躺在床上驰骋一些不必要的幻想。到如今，已有五年了。
>
> 现在，有一个女人能够接受他底信，同时也有回信给他，这不

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吗……

姚蓬子的小说《浮世画》，就这样开始展开故事。

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小说，1932年3月31日下午，姚蓬子抱着自己四个月的儿子，前去看望鲁迅。

他的独生子，便是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三）生于上海。他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给儿子取名，即“文中魁元”之意。

他去看望鲁迅，一是请鲁迅为他的新作《浮世画》写点评论，二是请鲁迅为他题几个字，三是让自己的儿子见识见识中国当代的大作家—虽然儿子才四个月。

姚蓬子的三个目的，达到了两个：

最容易达到的，当然是让儿子见到鲁迅。后来，当儿子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时，他就不无自豪地说：“我一岁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最难达到的，当然是请鲁迅为《浮世画》写评论。鲁迅收下了姚蓬子送的新作，说道：“我先看看。”自然，此后鲁迅没有为《浮世画》写过任何评论，表明他以为不值一评。

既不算容易，也不算太难的，是请鲁迅题字。

鲁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给你题一首诗吧！”

姚蓬子喜出望外，瞪大了眼睛，看着鲁迅提起了毛笔。

顷刻之间，鲁迅走笔如飞，写下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记述道：“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

关于这首《赠蓬子》的释义，颇多争议。诗是最为简练的艺术。惟其简练，往往多义。《赠蓬子》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按照《赠蓬子》一诗直释，“飞仙”指蓬子（因为蓬子乃“蓬瀛之子”），“灵童”指姚文元。意思是说，蓬子仿佛从天而降，坐着两辆驾

云的车子，带着儿子来临，可怜你蓬子并非天子，只不过是逃来逃去喝西北风罢了。

其二，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注释中认为：

> 诗中所说的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的事情。天子：穆天子，《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这里指穆木天，言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只好逃去逃来喝西北风了。……
>
> 因为穆木天的妻子到姚蓬子家去找丈夫，所以说：“可怜蓬子非天子”，即可怜姚蓬子不是穆天子。用“天子”来代“穆木天”，因为“穆木天”跟“穆天子”中有两个字相同。又据《唐六典》，称宫廷内阁中的秘书阁叫“木天”，即指天子的秘书阁，所以用“穆天子”来代“穆木天”，否则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又这首诗写的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当时住在战区的人都在逃难，穆木天的妻子也在逃难，所以说“逃来逃去”。穆木天的妻子在逃难时找不到丈夫，生活没有着落，姚蓬子不能照顾她，所以只好喝西北风了。这首诗不是写3月31日的事，是追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到3月31日，战事早已平息，鲁迅也从“一·二八”时逃难出来于3月19日搬回家去，已经没有“逃来逃去”的事，对姚蓬子来说，也没有“吸北风”的事。再说《穆天子传》记穆天子去见仙人西王母，所以联系到“飞仙”，“灵童”就是仙童，正从“飞仙”来的。倘若就姚蓬子讲，那就不能称“飞仙”，也无所谓“灵童”了。又“一·二八”正在冬天吹北风的时候，故说“吸北风”也符合时令，到3月31日，已是吹东风的春天，和“吸北风”也不合了。

这里提到的穆木天（1900—1971），也是左联成员，诗人、翻译家。

周振甫的依据是：“这首诗的本意，是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人讲的，她是当时的见证人，所以她的解释是有权威性的，正确的。”

《鲁迅全集》的注释，采用周振甫的查证，称此诗系调侃穆木天妻寻夫事，“飞仙”指穆妻，“灵童”指穆子，与姚文元无涉，详解参见周振甫先生的《鲁迅诗歌注》。

其实，持第一种释义的，也未尝不可。因为当时姚蓬子还是左联执委、共产党员，而姚文元不过乳臭未干的稚童，鲁迅戏称之为“灵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至于三十几年之后姚文元成为中央首长，借此自吹，那与鲁迅何干？

1988年2月29日，笔者在北京拜访楼适夷先生时，他谈及对于这首诗的解释—

1932年4月间，在上海无处安身的楼适夷，来到极司非而路（今万

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步入姚家，见到墙上挂着鲁迅题诗，还没有来得及裱呢。

楼适夷看罢诗，问及鲁迅的诗的意思，姚蓬子仰天大笑起来，说起了故事："'一·二八'的时候，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听说，穆当时另有所爱，谈恋爱去了）。穆的妻子带着孩子，坐着两辆黄包车，来到极司非而路我的家里。我帮她找穆木天，找来找去找不着……3月里，我去看望鲁迅，跟鲁迅说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鲁迅一边听，一边笑。后来，我请鲁迅题诗，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写进了诗里，笑我'可怜蓬子非天子'！"

楼适夷当面听姚蓬子所讲的故事，跟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这首诗所作的解释是一致的。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北斗》消失了。

不久，一份厚厚的新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的书摊上。

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文学月报。

每一期《文学月报》上，都印着《编后记》，署名蓬子—他是左联的这份新刊物的主编。《文学月报》由光华书局发行。

姚主编显示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一连串名作家的作品，出现在《文学月报》上：茅盾、巴金、田汉、丁玲、叶圣陶、张天翼、冰心、艾芜、楼适夷……其中特别是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姚蓬子在《文学月报》第2期《编后记》中，继续发表着激进的文学主张："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除了奴隶的领主们想用各种方法领导大众走入永远的无知，永远的愚昧，永远的黑暗中，可以永远供他们的驱使，永远受他们的支配外，谁都感到大众不仅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生活，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提高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作为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文学，也必然的应该负起它自己的使命。……"

姚蓬子除了拉稿，编刊，跑印刷厂之外，也写小说，写诗。他集主编、作家、诗人于一身。

他发表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雨后》，依然保持着他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细腻的描写：

> 下午四点钟，春雨蒙蒙的落着。街上只看见电车，洋车，摩托车，行人很少。大家都闷在家里吧。雨天在家没有事，照例听到了竹梆声便会有女人出来唤住他。但今天不知为什么缘故可有点儿不同，任他一弄又一弄躁急地敲过去，没有听到哎的开门声。是太太们麻将牌正摸得起劲忘记了肚子呢，或是上午已经买好肉，预备自家做点心呢，这是谁也无从知道的。甚至平日最爱作成他生意，送馄饨碗出来的时候还时常给他赞美的那几家公馆，仿佛也没有听到他的竹梆声……

蓬子写诗，比写小说拿手。不过，此时，他的"诗格"果真变了，再不是"象征派的法国诗风"了。他像怒吼的狮子，现出了心中的不平，吼出了民族的愤懑。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蓬子还登出他的《诗四首》。现摘录其中之一—《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从诗句那昂扬的基

调，可以想见当年的诗人蓬子，确曾有过革命的热情：

大众，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
被十六省泛滥的洪水，
夺去了可怜的粮食，牛马，庐舍，
被抛到饥寒的危崖的
穷苦的中国的大众，
听，日帝国主义的坦克车，飞机，炮弹，
从吉林，从辽宁，从山海关外，
雷雨般，野火般的卷到了黄浦江畔。
听，在紫色的烟，红的火花
弥罩着的闸北，弥罩着的茫茫的夜空下，
被围困在炮火的毒焰里的穷苦者底生命，
被践踏在兽的铁蹄下的少女底青春，
在死的界线上呻吟！
而那些命令我们不抵抗
命令我们镇静的，
此刻却拥抱着娇娃，低低的唤着“亲亲”；
在明媚的灯光下顾盼自己的勋章，
得意的微笑飘上了金黄的酒浆。
谁问日帝国主义的兽蹄踏到了江南！
谁管法西斯蒂的旌旗飘扬在吴淞江畔！
还有那荡着红裙的跳舞厅里，
听，那舞曲的幽扬，美丽，
伴着笼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惊心刺耳的炮声，
如一唱一和的双簧戏似的，
正在祝福这日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虽说诗味淡如白开水，用口号式词句堆砌而成，但是诗表明他确实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

《文学月报》也支撑不了多久。从1932年7月出版第1期，到12月15日出版第5、6期，便被迫停刊了。姚蓬子只担任了前三期的主编。后来，周起应（周扬）由田汉介绍，从剧联来参加左联。冯雪峰调周起应接替姚蓬子，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姚蓬子在上海滩上“消失”了……

转入秘密战线—中共特科

在姚蓬子之前，先“消失”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原本是文委书记，常常在左联的会议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1931年夏，潘汉年“消失”了—虽然他仍然在上海。他神不知，鬼不晓地出没。上午西装笔挺，下午便长袍马褂，晚上也许衣衫褴褛，时而教授派头，时而富商风度，时而小小百姓。

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如此这般地描述过神秘的潘汉年：“他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潘可西在《深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神出鬼没的潘汉年：

>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
>
> 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
>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他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

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点明了潘汉年的身份：“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

特科，中共中央的秘密、要害部门，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1927年11月，周恩来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便筹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铲除叛徒、特务。”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求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建立的。负责镇压叛徒、内奸，打击国民党特务。

四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李强曾任科长。

自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以来，便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为注意的目标。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特科是顾顺章负责的。他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1931年3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要和回国不久的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亲自执行护送任务。他从上海来到武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住。在敌人雪亮的刺刀前，顾顺章一下子瘫倒了，成了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机密。

1931年4月26日，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急告党中央：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的住处。武汉中统特务六次发密电给徐恩曾。所幸，全都落在钱壮飞手中。事关重大，钱壮飞心急火燎报告党中央。

4月27日，当顾顺章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及瞿秋白、周恩来均已安全转移。

发生的意外紧急情况使周恩来不得不重组中央特科。他选中了精明能干，25岁的潘汉年，挑此重担。

于是，潘汉年从上海滩“消失”了。

1932年秋，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姚蓬子从编辑，而诗人，而主编，而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了。

姚蓬子在中共特科负责什么工作呢？他的具体任务是“河北交通”[136]。

没有诗情，没有画意，这一次“改行”，有的只是严峻，艰苦，风寒，惊险。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革命，如同一面筛子，筛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强者。

写写激扬文字，做做地下工作，这都不算难。面对皮鞭和屠刀，面对生与死的选择，那才是对于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最严峻的检验。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把国民党政府弄得手忙脚乱。左翼作家们趁着民众的抗战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动着全国的抗日热浪。

到了1933年，国民党政府腾出手来了，形势陡然吃紧，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3月28日，廖承志、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5月13日，史沫特莱的秘书、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在上海被捕。冯达叛变，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5月14日，丁玲和潘汉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杀警告。

7月14日，《中国论坛》英文版第3卷第8期，王造时巧妙地以“记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为托词，公布了以蓝衣社总机关代号“华”署名的“钩命单”，共53人，每一暗杀对象名字下面加括号，内注执行暗杀任务者的代号。其中有：陈绍禹（后林）、秦邦宪（后林）、胡汉民（海陈）、李济深（海陈）、陈济棠（球王）、李宗仁（补章）、白崇禧（补章）、蒋光鼐（补章）、蔡廷锴（补章）、冯玉祥（线索）、吉鸿昌（线索）、杨铨（后林）、鲁迅（后林）、茅盾（后林）、胡愈之（后林）、田汉（后林）、王造时（后林）等。这份“钩命单”一公布，舆论大哗。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3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党员便达600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6月下旬被捕之后，成为“软骨虫”，居然供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成了叛徒。于是，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来了个大搜捕。

在这月黑风高之际，姚蓬子在上海滩上不见踪影。人们只是在书店里见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于1933年5月作为良友文

学丛书之一，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印行。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个短篇：《兄弟》、《意外》、《黄昏的烟霭里》、《一个人的死》、《雨后》、《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对于姚蓬子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虽然出过诗集《银铃》，毕竟是薄薄的一小本，况且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出过几本翻译小说，毕竟是替外国作家进行“中文写作”。这本251页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后，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1933年12月，天寒地冻。在朔风凛冽的天津，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三个特务突然出现在戴着罗宋帽、穿着棉袍的27岁的男子面前。

就这样，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现在被捕名单上。

一个叛徒出卖了他。

天津警察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因为这一回落网的乃中共机要人员，非同小可。

与姚蓬子同案被捕的，还有左翼作家潘漠华和洪灵菲。

潘漠华本名潘训，比姚蓬子小两岁，浙江宣平县坦溪村人氏，也喜欢写诗。1927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姚蓬子出席左联成立大会那天，潘漠华也来到会场，并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词。后来，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左联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时，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洪灵菲比姚蓬子小一岁，广东潮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姚蓬子在上海相识。1930年，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际，他成为七个常务委员中的一个。1933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秘书，在北平被捕。

首都南京电告：“速解宁。”

姚蓬子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作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车。

下了火车，一辆轿车已在那里“恭候”。

车轮飞转，直奔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看守所。

惊魂未定，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前来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这位先生却满脸春风，悠悠然抽着“三炮台”，慢慢儿地跟他聊着。

“姚先生，久闻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掷到姚蓬子面

前，说道，“姚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作家。我前几天刚刚拜读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华横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面前这位笑嘻嘻、文绉绉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当成政敌，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谊！”他继续微笑道。

当此人自我介绍说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轰顶。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恩曾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倘不是钱壮飞通风报信，恐怕连瞿秋白、周恩来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鸡鹅巷53号，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1932年9月，公开的名称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为处长。它的前身为复兴社（又称力行社、蓝衣社）的特务处。1938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系统。

徐恩曾原任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亦即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1938年，徐恩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系统—中统。

徐恩曾的脸上没有一块横肉，却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文绉绉的，笑嘻嘻的。他的话，像裹着橡皮的铁条，软中透硬，笑里藏刀。

在看守所里，徐恩曾没有高喊“来人哪”，没有使劲地拍惊堂木，却与姚蓬子面对面坐着，一边悠悠地抽着“三炮台”，一边慢慢地聊着。

徐恩曾开始了他的“演说”：“像姚先生这样的文人，干吗去给共产党卖命？”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话，都打动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内心的空虚，便长驱直入了：“姚先生，你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的首领们又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顾顺章和李竹声幡然醒悟之后，写下来的深刻体会，你不妨看看。他们都受到了当局的优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恩曾捻灭手中的烟头。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药包，剧烈地震撼着姚蓬子的心。

虽说顾顺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见过他，却没有太多的交往。李

竹声却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顶头上司”。读着不久前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的“反省体会”，姚蓬子不住地在自问：连李竹声都举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国民党特务手中的枪，不是吃素的。1931年2月7日深夜，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阵枪声响过之后，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联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都倒在血泊里。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年纪也与姚蓬子相仿。特别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诗友。记得，他把《银铃》送给白莽，白莽跟他畅谈过对诗的见解。

别无选择。在姚蓬子面前，只有两条路：李竹声之路与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况，先生家中还有两岁的儿子。先生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替儿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话，不时在姚蓬子耳际响着。

要么跪着生，要么站着死。没有挨过一棍子，没有上过一回刑，姚蓬子的双膝弯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认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供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

他，供出了左联党组织名单，供出冯雪峰、华汉、钱杏邨是中共党员；

他，供出了与鲁迅会面的地点，供出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柳亚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笔，写出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

大喜过望，徐恩曾发出一阵狞笑。他当即决定，给予姚蓬子这样的“反省模范”以“自由”！

又见到了蓝天，又见到了阳光，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姚蓬子从子弹上膛的枪口讨得一条活命。步出囚笼，获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卖了党的机密，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姚蓬子倒戈的消息，不胫而走。鲁迅闻知，不胜唏嘘，万分感慨。

鲁迅在三封书信中，谈到了姚蓬子。

1934年8月31日，鲁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卖身求荣的姚蓬子：“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

后来，姚克回忆道：

> 至于姚蓬子，我到1933年方才认识。他那时也算是个左倾作家；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左派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世背景，轻易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便多问。我对蓬子当然也不例外。和他谈话时，只听出他似乎有杭州嘉兴的口音，其他就不知道了。鲁迅先生不喜欢他的作风，觉得他不可靠，所以曾经劝我少跟他来往。鲁迅给我的信中所说的“贵同宗”就是指姚蓬子而言。由此可见，鲁迅对姚蓬子是深恶而痛绝之。[137]

1934年11月12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写道：“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1934年11月17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转向”的根源：

>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

从“蓬子转向”，再重读鲁迅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远见：“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的忌日—1933年2月7日，鲁迅提起凝重的笔，写下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然而，他对左联的败类—姚蓬子，只是投以睥睨的冷眼。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楼适夷清楚地记得[138]：

1934年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忽然响起监狱长嘹亮的声音："全体肃静，全体肃静……"

两边是铁囚笼，关押着一个个"共党分子"，监狱长站在囚笼间的"弄堂"里，发表训话：

"姚蓬子的名字，你们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前些天，他关押在这里，你们也是看到的。现在，你们看不到他了—他自由了！他为什么能够自由呢？因为他幡然醒悟了，与共党决裂了。他的悔过自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他不光是自由了，而且还将委以重任。他是你们的楷模！

"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左翼作家洪灵菲。洪灵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抗拒之路。结果怎么样呢？洪灵菲已经被当局所枪决！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做姚蓬子呢，还是做洪灵菲？好生掂一掂，赶紧作出选择……"

"无耻！"楼适夷骂了一声姚蓬子。

楼适夷也是在1933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几个月。

当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从楼适夷的牢房前走过。姚蓬子朝楼适夷微微点头，楼适夷也认出姚蓬子来了。

没几天，姚蓬子托人带口信给楼适夷："好吗？"

过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诉楼适夷："姚蓬子这人靠不住，当心！"

楼适夷不再理会姚蓬子。

果真，从监狱长的"演讲"之中，楼适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软骨虫！

监狱长在结束"演讲"之后，特地找楼适夷谈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识。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虑考虑吧，早一点悔过自新，我们会像优待姚蓬子那样优待你！"

楼适夷不予理睬。他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与姚蓬子同时被捕的潘漠华，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以绝食相抗，于1934年12月牺牲于狱中。

1934年的姚蓬子，仿佛身首异处一般，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译的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书店再版印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于徐恩曾的“力荐”，他的“反省范文”—《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赫然登载于1934年5月14日的《中央日报》上，并被5月30日出版的第30期《十日谈》杂志所转载。

姚蓬子的《宣言》，写于1934年4月18日。《中央日报》在5月14日发表时，还加了副题《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这篇《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脸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报》编者所加的一段说明：

> 姚蓬子顷发《宣言》，脱离共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党经历如次。
>
>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1930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团，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后任组用（系“组织”之误—引者注）部长并兼党团书记。1932年春，与上同并负责编辑《文学月报》。1933年，任中央至（系“驻”之误—引者注）河北的交通。四年来历任《萌芽》、《巴尔底山》（“巴尔底山”为“突击队”的音译—引者注）、《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这段关于姚蓬子“共党经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也有几处不准确，如《巴尔底山》早在1930年便已停刊等等。

《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原文如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 在这黑暗和黎明、衰者和少壮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避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
>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废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气氛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

激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进，沉默和叹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恼，于是开始在愤激的热情下，转换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展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1930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记；以及《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image]

■ 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全文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个人（“个人”系“一个”之误—引者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脱）离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的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虽然我竭力严厉的裁制（即“制裁”—引者注）着自己，认为是发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而加以诅咒仇视，可是我无法绝灭这一厌倦的细菌的滋长。

现在是我结束过去的生活，开始未来新生的时候。从改换政治立场的长久的反省中，我发现并理性的确定这一厌倦的来源，不是我过去政治的不坚定，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因此作为共产党的组织细胞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是一个良心的共产党员，必然会涌起一种虽说是说不出的茫然的、可是无限痛苦的苦闷。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所以无怪乎一个原则上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的基石上的党，结果却停留在一种秘密结社的狭隘的状态中。而它的政治行为，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的影响，引起他们热烈的拥护、欢迎和参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种谈虎的色变的恐怖观念。

这样在政治上已经失败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反映于文化上的失败，是怎样的碰壁呢？

自从1928年开始，跟着1930年的疯狂的立三路线飙起了一个

极盛时代以后，即趋向于脱离群众的衰落状态中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间，虽然经过共产主义的作家们多次集体的努力，到今天事实依旧证明无法以无产阶级作品本身来争取和组织广大的知识青年。所谓现阶段的列宁主义作品的产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苦闷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所以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死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而且从没落的旧贵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们，我们自己问问，当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本意，是为了遏制不住火一样强烈的阶级的仇恨心，还是为了目睹和身受这民族的危机呢？以一个从苦难的民族的挣扎里产出来的作家，而企图创造理想的无产阶级作品，结果，自然没有一个不遭到可悲惨的失败。其中有几部的（为）青年所欢迎、所爱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则都是含有针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状的意义，超过它为阶级服务的意义的。然而这些作品，又正是共产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尺，所认为右倾的含有毒素的。

正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样，左翼文化运动之陷于失败而趋没落，是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针对着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比之下，我在郑重的考虑之后，得到了如上的结论。因此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并将此种微意，敬献于青年的朋友们之前。

姚蓬子押
4月18日

在那样的年月《脱离共产党声明》之类在《中央日报》上并非鲜见。那种《声明》往往模式化，诸如“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则不然，洋洋洒洒写了两千余字，从笔调、从习惯用语来看，完全出自他的亲笔。他的《宣言》，不仅仅“声明”一下自己从此脱离共产党，从此“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而是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广大人民，尤其是“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他谈得振振有词，他的《宣言》要比《中央日报》的社论更能蛊惑人心。因为他曾是响当当的“左翼作家”、“共党要员”，如今在“郑重的考虑之后”，说出这番宣言，要广大青年“引以为戒”。

一纸宣言，成为姚蓬子的卖身契，成为他的人生道路上红与黑的分界碑，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他有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但他确实属于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也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投降、叛变之后，他成了可耻的叛徒文人。

姚蓬子反戈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文坛为之惊心，左翼作家们为之切齿。

如鲁迅所言："因为终极的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姚蓬子的叛变，只不过是炼钢炉中排出了渣滓，钢越发精熟了。

一辆轿车在4月20日驶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写出《宣言》的第三天，从车上下来的，是国民党大员张道藩。此人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亲自前来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宠若惊。

"我们已经是同志了！"张道藩笑眯眯地拉着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这位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是很注意"宣传效果"的。他预计姚蓬子的《宣言》一旦发表，会起着国民党的宣传家们难以达到的作用。

"哪里，哪里，写得很肤浅，请张部长多多教正。"直到这时，姚蓬子还十分注意"谦虚"。

"你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张道藩说出了这句姚蓬子至为关心的话。

果真，张道藩走后才两天，徐恩曾便把"悔过自新"的姚蓬子，接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的招待所。姚蓬子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他的内兄周复农保释出来。

又见蓝天白云，又闻枝头鸟鸣，姚蓬子那苍白的脸却还是那样的呆板，心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又过了几天，徐恩曾那辆乌亮的道奇牌轿车出现在招待所门口。"蓬子兄，你完全自由了！"徐恩曾拍着姚蓬子的肩膀说："当局已批准你在南京自由居住。走，我带你看房子去……"轿车驶入南京明瓦廊，停在一座老式的宽敞的印子屋前。

徐恩曾领着姚蓬子进屋，步入中厅，指着右边的房子说："你把家眷接来，就住在这儿吧！"真是喜出望外，姚蓬子呆板的脸上掠过微笑。

不久，妻子周修文便带着三岁的姚文元来到南京，与姚蓬子团圆了，一起住在明瓦廊。连着中厅，对面的房子锁着，无人居住。姚蓬子觉得非常清静，紧张、沮丧的心境算是舒畅了些。

徐恩曾委任姚蓬子为中统的训练股干事，每月给他津贴100元。手中有了钱，小家可以过小康日子，姚蓬子心又安逸了些。

于是，如同变魔术一般：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联络员的姚蓬子，转眼之间，竟变成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

在训练股当了一阵子干事，毕竟觉得在南京抛头露面，不大方便。

于是，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恰当的差使：到安徽芜湖，当那里的《大江日报》副刊主编。

芜湖离南京并不太远，但那里几乎没有姚蓬子当年的左翼朋友，不会使他感到难堪。何况《大江日报》发行量有限，当个副刊主编，并不很醒目。

姚蓬子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他，居然写起《十年间》，在副刊上连载。

姚蓬子的积极表现，使徐恩曾深为满意。于是，徐恩曾下令广登《大江日报》的广告。

下面是从1935年4月出版的《社会新闻》杂志第11卷第3期上查到的广告，用醒目的大字标出“姚蓬子”三字：

> 《大江日报》，芜湖大花园烟西墩。本报行销长江流域及安徽全省与芜湖市。
>
> 《大江日报》副刊，姚蓬子主编，日出二版。内容取材精警，趣味浓厚，执笔者均系现代有名作者，并由蓬子创作长篇小说：《十年间》。

怪哉，一家报纸的广告，不提社长，不提总编，却要突出副刊的主编，突出姚蓬子的大名。

其实，这广告的潜台词，无非是在说：你们看，自从姚蓬子脱离共产党之后，干得挺不错呀！

姚蓬子呢？反正已经成了过河卒子，那就只有拼命向前了。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见报的前一日—5月13日，对门的房子搬来了新的邻居。

徐恩曾早已告诉过他新邻居是谁，并把监视新邻居的任务交给了他。可是，他的新邻居并不知道他住在对门。

那天，姚蓬子下班，刚走进明瓦廊的院子里，突然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惊呼：“蓬子！蓬子！你住在这里？”

“嗯，嗯。”他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蓬子，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住在这儿？我们成为门对门的邻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说着。

姚蓬子赶紧往自己屋里走。那女人还想跟进来与他聊聊，他连忙把门掩上。

那女人双眉紧蹙，不知道姚蓬子为何如此冷淡？须知，当年她与姚蓬子曾是《北斗》杂志“三驾马车”中的“两驾”！

她，丁玲，已经整整一年失去了组织联系，骤然见到姚蓬子，她怎不欢呼雀跃？

记得，1928年12月5日，上海松江县城，当施蛰存先生[139]与陈慧华女士举行婚礼之际，丁玲和沈从文从上海赶去，参加婚礼的还有戴望舒、冯雪峰、刘呐鸥、林徽因等作家、诗人。在那里戴望舒介绍她结识一位年轻诗人，他便是姚蓬子。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从松江回来后，他与她便常来常往。他们住得那么近，两条马路紧挨着。姚蓬子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丁玲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谈起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谈起他们正在筹备成立的左联。后来由于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她也去济南了。

记得，1930年5月，当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与丁玲先后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在这危难之际，首先前来探望并给予可贵帮助的，便是潘汉年与姚蓬子。

记得，同办《北斗》的那些日子里，她与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着经商的本领，很快就弄来了纸张，谈定了印刷。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错的，能干的。

丁玲迁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周年纪念日。1934年4月，丁玲的母亲和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5月13日，她、冯达、母亲、儿子一起，获准入明瓦廊居住。

1985年6月中旬，笔者在北京西苑宾馆见到丁玲。“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正在那里举行。一头银发的丁玲站在话筒前，发表了十来分钟的即席讲话。趁她休息之际，我去找她，想跟她约个时间，请她谈一谈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没有时间。”她对我说道，“我已经写完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姚蓬子。你看了回忆录之后，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明白或者不详细，我们再约时间谈。”

我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还没有读到她的回忆录，她却于1986年3月4日病逝。

在她离世后一年，她的遗著《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发表了。我细读全文，果真，内中许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谈到徐恩曾。特别是其中《与姚蓬子为邻》一节，详细写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无法请教丁玲了。

在这里，我只能摘录丁玲的回忆录来代替对她的采访。

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 快到6月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了上什么！”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

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

丁玲又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她与姚蓬子的认识、交往，描绘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还是在1928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上海淡水路—引者注），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1930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罗，冯雪峰罗，柔石罗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1931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1932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丁玲于1933年5月14日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家中被捕，押往南京。这年冬天，被软禁于莫干山。1933年底，被押回南京，软禁于“曹先生家”。1934年4月，丁玲的母亲和丁玲的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同住，于是，在5月13日迁往明瓦廊—引者注），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即姚文元—引者注）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啊！我一下跳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

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像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不久，丁玲与冯达结婚。冯达原为史沫特莱的秘书，中共党员。1933年5月14日晚，丁玲和他同时被捕，事后丁玲才知，是冯达告密，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她的地址—引者注）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

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

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干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1936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的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1934年5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1934年9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10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1935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1935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似应为《大江日报》—引者注）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

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

1936年5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即李达夫人—引者注）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引者注）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南京“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勃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

经过严格的审查，1940年10月4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

这些批评……”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成了徐恩曾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1936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南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像《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1905年2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 P. Harris，1868—1947）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1912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笔者在近几年多次访问台湾，在台北见到那里仍有扶轮社的招牌。

[image]

■ 至今台湾仍有扶轮社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1987年10月13日，我前往上海浦东拜访汤静逸先生时，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已经白发似雪，年已九旬。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
>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
>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写了[140]。

过了不久，记得两个穿军装的人，到上海市监狱提审我。他们要我讲姚蓬子的情况，我就把已经写进材料的那些事讲了一遍。不料，他们听罢，拍台子，大声骂我“狗胆包天”！他们警告我，今后绝对不许再写、再讲关于姚蓬子的事，不然就会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属于“防扩散材料”！

那两个军人走后，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长”。显然，那两个军人是姚文元派来的。他们要封住我的口……

其实，在南京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早在1955年当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审查时，他便亲笔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白纸黑字，迄今仍保存在公安部的档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要我在那里写。我写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华汉、冯雪峰、郑伯奇、钱杏邨等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理事；还说以上的人都是左联的理事。我同鲁迅等办过《萌芽》月刊，同丁玲等办过《北斗》杂志，还自己编过《文学月报》。我加入党是潘汉年介绍的。

关于左联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说先是潘汉年，后是华汉。关于有哪些党员，我说有冯雪峰、华汉、钱杏邨等。

左联会员的住址，我说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都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同柳亚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住在什么地方也写上了。

这以后，张道藩到狱中来过一次，是在法官的审判室中接见我的。他说已看到了我的叛党的自白书，不久就可以觅保释放。

我既已成叛徒，而且拿着中统特务机关的津贴而成为它的一员。

到汉口以后，我先在中统临时办事处看到徐恩曾，他说每月仍给一百元津贴……

活口难封，事实俱在。每一个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脚印所组成的。在1956年，姚蓬子就已被公安部定为叛徒。

姚蓬子在被捕之后，先是出卖党的机密，继而公然发表脱党宣言，进一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甚至与徐恩曾攀上干亲—这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用双脚走过来的。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其中的桥梁，便是姚文元。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的目击者之一，是袁孟超。

袁孟超，原称之为“中统特务”。这是依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关于袁孟超的小注：“中统特务，已宽大。”

笔者在1997年底收到袁孟超亲属的来信，寄来中共中央组织部1987年5月3日《案件复查通报》第9号。《通报》指出：

> 袁孟超同志现为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省政协委员，四川资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释放后，被南京特工总部（中统局前身）管制，在此期间曾任俄文翻译、编译股长。从事过文化活动。同时，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47年参加我党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行反蒋活动，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党员。
>
> 对他的这段历史，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定为“叛变，充当文化特务”。1981年上海市公安局撤销了这个结论。1986年吉林省委又进行复查，认为袁孟超同志不属中统特务，并批准从1949年9月作为重新入党，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47年算起。

袁孟超在1991年去世。

据袁孟超生前所写的材料，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的经过是这样的：

> 那是在1936年5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楼上，忽地笑语飞扬，热闹起来。
>
> 徐恩曾挽着他姘妇费侠的粉臂，笑吟吟走来，跟在门口恭候的周伯良握手之后，上楼来了。已在楼上等候徐恩曾光临的，有中统特务卜道明。此外还有袁孟超和妻子傅伯群、姚蓬子和儿子姚文元。
>
> 东道主周伯良，乃国民党特工总部总务科长，水果店是他开的。眼下，他在楼上又开设了西餐馆，特请顶头上司徐恩曾及几位弟兄赏光。
>
> 几杯黄汤下肚，弟兄们的话就多起来了。“作家”姚蓬子，自然成了话题的中心。
>
> “蓬子，你的大胖儿子，一脸福气！”费侠摸着五岁的姚文元的脑袋，把他搂在怀里。
>
> “蓬子的儿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像蓬子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家！”徐恩曾也夸奖道。
>
> “你们这么喜欢蓬子的儿子，就把他给费侠吧！”卜道明笑道。
>
> “不，不，蓬子才一个独养儿子，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徐恩曾连忙说道，“还是做干儿子吧。蓬子，你看怎么样？”
>
> “那可太好了！”姚蓬子巴不得呢！
>
> 于是，姚蓬子当即成了“导演”。
>
> “文元，叫寄爹！”姚蓬子“教唆”儿子道。

“寄爹！”姚文元不愧为好“演员”，马上对着徐恩曾喊了一声。

徐恩曾这“笑面虎”，此刻放声大笑起来：“好儿子！好儿子！”

“文元，叫寄娘！”姚蓬子又“教唆”道。

“寄娘！”姚文元朝着费侠甜甜地喊了一声。

“真乖！真乖！”费侠亲了亲姚文元的圆脸蛋。

“干杯！我们为徐主任和费侠有了干儿子干杯！”卜道明站了起来，高高举起了酒杯。

“干杯！”姚蓬子也举起了酒杯。

几只酒杯相碰，发出叮当的声音。

徐恩曾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进一步与姚蓬子结成“亲密关系”而欣慰。

姚蓬子也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巴结徐恩曾，有了坚牢的“后台”而高兴。

1937年12月，当日军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的时候，徐恩曾西装笔挺，挽着费侠，徐徐步入汉口天主堂。他和费侠的婚礼，正式在这里举行。他们先同居，后结婚。

在贺喜的人群中，自然是少不了“干亲”姚蓬子的。他紧紧跟随着主子来到汉口，参与了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还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发表了“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在婚礼正式举行之中，费侠便由徐恩曾的姘妇“转正”为第三任妻子，当然也就成为姚文元的名正言顺的“寄娘”。

徐恩曾婚姻经历，汤静逸记得很清楚。据汤先生告诉笔者：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字可均，生于1898年。此人颇为风流，一表人才，有“美男子”之称。

徐恩曾原本是学工的，曾去美国留学。赴美之前，由父母做主，娶一吴兴姑娘张氏为妻。这个原配妻子，后来一直被徐留在湖州，从不带她外出，嫌她是乡下女人。张氏生一女。

徐恩曾留美归来，又娶中统局宣传处处长王劫夫之妹王素卿为妻。王氏是东北人，生了子女四五人。

自从徐恩曾见了费侠之后，马上为之倾倒。

费侠何许人也？此人是湖北人，原本是共产党员，曾赴苏联留学，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一套布尔什维克理论。她长得很漂亮，白白胖胖，有一种健康的女性的美，有点苏联姑娘的气派。费侠曾在中共特科工作，并奉命打入国民党中统。

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费侠被捕。跟姚蓬子一样，费侠成了叛徒。

徐恩曾看中了费侠，任命她为中央统计局秘书，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徐恩曾常常带费侠外出兜风，关系浪漫，很快传入王氏耳中。王氏大发雷霆。徐恩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王氏送往成都。

在南京，徐恩曾与费侠只是同居。1938年春在汉口，徐、费正

式举行婚礼。从此，徐恩曾一直与费侠生活在一起。解放前夕，徐恩曾与费侠一起逃往台湾。

九旬老人汤静逸的回忆[141]，可以说是对姚文元的干爹、干娘的面目的最确切的描绘。

[image]
■ 姚文元母亲周修文的交待

费侠成为徐恩曾的夫人之后，加官晋级，当上了中统局总干事、“立法委员”。

姚蓬子跟随主子来到汉口，每月照领中统津贴100元。

姚蓬子住在汉口交通路。那是类似于上海四马路那样的文化街，书店集中在那里。姚蓬子又混迹于出版界了。

在武汉，人们常常看见费侠带着干儿子姚文元去看戏、看电影。姚文元成了联系姚蓬子与徐恩曾、费侠之间的一根“热线”。

大约由于有着相同的经历，加上攀了干亲，费侠与姚蓬子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费侠写了文章，送来请姚蓬子润色；姚蓬子写了文章，有时署上“费侠”两字加以发表！

两个叛徒，结成了“神圣同盟”。

就在这个时候，楼适夷[142]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也来到武汉，在《新华日报》社工作。

天下真小。楼适夷跟姚蓬子在武汉不期而遇了。先是有点尴尬，马上嬉皮笑脸，姚蓬子朝楼适夷打招呼。

楼适夷心中别扭，脸上也别扭，一转身，走了。

党组织知道，劝楼适夷还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

1938年2月17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楼适夷、郁达夫、冯乃超等共聚武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老舍负责，楼适夷担任编辑，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国民党这边有靠山，在共产党那边有熟人，左右逢源，两边都有关系户。他很会经营，袋里常常塞着大把钞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弄钱，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错，在中苏文化协会也挂上个头衔—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1938年10月25、26、27日这三天，汉口、武昌、汉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逃往陪都重庆苟安，姚蓬子紧跟紧追徐恩曾，带着妻子以及7岁的儿子姚文元也逃往这座山城。

明里，姚蓬子挂着《新蜀报》副刊主编的头衔。

暗里，姚蓬子依然干着中统特务的勾当，与徐恩曾保持着单线联系。

关于姚蓬子在重庆依然是中统特务，有着两份铁证。

徐恩曾的秘书袁逸之，曾写下这样的回忆："1939年，我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5、6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300元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卑躬屈膝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另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则是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重庆区区长张文，他也还记得："1939年至1940年期间，在设于重庆川东师范的中统局本部，我曾几次碰到姚蓬子。当时我任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笔津贴。"

从叛徒到中统特务，姚蓬子的"轨迹"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姚蓬子毕竟是聪明人。这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中国的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显的了。姚蓬子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了。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姚蓬子和8岁的儿子姚文元被压埋在炸垮的防空洞中，差一点昏过去。当空袭结束，姚氏父子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满街是断垣残壁和死尸。当他们回到家中，发现所租房屋破损，财物被贼人趁乱洗劫一空。姚蓬子无奈，只好在重庆远郊北碚乡一个叫金银岗的村子里，租了商人兼地主王老板的一间房暂且容身。

姚蓬子陷入困境。

对于姚蓬子来说，当诗人吧，写诗那点稿酬，如胡子上的饭粒；当作家吧，写什么呢？写左翼作品，徐恩曾不会放过他。写反共作品，会遭左翼作家白眼。办刊物吧，难！在南京，丁玲与徐恩曾那一段对话，丁玲转告过他，他是清清楚楚的。

稳而又妥的，还是开书店。进，可以自己印书出书；退，还可以销售别人印的书。不论进退，都可以赚钱。

他嗫嚅着，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开设一家书店，“独立谋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借给他一笔款子。

姚蓬子千恩万谢，接过这些新钞票，再三声言：一旦书店站稳脚跟，有所盈利，日后定然连本加息奉还！

于是乎，重庆白象街头冒出“作家书屋”的崭新招牌，经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这个书屋，兼出版社和书店于一身；姚经理，则兼编辑和老板于一身。

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

姚蓬子靠着徐恩曾的资助，终于在山城重庆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里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干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只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里。

原来，徐恩曾那时手中的新钞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乐得资助姚蓬子，以图日后偿还。

徐恩曾神通广大，他手下的中统特务获悉重要情报：中央银行的钞票，曾委托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在日军攻占上海之际，这批印钞票的铜版匆匆运往香港中华书局。香港落入日军之手以后，铜版被日本特务运回上海，在那里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悄然把日军印制的假钞票，运往重庆，抢购物资。徐恩曾从中发了大笔横财。自然，从中瓜分一些给日本特务。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钱，他借给姚蓬子的大沓新钞票，乃假钞票也（据作者采访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

直到1943年秋，中统的对头—军统头头戴笠，从浙江缉私处长赵世

瑞那里，获知两艘路过杭州的商船装有大量假钞，而船长持中统的证明文件不许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军统特务截船，把钞票空运至重庆。经中央银行鉴定，证明皆为伪币。

戴笠立即密报蒋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状。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统局局长职务。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于假钞票开张的作家书屋却没有倒闭。

姚蓬子毕竟在文艺界人头颇熟，拉稿颇有手腕，从名家手中弄到不少书稿。他算不上一个有实绩的作家，倒是一个会赚钱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书有号召力，易销，也就易赚钱。

1942年6月24日，重庆的《新民报》上，刊载了老舍的《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一文，可以说是当年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的生动写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问，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
>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草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
>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围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波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
>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
>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哦，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蛰存在80年代讲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随随便便、嘻嘻

哈哈、邋邋遢遢、马马虎虎是出名的。

自从办起作家书屋，姚蓬子便混迹于左翼文人的阵营。遇见老熟人，问起他这几年的遭遇，他便长叹一声：“唉，唉，当时在南京，我发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种地步，不来个‘假自首’，脑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如今我获得‘自由’，就‘过来’了。”

他，见一个，说一个，发表着他的新的“宣言”。

虽说他再也无法重新混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宣言”还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现于左翼文人的聚会。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里来了！

冯雪峰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化名冯福春，国民党警察局并不知道此人即冯雪峰。他被关入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重。消息传到上海，然后传到延安。毛泽东和陈云得知之后，马上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

几经曲折，终于由宦乡设法，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里保释出来。

冯雪峰从江西取道桂林，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冯雪峰尚属保释，国民党当局随时可以重新逮捕他，党组织便叮嘱冯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庆养病。于是，看中了作家书屋这个地方。

冯雪峰住进了作家书屋。

姚蓬子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冯雪峰的到来，无疑是给作家书屋刷上了红色。他的尾巴翘起来了。当然，他心中也明白：冯雪峰从不跟他提起党内的机密，也从不问及他在南京狱中的那段往事。

1944年5月3日，重庆文化界五十多人集会，发表《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坚决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在请愿书上写下大名的，绝大多数是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舍、茅盾、胡风、夏衍、曹禺、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阳翰笙、于伶、聂绀弩、胡绳、浦熙修、冯雪峰、叶以群、张友渔、石西民、曹靖华、郑君里、张骏祥、洪深、彭子冈、沈浮、吴祖光、侯外庐、焦菊隐……

在签名名单上，紧挨着茅盾的名字旁边，签着“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

那时候，姚蓬子在重庆城里办作家书屋，姚文元与母亲则住在重庆北碚乡金银岗。姚文元从8岁到12岁，一直住在那里。他每天要走六七里路到北碚镇中心小学上学，读完初小、高小。由于家境不宽裕，姚文元的母亲当时给人家做饭、洗衣，赚点家用钱。

1943年秋天，姚文元小学毕业，进入重庆南开初中上学，终于离开了北碚乡。笔者的文友刘兴诗[143]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他送给笔者一帧姚文元的照片，那是姚文元在那里上学时交给学校的证件照。

据刘兴诗说，姚文元在1944年曾因成绩不好而留级，尤其是数学很差。不过，他的作文不错，在全校排名第二。

刘兴诗回忆说，第一名是杨汝䌹（后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第二名是姚文元，第三名是刘兴诗，第四名是唐贤可，第五名是马雪生。

[image]

■ 姚文元在重庆上中学时的照片

当时的语文教师郑学韬曾说：“姚文元的作文，大部分都不错，但并不是篇篇都好。他也学习写小说，但是在他笔下，每一个主人公到最后总是死去。”

每逢星期六，学校里进行卫生检查，姚文元往往不及格。他的耳朵老是流脓，衣服也总是不整洁。教导主任公开宣布姚文元是“全班最脏的一个”。由于留级而且遭到老师经常的批评，姚文元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刘兴诗在1995年10月21日打电话给笔者，说是在1944年出版的重庆南开初中40周年校庆专刊上，见到姚文元的文章——这也许是姚文元平生最早发表的文章。此外，在专刊上还有白先德的文章。白先德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哥哥。

精明的投机商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像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曾任中统局第四科科长、秘书以及内调局主任秘书的孟真，在重庆的时候与姚蓬子常有来往。据孟真回忆，在姚蓬子离开重庆之前去看望他，“时已近午，他还高卧不起，原来昨宵雀战（打麻将）黎明方归。我问他：‘走不走？’他两手一摊：‘像我这样的生活，还能走到哪里去？’”[144]

虽说当时重庆到上海的飞机票极度紧张，头脑灵活的姚蓬子后来还是弄到飞机票，前往上海。姚文元则和母亲周修文、妹妹姚文华乘坐木船，一路千辛万苦，在三个月之后到了上海。

姚蓬子的作家书屋终于东迁了。1945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上海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蓬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的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像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

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于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的，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1946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訏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145]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

那时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板。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给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像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老板不在家，稿费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终于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费，那时物价已涨了几倍了。

姚家向来喜欢雇同乡穷妇作佣人：一是同乡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追查到家乡；二是乡下穷人好欺，给碗饭吃就够了。

据曾在姚蓬子家做过五年佣人的钱亚芬回忆：五年之中，姚蓬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工资！1931年，当姚文元满月的时候，姚家亲戚前来贺喜。钱亚芬抱着姚文元给姚家亲戚们看，人赏给她几十个铜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从钱亚芬手中拿走了这些赏钱，只给她三个铜板。后来，当钱亚芬终于离开姚家时，她的身边只有这三枚铜板而已！

姚蓬子的吝啬，在亲戚中也是出名的：家乡来了亲戚，住不了几天，就得赶快开步走。姚老板的面孔是铁青的。亲戚多住几日，他便会下逐客令，唯恐亲戚多吃了他家的饭菜！

他总是说自己穷。他也确实一副穷相：西装已经又旧又破，他还天天穿着……

物价像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146]，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地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

与他常来常往。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1937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在北碚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子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姚文元操碎了心

姚文元从重庆回到上海之后，于1946年夏进入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继续上初中。然而姚文元在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参加学生政治活动，这引起了姚蓬子的严重不安[147]：

> 艺中隔壁是务本女中，两校为校舍常常发生纠纷。艺中校方就借机挑动学生起来闹事。姚文元和许多学生一起参加了罢课请愿风潮，他甚至敢于带头出来和教育局的处长“说理”。最后他们才明白是被校方利用并最终出卖了。但是，姚文元的最大收获是，他的表现引起了学校进步学生王克勤、顾志刚的注意。他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通信往来，还给一个自办的杂志《新生》投稿。
>
> 在投机政治中吃了苦头的姚蓬子，坚决反对姚文元再走从政这条路。有一次，姚文元写给同学的一封信，因地址写错被退回。姚蓬子看到信中对政局不满，就严厉警告他：“你不要随便写来写去，搞政治会搞出事情来！”初出茅庐的姚文元当然不服气，也不知道父亲参加过中共又自首的经历，两人经常发生激烈争吵。

1947年，姚文元初中毕业，总算可以离开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使姚蓬子松了一口气。姚蓬子期望儿子能够考上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虽然姚文元未能如姚蓬子所愿，但是姚文元考上了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那也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颇远，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无所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不过，作为作家的姚蓬子，为儿子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习惯：从15岁起，姚文元就坚持每天记日记。

几十年来，姚文元一直恪守父亲的教导，从不间断地记日记。

即便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忙得不亦乐乎，他仍忙里偷闲，写下日记。

后来，姚文元成为“阶下囚”，他在牢房里仍每日写日记。

不论历史对姚文元如何评价，姚文元毕竟已经深深卷入中国当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姚文元的日记，成了这些重大事件的重要记录，因而

富有史料价值。

笔者以为，将来在合适的时机，《姚文元日记》会分批出版。《姚文元日记》，将成为姚文元一生的重要著作。

诚如周佛海，人生道路崎岖，但是此公也数十年坚持记日记。如今，分卷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追根溯源，姚文元从小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不能不归功于父亲姚蓬子的引导。

1948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1月28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1月18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1月29日，上海27所学校5000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3000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200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27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1月29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那个姓王的同学，叫王寿根，中共地下党员。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胀。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17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确实，大同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十分活跃的中学。据记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组织。1938年校内已有中共党员。1940年重建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有学生党员三十一名……"[148]

由于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2月3日，姚文元被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张榜开除。由于中共地下党员王寿根的帮助，姚文元得以转入上海沪新中学继续念高中。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

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1948年9月1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有什么要紧的事呢？

姚文元向父亲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149]。"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一·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又过了几天，姚文元告诉父亲，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

不过，姚蓬子这一回并没有反对儿子与那个中共地下共产党员来往。不言而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姚文元喜欢看书。他的书包里，装着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桌上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曰“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那些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你有《三S平面几何》吗？”一个方脸、白皙、戴眼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穿一身旧西装，左手拿着报纸，问姚文元道。

“没有。”姚文元答，“我只有《范氏大代数》。”

按照崔震教给的联络暗号，那位男青年跟姚文元对上了号。

男青年名叫郭坤和（又名郭民），是上海南中区的分区委书记。

他向姚文元讲明了对党、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然后，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问及了姚蓬子。姚文元如同对崔震说过的那样，又重述了“进步作家”姚蓬子的身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无法对入党对象进行外调。由领导出面，这样找发展对象谈话，就像是一种审查手续。

由于姚文元的隐瞒，当时的党组织不知道姚蓬子的严重问题以及姚文元和徐恩曾、费侠的关系。何况姚文元只是一个中学生，他的入党申请只是报到分区委。

一位当年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后来曾不胜感慨地说：“因为姚文元当时是个中学生，所以他的入党报告，只是送分区党委郭坤和同志审批。限于当时的条件，审批手续不过是郭坤和找他谈话。问及他的父亲时，姚文元说是鲁迅的战友等。如果当时上报市委的话，姚文元的入党报告，不会马上批准，起码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因为姚蓬子是叛徒，当时地下党上海市委是掌握的，是绝不会被姚文元所说的那一套‘鲁迅的战友’之类话骗过去的！”

感慨只是感慨，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不过，从冯雪峰1953年12月15日写给姚文元的信中透露：“我在你入党时，就知道的。”这表明冯雪峰当时就知道姚文元加入中国共产党。

崔震成为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只需一个介绍人）。经过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讨论通过，经过分区委批准，顺顺利利，姚文元在1948年10月便举行入党宣誓。

“忠于组织，严守秘密，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郭坤和念一句，姚文元跟一句。念完誓词，姚文元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

据称[150]：1948年10月，姚文元刚刚秘密加入党组织几天，冯雪峰

看见他就笑嘻嘻地说：“姚文元，现在你进步了，好极了！”姚蓬子在旁一声不响。

姚文元入党之后，作家书屋二楼便常常成为沪新中学地下党开会的场所。每逢这种时候，姚蓬子知趣地回避了。

沪新中学的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地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姚文元由于工作积极，入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以及沪新中学高二甲班的分支部委员。解放前夕，姚文元已是支部之下的分支书记。

后来，姚文元在履历表上写“担任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那是给自己提了一级。

[image]

■ 地下党小组长孙志尚关于姚文元入党的回忆

[image]

■ 地下党支部书记冒金龙关于姚文元入党的回忆

我在访问当年沪新中学地下党的好几位老同志时[151]，他们一致严肃地指出：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先是孙志尚同志，后为冒金龙同志。1949年2、3月间，由于新党员不断增加，沪新中学地下党成立了总支，总支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分支部。姚文元是高二年级甲乙两班的分支部书记。姚文元在解放后填表，自称是“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显然不符合事实。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攻下上海城。

入党不过七个月的姚文元，年纪不过18岁，学历不过高中二年级，从此却有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曾经是地下党员。

在“文革”中，在大庭广众之中，姚文元曾不止一次吹起了自己的光荣史。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解放以后，姚文元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下面两个姚文元的镜头，时隔20年，反差是那么的强烈。

1949年初冬，上海还不算太冷，一个穿着蓝得刺眼的干部式棉衣的剃平头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车后的书包架上，捆着一大包刚刚印出的《青年报》。

此人便是姚文元。当时他还在继续念高中，课余兼任上海《青年报》的发行员。由于这一职务不属国家干部正式编制，他没有领到国家供给的棉干部服。不过，那象征着革命的棉干部服，对他的吸引力未免太大了，他就自己花钱，请人照样仿做了一件。只是所买的蓝布颜色太艳，叫人一看便知道是仿制的。

20年后—1969年，姚文元穿一身崭新的军装。这军装在当时是革命服。他以一个“武化文人”的姿态，出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当年的新闻公报这样报道大会开幕式：“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了闭幕式时，新闻则这样报道：“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新当选的38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

从20年前的一个普通高中生，到20年后成为党的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道路是令人寻味的。

其实，姚文元开初并没有坐上“火箭”，而是骑着“自行车”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他甚至一度车翻人仰，跌进沟里。

在档案里，我看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1949—1950.2　南二区工作
1950.2—1950.7　因病在家休养
1950.7—1951.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干事
1951.10—1951.12　团校学习
1951.12—1952.5　三反工作队队长
1952.6—1952.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2.10—1953.3　团校学习
1953.3—1953.4　卢湾区团委
1953.5—1953.8　卢湾区团委宗教办公室

1953.9—1956.5　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职工教育科长

也就是说，解放后七年，姚文元也不过是个科长。

也许由于太简略，有几处我不知何意，或者不知其详。

比如“1949—1950.2　南二区工作”，这“南二区”是什么意思？请教了姚文元当年的老同事，方知这是指他在团的南二区担任《青年报》的发行员、通讯员，“白天来来，跑跑基层，分分报纸”，如此而已。当时的“南二区”由上海的卢湾、蓬莱、邑庙、嵩山地区组成。姚文元在团的南二区委里，只有一个抽屉罢了，并非正式工作人员。

所谓“因病在家休养”，这病，据说是心脏病。

令人不解的是，“因病在家休养”的姚文元，在那五个月里，两度跟随父亲姚蓬子前往北京。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有一家以涮羊肉名闻遐迩的东来顺饭馆。一位有着跟姚蓬子差不多的叛变经历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在那里宴请姚氏父子。

老朋友跟姚蓬子沉湎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姚文元只顾自己涮着羊肉，一块一块送往嘴巴里。

突然，那位姚蓬子的老朋友，把脸转向他：“文元，你还记得你的寄娘费侠吧？”

“记得！”姚文元立即点头道。

[image]

■ 姚文元1949年填写的干部登记表（部分）

[image]

■ 姚文元1953年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部分）

“你还记得你的寄爹徐恩曾吗？”

“记得！记得！都记得！特别是寄娘，待我特别好。”姚文元连连说道。

这时，那位姚蓬子的老友压低了声音，姚氏父子把耳朵伸了过去：“你们知道吗？文元的寄爹、寄娘，都跑到台湾去了！”

姚文元的神色陡变。

姚蓬子双眉紧皱，当即说：“这件事，今天说到这里为止，不要再提

了！”

姚文元马上附和道：“对，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他，在“因病在家休养”前夕—1950年2月，总算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论他在入党或转正的时候，都从未向组织上交待过他与徐恩曾、费侠的关系。此后，他更是守口如瓶，就连两度随父去京广访父亲故旧，他也从不对党组织提及一句。心中有鬼，唯独他自己明白。

至于“1951.12—1952.5　三反工作队队长”，姚文元言过其实。不论是他当时的顶头上司，还是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一致证明：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分局组织的“三反工作队”的一名“打虎队员”，担任过联络员，从未担任过队长。

留存在当年的老同事们的记忆屏幕上的姚文元形象，大抵是这样的：

独来独往。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

懒得出名。那件鲜蓝色的棉干部服，穿了几个冬天，已经油光可鉴了，他照穿不误，不洗也不刷。同事们称他为“卖油条的小贩”，他也笑笑。臭袜子、脏衬衣之类，要等星期天带回家去，叫保姆冯金芸洗，他自己连块手绢也不洗。头发总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时候，才进理发店。每天早上，他总是机关宿舍里起床最晚的一个，从不参加做早操。

午睡时懒得连鞋子都不脱，斜着躺在床上。

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别的书经常换动，但是姚蓬子著的《论胡适实用主义》小册子一直在书架上。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穿着棉干部服，做着作家梦。

如果不把姚文元1944年在重庆南开初中校庆专刊上发表的文章算在内，姚文元平生第一篇公开见报的文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女作，那是在1949年4月，作为“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征文发表的，题为《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署笔名“志毅”。当时，姚文元18岁。

另外，在1946年2月21日上海的《大晚报》上，查到《老城隍庙一瞥》，署名“文元”。是否系姚文元所作，待考。但是“志毅”写的那篇书评，确系姚文元所作。因为那篇文章收入姚文元所著《细流集》一书，列为首篇。

1949年6月22日，上海《青年报》的“读者之声”专栏里，刊出一位读者的千字短文，题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署名“沪新中学姚文元”。这时的姚文元，是《青年报》的通讯员。

此后将近两年，姚文元没有发表过文章。

1951年4月12日《解放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里，终于冒出“姚文元”的大名，他的来信标题为：《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

这年秋天，姚文元步入上海天宫剧场，看了滑稽戏《活菩萨》。这时的姚文元虽然只20岁，已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左”派精神，在剧场里坐不住了，认为这样的戏太庸俗。他感到惊讶，竟有那么多的人观看《活菩萨》！不久，1951年11月《文艺报》的“读者中来”专栏里，发表了《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认为《活菩萨》拥有那么多观众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文章虽然不过千把字，批评的调子却唱得很高。此文署名：“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姚文元”。

写这样的文章，姚文元觉得顺手，就沿着这条路写下去：写了《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写了《错误的了解》。在1953年8月的第16期《文艺报》上，又在“读者中来”专栏，发表姚文元的《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一文，批评了“由于出版者唯利是图，有的集子编进了一些不健康的‘冷门’歌曲，以示其‘突出’……”

从1949年至1954年的六年时间里，姚文元总共只发表八篇“豆腐干”文章，要么“读者之声”，要么“读者中来”，要么“读者来信”，一会儿批滑稽戏，一会儿批歌曲出版工作……姚文元意识到，这几篇“豆腐干”文章，离大作家太远了！

在他调到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当宣传干事之后，一心一意要写长篇小

说—大部头。他要写的小说，据说是受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启示，名曰：百炼成钢！

这是一部“史诗”般的皇皇巨篇，从红军长征、土地革命，从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直写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写到“三反”、“五反”运动。

用姚文元自己的话来说：“我花费了不知多少个星期日和夜晚，查资料，写作……”

当红军进行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3岁娃娃，他只能靠着查资料来写“史诗”般的小说。

足足写了四大捆稿纸，姚文元终于把《百炼成钢》写出来了。

他以为这一炮足以使中国文坛震动，可是，一纸退稿信，把这部巨著打入了冷宫。

整整一个月，他闷闷不乐，一下班就躺在床上。哦，《百炼成钢》成了一堆废铁！

他终于从退稿中醒悟，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

他毕竟是从作家书屋里出来的，他从小就见过许许多多作家，他读过许许多多作家的作品，他铁了心，要当一位作家。

他在思索，他在寻找文坛捷径。忽地，他的眼前一亮，藤书架上的几本书吸引了他：那是作家书屋出版的胡风著作。

他想，不写小说，专搞文艺理论，不也能够成为大作家吗？胡伯伯，不就是活生生的榜样！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虽说姚文元在父亲的提携之下，见过鲁迅，见过瞿秋白，可是那时的姚文元乳臭未干，尚在牙牙学语之际。然而，胡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姚蓬子常常让儿子给胡风送稿子、送清样、送书，十几岁的姚文元已经知道什么是大作家了。姚蓬子把儿子当作交通员，为的是让儿子早早结交文艺界巨星。

每当胡风来作家书屋闲坐，姚蓬子也总是把儿子喊来作陪旁听大作家的高谈阔论，以求受到文学的熏陶。

自从《百炼成钢》告吹之后，姚文元把目光转向胡风。

油汗淫淫，姚文元在家中底楼的书房里，翻找着胡风著作。

姚蓬子成了他的老师，指点着他怎样研究胡风著作。

在机关里，姚文元传出风声，他要给机关干部作一次文艺讲座：论胡风文艺思想。

大抵由于姚文元的口才太差，他似乎忙着以笔代口，写起长长的讲稿。因为是为机关里准备讲座，所以他在上班时间，也忙于写讲稿。

其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姚文元哪里会把给机关干部作讲座放在心中，他在起劲地写一部厚厚的文艺理论著作：《论胡风文艺思想》。

他想，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不了，出版一部长篇文艺理论著作也能在文坛崭露头角。

说实在的，姚文元的运气实在太糟糕：就在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心领神会、烂熟于胸，就在他的《论胡风文艺思想》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文坛风向大变！

在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风波迭起：先是俞平伯在《红楼梦》中的研究观点，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联席会议。渐渐地，批判的矛头转向了胡风。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其中的第三部分便是“胡风观点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读着周扬的报告，冷汗湿衣衫，姚文元先是震惊，继而沮丧，辛辛苦苦写成的《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不言而喻，泡汤了！

细思量，姚文元却又暗自庆幸起来：多亏他的讲座还没有讲，讲稿也未曾送出版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出去的话，发出去的文章，如同泼出去的水。所幸水尚在盆中，盆尚在手中！

震惊过去了。沮丧过去了。庆幸过去了。姚文元之所以成为姚文元，在这关键的时候，显示了他的特点。

子肖其父。姚文元跟他的父亲一样，最拿手的好戏，莫过于“反戈一击”！

别以为直到“文革”，才发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姚氏父子早就谙熟“反戈一击”之法。

姚文元在1956年7月24日《新闻日报》上发表的《理论家和墙头草》一文，倒是他的绝妙的自我写照。那篇文章中，姚文元写了这么一位“猫先生”：

> 那天晚上，猫先生的愿望在梦中实现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一棵根扎得很浅的野草插在短墙上，在风中得意的摇摆。东来西倒，西来东倒，一点也不受拘束。他乐得唱起歌来：
> 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
> 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
> 因为我已变成一颗（应为棵—引者注）墙头草，
> 哪边风大我马上往那边斜……
> 歌未毕，突然一股强烈的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的向北倾斜，几乎成为九十度，表示他的正确性；可是他斜得太厉害，本来很浅浅的根竟有一小半从土中脱出来了；这时北方又吹来一股大风，他就向南方猛烈的弯腰，这一下弯得太厉害，竟把根全部从浅浅的土中拔起来，没有等到第三次弯腰，他就摇摇晃晃从墙头一头倒栽下来。
> “救命！”理论家大喊起来，浑身渗透了淋淋的冷汗，连毛都粘在一起了……

这位“理论家”猫先生是谁？正是姚文元自己！

见风使舵，已成为姚文元的“理论”的诀窍。这位“理论家”最初的精彩表演，便是从“颂胡风”一下子倒向“反胡风”。

姚文元对胡风打了第一枪—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文。

这是一篇以《文艺报》通讯员的身份写的文章，口气却不小，不仅胡风受到斥骂，而且连《文艺报》也捎带着被批评了一通：

> 老实说，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

> 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论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问题一直存在……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侮诬蔑党的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 我是一个《文艺报》的通讯员。我认为《文艺报》的通讯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是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据我的看法，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种骄傲自满的权威情绪终于使通讯员和《文艺报》的联系一天天削弱，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

姚文元此文写于1954年12月16日深夜，是“看到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于是急急忙忙赶着政治浪潮而写。他自命为“新生力量”，要在反胡风运动中大显身手了。

姚文元跨进《萌芽》编辑部

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13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1956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订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1955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7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1956年5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25年前—1931年1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

《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25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像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啰，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1955年6月18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1956年6月30日，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1956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6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152]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1956年6月3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僮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

[129]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30]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31]据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3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3]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4]1986年7月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老作家任钧教授。

[135]也有人称，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是宣中华，但是宣中华于1927年4月17日牺牲于上海龙华，而姚蓬子的入党时间为1927年年底。

[136]有人称姚蓬子担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但是并无确证，而姚蓬子任“河北交通”，则见诸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

[137]姚克：《“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上海滩》1996年12期。

[138]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39]1988年9月8日下午，叶永烈采访施蛰存于上海。

[140]经查阅档案材料，汤静逸曾于1967年11月6日写了《关于姚蓬子叛充反动派文化特务的情况》，1968年1月12日写了《有关姚蓬子和中统的关系问题》。

[141]1987年10月13日，叶永烈采访国民党中将汤静逸于上海。

[142]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43]1992年10月10日采访。

[144]孟真：《中统与我》，载《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5]1988年2月29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

[146]实际上那三层楼房是建在英籍商人哈同的土地上，按照合同，房屋产权在1954年12月31日起归哈同公司所有。

[147]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48]陈佐辉、董生甫：《大同中学地下党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片断》，《上海文史》1991年第3期。

[149]1986年9月7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崔震及支部书记冒金龙、孙尚志。

[150]据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151]1986年9月7日，叶永烈采访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崔震及支部书记冒金龙、孙尚志。

[152]1956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第七章　江青“偶尔露峥嵘”

江青飞往苏联疗养

1949年3月24日，虽然江青通宵未眠，却异常地兴奋。向来很讲究作息规律的她，这一回规律完全被打乱了。

江青随着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河北涿县火车站时，已是25日凌晨2点。

喷着水汽的火车头，带着七八节车厢，正在车站待命。虽说江青当年往返于京沪之间，火车没少坐，这一回却头一次乘软卧车厢。上车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各占一间软卧房间。

平津战役已经结束。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市，全歼守敌13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毛泽东任命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黄克诚。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

毛泽东的专列，从涿县驶往北平。

一路上，毛泽东也显得兴奋。他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153]

涿县离北平不远。清晨，专列便驶抵北平清华园车站，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已在车站迎候。

[image]

■ 1949年，江青、毛泽东、毛岸英、刘松林（后左起）、李讷（前）在北平双清别墅（徐肖冰　摄）

毛泽东坐进美国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一辆道奇牌小轿车，直奔北平西郊。从此，毛泽东和江青便下榻于那里的香山双清别墅。

就在毛泽东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5时，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上万人拥集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在那里检阅了部队。一些外国记者听说毛泽东出现在北平西苑机场，纷纷报道毛泽东“飞抵”北平。其实，毛泽东是坐火车前来北平的。

《人民日报》出版号外《毛主席飞抵北平》。北平震动了。中国震动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鲜明的标志。

江青也为此而兴奋。这意味着，她已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进入北平之后，毛泽东加倍的繁忙。他要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他要会见各界人士，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要着手于建立新中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就在这时，就在进入北平一个来月，江青走了，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北平。

江青上哪儿去了呢？

1949年5月21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说：“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154]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其实是经过东北去苏联治病。

江青先后四次前往苏联治病。这次1949年4月初是江青第一次去苏联治病。当时江青高烧不退，不知是得了什么病。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以及警卫员、护士和一位俄国大夫，从北平坐火车到沈阳，再从沈阳往北，进入苏联。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北平有那么多的大医院，那么多的大夫，她看不上眼。她要去苏联看病，借此去国外开开眼界，休养一番。她从未出过国，而那时出国，诱惑力最大的是老大哥苏联那里。

据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记载：

> 在1949年3月期间，江青回忆道，在行进中她已筋疲力尽，自己都怀疑她怎么能在最后的阶段坚持住。当作出结论和安排妥当后，一些领导人没有在主席的授意下，就决定：由于她身体虚弱，把她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
>
> 为什么她患有重病还要行程数千里去一所外国医院？多年的冲

突已经毁坏了许多中国的医院。在50年代的早期，医疗机构到处都处在可怕的混乱中。于是求助于斯大林，他也有义务进行安排。因此在到了北京几天后，她和几个护士以及警卫员就被塞进了火车。火车穿越了中国的最北部然后进入了苏联，这是她知道的唯一外国。在莫斯科火车站，一辆救护车来接她。医院给她安排了一张“中国付款”的病床。

她终于得以成行。她尝到了“第一夫人”的尊荣滋味。

到达莫斯科，她被安排住在斯大林在市郊的别墅。

李讷随江青一起疗养。苏联很尊重她，因为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后来还安排她到南方黑海海滨，住进雅尔塔疗养院高级房间。对于她来说，从1937年秋进入延安，到1949年春进入北平，在山沟沟里生活了12个年头。如今，35岁的她，可以尽情享受一番，苦尽甘来了。

在莫斯科，江青一称体重，只有42公斤。她的病状是持续发烧。

经过苏联专家会诊，确认发烧的原因是扁桃体炎：先是右侧的扁桃体发炎，然后影响到左侧。苏联医生为江青做了切除两侧扁桃体手术。手术只用了半小时。

据朱仲丽回忆，江青无大病。苏联医生的检查结果是除了官能性神经过敏之外，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用不着住院治疗。

于是，江青就乘火车旅行了一千多里，到了黑海边上的旅游胜地雅尔塔的疗养院疗养了一个多月。

关于江青在苏联治病的情况，很少见于书刊。1992年俄罗斯《半人星马座》杂志第1至2期，发表了当年担任江青翻译的A.N.卡尔图诺娃的回忆文章《我给江青当翻译》，详细透露了真实的情况。陈立思翻译了此文，发表于1993年第5期《人物》杂志。

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当时她25岁，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毕业不久，从未当过汉语口语翻译，幸亏江青的普通话很标准。另外，后来又来了一位中方女翻译，她叫林利（当时叫李利），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女儿。

现将卡尔图诺娃的回忆文章摘录于下：

> 1949年6月，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B.R.格里戈良对我说，江青此行是秘密的（她在苏联用尤苏波娃这个姓），并强调，领导对我高度信任，而我则不得把此事告诉任何人，除非是那些必须知道此事并将与我共同工作的人。他讲了我的职责的大致范围，再次强调说，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客人觉得在莫斯科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使她对在我国进行的治疗、休养和日常生活氛围都感到满意。至于

其他的一切工作，在此期间我都可以不做。

那时我只有二十五岁。在上述部门做中国问题初级专员刚刚一年。也许，正是由于年轻不懂事，接受这项任务时我竟然丝毫没有感到紧张不安。

在飞机抵达前我和部领导的代表已经在弗努科沃机场迎候了。江青的身体很虚弱。她是躺在担架上抬下飞机的。我们简短地问候了一下。就同医生护士一起把江青护送到莫斯科郊区一座专门为外国贵宾准备的别墅去。考虑到病人的身体状况，把她安排好，大多数人很快就告辞了，只留下医生、护士和我。这时我才初次体验到紧张：因我还不习惯的这种工作中会发生什么事呢？

卡尔图诺娃十分客观地记述了她对当时的江青的印象：

她身材优美，穿着得体（她穿长裤和连衣裙都同样惹人注目，不过连衣裙只有天气很热并且是接待客人或者外出时才穿），举止文雅。她有一双生动活泼的杏仁似的黑眼睛，五官端正，但牙齿略微向前突出了些，一头漂亮的黑发向后梳，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十指纤细。身高一米六四。心情好的时候她也会露出富有魅力的、愉快的微笑。

依我看，江青的记性很好。那年夏天和她见过面的人，谁叫什么名字，她一直都记得。她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形势也有相当的了解，更不用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动态了。总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长年“泡”在大量的信息当中（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她的办公桌上），已经修炼得能够毫不费劲地记住它们了。

再谈谈她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不得不惊叹她在同来探望她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交谈时驾驭对方的能力。我看她怎样变换谈话的调子和话题，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对什么人应把握什么样的分寸，她总是测度得很准确。我想，昔日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经历对于她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江青第一次在苏联治病的经过，卡尔图诺娃写道：

从江青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她就特别关照，房间里的温度要保持在22—23度。为江青做了一系列的医疗检查。我们陪她前往坐落在格拉诺夫大街上的医院（当时叫克里姆林医院）。我自然是要陪同全过程的，因此能接触到她的病情哪怕是最细微的情况。可是出于纯粹的道德上的考虑，我不打算写出这些，尽管江青已不在人世了。我只能说，我们的医生关于江青病情已无法医治的诊断是对的。后来还是传统的中医起了作用—正是中医治好了江青的痼疾。

时间一天天过去。江青经过住院治疗，身体渐渐恢复。出院后她回到扎列奇的住所，散散步，能打打台球（这是按照她的爱好特地运来的）。

随着身体情况的好转，江青提出要去参观工厂（我们陪她参观

了留别尔茨的农机厂），也想了解集体农庄的情况。当然，最常去的还是大剧院，有一次她还在那里会见了谢尔盖·列梅舍夫。她还去过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同当时任院长的塔拉索娃以及该剧院的主要演员进行了座谈。

江青是个自高自大和性格浮躁的人。在莫斯科她就是随心所欲的。而她的喜怒无常，我是很清楚的。

有一天我去江青的单间病房，我记得，是在二楼。在门厅里我看见玛莎（她是库图佐大街裁缝店的裁缝）在埋首饮泣。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要是你赶上了这种事也得哭。我给她（江青）赶了一夜才缝好的连衣裙，让她试试，可是她却不愿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江青的情绪不好。可是，有意思的是，当我走进江青的病房，同她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她根本没提这件事，只是说，她今天不舒服。而玛莎则不得不多等几天再给她试衣服。

在苏联疗养期间，江青最为高兴的事，是见到了斯大林。

那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

在宴会上，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她那么年轻，以为她会怯场。她，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辞，脸上浮现笑容，说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饮而尽。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六个月，才回到北京。这是江青第一次前往苏联治病。

贺子珍顾全大局

江青在苏联的待遇，跟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可谓天渊之别。

1946年，王稼祥来到苏联治病。他的夫人朱仲丽是医生，陪同他一起去莫斯科。王稼祥的腹部被国民党飞机炸伤，他是躺在担架上进行艰难的长征。

王稼祥到苏联后，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竟被关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疯人院里！娇娇，也在苏联。

王稼祥跟贺子珍是老战友，听到这消息异常震惊。他随即向苏方交涉，要求会见贺子珍。最初，他得到苏方的答复是：“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于是，王稼祥设法让妻子朱仲丽以医生身份去探望贺子珍，也被苏方拒绝。

经王稼祥再三交涉，苏方才不得不同意把贺子珍和女儿娇娇送来莫斯科。

相见之时，贺子珍热泪纵横，哭诉她的痛苦经历：原来，失去爱子，加上又得知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双重的打击，使她陷入极度苦闷之中。她又身处异国他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于是形成了忧郁症状。苏方却把她当成“精神分裂症”，把她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受此酷虐的另一原因则是由于女儿娇娇。她当时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工作。娇娇来苏联后，生了一场大病，她不能不全力照料娇娇。娇娇还未康复，国际儿童院院长就要她上班。她和院长发生争吵。苏方院长斥骂道，“我把你关到疯人院去！”

疯人院里的生活如同监狱。贺子珍在伊万诺夫市疯人院苦度岁月。她想念女儿娇娇，可是，她却见不着娇娇。无尽的思念和内心的痛苦，日夜折磨着这位当年叱咤井冈山的女红军。

王稼祥的再三交涉，才使贺子珍跳出了苦海，结束了疯人院两年多的囚禁。临去莫斯科之前，娇娇回到了她的身边。

见到被剃成光头（疯人院里的病人一概如此）、憔悴、目光忧郁的贺子珍，王稼祥的心震颤着。她连讲话都结结巴巴，因为已多年没有人跟她讲中国话。

王稼祥问："你今后怎么办？"

贺子珍这一句话倒讲得很干脆："回国！"

王稼祥深深知道，如果她再滞留在苏联，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然而，她又有着她特殊的身份，回国该怎么办？

王稼祥发电报给毛泽东，讲述了贺子珍的情况和要求。

毛泽东迅即回电："同意回国。"

就这样，1947年秋，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来到了哈尔滨。

她回国后不久，苏方把毛岸青也送回来，跟她生活在一起。

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娇娇也给毛泽东用俄文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给娇娇写了回信。怕信太慢，他又加发了一份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毛泽东派人前往东北，把娇娇接到了西柏坡。

娇娇的到来，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娇娇给贺子珍去信时，总是谈及毛泽东的近况，转达毛泽东的问候。

1949年，当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石家庄时，在那里见到贺子珍胞妹贺怡。毛泽东曾对贺怡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155]

毛泽东没有说清楚"按中国的老传统办"是怎么个"办"法。不过，他表示"让贺子珍到这里来"。

贺怡去东北接贺子珍，打算让贺子珍和毛泽东重逢。她们坐火车来到山海关车站时，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所阻挠，告诫贺子珍不能去见毛泽东。贺子珍明白，有人从中作梗。

贺子珍在天津暂住。

1949年盛暑，江青正在苏联疗养，毛泽东曾指派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往天津，看望贺子珍。

阎长林是这样回忆的：

> 8月初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进办公室一看，娇娇正在沙发上坐着，毛主席先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
>
> 我们到天津，来到了市委招待所里。在这里，娇娇看到了她的妈妈。贺子珍同志一见了娇娇，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忙拉娇娇的手，把娇娇搂在怀里。
>
>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
>
> 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谈。贺子珍同志问了毛主席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我也讲了毛主席在战争中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看来，贺子珍同志也非常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
> 贺子珍同志还对我说："我带着娇娇到苏联去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事后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说到这里，她再也讲不下去了。[156]

阎长林带着娇娇回到北平，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阎长林也谈及了贺子珍对往事的一段回忆之言。

毛泽东听罢，说道："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这样，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通过娇娇的来往，互通信息，并致问候。但是，"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她已不可能再和毛泽东恢复过去的夫妻关系。

这样，贺子珍后来由天津前往杭州。

1950年，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曾联名给毛泽东去信，提及工作安排问题。

毛泽东意识到这封信的用意，在复函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这"顾全大局"四字，表明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期求。

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从此，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在杭州，在南昌，在上海。她出于对毛泽东的挚爱和真诚，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由于贺子珍顾全大局，江青的夫人地位完全巩固了。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1949年秋，当江青从苏联回到北平时，毛泽东已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

中南海位于北平的故宫西侧。那里有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中南海指中海和南海。所谓“海”，亦即湖。中海、南海都是人工开凿的。中海开凿于金元，南海开凿于明初。有了“海”，沿“海”建殿阁楼台，湖光潋滟，风景秀丽，成了皇家禁苑。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曾仔细巡视了中南海，建议选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未来的政务院的所在地。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选择。于是，1949年5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丰泽园。

丰泽园在南海之畔，建于康熙年间，原是康熙及其后的皇帝讲礼的地方。

江青带着李讷到了北平，小轿车接她直奔中南海。她平生头一回进入风光秀丽、曲径通幽、古色古香、绿树掩映的当年皇家禁苑，如入画中。进入丰泽园，跨过三座汉白玉石栏杆桥，一座坐北朝南的朱红小院便出现在眼前。那里叫“颐年堂”，如今成了毛泽东召开核心会议的地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常在那里跟毛泽东碰头。

从会议室往东，穿过一条小走廊，那便是当年皇家的菊香书屋。

北平刚解放时，第一个住进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林伯渠住的是北屋。不久，东屋和南屋分别安排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临时休息之处—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住在北平香山，每天进城办公，在此休息。5月，当毛泽东正式迁入中南海，整个菊香书屋都安排作毛泽东住所。从此，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定居，直至1966年8月。

毛泽东住在北房东头的两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卧室。

江青被安排住在北房西头的两间屋里。她和毛泽东的住房之间隔着一间门厅。

东房五间，中间的一间也是门厅，成为毛泽东一家的餐厅。东房靠北两间是办公室，靠南两间是会客室。

西房五间，中间一间是过道。南头两间是值班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北头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

南房五间，中间一间是穿堂。其余四间是毛泽东子女住房。

菊香书屋四面二十间屋子，构成四方形的封闭小院。中间的院子里铺着草坪，种着树，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从院中央穿过，交叉成“十”字。

菊香书屋是老房子，红漆斑驳。毛泽东叮嘱行政部门，不必重新油漆，只是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只是院内原本没有厕所，没有暖气设备，行政部门在那里建造了卫生间，安装了取暖锅炉。

虽说菊香书屋无法跟斯大林的别墅相比，但是比延安的窑洞毕竟好多了。江青住进菊香书屋，在北房跟毛泽东相对而居，这意味着她完全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不必担心由于贺子珍回国而造成的对她的夫人地位的威胁。

1949年9月27日开始，北平恢复原名北京。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此后不久，江青受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公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具有崇高的声望。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亲笔致函宋庆龄，并委派邓颖超前往上海问候宋庆龄。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157]

1949年8月28日，当宋庆龄应毛泽东之邀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一起去欢迎她。

10月1日，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1月，宋庆龄因事要从北京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显然，江青是很恰当的人选，因为对方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前去送

行。江青兴高采烈，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执行此次公务她“代表毛泽东”，亦即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社会场合公开露面。

当时，宋庆龄对江青最初的印象不错。宋庆龄曾对别人这么说起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158]

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

宋庆龄回上海，勾起了江青对上海的无限怀念。她，自从1937年离开上海，已经整整12年没有回到这座令她日思梦想的大都市。

很遗憾，毛泽东只派她为宋庆龄送行。倘若那次毛泽东派往上海专程问候宋庆龄的不是邓颖超，而是她……

然而，江青能够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为宋庆龄送行，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邓颖超毕竟是邓颖超，她不仅是周恩来的发妻，而且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跟邓颖超相比，江青差远了！如她后来在“文革”中所说，当时她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开国之初，江青是个“闲人”。毛泽东却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高度繁忙时刻。他自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直至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都在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1950年元旦，江青向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发去电报，提出请求，到“新解放区”看一看。

江青所谓的“新解放区”，实际上也就是指上海。

1950年1月4日，毛泽东从苏联复电在国内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刘少奇。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1月4日上午四时[159]

从毛泽东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那时江青想独自外出工作，不那么容易：

第一，必须征得毛泽东同意；

第二，“须得少奇同志同意”；

第三，“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廖鲁言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

第四，“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

第五，“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

第六，“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

由此可见，江青当时外出受到种种约束。

然而，她毕竟是“第一夫人”。在她到达上海的时候，受到饶漱石的亲自欢迎！

饶漱石称她为“朝廷特使”！

关于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的情况，几乎不为人们所知。所幸在美国记者维特克访问江青时，江青倒是细细地谈及此事，算是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江青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她第一次回上海，主要是由饶漱石负责接待。尽管饶漱石尽了“地主之谊”，而江青对他并无好感。

后来，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样加以记述：

>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上海她很熟悉，但已有十二年没有造访了。虽然她知道它的管理和文化生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她看到时还是非常激动。
>
> ……
>
> 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
>
> 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在她离开之前，饶漱石坚持陪她去百货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应为公安局—引者注）的局长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
>
> 饶漱石把她安排在被称作胜利大厦的饭店内。为了继续监视她，他决定在她停留上海期间也住在那儿。开始她被安排了一间朝南和有暖气的房间。她强调说，那年冬天房间温度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仍然虚弱。但是饶漱石已经意识到她房间的位置使她能够与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接触，当时他想断绝她与政权之外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来往。此外，如果她感到不舒服，她可以离开。他改变了房间的分配，他住进了朝南的最好的房子，她被移进了饭店的一

翼，朝北而且没有暖气。房间非常冷而且没有阳光。为了保暖，她穿上了她所有的衣服，把自己裹在所有她能找到的被褥里。“看医生”，在她最后向他强调她的病痛和发烧后他说。这不是她想要的解决办法，所以她就坚持着喝大量的水来退烧，最后他妥协了，允许她住一间有暖气的房间。

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他解放了上海和她的老家山东），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他的文化活动。

从饶漱石统治中国东部地区以来，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是使一个女人感到舒服自在，而是降低了她的身份。在会议上，他坐在江青对面，当介绍时戏谑地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

笔者在读《陈丕显回忆录》时，却发现他在书中提及了江青1950年的上海之行，而且陈丕显的回忆明显与维特克的记述不同。陈丕显回忆说：

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160]

按照陈丕显的回忆，江青并没有住在胜利大厦，而是住在陈丕显家二楼的书房里。1949年12月至1954年8月，陈丕显在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

江青曾一度离开上海，前往无锡。在那里，据说她考察了茶叶业和丝绸业。

她又从无锡返回上海，再从上海前往北京—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独立的外出工作。

江青在从上海返回北京途中，悄然在济南下车。这是她去延安之后第一次返回济南。

关于江青乘“去新区看一看”，回到济南，这在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李干卿在1976年12月1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可以得到证实：

解放后，我和江青有多次见面。我先后去北京两次，江青来济南五六次。1949年江青来济南时，我对江青说："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江青说："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1959年我去北京，住了四十天，江青把我接到中南海谈话。同年秋，江青来济南，我向他谈了济南铁路局要审查我的历史问题。江青说："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后来我又给江青写信，说有人找我的麻烦。1960年5月12日江青回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1973年我第二次去北京，住了十六天，江青在人大会堂接见我，送给我二斤茶叶，一架进口的照像机。对我的生活也有一些照顾，1969年把我的工资由六十四元五角提到八十三元，住房由两间增加到六间，还免收房费。

李干卿

1976年12月15日

李干卿所说的"1949年江青来济南"，就是江青"去新区看一看"这一次。

江青回到济南，令她最为痛心的是，她的母亲李栾氏已经去世。

江青从小对母亲的感情极深，尤其是见到母亲受到父亲的欺凌，她非常同情母亲。何况母亲在很艰难的处境中把她拉扯成人。她很想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然而，就在江青荣归故里前一年──1948年初，李栾氏病故。

江青在哥哥李干卿以及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母亲墓前。江青大哭一场──哭她母亲没有福气，没有享到女儿的福！

出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中宣部电影处是一个很小的单位，总共只有三个人，即两个干事钟惦棐和安琳，另外还有一个办事员沈美理。这个处只有江青这么个处长，没有副处长。

电影处处长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工作，江青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挂一个虚衔，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党内的正式职务。按她的级别，是不配备专车的。因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她有了轿车，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她也跃跃欲试，企图染指政治。她的最初的尝试，那便是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在1948年12月完成的影片，编剧姚克，导演朱石麟，由舒适饰光绪皇帝，周璇饰珍妃，唐若青饰西太后，洪波饰李莲英。影片完成之后，便在香港上映。1950年3月至5月，《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映。江青虽然息影多年，仍关注着电影界的动向，曾调看了许多影片，内中包括这部《清宫秘史》。

江青看了《清宫秘史》，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

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于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这位电影处处长发话了：“《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对这位电影处处长之言，不以为然。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还发表了与江青相左的意见。胡乔木此人，自1941年起便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跟毛泽东接触颇多。江青可以用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去吓唬红墙外面的人，却无法镇住陆定一、周扬、胡乔木这样资深的人物：当年转战陕北时陆定一“郑位”（政委），与毛泽东朝夕共事，而周扬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是上海文化界的中共领导人。

不过，她对电影依然关注。1950年7月11日，文化部颁布《电影新

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四个暂行办法，加强电影管理，同时又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加强电影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等，江青也被列为委员。另外，这天还成立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

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奖，封为“义学正”。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精神。1944年夏，陶行知在重庆遇见电影编导孙瑜，送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给他，建议他拍《武训传》。

事隔数年，1947年，当孙瑜从美国回国，正值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着手筹拍反共“戡乱片”。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知道孙瑜对武训有兴趣，建议他把剧本《武训传》写出来，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以抵制拍摄“戡乱片”。这样，孙瑜写出了《武训传》，于1948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赵丹饰武训。

到了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战火酣烈，南京岌岌可危。中国电影制片厂经费困难，停拍《武训传》。

1949年2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购置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经过一番曲折，直至1950年12月才终于完成，于1951年初上映。

这样一部历时三年，从国民党时代开拍、到共产党时代完成的影片，作者为了使影片切合新形势，一头一尾，加上一位女教师的旁白：

> 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义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
> 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
> 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编导尽量把这样一部构思、创作于旧时代的作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之后，最初的三个月，《武训传》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仿佛众人皆醉她独醒，她看出了《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她又一次向毛泽东吹

风。

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的意见，使江青万分欣喜。她有了“尚方宝剑”，便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跟上一回一样，江青只是说出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说明这是谁的话。

周扬仍不以为然，以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剌，便顶了她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1951年的形势，已经与1950年不同。1951年，文艺界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忙乱中走过来，开始抓批判工作。

1951年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不拿枪的敌人》。

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4月，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开展批判。

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4月25日，《文艺报》发表贾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

5月10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报》在5月15日、16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

四天之后—5月20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事隔26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

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扭转乾坤，成为全国解放后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这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纷纷登报公开检讨。就连郭沫若也牵涉进去了，因为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

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8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她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她说，她是山东人，能讲一口山东话，回老家活动方便，以“李进”的名字出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毛泽东同意了。

江青的行动计划被周扬得知，周扬派出他的秘书钟惦棐，协助江青工作。

《人民日报》得知这一情况，也决定派人参加。

这么一来，在1951年6月，便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总共13人，

江青以“李进”之名，参与其中。

这13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省在1949年设置，1952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冀南等地），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当江青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火车站，只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到了火车站时，毛泽东没有下轿车。不过，毛泽东亲自为江青送行，足以表明对于江青的山东调查之行的重视和支持。

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为了写《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袁水拍出了大力。毛泽东和江青曾经设家宴招待袁水拍，表示谢意。

毛泽东在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提及江青：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7月11日[161]

毛泽东所说的“此件”，就是《武训历史调查记》。

毛泽东嘱把清样连同原稿交江青，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主持这一调查的是江青。

《武训历史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毛泽东对每一部分都作了仔细修改。

《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晋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

的封建剥削者。”

《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批判电影《武训传》，对电影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夏衍回忆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162]

夏衍还说，当时电影厂流行一句话：“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挞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1985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有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 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163]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烟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毛泽东的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

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尝试着干预政治了。

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猷教授（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好友）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1951年7月28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9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9月6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10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12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1952年初，江青建议就武训历史调查团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这时的江青，大有“文革”初期那种批张三斗李四的味道──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的江青是50年代初期江青的重演。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1952年2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烟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病了。

江青这次生病，最初是感冒引起的。

1951年9月初，她从山东回到北京，又决定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image]

■ 江青在苏联

毛泽东同意她参加土改运动，她被安排到湖北农村。她随李先念等乘火车从北京前往武汉。

为了她的安全，李先念只让江青在武汉近郊参加土改。她仍以“李

进”的名字出现在土改工作组。

天气日渐转冷。在一场寒潮袭来时，江青感冒了。由感冒而咳嗽，进而演变成为支气管炎。她不得不从近郊农村回到武昌治病。

她终于病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

她从武汉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经大夫会诊，她患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好。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1952年8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回忆第二次去苏联治病的情形：

> 苏联医生直接把她送进了外科实验室去探查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积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两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
>
> 在那令人厌烦的雅尔塔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因没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
> 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再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突然发病的消息。斯大林逝世的庄严宣告几乎使每一个苏联人民好几天都陷入在极大的感情紊乱之中。
>
> 在这紧要关头，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他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作出。
>
> 举行斯大林葬礼的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当年担任江青翻译的卡尔图诺娃，在1992年俄罗斯《半人星马座》杂志第1至2期发表的回忆文章《我给江青当翻译》中，这么写及江青第二次去苏联治病的情况：

> 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请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

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有一天江青决定去看望在莫斯科长期养病的毛远叔（即毛岸青，当时化名杨永寿）。我知道远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有一段时间他的哥哥毛远福（即毛岸英，当时化名杨永福）和他同学，我们叫远叔“果里亚·远叔”，把他哥哥叫作“谢尔盖·远福”。但那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也许，除了柳芭·库兹涅佐娃（出嫁后随夫姓帕廖多钦娜），因为谢尔盖同她关系很好。很难说江青对他们怎么样。从前她从来没有在谈话中提起过他们。而现在，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

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博览群书。我们，他的同学们，听说回国后他曾在一些问题上与父亲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就派他到满洲参加土改，以便让他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11个月，直到1953年秋才返回北京。

第一次匿名信事件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
>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
>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需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164]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1950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

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前往杭州，江青也一起来到杭州。这次毛泽东在杭州住了70多天，一直住到1954年3月14日离开杭州。毛泽东走后，江青继续住在杭州。3月20日左右，陡然起风波，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给江青。

这封匿名信，使江青吓出了一身冷汗！

信中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已经被揭露，中央很快又要开始审干了。你江青有着堕落的历史，难逃这次审干。我已经把你30年代在上海的丑行写成材料，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

信中很具体地写及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种种风流韵事，还提到江青曾经在上海被捕自首，甚至还说江青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

由于当时江青在杭州，最早经手这一匿名信案件的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自2003年至2006年，笔者曾经多次采访王芳，协助王芳的三位秘书整理出版了45万字的《王芳回忆录》，于2006年9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芳曾经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因为王芳曾长期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而毛泽东特别喜欢杭州，先后来杭州多达42次，在这里度过了800多个日日夜夜，毛泽东在杭州由王芳负责警卫。在“文革”之后，王芳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1987年4月至1990年12月任公安部部长，还担任国务委员、武警部队第一政委、武警部队党委书记。王芳因病于2009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image]

■ 叶永烈在杭州多次采访原国务委员、公安部原部长王芳

王芳告诉笔者，江青1954年的匿名信案件，当时为了保密，代号为“18号案”。王芳曾经详细地向笔者谈及“18号案”。

笔者根据王芳的回忆，专门写了《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8号案”》，收入《王芳回忆录》一书。

王芳说：“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她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谈了一个上午，主要是讲自己的历史。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我看了一张纸，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王芳告诉笔者，匿名信上有一句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65]：“你这样的人，现在还像苍蝇一样，爬在毛泽东的脚面上。”

那封信没有署名，但是信封上写着“华东文委”。写信者知道江青的历史问题，又知道江青的行踪—在杭州休养，这表明必定是中共高层圈内人士。

尽管清查匿名信的作者的范围不大，但是当时并没有迅速查出。

王芳回忆说：

>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

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18号案件”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应为许建国—引者注）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珍，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的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166]

在上海方面，参与“18号案”侦查的，还有许建国。许建国当时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据许建国说，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把侦查任务交给他的。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的副部长，离开了上海，没

有再参与“18号案”侦查工作。

在王芳领导下，核对了800多人笔迹，未能侦破此案。六年之后，“18号案”的侦破，事出偶然。王芳回忆说：“一直到1962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167]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中共元老：1920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1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被人称为“延安五老”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林伯渠曾经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原配夫人叫司马殿英，是由父母指腹为婚，于1910年病逝。司马殿英去世之后，林伯渠与小学教师伍复明结婚。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与范乐春结婚。范乐春1928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时，她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林伯渠进入延安，与朱明结识，在1945年5月和朱明结婚。

朱明（1919—1962），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县人。

在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和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了。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芳回忆说：

> 我记得那年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主席回北京之后，林伯渠和夫人朱明来杭州住了五六天，是我负责接待的。我几次去住地看望他俩，对他俩很尊重，很热情。
>
> 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她，是我让朱明的女儿去陪她的。当时江青对我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但是事后江青这样多心的人，不会不怀疑。因为朱明给江青的匿名信很可能是那次住在杭州时写成的，到了上海后发出的。[168]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林伯渠到延安之后，曾经于1937年与李俊在延安结婚。由于两人不合，于1941年离异。所以朱明实际上是林伯渠第五任妻子。可能由于朱明自杀的缘故，红旗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林

伯渠传》，只字未提朱明。

宋庆龄在1960年6月13日一封书信中写及："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原陕甘宁主席林老，上个月二十五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脏病，现埋葬在这里的八宝山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虚弱的双手捧着他的骨灰盒，而我们在后面走着，这情景真是感人。"[169]宋庆龄提到的林伯渠妻子，就是朱明。

前文写及，江青赴苏联治病时，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当时叫李利）担任江青的翻译，与江青朝夕相处。在"文革"中，林利被江青投入监狱，单独监禁达七年零四个月之久。

“游泳池事件”

1954年3月底，江青从杭州回到北京，除了匿名信事件使她极其不快之外，又一件事使她非常尴尬、非常难受，给了她重重的一击：那是她知道毛泽东喜欢游泳，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自从住进北京中南海之后，每日忙于政务，空闲时则总是半躺在床上看书。保健医生以为，毛泽东终日没有运动，对健康不利。知道毛泽东喜欢游泳，“投其所好”，鼓励毛泽东在空余时游泳。

中南海在解放前就有一个露天游泳池，长50米、宽25米，南深北浅。在深水区那边，还有10米跳台和3米跳板。不过，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都到那里游泳。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保卫部门只能让毛泽东在早上游泳池尚未开门或者晚上关门之后去那里游泳。不过，到了冬日，室外游泳池的水冰凉以至结冰，无法游泳，毛泽东只得改到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池去游泳。清华大学离中南海远，何况毛泽东一到那里，需要清场，深感不便。

江青看在眼里，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室内游泳池。不过，那个游泳池不是建在中南海，而是建在北京玉泉山一号楼，因为毛泽东有时候也住在那里。据中直修办处的田恒贵回忆，这个游泳池很小，也就和一个大客厅差不多大。

游泳池造好了，江青满心欢喜向毛泽东报告，期望毛泽东会非常高兴。

出乎江青的意外，毛泽东却发脾气了。毛泽东以为，动用公家的钱，为他建造游泳池，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毛泽东要江青为此事写检讨。

1954年4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

4月25日，毛泽东把江青的检讨信，转交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阅，并写下一段批示：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诸同志：

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1954年4月25日[170]

毛泽东批示中所说的“建造费五亿”，是指当时的旧人民币计算的。中国人民银行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也就是现在所用的人民币。一万元旧人民币，相当于一元新人民币）。所以，“建造费五亿”，也就相当于五万元新人民币。五万元人民币在1954年是相当大的数字！

江青一连受到两次打击，心境也就变得益发沉闷。她仍处于养病之中。

195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写信给堂弟毛泽荣（又名毛胜五）的时候，提及“江青病况略有进步”：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1954年6月24日

1954年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跟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式、表演和烟火。赫鲁晓夫来了。周恩来很注重礼节，走过来要把江青介绍给赫鲁晓夫。

这时，毛泽东突然站了起来，走向江青，把江青领到沿城楼边的一处地方，避免她与赫鲁晓夫见面。

这件事也给江青的心里留下了阴影。这表明，毛泽东不愿把江青作为“第一夫人”介绍给赫鲁晓夫，避免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苏联媒体的报道之中。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就在江青养病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江青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谈话时，曾自吹是“半个红学家”：

> 《红楼梦》我读过多少遍记不得了。大概十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了。太惨了。
> 毛主席批评我，你这个人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
> 《红楼梦》是讲不完的。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是半个红学家。

作为“半个红学家”，江青关于《红楼梦》的“名言”是：“不要只把这本小说当成故事来读，而要把它看成是一本论证阶级斗争的历史书。”

江青还这么说及她当时看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之后的情景：“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2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1952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他又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27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23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1953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

两位“小人物”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试图投寄给《文艺报》。他们先给《文艺报》去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

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他们的老师表示支持，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9月号上。

江青读过的小说不算多，但是《红楼梦》却读过几遍。她对维特克说：她很有兴味地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大为赞赏。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以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以为自己直接给《人民日报》下指示，要他们转载，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他让江青出面，转告《人民日报》。于是，江青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9月中旬，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9期，说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周扬以为，《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建议改由《文艺报》予以转载。于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还加了由主编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 这篇文章原来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
>
>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至今看来也并无什么不妥之处，想不到后来竟遭批判。

10月16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着中国的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除山东《文史哲》9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引者注），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

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了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

毛泽东的信中，有一句涉及江青：“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

不言而喻，这“有人”指的就是江青。

至于毛泽东所说的“某些人”，指的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

毛泽东这封信，让江青有了强大的“后台”。

毛泽东的信中还有一句话：“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泽东没有说明“被人称为”这“人”是谁。

如前所述，毛泽东有关《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的信息，来自江青。

在13年之后——1967年3月，在江青的策划下，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才揭穿了这一谜底——这“人”是刘少奇。尽管刘少奇否认对电影《清宫秘史》说过什么话，但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用黑体字标明毛泽东在1954年写下的这段话，成为批判刘少奇的“有力武器”。

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中这么写及江青：“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

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此处‘半点名’，指胡乔木—引者注）等却大唱对台戏……”

虽然人们直至13年之后，这才体会到毛泽东信中的那句话的巨大威力以及江青的不可小觑，不过在当时，人们还是太看轻了江青！

在毛泽东写了那封信的第三天—1954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

袁水拍的文章，在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

袁水拍在文章中尖锐批判《文艺报》：

>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的这段话之后，亲笔加上了这么一段：

>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171]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面对强大的压力，冯雪峰不得不写下《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公开发表于1954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 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我平日对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泛滥的现象熟视无睹，问题的严重更在于当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资产阶级唯心论开火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认识到这开火的意义重大，因而贬低了李、蓝两同

志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贬低了他们文章中的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尖锐性，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新生力量。这错误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里呢？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地脱离群众，失去对于新鲜事物的新鲜感觉，而对于文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确实是重视不够；并且存有轻视的倾向的。

由俞平伯又牵扯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毛泽东的信，表示对于“小人物”的挑战精神的支持，表示对于学术权威的见解可以开展讨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学术意见作出了裁决，这显然不妥，特别是那时形成了一边倒。对俞平伯全盘否定，并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倾向。

1954年这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便是江青。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制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而归！

毛泽东的信中，回溯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这使周扬意识到：江青不可小视！

1992年4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韦柰的回忆文章《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文中透露了俞平伯所蒙受的心理创伤：

1954年突发的事件来势凶猛，令俞平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文革”后期，报端披露毛泽东给政治局的那封信，他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韦柰和外祖父共同生活几十年，却从未听到他对这件事的任何议论，他的日记中也不见只言片语的有关记载。那一切，似乎已沉入他的心底，不见有一丝涟漪。沉默的本身也是一种表白，至“文革”后期，俞平伯更绝口不谈“红楼”，以至连他的家人也不敢去碰这个话题。但到临终前重病的半年里，他对《红楼梦》的系念却再也无法令他做到淡漠，他几乎要遍了家中所有版本的《红楼梦》，一部部翻看，他用几乎不能动弹的手写下了这样几个难以辨认的字：“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172]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6年1月，借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出面，作了一番讲话，对1954年的那场批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首先对俞平伯的成就，作了全面评价：

>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

胡绳着重地重新评价了1954年那场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所谓批判：

>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胡绳的讲话，意味着洗去了俞平伯所蒙受的历史冤屈。

1986年2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俞平伯的专访《佳气神州一望中》，这是三十多年以来俞平伯第一次公开谈《红楼梦》。

“政治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在1955年初还相当活跃。

1955年2月，江青曾两度夜访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

在本书第一章已经写及，当江青在1933年第一次从山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前往码头迎接她的就是史东山。当时，史东山是一位青年导演，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

后来，史东山成了中国的名导演。特别是在1946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1955年2月23日，52岁的史东山猝死。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史东山23日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52岁……”

《人民日报》的报道既然称史东山“逝世于北京医院”，言外之意是说史东山乃病死。从此对于史东山之死，一概称之为“病死”。

1955年6月《大众电影》发表唐忠琨的悼念史东山文章《可亲的老师》，把史东山“病死”说得更加具体：“很不幸，即将下厂的前几天，他突然病倒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患慢性肝炎……当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将他的生命夺去了！”

虽然当时对史东山之死统一口径是“病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渐渐浮出水面。令人震惊的是，史东山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史东山是个乐观、直率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

在史东山自杀前，江青在两名警卫的陪同之下，两度前往史宅，登门拜访。据说，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她关心电影界，于是她就登门看望史东山。

她与史东山单独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是，自从第一次谈话之后，史东山就一下子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

没几天，江青又突然来访。

江青走后，史东山双眉紧锁。

妻子华旦妮问他。他只蹦出一句话：“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

几天后，史东山便自杀离世。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异常震惊。按照当时的规定，自杀者是不能开追悼会的，周恩来破例批准为史东山开追悼会。

史东山之死，在“文革”中才被重新提起。1969年，显赫一时的江青写下这样的批示：

“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

“华旦妮是军统特务。”

据云，江青结仇于史东山，是因为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初入电影圈的时候，曾希望在史东山导演的影片中担任角色，被史东山拒绝。

至于江青在1955年2月，究竟跟史东山谈了些什么，直到2004年12月，95岁的华旦妮因病住院。在临终前，她向女儿史大里说出了隐藏在心中半个世纪的秘密。那是在江青两次到史宅访问之后：

> 仅一周，史东山的眼窝便深深地塌陷，身体十分虚弱。华旦妮十分担心，陪着他说话。史东山告诉她，胡风等人已被内定为“反党集团”，行将在全国铺开清查运动，江青暗示，他参与了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要他“不可执迷不悟”，马上起来揭发胡风。此前，毛泽东讲过“对二老（指蔡楚生和史东山）要客气一点”，所以江青两次找他，给他一个“客气”的警告。
>
> 江青还严厉地说：“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电影部分就是你写的，是反党反人民的，你必须反戈一击。”
>
> 作为胡风的老朋友，他是难脱干系了！
>
> 几天后，史东山服过量安眠药自杀了。
>
> 史东山的遗书很快上交，不知去向了，但华旦妮牢记了主要内容，几乎全是丈夫的自我表白：他跟胡风是老朋友，上下级，不是文艺小集团成员；尽管他赞同胡风的看法，可那份三十万言书，事前他不知道，没有写过一个字；他表示对大一统的文艺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如他这样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歧视和排斥，他十分愤怒；对于批判胡风和文艺整风，他觉得很恶劣，难以忍受。
>
> 华旦妮清晰地记得遗书里的一句话：“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刚毅如山的史东山，当然不可能对老朋友落井下石，但又无法摆脱无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于是，不诬人也不自诬，自杀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导的最终选择。[173]

江青在1955年2月两度夜访史宅，表明江青当时相当活跃。

此后不久，江青便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1955年7月，她第三次前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1956年夏天江青第四次前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在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则这样记述江青：

> 江青又一次旧病复发了。她的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

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她所有的医生都被召集起来会诊，妇科医生诊断她患有子宫癌。

她回忆起在1955年，她不得不被送到苏联做证实是无效的医疗检查。因为在那些年月，苏联医生不相信“细胞原理”。因而，苏联医生否决了她去苏联前中国医生所做的诊断。

直到1956年她的中国医生才注意到大概损坏的细胞开始冲破子宫膜。在他们的判断中，两种治疗方法是可行的，外科手术或射线疗法。由于她以前因肝病做的外科手术引起了腹部粘连，她不能再接受外科治疗，那就只有搞射线疗法了。

她发现镭治疗太使人痛苦了，钴60更强烈，无法忍受。既然她也不能忍受他们的治疗，她的医生简直无法救她。因此，他们建议她回莫斯科，让俄国医生再一次接管治疗。

她知道她虽然病重，但她无法接受再次离开中国的想法，不知道她在离开后将发生什么。因此她强烈反对他们的决定。但最终仍无济于事。毛主席第一次安排了一个女妇科医生陪同她出国。这是她的第四次俄国之行（应是第三次苏联之行—引者注）。

她记得到达莫斯科后就完全衰弱了，不断地发高烧。她知道她得了可怕的病，指望康复十分渺茫。当她的情况被估量到允许进医院时，苏联医生说他们不能接受她，因为她的白细胞数低到了三千，镭射治疗的一个方面的影响会使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很低。她的妇科医生和助手发疯似的告诉医生说既然他们的医院有病床就应该让她住院。他们妥协了，而且第一次允许她让中国医疗专家守在她的床边。他们对她“过量”使用钴60。她失去知觉。她坚信她骨髓都受到了损害。然后他们给她输血，但每次输血使她烧得更高，因此整个治疗方案被称之为适可而止。

停止治疗，苏联医生认为莫斯科郊外的新鲜空气更有益于健康，于是他们把她送到郊区疗养院。这是一个显然他们不再对她负责的地方。

那年冬天是刺骨的寒冷。疗养院的医务人员试图将她放到摄氏零下20度的空气中去“治疗”她。她的视力都斜了，所有的图像都变得模糊不清和变了形状，她的双腿严重颤抖以致她没有支撑就不能站起来。在她的记忆中，那个梦魇似的冬天转到了春天，春天又到了夏天。经过一长段对她的任意观察，她的医生庄严的宣布说她还患有“软骨病”。她突然大笑一声，回忆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陕西北部，很多同志患有他们所称的“软骨病”。这种情况是缺碘和钙而引起的。但这一次断定她患有“软骨病”的真正目的，是想找个理由将她脱手，以便把她送回到城市医院里去。

城里医生现在给她使用最有力的治癌武器。第一次，继而第二次、第三次使用钴治疗。这样大剂量的用药，削弱了她的身体，使得她时常需要供氧。

当她能振作精力时就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停止钴治疗法；第二，送她回国。提要求是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回事。苏联的医疗界是严格地区分等级的，这就意味着，另一个医师或医疗教授以他自己的权力担负起他的一个病例的责任，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上级的

认可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又一次昏迷过去，这时才找到一个教授在那关键的时刻来看她的病情。她告诉他们说她极想回国，但没有人听她的话。城里的医生，显然因他们治疗无效而感到懊恼，又安排她回到不在他们权限之内的郊区疗养院。

通过这些日子，毛主席知道她极想回国。然而他也知道苏联医生准备的医疗报告的详情。在周总理被派往莫斯科去进行政府谈判时，他到医院看望了她。是他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说要她留在莫斯科，直到她显然康复为止。总理在医院时，他与医务人员谈了话，研究了她病情的报告，以便自己判定她的情况到底怎样。当诊断和治疗的图像开始出现时，他对苏联医生所做的和没有做的大发雷霆。

她仍很高兴地见到了总理，因为她企图尽其所能跟上国内外政治形势。一天，总理带了鲍罗丁女士和程砚秋到她的床边看望她，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为了逗她乐，程砚秋表演了哑剧。

她待在苏联的时间越长，病情就更恶化。她反复乞求回中国去。最后，他们让她走了。在回中国的飞行途中，她全身皮下出血。

毛泽东1956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174]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钴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据江青秘书杨银禄说：

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

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175]

卡尔图诺娃回忆说：

江青1957年再次来莫斯科时，我已不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去读研究生了。有一天N.C.谢尔巴科夫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一位“老熟人”又来莫斯科郊区了，想同我见见面，并请我带我的女儿伊琳娜一起来。

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午饭后我们同江青漫步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她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她很快就累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江青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1957年春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美国记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评论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倒是入木三分：

回过头来看延安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无名的同志，江青意识到了：性只关系到第一回合，支持长期利益是权力。

也许江青没有意识到，这个判断概括了她不寻常的生活：少女时代的坎坷导致了她跟最高领导人的婚姻，而这个婚姻的纽带又因她对权力的追求而松弛；她经过成功的个人斗争，取得了别的女人得不到的地位，并使得主席不仅因她是一个女人而对待她，而且要把她当作一个不受任何男人控制的政治人物来看待她；她还赢得了主席的一些同事对她个人的尊敬和重视，虽然他们有时抱怨她阻挡了他们通向毛主席的道路；她跟群众保持某种个人联系，而各种类型的统治者很容易切断这种联系；她不仅打破了老一代树立的某些政治、文化标准，而且制造了影响国家和历史的她自己的标准，当

然是一种简单的破坏性的标准。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则这么谈及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

> 江青对工作人员的奴隶主工作作风，连毛主席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江青对哪个态度恶劣，便会找哪个同志道歉：“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
>
> 有一次，一位护士到毛主席处要求离开江青，毛主席说：“我知道江青不好，不要多说了，看在我的分上。”主席有时被江青扰得心烦，只好与卫士谈心诉苦，后悔与江青结婚，说现在离婚，同志们有看法；不离婚，又背了个政治包袱，只好凑合着过了。
>
> 虽然分居多年，但仍未忘夫妻之情的毛泽东主席，最后终于无法忍受江青的倒行逆施。1975年7月，他在一封信件上对江青作了这样的指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尽管指示没有执行，但江青的末日已经临近了。然而，对毛主席来说，至死也未能摆脱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
> 作为毛主席的妻子，江青长时期与丈夫和孩子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玩不到一起，使家庭处在解体的状态中。不能给丈夫以温馨，不能给孩子以母爱，而只知一味地贪婪地索取，给丈夫带来无休止的烦恼，一个家庭的悲剧正是从这里产生。

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

这“五大秘书”有所分工：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据说，最初定下的是“四大秘书”，没有江青。因为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经周恩来提议，常委们经过讨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所以，最后定下来还是“五大秘书”。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曾这么回忆：“最初，毛泽东提名的只有四个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我。周恩来接着提议加进江青，中央同意了，所以文件下发时就成了五个。”[176]

不过，叶子龙说，文件上不是称为“毛泽东秘书”，而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

其实，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是毛泽东，所以“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秘书。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当时，担任毛泽东专职生活管理员的张国兴，曾这么回忆道：

> 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由我每月初到中央警卫局行政处财务科签字领取回来，再交给卫士张云鹏保管，我负责每次具体花销，并记好账目。每月交李银桥审查，同时也必须交江青过目，因为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而且还是家庭主妇。江青及子女的生活支出也是由我来掌握和记账。[177]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

她只会狗爬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1958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的信中，提及“江青有一点病”：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象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1958年2月20日

这时的江青，虽然担任毛泽东秘书，但以休养为主，同时也看国内外报刊和文件，把认为有参考价值的送毛泽东参阅。

有的时候，正好反过来：毛泽东看到有的文件、文章，批给江青，要江青细细阅读。

在1958年，毛泽东曾几度批文件给江青。

其一：

1958年1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王佩琨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文章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毛泽东阅毕，在1958年1月3日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写了批语：“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其二：

外交部新闻司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141号，刊载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

毛泽东在1958年7月28日阅后，写下给江青的批语：“江青：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

其三：

1958年8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郊区涝灾和抢救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写了第二次报告。报告说，自8月6日暴雨过后，13日北京地区又下了一场大雨，郊区菜地受灾严重，近几天蔬菜上市量日渐减少，供应十分紧张。今后一段时间内，上市蔬菜还会减少。目前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力求增加供应。

毛泽东阅毕，写下如下批语："大问题。江青阅。老下大雨，菜量大减。"

其四：

1958年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发表了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

9月24日，毛泽东随手在这期《红旗》的封面上，写下批语给江青。"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其五：

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1月1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4期上摘登的三份材料。

第一个文件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一文。文章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运动正往深入阶段发展，具体表现在：

1. 群众发动得愈加广泛、深入。2. 重点批判对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细致。3. 领导核心健全有力或已经得到改进的单位占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有落后单位和落后面，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右倾，不敢或不愿放手发动群众，以简单粗糙的方法来代替深入艰苦的思想工作。为此，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1. 必须继续大胆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开展斗争。2. 对重点对象要有计划、有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3. 要加强领导。4. 运动必须有始有终，不能煮"夹生饭"。

第二个文件是《十三个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一文，介绍了河北等13个省份进行整社试点工作的情况，指出在整社开始的地方，都普遍获得贫农和下中农的拥护。

第三个文件是《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很快》一文指出，据12个省、区的材料看来，最近两三个月，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的增长。目前各地在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堂的同时，开始大力抓食堂的巩固工作。

毛泽东阅后，写下批示：

江青阅后，交林克阅。

三件都可看。

从毛泽东多次批文件给江青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有一点病”的江青是十分关心的。

旁人眼中的江青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给江青总结出“四怕”：一怕风，二怕光，三怕声，四怕冷与热。

1959年冬，王敏清受组织分配，担任江青的保健医生。

王敏清，也就是前文曾写及的王世英的儿子。当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时，王世英曾上书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坚决反对这一婚姻。

由于王世英解放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他的学医的儿子王敏清也就被视为政治可靠，在中南海保健局工作。也真是冤家路窄，王敏清被分配到江青那里当保健医生—不过，江青并不知道王世英当年上书张闻天之事，王敏清也不知道此事。

笔者的文友王凡采访了王敏清，这么记述王敏清眼中的江青：

> 王敏清被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很少。
>
>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
> 王敏清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他还得知，江青甚至因李强华辫子摩擦衣服的声音太吵，软硬兼施地逼她剪掉辫子。
>
>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吃饭时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如果谁出了声，江青就骂谁：“你是猪。”这是王敏清第一次看到江青施淫威，侮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感到吃惊：主席夫人怎么这么专横，这么不尊

重别人？

“江青说同甘共苦、一桌吃饭，她和同桌的人都吃一样的菜饭吗？”“我们是坐在一起吃，但她的菜是单独的，和我们不同。她有时会拣两口我们的菜吃。”“她吃得很奢靡吗？有的文章或书中说她常吃高级补品。”“在今天看来，倒不算很奢侈。鸡、鱼、肉、蛋，每顿总是有两样。有时也吃些高级营养品，像燕窝等，但不是经常不断。”

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不许别人吃饭出声，她自己难道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吗？”我问道，“记得某保健医生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也感到和江青一起进餐是受罪，因为江青吃饭时爱喋喋不休地议论这、评判那，而且吃相饕餮，让人厌恶。”“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确实没有什么声音，否则她骂别人猪时岂不也是在骂她自己？”王敏清答道：“可也奇怪，她对辫子和衣服摩擦的声音都挑剔，可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那么大的动静，她倒不怕了。”[178]

王敏清还回忆说，“她甚至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她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在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广州白云机场关闭，民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则这么谈及江青的生活：

当时，江青的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化”的程度却是令人吃惊的。一位曾在江青身边工作的护士告诉我，与其说江青像个东宫皇后，不如说更像个女奴隶主。在日常生活中，江青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不愿意付出。她晚上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要护士替她整好、拉平，她动都懒得动。房里安装了电铃，使唤人都不用开口，按按铃就行了。有一回她的电铃响了，护士急忙赶进房里，只听江青懒懒地说：“把暖水袋递给我。”其实，那暖水袋就在她床上，伸伸手就够着了。早上一睁开眼，她就把护士和工作人员叫到床前，问她们：“今天天气怎么样？我穿什么衣服好呀？配哪双鞋子呀……”嘀咕半天，想好了，给她办妥了，才准备起床。先坐在床上，在别人侍候下洗脸刷牙；然后在别人侍候下吃早饭。江青干什么都不愿意动手，甚至连洗澡也不例外。她躺在浴缸里，让护士给她洗身、擦背……

1962年夏，江青再次上庐山，当时，她常到直属招待所来洗头

发。只要她一到，招待所便变成一座“死城”，工作人员不能来回走动，炊事人员不能动勺弄盘，住在这里的客人也得屏住呼吸，因为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要“影响”江青的“休息”。而且她一呆就是半天，推拿按摩，没完没了，以致工作人员饭都吃不成。如此作威作福，也是天下少见的。

江青总是在自己周围制造死一般的寂静。我亲眼看到，她在上海、杭州、庐山等地的住处都与众不同，不但地上铺着厚厚的绿色地毯，窗上挂着沉沉的绿色窗帘，而且床铺、桌子、坐椅乃至马桶都要用绿色丝绒包起来；就连茶盘、茶杯也要垫上小方巾。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走进她的房间必须蹑手蹑脚，像雪花落地般地轻而无声，否则就要大触霉头。江青平时这么怕“吵”，我们这些夫人当时感到很不理解，背后常议论。江青那么怕吵，怕声音，可是跳舞时却非强刺激的西洋打击乐不能尽兴，这岂不自相矛盾？所以，如果说绿养眼还有些道理的话，静未必是为了养神，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造“威”，使人一入她的住处便胆战心惊，就像宗教庙堂里那种刻意制造出来的阴森气氛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一个人的功绩与他所受到的尊敬是成正比的，江青无功，唯恐别人不敬，于是挖空心思地“创造威严”，可惜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江青得到的生活待遇和荣誉，远远超出了她的付出。沾一点毛主席的“光”，人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我总觉得在她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怨恨，一有机会或抑制不住时便会宣泄出来。我是从她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上察觉这一点的。在她身边工作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无不恪尽职守，甚至对江青的过分苛刻和横蛮无理的要求，也都看在毛主席的分上而强咽下去。尽管如此，她不但不对这些同志表示感谢，反倒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甚至充满着仇视。一位曾做过江青护士的同志告诉我，江青偶尔一高兴，也什么都说，甚至连与唐纳等几个前夫的事也津津乐道；而她不高兴时，任何小事情都可以成为她训斥、惩罚工作人员的由头。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妹妹就是因为一件小事而被江青发配到大西北去“充军”的，搞得一家人不得团聚。还有更倒霉的，在江青一怒之下便当作“反革命”送进监狱。江青这种行为激起了许多领导的义愤，据说，少奇就很有意见，江青所在的党支部还专门派人找她谈了话，但毫无作用。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1962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

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拍的照片"太多了"，即使是"近几年"就有"大概一万张左右"，但是她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

“骄杨”风波

1957年1月25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1945年11月14日传抄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image]
■ 毛泽东《虞美人·枕上》手迹

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1957年5月11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指《虞美人》—引者注），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image]

■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手迹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1958年1月1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况且毛泽东所用的词牌，又恰恰是《蝶恋花》！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1950年11月25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江青本来是电影演员，20世纪30年代在水银灯下工作，对摄影有了许多了解。不过，那时她只是被摄对象，自己并不会拍照。

在20世纪50年代，她几度生病，病中无事，开始对摄影发生兴趣。她有了一架德国生产的照相机。由于那时的照相机要靠人工对焦点、定

光圈和速度，对于初学者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于是，江青在拍照时，便请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忙、指导，渐渐掌握了摄影的初步技术。

江青上了庐山，对庐山的风景发生浓厚的兴趣。在上海《文汇报》记者徐大刚的帮助下，她拍摄了庐山仙人洞。

徐大刚曾经回忆说：

> 1961年5月初，组织上安排我帮助江青搞摄影创作，为她在选材上出出主意，在摄影技术上指点指点，外面传我辅导江青摄影。此间曾随喜爱京剧的江青为京剧名角钱浩梁、刘长瑜拍过剧照。例如，钱浩梁的拿手好戏《伐子都》、《挑滑车》、《罗通叫关》，刘长瑜的《卖水》等都拍摄过。还助她拍了花卉《傲菊》、《洁莲》等。
>
> 此间，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江青想上庐山，当然她最关心的还是摄影。她向我谈到一同上庐山去拍仙人洞的一滴泉。不久，上庐山终于成行，我随她在1961年6月底从上海乘专机抵达庐山，随机带了一套照相、冲洗、放大器材。
>
> 7月的一天下午3时许，我随江青驱车去仙人洞。洞内潮湿、阴暗，一滴泉虽然泉水叮咚声不绝于耳，但很难拍出她要的那种“仙境”气氛。江青虽然学习摄影不算久，但艺术感觉不错，见状主动退出，打消拍摄“一滴泉”的念头。
>
> 出仙人洞后，我陪她在“仙路”上拍了一些小景。此时被誉为庐山观赏晚霞最佳处的御碑亭霞光灿烂，仙人洞外蟾蜍石上的石松沐浴着金色的霞光，御碑亭兀立的锦绣峰下的峡谷中，一缕缕云雾向石松方向涌来，景象十分动人。
>
> 江青十分欣赏这一景致，想抓拍这个镜头，我边选择角度边向她介绍拍晚霞常用的三种不同曝光程序及不同颜色的滤光、滤色的应用。画面选定后，随行人员架好三脚架，我请江青从取景框中看看画面如何？她满意地点点头。此时已是下午6时，霞光明面欲暗，我选择用侧逆光拍，她无异议，并按动了快门。为了能看到三种不同效果的画面，我们连拍了几张。
>
> 小样洗出来后，江青肯定了那张习作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并主张放大三种不同效果的习作呈送主席。毛泽东看后，也选中了我们认为最满意的那一张。江青很开心，嘱我再放大送主席。大样送出约一周后，毛泽东在芦林一号别墅，挥毫写下了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晚照》，下题“赠李进”（正式发表时标题系《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
> 意外的成功令江青欣喜不已，她不无激动地对我说：“大刚，照片成功了！照片有政治寓意，把国内外的形势表达出来了。主席亲口对我讲，这张照片反映了当今的政治气候，乱云飞渡，我很从容！”[179]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的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全文如下：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里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image]

■ 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及毛泽东为这幅照片题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然而，1962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11月15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1962年11月15日[180]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桂花酒”之谜

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毛泽东那首《蝶恋花》，通常被视为怀念杨开慧，因为“骄杨”非常醒目，一望而知，用不着多作考证。然而，《蝶恋花》中所隐隐约约透露的怀念贺子珍之情，却是外人莫知！

这话怎么说呢？

笔者在江西采访时，这才明白内中的含义。

那句“吴刚捧出桂花酒”中，这“桂”，这“桂花”，便是指贺子珍。

“桂”，怎么会是贺子珍呢？这是因为贺氏三姐妹，分别叫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这大姐贺桂圆便是贺子珍。

据江西的朋友告诉笔者，贺子珍生于中秋，他的父亲为她取名“桂圆”，取义于“丹桂飘香，圆月当空”。由于老大取名“桂圆”，老二、老三也以“圆”字命名，即“银圆”、“先圆”。

另外，贺子珍还有一小名叫“桂花”。

正因为贺子珍生于中秋，不仅毛泽东笔下的“桂花酒”指她，而且“寂寞嫦娥舒广袖”，也指贺子珍。

如果说，《蝶恋花》仅仅是怀念“骄杨”，为什么写“桂花酒”、写“嫦娥”呢？这分明与贺子珍生于中秋、原名桂圆、小名桂花，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毛泽东写《蝶恋花》，表达了对两位前妻的怀念。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庐山上主动提出与贺子珍晤面。

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小毛毛。

小毛毛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后所生的第二个孩子，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出生。毛泽东为这个儿子取名毛岸红。

毛岸红的奶妈是江西人。江西人习惯于叫孩子“毛毛”。于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也就叫毛岸红为小毛毛。

在开始长征时，小毛毛已经长到2岁多，活泼而可爱。毛泽东深知长征一路艰难，无法带领两岁的孩子行军。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长征前夕把小毛毛托给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把小毛毛寄养在警卫员家中，后来又多次转移。由于毛泽覃战死，断了联系的线索。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怡刚刚生下一子。

1940年，贺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1949年10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10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14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1997年8月4日，笔者采访了贺怡之子贺麓成。据贺麓成回忆：贺怡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她决心找到这断了的线索。另外，她除了想找回小毛毛之外，还想找回失散多年的长女—她和毛泽覃所生的第一个孩子。

1949年11月初，贺怡向中共吉安地委请了假，去赣南寻找小毛毛。中共吉安地委知道她要去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考虑到赣南一带交通不便，而且又不安全，就给她派了一辆中型吉普车，还让她的警卫员贺红随行。

贺怡把儿子贺麓成也带上车。母子刚刚团聚，她舍不得让儿子单独留在吉安。贺麓成记得开车时，母亲总是让他坐在她的身边。

贺怡先是朝广东韶关出发。贺怡要去韶关，不仅因为她曾在韶关做过地下工作，曾在韶关被捕、坐牢，更重要的是，她的老战友曾碧漪在韶关。贺怡要和曾碧漪一起去找小毛毛。

贺麓成永远难忘1949年11月21日这一天：一场突然飞来的车祸，夺去了她的母亲贺怡的生命，而且使偎依在母亲身旁的他摔成了重伤。

这场车祸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最初曾传说是国民党特务的有意预谋……这种传说甚至直至今日仍在流传。1997年10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一书第117页在谈及贺怡之死的时候，仍然这么写道：“原来司机是个特务，他早接受了杀害贺怡的任务……”

贺麓成向笔者详述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才终于弄清来龙去脉。

那几天，贺怡带着一车人马，在赣南东奔西跑。当时那里的公路很差，路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长时间行进在这样的公路上，早已人累车乏。21日，从江西泰和赶往吉安。天已黑下来。他们在泰和汽车站的一家饭店吃了晚饭，司机提出在泰和住下来，明早再走。大家几乎都表示同意。但是贺怡急于赶路，主张连夜行车，到吉安休息。贺怡的话也有道理，因为她在吉安工作，到了吉安，吃、住都方便得多。

既然贺怡这么说，司机也就服从了。

贺麓成记得，大约在晚上8点左右开车。前排坐着四个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司机助理、司机、贺怡、他。后面几排坐着曾碧漪、古一民、警卫员贺红等人。开车后，由于太疲劳，贺麓成斜倚着母亲睡着了。车上很多人也睡着了。蒙眬中觉得车子晃得很厉害。紧接着，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贺麓成顿时醒了，只觉得车子在打滚，翻了下去，车子着火，车内响起一片哭叫声……

后来才知道，出事的地点是泰和县凤凰圩。那里有一座旧木桥，天黑桥窄，汽车在经过这座桥时，翻了出去，跌进了沟里。

贺麓成当时被压在车下，他昏过去了。他没有觉得疼。他只有一种飘飘忽忽的感觉。近天亮他听见一阵嘿哟嘿哟声，这才醒了。那是附近的农民赶来了，把车子抬起来，把他从车子底下拖出来。这时，他才感到左大腿疼痛钻心。

也就在这时，贺麓成发现母亲贺怡躺在他身边，任他怎么叫喊，她没有回答。

泰和县县长把母亲遗物交给贺麓成，这才知道，母亲死了！他与母亲相聚不足百日，她就这样惨死了，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

事后查验贺怡遗体，身上并没有伤口。翻车时，车子压在她的胸口，使她窒息而死。如果她有项羽的力气，推开车子，也许可以幸免于难。

曾碧漪刚刚找回的儿子古一民，才团聚数日，死于这场劫难。他坐在后排，汽车油箱起火，把他烧死了。

另一个惨死者是司机助理，他是在翻车时被汽车砸死的。

车上还坐着贺怡女儿贺海峰的养父。他当时一点也没有受伤的感觉，可是却在第三天突然死去。据说，他翻车时被沟里的蛇咬了，后来蛇毒发作而死。

曾碧漪被摔伤，右腿骨折。

车上其他的人，平安无事。

这场横祸，造成四死两伤。

奇怪的是，在事发后，不见司机的身影。

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1935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181]。据她回忆，她陪同贺怡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1949年11月21日夜，曾碧漪和贺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距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贺怡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怡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贺怡之死，改变了贺麓成的命运：姨妈贺子珍要他和妹妹贺海峰一起去上海。

不言而喻，贺子珍在贺怡蒙难之后，要把贺怡的子女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培养成人。

据贺麓成回忆，车祸之后，他曾感到左腿一阵钻心的疼痛。可是，后来似乎好了些。在医院检查时，他的左腿，看上去连皮肉都没有破，所以他在吉安没有住院。可是，那腿痛是一阵阵的，有时很痛。他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个很能忍受痛苦的人，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叫痛。他躺在床上，涂点松节油，吃点止痛片。他一直以为是轻伤罢了。

姨妈从上海派了好几个人到吉安，看望贺麓成，并接他去上海。

既然姨妈一再要他去上海，他也就在1950年初乘火车前往上

海。“爷爷”、“奶奶”、保姆陪他一起去上海。姨妈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接他。这是贺麓成第一次见到姨妈。贺麓成记得，在寒风中，姨妈的脸通红通红的，看上去非常健康。远远地，姨妈就朝他招手。见到他已经长得那么大，姨妈紧紧握着他的手，显得很兴奋。

贺麓成坐上姨妈的吉普车，驶往上海武进路。那时，贺子珍住在那里，房子很大，上上下下住了十几个人。那房子原先大概是国民党部队住的，屋里居然有几麻袋的国民党军服，他们就分穿这些衣服暂且御寒。

知道贺麓成腿痛不已，贺子珍第二天就带他去上海的医院看病。大夫把他带进一间黑房子，贺麓成这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X光。

经过大夫用X光透视，贺子珍大吃一惊，原来贺麓成受了重伤：左腿腿骨断成三截！大夫说，必须开刀，马上把骨头接上。

为了使贺麓成得到很好的治疗，贺子珍带着他又去了几家医院，最后决定在上海公济医院动手术。

手术后，贺麓成从腿部到腰部，都上了石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贺子珍如同母亲一样呵护着贺麓成，每天在医院里陪伴着他，甚至给他端屎端尿。贺子珍视贺麓成如同己出，把一片母爱献给失去双亲的贺麓成。贺子珍亲自护理贺麓成达一个来月。后来，贺子珍忙于别的事情，叫警卫员贺红来照料贺麓成。即便这样，贺子珍仍不时抽空到医院看望贺麓成。

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多月，贺麓成的左腿总算伤愈。不过，出院时，他仍不得不拄着拐杖。

出院后，贺麓成仍住在姨妈贺子珍家。姨妈待他极为亲切。

后来，贺麓成进入上海中学学习。由于上海中学离市区较远，学生都住校。贺麓成在星期日回到姨妈贺子珍家里。后来贺子珍搬到了上海溧阳路的一座楼房里。陈毅主持上海市工作，对于贺子珍是很照顾的。

贺子珍很为贺麓成优异的学习成绩感到高兴。贺子珍甚至请贺麓成当她的老师呢！贺麓成记得，有一回，贺子珍要他陪着去书店买书，然后要他教她。那时，贺子珍很想在工作上有一番作为，所以开始自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这些课程。这样，贺麓成便一度成了贺子珍的“老师”。

在上海中学学习两年，贺麓成在1952年夏，毕业了。

贺麓成回忆说，在他刚到上海时，贺子珍的身体很不错。这位井冈山上的游击女英雄，很想再干一番事业。正因为这样，她请贺麓成当“老师”，学习数理化。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的心灵备受折磨。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致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了毛泽东的讲话。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听见毛泽东发表演说的声音，她久久地呆住了，昏倒在沙发上。她已经多年没有听见这熟悉、亲切的声音。她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虽然经过抢救，她苏醒了，但是从此埋下病根。经过大夫检查，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的身体时好时坏。正常时思维正常，发病时精神紊乱……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182]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贺麓成来到北京进入留苏预备班之后，每年休假总是要去上海，在姨妈贺子珍身边度过假期。李敏也是这样。他们总想给贺子珍精神上的安慰。

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

为了使贺子珍的身体得到康复，中共上海市委还安排贺子珍去青岛、庐山等地疗养。

从1958年7月起，至1966年9月，贺子珍在南昌市三纬路9号小院居住。[183]

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另外，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他也邀请贺子珍到江西去。

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1943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1940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朱丹华以及杨尚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纬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米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1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1937年以来22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7月8日[184]。李锐当时是毛泽东的通讯秘书。据他所记，毛泽东于6月23日抵湖南长沙，25日去故乡韶山，28日到武汉，29日上庐山。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1985年3月10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185]。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7月23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7月8日就“争吵”。后来，关于毛、贺会面的比较真实准确的报道，是来自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曾志说出了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的原因，是因为她向毛泽东汇报了贺子珍的近况。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1954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是陶铸的老朋友。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1937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 毛泽东嘴唇翕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代：“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1949年6月至1965年3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1965年4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翌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据说，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人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密报？须知，毛泽东会见贺子珍，严格保守机密，尤其是对江青保密，知道这件事的人，屈指可数，江青怎么会迅速知道呢？

直到最重要的当事人、杨尚奎夫人水静说出了内幕，这才冰释一切疑问……

>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郑重地对我说。
>
>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我问。
>
>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又名朱丹华—引者注）一道去。"尚奎说得很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
>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了。
>
> "啊，这可太好了！"我几乎叫了起来。
>
>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说道："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如此这般地作了许多具体的交代。
>
> 下午四点多钟，我便和朱旦华同志一道乘车下山。在车上，我们商量了一下用什么理由请贺子珍上山，并且统一说话口径，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尚奎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并且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
> 不到六点，我们便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大姐的住所驶去。
>
>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座，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
>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
>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
>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们来接你

好吗？”

第二天，我们准时把车开到大姐住处，大姐上车后，我们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之上，我们和大姐尽谈些轻松、高兴的事，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汽车在成熟中的田野起伏，只觉得芬芳扑鼻，满眼金辉。一片丰收的景象，跟着我们风驰电掣，更使我们心花怒放。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庐山牯岭。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二十八”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朱旦华已经回到自己的住处，只留下我陪同贺子珍大姐。我们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齐全。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主席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一八〇”。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是原毛泽民的夫人，他们之间的感情会更亲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华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这句话的内涵，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再见，主席，晚上九点我一定陪大姐来。”

待我赶回“二十八”号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一八〇”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

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我已经注意到了，在离"二十八"号不远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我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微末节都了解到了。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我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我说。[186]

按照水静的回忆，可以排出以下时间表：

7月7日中午，杨尚奎通知水静下庐山去接贺子珍；

7月7日下午六时多，水静和朱旦华来到贺子珍住处，约定翌日下午上庐山；

7月8日下午三时，水静和朱旦华，陪贺子珍从南昌出发上庐山，住在"二十八"号；

7月9日中午，水静向毛泽东汇报，约定晚上见贺子珍；

7月9日晚九时，水静陪贺子珍来到毛泽东住处"美庐"，毛泽东和贺子珍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

7月10日上午，水静送贺子珍下庐山。

所以，李锐所记毛贺会面在7月8日是不准确的，应为7月9日。

水静的回忆，可以说是最富有权威性的了。因为如她所言："贺子珍在庐山上的头尾三天里，只有我陪着她。在到达庐山后，朱旦华同志也离开了，所以除我之外，她身边没有任何人，更没有带什么护士、女伴之类。当时，毛主席对这件事是非常谨慎的，因而知情人极少。即使事过之后，也没人敢于任意扩散。直至'文革'那场浩劫收场，社会上才渐有传闻……"

水静强调："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亲口说

的，而且有据可查。而有的文章却说，当时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便立即赶来，大闹一番。其实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

按照水静的说法，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那个所谓陈伯达的“告密电话”，也就不存在了——那只是贺子珍的猜测而已！

不过，据毛泽东贴身卫士李家骥回忆，江青确实上了庐山。江青上庐山，是李家骥下山去接的，而且还有李家骥当时的日记为证——“我日记上写着江青是8月11日上山的”。

李家骥是这么回忆的：

> 8月9日，副卫士长李银桥对我说，江青同志要来庐山，因为你了解江青，就请你帮助收拾一下房子，多为她服务点。我说可以。
> 8月11日上午，我前往九江接江青。我陪江青坐车上的山。这次她带的东西很多，共四大皮箱。
> 在上山时，我和她坐的是一个车。
> 上山后，她首先看望了毛泽东，询问了一番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情况，表示对毛泽东生活的关心。一般地说，这个时期她对毛泽东的生活还是关心的，有时也很会来事，会说话。
> ……
> 13日上午天气很好。我和另一位卫士帮她先把被子拿出来晾晒。在我们两人用竹竿子往外抬衣服时，正好碰到徐晓冰。他问这是谁的衣服，这么多呵！都这么漂亮！我回答是江青同志的，因为湿了，要在外边晾晾。[187]

笔者以为，水静所回忆的接送贺子珍上下山，她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很有价值，可以帮助澄清许多传闻。

但是，关于江青是否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上了庐山，水静不是当事人。她所回忆的“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不知“有据可查”所依靠的是什么“据”。

李家骥是陪同江青上庐山的当事人，而且有日记为据，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确实上了庐山。这倒是“有据可查”的。

当然，贺子珍是1959年7月8日上山，与毛泽东会面，7月10日就下山了，而江青直至8月11日才上山，中间隔了一个多月。另外，据李家骥回忆，江青上山后，情绪平静，不像是得知毛贺会面的消息后赶来。按照江青的脾气，她如果得知毛贺会面，一定会立即赶上山，并且会大吵大闹。所以，江青上山，应当说与毛贺会面无关。

顺便提一笔，1959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庐山的这次见面，向来被认为是毛、贺在延安分手后唯一的一次见面。但是，笔者的《江青传》初版本出版后，收到山西榆次读者白鸿多来信，提出毛、贺在1949年曾经见过面。

白鸿多在1996年10月12日来信说，他和姐夫当时在东北，姐夫是司机，负责接送娇娇（即李敏）上下学。姐夫跟贺子珍当时的保姆关英也很熟。他当时住在姐夫家，听说贺子珍曾秘密去过北京，见过毛泽东。

白鸿多所说的情况未必可靠。这里提一下，仅供读者参考。

另外，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黄敬之死。

1949年1月15日，黄敬冒着战场的硝烟，进入天津。他被任命为解放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他的妻子范瑾则担任《天津日报》副总编，后来担任总编兼社长。

1953年，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黄敬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当时，段君毅和汪道涵被任命为副部长。黄敬对工作极为负责。他当年在青岛大学只读过一年数学、两年物理，为了熟悉机械工业业务，坚持自学《普通物理学》，做完四卷书中所有的习题，而且自学《机械工业百科全书》。

1956年春，毛泽东在准备起草《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听取了黄敬关于机械工业情况的汇报。不久，在中共八大，黄敬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957年4月，黄敬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全文如下：

>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
>
> 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毛泽东所开列的出席会议名单中有黄敬。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必须反对右倾保守。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结束后，黄敬在从南宁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当服务员给他送饮料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口中不停地说话……

据黄敬胞妹俞瑾告诉笔者[188]，黄敬过去有过精神方面的疾病。为

此，1944年他在延安时期就因病休养过。这种病的医学名词叫“迫害妄想症”。据说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工作过分紧张所造成的。这回则由于精神紧张，再加上乘飞机高空缺氧，导致旧病复发。

飞机在广州降落之后，陶铸立即派车把黄敬送入高干病房治疗，并电告范瑾。当时范瑾已调往北京，担任《北京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得知，非常关心，托人传话给黄敬：“好好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彭真都过问黄敬的治疗。

当时在广州的董必武、李富春、陶铸都赶去看望黄敬。

据俞瑾说，由于黄敬患“妄想症”，住院的时候竟从二楼跳下，股骨骨折，同时并发肺动脉栓塞。

当范瑾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广州时，晚了一步，黄敬已经在前一天——1958年2月10日，病逝于广州，终年仅46岁！

在黄敬追悼会上，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黄敬的一生：

> 黄敬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在党的领导下，黄敬同志曾经在复杂和艰难的环境里，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image]

■ 黄敬（俞启威）

> 黄敬同志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忠心，他积极努力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具体的革命实践在工作中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党所交给他的工作任务。他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的发奋忘我的工作热情，他的敢于打破常规，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精神，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
>
> 应该特别指出，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我们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又一封令江青坐立不安的匿名信

前面已经提到，1954年3月，江青在杭州时收到的一封匿名信，曾经使她多日寝食不安。那个“18号案”，直到1962年才侦破，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就在“18号案”尚未侦破的时候，1959年3月26日又发生第二起匿名信案件。这起匿名信案件，发生在上海。

当时，正处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前夕。江青虽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她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于1959年3月24日先期到达上海。

中共中央全会通常在北京举行，难得在上海召开。会议地点在当时上海最好的宾馆—锦江饭店。

江青并不住锦江饭店，而是住在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锦江饭店在茂名南路东侧，锦江俱乐部在茂名南路西侧，两者只隔着20米宽的茂名南路。毛泽东在4月1日从北京飞抵上海，也住在锦江俱乐部。毛泽东、江青不住锦江饭店，而住锦江俱乐部，为的是与大部分与会代表的住处分开。

锦江俱乐部是一幢法国宫廷巴洛克式的二层精致建筑，建于1926年。最初那里叫法国体育俱乐部，简称法国俱乐部，上海人称之为法国总会。在法国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解放后，改称锦江俱乐部，从属于锦江饭店，成为上海市领导和高层社会人士休闲的场所。

江青很喜欢锦江俱乐部，来去上海，总爱住在这幢闹中取静的豪华建筑。

这次江青来上海，为毛泽东打前站，心情很好。到达的翌日，由锦江饭店派车、派人，陪同她到上海南京路购物，并游览上海名胜豫园。

第三天—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锦江俱乐部客房里闲坐，锦江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交给她一封信。那外面的信封上写着“锦江饭店负责同志收”，已经拆开，里面放着一个信封，写着“江青同志收”，没有拆过。

江青拆开了那封信，顿时脸色陡变，晕倒在地。

郝德光急忙请江青随行人员帮忙，让她躺在床上休息。

当时，江青只说身体不舒服。

当晚，康生抵达上海，住进锦江饭店，江青这才把收到内容非常恶毒的匿名信一事，告诉康生。

康生当即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告诉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瑞卿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以为，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江青在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就收到匿名信，表明有人严密关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必须及时侦破这一案件。

于是公安部调兵遣将，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挂帅，成立专门的小组，侦查此案。

不过，江青只愿交出信封，不愿交出那封信，给侦查工作带来困难。江青说，信是用打字机打的。

4月1日，毛泽东从北京飞抵上海。就在这一天，锦江饭店又一次收到“锦江饭店负责同志收”的信，拆开之后，里面又是一封写着“江青同志收”的信，迅即交给江青。

江青拆开那封信，同样是用打字机打的，内容跟上次的信一模一样，可见是同一个人所为。

几天之内，接连收到两封匿名信，而第二封匿名信收到的翌日，正是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开幕之时，凸现出这两封匿名信来历不凡。

可是江青一直不肯交出匿名信，而光凭信封上的几个字很难侦查下去。罗瑞卿通过周恩来劝说江青，使江青终于交出了信件。果然那匿名信的内容非常“恶毒”[189]：

“以尖刻嘲讽的语气揭露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旧闻轶事，内容之详细，令人吃惊。信中甚至列举了当年与江青交往的数名男子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还具体到描述了江青当时的种种媚态丑姿。”

在那个年月，还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而中文打字机也很少。经过打字机专家鉴定，那封信是用宝石牌打字机打字，这下子使侦查范围缩小。

又经过调查，上海当时拥有宝石牌打字机总共为81台，分散于10个区的81个单位之中。循着这一线索，逐一排查。虽然从这些拥有宝石牌打字机的单位发现几个可能作案的人，但是经过比对信封上的笔迹或者打字机上的字模，都被一一否定。

案件的侦查陷入胶着、停滞的状态。

直到4月16日深夜，侦查人员宋添福偶然注意到信纸上方的一根草绿色的细丝。那表明那张信纸是从整本的信纸上撕下来，而整本的信纸是用草绿色的胶水粘起来。这种书刊装订用的胶水，通常是无色的。宋添福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草绿色胶水。

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线索。经过艰难的追查，在东海舰队的仓库里发现用草绿色胶水粘起来的信纸。再沿着这一线索追查，发现使用这种信纸的单位，竟然是东海舰队的情报机关，代号为“1287办公室”。

难道在这样绝密的军队机关，潜伏着危险的作案者？

经过仔细的排查，1287办公室海军中尉金柏麟有重大嫌疑。

1287办公室正好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经过打字机字模厂的专家鉴定，这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与匿名信上的字一样。金柏麟的笔迹，也与匿名信信封上的字相同。

这样，匿名信案件终于侦破。1959年4月12日金柏麟被捕。

关于金柏麟为什么要写羞辱江青的匿名信以及金柏麟如何获知江青来沪，侦查的结果如下[190]：

> 当时以为此案案情重大，背景复杂，审讯会有相当难度。出乎审讯人员意料的是，没费多大劲，这位前景看好的海军中尉便爽快承认了事实。原来，28岁的金柏麟是烈士遗孤，父母均系地下党员，6岁时，其父母被叛徒出卖遇害，金由其姨妈史文慧收养。史文慧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系当年上海文艺界活跃分子之一。其实，这位评弹艺人还有着另外一种身份，她的秘密身份是为周恩来直接掌握领导的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1924年入党），交往中结识了当时的电影明星蓝苹（江青艺名）。但其时，史文慧并不知道江青的地下党身份，因看不惯江青作风派头，主动断了与其的关系。
>
> 金柏麟父母牺牲后，史文慧同党中央断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找到长期与史文慧一起居于苏州的金柏麟，将他们安排至上海。1953年金柏麟参军，在海军服役。此时，史文慧才偶然从熟人那里知道江青已成中国的“第一夫人”，她目瞪口呆之余，很想不通其间名堂，有时不免与家人说点江青的过去。金也由此对江青产生极大反感。
>
> 3月25日当天，金柏麟去上海市区办事。在南京路上，正好碰见从永安公司购物出来的江青一行。那天下午，虽从未与江青见过面，金柏麟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基于对江青的反感，金柏麟顿时产生写匿名信羞辱这个女人一番的念头。于是他开始跟踪江青一行，从南京路跟踪到城隍庙、龙华寺，一直到了江青下榻的法国俱乐部。
>
> 当天，他便寄出了第一封匿名信。几天后，正好派他去北京船

舶机械附件厂查数据，他利用出差北京之机，又发出了第二封信。

金柏麟案件若在“文革”中，江青大权在握时，足以杀头，而且株连一大片。但当时，江青之淫威尚不足以控制军内外。结果，此案虽是公安部直接抓的大案，却既不由公安部处理，也不由案发地的上海处理，而是交部队军事法庭审理。罪名及判决也大出人意外：泄密罪，3年刑期。据言，此为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干预的结果：金系烈士遗孤，须从轻发落。“文革”中，当年颇带侠义心肠的金柏麟侥幸躲过江青可能的报复，逃过一死。

江青之兄李干卿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发生了匿名信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露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关于李干卿的情况，济南军区张庆祥在1976年11月27日写过一份材料：

> 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国民党时期当伪警察局的巡官，解放后被济南铁路局留用，经有关部门调查，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江青为了让李干卿逃避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1969年春，江青通过叶群给王效禹打电话说：“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济南，听说生活很困难，住的条件也很差，你们是不是安排一下。”先是安排李干卿住在省委会生产指挥部大院内，由生产指挥部供给。后来江青又别有用心地打电话，叫李干卿搬家，不要住在机关，结果被迫又把他安排在济南军区第一招待所的宿舍居住，占用六间平房的一个独立院，工资由六十四元五角加到八十三元，还享受着免收房费、生产补助、困难救济等特殊照顾。
>
> 张庆祥
>
> 1976年11月27日

另外，李干卿在1976年12月15日写过以下材料：

> 1939年春，江青通过别人从香港先后寄来了四封信，每封信内有七十五元的旧法币。有一封信被日本宪兵队队长寺田扣压了。不几天，寺田和伍长石吉、特务巡官张兴家把我抓到宪兵队，他们问我和江青的关系，开始我不承认，他们就打我，后来寺田拿出江青的照片来，我承认了江青是我妹妹，寺田就不打我了，对我说话也客气了。他叫我写信让江青回来，并说只要江青回来了，可让我当个省长、厅长。后来把我放了，还叫我定期到宪兵队去，有时寺田也到我家来，问我有没有来联系的人？江青有没有来信？过了一月左右的时间，我给江青写了第一封信，内容是以我、母亲和大妹妹的名义让江青回来。信交给了寺田，怎么发出的我不知道，过了一

个时间，没有消息，寺田又叫我给江青写第二封信，内容和第一封相同。以后日本宪兵队每十天、半月找我一次，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停止。

李干卿
1976年12月15日

在江青倒台后，李干卿还曾交出江青在1960年5月12日写给他的一封信，内中提及有人找他的“麻烦”：

哥哥：

你最近的来信收到了。

姐姐还在医院里，需要动一个手术，没有危险，请放心！

我有一年的样子没有给你写信，一方面因为身体差和忙一些，另方面也没有什么事好告诉你。今天姐姐给我看了你以前的一封来信，你要求上北京，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孤单，我认为应该和你谈谈。你不能来北京，因为找不到职业，你应好好地在目前的职位上工作，能够有工作有饭吃就是好的，至于有人找你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去年在济南我就和你谈过，只要自己拿稳了，是不怕这个的，你如果拿不稳，出了岔子，我完全不能负责任，希望你注意，不可因小失大。我们是劳苦家庭出身，应刻苦生活、努力工作！你现在究竟做什么工作？一个月多少薪水？

房子是否还是不出房租？在济南租一间房子一个月多少钱？以上这几个问题，请来信详细告诉我。祝你和嫂嫂

好！

江青
5月12日

最初，在1953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找他“麻烦”。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江青所说的找她哥哥的“麻烦”，是在1959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于是，引出了“麻烦”……

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1959年7月25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1921年4月至1923年3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

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建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1945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1945年10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支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1948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

1951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

1951年6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7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1954年7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指江青—引者注）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对李干卿的审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汇报，哭道：

“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191]

陈伯达则帮腔道：

“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引者注），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192]

急急如律令。翌日，从北京派出三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张国峰病重外，其余六人于4月29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峰受到日夜折磨，6月30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尽酷刑和屈辱。直至1977年8月，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197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这才为审查李干卿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进中南海，只在毛泽东1959年底路过济南时，在专列上见他一面，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毛泽东接见李干卿，前后只有五分钟，话不投机，纯属敷衍而已。

后来李干卿在1970年春天带着他的小儿子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共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住在中直招待所。江青拒见李干卿，并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立即回原籍。

江青对秘书杨银禄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193]

但是李干卿不肯走。

江青托秘书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194]

就这样，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见李干卿一面，训斥了几句，就走了。

江青之姐李云露倒是在中南海长住。李云露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王博文，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王博文随李云露也住进中南海。李云露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李讷。

然而，有一回李云露为了一点小事，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把李云露逐出中南海，再也不理她。

李云露在北京艰难地生活着。在1969年之后，李云露常常给江青写信，表达想念之情。江青嘱咐秘书杨银禄，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在毛泽东去世前，江青忽然记起了李云露，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

看望。当年，李云露在中南海的时候，就与江青的厨师程汝明相识。

程汝明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见到了李云露。江青秘书杨银禄后来听程汝明讲起当时的情景：

> 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
>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195]

程汝明回到中南海之后，向江青汇报了李云露的情况。这时，江青倒是动了恻隐之心，拿出5000元人民币，托程汝明送到李云露手中。

杨银禄说，其实江青手头没有多少钱。江青能够拿出5000元人民币给姐姐李云露，是毛泽东在1973年批给江青8000元人民币。那是因为1972年5月李讷生了孩子之后，既要雇保姆，又要给孩子买牛奶，而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李讷不敢自己出面向父亲毛泽东要钱，而是在1973年托张耀祠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张耀祠鼓足勇气说，给8000元人民币吧。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196]

就这样，江青有了8000元人民币。江青把其中的5000元人民币给了姐姐李云露。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手头有点紧，要程汝明去李云露那里，把送出去的5000元人民币要回来。程汝明以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都以为不妥，劝江青不要那样做，否则影响不好。江青只得作罢。

江青的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1990年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老式房子里，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又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在1934年便加入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老武术家双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拳。

顾留馨最初的“学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前来教他打太极拳，以拳术疗伤。贺龙主管体育，他回国后经过调查、选择，选中了顾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馨颇受重用，回国后，教过贺龙，教过叶剑英，教过邓颖超，以至教过宋庆龄。

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她也请顾留馨教太极拳。在顾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不过，她倒很守时，总是准时前来学拳。这样的体育疗法，使江青的体质有所加强，这样，在1961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一时间，向顾留馨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纷至沓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于是，她打乒乓球，打台球。从1959年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乒乓球热席卷中国。江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她常抽杀，球技颇凶，属于进攻型。

她的游泳姿势虽差，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她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之类不快之事，不时下海。

江青那时常在外地休养。1962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为江青代拟给陈宗娥的信中，便提及江青“已两年不在北京”。

陈宗娥曾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

毛泽东代江青所拟的复信全文如下：

宗娥：

你1961年6月27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3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忽（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17支局109号信箱徐业夫同志收转江青。祝你健康！

云鹤

1962年5月12日

“云鹤”，江青的本名。徐业夫是当时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江青在外地休养期间，毛泽东常常批一些文件给江青阅读，以使她在休养中了解中国政治情况。

1960年6月20日，毛泽东致函江青：

江青：

此件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的（会）谈，他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劲，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

20日晨

蒙哥马利是原英国陆军元帅，当时已退休。新华社通讯社在1960年6月16日下午编印的《参考资料》第3660期上，刊载了《英报刊载蒙哥马利访华第一篇文章》的报道。报道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6月12日全文刊载了蒙哥马利谈访华观感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同毛的会谈》。

1960年6月，毛泽东还就蒙哥马利问题，批示江青：“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指外交部办公厅1960年6月24日印发的一份材料。在这份材料上，刊载蒙哥马利6月9日晚在德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讲。

蒙哥马利说，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当然也流过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看来不流血也没有办法。

蒙哥马利说，他曾同毛泽东主席谈过，革命使许多人掉了脑袋，固

然不能算是件好事，但也不完全是坏事。为此，毛泽东主席称他是一位英国的开明元帅。

蒙哥马利还说，他所见到的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西方所说的中国领袖对世界了解很少，是不正确的。他介绍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

1960年8月，毛泽东又批示：“江青看，仔细地慢慢地看，很有好处。”

毛泽东要江青“仔细地慢慢地看”，是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0年8月1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载《委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阿里埃蒂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看法》。“委共”，亦即委内瑞拉共产党。

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著名散文作家杨朔写的一篇旅日游记《樱花雨》。细于阅报的毛泽东，便在杨朔散文的标题旁，写下这样的批语：“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

1961年6月17日，毛泽东又写道：“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好文件”，是指中共中央1961年6月15日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6月19日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961年11月19日，毛泽东收到江青的来信，批示：

> 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

毛泽东
1961年11月19日

毛泽东所说的“一批材料”，共五种。其中有中共中央联络部1961年4月2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载的五篇材料。在第四篇《美国军事家说西方国家无法对付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一文标题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指示“江青阅”。第五篇为《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毛泽东也以为很值得一读。在这批材料中，还有中共中央1961年5月17日印发的《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等文件。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1月1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5）（总第91期），对所载的《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很重视，给江青写了批语：

江青：

此件可以看一下，可以明白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形。

毛泽东
1月12日上午九时

《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用列宁“遗嘱”，攻击斯大林“过于粗暴”、“滥用职权”，说列宁“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的品质”，“提出过应该研究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

所谓列宁“遗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指出，所谓列宁“遗嘱”，就是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病重时口授的。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列宁是准备把它交给他死后召开的那次党代表大会的。

列宁死后，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的这一封信。尽管列宁在信中指出斯大林的种种缺点，认为斯大林不宜再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代表们经过讨论，还是主张斯大林继续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并决定不公布这个列宁“遗嘱”。

此后，反对派便不断利用这一列宁“遗嘱”作为反对斯大林的武器，并造成一种空气，似乎俄共中央隐瞒了这一“遗嘱”。

实际上，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所写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还引用了列宁“遗嘱”中关于“斯大林太粗暴”那一整段话。

《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说明了列宁“遗嘱”问题始末，理所当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严重分歧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斯大林。

毛泽东以为《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值得一阅，所以向江青推荐。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表明他对休养中的江青是十分关心的。

不久，1962年2月，毛泽东关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中，又一次要江青阅读文件：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毛泽东手稿漏“么”字—引者注）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毛泽东
26日上午四时半

经过休养和体育疗法，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建议，进行文化疗养：摄影，看戏，看电影。

前文已经提及，她喜欢摄影。在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她的摄影作品庐山仙人洞题诗之后，她对摄影的兴趣更浓了。

她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决定拜师。

她请谁当老师呢？

她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著名摄影家石少华当自己的摄影老师。

石少华得知这一消息，却推辞了。他深知江青性情乖戾，不敢收这样的“学生”。他借口工作忙，谢绝了江青的请求。

石少华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亲自出马，为江青求师。

> 石少华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请他去。他开始以为是摄影上的事情，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更没意识到和江青学习摄影有关。他赶快驱车往中南海去，车子一直开到南海湖畔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后院的门外。
>
> 主席会见客人的颐年堂在前院，工作和居住在后院，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办公，石少华到了后，卫士进主席办公室通告。石少华刚在会客室坐下，就见主席走了进来，他不知怎么觉得有些拘束，不似以前在延安那样放得开。毛主席却老远就大声招呼他：“欢迎欢迎，石少华同志！”
>
> 60年代初，毛泽东虽说已近古稀之年，可是体质相当好，面色红润，腰板笔直，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脚底生风似的，噌噌地，有时年轻的卫士跟在身后都要不住地一溜小跑，大家无论从感觉上还是从感情上，都觉得毛泽东像常青树一样出神入化，永远不会衰老。
>
> 毛泽东热情地握住石少华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他的肩，请他坐下。
>
>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毛泽东说到这，故意停住他难懂的湖南话，侧过脸专注地看着石少华，想看看这个广东人的反应。
>
> 他们的会谈的确很有意思。一个湖南人，一个广东人，口音都难懂，交谈快了，别说外人了，就连他们自己相互听起来都费力，叽里咕噜的，和说外语差不多。不过他们交谈时都知道扬长避短，用慢速度讲话，也就不存在语言障碍了。

石少华听懂了主席的湖南话，但是没有马上明白主席所指的事情，愣愣地望着主席，等他说下去。

毛泽东将他请石少华来的意图慢慢对石少华说了，原来是为江青身体着想，请石少华做她的摄影老师。“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197]

除了学习摄影之外，江青还看了很多戏剧和电影。

江青在看戏、看电影之中，看出了大“问题”！

后来，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滋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1962年3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20世纪50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这时，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使江青颇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笔者在1991年7月7日采访王光美时，她正在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赠英文原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倚，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后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8年5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1945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

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九真一女一子；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革”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此是后话。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出。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晚了15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在向“左”偏航。

会议前夕，1962年9月14日，毛泽东读了冶金工业部党组1962年9月11日《关于解决品种质量的情况和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给江青写了批语：

江青阅，很重要。
退毛。

毛泽东把冶金方面的文件批给江青，表明他希望江青关心中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批示：

此二件，江青阅。退毛。
可看，很好。

[image]

■ 江青第一次在《人民日报》露面—1962年9月陪同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夫人。

毛泽东所说的“此二件”之中，一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9月16日印发的《八届十中全会简报·华东组第二十号》，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9月14日下午在华东组的发言。

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

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全会的文件批给江青阅看，这同样表明，毛泽东要求江青关心中国政局。

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前夕，工人出版社忽然接到通知，要求赶印六百册小说《刘志丹》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

会上，不仅散发了小说《刘志丹》，还印发了两封信—那是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在1962年写给周扬的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批

评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制造舆论，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指的便是小说《刘志丹》。

虽说对小说《刘志丹》作了"宣判"的是毛泽东，而制造这起文坛冤案的幕后策划者则是康生。

刘志丹，著名的红军将领，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1935年9月21日，毛泽东率红军长征到了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见到刘志丹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遂决定进军陕北，以陕北作为根据地。

刘志丹在1936年4月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阵亡于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此后，刘志丹一直被作为革命先烈纪念。

1956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传记，内中有一本《刘志丹》，约请李建彤写。

李建彤确实是很合适的作者，因为她是刘志丹的弟媳，很熟悉刘志丹的事迹。她的丈夫刘景范当年担任陕甘军委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经过两年的准备，李建彤在1958年开始写《刘志丹》。写了一稿又一稿，写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工人日报》还连载了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来，刘志丹早在20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33岁，关于他的小说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小说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这下子，使问题复杂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1953年6月在全国财经会议前后进行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受到批判。同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罗炎"，被说成是高岗。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此案不断升级。许多人因此受到牵连。

此案直至经历了17个年头之后，在1979年8月，经邓小平批示，中共中央发出1979年第五十三号文件，才终于得以平反。

文件批驳了康生，指出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是制造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特别指出，小说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铲除。

文件还认为，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甘时期的某些材料，也不应定为“为高岗翻案”。

所谓“索隐”，亦即附会，亦即影射。把小说《刘志丹》索隐成是“为高岗翻案”开了一个恶例。

此事给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后，她运用康生的“索隐式”手法，把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成“为彭德怀翻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江青意识到形势对她颇为有利，便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铭。齐燕铭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此时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文化部副部长。江青向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茫然，不知江青这番话有何来历—是江青自己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论职务，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只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怎可以“训示”齐燕铭！

此后不久，江青居然召见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须知，当时陆定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江青又一次向他们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

部长们居然无动于衷，对于这位颐指气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

部长们又一次忽视了江青的“能量”。江青下决心要大干一场—她结束了疗养生活，插手中国政治了。

[153]据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1987年第1、2期合刊。

[1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155]据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156]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1987年第1、2期合刊。

[15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158]爱泼斯坦：《宋庆龄》，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页。

[1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160]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革命”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8页。

[16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

[162]《夏衍谈〈武训传〉和中国知识分子》，1994年8月3日《文汇电影时报》。

[163]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及其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党史通讯》1985年12期。

[164]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165]2004年3月25日，叶永烈在杭州采访公安部原部长王芳。

[166]《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205页。

[167]《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168]《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69]《宋庆龄书信集—续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

页。

[17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3页。

[17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89页。

[172]麦阳：《〈红楼梦研究〉批判始末》，《世纪》1994年第1期。

[173]蒋连根：《大导演史东山自杀真相》，《名人传记》2010年8月。

[17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8页。

[175]杨银禄：《江青的“女皇”生活》，《百年潮》1998年第6期。

[176]王凡：《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177]田原：《我负责毛泽东日常饮食生活—专职生活管理员张国兴的回忆》，《中外书摘》1994年第11期。

[178]王凡：《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页。

[179]徐大刚口述、任翔撰文，载陈政《黑白瞬间的岁月：庐山老相册2》，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180]《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0页。

[181]1991年7月1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曾碧漪时年86岁。

[182]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海南纪实》1988年第4期。

[183]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江西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8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185]据1985年第1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

[186]水静：《特殊的交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

—220页。

[187]李家骥、杨庆旺：《跟随红太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188]1988年11月3日，叶永烈采访于北京俞瑾寓所。

[189]王仲典：《1959，上海“匿名信”事件》，《文史春秋》2007年第1期。

[190]王仲典：《1959，上海“匿名信”事件》，《文史春秋》2007年第1期。

[191]鲁公宣：《齐鲁一劫》，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192]鲁公宣：《齐鲁一劫》，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193]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94]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95]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96]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97]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203页。

目录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毛泽东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突然跃为“新星”
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横扫“右派”
姚文元“双喜临门”
“金棍子”讨伐文坛老将
姚文元的“诗传单”
一度“失业”的“棍子”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出任《解放日报》编委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巴金怒斥“姚棍子”
“骆漠”是谁
《杂家》事件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张春桥是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柯庆施差一点取代周恩来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干掉陈其五
第九章 江、张联手抓“样板戏”
江青成了上海的“女客人”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介绍江青结识张春桥
在上海发出“有分量”的第一炮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树《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江青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张春桥成了“两出戏书记”
江青刨了张春桥一顿
柯庆施之死
张春桥提携于会泳
江青伸手抓《海港》
第十章 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张春桥介绍江青结识“青年评论家”姚文元

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看中“民间报纸”《文汇报》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张春桥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大学生王复兴奋笔批姚
张春桥终于“引蛇出洞”
“围城打援”——打北京援军
“海瑞热”的来历
毛泽东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
邓拓死于姚文元笔下
田家英为抗争而献身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
江青前往苏州请“尊神”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陈伯达、张春桥帮助改《纪要》
北京针锋相对起草《二月提纲》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毛泽东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起草《五一六通知》
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毛泽东坐镇杭州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沉思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江青点火于北京高校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旗手”的登基典礼
第十二章 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
崔家的新女婿
王洪文当过五年半的兵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科长梦的破灭
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保卫科事件
炮轰工作队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北京小将”鼓舞了王洪文
带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洪文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成为“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头头
王洪文结识王秀珍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王洪文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工总司”深夜抢红布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
第十三章 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车停安亭
王洪文拦车卧轨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陈伯达发来急电
张春桥从天而降
王洪文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王洪文昆山历险记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王洪文在各派纷争中剪除异己
稳定“后院”
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上海“赤卫队”的崛起
爆发《解放日报》事件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两军对垒争夺上海
急令耿金章回沪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第十四章 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常溪萍终于发出了致邓小平的信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
“上海不可能属于陈丕显”
张、姚从幕后走到台前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紧急通告》的诞生
上海“工总司”成了全国“光辉的榜样”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二兵团”耿金章宣布上海“夺权”
张春桥软硬兼施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迎接上海“最盛大的节日”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上海，落入张春桥手中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其人
张春桥降服耿金章
张、姚成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人民日报》对“上海人民公社”保持沉默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王洪文吞并“二兵团”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人帮”兴亡（2）：兴风/叶永烈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54-0409-7

I. ①四… II. ①叶… III. 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IV. ①K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0592号

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未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特向未署名的摄影者致歉；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与本社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克　川　陈立旭　柯琳芳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胡志华　袁又文　章文岚　叶敏娟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97印张　9插页　插图253幅　2168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平全四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1925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104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1977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张春桥。

经过一番摸底、筹备，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1955年，53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扬（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1957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柯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

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了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1965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忠实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虽有微词，诸如称之为“上海的那个好学生”，但并没有视他为张春桥的“帮”中同伙。

柯庆施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说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

的红色接班人。”

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他从未批评过张春桥。

虽说柯庆施早在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论革命资历是很深的，但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柯庆施博得毛泽东好感，那是在1956年，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不久的时候。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

这次著名讲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的观点：

>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

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image]

1962年柯庆施（中）陪同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左一）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柯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春桥呢？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

毛泽东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1]

毛泽东先是谈及王蒙：“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

接着，毛泽东论及李希凡：“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

毛泽东最后提及了姚文元：“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及的三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唯有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姚文元。

不过，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姚文元时，前面加了个“定语”——“姚蓬子的儿子”！

对于毛泽东来说，当时对姚文元还很陌生，而对姚蓬子其人却是熟知的。

毛泽东怎么会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呢？

那是在1957年2月6日的《文汇报》上，姚文元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

姚文元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

开头便写道：

“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创作问题杂谈》中尖锐地提出了三大问题和七种偏向，大声疾呼地要求‘彻底肃清’他所谓的‘歪风’，而其锋芒则指向‘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姚雪垠先生所指责的毛病有一部分确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是正在纠正中的缺点，再提出来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许多‘根本性偏差’，我认为并不全是教条主义，而有一些是已经为十多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根本原则，这就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姚文元在“讨论”中，如此说：

“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话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阅1956年第17期《新观察》时，很有兴味地读了散文《惠泉吃茶记》，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泽东称赞这篇散文“很讲求艺术技巧”，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扬、茅盾问及姚雪垠何许人也。

《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泽东对周扬、茅盾说：“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2]

也许是历史的巧遇，正在这时，上海《文汇报》刊出“两姚”相争的文章。毛泽东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

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调来上海不过一年多的柯庆施，并不知道姚文元为何许人。

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姚文元是张春桥“培养”的文学青年。

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说，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哦，原来是姚蓬子的儿子！”柯庆施对姚蓬子非常熟悉。

柯庆施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

“哦！”毛泽东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却并不介意。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顿受青睐。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上海文化界名流辈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出的代表名单，是一批名家：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即林放）、徐铸成、吴永刚、石挥等。

3月4日，当上海代表团上火车赴京之际，人们惊讶地看到，姚文元也上来了！

“大概是作为工作人员去的吧。”人们这么猜想。

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提到了姚文元。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们才知，姚文元颇受毛泽东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谈及姚文元的：

>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此番，姚文元亲耳听见毛泽东对他的褒扬，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扳扳手指头，这一个来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2月6日，他发表《教条和原则》；第十天——2月16日，毛泽东便谈到他；眼下，才一个月零四天，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他。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从北京回来之后，姚文元自然是“备受鼓舞”。不知是他过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还是当时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于政治投机的他此时转向了“右”，他竟发表了一系近乎“右派”言论的文章。

姚文元挨过整，他对于“挖根”之苦，有了深切的体会。于是，他写文章，抨击那种“挖根”之法：“动不动就用‘挖根’来代替一切具体分析，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然而我们不少人，是习惯于用几顶帽子来代替具体分析的，这在整风中是应当改一改了。”[3]

他也反对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后来他却成了自己批判过的那“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的人：“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4]

他，居然也反对“棍子”。他认为：“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惺惺惜惺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5]

遗憾的是，当他成为“金棍子”之后，早把什么“知音”呀、“诤友”呀，忘得一干二净，变“惺惺惜惺惺”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大声叫嚷“放下架子”：

“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拆墙也好，填沟也好，首先还是把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架子摔掉，没有挥架子的勇气，自己高坐在云霄之上，大喊：‘大家来拆墙呀，大家来填沟呀！’恐怕墙还是墙，沟还是沟。

“如果把灵魂深处的优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气凌人整掉，那墙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沟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评说：“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权

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6]

他的这番颇为尖锐的言论，在当年反右派时扣上“反对党的领导”之类的帽子，是极为容易的。

姚文元在“鸣放”时最“危险”的言论，莫过于他对王若望[7]的附和和支持。

姚蓬子在会上支持王若望。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鸣放会上，王若望发言之后，姚蓬子立即站了起来，显得异常激动，大声地吼道：“我代表中国人民，支持王若望的发言！”

姚蓬子获释回家，满肚子的冤气，满肚子的牢骚。他动不动“我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大的口气，倒向来是他的风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王若望。

王若望在1957年那“早春天气”中，他接二连三发表了锋芒毕露的杂文《步步设防》、《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不对头》、《一板之隔》等等。

1957年4月26日，当姚文元从《文汇报》上读到王若望的《步步设防》，不由得拍案叫好。当即欣然命笔，写了《一点补充》。5月7日、8日的《文汇报》，连续刊出了姚文元对王若望的“补充”：“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含义，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个劲儿在那里“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教条主义”。

也就在这篇《一点补充》里，姚文元大大地赞扬了《在桥梁工地上》。他说：“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桥梁工地上》，都相当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话剧《同甘共苦》后来也遭到了“批判”。

1957年6月8日，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这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幕。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中，王若望和刘宾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么多公开发表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随时可以“光临”他的脑袋。何况，水有源，树有根，要“挖根”的话，那是很便当的——因为父亲受到审查，因为自己挨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气冲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仅没有成为“右派”，他摇身一变，又成了“英雄”——一名震惊全国的反右“英雄”！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他的历史的转折点。

突然跃为“新星”

6月14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6月14日下午，一辆轿车驶往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海格大楼”。车上坐着张春桥和“新星”姚文元。

听说“庆施同志”召见，姚文元搓着双手，兴奋得不知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

“哟，那么年轻呀！”柯庆施一边握着姚文元的手，一边问，“多大啦？”

“26岁。”姚文元赶紧答道。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哪！”柯庆施连声说，“你的文章，很老练，不像二十几岁的人写的。”

姚文元一听，有点紧张，马上说道：“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

“哈哈哈哈，”柯庆施大笑起来，“请坐，请坐。我是说，你的文章、你的思想，超越了你的年龄。”

姚文元的心，放了下来。他赶紧掏出笔记本，飞快地用笔记着。这时，他的双手才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你的情况，春桥同志都已经跟我说了。”柯庆施收起了笑容，开始了正式的谈话，“你的阶级斗争的嗅觉很灵敏，这一点很不错！”

姚文元的笔，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我们应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当前，反右派斗争刚刚打响，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你要争取成为一名反右尖兵，要不断写出《录以备考》那样的好文章。”柯庆施用作大报告的口气，说了一大通。

姚文元只忙于记录，仿佛在听报告，忘了这是在跟书记谈话。

“以后，你常跟春桥同志保持联系。要随时了解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只有消息灵通，才能写出好文章。”柯庆施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张春桥。

“我们早就认识。春桥同志给过我许多帮助。这一次，多亏他把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要批判《文汇报》的重要消息告诉我，我才会写出《录以备考》。”直到这时，姚文元才想起应当说这样几句必须说的话。

张春桥坐在一侧，只是微微笑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他深谙柯庆施的脾气——不喜欢别人随便插嘴。

等到姚文元说毕，他才讲了一句他必须说的话：“庆施同志像毛主席一样，历来是很重视抓阶级斗争、很注意抓报纸的。”

“以后要写什么文章，我让春桥告诉你。在报纸上，由你出面，比我、比春桥都要方便。”柯庆施的这句话，使姚文元受宠若惊。

这是当时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的姚文元，跟上海首脑人物的会见。从此，姚文元在柯庆施的记忆仓库中，留下了好印象。从此，张春桥跟姚文元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1957年6月1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那一阵子，毛泽东天天读上海的《文汇报》，关注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诚如他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当毛泽东打开6月10日的《文汇报》，第3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华社5月25日一条很短的电讯引起的。电讯报道了毛泽东在5月25日下午于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
>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
>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
>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尽管新华社的这条电讯很短，但是非常重要。毛泽东的话，一共只有四句。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出的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讯号──13天后，“反右派运动”的狂飚便席卷中华大地。

毛泽东这几句话的重要性，还可以从此后20年──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得到印证：这几句话以《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为题，作为单独的一篇文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

当然，不论是13天后发生的事情，还是20年后发生的事情，事后都证明了新华社那条消息的重要性。然而，在当时，这条简短的新华社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姚文元却凭借着他特殊的政治敏感性，立即注意到这条不寻常的新闻。

姚文元比较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这一电讯时的不同编排技巧，大发感叹，写成《录以备考》。

鉴于此文是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况且文章不长，特全文照录于下——“录以备考”。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毛泽东以敏感的目光，注意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亲笔写下一篇重要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然而，毛泽东没有在文章上署“毛泽东”三字，却是写上“本报编辑部”。

“本报”是什么报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毛泽东还指示，把姚文元的文章与《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起刊出。

毛泽东的文章，是怎样交到《人民日报》的呢？这件事，恰巧与《人民日报》“换帅”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是在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卧室里召见吴冷西。当吴冷西到达那里时，胡乔木已经在那里了。

毛泽东早已不满于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尖锐地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所以，在1957年6月7日晚上，毛泽东紧急召见吴冷西，宣布《人民日报》“易帅”，由吴冷西代替邓拓。当时，吴冷西极感突然，脱口而出：“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说，给他十天考虑的时间。

翌日—1957年6月8日，奉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改定的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右派斗争。

还没有到十天，毛泽东便在6月13日晚召见吴冷西，要吴冷西马上到人民日报去主持工作。毛泽东随手把自己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当面交给吴冷西，嘱他翌日见报。

吴冷西这么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这时又回过头来就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8]

吴冷西当即和胡乔木一起赶往人民日报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同时一起刊出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按照中国新闻界的习惯，凡是重要的文章，必须以新华社电讯发出，这样全国各地报纸都会马上加以转载。为了扩大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毛泽东还指示新华社转发这两篇文章。

毛泽东甚至为新华社转发这两篇文章，亲自写了电讯的新闻导语。

毛泽东所写的导语全文如下：

［新华社14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9]

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全文播发。

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所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全文如下：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

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10]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为之震动。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毛泽东强有力的推动下，跃上苍穹，万众瞩目，名噪一时。

1957年6月14日，成为姚文元一生中里程碑式的日子。

从此，姚文元奠定了他的“左派”地位。

他，一跃而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费解的是，1957年6月10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6月10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6月6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6月6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

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起5月25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

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6月8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

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

然而，6月8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6月10日刊出。

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

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盘上走过的棋，全然以投机为行动指

针。

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

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兴奋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啪啪作响：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6月14日《解放日报》）；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6月15日《文汇报》）；

《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6月18日《新闻日报》）；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6月21日《解放日报》）；

《“过去是有功劳的”》（6月24日《解放日报》）；

《揭露谜底》（6月27日《新闻日报》）；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6月28日《文汇报》）；

《这场“戏”的确“好看”》（6月29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炫目的光芒。

7月1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5月25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

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

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

横扫“右派”

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11]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

>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像高岗、饶漱石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同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曾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面目，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暴露得特别明显，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王若望就是这类人物之一。他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急先锋，并且使用了各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来达到他的野心。[12]
>
> 王若望自从鸣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多次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发言。在这些文章和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党发动了剧烈的进攻，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实的、带煽动性的言论，已经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上的武器，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党外人士对党的不满。彻底批判这些言论，澄清他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是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13]

后来，王若望因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20世纪30年代，18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当时担任主编的施蛰存发现此事，使张春桥丢了饭碗。

不料，22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

> 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讽喻，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曲曲，像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

是非常明显的。[14]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在“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 谁都知道，许杰是一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7月15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别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15]

其实，许杰短短几句话，点穿了姚文元之辈的“秘诀”：“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难怪，这些击中要害的话，使“青年批评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来。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劲。

他打流沙河——

>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勋坦，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他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组织了右派小集团，辱骂共产党，辱骂新社会的一切干部。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质上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作品。[16]

他驳徐中玉——

> 从这种谣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质，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被怎样一种黑暗的思想充塞着。教授造谣，在今天并不算新鲜的事情。[17]

他骂鲁莽——

> 鲁莽是一个仇恨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动起家并且以反动闻名的。[18]

他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讨论”——

> 最近一年以来，有哪种理论是风靡一时的话，那就是“写真实”。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写《在悬崖上》，其指导的文艺思想都是“写真实”。……刘绍棠提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

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去空谈真实性和忠实于生活，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应当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19]

他揍徐懋庸——

在1957年11至12月的《文汇报》上，姚文元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

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了“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在。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骗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阶级暂时不进行反击的时候；至于做“一世之雄”的幻梦，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代早已被历史的巨潮永远地埋葬了。……

他攻陆文夫——

“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企图又是这样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青年。他们自称是“一群青年的文学工作者”。……青年文学工作者中个人主义的滋长，近一年多来是有了相当发展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上非常厉害的腐蚀剂。[20]

他向《新观察》开火——

5月16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21]

他向《文艺报》猛攻——

> 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喜欢看《文艺报》，但那“欢喜”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22]

26岁的姚文元，比两年前“反胡风”的时候神气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坛打手。从1957年6月10日发表《录以备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姚文元大打出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

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姚文元“双喜临门”

《录以备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脑海中的美好印象，终于在1958年化为一纸调令：姚文元不再是从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借调到《萌芽》杂志编辑部，而是正式调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195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6月1日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柯庆施一回到上海，当即决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创办理论半月刊，取名为《解放》，于7月1日创刊，任命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为副总编，周原冰为编辑部主任。柯庆施点名调来姚文元，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从此，姚文元成为柯庆施“直辖部队”中的一员，消息益发灵通了，跟张春桥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柯庆施有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姚文元常有机会出席这样的小会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断记下柯庆施的话，揣摩这些信息，加以延伸，加以发挥，便变成姚文元的文章。轧苗头，看风向，已成为姚文元的写作秘诀。

政治上的得势，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在中共上海卢湾区委挨批判时那样窝窝囊囊，再也不用在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赢得了金英的爱情。

一本又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不断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书，仿佛一颗砝码，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

1957年6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书——杂文集《细流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1958年4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杂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1958年7月，姚文元的第三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8年10月，一本小册子——《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

〈保卫延安〉的几个特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成为姚文元的第四本书。

离香山路不远的思南路85号，变得热闹起来，贴上了红色的“喜”字。

自从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难得露面的姚蓬子，也穿上一身新衣裳，和妻子一起前往香山路，步入儿子的新房，表示祝贺。

姚文元经历了一番“苦恋”，终于结婚了，新娘便是金英。

为了庆贺与金英的结合，姚文元取了一个笔名“金兆文”。“金”、“文”的来历都很明白，那“兆”则取自“姚”。

姚文元“双喜临门”了。他，“羽翼已就”，要“横绝四海”了。

“金棍子”讨伐文坛老将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疯狂。1958年，姚文元手中拎着棍子，战绩“辉煌”。

过河的卒子吃老将。姚文元所征所伐已是那批颇有建树的老作家。

冯雪峰，当他在上海担任左联的中共党团书记时，姚文元才出生，冯雪峰还抱过姚文元。冯雪峰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去世时丧事由他主持，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样的革命前辈、文坛老将，姚文元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姚文元用从笔尖流出的墨水，往冯雪峰脸上抹黑。那些话语，非常刻毒：“冯雪峰从他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指导他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23]

顺便提及的是，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病逝。当时姚文元执掌中国文艺界领导大权，冷漠地写下批示：“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的规模。”

艾青，这位中国诗坛的主帅，也不在姚文元的眼中。姚文元写了洋洋万言的《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发表于1958年5月第5期《学术月刊》。

姚文元用这样的“概括”，指责艾青怎样“堕落为人民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艾青在某些方面比丁玲走得远些。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达了人民抗日的热情。然而由于艾青的基本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他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所以革命越前进，越是接近社会主义，他的进步性积极性就越缩小。到了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艾青的积极性就不但等于零，而且转化为彻底的反动性了。分析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历程，可以增长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知道许多世事。并且从他身上，取得深刻的教训。”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咒骂老干部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其实，姚文元论定艾青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已经“首次”使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样的“批判”公式了。

就连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上海老作家巴金，居然也连遭姚文元的棍

打。姚文元发表了《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巴金作品讨论）等文，认为巴金的小说《灭亡》充满“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且批判了巴金迄今“仍旧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对于作品中暴露得很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作了肯定和歌颂”。

姚文元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丁阿姨”——丁玲。当年，丁玲与姚蓬子共办《北斗》，又一起被关押在南京。姚蓬子叛党，丁玲挣脱了锁链，奔向延安……当丁玲、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丁玲“贬值”了。管她什么“甲玲”、“丁玲”的，谁“贬值”，就打谁。反正“符合”领导意图是最重要的。

在1957年9月第35期《展望》杂志上，姚文元已向丁玲放了一枪——《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那口气，令人竖起汗毛：“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这样灵魂腐化丑恶的人，我们斗争她，难道还有什么可惜吗？一条黑颜色的毒蛇是毒蛇，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仍旧是毒蛇，决不因为表面上好看，就可以放它过关……”

到了1958年，姚文元抛出两篇万言长文，对“丁阿姨”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批判”：《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1958年3月第2期《收获》）；《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1958年第3期《文艺月报》）。

姚文元这样“评价”丁玲的早期作品：

> 当我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丁玲所死抱住的形形色色的莎菲们将显出她们全部的无耻、反动、黑暗同渺小，她们以及那个早已被粉碎了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王国，将永远地被社会主义文学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

姚文元对丁玲的《在医院中》上线上纲，指斥其为“反革命作品”：

> 丁玲的反革命作品《在医院中》，就是把伟大的、光明的解放区歪曲成漆黑一团，把英勇而勤劳的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干部诬蔑成冷酷无情的人。反之，对于敌视革命队伍、内心黑暗、抱着顽强的反党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他们粉饰成善良的受屈的羔羊，企图引起人们对他们反革命思想的同情。很明显，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来描写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生活的，这个立场是和中国革命的方向相敌对的反动立场，因而作品本身也就带着露骨的反动性。

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我先知，唯我先觉。27岁的姚文元如同一

颗扫帚星，在中国文坛上“扫荡”着。

姚文元的“诗传单”

姚文元的棍子，居然打到古人欧阳修头上去了！

1958年10月出版的第16期《读书月报》上，姚文元发表了《向“广大群众”推荐什么东西？——简评〈欧阳修词选译〉》。

欧阳修乃唐宋八大家之一。1958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黄公渚的《欧阳修词选译》。用白话文翻译欧阳修的名作，这本是向广大群众普及古典文学的好事。然而，姚文元却不。他首先提醒人们，今日所处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他说：“全国人民正投身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干劲无穷尽，跃进再跃进，上游再上游，向伟大的共产主义前进！六亿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接连不断地创造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

在如此“热火朝天”的年月，姚文元以为出版《欧阳修词选译》，“会削弱人民革命的积极性”、“大多数是表现着露骨的颓废厌世的倾向”，“特别是广大青年，尤其有着毒害作用”。

姚文元危言耸听地说，古典文学，“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正是跃进高潮接着高潮的伟大时代，思想战线也要大跃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

大抵因为当过《萌芽》杂志的诗歌编辑，大抵因为父亲姚蓬子喜欢写诗，姚文元在1958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让诗传单飞遍全市》。

姚文元力主诗歌应当“赶任务”，“通过几万、十几万宣传员的口，广泛地传播到工厂、学校、里弄里去，有力地发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

姚文元说，诗歌是“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每一句都是战斗的歌声，每一首都是行动的号召”。

他批判道：“在以前，或在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冷眼旁观、鄙视‘赶任务’，看不起及时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短诗，或在崇洋观念支配下，形式上机械地摹仿外国，不愿写民歌体的诗。这样，当然就不可能用满腔热情来写诗传单了。”

在“满腔热情”鼓舞之下，为着“赶任务”，为着“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在那“大跃进的年代”，姚文元居然也成了“诗人”！

论“棍”才，姚文元远远胜过他的父亲！可惜，论诗才，姚文元则远

远逊于其父。

如今，读者们读着姚文元的“诗传单”，会笑问：这是诗？

请看，“诗人”姚文元在1958年6月8日《街头文艺》创刊号上写的诗，题为《我们工人骨头硬》：

我们工人骨头硬，
刺刀底下夺江山，
拔白旗，插红旗，
干劲要叫天地翻！
钢水滚滚火光闪，
定叫英美吓破胆！

1958年7月20日《文汇报》的《诗传单》栏目里，又一次刊出姚文元的“大作”，题为《和平出在斗争里》：

美帝英帝，是纸老虎，
外强中干，见风转舵，
你若怕，就欺你，
坚决斗争，一定胜利。
全体同胞，斗争到底，
哪里逞凶，哪里粉碎。
同志们！
奋举宝刀斩毒爪，
掀起怒潮葬狂贼！
从来光明胜黑暗，
和平出在斗争里！

呜呼，一时间，古之词人欧阳修被批判，今之诗人艾青被打倒，剩下只有“棍子诗人”姚文元，剩下只有“诗传单”！

就连曾经出版过诗集《银铃》的姚蓬子，“拜读”了儿子的“大作”，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对老伴说：“文元写的是诗？”

一度“失业”的“棍子”

林村，姚家三楼，老保姆冯金芸在忙着粉刷墙壁。

冯金芸是姚蓬子的诸暨同乡，在姚家干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粉刷墙壁。

白墙，绿窗纱，花窗帘，三楼显得格外幽雅、整洁。

那是1959年春，金英要做妈妈了，姚文元就以此为借口，搬到父母那里去住。这时候的他，已是“铁蛋掉在铜碗里——响当当”的“左”派，已经不在乎什么“划清界限”之类忌讳了。父母那里有保姆，母亲又闲在家里，住到那里自然要舒适得多。

金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小红。

姚蓬子当上了爷爷，扫去了这几年心头的不快，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他笑了没有多久，脸又拉长了：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的领导考虑到金英是那里的组织部负责人，住在姚蓬子家毕竟诸多不便，要她搬出去。

虽然姚文元拖着不搬，但是卢湾区委已一再提醒金英，姚文元这才不得不与金英迁入机关宿舍。

他们把女儿留给姚蓬子、周修文抚养。直至“文革”中，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那群年轻人来抄姚蓬子的家，小红和她的妹妹还住在姚蓬子家里。

“棍子”是吃“阶级斗争”的“饭”的。姚文元在“反胡风”、“反右派”中大打出手，到了1959年，“棍子”竟渐渐“失业”了。

他仍在不断地发表文章，只是不大容易捞到整人的机会——因为毕竟要等“上头”有了“阶级斗争”的意图的时候，才可以显示“棍威”。

姚文元写些什么呢？

他称赞“退休工人闲不住”——《发扬“闲不住”的精神》（1959年2月27日《解放日报》）。

他说说“认真读书”——《漫谈读书》（1959年4月8日《文汇报》）。

他对废物利用发生兴趣——《废物中有奇珍异宝》（1959年7月2日《解放日报》。）

他谈业余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1959年7月第14期《支部生活》）。

他写起了《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1962年2月16日《解放日报》）。

他发表“美学笔记”《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美学笔记之六》（《新建设》1962年3月第3期）。

他甚至对江河、红绿灯、相片之类产生兴趣，写了《咏物杂感（江河、红绿灯、相片）》（1962年5月28日《解放日报》）之类。

这时的姚文元，像刺猬失去了一身硬刺，成了温和的兔子。

偶然他也发出几句批判之声，不过，那是批判印度总理尼赫鲁（《这是什么“人道主义”？》，1959年5月6日《解放日报》），批判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尼克松的“拿着吧”》，1959年7月9日《解放日报》）。

笔者读了上海作家协会陈冀德女士的《生逢其时》一书[24]，发现内中有一段描述这时候的姚文元很形象，可谓跃然纸上：

>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一次会议组织的联欢活动上。批判会从五九年底开到了六零年初。元旦过后不久，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庆贺会议胜利闭幕的余兴。作协在沧浪亭摆了十几个台面。请与会者们吃一顿。饭后还有舞会。正当大家济济一堂，尽情享用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难得一尝的菜肴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姚文元。
>
> 与我同桌的作协党组秘书郭信和，眼光追随着姚文元，咯咯的笑个不已。姚文元意识到他要找的东西在我们这一桌，就走了过来。他只是瞧着郭信和，不尴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来走去的干吗呀？是不是想早点溜回家去陪金英啊？姚文元嗫嚅着，只见嘴巴在动，不知在说些什么。郭信和这一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协机关工作的人，都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钱出来请客。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费了。再看姚文元，这哪像是个大作家呀？也不见有一点斯文相。最后，还是郭信和出来打了圆场，把被她藏了起来的姚文元的一只黄绿色军用背包，递给了他，说，今天就放你一马啦。看在金英的面子上。客，总该请一请的吧？交给我了。实报实销，如何？姚文元接过背包，依然不吱一声，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
>
> 看着姚文元离去的身影，我忽发奇想。都说文如其人。事实恐怕未必。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

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陈冀德以为，姚文元是“憨厚中带着窝囊”。

1959年盛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亦即“庐山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又收紧了。

本来，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正是挥刀跃马、杀上“阶级斗争”战场的大好时机。这一回，他心中一阵紧张。

姚文元紧张点儿啥？外人莫知！

唉，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好在一年之前，他为作家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写了一本评论小册子，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读书运动辅导丛书”之一。那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书会给他惹了大麻烦！

为什么呢？《保卫延安》中作为英雄人物之一加以塑造的，不是别人，正是彭德怀！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姚文元重读自己一年前写的那本小册子，脸色都变了。

那本小册子，印行了八万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他的评论：

> 彭总的特点是极其沉着、镇定、冷静。……他对敌我情况了如指掌，能在似乎是最危急的时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引向灭亡。……彭总的判断是明晰简单的，只有几句话，但包括了一切最根本的东西。
>
> ……敌人的主力被彭总巧妙地引向绥德地区，蟠龙镇这个老巢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
>
> ……他好像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
> 就是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彭总也没有任何冲动。……在沙家店九里山摆下战场，把敌人全部消灭，取得了在西北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
> 但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藐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信心；在具体的战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线不苟地检查各项

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小册子的结尾处，姚文元又一次热情洋溢地歌颂彭德怀："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随时准备把敢于发疯的敌人送进坟墓里去！"

小册子出版才一年，彭总就迅速"贬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下子"贬值"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就在各单位都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那些日子里，姚文元步入上海新华书店，还看见书架上放着他的那本小册子！他，顿时触目惊心，赶紧走开了……

《保卫延安》被停止发行了。

幸亏姚文元已是颇有名气的"左"派，没有人给他"上纲"，总算躲过了一道难关。

倘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写过那本小册子，姚文元定然会来一篇《〈保卫延安〉为谁唱颂歌？》之类的"批判"文章。

不过，六年之后，他毕竟还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在那时他写的小册子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屏幕上消失了。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就在“棍子”“失业”了一年的时候，张春桥告诉姚文元重要消息：庐山会议的“反右”浪潮，已经波及首都文艺界。这一回，康生树了一个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论”。

惯于以“领导”意图为行动指南的姚文元，赶紧跑进图书馆，找寻那“箭靶”……

巴人，不论是革命经历，还是文学经历，都足称老资格。他，本名王任叔，并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从“下里巴人”中，取了笔名“巴人”。论年龄，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30岁。

早在1924年，巴人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向来看重同乡。巴人借助同乡之谊，1926年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任机要科科长，暗中为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在上海参加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去世后，他曾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1950年，巴人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1953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在1957年1月号天津《新港》杂志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两千来字的《论人情》，大喜过望——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论人情》中，巴人写道：“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 “什么是人情呢？我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
>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
>
>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棍子”顿时“摇”起来了，挥笔疾书，写出长达万言的《批判巴人

的“人性论”》，抢先在全国批响头一炮。姚文元在1960年1月写完，《文艺报》在1960年第2期刊出，上海《文汇报》于2月10日全文转载。顿时，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澜。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粪”来嘲弄老作家巴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像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巴人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的一切方面去，把很多问题都搅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巴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系统，这样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巴人的人性论，同在新文学史上我们曾经与之进行许多次斗争的人性论，特别是胡风、冯雪峰的人性论，是一脉相通的。”

一阵乱棍，打得巴人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61年，巴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乡奉化，于1972年7月25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挣扎着写完160万字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之际，顺便捎带着给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一棒——在1960年第5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1960年冬，又是那个张春桥，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庆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听说，毛泽东几次谈及美学问题。

美学，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养成赶浪潮“习惯”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学书籍，便在1961年1月17日《文汇报》上，发表一整版的长文《论生活中的美与丑》。

不料，假猴王遇上孙悟空。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读后，写了批评文章，在1961年3月17日《文汇报》上发表。

“冒充金刚钻”的姚文元，虽然口口声声说“对于美学，我是一个初学者；懂得还很少”，却在1961年5月2日《文汇报》上，发表整版长文《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从此，他批判起朱光潜教授来了。虽然他对美学确属外行，而在破口骂街方面却十分内行，他居然给朱光潜教授扣帽子了。

出任《解放日报》编委

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决定停刊了。

姚文元在《解放》半月刊结束工作之后，于1962年春，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

姚文元又搬了一次家。

这一回迁入的新居，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熟门熟路：香山路9号《解放日报》宿舍！

那儿是姚文元当年常常去吃粽子糖的地方。竟是那样的凑巧：姚文元搬入的房间，正好在当年张春桥家楼下！

当年，姚文元作为《解放日报》的一名通讯员，他走进这幢花园洋房时，不敢咳嗽一声，惟恐不恭；如今，他大摇大摆，迈着八字脚，瞪着金鱼眼，跨进了大门。他，已成了取张春桥而代之的新主人。

姚文元是张春桥建议、柯庆施点名，调往解放日报社的。

“要不要让他当副总编？”柯庆施征询张春桥的意见。

“我看，让姚文元当个编委为好，让他超脱一些。”张春桥富有“战略眼光”，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他看稿子、管版面，不要让他陷进具体事务。应当发挥他的特长，多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喉舌。”

“你说得对。”柯庆施很少当面表扬别人，这一回夸奖了张春桥。

“以后开市党代表大会，可以安排他当个市委委员。”

张春桥又补充了一句。

“行，就这么定。”柯庆施说道。

很快，《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接到了来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担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文艺部具体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负责。

从此，姚文元成为文坛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视为有“来头”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章被视为有“来头”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体现“上头”来的意旨，他也乐于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他，再不是当年他自己在《论“知音”》中所宣称的：“批评家应当成

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他，已成为高踞于作家头上以鸣鞭为职业的总管！

“姚文元＝棍子”，不仅许许多多作家如是说，而且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如是看。

半是讽刺，半是愤懑，人们称姚文元为“摇棍子”！

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是姚文元，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幕后指挥是张春桥。

偶然，有一回姚文元泄露了天机。

姚文元到《解放日报》上任之后，在“朝花”副刊版上开辟“文坛漫步”专栏。积极的投稿者之一，便是徐景贤。

徐景贤接连在“文坛漫步”专栏里发表了《冷酷的观众》和《摇头派》两文。石铮则写了《何惧于摇头》，对徐景贤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姚文元见到石铮，用近乎恫吓的口气说道：“‘文坛漫步’有个作者座谈会，景贤也参加的。春桥同志经常给我们指示，对我们很有帮助。景贤写的短文，春桥同志是看过的。”

姚文元的话，明明白白地把后台老板说了出来：张春桥不仅给他们“指示”，而且还审看文章！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1962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

“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3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提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冕”。

4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

什么“出气会”呢？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

“白天出气”——那就是出席“出气会”，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

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

“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

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

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

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

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

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

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

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5月9日至16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1936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32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5月号。24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1927—1986）》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璧。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愠怒：

>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
>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

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1980年6月15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25]

1980年10月15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26]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砺，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指1958年——引者注）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

从1962年批判姚文元，到1980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1962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邨。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邨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像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27]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像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像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1962年5月6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
>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
>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
>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
>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
>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
>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
>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
>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图穷匕首

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来。

《杂家》事件

5月13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5月6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草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 做文章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
>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匆匆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
>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为什么他把自己同广文先生连在一起呢？
>
> 我干文学编辑的时候，北京就专门开过一次很大的杂志编辑会议，我也听说有负责同志接待过《辞海》的编辑同志。“从未有负责同志接待过编辑”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
> 编辑待遇问题确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大抵因为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趋于温和，不像反胡风、反右派那样的寒风肃杀，姚文元未敢给骆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讥，把那个“老赵”当成骆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阵。

姚文元这么一批判，骆漠的《杂家》益发受人注意了。

过了四个月，中国的政治气温骤降。9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康生诬陷七八月间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的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

柯庆施回到上海，马上发话了："现在，很多人伤风、感冒，这可不行呀。老罗哪，你写那篇《杂家》，就是伤风、感冒，要注意！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言外之意，《杂家》是坏文章。

在一次大会上，柯庆施当众又点了罗竹风的名："罗竹风，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28]

不久，一纸调令下达：撤去罗竹风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调任《辞海》副主编。

怪不得，人们传说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罗竹风被"罢官"，人们领教了"姚棍子"的厉害！

"杂家"风波，至此本该画上休止符了。

不料，当"文革"风云涌起时，《杂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进行"批判"。飞来横祸，邓拓被打成"黑帮"，他的《燕山夜话》成了"反党大毒草"。邓拓在1961年3月26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这下子，把罗竹风跟邓拓相联系，成了"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罗竹风在牛棚中，受尽折磨。

罗竹风无端受冤。他，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投身革命，打过游击扛过枪。"骆漠"，本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的笔名。虽然那时的环境如同沙漠一般艰苦，他要以骆驼般的坚韧精神投身战斗，这便是"骆漠"的由来。姚文元并未读过骆漠当年的激扬文字，望文生义，歪批"骆漠"。

那天罗竹风从华侨饭店开完杂文座谈会，回到家中，细思量，却觉得姚文元命题的《敲锣说》难以落笔，无法成文。

数日后，潇潇春雨，绵绵不绝。住在六楼的罗竹风，望着低垂着的铅灰色云层，仿佛天也矮了半截。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他站在落地窗前，蒙蒙细雨不时飘洒在脸上，倒觉得头脑清醒得多。

"笃，笃笃……"响起敲门声。

妻前去开门。来者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黑布伞，腋下夹着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来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勋，老编辑也。他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时，

写过短篇小说，翻译过《续西行漫记》，也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自1927年起，便献身于编辑工作。1938年，他担任20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时，他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一个局长，一个社长，闲聊也离不了本行，谈起了编辑的苦经，编辑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光在会上“出气”，在会外也“出气”！

蒯斯曛给罗竹风送来了“灵感”。

当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飘飘洒洒的牛毛细雨之中，罗竹风乘着电梯，回到了六楼家中。他站在窗边，望着绵绵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宽大的写字桌旁，挥笔疾书。于是，稿纸上便出现了一行标题：《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他作为出版局代局长，感到写上真名实姓诸多不便——这篇短文会被读者看成是局长的呼吁。于是，他写上了他过去用过的笔名“骆漠”。

写罢短文，他提笔给多次前来约稿的《文汇报》女编辑余仙藻挥就一函：

仙藻同志：

> 这几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编辑交谈，引起了写作的冲动，草成《杂家》一稿，请阅处。

《杂家》一文很快就在《文汇报》上披露。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篇千把字的短文会惹出一桩“《杂家》事件”。在“文革”中，责任编辑余仙藻因此被没收了记者证；为《杂家》写了《编后记》的《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多次检讨，如他自己所言[29]，“屁股都给打烂”；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斗台；对《杂家》一文表示过赞同的几十个人，受到株连。

迄今，仍可从1968年4月17日以《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关于《杂家》的寒光闪闪的文字：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问，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引者注）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1962年，更达到了高峰。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竹风，在报上公开抛出一篇反党杂文《杂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写文章予以回击。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庆施同志几次在会上点名批判了反党分子罗竹风，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也明确指出：《杂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矛头指向党的。可是陈其五呢，他一面勾结

党内党外的反动"权威"和黑线、黑网人物，对姚文元同志进行反革命围攻；一面拼命给这个反党分子鼓气："老罗，我是支持你的。"同时还赤膊上阵，专门找姚文元同志谈话，对他施加政治压力。正是在陈其五之流的策动下，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亲信，纷纷行动起来。文艺黑网上的小爬虫刘金，就更为活跃，赶写了一篇黑文给报社，恶毒咒骂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贼心虚，还加了注解，说是"文章估计不会用，但一吐为快"。请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仇恨啊！他们把无情地批判他们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铁扫帚"。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这篇以"造反派"口气写的文章，把话说得明白不过了：原来，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着强大的后台——"一直坚定地支持"着的柯庆施和张春桥，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2年5月，随着《杂家》挨棍，很快的，刚刚复苏的杂文之花，又被寒风吹得七零八落。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1963年5月20日，上海《文汇报》上忽然冒出一篇拖腔拿调的文章。《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章作者，便是姚文元。

算起来，这是姚文元第二次把笔伸进音乐领域。第一次，那是1953年8月，22岁的他作为《文艺报》的读者，写了篇《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在“读者中来”登出。这一回，大不一样，32岁的他，把“金棍子”伸进了陌生的“音乐王国”。

文章一开头，诚如他的“美学笔记”一样，先来一番谦谦之词：

> 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说来的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西洋的“音乐名著”，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1862—1918）。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于是就去看编辑部所写的“内容提要”……

虽然姚文元自己承认对德彪西“一无所知”，对音乐理论“十分陌生”，即使随手“翻翻”那本小册子，也因“文章极其费解”而“咬紧牙关读下去”——姚文元并未读懂，却抡起棍子打了起来，既打那位“洋人”德彪西，更打书的编者们。

一反开头那种谦恭之态，文末，姚文元摆出一副文坛霸主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问号：

> 我这篇短文，也就算“大家谈”，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提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吧：
> 一、这样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
> 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
> 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的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德彪西，怎么会“冒犯”姚文元的“虎威”呢？

德彪西此人，用美国弗兰克·道斯在他所著的《德彪西的钢琴音乐》一书中所言：“德彪西整个创作生涯都是通过声音与清晰的幻梦打着交道。”德彪西的强烈的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乐坛。他的歌剧《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曾被推崇为印象派音乐的巅峰之作。他的钢琴曲《版画》、《欢乐岛》、《意象集》、《二十四首前奏曲》则被视为印象主义精品。

德彪西也写音乐评论，署笔名“克罗士先生”，所以那本介绍他的小册子就用《克罗士先生》作为书名。

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音乐评论，德彪西都充满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不是一个鹦鹉学舌式的人，却是一个敢于创新、非同凡响的音乐家。他，在音乐王国独树一帜——这一点，不论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承认。他的可贵之处，也就在敢于创立自己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本来，姚文元与德彪西，河水不犯井水：一个今人，一个古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一个“金棍子”，一个音乐家。

姚文元是持箭找靶，偶然撞着德彪西的。

原来，那是柯庆施到北京去，见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他最近看了一些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柯庆施回到上海，把毛泽东的话，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马上把“行情”告诉了姚文元。

善于看“行情”写文章的姚文元，搔了搔脑袋，觉得有点麻烦：毛泽东并未讲自己看的是哪一些翻译的西方著作！

怎么办呢？姚文元来了个持箭找靶！

好在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一系列特定的条件：第一，他是“最近”看的，说明那些书大约是最近出版的；第二，是“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第三，“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于是乎，姚文元抱来一堆最新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以“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一审视着。

蓦地，薄薄的“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克罗士先生》，成为他的理想的箭靶——该书编者所写的“内容提要”，正是“没有阶级观点”！

尽管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提到过德彪西，惯于揣摩、猜度的姚文元，却已在那里向《克罗士先生》开火了！

然而，就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翌日，《文汇报》编辑部响起了电话铃声。

电话耳机里传出浓重的湖南口音，狠狠地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不懂装懂”，并要求约见《文汇报》记者。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谁敢如此大胆地向姚文元挑战？

上海乐坛主帅贺绿汀也[30]！

贺绿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一生，是由革命与音乐二重所组成。他的音乐造诣，使他一读姚文元的文章，便斥骂姚文元“狗屁不通”；他的革命生涯，练就他一身硬骨头，敢怒敢言，不把棍子放在眼里。

贺绿汀，1903年7月20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他本名贺楷。后来，他的三哥贺培真为他改名贺抱真。贺培真即贺果，毛泽东当年的中学同学。

笔者多次采访了贺绿汀，曾问及“贺绿汀”名字的来历。据云，那是他1931年2月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取的假名，后来竟一直沿用下去，弄假成真。他说：“汀，就是水，绿汀，意思是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取这样的名字，大概跟我喜欢绘画有点关系。”

他，老资格的中共党员，1927年便化名贺如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暴动，创作了《暴动歌》。此后，他的名作《牧童短笛》、《游击队歌》以及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写的插曲，使他的名字广为人知。

接到贺绿汀的电话，《文汇报》记者萧庆璋便应约前往上海市西区一条闹中取静的里弄，揿响了贺宅的门铃。

萧庆璋曾作如下回忆：

“当晚我去看他时，他十分激动，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是：‘糟糕呀，糟糕！报纸怎么发表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简单的、粗暴的，没有把德彪西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主观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了笑话。’”

萧庆璋拿出笔记本，记下了贺绿汀的话：

“姚文元摆下了一副批评家的架子，要出人‘洋相’，结果却出了自己洋相。因为他所引证的书中的许多话，大部分是歪曲了德彪西的原意，有的是没有把原意弄懂，有的原意是反面的、讥刺的，而他却当成是德彪西正面的艺术见解，大大加以驳斥，这岂不贻笑大方！对于外国的音乐作品、音乐书籍，我们应该多介绍、多研究，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学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多了，而是太少了。刚出一本

新的书，还没有看懂人家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劈头盖脑的一棍子打下去，实在对我们不利。

“此风绝不可长。”

贺绿汀还对姚文元作了很尖锐的批评：

“姚文元是位有声望的年轻批评家，而德彪西的东西，欧洲已有许多人研究，也做过许多科学的分析，看见我们这样的文章，会觉得我们学术研究肤浅，会认为我们的被称为‘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批评家，原来是这样。这影响不好。”

如同竹筒倒豆子，贺绿汀是个痛快人，向记者说出了心底的话。

萧庆璋听罢，建议贺绿汀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

贺绿汀爽快地一口答应。

1963年6月25日，《文汇报》刊出了《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署名“山谷”。“山谷”，是贺绿汀的笔名。

贺绿汀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不懂装懂的“批评家”：

“这本书不容易理解是事实。但是姚文元同志没有把原来文字弄明白，就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判断也是事实。”

贺绿汀毕竟是音乐的行家里手，一口气指出姚文元的十几处错误，诸如：

“姚文元同志对书中题为‘马斯涅’的一篇文章，自己没有看懂，便狠狠地批评起来，不能不使看过这篇文章的人感到十分惊讶……

“姚文元有关艺术趣味的培养问题所引用的几段话，也是完全误解了德彪西的意见……”

贺绿汀在指出姚文元的一系列错误之后，一针见血地正告这位“批评家”：

“我们知道，姚文元同志是有影响的批评家，我虽然对他的文章读得不多，他的批评文章是有定评的。不过我认为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同志对1900年前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活动不很熟悉，对印象派音乐与绘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恐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工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批评是起指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力求正确。”

贺绿汀的骨头是硬的。在发行量甚众的《文汇报》上，指名道姓地批评“金棍子”，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

消息飞快地传进柯庆施的耳朵里，他拍着桌子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批判！要抓住他，他是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有着后台的撑腰，姚文元挑起了音乐界的一场大论战。

于是乎，贺绿汀被用绳子跟德彪西捆在一起，同受批判。在《文汇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这场论战的文章；1963年6月，两篇；7月，三篇；8月，三篇；9月，四篇；10月，四篇；11月，两篇；12月，两篇；1964年1月，一篇。

这场“大批判”，还从《文汇报》扩大到《光明日报》、《人民音乐》。

诚如贺绿汀在1978年11月28日写的《姚文痞与德彪西》一文所言：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大批判’，首先把我当活靶子来打，同时还想钓出一大批‘鱼’来批，为他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路。

文章大都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姚文痞还亲自上阵指挥。在（1963年）8月19日《文汇报》上，他写了一篇化名‘群山’的臭文，除了替打手们打气之外，自己无法进行回击，真是‘银样镴枪头’。9月9日，他又化名‘铭人’在该报上登出《从德彪西想到冼星海》的文章，把冼星海的文章抬出来作为炮弹……”

贺绿汀痛斥姚文元，被张春桥称为“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在“文革”刚开始，1966年6月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载长文：《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从此，贺绿汀受尽折磨，以致在1968年被投入监狱。他的爱女贺晓秋，年仅28岁，在1968年4月6日夜被逼自杀[31]。贺绿汀在狱中度过了五年多。直至1973年，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去北京找毛泽东，要求释放贺绿汀。

尽管张春桥曾扬言：“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毛泽东还是下令解放贺绿汀，张春桥不得不照办。直到贺绿汀出狱，回到家中，问起怎么不见爱女贺晓秋，才知她早在五年前已愤然离世。

张春桥是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在上海的文坛上，姚文元是很“露”的棍子，而张春桥则是幕后操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差不多都署本名，而张春桥的“批判”文章大都化名。

1957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1956年12月18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
>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1957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

张春桥已于1955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40岁的张春桥，比26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笔者逐版查阅着1957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提供了张春桥的“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

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6月26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6月28日就在第2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7月17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7月19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气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6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1957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柯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柯庆施差一点取代周恩来

1958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实，1958年对于柯庆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柯庆施和张春桥能够在1958年“大跃进”，话还是要从1957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柯庆施特别注意到，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比上海早半个月召开。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工作报告，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极大的重视。

毛泽东在1957年12月17日给机要秘书叶子龙写了一信：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12月17日上午二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七人之中，除周恩来之外，其余六人除刘顺元之外皆为华东各省市的第一把手：

舒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江渭清——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刘顺元——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柯庆施——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叶飞——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后来，《人民日报》在1957年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了江华的报告。

《人民日报》还为江华的报告发表了“编者按”，这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江华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柯庆施要与江华争高低。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来自“最高”的消息：主席对1956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主席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柯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柯的信息，为柯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柯庆施的报告，飞快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毛泽东在这段话末，加了一句：“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同意，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念完长篇报告。

[image]

原载于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上的中共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

由于毛泽东赞赏柯庆施的这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马上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

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只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

不言而喻，《人民日报》社论从柯庆施的报告那里获得了“灵感”。

《人民日报》社论把“乘风破浪”四个字大大发挥了一番：“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目的。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那时，毛泽东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毛泽东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

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不言而喻，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为“乘风破浪”提得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出席会议。据他回忆：

> 在15日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
>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32]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力平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这么写及：“（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33]

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

其实，这也可以从现存的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中看出，手稿的第一行便写着“上海报告”四个字[34]。

毛泽东所写的“上海报告”，也就是指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的讲话，正是从“上海报告”开始说起。

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而且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这么写道：

> 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截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
>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有这样的记载：

>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

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3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决定的“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载于邓小平亲笔所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58年6月22日会议纪要》。

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谈及了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

>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37]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两种崇拜”观，把个人崇拜分为“正确”与“不正确”两种，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38]

真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迎合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心理，说出了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毛泽东的欢心。

就吹捧毛泽东而言，柯庆施其实与那吹嘘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可谓“哼哈二将”，甚至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作为政治秘书，张春桥有机会随柯庆施出席中共高层会议。每一回从毛泽东主席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

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子曰：四十而不惑。41岁的张春桥，比19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蓦地，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重头文章。自然，再不会写“吴松”，也不会署“常轨”，而是签上“张春桥”大名。

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上发表。那时《解放》创刊不久。

柯庆施嘱，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因此，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9月15日刊于《解放》第6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

否说得活一些。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即编者按——引者注）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10月11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张春桥受宠若惊了。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一连串赞语，怎不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是张春桥苦苦奋斗多年才终于一鸣惊人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张春桥思想”的核心。直至1975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成名作”的基本观点。

欲知张春桥其人，不可不读他的“成名作”。现把他的“成名作”摘录于下：

>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
>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
>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

> 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
>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鲁迅《阿Q正传》中的人物——引者注）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image]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年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刊发。

>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1958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时隔17年，张春桥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旧事重提："春桥的文章[39]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40]。"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二十一日刘子厚同志（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引者注）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当时《红旗》杂志编辑——引者注）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七时

到郑州时，最好能请史向生同志和你们一道去卫星社。史对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过卫星社。他是省委书记。

毛泽东嘱令调专机给陈伯达和张春桥，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此行的重视。

毛泽东在写下那封给陈伯达的信之后半小时，又补充写了一信给陈伯达：

伯达同志：

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七时半

四天后，毛泽东又给陈伯达一函：

陈伯达同志：

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

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以上请酌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23日下午五时

又过了五天，毛泽东写第四封信给陈伯达：

陈伯达同志：

回信收到。我还须几天才能出发。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毛泽东
10月28日上午四时

当时，陈伯达早已是中共“大秀才”，而毛泽东把张春桥的名字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表明毛泽东在提携这位“新秀才”。

于是，奉毛泽东之命，陈伯达头一回与张春桥同行，前往河南嵖岈山。

一个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个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行究竟如何呢？

关于此行，据陈伯达在晚年自述[41]：

1958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发表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我预先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章程”。这个“章程”做了不少“规定”，“公共食堂”就是其中之一。

在是年，似乎是当时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记得，我没有参加这个决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本来，我没有想到嵖岈山去参观，因为毛主席要我同张春桥去一趟，就去了。当然，受到当地一些招待。

似乎是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位老头子，泄露出来关于“高产”麦田的秘密：那块所谓特别“高产”的麦地，是那几个爱作假的人在夜里趁大家睡觉的时候，搬运其他许多田里的大量麦子堆上去的。各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大家看的集中地点是那早已收割的“高产”麦地，麦早已收了，可是不少的参观热心家却在那一块地里挖一

把土带回去，作为纪念，或想作回去的“科学的试验”物。

那里的干部可能觉到我的态度不如他们原来设想的那样高兴。他们一个负责人曾经问我有什么意见，是否有不对之处。当然，那时我还不能说出什么。

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

此行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异常兴奋的。因为是平生头一回奉毛泽东之命执行任务，何况与“大理论家”陈伯达同行；陈伯达的回忆却是平淡的，他对于这个来自上海的“秀才”并没有太留意。

陈伯达回忆河南嵖岈山之行中所说：“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

毛泽东给他们打电话，是从郑州打来的。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选择郑州作为开会的地方，是因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此次会议开始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些“左”的错误。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回来，为的是出席会议。

陈伯达从嵖岈山一回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次批评相当厉害。会议结束时所发的纪要中，有一段话是不指名批评陈伯达的：

……同时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是违反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现在不仅不能消灭，而且应该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应该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如此严厉批评，相当狼狈。关于他为什么会受批判，他在晚年作了如下回忆：

从嵖岈山到遂平县里那天晚上，一个会计（似乎很年轻）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们这里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汉交换机器，这是‘产品交换’。”

到郑州后，我和同去的张春桥见毛主席，当还没有正式汇报之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那会计把沙子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就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

其实，这是毛主席一时误会了。当时还没有开始正式汇报，我在那瞬间只是闲说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

当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也看过。但是，对这样极端复杂的问题，直到现在，我顶多只能开始进幼稚园长期刻苦学习，当时怎么可能信口开河呢。

不知怎样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竟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我觉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确处于很狼狈的状态。有两位地方同志或许知道我当时说话的经过，到我的住处看一下我，那时真使我感激不尽。

陈伯达受到毛泽东批评一事，“一传十，十传百”，那是张春桥“发布”的“新闻”：坐在一侧的张春桥，把毛泽东对陈伯达的当面批评句句牢记，作为“新动向”向柯庆施汇报。消息很快从柯庆施那里传出，这倒诚如陈伯达所言，“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

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命陈伯达与张春桥同行，“会后出征”，前往山东范县。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于上海“新秀才”张春桥的看重。

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8年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上，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河南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了关于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宣教动态》第134期刊登了这一报告的摘要。内中这么写及：

农业生产万斤化。规划提出1960年粮食作物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共产三十九亿斤；棉花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五千斤，争取二万五千斤，总产二十二亿五千万斤；花生种植十五万亩，保证亩产五万斤，争取八万斤，总产七十五亿斤；甜菜种植五万亩，保证亩产三万斤，争取五万斤，总产十五亿斤。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1959年全部土地田园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1960年达到灌溉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这一报告还说：

丰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

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罢，颇为兴奋，于1958年11月6日写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

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九时

张春桥两度受到毛泽东亲自“点将”，而且与陈伯达同行，这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1932年4月17日，他不过15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1937年8月14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

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1938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78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

1954年1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并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1957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字报有感》之类，凑足33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178页而已。

到了1960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

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182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21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陈小蒙便是他的次子。1986年2月，因强奸、流氓罪在上海被判处死刑，轰动海内外。那时，陈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为一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

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1949年5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迥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1962年5月9日至16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3月2日至26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3月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3月6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

巴金讲毕，陈其五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整人要有机会；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柯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柯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1962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张春桥大胜，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不久，张春桥召开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大会。他以部长的身份，宣讲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撤销陈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又过了几个月，干脆，开除了陈其五的党籍！

从此，陈其五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在江苏农学院当个教务处副处长。

陈其五的老战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向党中央反映意见。无奈，张春桥依仗着柯庆施，已有恃无恐了。张春桥双臂交叉在胸前，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不管你北京南京，将军元帅，就是要叫你陈其五永世不得翻身！”

在扬州，陈其五写下了悲愤满腔的六言诗：

冷落门前车马，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寞，举头可望青天。

在“文革”中，陈其五备受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张春桥整人，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1968年，趁着“打击右倾翻案风”，张春桥提醒人们：“陈其五并不是死老虎！”

于是，1968年4月17日，《文汇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两大版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又把陈其五批了一通。这篇文章一开头，那口气便咄咄逼人：

> 陈其五何许人也？旧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死党，霸占上海思想、文化领导岗位多年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道道地地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
> 某些天真的人们一听，会说：啊！原来是一只“死老虎”。不对！陈其五不是死老虎，而是一条虽已落水却总想重新爬上岸来咬人的疯狗。他被革命人民揪出之后，非但从来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而且随时都在准备翻案，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时刻准备突然在某一个早上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咬人，吃人。为了表示这种反革命的决心，他特地从一具也曾被罢过官的封建僵尸于谦那要挖来了一首黑诗，疯狂地叫嚣：“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一个多么死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啊……

这篇经过张春桥亲自审定的长文，列举了陈其五的种种“反动言论”。今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又该作何观感呢？悉照原文摘录于下：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他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文章当然不忘陈其五对“姚棍子”的那些批评，要清算这笔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1962年，便达到了高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棍子”之称，连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承认，只不过要加“革命”两字，成为“革命的棍子”！这种“大批判”文章，今日看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文章提及了张春桥，用了这样的词句：“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张为姚之后台，讲得最明白不过了。

文章也谈到，打倒陈其五是颇为不易的，用陈其五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敢于如此猖狂地进行反扑，就是因为‘上面还有人同情我’，‘下面还有群众基础’”。文章开列了为陈其五“翻案”的“上面的人”的名单：刘少奇、陈毅、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江渭清，说他们“一直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文章特别提及，“陈丕显就曾经偷偷地召见陈其五，要他‘再回到党内’，‘两三年不行就四五年、七八年’。”

张春桥能够面对那么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陈其五，足见他在1962年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能量。

自从去除了陈其五这个“心腹大患”，张春桥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了。

此后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到了1965年，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上），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17页。

[2]转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敌友之间》，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4]《敌友之间》，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5]《论“知音”》，《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6]《放下架子！》，1957年5月13日《解放日报》。

[7]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8]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509页。

[11]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2]《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1957年8月2日《解放日报》。

[13]《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文艺月报》1957年第8期。

[14]《驳施蛰存的谬论》，《文艺月报》1957年第7期。

[15]《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哪几个方面？》，《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

[16]《流沙河与〈草木篇〉》，《展望》1957年第27期。

[17]《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1957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18]《鲁莽被什么人“利用”？》，1957年7月21日《解放日报》。

[19]《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文艺报》1957年第18期。

[20]《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艺月报》1957年12期。

[21]《〈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1957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22]《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

[23]《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文艺报》1958年

第4期。

[24]陈翼德：《生逢其时》，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25]巴金：《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6]巴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27]1986年9月6日，叶永烈采访罗竹风于上海。

[28]1986年9月6日，叶永烈采访罗竹风于上海。

[29]1986年9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虞荪。

[30]1986年7月9日，叶永烈采访贺绿汀夫人姜瑞芝。1986年7月14日、1987年5月27日、1995年10月5日，叶永烈三度采访贺绿汀。

[31]1986年4月8日，关于贺绿汀之女贺晓秋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情况，叶永烈先是采访贺绿汀女儿贺元元，接着在1986年6月7日采访陈刚。

[3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3]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35]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3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37]《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74页。

[38]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39]指1975年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0]据张春桥说，是在北戴河开会时柯庆施把他介绍给毛泽东的。

[41]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第九章　江、张联手抓“样板戏”

江青成了上海的“女客人”

1962年12月31日，辞旧迎新之际，毛泽东给江青写下一段批语：

江青：

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

泽东
12月31日上午四时半

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毛泽东所说的“三篇文章”，是指1962年12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的。

毛泽东所说的“周信芳、盖叫天两文”，是指《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两篇文章。

毛泽东把文艺界的有关文章批给江青阅看，显然是因为江青正在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动向。

那时，江青神出鬼没，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胱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毕竟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女客人”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13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怡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1935年的18层茂名公寓，建于1934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原本是法国俱乐部，解放后改为锦江俱乐部。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曾这么谈及江青：

> 也许为了显示她是“和主席一样的”，江青常常独自带着随从人员漫游全国各地，极少和主席同行；即使同到一地，也很少同住一处。1959年主席上庐山开会，她到北戴河避暑；1962年，主席在北戴河开会，她却两次上庐山。江青既会养尊处优，又是贪图享受狂，全国的著名风景名胜区江青都跑遍了。一到冬天，北京气候冷了，她就和林彪一样到广州度过温暖的冬天，多年如此。但相比之下，物质条件最好、能让她尽情享受的还是上海。所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她就常住上海，要“以上海为家”。为了住得舒服，江青看中了锦江俱乐部，将二楼西边重新改建装修。锦江俱乐部原是外国人留下的，解放后收为人民所有。江青住进之后，便成了她的个人领地，从此很少有人问津了。考虑到毛主席工作和安全的需要，有些省市专为主席修建了一些住房，其中自然少不了江青的一套；但江青认为那不是“专门”为她建造的，她要为自己构筑独立的“宫殿”。

江青常在全国各地跑，成为“享受狂”，内中的原因还在于她在中南海的生活实在太“清苦”了。

毛泽东当时的“管家”吴连登，曾十分真实地回忆当时江青在中南海生活的实际情况：

> 毛泽东的稿费是中央特会室保管的，我们不管，我只管他老人家的工资，江青的工资，还有他们的日常支出。毛主席的账是一号，江青的账是二号。
>
> 说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毛泽东的工资是四百零四点八元，江青的工资先是一百二十元，后来长到了三百多元。
>
> 毛主席的账是很好算的，他的四百零八元，要交党费十元。房租、水电费加起来八十多元，吃饭要用一百元左右，还有三个人要毛主席负担—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费十五元。后来涨到了三十元。除此之外，孩子们的车费和葡萄糖一类营养药费也都要从主席的工资里出。
>
> 主席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这都要从主席的工资里面出。这样下来，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过一段时间，我给主席写了个报告，要从他的稿费里提出一万元来补贴家用。毛主席画了圈，我们才用了一阵子。
>
> 前几年，社会上传说很多，说江青如何如何，好像她有多少东西似的，其实，她并没有多少家当。
>
> 江青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金银首饰，衣服倒是有不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有一次，她要做一件小翻领西服，我给她找来了做衣服的，按照她的尺寸做好送来了，我送给她看，她问多少钱，我告诉了她，她立时就说：“这衣服我不要了，不合身，做坏了。”衣服明明没坏，我说：“这不挺好的吗？”
>
> “好，你要，反正我不要了。”
>
>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这不是我要的衣服，做坏了，你赔！”
>
> “我赔不了，我没有钱。”
>
> 她看我真的不高兴，把衣服甩下走开了。
>
> 这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只好拿了衣服去找汪东兴，把情况告诉了他。
>
> 我说：“这衣服好好的，她非说不要了，我没有办法处理。”
>
> 汪东兴看了看衣服，说：“不是衣服不好，她是嫌贵了。”
>
> 江青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又想穿好衣服，又没有钱，所以经常是长袖改短袖的，浅色改深色的。总是改来改去，染来染去，我可是给她跑了不知道多少次洗染店。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她是又要花样多，又不能贵。[1]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1958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1965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1963年1月4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200号——上海文艺会堂，人头攒动。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巴金、熊佛西、丁玲、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良、蒋月泉、张乐平……聚集上海文艺会堂。

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联欢会，怎么忽地变得“重要”起来？

1月6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请柯庆施同志讲话。”

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

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柯庆施说：“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

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柯庆施加以发挥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这一回，柯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1963年1月6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就是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其实，“大写十三年”这口号，与其说是柯庆施提出来的，不如说是柯庆施和张春桥一起提出来的。姚文元“紧跟紧追”，成为这一口号的最积极的鼓吹者。

1月6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

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

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像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一谈。”

当他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他又一次“急转弯”。1963年1月21日的《解放日报》，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

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笔，简直成了柯庆施、张春桥手中的一块橡皮泥！怎么捏，就怎么着！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

大战前的沉默。张春桥手中握着《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却并不急于抛出。

4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

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弥漫在会议室里的烟雾，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烟，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烟。

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张春桥“后发制人”。等到排炮过去，这才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为“大写十三年”辩解。他，一条又一条，不厌其详地列举“大写十三年”的“好处”。不多不少，正好十条！他终于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肠凑成的《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虽然张春桥振振有词，却处于“光荣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宣部不买他的账。要想让周扬、林默涵等俯首听命，谈何容易。

当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向柯庆施汇报了在新侨饭店遭到的“围攻”。姚文元在侧，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着瞧！”柯庆施青筋暴涨，用手拍着桌子——这向来是他激怒时的习惯动作。

柯庆施介绍江青结识张春桥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赔尽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20世纪30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心上的一块疮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

擅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纳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几个月之后——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成为“最高指示”：

>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
>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十多天，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张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在会上响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一回，柯庆施、张春桥的腰杆挺得笔直。因为毛泽东的批示说“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柯庆施、张春桥立即在上海推出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喊出“大写十三年”，实实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紧跟”。他在1964年3月，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了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江青则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在上海发出“有分量”的第一炮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
>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1992年2月15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荪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这个笔名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璜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写心集》），内中写及：

>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璜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璜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是江青同乡，也是山东诸城人，比江青年长12岁。早在1924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解放后，1954年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1959年冬，孟超应北方昆曲剧院之约，根据明代戏曲作家周朝玉的

传奇剧本《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李慧娘》刻画了南宋末年太学生裴禹和奸相贾似道的宠妾李慧娘之间离奇、悲壮、纯洁的生死恋，从中反映出贾似道的荒淫误国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改编过程中，孟超曾多次向他的同乡康生“讨教”。

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 1961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指康生）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2]

1961年《剧本》第7、第8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

1961年夏秋之间，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李慧娘》。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康生登台与孟超以及全体演员合影。他还先后两次致信孟超，赞扬《李慧娘》的成功。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在文中，他写道：

>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
>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

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江青给《李慧娘》“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以为是为“毒草”叫好，一起批！

1962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他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

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分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1963年3月16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3]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这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柯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5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4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8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1962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江青批判京剧《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 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4]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曾回忆了毛泽东就这一问题对他以及《人民日报》进行的批评：

> 不久，毛主席（1964年）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我到达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在座，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陆续来到，彭真同志也参加。
>
> 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对着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
> 毛主席指着我说，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研究》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确。据说这

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我审看时认为不必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时发表批评鬼戏的文章，于是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认为发表赞扬《李慧娘》是错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利的。

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很明显，毛主席这时已开始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了。[5]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1965年2月18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孟超在1964年受到“停职反省”处分。在“文革”中，更是受尽折磨，于1976年5月6日含冤去世。1979年6月16日，孟超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1963年2月22日晚上，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作“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她从12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

须知，早在1931年1月22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生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17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对于戏剧的爱好，尤其是对于京剧的爱好，使江青着手发动“京剧革命”。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image]
《红灯记》宣传画

>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
>
> 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

> 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
>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这是在1964年8月——引者注），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这是在1964年11月——引者注）。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6]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关于《红灯记》的改编，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 为《红灯记》我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
>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其实，《红灯记》故事最早脱胎于电影剧作家沈默君的电影《自有后来人》。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1961年底摘帽。沈默君根据当地收集的生活素材，在1958年写成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后来被拍成电影，1963年在全国上映。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爱华沪剧团也根据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排演了沪剧《红灯记》。

[image]

“痛说革命家史”一场剧照（选自1970年《红灯记》明信片）

中国京剧院的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

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发“指示”。她在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天两次）、11月5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

“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钱浩梁1934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钱麟童是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1950年，钱浩梁从上海来到北京，以一出《林冲夜奔》得到主考周信芳的赏识，从而进入中国实验戏曲学校研究班深造。1962年选调进入中国京剧院一团。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1987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7]

树《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沪剧《红灯记》不久，江青于1963年秋，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1939年9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的张家洪（剧中称“沙家浜”）留下36名伤病员（剧中为18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沪剧毕竟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江青仍要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以树为“样板”，推向全国。这一回，江青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

1964年元旦，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一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江青对他们说：“坚决按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江青对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似乎特别热情。江青曾特地到后台去见赵燕侠，说了一番“火热”的话：“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在排练时，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沪剧中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赵燕侠。京剧跟沪剧，毕竟是不同的剧种，赵燕侠借鉴了沪剧中的表演，但并不照搬。赵燕侠说：“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顿时大为不悦。[8]

后来，发生了“毛衣风波”，赵燕侠终于被江青所冷落了。

> 1966年上半年，《沙家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京剧《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引者注）来沪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一起，给赵燕侠送去了两件毛衣，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深知江青喜怒无常，不敢穿，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
> 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

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

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9]

1964年7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1965年4月27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1963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22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image]
电影《智取威虎山》剧照

然而，当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10]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童祥苓当年29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1966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他被一下子“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长，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80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1969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把杨子荣演得像他那样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11]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江青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下批语：

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26日

江青阅。
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毛泽东是在当天的《参考消息》上，写下给江青的批语。在第1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期《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在第4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

1964年3月19日和4月2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次批语。

在1964年3月19日，毛泽东给江青写道：

江青阅。
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
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3月19日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写在刊载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的中共中央联络部文件上。

在1964年4月24日，毛泽东又写道：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4月24日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是写在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1964年3月4日编印的《会议简报》第1期上。

在这个批语中，“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表明在毛泽东的眼中，江青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了。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资本”。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6月4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29个剧团、2000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7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8月1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是6月17日、23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6月23日接见了各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

23日，周恩来等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团、观摩团主要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是她1937年8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27年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重要。

江青的讲话，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64年6月24日，“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办公室为送审

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1964年6月2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写下批示：“已阅，讲得好。”

毛泽东称赞江青“讲得好”，给了首次公开亮相的江青以极大的支持。

后来，美国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 江青发表了她的第一次讲话，那时大多数人对她的容貌和声音还不熟悉。
>
> 江青说，这个讲话被压了三年才出版，而其他讲话则立即出版了。直到1967年5月，她的讲话才刊登在党的期刊《红旗》上面。
>
> 为什么？因为她的“敌人”“窜改”了她的原文，然后拒绝让这篇讲话公之于众。直到他们失去自由，她的观点才得以出版。
>
> 在京剧汇演期间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江青自我标榜的政治特征进行揭露：
>
> “有些人打算靠着批判和否定别人来出风头。他们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舞台……由于（京剧）改革运动，许多人不写文章了。现在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剧中只剩下战士和打仗了。”

邓小平的话，可以说是对江青的尖锐批评。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
>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
>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
>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

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

对于江青和柯庆施的所作所为，田汉作为老戏剧家，深表反感：

一份由一位戏剧界著名人士1964年所写的情况反映，“揭发”田汉前不久上海之行时对柯庆施推行现代戏的不满：田汉同志到上海时对柯庆施同志冷淡得很。据柯老说他安排了和田汉在剧场见面，田汉同志表示冷淡。并提到他对现代戏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的态度，曾说现代戏像“白开水”。在上海戏剧学院谈《丰收之后》时说这个剧本很虚假，要不得。……田汉还不同意批评《李慧娘》。[12]

正因为这样，后来江青借助于“文革”狂潮，把田汉作为“四条汉子”之一，痛加挞伐。

张春桥成了“两出戏书记”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1963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作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啰嗦，一口气讲两三个小时，滴水不漏。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她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的“才干”。正因为这样，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跟柯庆施的联系日趋频繁，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避其所长！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

[image]
江青与张春桥在“文革”中

张春桥却深知，巴结“第一夫人”，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使江青欢喜。他只得急就章，从不听京戏的他，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

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子”。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只有懂得江青的“行话”，才能与她有共同语言。一个京剧门外汉，张春桥煞费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本来，改编《红灯记》，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可惜，当时的江青与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1963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成京剧《沙家浜》。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浜》，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

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前文已经提及的至为重要的批示。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柯庆施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诸事冗忙，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但只能倚重于张春桥，代他过问。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青看中这位山东同乡。

紧接着，1964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书记”！

张春桥为此得意扬扬。如同陈丕显所言：

> 张春桥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当着众人的面，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这番语惊四座的话，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这个“马屁精”的嘴脸。更使人惊讶的是，他拍马屁还有一套“理论”。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13]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咋咋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地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

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来自张春桥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把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的脸上。
>
>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不能大喊大叫。
>
>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
>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
>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
>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1964年6月22日，山东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47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正因为这样，江青才请张春桥“挂帅”，主持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江青接见《奇袭白虎团》剧组，说了一番意见：“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战斗故事，但艺术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艺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要照顾到两国的关系，我们谦虚一点好。”

张春桥变得颇为忙碌。江青让他“挂帅”改《奇袭白虎团》，又要他“过问”《智取威虎山》剧组，按照毛泽东看戏时说的意见修改。如此这般，连张春桥自己也说：“我成了京剧书记了。”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1965年4月27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 一、劲头用得不对；
>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 三、缺乏点牛劲。
>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唉，唉，去年6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柯庆施之死

柯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63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1976年10月，在张春桥被逮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柯庆施去世时的职务几乎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张春桥担任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13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1964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柯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1965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3月23日前往成都。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柯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6时入宴，至晚9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12点多，柯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2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

清晨6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北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么“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张春桥提携于会泳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有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不过，“狄克”的擅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在1965年春，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就是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1965年6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14]。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1947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

级的批评。

解放后，1949年9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子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声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琢磨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厌烦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

院，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同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1965年6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只是一名教师，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10月4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疾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

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1966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被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江青伸手抓《海港》

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这是闻名于上海的“兰心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1930年。在当时，是上海豪华型剧场。解放后，改名上海艺术剧场，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1964年7月22日晚，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热闹非凡，迎来了一批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石西民、王一平等。就连观众，也不是普通的观众，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不是开会，却是观看上海淮剧团上演的淮剧新戏《海港的早晨》。淮剧，又名“江淮戏”，流行于苏北、安徽和上海一带。虽说淮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毕竟流行区域有限，影响也有限。这天，嘉宾盛赞《海港的早晨》，刘少奇等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成了上海淮剧团历史上的难忘的一日，难得的殊荣。

淮剧《海港的早晨》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是因为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黄埔剧场看过这出戏。周恩来赞扬这出戏，说道：“感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舞台上反映青年问题的戏有《年青的一代》、《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说明当前教育青年的重要性。”[15]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连看了三次淮剧《海港的早晨》！

正忙于“京剧革命”、正忙于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江青惦记着淮剧《海港的早晨》，急匆匆又赶往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8月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召开的座谈会。

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港的早晨》。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了。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着手排演，由童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1965年3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江青看罢，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1965年6月7日审看，剧名改为《海港》。

6月11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江青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把张春桥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

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概。”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引者注）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眯眯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书记”吓蒙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柯庆施：“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避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1963年12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5年1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浜》。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16]。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样板戏”受舞台的局限，观众毕竟有限，影响也就有限。后来，在江青的“指导”下，逐一拍成电影。

这样，人们给江青编了个顺口溜：

三十年代演电影，
五十年代看电影，
六十年代批电影，
七十年代导电影。

这里唯一空缺的是20世纪40年代，她在延安连电影都看不到，所以也就成了“空白期”。

在1964年8月，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次批示，这表明江青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

8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送审稿（这一声明后来发表于1964年8月6日《人民日报》）上，写下一段批语：

>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
8月6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所说的“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可能是指毛泽东原计划骑马沿黄河考察的行动。

在1964年8月，毛泽东又在《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上，写了一段给江青的批语：“江青阅，此文有些道理。”

[image]
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芭蕾舞《白毛女》剧组

[image]
江青接见样板戏剧组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是当时学术界的“热门话题”。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谈论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见解。

《光明日报》接连分期编发《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在第10期上，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蔡尚思说，对李秀成既不应该全盘肯定，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

又不完全相同……吴泽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

对此，毛泽东以为“有些道理”。毛泽东把批语批给江青，表明要江青关注文化界的种种动态。

在1964年10月，毛泽东再次给江青写了一段批语。

1964年10月16日，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34期上，发表了共青团南京市委提供的《一个立志务农的教授女儿和家庭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一文。这篇文章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黄桂玉自述的摘要，反映她立志务农，同家庭展开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到江苏省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的经过。

毛泽东看罢，写道：“江青、李讷阅。”

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外交部的《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告》上，写下批语：“江青阅。8月间的材料。到10月中旬发生突变，赫鲁晓夫倒台，末尾几条结论，有些估计不足。”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1]董保存：《毛泽东“管家”访谈录》，《海上文坛》1994年第3期。

[2]唐振常：《有鬼皆害辨》，1979年2月1日《文汇报》。

[3]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

[4]《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5]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46页。

[6]《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1988年4月27日《中国文化报》。

[7]据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1987年12月25日《文汇报》。

[8]1997年3月3日，赵燕侠托刘新远先生给本书作者打来电话。此处已经根据她的意见作了修改。

[9]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1990年2月26日《新民晚报》。

[10]江青，1965年4月27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11]据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1990年第2期。

[12]据李辉：《做人与做学问》，《做人与处世》1998年第9期。

[13]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14]1986年4月4日，叶永烈采访上海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常爱宗和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江明淳，请他们回忆于会泳。

[15]葛昆元：《江青一伙插手〈海港〉我见我闻——记上海淮剧团李晓明谈话》，《上海滩》1991年第6期。

[16]后来，从1967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

第十章　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的江青。

江青原本与吴晗毫无交往。1987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王宏志著）一书，披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 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仇恨的种子，最初是这样埋下来的。用江青的话来说，从此她对吴晗非常“感冒”……她的小心眼儿，她的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对吴晗横竖看不惯。

1962年7月6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image]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边握着马连良的手，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朗朗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

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拍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后来，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能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1962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1961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多修改，于1962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1964年4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的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1962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1965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张春桥介绍江青结识“青年评论家”姚文元

1965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漫天皆白的银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车厢里达到了“过饱和”状态。处于一年一度的客运高峰之中的列车，连过道里都像筷子笼一般站满了旅客。

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里，门窗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窗帘。室内温度按照“指标”，保持摄氏27度。整节软卧车厢，只住着一位旅客和她的几个随从。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总是坐“公务车”来来往往，每一次都要独占一节软卧车厢。

她此时手里正拿着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细细琢磨着上面登着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剧本的作者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

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在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抨击了昆曲《李慧娘》，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刊登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到了1954年的风云人物

——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1964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1964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6月22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11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2月22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广东宝安（今深圳）演出，在宝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宝安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4月27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6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6月7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6月11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6月1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6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7月、8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9、10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6月24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柯庆施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34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个草绿色挎包，一对金鱼眼睛，第一次与“第一夫人”握手。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头一回相聚。

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史学家黎澍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1]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在1962年7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27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高潮。

既然毛泽东以为“修正主义”的影片“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马上“加码”，增加到十部。

于是，在1964年底，江青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位正副部长座谈。这清楚表明，江青已经凌驾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上。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冷西回忆：

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五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

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

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

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2]

在全国点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加紧了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工作。

康生支持了江青。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维特克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江青关于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回忆：

“你知道姚文元同志是谁吗？知道他做过什么事吗？”她在介绍她最忠诚最善辩的追随者之一时反问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笔杆子。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我们党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文化大革

命’初期和中期，尤其是在初期，他组织写作了批判反动文艺路线的文章。当然，首先是毛主席批准我去找他，我到上海后又得到柯庆施同志的支持。然而，大多数文章是姚文元同志写的。”

“工作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组织下完成的，”姚文元指出。“那时这确实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所以毛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整整19天（1965年11月10—29日）北京的报纸拒不刊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继续说，“11月10日，这篇文章就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后来以单行本发行，但是，有两三天，北京仍然不许发行。这些人多么霸道！花了7个月时间完成这篇文章，多次修改。而且，写作时还要保密。稿子送到北京，我看了三遍，这一切也要秘密进行。你不感到吃惊吗？”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4月26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柯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是自己读吴晗的《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1964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1961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1965年2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在武汉。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5年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见到《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写下给江青的一段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4月29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1965年6月，毛泽东给江青写下两段批语。

6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1965年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15期，对所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写下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6月2日于杭州

1965年6月7日，毛泽东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3期，对所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作了

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6月7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就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致信江青。江青把信转给毛泽东。7月18日，毛泽东就人体模特儿问题，写下两段重要批示，认为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

就在这些日子里，上海香山路9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3]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往武康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棍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朱永嘉曾回忆说：

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

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4]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4月27日“接头”之后：

5月29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6月7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6月11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6月24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

看中“民间报纸”《文汇报》

1965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1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濯。

2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3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5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6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4月7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江青准备抛出那“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

这一“宏文”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11月2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

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10月13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令人不解的是：据《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告诉笔者[5]，对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直到排印稿交到他手中，这才“奉命刊登”！据《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维告诉笔者[6]，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是在《文汇报》发表的，却是在《解放日报》排印的，原因是《解放日报》乃党报，排印车间的“保密性”强。

王维向笔者娓娓道出当年的内幕……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

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瞄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

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1966年12月23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经过：

> 姚文元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无关。从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两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给市委。当时主要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关系，也为了我不搞个人突出，谦虚。
>
> 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
>
> 至于《评“三家村”》，我一手经手的，与姚文元一起搞，最后的稿子才送市委。……

姚文元说是“九稿”，张春桥说是“七稿”，陈丕显说的是“八稿”，只是“略有出入”而已。

陈伯达在晚年则这么谈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

> 我至少有两次听到江青公开大肆吹嘘姚文元，说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的文字工作，背着北京，做的是秘密工作。这是真的。因为在姚文元的文字发表之前，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好像别人都不知道。
>
> 据江青说，开始她并不和姚文元见面，只是通过张春桥和姚联系。她和姚文元见面是较后的事。
>
> 江青替姚吹嘘，表明姚的文字内容就是她授意的。开始吹嘘姚文元的时候，总会有点顾虑，因为姚文元的父亲是著名的叛徒、特务。当姚蓬子死后，吹嘘就变得大胆，说姚跟姚蓬子没有什么关

系。姚是他母亲带的。

江青在上海住的时候，她同人们的来往，我没有打听过。在柯庆施死前，我只隐约知道他们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设想的许多事，主要是文艺界的，但这并不排斥他们议论其他问题。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就在“火力侦察”之后的几天——11月10日，上海莫有财饭店里，人们手中拿着当天的《文汇报》，宴会成了讨论会。

这天，吴晗的老朋友、中山大学的梁方仲从北京路过上海回广州。上海史学界人士聚会于莫有财饭店，为梁方仲洗尘。

非常凑巧，这天的《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席间中心话题。因为参加宴会的好多位教授，都曾出席前几天张春桥主持的“征求意见会”。

“真是岂有此理，一字不改！你一字不改，开什么‘征求意见会’？”

“强词夺理，歪批《三国》！”

“胡闹！”

饭店里一片斥责之声。

梁方仲没有看过大字本，匆匆阅毕《文汇报》，失色道：“这下子，辰伯兄（即吴晗）要吃苦头了！前天，我们在北京握别时，他还喜笑盈盈，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真是‘自古经纶足是非，阴谋最忌夺天机’！”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途穷天地窄，世乱生死微！”

“避席畏闻文字狱！”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诗句，道出古往今来的真理！”

……

岂止是莫有财饭店里众书生议论纷纷，怒火中烧；凡是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四起。

[image]
姚文元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挨骂活该，《文汇报》却无端蒙尘：就在见报的前一天——11月9日，张春桥突然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荪[7]，交给他一册大字本，指定明日全文见报。当陈虞荪接过大字本之际，尚不知要登的是什

么文章——诚如那天张春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排印大字本之际，魏克明、王维不知姚文元的拎包里装的是什么稿子。大字本在《解放日报》排印，而公开发表却在《文汇报》，曾使许多报人费解：《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姚文元的文章既然“来头不小”，为什么不在《解放日报》刊出？

“《文汇报》是一张民间的报纸，发扬民意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早在解放之前，《文汇报》便用这样的办报宗旨取信于读者。

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天，《文汇报》又以“资产阶级方向”闻名于全国。

正因为这样，江青和柯庆施组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便选择了《文汇报》发表。这一次，江青和张春桥又一次看中了《文汇报》。虽然这时的《文汇报》早已不是什么“民间报纸”，但是它毕竟在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影响。

11月12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对《解放日报》来说，几乎是破例的：历来是《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而颠倒过来的转载唯有这一次。张春桥处心积虑，每走一步棋都别出心裁，玩弄权术是他的专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历史性著作”。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一不反复“学习”过这篇“宏文”。然而，岁月的流逝毕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何况年轻的一代很少有机会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翻阅此文。原文过于冗长，无法全文照录。现摘录此文的一头一尾，也算是“录以备考”。

摘录此文的开头一段，便于今日的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摘录此文的末尾一段，因为那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争论最激烈的所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 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

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中略，下为结尾）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棍子”，那么，此时他已成了江青、张春桥手中的“金棍子”了！

当姚文元还只是“小棍子”、“棍子”的时候，并未引起海外的注意。然而，随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随着他成为“无产阶级金棍子”，港台及香港海外才注意起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位新角。

当时香港报纸称姚文元是“姚苏凤之子”。姚苏凤乃当年鸳鸯蝴蝶派作家。这表明香港最初对于姚文元其人十分陌生。

后来，香港报纸才披露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然后大登姚蓬子当年叛变中国共产党之事，使其时正非常得意的姚文元变得十分尴尬。

张春桥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

唐朝诗人陈子昂在《宴胡楚真禁所》一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自从《文汇报》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看中，也就蒙冤受屈了。

张春桥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荪[8]，发号施令，规定了六条“纪律”，把了解各界人士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列为“绝密工作”。

于是，文汇报社印刷厂里，忽地冒出了个闲人莫入的“第二车间”——保密车间。

于是，文汇报社指定了专门班子负责“《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于是，文汇报社奉命逐日向张春桥报告：一、哪家报纸在第几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二、各地、各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尤其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必须随时报告北京动向）；三、把重要内容编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

于是，《文汇报》奉命执行自1938年1月25日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编辑方式：凡是准备发表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必须事先由“第二车间”用老四号大字排出，送张春桥阅定，再退回报社，改用小字排印。拼成大样后，再送张春桥，待他签字后才付印。

于是，张春桥完全控制了《文汇报》，成为《文汇报》总编的“太上皇”。什么“民间报纸”，那只是张春桥借以蒙骗读者的幌子！

然而，张春桥的指示又来自江青。江青才是《文汇报》真正的“太上皇”！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9]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几乎每天都要陈虞荪去汇报情况，然后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笔记。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所幸陈虞荪的记忆力不错。所以，他能够把张春桥的种种指示，一一复述，记录在案。因为倘若没有文字记录，很容易疏漏，张春桥怪罪下来，那就麻烦了。

关于陈虞荪这种先凭借记忆复述上级指示的“本事”，《文汇报》唐振常先生所写的悼念“陈虞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 大家最感佩服的，是他传达市委领导讲话的本领。那些年，市委抓报纸极紧，他常被市委叫去谈话，回到报社，总是立刻召开小型会议传达贯彻。他从无笔记本，依然如作报告一样，不过一两张纸，记了几条，然后源源本本传达。作报告是发抒他自己的思想。思之有得，成篇亦非甚难。传达则是讲述别人的话，只那么几条杠杠，他照样长篇大论，讲来活灵活现。这不单是记忆力好的事，实已将他人所言融入自己脑中，用办报纸的行话讲，叫做吃透领导意图。当然，所说当非原来词句，但其内容则不能出以己意，且不容出以己意的。果然，传达完，然后发表他自己的贯彻意见，提供会议讨论。陈虞老的冰雪聪明，大多类此。[10]

作为《文汇报》多年的总编辑，经历过多少沧桑。他手下记者如云，却几乎不接受采访。笔者不顾浅薄，在1986年几度访问年已八旬、资深的“陈虞老”。

步入他的家，见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幅字：

> 结缡六十春秋，历经家难国难党难，正老境如蔗，忍撇我先归；
> 抚育八个子女，欣看自立自强自爱，恰青山满目，应知君无憾！

落款是“八十孤叟虞荪”。

他说，这是纪念他故去的夫人而写的。

他的床头，挂着一帧周恩来的照片。

他说，《文汇报》处于风口浪尖，总编辑这把椅子是很难坐的。他说起他的前任徐铸成，在1957年下台。他在这样严峻的历史关头，接替徐铸成，出任《文汇报》总编辑。

他说，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柯庆施。对柯庆施这个人如何

评价？如果没有柯庆施，江青未必能够把上海作为她的“基地”。在这中间，张春桥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说，江青第一次用《文汇报》“开炮”，是关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他说，姚文元本来只是《文汇报》的普通作者。后来就不得了了，碰不得。沙叶新只“碰”了他一下，“棍子”就朝他打过去。

我问起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经过。他摇头。他说：“那稿子交到我手里的之后，第二天就一字不易在《文汇报》上全文发表。我不知道这稿子怎么来的，改了多少次。我只知道‘来头’不小。我是‘奉命发表’。”

他说，关于这一“公案”，在《文汇报》，除了他之外，要算全一毛最清楚。他为我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全文如下[11]：

面致《文汇报》全一毛同志

一毛同志：

叶永烈同志来找我几次，为的是准备创作有关海瑞罢官前后的小说。

我确实有点爱莫能助。因为我无法原原本本地讲这场故事。特别无法像“文化大革命”中作交代那样，经得起推问。

因此我就推荐了你去承当这个差使。你有大量笔记，特别是你有惊人的记忆力。

当然，这篇历史小说，到底应如何写，还是有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决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可以来找我。

我绝无“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之意。

专此即颂

撰安！

虞荪
9月5日

有了“陈虞老”这一“手谕”，全一毛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讲述了当年的深层内情。

在“太上皇”张春桥的控制下，《文汇报》成了张春桥的耳目，张春桥的喉舌！

张春桥每走一步棋，都有一套“战略”：第一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写作过程中，曰“对外保密”；第二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开“征求意见会”，曰“火力侦察”；第三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

初，曰“引蛇出洞”。

怎么个“引蛇出洞”？

张春桥“指示”：在《文汇报》上开辟专版，冠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要“之一”、“之二”、“之三”地连续刊出，要引出各种不同意见来——以便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虽然张春桥打起了“百家争鸣”的旗号，虽然《文汇报》编辑奉张春桥之命到各位知名人士家中，主动约写批判姚文元的文章，然而，令人非常遗憾，一开始无人出马“争鸣”。大抵是1957年大鸣大放的“阴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各界高级知识分子都经历过那场运动，已有了前车之鉴。在姚文元的文章见报之后，敢怒者众，敢言者寡——人们只是在莫有财饭店里的场合那样私下议论，未敢落笔写批姚文章。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响。没有反驳文章，难演“争鸣”这场戏，无法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真是天底下的怪事：张春桥居然为没有人写文章批判姚文元而犯愁了！

又一次召见《文汇报》总编。

“你们把读者来信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个‘反对者’？”张春桥出了新主意。

于是，编辑们奉命逐封检查最近的读者来信。查来查去，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两封。其中的一封，只是大骂姚文元，没有留姓名、地址，似乎要请公安局帮忙才能找到写信者；另一封倒不错，对姚文元的文章逐点加以批驳，但是“理论水平”不高。最遗憾的是，这封信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写来的，“资历”未免太浅。

不过，如果真的找不出“反对者”，很难向张春桥交账。《文汇报》的编辑只得矮子里拔将军，把那封中学生的来信，送往“第二车间”，用大字排印出来。

出乎意料，张春桥见了排印稿，居然喜出望外。他立即要《文汇报》总编把那个中学生找来，对他进行“辅导”，写得更有“深度”，写得更加“尖锐”。

那位中学生——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真的被请到文汇报社，真的受到“辅导”。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笔者在1989年10月16日采访了马捷。他出生于1948年4月12日，写那篇批姚文章时，他不过17岁！

马捷的真名叫马以鑫。既非高干子弟，也不是书香门第，他原先住在上海南市区斜桥附近大林路。父亲在某水产供销公司当职员，母亲则是居委会干部。

当年，马以鑫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大约从初三开始，他对文学产生兴趣，课余不仅喜欢看文学作品，而且广为浏览各种报纸、杂志。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的“宏文”在《文汇报》上冒出的当天，马以鑫就细细地“拜读”了。对于姚文元的“大名”，他早就十分熟悉，知道此人在文坛上东征西讨，颇有背景。不过，读罢那篇“宏文”，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问号：海瑞，向来是受人推崇的清官，如今怎么成了姚文元的批判对象？再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怎么可以跟毫不相干的“单干风”、“翻案风”、“平冤狱”扯在一起？……他越看，越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强词夺理，逻辑混乱，简直在那里“歪批《三国》”！

他思索着。忽地，他产生一个念头：写一篇稿子给《文汇报》，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意见。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日——11月14日，他一早就赶到上海图书馆去。他那“注释”中所引用的许多学术论文，就是在这个星期天查到的。他一边查阅文献，一边摘录。

回家后，花了四五个小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也谈〈海瑞罢官〉》。他连草稿也没有打，信手写在印着横条的活页纸上。

写罢，他看了一遍，觉得这样指名道姓批判姚文元的文章不便署真名，灵机一动，想出个笔名“马捷”。

他还给报社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敬业中学高二学生，出于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写了一篇稿子，信末署上自己真名实姓。

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把信和稿子一起投进了邮筒。

约摸过了四五天，班主任突然来找马以鑫：“你给《文汇报》写了稿子，是吗？报社给学校来电话了，要你马上去一下，有些地方要作些修改。”

万万想不到，“文汇报”居然会这么快就有了回音！他原以为，一个

小小的中学生的来稿，也许会被扔进编辑部的废纸篓。如今，竟要他去报社，且要作修改，这显然意味着要发表他的文章。

他平生还是头一遭去文汇报社。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当即去了。他不知道去那里该找谁，因为打电话给学校的人没有留姓名。当他来到圆明园路，跨进《文汇报》大门，说自己是敬业中学的学生，一个似乎早就等在那里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说道："跟我来！"

马以鑫随着他走进大楼，来到一间办公室。马以鑫注意到那门口挂着"总编辑办公室"字样的牌子，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总编辑亲自接见他这个中学生，看样子对他的稿子破格重视！

[image]
刊登在《文汇报》上的马捷的文章《也谈〈海瑞罢官〉》

一进去，总编辑手中正拿着他那写在活页纸上的稿子，每一页差不多都用红铅笔画过许多道道。

[image]
1989年的马以鑫（叶永烈 摄）

总编辑询问了马以鑫怎么会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不是自己写的，资料是怎么查的。这时，马以鑫壮起胆子，逐一作了答复。从他那不假思索、流畅的答话中，可以清楚判定，此文确系他写的，并没有什么人"辅导"。

总编辑谈了对稿子的意见，说写得太分散，要集中一些，要他抓紧时间修改，明天一早送来。

走出文汇报社，马以鑫的情绪处于异常兴奋之中。因为"明天一早就送来"，意味着《文汇报》会很快发表他的文章。如此重视，又如此急用，是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他揣着那一叠画满红道的活页纸回到家中，当晚便重写了一稿。他把文章删短，压缩。想到此文要公开见报，他把初稿中一些很尖锐的字句删去了，改写成一封读者来信，说是一位中学生读了姚文，提出如下意见云云。

第二天一大早，他把初稿留在家中，把修改稿送到报社，报社还未上班呢！

过了一个多星期——11月30日，上午，马以鑫从学校的阅报栏里看见《文汇报》以显要的位置刊出了他的文章，这是他一生中头一回在报上发表文章，他的心情收紧了，急剧地跳着。他读着报纸，才看了几句，便傻眼了：怎么，报上登的不是他的修改稿，而是他的初稿！

马以鑫陷入了困惑：既然登他的初稿，又何苦要他作修改？他的初

稿从报社取回之后，没有寄出，报社从哪儿弄到了他的初稿？

天真烂漫的他，哪里知道报社讳莫如深的内幕：

那是因为，马以鑫把意思领会错了，在修改时反而抹去了那些锋芒毕露的词句（也是因为他修改时处处想及此文要公开见报，不像写初稿时图一泄为快）。

张春桥没有用修改稿，指令仍用初稿——马以鑫压根儿不知道他的初稿曾用大字排印过。正因为这样，这位幼稚的中学生会对报上登出他的初稿迷惑不解。

经过张春桥这位幕后导演的一番煞费苦心，《文汇报》上终于出现了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①。

通栏标题之下，刊登着“编者按”和署名马捷的《也谈〈海瑞罢官〉》一文。

“编者按”是经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逐字逐句推敲，这才定下来的。

> 编者按：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1月10日在本报第二版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史学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有的单位已进行了几次讨论，有的正在展开讨论。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讨论。现在把马捷同志的来稿发表于下。

这段“编者按”，是张春桥、姚文元“引蛇出洞”的“广告”。令人惊讶的是，惟恐人不知，这段“编者按”竟一字不易地接连重复刊登了六天，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的空前奇迹。唯有广告，才会如此重复刊登！

马捷的文章，被放到空前显要的位置。在“编者按”中并没有说马捷是中学生，作者名字前也没有冠以“上海敬业中学学生”，张春桥在巧妙地玩弄遮眼法：“马捷”这名字对于读者来说是生疏的，谁也不会以为他是中学生，而会把他看成是某一专家学者的化名！不言而喻，这就大大提高了这篇反驳文章的声望和煽动力，才能起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马捷的文章，火药味浓浓的，简直是指着姚文元的鼻子予以痛斥，骂得那么痛快：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是棵毒草，并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

姚文元同志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

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不仅反对了《海瑞罢官》，而且还指责了《海瑞上疏》。他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这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仅认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坏蛋，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践，什么刘、关、张，什么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什么林则徐，什么邓世昌……他们统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帮凶。那么请问：历代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阶级的骗，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昧的？……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岂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书烧光吗？姚文元同志何必费那么大劲看《明史》呢？

……姚文元同志认为，我们向《海瑞罢官》学习，一学“退田”，二学“平民冤”，三学“反官僚主义”，他还请吴晗同志“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奉告。文艺作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读者从中吸取优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优秀形象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认识这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戏中有“反官僚”，我们也“反官僚”……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按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像许云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在临死前要学江姐；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

马捷在毫无顾忌地逐点批驳了姚文元之后，文末，也给姚文元“上纲”了：

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

虽说马捷的文章，是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而故意抛出的，但这位中学生毕竟是勇敢的。“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哪里知道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心中的诡计？马捷批姚文元是真批，是出自内心的对“金棍子”的无比憎恶。虽然他上了张春桥的当，而他的纯真、他的正义感是可嘉的。

此处顺便提一下马捷——马以鑫的“后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文章以笔名“马捷”发表，敬业中学还是轰动了，人人皆知是马以鑫写的。好心的老师们看了马以鑫那没遮没拦、直言不讳的文章，都为这位正直而颇有才气的学生捏了一把汗。

马以鑫在文章见报的当天，给文汇报社去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修改稿，却登初稿。他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我们需要！”

满校风雨，马以鑫成为全校关注的人物。随着“文革”日近，姚文元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各报纷纷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马以鑫也就成了校内的批判对象。

最初是开班会批判他。接着，学生代表会批判他。再接着，大字报围攻他，有的大字报甚至称他为“反动学生”。

本来正在争取入团的他，入团成了泡影，连红卫兵组织都不许他加入。

有一回，他去文汇报社看大字报，吃了一惊。大字报“揭露”，那位总编辑如何“扶植反动学生马捷”，“帮助他修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同志的毒文”，甚至还说“马捷”这笔名也是那位总编辑取的，如此等等。马以鑫看了，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又一度“升级”，变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马以鑫到《文汇报》看大字报的消息传开以后，学校里贴出了“勒令”，不许马以鑫“乱说乱动”，不得“私自外出”。

当红卫兵们去“大串连”的时候，马以鑫被“勒令”下乡，接受“改造”。

接着是“勒令”马以鑫交出日记，他只得照交。好在日记上写的都是“闪光的语言”，查不出什么反动言论。所幸马以鑫的父母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他本人又年纪轻轻，平时还算“积极”，因此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成为什么“分子”。那“反动学生”的“头衔”，也还只是大字报上说说而已。

1966年8月光景，一个陌生的男人忽地出现在马以鑫家中。此人大约35岁上下，瘦瘦的，中等个子，他自称是《文汇报》的，却没有拿出任何证件。他说报社要查看初稿的原稿，要马以鑫交出来。已是惊弓之鸟的马以鑫，未问来者姓名，就交出了原稿。从此，这份写在活页纸上

的原稿，不知去向。

在动员上山下乡时，马以鑫被列入第一批到安徽插队的名单。不过，体检时发现他有肋膜炎，他被以病休名义留下，转到街道。后来，街道居委会又动员上山下乡，他于1969年9月到黑龙江嫩江农场劳动。

原以为从此可以跳出苦海，同去嫩江的有敬业中学的同学，“马捷”之事又在那里传开来了。好在那儿毕竟不是张、姚的“根据地”，人们当作一桩新闻听过之后，也就一笑了之。农场领导因此得知有一个能写文章的马以鑫，把他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编编写写，当个“秀才”使用，这是想不到的。

原本少年气盛、血气方刚的他，经过磕磕碰碰，棱角慢慢磨平，懂得了“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诚惶诚恐地完成领导交给任务。这样，在北国边陲，他度过了平静的四个春秋。

大学生王复兴奋笔批姚

1994年9月8日，笔者收到中原油田采油技校高级政工师王复兴的来信。在信中，他告诉笔者，他有着与中学生马以鑫十分相似的经历。“先生写及中学生马捷成了‘反姚先锋’，我反复读了多遍。本人有着与马捷同志相同的经历。当时，我是河南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1966年1月9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不能这样否定—与姚文元同志商榷》，受到了原河南省委、河南大学当时领导人的迫害……”

当时，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奋笔批驳。他化名“宋都”，把文章寄到北京的《光明日报》。意想不到，《光明日报》在1966年1月9日发表了他的文章！此后，他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反革命”……

1994年11月29日，王复兴是这样向笔者叙述自己的这一不平常的经历：

> 当时，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不可能知道姚文元文章出笼的历史背景。但是，青年学生天真，没有包袱，无所畏惧，确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不管你是什么大人物、小人物，你说的不对，就要和你辩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
>
> 为了捍卫真理，我就到图书馆里翻阅《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有关海瑞的历史资料及批判姚文元的理论根据。
>
>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化名“宋都”（因为学校在开封，开封是宋朝的国都），写出了《不能这样否定》的文章，寄往北京《光明日报》。
>
>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会发表。1966年元月9日的《光明日报》来了之后，我发现刊登了我的文章，当时学校轰动了，好多同学都争看那篇文章。
>
> 我把那篇文章寄到了我的母校—河南省荥阳高中，母校的教导主任李涤平老师在全校大会上宣扬了我的文章，认为学校毕业生中出了一个才子。
>
> 1966年4月，原中南局书记在广州召开中南六省宣传部长会议，在会上点了我的名，说开封师院有个学生叫宋都，发表文章反对姚文元，河南来的同志回去查一查。
>
> 河南省委宣传部长连夜从广州坐飞机回到郑州。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封师院党委的一个秘书，把我从学生寝室里叫了出来，问我：《光明日报》登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
>
> 第二天晚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进行审问，问我家庭是什么出身，我说是贫农；问我父亲是干什么，我说是党员，荥阳完中党支部书记；又问我都干过什么，我说我从小上学，高中毕业后当过兵，当了兵又来上大学。

他又问我那篇文章是谁让你写的，有没有后台？我说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出问题我自己负责。

接着系里让我写检查，又派人到我的家乡调查情况，全系开大会批判我。

他们抓不住我什么问题，就从笔名上无限上纲，说“宋都”要复辟封建主义，要恢复宋朝的国都。就连我不爱吃鸡蛋，也成了他们攻击的把柄，说我腐化堕落、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连鸡蛋都不吃，真是无稽之谈。

后来，开封师院党委把整我的材料报到了河南省委宣传部，把我定为反动学生。

1966年6月4日，“文化大革命”在开封师院爆发，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院第一炮就瞄准了我。一夜之间，前庭后院，墙上、地上、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复兴”，“打倒小邓拓王复兴”，“打倒小吴晗王复兴”，大约有一万张之多。一夜之间，一个本来不出名的青年学生居然成了全校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诬蔑为“历史罪人”。

在我的母校，曾经宣扬过我文章的教导主任李涤平老师也成了“黑帮”，宣扬我的文章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我父亲也成了“黑帮”。他们学校的造反派把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贴了出来，说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反革命培养的小反革命”。

就连我们一个宿舍里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同学，也不敢和我说话，要和我划清界线，写大字报攻击我。一时间，我成了孤家寡人，没人敢和我说话，没人敢接触我，我走到那里，后面就有人指指划划，“他就是小邓拓”。两派群众组织都不敢让我参加，说我是“反革命”，上街游行也不让我去，恐怕我玷污他们的“革命行动”。

直至1979年5月10日，王复兴才获得彻底平反。

《关于王复兴同志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王复兴，男，现年三十二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河南省荥阳县人。1965年考入我院历史系学习，1970年毕业，现任荥阳县刘河高中教师。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报刊上开展了对《海瑞罢官》问题的评论，王复兴同志于1966年1月9日在《光明日报》上化名宋都发表了题为《不能这样否定》的文章。王复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对反动文痞姚文元对吴晗同志的恶毒攻击和诬蔑表示反对。因此，受到林彪、“四人帮”及我省那几个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的迫害。给王复兴同志强加上“小邓拓”、“小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判，使王复兴同志精神上受到很大委屈。

院党委认为：上述情况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作法是极其错误的。决定给王复兴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强加给王复兴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塞进本人档案或家属档案中的

不实材料都应予清理销毁。

中共开封师范学院委员会
1979年5月10日

1985年出版的《河南大学校史》，对王复兴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 吴晗同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中文、历史系一些学生对姚文元散布的反动论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历史系学生王复兴以宋都的笔名，于1966年1月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不能这样否定》一文，批判姚文元的论点。他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为吴晗申辩，明确指出："姚文元不顾历史的局限，不顾时代的不同，不顾事实性质的不同，而硬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和现代的人民公社、翻案风相提并论，岂不可笑。"他还尖锐地指出，姚文元"自以为是地在自己的审判庭上把《海瑞罢官》判为毒草"，"我们决不允许"。事实证明，广大师生是富有鉴别能力的。

马以鑫和王复兴，作为两名普通的学生，能够鉴别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姚文元是无法一手遮天。"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手握真理的"小人物"必将战胜貌似强大的"大人物"。

张春桥终于“引蛇出洞”

马捷一马当先，在《文汇报》上被树为反姚文元的“样板”，给《文汇报》涂上了一层“民主”、“争鸣”的油彩：马捷这么尖锐的文章，《文汇报》也登，编者是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张春桥所料，自从马捷文章刊出之后，读者来信激增，来稿也不断增多。

于是，张春桥又选发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为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等。

不过，史学界、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仍按兵不动。看来，坐等他们来信、来稿，是不行的。

“请他们来！”张春桥发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请来了，周谷城请来了，蒋星煜请来了，谭其骧、李俊民[12]、李平心、束世、魏建猷、张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一位位教授、学者请来了。12月31日，由《文汇报》编辑部出面，召开了座谈会。为了使与会者无拘无束，张春桥和姚文元“回避”了——他们叮嘱，记录一定要细致！

会议开始时，主持者声言：“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这么一来，解除了与会者的戒备，个个畅抒己见，以为只不过“内部谈谈”。

可是，会议结束时，主持者却道：“谢谢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准备整理成文见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专家、学者们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但悔之晚矣。

张春桥和姚文元翻阅着会议记录，笑了：“引蛇出洞”终于成功了！

这时，从北京也传来“引蛇出洞”获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跳”出来了，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好，你翁独健敢于骂姚文元“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调子比马捷唱得还高！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也终于按捺不住了，替吴晗大打不平：“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好，好，翦伯赞可是条“大鱼”，中国史学界之“马首”，是马捷远远无法相比的。你翦伯赞也跟吴晗坐一条板凳，太好了！

那阵子，张春桥和姚文元够忙碌的，天天在那里排“左、中、右”名单。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便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拥护的，“左派”；中立的，“中间派”；反对的，“右派”。

到了1966年春节，张春桥还在忙碌。他在春节联欢会上，还不忘“钓鱼”。他拍着胸脯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他还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

为了开展“大辩论”，颇为“艰苦朴素”的姚文元，穿着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光临《文汇报》编辑部。他从包中拿出几张纸头，上面开列了三十几道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题，要求《文汇报》展开讨论。

文汇报社忙得团团转：每一封关于《海瑞罢官》的读者来信都要摘要登记；每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都要送张春桥审；每一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文汇情况》都要请张春桥阅定。

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12份。这12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

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不编号，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

“围城打援”——打北京援军

按照姚文元开列的三十几道题目，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旷日持久地在《文汇报》上进行，一整版又一整版，连篇累牍，没完没了。

一出京剧《海瑞罢官》，用得着花那么多的篇幅，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

如果说要“引蛇出洞”，许许多多专家、教授都已表了态，讲了话，写了文章，干吗还要“深入、持久开展讨论”？

在文汇报社，已有人厌倦了，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漫无际涯的“学术讨论”。

张春桥说了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战还没有开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本是军事用语，即：进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据守城镇的敌人，诱使敌人从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的援兵。现在，张春桥把吴晗当成已被围困于城中的敌人，旷日持久地讨论《海瑞罢官》，对吴晗“围而不歼”。张春桥的目光，注视着城外的援军……

张春桥和姚文元无日不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说过，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来上海点燃批判《海瑞罢官》之火。

北京，隐伏着吴晗的强大的援军！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1949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抛出之后，北京保持缄默。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的妻子。

她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张春桥嘱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单行本，以便到北京散发，攻入那个“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纸型，就要付印。这时，江青给张春桥来电，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准备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的报纸终于表态了。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

11月29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后的第19天，《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在第2版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

《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旗帜鲜明”，倾向性极强，口气咄咄逼人。全文如下：

>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认真读一读。
> 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形象，要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海瑞的所谓“退田”、“平冤狱”以及所谓“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这究竟

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

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是对哪个阶级有利，对什么人有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凡是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去干。反之，就坚决反对，坚决不干。

希望大家在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好想一想，议一议。

大家还要关心报纸刊物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中吸取教益。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口气就温和得多，只是说以“双百方针”的精神展开讨论。全文如下：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现在加以转载。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次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用词严谨，口气平稳，把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讨论来处理。这一“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和彭真审定的。

《人民日报》“编者按”全文如下：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

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1959年6月16日）、《论海瑞》（1959年9月21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是这么回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编者按”的报审过程：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汇报》突然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由于姚文元的后半部武断地认为该剧借古讽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而且还提到吴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这些观点，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认为这样联系就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

我请示彭真同志（当时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线视察，中央书记处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处理，他说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参加为庆祝她八十寿辰的活动时，在毛主席给她祝寿的宴会上，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因为我当时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既已请示中央书记处，就无须打扰主席了。

直到周总理在为斯特朗祝寿后从上海回到北京，才决定《人民

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经彭真同志和周总理审改后于11月30日发表。编者按语措词比较缓和，基本倾向仍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处理。

以后发展的情况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篇文章是江青策划、毛主席看过的。从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报刊已点名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学者。[13]

12月2日，《光明日报》在第2版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大体上保持与《人民日报》“编者按”一致的精神。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提出了要不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事件等重大原则问题，值得大家重视。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编的一出京戏，曾经出了书，也在舞台上演出过。本报也曾发表过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序》和其他称赞这出戏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封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的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认为，既然《海瑞罢官》这出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既然人们对这出戏和上述有关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就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充分的讨论，以便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为此，我们准备就这出戏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争鸣。

各报不同的“编者按”，反映了各报对于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

张春桥和姚文元研究着北京各报：什么时候转载，登在第几版，尤其是“编者按”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表态。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态度是差不多的，“编者按”只是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不偏袒吴晗，也不倾向于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点也不含糊。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写，也无报纸会登——要不，只能求助于《解放军报》，而《解放军报》毫无“民间”色彩！

以下是当时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间表：

[image]

《南方日报》没有转载姚文，只在1965年12月8日发表了《〈海瑞罢官〉宣传了什么？》，转述了姚文元的要点。

《湖南日报》也没有转载姚文，只是于1966年4月6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讨论情况的介绍》。

从以上各报转载的时间看：一、最先转载的是华东各省报，不言而喻，当时华东各省受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最先知道姚文元文章发表的“通天背景”。二、其他各省报则都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之后，才开始转载的。各省报转载姚文时，无一例外地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不断地摸各地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内中特别关注北京的动向。

从北京不断传来“秘密”摸来的消息，使张春桥、姚文元如坐针毡。

吴晗，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居然有恃无恐地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被“围困”了的吴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为他有“后台”，有“援军”。

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被视为吴晗的“后台”。彭真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盛怒道：“姚文元是什么人？把姚文元和他的父亲姚蓬子的材料都给我找出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

有人密告张春桥、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是《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定稿者。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表态：“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密报！密报！从北京又传来紧急消息：邓拓从北京许多高等学校抽调文史专业教师，组织成一支队伍，要以《北京日报》为阵地，反击姚文元！

密报！密报！就连邓拓面对这些教师所讲的一席话，也被急急地密报到张春桥、姚文元耳中。

邓拓很明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专门查对过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吴晗的意思。他这样搞很被动，有心人多得很！你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

密报纷至沓来。张春桥把主攻目标从吴晗转向邓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机宜：你去准备批邓拓！

这样，姚文元在讨论《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除了以"劲松"、"伍丁"的笔名，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之类"棍文"，便埋头于整邓拓的材料。

张春桥的"围城打援"，终于奏效：《北京日报》登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登出了《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呢？》，署名"向阳生"。

密报！密报！"向阳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

好，好，另一支援军也出动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报！密报！"方求"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热”的来历

[image]
海瑞画像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话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写了戏，而且还写的是京戏，岂不大可奇怪也乎！”

吴晗为《海瑞罢官》写的序，一开头就这么谈起了“奇怪”的事情。

一个不懂京剧、不看京剧的历史学教授吴晗，怎么会“破门而出”写起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呢？

仔细追溯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缘由和过程，彻底刷去了姚文元泼在吴晗身上的倾盆污水……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知道毛泽东是湖南人，爱看湘剧，又听说上海在演出湘剧《生死牌》，上海方面便在4月2日晚请毛泽东观看了此剧。剧末，明朝江南巡抚、素有“南包公”之称的海瑞上场。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也真巧，第二天晚上，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上海的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自己是这样叙述的：“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14]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也都不敢讲话！”

毛泽东以为，应该提倡海瑞那样敢于直言的精神。

于是，毛泽东嘱咐秘书田家英：“你刚从四川农村蹲点回来，很累。不过，我有小事一桩，要你去办：你明天去借一下《明史》，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4月3日晚，毛泽东没去看戏，也没跳交际舞，在灯下细细读着《海瑞传》，几乎入迷了。毛泽东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陈丕显也回忆说：

> 《海瑞罢官》这出戏成于北京，却是源于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们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主席是湖南人，爱看湖南戏。一天，他看了湘剧《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第二天，他专门打电话要我们为他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
>
>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问题，为了纠正“高指标”等“左”倾问题，毛主席有感而发，在工作会上盛赞海瑞，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毛主席说：明朝皇帝对下臣严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疏批评皇帝。海瑞对嘉靖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嘉”谐音）皆净（“靖”谐音）”。他要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批评的品格，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15]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了海瑞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皇帝的“嘉靖”，是“家家皆净”。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也写了这样的话。这当然触怒了嘉靖皇帝，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了酒菜给他吃，他吃完了，觉得有点蹊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悲恸不已，以致把吃进去的酒菜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讲完海瑞的故事，意味深长地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毛泽东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曾向文艺界一些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发扬海瑞精神的意思，许多人都向钱俊瑞推荐了吴晗，以为由研究明史的吴晗来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胡乔木也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很重要，他同样想到了吴晗。胡乔木以为，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早在清华大学时吴晗便把《明实录》读完，做了大量明史卡片，此后以研究明史而享盛誉。于是，胡乔木便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的两个多月——6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署名“刘勉之”，亦即吴晗。这篇文章，贯穿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精神。

7月初，吴晗又写了《论海瑞》一文，送交胡乔木。此时，正值胡乔木出差，吴晗的《论海瑞》手稿就压在胡乔木那里了。

胡乔木上哪儿去了呢？

赤日炎炎，七月流火。中共中央委员们聚首清凉世界——江西庐山，在那里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亦即著名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7月1日刚上庐山时，心境是宽松、愉快的，欣然命笔，写下了“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登庐山》。

上山不到半个月，一封意外的信，使毛泽东的心绪顿时变得极不愉快，原定20天结束的庐山会议竟延宕至历时一个半月才结束。

那是7月13日早晨，一个壮实的中年人朝庐山向毛泽东住所走来，说有事找主席一谈。警卫员说，主席刚睡。中年人走了。当晚，他在庐山上草成一信，于14日晨又亲自送往毛泽东住所。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多年战友、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正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彭德怀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声明。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直言苦谏。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阅信后，双眉紧皱，当即在信上批示：“印发”。

7月17日上午，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都收到一份新印的文件，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批判了彭德怀的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顿时，庐山上风云翻滚，一片紧张气氛。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海瑞。他说，他仍然提倡海瑞精神。但是，他又作了新的阐述：海瑞有真海瑞、假海瑞，有“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他提倡的是真海瑞、“左派”海瑞，不是假海瑞、“右派”海瑞。

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image]
彭德怀给毛泽东信的部分原件

8月16日，庐山会议终于结束。

当胡乔木下山，回到北京，这才见到吴晗那篇《论海瑞》。胡乔木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上仍然提倡海瑞精神，觉得吴晗的文章仍可照发。他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新见解转告吴晗。于是，吴晗修改了《论海瑞》，补充了毛泽东关于反对假海瑞的见解。9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吴晗的《论海瑞》。吴晗始终以为，他宣传海瑞精神，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

除了胡乔木找吴晗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多次向文艺界提出，要宣传海瑞精神。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各出版社、各剧团纷纷刊登文章、出版书籍、上演节目，歌颂海瑞、宣传海瑞，形成了“海瑞热”。就连关于海瑞的连环画，一时间也出了十多种。

跟毛泽东跟得最紧的，其实还不是北京，而是上海。毛泽东4月4日上午在上海谈了海瑞的故事之后才十来天，4月17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便在“朝花”副刊登出该报组织的专稿——蒋星煜的历史小说《南包公——海瑞》（也就是张春桥后来在小轿车上突然向《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提出质问的这篇文章），比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早了整整两个月！

当时，《解放日报》约蒋星煜写关于海瑞的历史小说，是因为蒋星煜对于海瑞颇有研究，早在1957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历史人物传记《海瑞》。

就京剧而论，上海也跑在北京前面。1959年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上海便推出了许思言执笔、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据蒋星煜回忆，他的历史小说《南包公——海瑞》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引起了周信芳很大的兴趣。周信芳邀请蒋星煜一起去青岛，决定以《南包公——海瑞》为主线改编京剧。周信芳还邀请剧作家许思言前往青岛，着手写作剧本。

蒋星煜说，剧本最初取名《直言天下第一事》，因为海瑞的奏疏在收入陈子壮的《昭代经济言》之中时，题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于是周信芳便以《直言天下第一事》为剧名；后来觉得《直言天下第一事》毕竟不像京剧剧名，便改为《海瑞上本》；最后，改为《海瑞上疏》。

上海京剧团一马当先，急坏了北京京剧团的那匹“马”——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他在全国政协会上遇见吴晗，便求吴晗写剧本。此后，马连良亲自出“马”，几次三番到北京市政府，敦促吴晗，请他写海瑞剧本。虽然吴晗再三声明不懂京剧，挡不住马连良一片热忱。终于，“上帝”被感动了，吴晗七易其稿，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在1960年底写出京剧剧本《海瑞》，开始彩排。

正巧，吴晗的老朋友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此人虽说是植物学家，身为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却酷爱文学。当年，蔡希陶写过《蒲公英》等短篇小说，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他听说吴晗在写《海瑞》剧本，便索了一本排印稿。读毕，吴晗征求他的高见，这位植物学家拿起毛笔，在封面上“海瑞”两字之后加了“罢官”两字。蔡希陶道：“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作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觉得此言甚是。从此，剧名便改为《海瑞罢官》。

吴晗之冤，冤在何处？姚文元之霸，霸在哪里？只消看一下时间表，便一清二楚：

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在1959年7月14日，怎么可以把《海瑞骂皇帝》说成影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难道吴晗会“未卜先知”？

二、吴晗的《海瑞罢官》自1959年秋酝酿，1960年底定稿，而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翻案风”是在1961年才出现，怎么可以说《海瑞罢官》是要人们从中“学习”“退田”和“平冤狱”呢？难道吴晗又“未卜先知？”

如果来一个《韩非子》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吴晗倒过来也可以用姚文元笔法批判姚文元。须知，姚文元在1958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一书中，他曾热情讴歌过彭德怀元帅。

诚如从颂胡风到反胡风，从支持右派到反右派，对于姚文元来说，从赞彭总到批《海瑞罢官》，那是习以为常的“急转弯”。他是“墙头草”。他的笔杆是姓“摇”的……

在上海排演了《海瑞上疏》、北京排演了《海瑞罢官》之际，海瑞的故乡—海南岛排演了《海瑞回朝》，写的是海瑞在72岁时东山再起、到南京出任南吏部侍郎的故事。

当《海瑞罢官》受到“批判”，马上殃及《海瑞上疏》和《海瑞回朝》。这三部海瑞戏，被称之为“海瑞三部曲”。据云，这三出海瑞戏是从北至南，“全国一盘棋”，与彭德怀“南呼北应”，进行“反党活动”。

毛泽东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一人知。

据说，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谈到“文化大革命”，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

>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16]

毛泽东是否真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不得而知。

有人以为，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怎敢去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也有人以为，一开始可能是江青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去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章写出初稿之后，送毛泽东审阅。

不过，江青却一次又一次吹嘘说：“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据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和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所著《问史求信集》[17]一书查证，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一句。

江青一次次来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中共上海市委只有第一书记柯庆施知道。1965年4月9日，柯庆施

病逝。1965年11月，陈丕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时，张春桥、姚文元所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写到第八稿了。陈丕显回忆说：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工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

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18]

另外，毛泽东在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19]

毛泽东所说的"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第八稿。

正是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第八稿，表示同意，于是江青、张春桥就把文章交给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11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image]

1964年6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检阅北京、济南军区的军事汇报表演。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谈话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12时。[20]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

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21]

198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为“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上面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

康生见此，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弛。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1966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

《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于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时，一直在观言察色的康生着急了，马上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主席！”

彭真——毛泽东——康生之间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彭真记得，在场的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也记得。离开毛泽东那里，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江青。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是说吴晗写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个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攻击”现实，从头至尾没有提及为彭德怀翻案这一“要害”。

身为“上纲专家”的姚文元，怎么会“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问题？何况，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不“提醒”姚文元呢？

“军师”张春桥的一席话，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让主席去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写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是“军师”，棋高一着。

难怪江青要一趟趟来上海，评《海瑞罢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为了点不点明“要害”问题，那三颗聚在一起的脑袋，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花费了多少时光。

果真不出张春桥所料，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说了那番话。

不过，康生更是棋高一着。

1966年8月1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从毛泽东那里夺回了“发明权”。会议记录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康生这么一段话：“1964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其实，康生的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掺假——他掩盖了他曾告诉过江青。曲曲折折，历史的迷雾经过沉淀、澄清，这才终于显示出原先的面目。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戚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会议。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image]
戚本禹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

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1959年到1960年写的，发表于1961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戚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

邓拓死于姚文元笔下

在姚文元的书桌上，《海瑞罢官》剧本以及《明史》已被搁在一边，代之以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金棍子”要从打吴晗转向打邓拓和廖沫沙了。

说实在的，姚文元本来对邓拓颇为敬佩，对《燕山夜话》深为赞赏。

1962年，姚文元曾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写过这么一封信：

编辑同志：

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杂感》），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

致

敬礼

姚文元5月30日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邓拓北呼，姚文元南应。他要步《燕山夜话》的后尘，出版“上海版”的《燕山夜话》。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姚文元“反戈一击”，把《燕山夜话》当作“大批判”的箭靶了。就连张春桥也是如此。当年，当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之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曾一起共事。如今，为了顺应“阶级”的需要，全然不顾这些了。

又一番“对外保密”。经过几次修改，经过江青、张春桥动笔斧定，由江青把大字本送到毛泽东手中。

标题：《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署名：姚文元。

毛泽东阅毕，拿起铅笔，思索了一下，把原先标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删去。于是，江青便吹嘘了：“经过主席亲笔改定……”

江青和张春桥第三次看中《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发表。

作为“军师”，张春桥选择了“最佳时机”——1966年5月10日，在《文汇报》上抛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确实是“最佳时机”，因为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会议。

因为5月8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登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指明“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江青还点明：“《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这样，江青就借“围城打援”，从吴晗身上“扩大战果”，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进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直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见报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调子，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开缺口，“扩大战果”，成为轰击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发重磅炮弹：第一发俞铭璜的《“有鬼无害”论》轰击廖沫沙，第二发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轰击吴晗，如今第三发轰击邓拓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这三发重磅炮弹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都是以《文汇报》为炮口。

“四人帮”其实最初是“三人帮”：以江青为核心，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棍子”。那时候，“造反司令”王洪文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办公室里逍遥，他连做梦也想不到日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密战友”。

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500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开会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衣，“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彻头彻尾”的。

大抵是某种巧合，在中国古文中，“笔”与“刀”常常连在一起。替人写作，曰“捉刀”。整理文书的小官，曰“刀笔吏”。古时刀笔相连，那是因为古时以竹为纸，笔在竹简上写字，误写之处即用刀刮去，刀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却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笔吏”，其笔如刀，笔能杀人！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和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

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1966年5月17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54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

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

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田家英为抗争而献身

西子湖畔，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上午谈到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一席话刚刚说毕，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

“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

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

毛泽东对田家英颇为器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毛泽东笑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写的，叫田家英，我的秘书。”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987条注释的主编，参加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他从小失去父母，在中药铺里当学徒。1937年，15岁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之后，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田家英，调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家英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田家英向来为人正直。最初，提议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据说是陈伯达。在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问，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思索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见解？……陈伯达摸到了毛泽东的动向之后，抢着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每当陈伯达向田家英摸“动向”的时候，田家英总是支开话题，聊起别的事。这使陈伯达深为不快。

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image]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

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22]。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

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

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

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

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

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88年3月初，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还曾多次访问过陈伯达。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原文如下：

> 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是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艾思奇并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整理工作，他从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关锋最初整理出的纪要，原本就没有言及《海瑞罢官》的话，根本不存在从纪要中删除的问题。关锋在完成纪要稿后，曾提出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言论不写进纪要“行不行”的疑问，但田家英、胡绳对此没有理会。
>
>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话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
>
> 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瞒过了。
>
> 十多年后，董边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关锋后来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进去了。我们在此事的处理上，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关于《海瑞罢官》的话，虽然是附带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们不主张放进的那段话。原先的主题，倒不再提起了。
>
> 胡绳告诉董边，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触了解，能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那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23]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 196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职，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24]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他以为：

一、在杭州整理记录的时候，田家英就提出不要写入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胡绳、艾思奇支持，关锋不表态；二、回到北京之后，由于关锋坚持要写入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最后印发的记录上还是写上了那段话（前几种说法都说最后印发的记录上没有这段话）；三、是关锋向上告密。

逄先知的原文如下：

>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25]

说法之四，《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一、记录是田家英整理的；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三、告密者除了关锋之外，还多了个戚本禹。

彭亚新的原文如下：

>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
>
>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
>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
>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26]

[image]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以为：一、建议整理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不是江青，却是田家英；二、田家英在记录中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三、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附带”谈到的。

原文如下：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它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27]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认为：一、是田家英在纪要中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二、田家英删去这段话的原因是这段话不属于“重要的内容”。

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28]

说法之七，是邓力群。他以为：

一、田家英是由于“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而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二、田家英是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

原文如下：

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就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29]

以上七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江青骂田家英是“老右倾”，而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在7月23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像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然而，田家英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1966年5月2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5月22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23日，滚出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44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是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1969年3月18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

吴晗的学生张海瀛，曾回忆1965年底在吴晗遭到猛烈批判的时候，前去看望他。师生间作了这样的对话：

吴问：你还在乡下吗？几个月没来了？
张答：还在乡下，是9月份返京时来过一次，已有两个多月了。
吴问：最近看报没有？
张答：看了。原先手头没有《文汇报》，《北京日报》转载后，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这两天读了蔡成和同志和燕人同志批驳姚文元谬论的文章，真解气！真痛快！真是以理服人！
吴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能说服了谁呢？
张问：先生是否准备写篇澄清史实的文章呢？
吴说：准备写，问题是怎么个写法。
张说：看来这场争论有点像郭老替曹操翻案时引起的那场风波。
吴说：不好类比。这场争论的来势要比那次猛烈得多。

1965年12月30日，张海瀛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吴晗先生发表的自我批评后，利用1966年新年休假，又去拜访吴晗先生。

张海瀛后来回忆了两人的对话：

吴问：你看报了吗？
张答：看了，先生的大作我认真拜读过了。
吴问：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
张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评，说明这场争论要收场了；也有的说，这不是收场的信号而是升级的信号。
吴说：从《人民日报》的按语来看，这场辩论是要扩大和升级的。假如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

张问：学习刚开了个头就有中断的危险，怎么办呢？

吴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有志于明史，主要靠自己努力。我送你几本书。

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海瑞集》以及在高级党校的明史讲座稿，在封面分别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1966年元旦。"[30]

张海瀛说，从吴晗谈话的口气和举动，可以看出，吴晗已经感觉到事态在扩大、升级，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将面临火与血的考验。

此后吴晗一次次被拉上批斗会。他遭到了一次次毒打。

1969年10月11日，被打得胸积瘀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60岁。

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1976年9月23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

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如此看重姚文元，她甚至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

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1966年受迫害而死，不过53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1587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370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千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申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1966年4月3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侠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话：“画像（指海瑞画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墨迹（指海瑞墨迹——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侠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也就因为这么一句吴晗致谢的话，使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成为打手们注意的目标。不过，光是凭常任侠把一份海瑞墨迹送给吴晗这一点而打倒他，就连打手们也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奇事：报上曾登过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而常任侠偏巧姓常，打手们便一口咬定，“常谈”是常任侠的化名！

于是乎，常任侠“步步高升”；先是站高台，戴高帽，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提了一级，成为“吴晗的死党”；又过不久，又提一级，成为“彭真的死党”。

常任侠教授在忆及这场飞来横祸时，感叹万分。他引述了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描述朱元璋设置文网的一段话，倒是可借为准确地描绘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文网：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历史现象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写过明代文网的

吴晗，到头来落入“文革”之网，可悲可叹！

这里顺便提一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吴晗的《海瑞罢官》还难以平反，姚文元的那篇“宏文”还难以批判。内中的原因，是由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毛泽东同意才发表的，有着“御批”的“来头”；再说，“彭德怀就是海瑞”这最高指示，人人皆知。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无人敢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姚文元早已倒台。

其实，否定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最深刻的含义，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是这篇“宏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在“两个凡是”的岁月，还高唱“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终于勇敢地打响第一炮，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苏双碧，传言称是“吴晗的秘书”。其实，当年他是北京历史学会唯一的专职干部，而会长是吴晗，故与吴晗相知甚深。苏双碧后来在1974年调往《光明日报》工作。

也正巧，在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推出历史性的文献—“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炮猛轰“两个凡是”，从此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苏双碧决心为吴晗申冤，打响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一炮。苏双碧是这样回忆的：

> 我当时觉得，由我来写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年轻，又是报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即使文章有点偏差，上面也不至于太计较；二是我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又参加过邓拓、范瑾同志为组长的后来被称为“假批判真包庇”的写作组，多少也算了解一些内情。据此，我决定试一试，并着手准备写这篇文章。
>
> 然而，这件事毕竟太大了，按组织原则，我必须向报社领导汇报我自己的想法，并征得领导的同意，才能着手去做。
>
> 大约在（1978年）11月10日左右，我得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很快要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那天下午正好在楼道碰到他，我向他说明我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从而为全面替吴晗平反作舆论准备的文章。西光同志几乎没有多加思索就表示同意，并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吴晗平反是时间问题。”他态度明确，坚决，增强了我的信心。
>
> 随后，我告诉了主管理论部工作的副总编辑马沛文同志，他对我的设想报予极大的兴趣，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并让我把别的工作先放一下。于是，从构思到查材料到写文章，大约只用了两天多时间。把文章初稿交给马沛文同志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找

我，认为文章基调不错，大体可以。[31]

就这样，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勇敢地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苏双碧这样说道：

> 当天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全国许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
>
> 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根据他们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需要进行评述和猜测。
>
> 美国《纽约时报》11月16日的一篇专稿认为，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的“最惊人之举”。
>
> 11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评论中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 11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
>
> 其实所谓“最惊人之举”或“冲击性很强”的说法，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四人帮”制造的冤案是一定要得到平反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作风的表现。[32]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3]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4]据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5]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采访王维于上海。

[7]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8]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9]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同年9月11日采访全一毛。

[10]唐振常：《漫谈陈虞老》，《上海滩》1994年4期。

[11]1986年9月5日，叶永烈采访陈虞荪于上海。

[12]1986年10月12日，叶永烈采访李俊民于上海。

[13]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14]据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1988年第5期。

[15]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17]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8]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1页。

[19]据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20]笔者自1988年10月31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此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21]引自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的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2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23]此文原载《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4]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25]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26]彭亚新：《田家英小传》，载董边、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页。

[27]余广人：《当代一幕政治悲剧：田家英以死诤谏》，《炎黄春秋》1997年第2期。

[28]曾自、曹应旺：《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载《名流写真》，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2页。

[29]邓力群：《悼念家英同志》，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30]张海瀛：《忆吴晗师》，《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31]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1996年第2期。

[32]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1996年第2期。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

江青前往苏州请“尊神”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1959年春天，以21天的神奇速度建成的！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不过161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了。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1966年2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1966年4月10日，当这个座谈会的“纪要”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1966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2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林彪在此之前已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1月21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1958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image]

1959年9月15日举行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左一）被任命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孟昭瑞 摄）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

当然，江青寻找林彪的支持，也有她的“依据”。这个“依据”，便是毛泽东1964年6月4日写给她的一个批语。

毛泽东的批语，是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上。

这一期通讯登载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1964年5月9日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的谈话。林彪指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的《工作通讯》，在1964年6月4日写下批语：

> 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
> 毛泽东
> 6月4日

有了毛泽东的批语，江青请林彪给予支持就名正言顺了。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

所谓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

1962年第3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撒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笔者在1990年7月22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31年加入中共，不久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时，主任是萧华上将。萧华，12岁入团，14岁入党，18岁就当上“少共国际师政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总政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正因为这样，叶群的电话打到刘志坚那里。

叶群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跟部队向来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回怎么忽地要“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了呢？

早在延安的时候，刘志坚就认识江青，只是看不惯她“挖墙脚”，对她印象不好，没有太多的交往。

1965年11月26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崇武海战作战有功人员。崇武海战发生在这月14日凌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潜艇“永泰号”。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算是多年以来，刘志坚跟江青有了第一次间接的工作联系。就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一个多星期，罗瑞卿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说：“我事情

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萧华去，萧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image]

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叶永烈 摄）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萧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就这样，2月2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1]、《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1963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2]。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

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5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信中有一段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1962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1946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13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2月9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集体座谈”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2月9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2月10日飞回北京向萧华汇报，16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2月8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16日继续举行。到了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三千多字，以供向

上汇报之用。

20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3]："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21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22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这样，23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萧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萧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帮助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1949年到当时的1966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30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11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3月10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3月14日、17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17日写了

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末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顺便提一笔，林彪在常人眼中，武将也，对文艺外行。其实林彪也颇有文学修养。1942年5月，林彪为了悼念牺牲疆场的战友、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写下了一首长诗，这首诗以笔名“凌霄”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林彪能写长诗，足见其颇有文才，只是平时深藏不露罢了。

北京针锋相对起草《二月提纲》

1966年春节刚过，大地又是一片银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儿照样在放鞭炮，女人照样在穿新棉袄，老头、老太婆照样在吃饺子，小伙子照样在下棋、玩扑克。谁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对台戏”在悄然开张。

1966年的2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2月2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2月3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1964年四五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这个小组是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1963年9月6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五个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image]
晚年彭真

“我看，一定要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会议一开场，彭真就明确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赞同彭真的见解，唯有康生不置可否。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2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二）方针；（三）队伍；（四）左派要互相帮助；（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五人小组写出了《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于是，2月12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3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指谁。

杨永直在3月11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

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

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3月30日，刘志坚[4]和陈亚丁在北京为《纪要》的通过履行最后的手续。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指江青3月19日致林彪信及林彪3月22日致贺龙等军委常委信——引者注），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4月1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内中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毛泽东在4月1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时，中共中央的批语，已换成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语，新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于是，《纪要》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4月10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在上海策划发表梁壁辉、姚文元的文章，江青毕竟只在幕后操纵。推进“京剧革命”，抓“样板戏”，江青的那篇《谈京剧革命》，也迟至1967年5月10日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江青以一颗“政治新星”的姿态，在全党亮相！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论”——引者注）。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
>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

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

《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将担任要职了。

毛泽东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1966年3月28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1987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宫本显治同志的意见。”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说：“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3月11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

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久久地一言不发。这一次康生知道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49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尖锐地批评了《二月提纲》，批评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称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称姚文元是“小鬼”，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5]。

毛泽东说：

>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
> 什么叫学阀？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学阀，不读书、不看报、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又包庇坏人、包庇吴晗、翦伯赞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他们是阎王，姚文元是小鬼，大家怕同你们联系，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
>
> 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
>
> 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
>
> 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
>
> 去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各地方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接着，毛泽东又对魏文伯说：

你们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左派写文章，谁不犯错误。
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改了几次，就是有错误嘛。列宁手稿也改得很多。
许立群专门搜集关锋的文章，不搜集吴晗的文章，要批评。我们要保护左派。尹达有两句话是对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大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历史上都是这样。
我最近同乔木谈，书不可不读，多了也没有用。中国历史书太多了，我们有些军区司令，如许世友他们，也不懂宋元明清，但他们会打仗，会阶级斗争。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他们实际掌握了文、史、哲、经、电影、出版等等事业，对他们一个是要驳倒，一个是给他们饭吃，有职无权。
我也保过吴晗，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底，他少年时代就拍胡适的马屁。郭老、范老这两个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不懂学术，郭老搞古代史就很有成就。

有人插话：郭老在海南岛写了两首诗，发点牢骚。

毛泽东说：

郭老写两首诗不算什么，他是个杂家、学术批判可找二、三个有代表性的人，不可过多。姚文元关于海瑞修吴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无名的，修水利还不如张居正。海瑞的平离策要好好批判，他还画了地图，很反动的，要好好加以批判。
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现在写文章的人许多我都没见过。李希凡写一篇文章，调到《人民日报》，做了人大代表，再没有写出好文章。关锋是不是人大代表？……但是也有危险，年轻人要注意，现在学校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报刊编辑、记者很复杂，保皇党很多。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好比孙中山和康梁。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走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我怀疑。
文化革命要进行到底，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大大鼓舞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1966年5月1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4月1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5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上海飞回北京。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当时，王力是康生手下的笔杆子，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而又非常出名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此王力本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1943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从此以“王力”为名。1958年6月1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内。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6]，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只有一

句话："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

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既然《通知》"应当是理论性的"，毛泽东指定由"理论家"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以为王力"笔头快"，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通知》，彭真也在座。

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

[image]
王力在家中（叶永烈 摄）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这个小组，人称"中央文件起草小组"。

这时，35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

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组长陈伯达沉思了一下，说道："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辫子！"

关锋愕然——笔者采访关锋时[7]，他回忆说，直到这时，他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江青一听"老夫子"的话，生气了，说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每逢这样关键的时候，江青总是要用“主席”来作为王牌打出去。

第二天，“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刚开始，江青便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谁还敢反对？于是，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

至于江青是否向毛泽东报告过，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姚文元为江青出了大力，“第一夫人”也就为之力荐。江青为姚文元从上海进入中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而是中共中央的极其重要文件——后来被称之为《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76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28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反复

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5月6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今非昔比，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5月10日下午，刊登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当天的《文汇报》从上海空运至北京，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7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也全都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5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5月16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据戚本禹回忆，《五一六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时的情景是这样的[8]：“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

知》的通过之日——1966年5月16日，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
> ……
>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5月18日上午，林彪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炮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的“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

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捏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1966年1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关于政治挂帅的讲话，颇受毛泽东重视，于1966年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这一回又少了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忝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飞往北京，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 组长：陈伯达
> 顾问：康生
>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image]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合影。（孟昭瑞 摄）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小组”或者“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了“中央文革小组”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文件的起草。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增至18人。

据王力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6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摄氏40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〇一医院。

[image]
王力晚年在上海（叶永烈 摄）

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80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

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这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5月17日夜，邓拓自杀。

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1965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2月20日至26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4月29日又来长沙，住23天。5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7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11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12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据江青自述，从1966年5月下旬开始，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析主要大学的动态，尤其是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和北京大学传出的新闻。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杭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1957年6月1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

召见。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西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9]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6月1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6月1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10]

江青呢？她5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68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7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对此外的61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

《战火中的青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哥俩好》——写中间人物，充满了低级趣味！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满人性论。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

《花好月圆》——片名就没有阶级斗争！写多角恋爱，太低级。

《五朵金花》——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也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

《雷锋》——影片中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错误。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

《红霞》——宣扬假投降、美人计。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

《人民的巨掌》——为反革命扬帆翻案。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宣扬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江青的几句话，便把电影界说成一团漆黑。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6月20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

6月16日至18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沉思

6月17日下午4时光景，三辆小轿车、一辆大客车，忽地鱼贯进入湖南韶山的一个山谷里。四周实行了严密的警戒，闲人莫入。

从车上下来身材伟岸的人物，一望而知是毛泽东。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声震天动地、“文革”之火席卷华夏之际，毛泽东居然来到故乡的山间过着“隐居”生活！

那个山谷，人称“滴水洞”。其实，那只是因为附近有个小山洞，不论晴天或下雨，总在滴水，因此得名。后来，修水库时，人们把这小山洞填掉了，可是仍习惯地称那山谷为“滴水洞”。

滴水洞是由龙头山（南）、黄峰山（北）、牛形山（西）三山环抱而成，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如今，滴水洞已经成为韶山一景，向游人开放。笔者在1997年便到滴水洞细细看了一番。

毛泽东对于滴水洞，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这里。后来，他的祖父同伯祖父分家，他的祖父迁往韶山冲上屋场安家——如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毛泽东故居，便是上屋场毛泽东祖父的房子。毛泽东是在那里出生的。上屋场离滴水洞大约四公里。毛泽东小时候在这儿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他到外婆家，要打这儿经过。他的祖父、祖母的墓，也建在这里后山的虎歇坪上。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泽东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着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〇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一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一亿元，兴建了三栋楼：一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24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这个“二〇三工程”从1960年动工，到1962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

足足等了四年，这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他于1966年6月15日离开杭州，16日到达长沙，17日到达滴水洞。

陪同毛泽东此行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8341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11]。张耀祠是江西瑞金沙洲坝人，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沙洲坝，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而张耀祠则在政府门口站岗……他的名字，在“文革”中常被写成“张耀词”，据他告诉笔者，那是江青给他改的，据云“光宗耀祠”乃是“封建意识”。如今，他仍用原名。

毛泽东下榻于一号楼。那是一幢灰顶青瓦白墙的小楼。跟毛泽东的卧室相通，有一套完全一样的房间，只不过卫生间里的澡盆不是白色而是紫红色的，据云那是设计者们为江青准备的。江青却没有来，内中的原因不知是毛泽东不让她来（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江青到长沙，后曾希望去滴水洞，毛泽东劝她“你不要去”[12]），还是江青忌讳到了韶山，当地人总要提起杨开慧。

在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和一位男服务员小周。郭国群23岁，湖南邵阳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从长沙来此照料毛泽东。小周是毛泽东的理发师，也兼生活照料。张玉凤则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随毛泽东来此。

张玉凤22岁，能够成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纯属偶然。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4岁那年，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正遇上铁路局招工，就去试试看，考上了。于是，她成为铁路客运列车的列车员。

1960年冬，铁道部要调一批列车员到专列上当服务员，16岁的张玉凤被选上。这样，她被调进北京。这时的她，还不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

上了专列，她才明白那是首长和外国国家元首乘坐的专门列车。这时的她，每月工资不过32元而已。先是在别的专列上工作，没多久，她被调往毛泽东专列工作。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毛泽东会坐在这趟列车上。直至专列抵达蚌埠，毛泽东跟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张玉凤肯吃苦，工作认真细致。她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了两年之后，一天，汪东兴带她去见毛泽东，这是她头一回跟毛泽东交谈。她的心中颇为紧张。

一见面，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汪东兴见她神情紧张，就代她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她的名字三个字怎么写。说着，拿起铅笔和纸，让她写下来。

张玉凤怕自己的字写不好，就答道：“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

毛泽东手中正拿着笔和纸，就随手记下了她的名字。

头一回的交谈，没几句，就结束了。

张玉凤走后，汪东兴发觉那张写了“张玉凤”三个字的纸上，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汪东兴便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否把张玉凤调至毛泽东的车厢当服务员。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样，张玉凤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张玉凤同时调至毛泽东车厢的，还有一位老大姐。

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张玉凤也就奉命随行。据云，汪东兴考虑到毛泽东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而张玉凤水性甚好，这也是要张玉凤同行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11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和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1966年6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住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13]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6月29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稿，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7月8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现全文照录于下[14]：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引者注）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引者注）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引者注），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指杭州——引者注）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引者注）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引者注），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引

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引者注），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5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注），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此处指共产党——引者注），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

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此信一开头，称“6月29日的信收到”，那是指江青在6月2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谈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此信，是对江青来信的回复，只是江青6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至今从未公布过。

毛泽东此信，纵论20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此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时，最初注明：“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

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此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时，最初还注明：“原件为毛泽东销毁，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文件没有说明，为什么“原件为毛泽东销毁”。

据传，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毛泽东同意了。据称，毛泽东嘱咐：林彪看后，当面烧掉。这样，这封重要的信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

当时林彪正在大连休养。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表示

悔悟之意。周恩来当着林彪的面（一说当叶群的面），用火烧掉了这封长信。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毛泽东当时对机要秘书说，“原稿发出，抄件存档”。据后来看到过这一个“抄件”手稿的徐景贤回忆，“抄件”是抄在“一种直条纸上的”，“抄信人的字迹很稚拙”。徐景贤的回忆录没有提到这位“机要秘书”是谁，经查，1966年跟随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徐业夫。

以上的“据传”，是对“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而又保留了一份抄件的一种解释。

然而，这一“据传”，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1998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性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在收入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时，只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至于“修改件”是否系手稿，没有说明。该书中所收毛泽东其他文稿，倘若是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则必定注明“根据手稿刊印”。而该书在对全信所作的13处注释中，也无一处提及“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这表明，该书编者避开了“原件为毛泽东销毁”这一问题。

据戚本禹回答余汝信的采访提问时说[15]，“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汝信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本禹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汝信问，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本禹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戚本禹是烧掉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回忆有一定价值。据戚本禹的说法，毛泽东致江青信不是周恩来在大连当着林彪的面

烧掉，而是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在江青的住处烧掉的。

在林彪倒台之后，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毛泽东在印发前，在抄件上作了亲笔修改了两处。其中有一处是“他（指蒋介石）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关于这封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由于没有手稿，海外有人以为是在1972年5月为了批林整风的需要，“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而“补写”的。这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罢了。这封气势磅礴、思想深刻的信，远非康生、张春桥之辈能够写出的。

不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在当时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此信确系毛泽东手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是毛泽东晚年极其重要的著作。有人甚至评价说，这封信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个纲领性文件，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

江青点火于北京高校

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16]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了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其实，毛泽东在7月18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17]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 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

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她在7月20日才回到北京，22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7月22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

>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7月23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

革命同学们：

>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翌日——7月24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小组”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

> 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

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

>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
>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
>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应为在青岛入党——引者注）。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
>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
>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
>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
>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
>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江青这人，在露“峥嵘”之际，也往往露“真容”。1966年7月26日，她在北京大学露“真容”，曾使听众一片哗然。

那是前一日——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尖锐地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

仿佛持“尚方宝剑”，江青在26日晚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前往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大操场，“聆听”着他们的演说。会议的主旨，在于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于1966年6月4日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职权——因为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之后，原本以陆平、彭珮云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北大党委也就垮台了。

1996年3月28日，国家外国专家局退休干部时友人先生曾给笔者来信。他说，他是派往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在信中，他这样回忆道：

>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进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
>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点多钟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四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我，并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北大向张承先和刘仰峤同志报到。我连家里人都没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当晚就在礼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由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工作组，形成校、系两级机构。

[image]
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出现在北京大学

才过了五十多天，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陷入了陆平、彭珮云一样的困境！

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清算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种种错误。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声中，侃侃而谈，严

厉批判张承先，批判工作组。

渐渐地，江青激动起来，也就说走了嘴。

江青忽地说起了自己家里的事。据当时的传单所载："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一言既出，举座万人皆惊！

张文秋何许人？怎么她是"政治骗子"？

张少华又是何许人？怎么"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的长女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刘思齐）；次女即张少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之妻。

刘松林与张少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氏，本名张国兰，号文秋。1926年她加入中共时，便在武汉结识毛泽东。

[image]
1986年6月5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原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谈"文革"经历。

1927年4月26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刘谦初也是中共党员。

1931年4月5日，刘谦初死于国民党刑场。张文秋不久产下遗腹女，即刘思齐——刘谦初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所以预先给孩子取了此名。

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

1937年冬，张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怀部将陈振亚。翌年秋，生一女，从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

张文秋颇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陈振亚遇害于新疆迪化。张文秋又生下一遗腹女，取名张少林。

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在20世纪30年代曾采访过张文秋，那时张文秋化名珊飞。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中，其中有一节《共产党员珊飞》，写的便是张文秋。

1949年10月15日，刘松林跟毛岸英结婚，从此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

江青与毛岸英常吵架。江青曾经这样说[18]："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

由于江青与毛岸英关系不好，所以刘松林说，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与刘松林结婚没多久，走上朝鲜战场。1951年11月21日，毛岸英被美军轰炸机炸死于朝鲜。

十年之后，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的消息，传入江青的耳朵，江青大为不快。几年前，江青曾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跟毛泽东大闹一番。眼下，又担心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加强了家中"杨家将"的势力。对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没有王光美那样的胸怀。

江青反对毛岸青与张少华相恋，甚至封锁消息，不让毛泽东知道。江青扣下毛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并烧毁了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19]："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

[image]
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在北京西山（徐肖冰 摄）

无奈，毛泽东赞成这一婚事。知道刘松林要带着妹妹到大连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泽东写了一信托她们带去：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祝愉快！

父亲[20]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对岸青、少华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从中作梗。

就在毛泽东写此信之后，毛岸青和张少华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双倍”的亲家！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的三女儿张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没有三个儿子，没法让你成为我的儿媳妇，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

张少华和妹妹张少林，双双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个在中文系，一个西语系。

“文革”开始后，张少华曾在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上签了名。

正因为这样，江青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点了张少华的名，点了张文秋的名。

在外人看来，江青把家庭内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当众捅了出来，简直不可理解。

在江青说来，她早已恨透张家母女，此时此际借机发泄，倒是完全符合“逻辑”！

江青说“根本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在当年的传单上，还有下面一段文字：

> 在这当中江青同志讲了过程，讲时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未记清，大意是：主席有个儿子，得神经分裂症，让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出来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毛泽东那封给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江青既然“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于是张文秋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家也就成了“政治骗子”！

笔者多次采访刘松林[21]，她回忆道：

> “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放了炮，我们家就倒霉了！
> “少华和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出走。少华被说成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 “北大贴出许多批判我母亲和少华的大字报。母亲没办法，只得带着我两个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战友家，躲避一下风头。
> “我母亲是董老（指董必武——引者注）的学生。董老说，少华怎么会成了‘主席家中的坏分子’？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了！我实在无法容忍。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护了我母亲和少华，这才避免了大灾难……”

还应提到的是，江青跟李敏的关系也很不好。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之后，对秘书说[22]：“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小组”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小组”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1958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16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

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贵宾，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直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6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得热闹起来，才变得名副其实。

就在钓鱼台冷清的日子里，江青看中了这豪华、幽雅、秀丽的国宾馆。“中央文革小组”在15、11号楼，都短暂地办公过。从1967年7月中旬开始，迁到16号楼，此后一直住16号楼[23]。陈伯达住在15号楼。江青先是住5号楼，后来她看中了环境更幽静的11号楼，住了进来。从此，江青的代号为“11楼”。康生也占了一座楼。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此，住在16楼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楼上，每人一个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王力、戚本禹也搬了进来，跟他们共住那一层。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占领了钓鱼台南半部的五座楼，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一时间，“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代称。一时间，钓鱼台和中南海、毛家湾，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小组”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小

组”“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后来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小组”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1967年1月那样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蓬莱，1937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穆欣、王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考虑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担任办公室主任容易分散精力，在1966年12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并责成宋琼组建办事组。办事组成员共有五人，他们是：组长宋琼，副组长陈满池（未到任），成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杨子才、张文荣同时离开“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日常工作由王广宇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有关领导曾口头任命王广宇为办事组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江记班子”。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那是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6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

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8月5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8月5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image]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见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姚文元的大字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释，说明了在当时成为新名词的“炮打司令部”的具体含义。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不同意这样的排列。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这样江青还不满意，又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

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排列顺序变成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

“旗手”的登基典礼

1966年11月28日，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陈伯达发表演说，称颂江青的贡献：

> ……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
>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江青接着作长篇讲话。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养病中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如何去“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然后“才想到要改”，即进行所谓“京剧革命”。

[image]
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言（孟昭瑞 摄）

[image]
“文革”时期江青宣传画

江青在谈及北京京剧一团时，点了一连串的名：

> 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在这里，江青第一次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三旧”。在她的讲话之后，一下子便在全国掀起批“三旧”的高潮。

江青声称：“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谢镗忠还宣布：“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1]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的，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1965年4月7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直至198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2]1990年7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

[3]1990年7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

[4]1990年7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6]自1988年11月3日起，叶永烈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历程。

[7]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8]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枫华园》第432期（2004年1月9日）。

[9]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10]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页。

[11]1991年5月19日，叶永烈在成都采访张耀祠。

[12]据金振林：《毛泽东隐踪之谜》载：毛泽东对江青说：“你不要去，你去了，那里不得安静。那是我要去住的地方。”《花地》1989年5期。

[13]据赵景云：《灵秀聚钟人莫识——韶山滴水洞印象》，1991年1月12日《文艺报》。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5页。

[15]以下戚本禹叙述据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枫华园》第432期（2004年1月9日）。

[16]据《毛主席畅游长江》，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17]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8]据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9]据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

期。

[20]据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1]1986年11月25日、12月17日及1990年7月15日，多次采访刘松林。

[22]据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23]本书初版误为14号楼，经原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指出之后改正。

第十二章　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

崔家的新女婿

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在20世纪50年代，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22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

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80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尽头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作“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194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球炉。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1]。他生于1910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20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1958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1955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

1956年9月，经过在南京集训之后，21岁的王洪文转业了。

王洪文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军官服，手里拿着转业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当时，凭着转业军人、党员的身份，安排个工作不是件难事。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2]。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194号那10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64元，崔根梯每月收入24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王洪文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她便是王洪文的母亲。

王洪文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市郊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长大的。

王洪文的父亲叫王国盛[3]，母亲姓杨，称“王杨氏”。王国盛一辈子务农，耳朵有点聋，家境艰难。

那时农村，崇尚多子多孙。子孙多，家中的劳动力就多。王杨氏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王洪文是她的长子。按照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王家骤添四个儿子，使王国盛异常欣喜。

儿子属“洪”字辈。王国盛给用“文武双全”为四个儿子命名：长子王洪文，次子王洪武，三子王洪双，四子王洪全。王洪文的妹妹叫王桂兰。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当王洪文来到人世，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王洪文出生的前一年——1934年3月，溥仪在长春“登基”，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年号为“康德”。所以，王洪文出生于“康德二年”。

王洪文的童年，是在日军铁蹄下度过的。

王家本来就清寒，加上子女又多，日子过得拮据。长子王洪文七岁，本是到了上学的年龄，却不得不到姨父家放猪。

表兄放学归来，在家中做功课，王洪文在旁边看了几眼，便遭讥笑：“你看得懂？还是放猪去吧！”

到了1945年，王洪文十岁，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长春街头，出现了苏联红军。

然而，紧接着，战火又在东北燃烧。国共两党在东北展开了大决战——著名的辽沈战役。

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部署下，以一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长期围困长春。经过激烈的战斗，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

锦州，长春震动。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一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二万六千余人起义。19日，长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四万七千多官兵投降。这一天，东北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春。

在饱受长年战乱之后，王洪文一家总算过上安定的生活。然而，父亲王国盛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

王洪文在家务农。空闲时候，喜欢钓鱼，给全家增添点鲜活的菜肴。

1951年4月，听说解放军在长春招兵，王洪文前去报名。父亲王国盛最初不同意王洪文参军，因为他已经染上肺病，身体虚弱，而王洪文是长子，已经16岁，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但是，王洪文坚决要求参军，父亲也就只好尊重儿子的意愿，同意他参军。

王洪文参军后，在部队当上了通信兵。

王洪文参军前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王洪文参军之后便随部队前往朝鲜作战。

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相当艰苦，对于王洪文来说，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王洪文在战场上的表现大体上是可以的。

不过，王洪文也显露出一些缺点。比如，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散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当场跟协理员吵开了。

王洪文在朝鲜作战三年，爬冰卧雪，冲锋陷阵，毕竟坚持下来了。

他戴着大红花回国后，从士兵升为军官，而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出身贫苦农民之家，从1951年4月到1956年9月又经过五年半部队生活的锻炼，而且又是中共党员，这成为王洪文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就在王洪文有了点“出息”的时候，劳累了一辈子的父亲王国盛，却在王洪文参军后的第三年，受肺病的折磨，在长春去世。王洪文曾赶回长春，伤感地大哭了一场。

虽说转业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10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文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

那是在1960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共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1960年10月5日，王洪文无奈地踏上驶往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滩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

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病”，“病”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科长梦的破灭

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1964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转业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4]。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公安部门认真负责地替他寻找崔根娣的亲生父母。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阵惊喜！不过，见面之后，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亲生父母也很穷。正因为穷，才把自己的女儿送人。

每当回到拥挤的小屋，王洪文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买不起酒，借烟解闷缺烟钱，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钱！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

那时的他，“升官”的目标，不过是做个科长罢了。

正当王洪文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使他好梦破碎，恼火之极。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四清”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经济”的时候，有人向工作队反映：

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棉布做的，显然是偷的。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时，用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是从厂里偷去的。

在外宾走后，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

有人看见，王洪文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

最使王洪文难堪的是，有人要他当场把穿在里面的衬衫脱下来，弄得他的两颊涨得绯红绯红的。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声名狼藉，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检点，反而倒打一钉耙，心中燃起一股对厂党委的怨恨之火。

他也恨“四清”工作队，还有那个向厂里揭发他偷拿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组长余凤珍[5]。他是一个报复之心很重的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1966年6月12日上午10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6月1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点燃起来了。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6月11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

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虽说王洪文“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王洪文，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琢磨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

自1966年6月1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而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在上午10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11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保卫科事件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6月16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6]手里。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卿卿我我也被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清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小屋坐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8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那是6月19日晚9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9时45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1966年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6月30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像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从7月7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7月7日至7月19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7525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炮轰工作队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1966年7月20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7]，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1958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1964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

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6月3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6月8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7月19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7月20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1966年8月9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8月8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一场“竞选”开始了。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8]。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1936年，18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200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但余凤珍在1977年4月12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1958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1965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
>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像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
>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
>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
>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1973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

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北京小将”鼓舞了王洪文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更为迅速。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横批是“造反请进”。

[image]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被印刷成宣传画广为传播。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1966年8月18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30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真不巧，王洪文31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1966年8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时间：1966年8月29日。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9]，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700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怕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9月3日清早7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上午10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10时14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

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荻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荻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

“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荻秋！”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显然，1957年的老经验，被用在1966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

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9月4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千余人。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

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9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

带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

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1966年10月5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琢磨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琢磨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17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第13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第13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红旗》第13期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1988年3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1966年8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

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第13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名词，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两天之后——10月7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大字报指出：“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10月11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

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拔腿溜了。

王洪文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10月13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15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10]。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10月10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10月11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惹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19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14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10月12日，下午3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115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14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时，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10月14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15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222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像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10月18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10月18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10月18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

>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

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image]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孟昭瑞 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10月18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1966年10月18日下午1时20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18日下午1时20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image]

1966年10月17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孟昭瑞 摄）

成为“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头头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10月14日到10月24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10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14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10月25日晚上8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10月26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

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18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10月24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11]。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

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啰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

“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10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10月27日凌晨3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8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12]。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屉……

斗争，日紧一日：

10月29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副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11月1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11月4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

向社会了。

王洪文结识王秀珍

上海延安西路200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在中国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1966年10月28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30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image]
前排左起：张春桥、王洪文、王秀珍。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1934年11月17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14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1950年3月，16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1952年9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18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她只在11岁至13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

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1956年8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

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身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　苏福金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五分，两门四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1960年8月，24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

她上中专之前，在1956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79元3角。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1961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79元2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在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1966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1966年6月11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飙。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11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像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1966年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像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骜不驯的造反派，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200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果真，10月29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11月4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8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11月6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13]。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8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在当时并称为“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当时相传他原名包得福，后来他自述原名包常甲，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14]。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工人，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又据传他的母亲，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乃康生也。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包炮当时带着中央美院附中的两个学生李永存和武晋安一起来上海，住在上海音乐学院。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小组”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1939年5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于是，11月1日至4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1月5日——星期六晚7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上海愚园路311号“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

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就这样，在11月6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王洪文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钳工）

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工人）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黄金海（车工）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化验工）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谢鹏飞（锻工）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上海八二二厂岑麒麟（技术员）

……

到了下午3时半，来自17家工厂的30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像个学生，20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佩戴“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17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工人”。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转业军人”、“保卫科干部”。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包炮后来回忆说[15]：

> 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扛过枪，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当保卫科干部，年龄比较大。所以那天的倾向性，我觉得应选王洪文当工总司的头。因为这个会是我拉起来的，我总要找一个可靠一点的。当时会上也出了点意外，岑麒麟竟然先拿出一个什么图章，大家马上就要把他抓出（起）来。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人，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23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既把“司令”当，便把令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荻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image]
红卫兵袖章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11月9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691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人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工总司”深夜抢红布

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11月6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25号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买布！”

“半夜来买布？”

“买红布，做袖章。”

“明天来买行吗？”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据黄金海称，众哥们之中，有上海保温瓶二厂的范佐栋、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等人。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匹红色府绸。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荻秋。他马上说：“我

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荻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儿们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批发仓库。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这时，已是11月7日凌晨1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

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大受鼓舞。

11月8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扬扬，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王“司令”忙得团团转：

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

忙着审看“宣言”、“海报”；

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

忙着安排大会发言；

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image]
曹荻秋

上海市区西南，15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个大字。这座建于1936年的大型宾馆，坐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他原名曹仲榜，号健民，1909年8月2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早在1929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1931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1931年3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1932年3月17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1937年8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1939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1955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1965年4月，柯庆施病逝，曹荻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

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

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
1966年11月7日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荻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11月8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曹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本，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2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最后通牒”的时间——11月8日下午2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

上海上空乌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

11月9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上午10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像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

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像一锅粥。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的发言稿，慷慨激昂：“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这时，台下的“永忠队”队员们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施惠珍！”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

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

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三十多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已经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我不代表市委！”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像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晚上9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夜，10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恪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凌晨2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琪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有人质问张琪：“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张琪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张琪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曹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

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1]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采访崔家邻居余凤珍。

[2]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采访崔家邻居余凤珍。

[3]据王洪文的大弟弟王洪武说，其父亲叫王国胜。

[4]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5]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余凤珍。

[6]1986年10月27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王有富。

[7]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8]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余凤珍。

[9]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0]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11]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2]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3]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14]包炮，现用艺名包泡，雕塑家，曾参与毛泽东纪念堂、中国抗战纪念馆的雕塑创作。

[15]据金大陆、金光耀：《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世纪》2012年第3期。

第十三章　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车停安亭

往昔，张春桥和姚文元坐在上海，望着北京。如今，他俩坐在北京，望着上海。上海，毕竟是他们经营多年的“基地”，万万不可因为做了“京官”而丢了上海。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私下里庆贺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周年的日子里，从上海传来“特大喜讯”：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也就在11月10日这一天，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率领两千多名上海工人截车北上，要进京告状，被堵于上海远郊的安亭车站。工人“造反派”切断铁路交通，发生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但她托付给了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120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800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396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时，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时，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清晨5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呜”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10日晚23点发车，这未免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7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7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8时17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10时10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趟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王洪文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报告给曹荻秋。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惑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11月10日中午12时2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戴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小组”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1]：“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小组”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image]

安亭事件的见证者、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叶永烈 摄）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

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辞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20小时21分[2]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3]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

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发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小组'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11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image]
陈伯达（左一）与红卫兵在一起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4]，告急电话最初是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就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陈伯达当即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

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像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小组’！”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小组”？

陈伯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像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忡。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1966年11月11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穿云南来，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军人。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亭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回忆说[5]，他当时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

笔者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据他回忆[6]，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浓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对于张春桥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

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11日夜10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韩哲一抢先一步[7]：“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韩哲一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另一路人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代表江涛也在机场等张春桥。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江涛，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江涛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亭。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江涛提醒司机道。

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一个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的红卫兵，第一个跟张春桥握手。江涛介绍说，此人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包炮。

多年之后，包炮回忆说[8]：

> 工总司开成立大会是在文化广场。那天有几个事。一个是保守派去了，会场乱糟糟，后张宝林出来控制会场。那天会场很乱，发生抢话筒的情况。王洪文基本没有动静。主持会的是潘国平。会议闹到最后的时候，曾经全体去过市委，在市委待了一会，结果没有人出来接待，那么就往火车站去了。这个决定我和王洪文，还有潘国平都是一致的。
>
> 到了火车站我们三个人都上火车了，但不是一个车厢。到了安亭之后，因为大家已经一天一夜了，没有水，没有吃的，我记得后来送去的面包都是长条形的。结果火车一停大家就气愤，所以我觉得安亭事件我要负责。火车一停里里外外都是人，而且大家在煤堆那边辩论，我一看辩论就跑过去了，朝煤堆跑的时候我就摔倒了，结果把膝盖给摔破了，缝了几针。当时我跟张春桥见面的时候，我是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

包炮1940年出生于长春，而王洪文、王秀珍也都是长春人，所以特别讲得来。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楼上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尔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11岁，是个干

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潘国平代表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这是包炮与王洪文、潘国平事先商量过的：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潘国平、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潘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3点，应该说是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囔囔，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

后来，包炮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9]：

> 江涛陪着张春桥到安亭，就把我、王洪文、潘国平找去。江涛没说什么话。第一次和张春桥是在安亭的无线电厂谈的，我们积极地和他辩论。我记得是在楼上，那时吃着包子，这我记得。我认为主谈的是潘国平，一切主事当时是潘国平。我是拿主意（的），这点我自己清楚。潘国平起草了五条，我肯定是明确这个态度，而且支持这五条。张春桥到安亭是半夜，谈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我和潘国平、王洪文、张春桥在车上对话，内容就是要承认那五条，不能回去。这点潘国平是很有条理的，因为当时你要是不承认这是个革命组织、革命行动，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当时赤卫队还在的，回去之后工厂里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记得陈伯达电报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点。张春桥当时基本同意了这五条。在这点上，我同意张春桥的，叫他们先回去。王洪文在整个安亭事件里是不抛头露面的，很小心。从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到安亭事件，潘国平起着主要作用，再到签下这五条。当然，后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王洪文。

王洪文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12日上午8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响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顿时，“向中央文革小组学习！”“向中央文革小组致敬！”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

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王洪文昆山历险记

12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张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像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诉”，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10]，21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1964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分？”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分——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王“司令”手下，正缺“成分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是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恃无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闲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工总司’在安亭闹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多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到了这不寻常的双重身份。虽然他的意见受到

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小组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

特级报导

11月13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11月9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时，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糨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传单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十一月十三日”。

现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逼去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十一月十三日

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

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image]
张春桥在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五项要求上签名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他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

张春桥呢？他在1966年12月23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11月13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image]
1966年，陈丕显在上海西郊宾馆。（陈东棋 摄）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敢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分！报成分！”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分”。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分”。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分”比别的“候选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11]：“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5岁死了爹，8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1949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分”之后，全场轰动。像他这样“红透了”的“成分”，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11月13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像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12]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

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订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账，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

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1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中共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小组’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接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13]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1966年12月23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11月16日，张春桥在苏州对上海“工总司”部分工人发表谈话时，这样谈及陈伯达的电报：

> 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即电报——引者注），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通通在电

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

同志们提出的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结果，请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来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一些意见，我还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

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14]，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认识，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显然，能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对双方作出裁决的，唯有毛泽东。

11月16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支持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安亭事件”成为张春桥和王洪文勾结的开始。陈伯达在晚年曾经这么回忆说[15]：

> 上海安亭事件，虽然当时王洪文等来北京未成，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消极作用，使张春桥获得同王洪文结合的机会，搞了一个所谓“一月风暴”，夺得上海的权力。
>
> 随后张春桥又把王洪文引到北京。我有一回在大会堂，走路时碰到他们，张春桥介绍了一下。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种种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估计江青必然会同他见面。
>
> 在九届二中全会一个比较大的批判我的会上，张春桥同王洪文坐得很近，我离他们不远，我听到张春桥轻声跟王洪文说道：“他（指我）那次给上海写的那张传单上，就是唯生产力论。”王洪文笑着点头。

王洪文在各派纷争中剪除异己

王洪文笑了。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从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16]，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摩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41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分”，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都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17]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一旦这个“联合兵团”崛起，必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兵团”的头头们也自封“司令”。虽然他们都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戴祖祥一怔。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18]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在“工总司”内部剪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稳定“后院”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个“司令部”里忙碌着。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永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令’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

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19]。

“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

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20]。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他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那是1966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16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45岁的女人，在1966年6月1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image]
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17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1966年3月4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

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珮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

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放炮”的依然是聂元梓。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聂元梓所说的“花园街×号”，也就是花园街一号，“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所在地。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四人帮”兴亡〉读后》一文中说，W就是他。王广宇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 大约是1966年11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王力把我叫去（关锋也在场）。对我说：“我们获得可靠情报，聂元梓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保护‘左派’的骨干力量，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王力又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可以暂时把聂元梓接到那里住几天，那里比较安全，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他说：“告诉聂元梓今晚必须离开北大，她如果有什么重要材料，怕丢失可以随身带来。”
>
> 王力叫我马上就去找聂元梓，把她接到花园村一号。
>
> 我立即要车赶到北大，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保护她人身安全的决定。聂元梓说：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但她要求回家取点随身生活用品和重要材料。我同她一起去她在北大的宿舍。她进里间卧室收拾东西，我在外间等她。她磨蹭了半个多小时也不出来。直到她的十几岁的儿子回家，她才出来。然后，她对我说，她要找的材料没有找到，还要再找，另外还要把孩子安顿一下，今天晚上先不和我一起走了。我提出担心她今晚不离开家不安全，她说她今晚不住在家，一会儿她就和她孩子去她姐姐家，对聂元梓突然变卦，我也无奈，我不能强迫她必须当晚离开家。

我们商量好，明天早晨八点钟我来接她，我提出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她还让我来她的宿舍接她，我只好回钓鱼台向王力汇报，王力听后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聂元梓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不要去她家接她了，她已经进城了，让我到沙滩中宣部图书馆楼前接她。八点我准时到达中宣部图书馆楼前。聂元梓已经在图书馆楼前等我。我看到她正和中宣部的阮铭一起谈话。她让我当着阮铭的面把她接走。聂元梓违反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行踪要保密的要求，她向阮铭透露了她的行踪，暗示中央文革小组把她接走了。

又据王力回忆，保护聂元梓的指令来自毛泽东、江青：

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11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让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快报组（花园村）。下半夜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的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电话。……

在花园街一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交代说：“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那中年女人，戴着眼镜，便是聂元梓；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

这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他们动身之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给“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打了电话：“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梓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

宾馆，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100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当天，在“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聂元梓提出“打倒曹荻秋”的口号，问张春桥可不可以？张春桥说可以[21]。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对于王洪文来说，1966年11月21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应王洪文之邀，她当天出席了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11月22日，"工总司"和"红革会"（全称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全称为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像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11月24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11月25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梓，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她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知。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卫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保镖”的自行车。这时，“保镖”既成了她的“两轮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她秘密地“下榻”于华东师大，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的猛攻势。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上海“赤卫队”的崛起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千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又一绝密情报：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22]，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38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作“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1928年1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想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11月26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1000匹，号称拥有80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安亭事件真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诉》。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沓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爆发《解放日报》事件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11月29日晚10时，三百来名戴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9期了。

在第9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9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9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于延安，1947年3月27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1949年5月28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27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9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红卫兵们磨到30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

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9期夹在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谈判僵持着。

大批印好的30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在30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12月1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300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12月2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赤卫队”也出动了。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一、《红卫战报》第9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文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因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弩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从12月3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23]、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12月10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沪委（**66**）第**12**号通知

现将曹荻秋同志12月10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1966年12月10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

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就在曹荻秋签字的翌日——1966年12月11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60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戴着“工总司”袖章。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只差胸前挂副望远镜、腰间别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登上主席台。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
>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
>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

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戴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戴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王洪文意识到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站不稳脚跟。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时间：1966年12月6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11月）25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们25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一、要罢张春桥的官；
二、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三、炮轰上海市委。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的人数——引者注）。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小组”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要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两军对垒争夺上海

“工总司”与“赤卫队”原本旗鼓相当。但1966年12月18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捉刀的。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11月28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绉绉的新口号：“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指“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赤卫队！”

“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小组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12月25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1966年12月26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24]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12月20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但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处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27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25日"赤卫队"召开总部委员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12月27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远，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间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都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住着上海党政要员。柯庆施、张春桥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账"，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拨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

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28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25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23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29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29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像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账：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像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1943年秋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12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

另外，在1963年“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文静在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承认自己有过叛变行为。

文静在《干部履历表》的“何时何地被捕、被俘过，经过情形及表现如何”一栏中写道：

> 1943年12月8日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担任区委宣传委员，日寇大扫荡中被俘（在园坊村）负伤。由平山被压（押）到石家庄，先在石家庄日寇司令部，后解到日寇1417部队，在监狱中关了半年，后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

与文静同时被捕的王晓初（汪雨菲）在1976年12月26日写道：

> 我叫王晓初，河北平山县人。1943年投敌，1944年春被扣到日寇驻石家庄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第一四一七部队，与李淑芳关在一个木笼里。后来我们一起参加了宣传班，日本矢野中尉宣布李淑芳为班长，为敌搞反共宣传，积极编写宣传材料，记起的有“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她还为敌出谋划策，搞策反宣传。李亲自讲演，宣扬“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谩骂共产党、八路军，作过广播宣传，与日寇中西少尉秘密外出散发传单。她参加了日寇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对日寇抓捕的我方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女干部，她总是对日寇说这个是废物，说那个思想不良，而被关进木笼。由于她忠实为日寇效劳，受到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称赞，称她是“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给她的薪金多，待遇也高。

[image]
文静在1963年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承认自己曾经叛变

此外，天津市公安局在相关材料中也写及：

文静于1943年12月8日被捕，被捕前担任中共平山县郭苏区委员会宣传委员。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几位女同志。

文静被捕以后变节投降，被日本侵略军编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石家庄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1417部队，归日寇宪兵中尉矢野一郎管辖。文静在变节期间，为侵略者撰写大量反动宣传文章、为日军的侵华行为做辩护，鼓吹“中日满、永亲善”，她不仅在电台上播音，还参加演出，主要反动作品包括《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

陈丕显也说[25]：

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

我长期负责上海市委干部组织工作，还兼管过审干领导小组组长，非常熟悉李文静历史问题，多次提醒柯庆施，但柯庆施就是不听。

文静在1963年就亲笔写下自己“叛变了革命”，可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条“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俨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18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

就在这一天（12月28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

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危险道路。

……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12月29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12月29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注：柯庆施夫人）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调查：

29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100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60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1966年12月30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多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 30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30日下午5时45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80多人中，有70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时里，26列客车停开，5万多旅客无法上车，5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38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

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240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负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26]，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被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24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1966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

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1]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2]据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于1979年12月8日提供的证明材料称，14次列车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4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3]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4]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5]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6]1988年12月16—18日，叶永烈在北京多次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7]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安亭事件重要当事人、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

[8]据金大陆、金光耀：《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世纪》2012年第3期。

[9]据金大陆、金光耀：《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世纪》2012年第3期。

[10]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1]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12]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3]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14]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15]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

[16]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17]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8]1988年4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宝林。

[19]1988年4月7日、11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施惠珍。

[20]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21]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6页。

[22]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采访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副主席马骥。

[23]1988年8月2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韩哲一。

[24]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25]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26]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马骥。

第十四章　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张春桥选取了“砸烂”常溪萍作为推倒中共上海市委的突破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1966年7月25日晚，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64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6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

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17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回燕南园64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连忙赶到会场，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1979年9月24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17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1966年11月24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道：“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头，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
>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指导”下，聂元梓等七人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开了北京大学这个缺口，导致6月3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珮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6月4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刀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荻秋，叫曹荻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荻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荻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荻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image]
受张春桥迫害的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夫妇

1971年6月14日，曹荻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1966年7月25日晚间，北大师生开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26日见到康生，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荻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荻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8月1日上午8点多，糜欣祥挂了电话。很干脆，将近11点，邓小平的秘书就来电话，请曹荻秋马上去中南海。

曹荻秋立刻赶到邓小平家。

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邓小平对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情况十分了解，干脆利落地作了答复。

曹荻秋回忆道：

>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
>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
>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儿传到江青耳朵里。

江青恼怒了，说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曹荻秋写下这样的回忆：

>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当时在侧。他于1977年6月11日也写下这样的回忆：“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荻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荻秋说：‘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只得嘱咐秘书：“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把情况告诉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就这样，本来在那年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盛行，谁都可以刷一把糨糊，贴一张大字报，而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却要牵动那么多高层人物，要借“中央文革小组”的“虎威”，转到上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充满着火药味儿。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毛泽东还公布了他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从此，红卫兵运动如潮如涌，在全中国卷起狂澜。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诚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

动的标志。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8月12日，曹荻秋收到了张春桥的一封亲笔信，所谈的又是关于常溪萍。全文照录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江青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张春桥也说“不然很被动”，如出一辙。显然，他们私下商量过怎样整常溪萍。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把来自北京的信息转告上海市委的常委们，常溪萍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议了对策。如同杨西光所回忆的：“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们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后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又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么会成为聂元梓的眼中钉、肉中刺？怎么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必欲置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那时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1965年1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张磐石，正坐在他的办公室——北大专家招待所里，皱着眉头，翻阅着常溪萍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看罢，他提起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右”字！

张磐石和常溪萍本来素昧平生，只是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张磐石对常溪萍的印象是：“开始还以为他是稳，其实是右！”

张磐石和常溪萍在对待北大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起逐步在全国展开。最初，在农村叫“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社教运动走过了曲折的路——1964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运动的面越来越宽，从农村扩大到工厂，到学校。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大学中的社教运动试点单位。1964年11月，党中央从各地高教部门调集了200多名干部，组成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上海当时共有24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级、一名处级干部，作为北大社教工作队员。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带队。到了北京之后，工作队成立党委，设一名书记、四名副书记，常溪萍是副书记之一，兼北大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张磐石和常溪萍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来，张磐石太“左”；在张磐石看来，常溪萍太右！

他们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身上。张磐石要把陆平打成坏人，而常溪萍则认为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

在一年多之后，由于北京大学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轰击的单位，陆平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常溪萍和张磐石当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分歧，也就随之成为众所瞩目的大是大非。

陆平经过十年磨难，得以幸存。1981年10月，陆平写下一段对常溪萍的带泪的回忆：

> 1964年冬，社教工作队在北京大学发起社教运动，把北大当作“烂掉了”的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使北大陷于半瘫痪的状态。乌云笼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们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压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随时可能遭到无情的打击，被打成所谓的“敌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相识的。
>
> 大约在1965年1月，北大党委办公室通知我，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识，对他还不了解，加上社教工作队在北大的错误做法，不能不使我对谈话怀着很大的疑虑。
>
> 我和溪萍同志谈了两个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地一一作了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他始终认真地倾听并提出许多询问。在有些问题上，他还与华东师大作比较和分析。他总的认为，这些年来北大党委是执行了党的教育路线的。同时也有若干缺点错误，甚至有的是严重的，但成绩仍是主要的。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北大多年来的工作公正的历史评价。我从谈话中切实感到溪萍同志观察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态度是和蔼可亲并允许别人讲话的。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压人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别。我起初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并对他敢于顶歪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行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陆平所说的“钦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张磐石。

1965年12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书记张春桥作了汇报，着重谈了他与张磐石之间的重大分歧。

杨西光1977年6月6日所写的回忆材料中说：

> 那个时期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确实很主观，作风上也独断独行。我在1964年在北京和张磐石一次谈话中已经感到，后来也陆续听有些同志谈过……1965年春节常溪萍回沪后，首先向我汇报，我相信常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市委是我和张春桥共同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约了张春桥一起听常的汇报，当时张春桥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见，我们一致意见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条”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中间提，也可向组织反映。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没有讲过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么不同意见。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学后，于3月4日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信中说：

> 昨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对北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批评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小平同志说：“运动一开始即应三结合，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北大运动要总结。总之，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被斗得神志不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陆平犯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搞得万里见了陆平要躲开，把市委放在一边。同意市委帮助北大党委总结过去工作的方法，这方法很好……”……如果张磐石等老是这样，我想向中央写信反映一下（他们自以为是很严重，有许多做法很不对头，作风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决定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写信。

张春桥拿起铅笔，在常溪萍的这封信上开头所写的“春桥同志”的“春”字上，画了个圆圈，表示他已“圈阅”。这是当时领导层中流行的办公习惯。

张春桥还在信的天头上写下批语：“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

常溪萍终于发出了致邓小平的信

常溪萍着手起草写给中央的信。

他毕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3月4日的信，尚未见到复函。他有点焦急，在3月11日又给张春桥、杨西光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他除了谈了张磐石最近如何抵制邓小平的意见之外，还重申了他要给中央写信的决心：“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见，基本上都遭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但，我想，应当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否则会犯自由主义，不知可否？请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个着重号，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急如焚。

张春桥又拿起铅笔，在“春”字上画了一个圆圈。

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聚集在康平路会议室里，研究常溪萍的两次来信。

杨西光很详细地写及这一过程：“常溪萍对北大运动有些意见，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张春桥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同意他这样做。为了更慎重起见，我们还把常信的内容向市委书记处所有成员汇报了。在一次书记处办公会议上，由陈丕显同志主持谈了一下，都认为按照组织原则，常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写信反映，也可以向有关组织口头反映。在工作队内部可提出问题是我和张春桥与他个别谈话时也已告诉他。这样，我就通知当时教卫部办公室负责人邱敏珠同志把市委的意见告诉常溪萍了。”

张春桥对于常溪萍给中央写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这是有着确凿的人证、物证的。

常溪萍是一个组织观念颇强的人。他在征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后，找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万里的意见与他一致。他又找张磐石当面交换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张磐石与他如针尖对麦芒，怎么也谈不拢，没有商量的余地。

考虑再三，常溪萍终于在3月17日，写定致中央的信。考虑到中央是邓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虑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考虑到陆定一是中宣部部长、张子意是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常溪萍的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彭真、定一并子意同志：

> 我向中央和宣传部反映一个情况。
>
> 张磐石在领导北大的社教运动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对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错误态度和做法……

这里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建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常溪萍在信中批评了张磐石的一系列错误，肯定了北大陆平、彭珮云、宋硕的意见。（请注意，一年多以后，聂元梓等七人抛出的那张震惊全国的大字报，标题便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3月19日，常溪萍发出了这封观点鲜明的信。

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见常溪萍，他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万里也向邓小平反映了意见，与常溪萍的见解一致。

万里曾回忆道：“我曾在中央书记处会后，将我召开北大系总支书记会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其中把张磐石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邓问我常溪萍怎样？我曾向他介绍常是正派人。”

3月30日，邓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语：“我看张磐石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就在邓小平作了批示后不久，张磐石被调换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一位同志担任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这样，北大社教运动“左”的倾向得到了纠正。

对于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七个多月的工作，万里曾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 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
> 在北大社教期间，我跟小平同志说过，张磐石把北大社教运功搞得很不好。
>
> 常溪萍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张磐石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写得很好。
>
> 聂元梓把陆平说成是坏人，而陆平是个好同志，聂元梓才是混入党内的坏人。

常溪萍同志就是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

正是因为常溪萍“坚持党的政策和革命路线”，秉公直言，向邓小平等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聂元梓把利箭对准了他。

聂元梓等17人的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经“中央文革小组”转交，终于在上海市委教卫部和华东师大同时贴出来了，一时成了上海一大“新闻”。

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担任党委书记达十年之久，工作踏踏实实，在师生中享有颇高的威信。

刘佛年教授对他的印象是：“我初见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着很朴素。他仿佛对个人生活很不关心。身上一年四季总是几件旧衣服。共事十多年，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添过什么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师。”

华东师大党委干部姚柞训记得：“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住在他的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经常发现常校长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运动期间只睡三四小时，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

夏鹤龄、孙殿林等同志回忆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常溪萍同志每天是这样工作的：清晨，他打扫自己包干的垃圾箱，然后来到共青操场，和同志们一起做广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会议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学一起听教师讲课，或者到系里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午饭的时候，我们又经常看到常校长在食堂了解情况；下午，一般是他学习、办文或开会的时间。到下午4点半，他总来到共青操场或文史楼旁的操场和师生们一起打球；晚饭以后，常校长又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

膳食科冷海天记得：“学校里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亲自撑船，把烧好的姜茶送给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动。”

司机庞学友则记得[1]：“在汽油供应紧张的年月，常校长为了节约汽油，宁愿骑自行车去嘉定看望同学，不坐小汽车。后来，他学骑摩托车，想不坐小汽车，结果摩托车摔在沟里，他断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哗啦啦飘的那些日子，尽管人妖颠倒，尽管常溪萍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从师生们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还不那么容易。

在“文革”初期，华东师大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并不多。揭来批去，无非是些“大路货”：《常溪萍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推销员》、《常溪萍抓卫生、抓篮球为了什么？》、《常溪萍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常溪萍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这些大字报不仅标题一般，而且内容也空空洞洞，无非开头引几句语录，中间举几个例子，结尾喊几句口号，如此而已。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却如重磅炮弹，在华东师大炸开来了！

不过，虽然爆炸的冲击波过去之后，常溪萍的脸上只落上一些灰尘，并没有被抹黑。因为那张大字报，除了一连串“黑帮分子”、“政治投机家”之类大帽子之外，并没有多少足以动摇人心的货色。它的冲击波，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和作者“聂元梓”在当时所享有的特殊名声而已。

一阵风过去了，华东师大又恢复了平静。

再轰！聂元梓在1966年9月20日，再向常溪萍发射一炮：还是17人签名，写了第二张大字报，题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千把字。这一回，洋洋数千言，竭尽诬、骗、骂之能事，硬给常溪萍安上了个“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颗炮弹的冲击下，华东师大师生对常溪萍的态度起了变化，分化为“反常”和“保常”两派。

“反常”派唱着聂元梓的调调，咒骂起“大叛徒常溪萍”来了。但是，“反常”派毕竟只是少数派。“保常”派占多数，高举“心向党”大旗，跟少数派论战。

平静的校园里起风波了：这边，“鬼见愁”战斗组的大字报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径”；那边，“天安门警卫连”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好人犯错误》；紧接着来了个“刺刀见红”战斗组“刺”向了“天安门警卫连”；“红色钢铁”战斗队上台了，跟“刺刀见红”来了个“刺刀见红”。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中文系四（3）班“红旗”战斗队贴出了《一论常溪萍》、《再论常溪萍》、《三论常溪萍》这样的“系列”大字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幸亏当年大字报的底稿尚在，现在读来，时隔二十年，仍颇为感人。

这是“红旗”战斗队在1966年10月3日贴出的批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以理服人，写得很有水平。

> 常溪萍是大叛徒，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了。
>
> 他们说，常溪萍在给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办公

厅秘书室的同志的谈话，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的看法是，向党的上级机关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意见是每一个党员的权利，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有的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告密”，是毫无道理的，极端错误的。

这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的。根据党章规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这样的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也有这样的权利：“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有些人竟把这种党员的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称之为“告密”，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看待我们党的领导机关的？

聂元梓的第二张大字报，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点焦急了，咒骂华东师大是“常家王国”、“常家王朝”，咒骂常溪萍是“常霸天”。

骂也无济于事。华东师大的“保常”势力“顽固”得很哩！

终于，江青电召聂元梓来到花园街×号；

终于，聂元梓坐着软卧专程来沪“揪常”；

终于，华东师大校园里出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写“打常”，不可不写那个“狗头军师张”。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11月11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回到上海。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

11月24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 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过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干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

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
>
>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
>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三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

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

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陆、罗、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又“但是”起来了：

> 但是，在那个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
>
> 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
>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作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
>
> 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
>
> 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事情，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11月8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撤了队长张磐石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许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1965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致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的巨幅标语。

“反常”，一切反常！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

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深谋远虑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1966年11月29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丁学雷”和“罗思鼎”要出马了。

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丁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即朱永嘉。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徐景贤出狱之后，笔者也与他多次见面。

[image]
徐景贤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作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8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1904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1917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1921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1926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值中国处于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22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子，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1927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42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1928年4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1928年4月7日，上海《申报》第3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蓬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1928年8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1933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触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1957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20来年的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柯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工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柯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柯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

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1964年3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1965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竟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眼看着陈丕显、曹荻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形势不断吃紧。1966年11月25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27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28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小组”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小组”，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1966年12月12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荻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命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绉绉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12月18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篷一（聂元梓于16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造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

1966年12月18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卫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卫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共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1970年12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1966年12月18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25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image]
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

第二次，是在1971年1月15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1980年11月27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 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
>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狗头军师”的伎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本来，虽然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度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12月30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

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上海不可能属于陈丕显”

“当，当，当……”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1967年。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2]，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那是五天前——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寿辰。“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

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沪宁线上，57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

黄浦江，100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40多万吨；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

拥有60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80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疾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1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账，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凌晨3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3]。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这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胜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相继到会。

会议开始了。自1966年3月因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跟他说的话：“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账。你的账，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

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就拂袖而去。

张、姚从幕后走到台前

1967年1月3日夜，北京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吉普车，载着四五位男子，驶入报社[4]。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25岁的陈阿大和18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个“小廖”，就是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5]。

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前一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王广宇挂了电话。据王广宇回忆，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等人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张春桥同志接见。

王广宇向张春桥报告了聂元梓的电话内容，张春桥答应接见，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让王洪文等主要负责人来谈就可以了。时间定在当天晚上，新任办事组长宋琼将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

当天晚上，王广宇乘坐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个人，一起乘车去解放军报社。

据王广宇回忆，王洪文等人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了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运动中的情况，介绍各派头头的能力、优缺点、威信以及在运动中方向是否正确之类，也谈了和“走资派”斗争批判资反路线的情况。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奉毛泽东之命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姚文元原本是张春桥一手提拔和倚重的。从这时起，张姚成为上海的共主，张姚在许多场合总是一起亮相。当然，在张姚二人之中，张春桥永远的第一提琴手，姚文元则听命于张春桥。

10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簇拥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2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622弄7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2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2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image]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开会庆祝夺权成功。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上海的局势剧变。

1月5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1月5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这张传单指出：

>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

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11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

草稿经过修改，在1月3日印出初稿。

1月4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11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1月4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1月5日头版版面。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自从1月5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1月6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呵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亭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用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像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四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今日的青年读者可能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照录原文于下：

第一号通令

>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荻秋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

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〇”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1967年1月6日

第二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〇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1967年1月6日

第三号通令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1967年1月6日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

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紧急通告》的诞生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摩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1967年1月8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9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

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 此致　上海市委
>
> 要求者代表
> 蒋××
>
>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1966年12月26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像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1967年元旦到1月4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令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使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

风”，又是“走资派”们倒霉——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9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到会的共有35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6]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朱永嘉这位“秀才”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10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了。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35个造反派组织，只有32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32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1月10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1月8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上海“工总司”成了全国“光辉的榜样”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

>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了反，《解放日报》6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
>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1966年6月1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
>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
>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
>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

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1月9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位置，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全国震动了！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

扬，产生的“反馈”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画上了等号。

1967年1月12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1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抬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像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当当响的“左派”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

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1月11日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1月8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

1月11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

1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1月10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1月6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1月6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

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1月12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1月4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的：“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份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讲话：

>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

>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32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1月4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1月9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把右手举到帽檐，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来到

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这是昨夜11点，在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文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1月14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二兵团”耿金章宣布上海“夺权”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1月15日凌晨3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11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清、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7]。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1967年1月5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工总司”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便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即《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1月6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急告全市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1月8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20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都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1月9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表示“知道了”，并没有太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

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1月12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对于耿金章[8]，张春桥不像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像夏天吃了冰淇淋似的，怪舒服。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好，我马上就来！”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5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春桥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5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慢条斯理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

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

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11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耿金章像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言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色。“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1月22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工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月25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特大号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24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25日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

那是24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23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特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了一场“炮

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迎接上海“最盛大的节日”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1月12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

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1月15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王洪文心领神会。

1月19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趟：“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剩下来的38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姚文元还报告道：“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第一，毛泽东在1958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1月24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

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1月25日。

可是，1月25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那是因为1月24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23颗大印！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斗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嘭、嘭、嘭、嘭、嘭、嘭……

1967年1月24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臂上佩戴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戴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23颗木头疙瘩。“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23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1月25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按张春桥的指示，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行吗？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1月26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干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嘭、嘭、嘭、嘭、嘭、嘭……

1月27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23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了？”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1月28日凌晨又响起一阵嘭嘭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18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车，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打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喷去。“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中央文革！”

“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落入那幽静的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如坐针毡。他，从“狄克”，到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到为“女客人”抓“样板戏”，到批判《海瑞罢官》，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每一步高攀，都费尽心机。如今，眼看着上海党政大权就要到手，难道功亏一篑，失于“炮打”？

“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时间：1月28日凌晨。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吗？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

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1010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急急如律令。28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们云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筑物——那座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儿，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近在咫尺。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红革会”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还在那里讨论着掀起全市炮打张春桥高潮的计划。

7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

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兴国招待所，他已接到确切情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秘密策划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他思索着对策。再动用军队吧，弄得不好，事态会进一步扩大。任其秘密策划吧，一旦大游行爆发，那么他就将葬身于上海群众愤怒的海洋。仿佛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仿佛兴国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张春桥心中打着小九九，来了个铤而走险，干脆，“走到群众中去”，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红革会”！

当张春桥拉着姚文元一起去的时候，姚文元直摇头。姚文元以为这样的“高姿态”太危险，等于走进炸药桶！

张春桥呢，笑了，说姚文元太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姚文元无奈，只能跟着富有“群众斗争经验”的张春桥，坐上了轿车。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后，步入北大厅。张春桥的脸，此时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尽量使每一步都稳稳地迈向前。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

红卫兵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张春桥为自己的“高姿态”能够赢得这样的效果，脸上从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侧过脸白了姚文元一眼，仿佛在说：瞧你，多么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已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状态中复原，有人高声地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争得了会议的主动权：“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因为这段“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差不多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听念什么样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发言是什么样的倾向。

果真，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而不是用那种又亲昵又尊敬的“春桥同志”，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红卫兵们像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张春桥冷冷地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荻秋所利用……”

这下子，像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他们的老底了：“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没想到，张春桥的“高姿态”，却为红卫兵们斗他提供了绝好机会——他竟与姚文元一起，坐着轿车，送上门来供红卫兵批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去了”！

从晚上7点，一直斗到凌晨1点，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张春桥和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挨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所以张、姚只得听凭红卫兵批斗，无人救驾。

直到凌晨1点，红卫兵们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春桥、姚文元上了轿车，一溜烟，逃了！

这一天——1967年1月28日，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记忆之中。“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成为上海尽人皆知的笑谈。

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大礼堂人声鼎沸，“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大会结束之后，以“红革会”为主的几千名红卫兵涌向上海街头，连夜张贴海报。

海报上印着这样的醒目句子：“1月30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张春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29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兴国招待所，疾步奔向电话机，挂通了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的“阴谋”。

就在29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第二天的行动。

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春桥的目光飞速掠过电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由白转灰转黄转红。

他拿起“BH”铅笔，刷刷地在电报的天头上写下一行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

当秘书拿着电文坐上轿车前往印刷厂的时候，张春桥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上海，落入张春桥手中

1967年1月30日清晨，上海气温骤降。来自北方的寒流扫过这座海滨巨城，那些已经贴好“打倒张春桥”的游行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只差两小时！只差两小时！

原定，上海10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8时开始。可是，清晨6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所覆盖。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着《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

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张春桥双管齐下：广为散发《中央文革小组加急电报》，同时指令“工总司”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

在强大的压力下，“红革会”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徐景贤。

张春桥发出了一阵狞笑，他终于危翼存卵，胜利了！

2月1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笑嘻嘻地露面，接见上海的一些红卫兵代表。如今尚存的传单《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红革会》，倒是张、姚那次“双簧”的如实记录。

张春桥胜利后的得意，姚文元被斗后的怒气，都跃然纸上——

张春桥：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群众组织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姚文元：红革会在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把我和春桥同志斗了六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这么干，他们炮打春桥同志，矛盾确实会转化的。

张春桥：他们已经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他们的“炮打”，适应了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我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曹荻秋的信，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来，看来跟红革会是相呼应的。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一点也不错，曹荻秋讲过这话。他对我也说，“你们在北京、中央发号施令，这一回你们到上海尝尝味道！”他所说的“尝尝味道”，就是指尝“炮打”的味道。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革会是有后台的。

张春桥：同志们，你们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中的措词了吗？电报中总是提“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这就把红革会的某些头头与广大红革会战士加以区别。红革会某些头头是什么性质？我看，以后会下结论的。

姚文元：同志们注意了吗？最近，马路上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有的只是炮打春桥同志的大字报。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红革会的“炮打”，适合了谁的需要，不是很清楚的吗？红革会转移了斗争的矛盾，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首要任务：

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张春桥：文元同志的话，是值得大家重视的。现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我们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高举夺权的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姚文元：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

张春桥：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张春桥和姚文元，你一言，我一语，不断地给红革会“上纲上线”。

终于，张春桥梦寐以求的一天到来了：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从此，上海落进了这伙阴谋家手中，蒙尘近十个春秋。“狄克”，成了上海的主宰。

张春桥刚刚上台，当即发布“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春桥收起了笑脸，举起了屠刀。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红革会！第一笔要算的账，就是“一·二八”炮打！因为炮打张春桥，亦即炮打中央文革，而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亦即“现行反革命”。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二八”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达2500多人（不包括一般的请罪、写检查），其中被隔离审查的200多人，被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440多人。在审查中，有5人被逼死，6人被逼疯，好多人被打成残疾。

张春桥，一手拿着“棍”笔，一手拿着屠刀，这才成为上海第一号“铁腕人物”。

不，不，“棍”笔，屠刀，都是明摆着的。“华蒂社中坚”张春桥，步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的后尘，在上海秘密建立了“张氏特务纵队”。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作“斜桥”。

1月30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上海的工人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50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他被耿金章[9]派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

团”、“工三司”（即“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巴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的声音。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5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胡子拉碴，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

听外边的声音！”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炮轰张春桥！”

“打倒张春桥！”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跷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1967年的1月，只剩下最后一天——31日。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1967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2月1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2月2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宣言”、“通令”——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28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32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道，“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

明！”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其人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10]。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他的小辫子。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1925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19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11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十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士。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1949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班长、副排长。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波、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1957年9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1964年2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了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1959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扇了那人一记耳光。

1964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1967年1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50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离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地方，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7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瞰，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深夜12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装”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像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像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

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果真，1967年2月2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32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张春桥降服耿金章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拿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伫立在5号楼前静候。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分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小组'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32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猾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像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于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张、姚成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人民日报》了。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2月5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2月5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徐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
>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
>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
>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
>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

>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
> ……这场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在“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代表，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审定“临时委员会”委员名单，眼睛布满红丝，眼皮也浮肿起来。

2月9日上午，姚文元居然忙里偷闲，在上海林村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这天，正值农历正月初一，一辆乌亮的小轿车停在林村弄堂口。

从车上下来的“首长”，一身崭新的军装。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邻居们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走向老家。

哦，儿子姚文元来向老子姚蓬子拜年来了！

“到底是做了大官，坐了小汽车来拜年。”邻居们议论纷纷。

向来邋遢的姚蓬子，一身笔挺呢中山装，胸前自然不忘戴那闪闪发亮的金像章，在家门口恭候儿子一家的光临。

姚蓬子哈哈大笑着。虽然儿子进屋之后，随即关上了大门，那笑声还透过门缝，在外面回荡着。

过去了，过去了，反胡风时那口口声声“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抄家、周修文被勒令每天在里弄里扫马路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在姚蓬子的笑声中这一切不快都过去了。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5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人民日报》对“上海人民公社”保持沉默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印刷厂。

下午3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2月6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2月6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2月7日、8日、9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2月12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张、姚到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

认！”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速去北京。

农历正月初四——2月12日，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

张春桥的衣袋里，放着关于“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汇报提纲。他和姚文元的脸上，都荡漾着春风——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一定会跷起大拇指。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他们向毛泽东问候新春好的时候，毛泽东眉间的竖纹没有展开，这意味着不是个好兆头。

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刚坐定，张春桥还没来得及掏出汇报提纲，毛泽东就发话了：“上海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以下是当时秘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原话，句句都是“最高指示”：

> 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 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经毛泽东连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的时候，来了个先斩后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后来，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一回又来了个“先斩后奏。”

不料，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两颗发热的脑袋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神情严肃，继续说道：

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的一连串问话，问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哑口无言。思想深邃的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从理论上谈透了这个问题：

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

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据我看，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

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却跟英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还是西哈努克好一点。

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尼泊尔王国比印度好一点。

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能说明什么呢？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我们看来好像校长低得多，总统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所以，名称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张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

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张春桥的脸色变白，却还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

>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
>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
>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
>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
>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 我看，有三种办法。
>
>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
>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
>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

回到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2月18日匆匆飞回上海。

《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

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2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诮那些反对派们：

>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
>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打来了……

王洪文吞并“二兵团”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

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8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车队拐入长阳路，驶近1382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为时已晚，他成了瓮中之鳖。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屈指算来，从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当上“常委”，到这天——2月25日被捕入狱，耿金章整整当了20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土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100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1967年5月2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据笔者1986年10月30日采访耿金章，他说当时他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1]1986年4月12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常溪萍司机庞学友。

[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3]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4]本节根据原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的《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四人帮"兴亡〉读后》一文做了修改。

[5]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6]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7]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8]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9]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10]1986年10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耿金章。

目录

第十五章 “得志便猖狂”

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所谓“二月逆流”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怀疑狂·迫害狂

宋庆龄怒斥江青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

四支秃笔倒了三支

第十六章 疯狂的复仇

“不知名的红卫兵”夜半敲门

“歼七”追抄一封信

教导队冒充红卫兵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江青追抄什么信

王莹惨遭江青迫害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屈死狱中

江青报复严朴和扬帆

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的厄运

专机押送王芳赴京受审

毛泽东儿媳刘松林上海蒙尘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谁泄露了狄克的秘密

鲁迅当年曾痛斥“狄克”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安在

他查出“狄克”是谁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行踪诡秘的“扫雷纵队”

无孔不入的“福尔摩斯”
上海藏书楼里的斗争
另一支兵马杀进藏书楼
主炮手被关进秘密监狱
“扫雷纵队”游雪涛自食苦果
张春桥妹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尚未动刀，患者突然死去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王洪文重申“此案要严肃处理”
周总理当面质问张春桥
姚蓬子戴起“工总司”袖章
“太岁头上动土”——抄姚蓬子的家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姚蓬子之死
第十七章 王洪文横行上海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充满辣味的“全向东”
静坐于上海市公安局前
王洪文后发制人
震动上海的解福喜之死
冒出了“压勿煞战斗队”
“888”秘密会议
大战的前奏
上海血泪横飞的8月4日
张春桥“完全支持”王洪文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王司令”乔迁“上只角”
马天水卖身求荣
上海“市革会”的“三驾马车”
王洪文的“小兄弟”成了“纳新”对象
“先进典型”陈阿大入党
陈阿大其人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王洪文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张春桥拿“上海党”炮轰陈毅
王洪文成为上海“中南海”的新主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成了“红色堡垒”
第十八章 与林彪又握手又踢脚
与组长陈伯达的争斗

“四一二”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林彪救了张春桥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江、张、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陈伯达倒向了林彪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陈伯达遭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噩梦连连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姚文元取代陈伯达成为“舆论总管”
姚文元“左”眼看画
第十九章 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
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
毛泽东突然休克
张玉凤眼中的江青
秘书眼中的江青
江青看电影
护士眼中的江青
美国总统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毛泽东没有选择江、张、姚接班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
王洪文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王洪文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第二十章 四人结帮斗“周公”
江青“迫不及待”攻击周恩来
王海容、唐闻生成为特殊的“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把手伸进部队
批林批孔批“周公”
返回总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人帮”兴亡（3）：横行/叶永烈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54-0409-7

Ⅰ．①四…　Ⅱ．①叶…　Ⅲ．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Ⅳ．①K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0529号

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未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特向未署名的摄影者致歉；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与本社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克川　陈立旭　柯琳芳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胡志华　袁又文　章文岚　叶敏娟

责任校对　康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旗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97印张　9插页　插图253幅　2168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平全四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转出版部。

第十五章 “得志便猖狂”

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像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像地火在上海滩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城。

紧接着，江青推波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于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196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共党史上出

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虽然它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但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王力[1]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image]

■ 王力在"文革"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5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2]，号秀山，比姚文元大12岁，是四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1919年7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1933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1939年改名关锋。1944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1956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杂志社，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关锋喜欢写杂文，1962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写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

1966年2月8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戚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撤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3]是山东威海市人，跟姚文元同龄，都生于1931年。

戚本禹早年的经历有点类似姚文元。他是在1942年随父亲从山东来到上海，父亲在上海报关行工作，他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上海解放前夕——1948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也是在那一年在上海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笔者曾问戚本禹，据传他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他大笑，他的最高学历就是高中，没有上过大学。

比姚文元幸运的是，上海解放后，戚本禹被选送到北京劳动大学学习。劳动大学名为大学，其实就是共青团中央团校的前身。

经过劳动大学的短期培训，1950年5月4日，19岁的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他的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为江青、田家英。戚本禹最初主要是处理信访。后来，戚本禹成为田家英的助手，为《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做校对工作。戚本禹回忆说，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文章，他差不多每篇都读过五六十遍。

戚本禹告诉笔者，1957年至1958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

件”。“八司马”原本是指唐朝顺宗永贞年间韦执谊、柳宗元等八人遭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由于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即原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时在反右派运动中有八名科级干部被批判，成了挨整的“八司马”。其中之一便是戚本禹。

戚本禹还说，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田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戚本禹真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他在1963年第四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等发起挑战。于是双方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据戚本禹说，毛泽东并在一张刊有他的文章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戚本禹也因此在史学界一举成名。

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然“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1967年4月1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风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1967年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批杨献珍起家，戚本禹攻刘少奇夺取“头功”，姚文元则是以评《海瑞罢官》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笔杆子们之间，有过你呼我应：在批《海瑞罢官》时，关锋和戚本禹曾一起专程来沪，跟张春桥、姚文元密商[4]。不久，关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围剿吴晗。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江青要整倒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江青说道：“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着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工作的常委。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5]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6]

毛泽东一席话，那一阵密集的批判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几天之后——1967年1月4日晚9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image]

■ 陶铸（左一）与毛泽东在一起（孟昭瑞 摄）

原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小组’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1月5日）凌晨2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

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指陶铸在12月30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引者注），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1967年1月4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1月3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斗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5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5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萧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了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1月8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销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1934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1935年在长征途中，1942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

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因此，他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萧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1966年8月，刘志坚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由于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1966年11月13日、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

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萧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12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1967年1月4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的发生。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屜桌，床前一盏一百瓦的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为囚徒——在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的情况下。

不久，萧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阵营：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所谓“二月逆流”

自从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便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2月12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里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仿了。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2月16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2月16日下午3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不料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只是张春桥罢了。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头一句话便使张春桥不快。

陈丕显是谭震林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的进京省、市委书记的名单中有陈丕显，理所当然地这么问张春桥。

张春桥呢？他的“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在于打倒了陈丕显。他傲然回答了谭震林的问话：“他来不了，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冷笑：“党组织？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大谭”报以讥笑：“喔，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张春桥眼睛一翻，气嘟嘟地管自走进会场。

周恩来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谭震林就第一个发言：“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的目光逼视着坐在斜对面的张春桥。

张春桥重弹老调：“群众不答应嘛！”

谭震林再也忍耐不住了，霍地站了起来，当着众人面前，痛斥张春桥：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边，谭震林的两侧坐着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余秋里。

那边，张春桥的两侧坐着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王力。本来，这样的场合，江青是必定要出马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江青“批判”陶铸时，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毛泽东批评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她一生气，说自己“生病”了。

两军对垒，阵线竟是那样的分明。

谭震林说罢，一肚子气，走过去穿衣服，看样子要走。他手中拿着大衣，指着对面的那一帮子人说道：“就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劝住“大谭”，拿下他手中大衣。

陈毅也站了起来说：“不要走，要在这儿斗争！”

谭震林一听，回过身来，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大声地说：“陈老总，我不走！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

这时，陈毅怒火中烧，放炮了：“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许多老干部挨整。‘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过整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现在，不能再重复这些错误！”

陈毅的话，直刺对面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陈老总快人快语，继续放炮：“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唯有他的眼珠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他并不马上“回击”。他一言不发，他有充分的“涵养”。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他曾主动“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开座谈会，“虚心”地“征求意见”。历史学家们指着他鼻子痛骂，他也毫不动气。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手持那份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老帅们的状。张春桥知道，只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才能压得住那班老帅、老将军、老干部。

江青没有去，张春桥领着头。毛泽东抽着烟，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张春桥那添油加醋的汇报。毛泽东毕竟熟知他的老战友们的脾气，只是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当记录员。他俩立即记下这句“最高指示”。

当张春桥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深深地激怒了。

两支笔沙沙的同时记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别说陈丕显不在话下，那谭震林、陈毅也马上被赶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这一天——2月17日，当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

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指“喷气式飞机”，比喻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引者注），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

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箩”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2月2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12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一张大字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现在可以

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群众呼喊，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实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众呼，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此时的张春桥，已在扮演“钦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中央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1967年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跳梁小丑岂足论。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1967年，是张春桥直线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国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之中，倒掉了6人，即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只剩下5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只是规

定，“中央文革”成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这时，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怪事：一个在党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一下子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从那以后，中央文件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者并列的形式发出。“中央文革”权重一时。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三员大将也倒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因为毛泽东批评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三个秀才成了炮制这一口号的林彪、江青的替罪羊。这下子，“中央文革小组”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张春桥大权在握了。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1966年12月24日凌晨3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

毛泽东于1959年9月9日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7]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1965年9月22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8]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1966年5月29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

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45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1966年12月20日，戚本禹给20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韩爱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戚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image]

■ 陈伯达（左）与“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右）

韩爱晶茅塞顿开。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特别使命，让“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是在戚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9]

就这样，彭德怀在12月25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兵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从此，戚本禹得一诨号，曰“戚大帅”。

1979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1966年12月26日，戚本禹致信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1、2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干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1967年1月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

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应为24日凌晨——引者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应为25日——引者注）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月3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image]

■ “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彭德怀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姚：读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1967年7月12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应。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

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7月19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戌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7月19日至20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19日参加批斗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20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1973年春末患上直肠癌。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76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一——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说的“大人物”就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21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12月25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1966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image]

■ 1966年10月1日，江青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含笑握手。这笑背后隐藏的内容，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孟昭瑞 摄）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来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19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6月27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部队”。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之时，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

吗？”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之声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拨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image]

■ “文革”初期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孟昭瑞 摄）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遭遇没顶之灾。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1967年1月6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的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

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image]

■ 195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南京

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10]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

1963年4月20日至2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

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

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

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曾使江青极为眼红。1963年11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户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抓“四清”，担任工作组副组长。1964年春节，王光美回京，刘少奇跟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谈“四清”》）。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4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1964年9月1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达各级党组织，使王光美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尽管“桃园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实际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借刘少奇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1月12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1月13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11]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4月1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

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刘少奇看了报纸，愤愤地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4月8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4月10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image]

■“文革”中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置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1967年6月3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12]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益的证言：“在1967年5月（应为6月——引者注）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

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1967年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1946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1950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祚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

员周耀澄于1967年12月16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祚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1980年12月5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通过审查杨承祚、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央，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70年2月3日的《关于杨承祚死亡报告》中写道："杨承祚病情时好时坏。1970年1月19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1970年2月3日8时03分死亡。"

就在杨承祚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处在受苦受难之中。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祚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1967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1967年10月24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1967年11月9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27天中，竟被"突审21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待"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得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待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待？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祚、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1967年9月3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萧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萧孟回忆道：

>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得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9月8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祚，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1946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专案组拿来杨承祚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祚”，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1946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

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1973年10月26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11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1966年8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9月16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个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这一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

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1929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1929年8月22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6月22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待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5月29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待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待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1967年8月到1969年3月，写了20次申诉，否定自己因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1968年1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孟用潜1968年1月22日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于1967年7月27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1967年10月31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1968年3月26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1967年9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逼问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1967年7月19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12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1968年8月27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1968年3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300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

命”。

9月29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66岁的陈少敏，1928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8年11月6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24天——1968年11月24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70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摄氏40度！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深秋的寒气，使本来病重的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一座用来隔离审查的楼房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顺便提一笔，随着张春桥在政治上日益显赫，他也日益担心妻子文静的叛徒问题影响自己的前途。张春桥在去北京参加筹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便曾经向江青谈起自己的苦衷，透露出打算与文静离婚的心思。江青对他说：“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江青这句话，使张春桥暂时打消了与文静离婚的念头。

[image]

■ 受尽迫害的刘少奇惨死开封

回到上海时，张春桥对文静说：“他们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张春桥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毛泽东、江青。

从那以后，张春桥提出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让文静称病长期躲在家里。但是所有中央文件，仍由专人送到家里给文静。文静虽然不在上海抛头露面，但是仍在幕后为张春桥在上海“看家”。文静不时通过电话向张春桥报告上海的动向。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1967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5月13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1932年2月20日、21日《申报》，2月18日、19日《新闻报》，2月16日、21日《时事新报》，2月16日、17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13]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5月19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14]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5月19日夜

也就在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5]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于1931年5月处理了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1931年11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12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2月22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3月4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6]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成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1953年6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

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1967年10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些“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造反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1967年10月和11月，嘱咐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1967年12月22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〇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17]

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作了如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18]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196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19]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1972年3月26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1971年9月20日曾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授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1969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20]直至1972年4月23日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6月13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6月23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1972年6月23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末的“1972年6月23日”之后，用颤抖的手补充了一行字：

进入手术室　　1975年9月20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他去世之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会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利用那个伪造的启事把他打成“大叛徒”！

怀疑狂·迫害狂

江青是个怀疑狂，迫害狂。她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聂荣臻元帅。

那是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刚刚结束，聂荣臻得了肺炎，住进北京301医院。

陈毅前来看望他，说道：“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真为你捏一把冷汗！”

聂荣臻懵了，不知陈毅讲的是什么简报。

原来，那份简报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补发的。由于聂荣臻在会议一结束就住院了，未见到那份简报。

简报记载的是江青的发言内容。江青说：1948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江青旧事重提，含沙射影，那矛头直指华北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又是“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又是把特务“处决灭口”，那不就是在说幕后指挥是聂荣臻吗？

聂荣臻听罢陈毅讲述的简报内容，虽然对江青的诬告非常气愤，但心中却很坦然，他说：“这件事，毛主席很清楚！”

江青那里一阵风，北京就是一阵浪。没多久，北京街头就出现触目惊心的大字标语：“聂荣臻谋害毛主席罪责难逃！”

在那种年月，“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足以置聂荣臻于死地！

江青对聂荣臻咬牙切齿，无非是因为1967年2月在北京怀仁堂，聂荣臻和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一起，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以及谢富治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被称为所谓的“二月逆流”。于是，江青覆手为雨，翻出城南庄旧事，颠倒黑白，加害于聂荣臻！

红卫兵们贴大字报，撒传单，炮轰聂荣臻。倒是如同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城南庄事件很清楚，所以尽管江青加在聂荣臻头上的罪名很吓人，仍无济于事。

江青耿耿于怀。1971年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江青又一次提起城南

庄事件。这一回，她干脆指名道姓，点了聂荣臻夫人张瑞华："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1948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阜平县陈南庄（又称城南庄——引者注），结果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

毫无事实根据，仅仅凭借"推测"，江青就诬指聂荣臻夫人"可能"是"特务"！

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江青还说："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

信口开河，凭借"怀疑"，就诬指徐向前夫人是"叛徒"！

那年月，江青手握"专案"大权，不可一世，随意在各种场合，给人加上种种"大帽子"。

1968年9月18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代表时，称陆定一是"军统特务"。她的原话是："陆定一作为一个部长、中央委员，一个屁也不答，说明问题，陆定一是军统特务。我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

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江青称周扬是"日本特务、美国特务、国民党特务"，诬指胡乔木是"叛徒"。

1970年7月3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周扬专案组"时，又一口气点了许多"特务"："王昆仑、钱俊瑞、曹亮、廖沫沙也是证据很厉害的特务。萧望东呢？历史反革命，有没有现行反革命？他调到文化部做文化部长，他成了'武化部'了。萧望东枕头底下有一支手枪。"

她还说："齐燕铭这个问题很容易，现行反革命嘛！那厉害得很呢！凶得很呢！"

江青还诬称荣高棠、田汉、阿甲、王昆等是"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

其中田汉在1967年2月17日被关入秦城监狱，后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1968年12月10日田汉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

深知江青早年情况的赵太侔，于1968年4月24日在青岛投海自尽，终年79岁。

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俞珊，遭到红卫兵的抄家，于1968年去世，终年60岁。顺便提一句，俞珊与赵太侔结婚之后生下两个女儿，在抗战胜利之后与赵太侔离婚。

江青信口雌黄一句话，就会使一个人无端被投入狱中好多年，甚至被迫害致死。

据特别法庭统计，仅从江青1966年底至1970年7月的部分讲话录音中，查出江青直接点名诬陷的有172人！其中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8人！

1968年7月21日，康生写给江青的一封“密件”中，开列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名单。除了由江青在各种场合点名之外，据特别法庭统计，在“文革”中，由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多达592人之多！

《红楼梦》第五回中有两句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江青“得志”，无比“猖狂”！

宋庆龄怒斥江青

江青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受人尊敬的宋庆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与毛泽东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宋庆龄是应毛泽东盛情邀请前往北京的。

1949年8月28日，当宋庆龄应毛泽东之邀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一起去欢迎她。如此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在当时也是少见的。这表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夫人，具有崇高的声望。

11月，宋庆龄因事要从北京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印象不错。宋庆龄曾对别人这么说起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

此后，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邀请江青以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作陪。宋庆龄称江青"举止文雅、服饰得体"，依然对江青保持良好的印象。

不过，那天席间江青忽地说起，毛泽东从不穿西装，不合世界潮流。她说，孙中山先生就常常穿西装。

江青说，她劝过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能否穿西装，以改变外界对中共领导人服装单一的不良印象。毛泽东不以为然。

江青希望宋庆龄能够劝说毛泽东穿西装。在江青看来，毛泽东非常尊重宋庆龄，也许会听进宋庆龄的劝说。

宋庆龄对此笑而不答，不置可否。

随着"文革"的逼近，江青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政治野心大大地膨胀起来，开始做"女皇梦"。这时，江青开始嫉妒宋庆龄在中国妇女界的崇高地位。宋庆龄以她高尚的人品和漫长的革命道路，无可辩驳地成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中国妇女界当之无愧的领袖。然而，江青却把宋庆龄视为"障碍"，要取代宋庆龄的中国妇女领袖地位。

宋庆龄受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宋庆龄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扬言要把宋庆龄的头发剪成短发。

宋庆龄听说之后，非常愤怒。她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

宋庆龄一直把头发朝后梳，在后脑勺盘成一个圆髻，这本是中国一种传统的发型。宋庆龄曾经对母亲说，她将一辈子保持这一发型。

更令宋庆龄震怒的是，红卫兵竟然冲进她在上海的住宅，抄她的家！

最令宋庆龄不能容忍的是，红卫兵居然毁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而且在被毁坏的坟墓上贴了批判宋氏家族的大字报！

中国人向来视“挖祖坟”为最大的侮辱。宋庆龄遭此奇耻大辱，内心如焚。

周恩来得知，立即下严令加以制止：“绝对不允许攻击宋庆龄同志！”

周恩来指派部队保卫宋庆龄住宅和宋庆龄父母墓地。

周恩来下令紧急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并把复原后的宋庆龄父母坟墓拍照，派专人送给宋庆龄，并征询她对修复工作是否满意。

毛泽东派出江青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客气地接待了江青。在谈话中，宋庆龄提出，该对红卫兵的行动有所控制。江青闻言，却置之不理，反而一味称赞“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从此，宋庆龄非常厌恶江青。

江青异想天开，希望宋庆龄以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公开表态，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宋庆龄以年老体衰为由，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

在“文革”中，宋庆龄长期保持缄默。看着江青一步步走向“女皇”宝座，宋庆龄嗤之以鼻。

向来儒雅、从不骂人的宋庆龄，开始骂江青为“泼妇”。

在1978年6月5日，宋庆龄在写给美国理查德·杨的信中，斥骂江青为“无耻婊子”，足见宋庆龄对江青的无比愤懑。

宋庆龄写道：“……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的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婊子江青炮制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21]

宋庆龄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但是“婊子”二字却特地用中文写出

来。

这也许是宋庆龄一生中唯一一封骂人的信。她对于江青的刻骨之恨，真可谓溢于言表了！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高高的上海国际饭店，从上至下，挂出了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楼，也挂出了同样的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全市许多高楼、许多围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这四句口号，还印在传单上，响在人们的嘴巴上。

1966年12月，上海全市性批斗常溪萍大会召开了。这四句口号，被确定为大会的“主题”。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烧”、“揪出”、“打倒”、“砸烂”，有着特殊的含义，仿佛在逐步升级。喊口号的时候，调门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响。喊到“砸烂常溪萍”的时候，造反派们都伸长了脖子，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可惜还没有一本《文革辞典》，还无法给“砸烂”下确切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砸烂”，意味着常溪萍的问题最严重，已进入“彻底打倒”的范畴。

1967年1月，张春桥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嘘过：“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奇怪，张春桥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就一口气背出来呢！他不是说“我还背不出来”吗？

哦，一直到1977年12月9日，徐景贤交代了这个口号的来历，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张春桥审定的：

> 我第一次接触常溪萍的问题，是在1966年12月筹备召开批斗常溪萍的大会。当时得到师大红卫兵的支持。当时，是我同郭仁杰、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动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即要砸烂的。这个口号，张春桥、姚文元是很赞赏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口号印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期简报上。1966年12月12日后，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赞成这个口号。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都说：“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此后，常溪萍就一直被我们作为砸烂对象。

常溪萍成了“砸烂”对象之后，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经无法统计了。据当年的“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告知，那时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论是市里、局里、校里、系里、班里，不论是关于教育、关于人事、关于体育以至关于卫生的批判会，都要把常溪萍“揪”来，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最高纪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造反派们在他的胸前挂黑牌，那黑牌的铅丝深深地嵌在常溪萍的脖子上，脖子肿了，出血了，化脓了……

在“砸烂常溪萍”的那些日日夜夜，常溪萍受了巨大的痛苦。下面的一行行文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我一一写明目击者的真名实姓——因为那一桩桩迫害常溪萍的暴行，都有人可以作证，都是确凿的事实：

> 1967年初，我听到有个学生告诉我说常溪萍被人用绳子牵着走，我就走过去看。这时发现真的有人用麻绳套在常溪萍同志的脖子上，共有七、八根绳子，从各个方向各自拖拉，常溪萍弄得站都站不住，哪边力大就向哪边拉，往哪边走。开始向北朝第二宿舍方向走，后来又向南朝地理馆方向走。我们都不忍心再看，认为这样做太残忍了，但又不敢讲。
>
> 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常溪萍的一条腿坏了，不能走路，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常溪萍到厕所大便，学生到房间一看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从厕所里拖出常溪萍拳打腿踢，打倒在地上，再拖起来打。（目击者：郭振翔，华东师大工人。）
>
> 大约是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从文史楼底楼走过时，听见呼叫声。我隔着玻璃窗向里望去，见一个学生一面对着常溪萍同志喝问，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于是鲜血从他头部直往下流。常溪萍同志忍受着，未吭一声。（目击者：吴怀德，华东师大教师。）
>
> 常溪萍的腿被打拐了，批斗时他要求跪下来，打人凶手还不允许，还要拳打脚踢。甚至演戏时还要把他拉出来，踩在脚下，充当活的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的角色，进行人格污辱。（原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L交代。）
>
> 我在进新二教室时，见到门外有一伙学生围着常溪萍同志，骂他“大叛徒”，打了他许多耳光。（目击者：冯契，华东师大教授。）
>
> 我一进牛棚，气氛极其紧张、恐怖。D事先准备好扫把柄、拖把柄，打常溪萍同志。打折了几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柄打，打得常溪萍同志在地上打滚，常溪萍同志在地上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听闻。D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打得常溪萍同志脸青鼻肿，然后又朝常溪萍同志身上猛踢几脚，常溪萍同志被踢得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
> 就在此时，牛棚的门呼的一声突然被踢开了，闯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四年级的Da。也有事先准备好的武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的木棒。他朝常溪萍同志身上打去，又打得常溪萍呼天

> 不灵，呼地不应，直在地上打滚惨叫，惨不忍闻。他们是要把人往死里打。我看到他此时已是面目全非了，瘦瘦的脸突然肥胖起来，脸青鼻肿，肿得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还淌着血……（目击者：黄澄河，华东师大教师。）

真的是“砸烂常溪萍”呵！他们真的是要把常溪萍往“死里打”！

当江青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那年月，真的是“无法无天”：打手是“英雄”，挨揍是“活该”。法律被“英雄”们践踏在脚下！

然而，那个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居然不知羞耻，在《新师大战报》上发表如此肉麻的文章：

>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筹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唉，真是唱不完的“颂歌”——一声声“是他”，变成一阵阵鞭打，劈头盖脑落在常溪萍身上……

就在常溪萍不断挨打的日子里，又一次大规模的“斗常大会”要在复旦大学举行，“勒令”常溪萍按时前往“候审”。

突然，传出惊人消息：常溪萍失踪了！

一连好几天，造反派们四处搜寻常溪萍，仍杳无音讯。他们抓住了常溪萍的司机庞学友，这才查明：原来，小庞看见常溪萍天天挨打，而即将召开的“斗常大会”意味着又是一次毒打，他于心不忍，把常溪萍塞上汽车，直奔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小庞的小姨子在那里开饭店。常溪萍在那里总算喘了一口气，疲倦不堪的身体得到休养。

造反派们狠狠地把小庞斗了一通，骂他是“铁杆保常”。

其实，在华东师大，“铁杆保常”岂止小庞。常溪萍深得人心，许多同志在暗地里照料他，保护他。

光是凭借聂元梓的两张大字报，毕竟还无法“砸烂”常溪萍。

光是依仗拳打脚踢，也未能从常溪萍的口中挖出什么够上“敌我矛盾”的材料。

怎么办？

查历史！于是，外调人员走遍天南地北。

关于常溪萍历史的外调，可以称得上“上海之最”，几乎把常溪萍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查过一遍。

原来，常溪萍并不姓常，而姓昌，叫昌德兰，山东莱阳西南乡王屋庄人，生于1917年10月。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入党的时候，他才21岁。

新中国成立前，常溪萍担任过中共山东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胶东区党委秘书长，西海地委委员，西海专署专员。

新中国成立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他的历史清清楚楚。即使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也很难，因为鸡蛋里毕竟没有骨头！

按照当时最为“时髦”的外调方法，首先查党籍，看看能不能打成“假党员”。

常溪萍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找到了，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广西。

就在那样的年月，两位入党介绍人都明明白白地答复外调人员。

梁辑卿说：“常溪萍入党是我介绍的。常在入党方面没有问题，当时还是进步青年。”

吴青光说：“我和常溪萍是同学，他入党是我介绍的。”

得了，“假党员”的帽子，无法戴到常溪萍头上去。

于是，又来个“时髦”的外调：查一查常溪萍是不是“叛徒”。

尽管常溪萍那时戴着“大叛徒”的帽子，但是谁都明白，那是聂元梓给他硬安的。就凭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能算是“大叛徒”？

外调人员查起常溪萍是否曾经被捕来了。

他们几乎找遍了能够找到的，曾与常溪萍共过事的人。非常遗憾，谁也未曾听说常溪萍被捕过。

一份份外调材料上，都清楚地写着：“我没有发现常溪萍有被捕、被俘的事。”

可惜，“叛徒”的帽子又与常溪萍无缘！

事与愿违，许多外调材料上，反而记载着常溪萍的先进事迹：

“常溪萍对党忠诚老实，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生活简单朴素，不特殊化，态度和蔼，能深入群众。”

“胶东区委曾表扬过常溪萍。”

“常溪萍工作一贯积极，对敌斗争直接深入边缘地区，支援前线工作一贯抓得很紧。”

“常溪萍曾被誉为‘西海模范专员’。”

须知，这些话，出自“四人帮”高压政策时期，面对前来抓“叛徒”的专案人员，常溪萍的战友们实事求是，的确难能可贵。

一次次外调，一次次“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抓到常溪萍任何把柄。

就连常溪萍改名，也曾作为疑点，查了一番：那是因为他被派往敌后工作，他的原名昌德兰是敌人熟悉的，只得化名。“常”与“昌”音近，改为姓常。溪萍是临时随便取的。不料，后来一直沿用常溪萍这名字，就连子女也姓常。他的改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并非外调人员曾大胆“想象”过是敌特化名钻进革命阵营。

一个人的历史，毕竟是用他的双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像演员脸上的油彩那样可以任意涂抹。

常溪萍打而不倒。

经历了数百次批斗会，经历了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围剿”，经历了上百人次的内查外调，常溪萍岿然不动。

就连“常溪萍专案组”，也渐渐对常溪萍失去了兴趣。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

1968年1月15日下午，华东师大“革委会”的头头们慌了手脚：张春桥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赶紧一边向张春桥“汇报”工作，一边广播通知全校师生在“九一五”广场紧急集合。

张春桥还是用他那阴阳怪调，在广场上发表了即兴演讲。

以下是当时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张春桥的讲话，给造反派们上紧了“批常”的发条：

同志们，你们好！（鼓掌，口号。）

很早就想来看望同志们。我这个人实在糟糕，这么个大名鼎鼎的华东师大，我从来没有来过（笑声）。所以，我很早就想来。

今天下午嘛，我们那里改文件，改得实在头昏脑涨了，我就不愿意再干了。我就出去，突然袭击，来到你们这里了。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这么关心。我走得一身汗（笑声）。

没有想要说的话，因为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开这么个群众大会。

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是很有名的，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有名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了红卫兵，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总是有对立面出来，才有打倒他的力量出来。

经过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你们现在走得比较靠前了……走在前面可以发生另外的问题，就容易骄傲啊，会说我们多先进啊，那么厉害，有打常溪萍的战功，这是很先进的吧！

张春桥谈笑风生，却在笑声中隐伏着杀机。

他的突然袭击，其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私下里对红卫兵头头说：“要把队伍清理好，不能认为校革会成立了，太平无事了。”他甚至说：“打是可以理解的，小将出于气愤嘛！”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果真是再次掀起“批常”高潮的信号。

1968年4月4日，张春桥踏上上海市“积代会”的讲台，在全市又一次点了常溪萍的名：“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在全市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好同志。”

第二天，早被造反派“夺权”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右倾翻案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马上把张春桥的意思融了进去：“最近，在一个大学堂，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鸣冤叫屈。这样一系列的严重事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一个星期后——4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华东师大造反派的所谓“群众来信”，加了耸人听闻的“编者按”：

> 那些认为走资派已是“死老虎”的人，请看看华东师范大学揭露的这个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那一小撮走资派，我们虽然罢了他们的官，撤了他们的职，但他们没有死心，他们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值得深思的是像常××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有人为他翻案呢？这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因此，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这一阵密锣紧鼓，使华东师大一时成了上海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重点单位，常溪萍成了万箭齐射的“翻案典型”。

张春桥一直念念不忘常溪萍，不斗倒斗臭决不甘休！

华东师大“革委会”当然闻风而动，立即下令改组“常溪萍专案组”，批判“右倾观点”，加强“专案力量”。

新建的“常溪萍专案组”，办起了“学习班”，反复讨论一个问题：常溪萍有没有彻底打倒？

在专案组成员一本迄今尚在的工作笔记上，有着当时“学习班”的记录：

“反复明确为什么要拉起这个组织？”

“任务：彻底打倒常溪萍！”

常溪萍又挨斗、挨打了，斗得比原先更厉害，打得比原先更凶！就连他在检查中写了一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被说成是“翻案”，又招来批斗——因为你常溪萍是“阶级敌人”，怎么可以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他从三楼窗口坠下，砰的一声，摔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

他足踝跌断，双目紧闭，殷殷鲜血立即从面额涌出……

离他坠地处两米的水泥方柱上，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时间——1968年5月25日下午1点40分。

地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边的数学馆。他从三楼301阶梯教室最末一个窗口坠下。

华东师大震惊了，上海震惊了。

当天，一辆小轿车急急地驶出华东师大校门，把一份报告送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白纸黑字：“我校党内头号走资派常溪萍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竟于1968年5月25日下午跳楼自杀身亡。”

“常溪萍”这三个字，曾被写成比斗还大得多，打上红“×”，贴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上，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用石灰水刷在柏油马路上，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是当时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学生俞珠屏、汤惠娟。在发黄的档案里，有着她俩1968年5月29日写下的目击记录的原文：

> 5月25日（星期六）中午，我俩在九一五广场骑自行车。大约1点20分左右，我们看见大叛徒常溪萍由西面走进数学馆。一点三刻校广播站响音乐后（约五分钟）我们刚巧在数学馆前的马路上，这时我们看见数学馆有一个人脸朝下掉下来，然后就听得一声响，这个人就掉在数学馆台阶最后一格。我们看到这情景迟疑了一下，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看到这人脸朝数学馆，头朝西（翻身下来的）。我们中的一个先走上台阶看了一下，认出是常叛徒，这时周围还没有人。过了一会，数学馆里出来一（3）班的三个女同学，以后人就逐渐多了。

另一目击者、教师孙建英，回忆如下：

那天中午，我去地理馆审定一期大字报刊稿，走近地理馆，见有一人从数学馆上跌下来。由于我不要看跳楼自杀的现场，所以就站定了。此后听说是“常溪萍自杀”，才跑过去看。当时约有四五个同学在场。常溪萍在地上为俯身，有轻微的“哼”声。以后有两个同学（数学系的）跑上楼去，看楼上有没有人，为什么不小心让常跳楼了？不一会儿下楼来说，一个人也没有，真正麻痹大意，并有一人去校部找人报告。此时已有近十人在场。后来来了一个数学系造反大队的同学，说常死有余辜，并把常拉着手臂翻过身来。此时，常开始发出“啵啵啵”的声音，并两次想把眼睁开，口角有血，不多，下颏有些跌开，血也不多。额上有擦伤，估计是脚着地后，向外扑出去的结果。以后人愈多，有人看到常的头在台阶上不好受，把他拉在地面。有人用脚踢踢他，看他还活着否……

造反派头头Z跑来了，校医赶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常溪萍放上担架，抬上救护车。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帆布。

救护车在宽阔的中山北路急驶，直奔华东师大的劳保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造反派头头Z亲自押车，紧坐在担架旁，用他那乌鸡眼凶狠狠地注视着常溪萍。此人乃是华东师大“最早起来造反”的“老工人”，有着“校革委会委员”荣衔。

校医李荣武大夫曾作如下回忆：

当时Z抢先上车，把门一关，迫我坐在前面，其目的是控制我，不让我靠近常溪萍，但我仍然注意常溪萍的伤情和叫唤。我摸他脉搏，跳动较弱。当时汽车开得很快，摇动较大。这时常溪萍靠外边一只手掉下来了，我看见Z拎起常溪萍的手一扔，还恶狠狠骂了两句：“你还想找死？死不了！”

那年月，医院最忙碌，特别是外科，而外科中要数骨科最忙。

就在常溪萍被送进第六人民医院之前一个多小时，也是一辆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车，急匆匆驶进医院大门。司机陆永洲清楚记得：

1968年5月25日中午，我开了福特小汽车去第六人民医院，送一个跳楼自杀的学生。过了一会儿，我在走廊里看到我校司机周孔谦。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送常溪萍来的。“常溪萍怎么啦？”“跳楼了！”这时，我就快步冲向急诊室去看，发现他已睡在一张活动床上，头部向进门处，医生正在给他缝颈部的伤口，嘴巴里还发出轻微的叫声：“啊呀，啊呀……”正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骂起来：“他妈的，还装呢，老实点！”我一看，原来是Z！当时，他眼珠突出，紧握拳头，杀气腾腾，还对医生说，“他就是大叛徒常溪萍！”

有Z这尊凶神在那里，看来常溪萍只能在那里等死。因为那时的医院，把“大叛徒”、“走资派”之类当贱民，往往见死不救。

然而，居然出现了奇迹：医院委派名扬世界的骨科专家陈中伟大夫亲自出马，和吴道权、王爵鹓、陈尧南、王智金、王琰、卞蓉仙、姜锡英等，共同抢救常溪萍。

是哪个“菩萨”忽然发了慈悲？

原来，“市革会”有令：“尽力抢救常溪萍！”

为什么呢？“为了运动的需要，不能让常溪萍把材料带走！”

哦，是这么回事！这是“市革会”接到华东师大造反派电话以后，下达的“指令”。

当然，第六人民医院接到如此重要的电话“指示”，不敢怠慢。

以下是陈中伟等八位参加抢救常溪萍的医护人员在当天下午共同签署的《常溪萍救治经过》，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 1968年5月25日下午2时20分，患者由数人送至本院急诊外科。
> 急诊体检：痛苦病容，神志清，苍白冷汗，脉细弱，96～120次/分，血压测不出。头面部染有血迹，鼻根及颔部皮肤裂伤二处1～2cm长，瞳孔对称，对大光反射存在。右尺桡骨下端闭合性骨折，左肱骨下端及尺骨上端闭合性骨折，左跟骨骨折。
> 诊断：
> （一）创伤性休克（重度）；
> （二）多发性四肢骨折；
> （三）头面部软组织挫裂伤；
> （四）呼吸循环衰竭。
> 救治经过：
> （一）抢救休克，补液、输血、升压药物；
> （二）扩创缝合皮肤裂伤，T. A. T，注射抗菌素；
> （三）骨折夹板固定；
> （四）给以氧气吸入；
> （五）呼吸循环兴奋药物；
> （六）死亡前积极救治措施：气管插管控制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胸腔切开心脏按摩，心内输血，心内注射异丙肾素，均未获效。
> 自下午2：20抢救至下午4：25，无效，患者死亡。

“常溪萍专案组”一位成员在下午3点多赶到医院。他的工作笔记本如今尚在。下面是他当时的现场记录：

3：10到医院
常：气闷
多发性骨折“不是自杀”
创伤性休克
处于危险期
3：20会诊骨科
左手手臂骨折
右手手腕处骨折
陈中伟：“血压听不出，有危险。”
3：53瞳孔大
希望不大，脉微弱
脚跟着地
3：53脑外科参加抢救
心跳已停
3：56心跳已停，决定切开心脏按摩
4：00按摩无反应
4：08无反应
4：14停止抢救

就这样，常溪萍离开了人世。他才51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

常溪萍含冤死去——坠楼而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留在那专案人员笔记本上的常溪萍垂危时讲的一句话，却是极为重要的：“不是自杀”！

这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现场亲笔记下来的话。他不可能听错，不可能记错，更不可能偏袒常溪萍。

如果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杀，或者是不慎坠楼。常溪萍之死，竟是什么原因？

宣传机器操纵在权势者手中。常溪萍临死的辩白“不是自杀”，被淹没在“常溪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一片“大批判”声浪之中。

常溪萍含冤屈死，本来已是人世间一桩催人泪下的悲剧。然而，他屈死之后，仍不得安宁。

就在他含冤死去的翌日，尸骨未寒，华东师大的造反派们居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叫：“常溪萍死了好，少浪费国家的粮食！”

有人扎了稻草人，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常溪萍”黑牌，当众烧掉，象征着“焚尸扬灰”！

两天之后——5月28日，《上海红卫战报》登出大字标题：《把常

溪萍焚尸扬灰——怒揭常溪萍的反革命翻案罪行》。作者：华东师大遵义兵团、工农兵突击兵团。

这篇文章，加上了黑体编者按，对常溪萍切齿痛骂。今日的读者已很难有机会读到那样的奇文了，故原文照录于下。虽然斗转星移，那字里行间腾腾杀气犹在：

> 编者按：臭名昭著的常溪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这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自杀向革命人民作了最后的一次反扑。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松懈麻痹。
>
> 常溪萍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在临死之前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常溪萍的阴魂还在作祟；活着的常溪萍们还企图为死去的常溪萍翻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切不可以为太平无事了，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常溪萍这具政治僵尸连同他的主子、伙计、奴才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让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把他烧为灰烬。

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们的语言。就在同一天，“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的一份报告中，便定下调子：“常溪萍用自杀来对抗伟大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他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1969年4月11日，驻华东师大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的《关于死不改悔走资派常溪萍的定案报告》，作了这样的结论：“常溪萍跳楼自杀，向党、向人民作最后的反扑。”

就这样，常溪萍“自杀身亡”仿佛已经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了。

不，不。如果说“盖棺论定”，常溪萍死后，不仅谈不上“盖棺”，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他，真的被焚尸扬灰了！

当时奉命处理常溪萍后事的经办人——华东师大总务处一位工人写下了真实情况：

> 1968年5月27日下午，L讲：常溪萍死了，你们去个人到龙华办理火化……后来L说找造反派的人去。
>
> 第二天，一个穿黄军装的学生和我到陈波浪家（陈波浪为常溪萍之妻——引者注）。他对陈波浪的十七岁的外甥女鲁江说，要火化常溪萍，把户口簿拿出来，打埋葬证。当时陈波浪同志受折磨躺在床上，呻吟，内心难过，讲不出话来。尔后小鲁江找出户口簿……当时造反派在旁边。陈波浪同志当时未作决断。片刻，那个造反派讲：“烧掉算了。”我说，要得家属同意签字才行。最后，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对鲁江说：“你签字，骨灰不要，和大叛徒划清界

限。”当时鲁江被吓呆了……

造反派逼迫一个17岁的孩子签字，使蒙冤而死的常溪萍，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惨绝人寰！

就在常溪萍死后，遭到挞伐，被诬为“畏罪跳楼自杀”的时候，他的妻子陈波浪也被栽上“畏罪跳楼自杀”的可怕罪名，仿佛常溪萍夫妇俩都“爱好”跳楼！

幸亏陈波浪九死一生，劫后犹存，能够揭露事实的真相[22]。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向沙发，坐了下来。她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强忍着心中无限痛苦，向我诉说着她所谓“畏罪跳楼自杀”的真情。

她所谓的“畏罪跳楼自杀”，发生在常溪萍之死以前三个多月——1968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三。

差不多跟本文中叙述的常溪萍被送进医院的情景一样，也是一辆汽车，也是一群造反派呼拥着，也是向医生声称患者系“跳楼自杀”。所不同的是：她是在早晨进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她没有得到“为了运动需要，不能让她把材料带走”之类“恩典”。

经检查，她的七根肋骨断了，其中两根插入肺中，把肺部刺破了。右脚小腿骨龟裂。

血压降到零。她已昏迷不醒。

所幸的是，主持手术的是王道民大夫——该院原副院长，“走资派”。他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一听见她的心脏还在跳，王大夫就决定尽力抢救。

输血。当鲜血源源输进她的血管，血压回升了。

切除了断裂的肋骨，代之以不锈钢。

缝好了肺部的两个洞。

她，终于被穿着白大褂的“走资派”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

然而，离开手术台，推进病房，她却落在一个“造反派”医生手中。他得知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射来了冰冷的目光，不许家人看望，不准家人送东西给她吃。

她受到病痛和冷遇双倍的折磨。

她十几天大便不通，向那个“造反派”医生要几颗通便药片，他都板

起面孔："不给！"

手术后才半个月，就逼她出院！

她躺在家中，奄奄一息，断绝医疗，生活无着落。

她的历史清清白白。她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多年，工作向来认认真真。仅仅因为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这十个字写在大字标语上，写在她胸前的黑牌上。

华东师范大学"常溪萍专案组"一个成员，对于她"自杀"那天的情况，曾作如下回忆：

> 1968年春节，常溪萍放假回去过春节。我于年初三晚上8点多钟回到学校。刚到宿舍放下东西，有人就来告诉我，财经学院来通知，陈波浪"自杀"了，现在在市一医院抢救。常溪萍住在家里，怎么办？当时我和这人就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汇报。记得几个常委在场。他们已经知道陈波浪"自杀"了，当即要我们到财经学院、医院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常溪萍家里，把他带到学校里来住。当时打电话，派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和另外两人一起上车……汽车到财经学院时，发现财经学院两派对立很严重……
>
> 我们从财经学院出来后，就到××路常溪萍家里。当时已十一点钟光景……我对常说，陈波浪自杀，你知道吗？常回答说，知道，小孩去看过了。我又说，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常说：自杀是叛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又问常的态度，常说决不走她这条路。我当时告诉他，学校要他住到学校里去。当时常溪萍拿了一包被子，就和我们一起上车……

就从那一天起，常溪萍再也没有回家。

也就从那一天起，陈波浪"自杀"的消息，传遍了医院、学校，传到了许多地方。令人吃惊的是，迄今，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人还在说陈波浪"自杀"！

法西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陈波浪被谣言泼上一身污水，迄今还未洗刷干净！

她用愤怒的声调，痛斥那无耻的谣言。

1968年，那是非常"革命"的年头，春节也"革命化"了：学校不放寒假，只在春节休息三天。

她被关押在学校。

就在年初三晚上，来了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用棍棒对她进行"审问"。

她的腿骨是被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打断的。她的七根肋骨也是被打断的。她被打得失去了知觉。

红卫兵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为了遮掩自己的罪恶暴行，他们就放出了谣言："陈波浪跳楼自杀！"

她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病痛，在棍棒下活了下来。她斜靠在沙发上，那用不锈钢支撑着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终于说出了谣言的来由。

她说，和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上海财经学院的组织部长和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被打得下肢残疾，组织部长被打得尿血。她是挨打最重的一个。

就在她被驱出医院，躺在家里，生死维艰之际，传来了丈夫的死讯！

就在她如刀剜心、痛苦难言之际，那个"穿黄军装"的"造反派"逼着鲁江签字，不要常溪萍的骨灰。

暂且把常溪萍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放一下。耐人寻思的是：为什么常溪萍夫妇一个死、一个残，蒙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常溪萍最大的罪名是"叛徒"，而常溪萍一生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会成为"大叛徒"？

这一个个问号的答案是惊叹号。一旦把一个个"？"拉直成"！"，常溪萍之死那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明朗化了。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很深。当年的常溪萍一案所及，很深很深……

四支秃笔倒了三支

“四笔并存”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1967年酷夏来临，“文革”的热度也继续上升，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头脑发热中一起倒台，只剩下姚文元一支秃笔。

那是在7月13日晚，毛泽东带着杨成武、余立金登上火车，离开了北京，开始为时两个月的漫长旅行。他巡视大江南北，调查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副统帅”林彪坐镇北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着手部署“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第一战役是打倒“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实现了；

第二战役是打倒“刘邓司令部”，已经实现了；

第三战役是借助于批判“二月逆流”，扫掉一批老帅老将。

须知，林彪虽然名列元帅，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有十个，他只是十帅之一。除了彭德怀早已扫除之外（1959年，他取彭德怀而代之，当上国防部长），尚有八帅。林彪以为只有打倒这八个老帅及其手下一批将军，才能巩固他的“副统帅”的地位。

2月，天赐良机，在北京京西宾馆，老帅老将们当面斥责“文革派”人物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被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林彪想乘机下手，除去军内对手。可惜，毛泽东不允，林彪只得罢休。

7月中旬，武汉两大派严重对立，一场大规模武斗迫在眉睫。谢富治和王力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于14日匆匆从重庆赶到武汉。王力虽然不过是一名“组员”，却自视甚高，仿佛钦差大臣、最高裁判。王力本该调解两大派的矛盾，而他却支一派，打一派。武汉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同情受压的“百万雄师”派，于7月20日抓了王力，批斗了一番。消息传出，全国轰动。

江青闻讯大怒：岂可如此无视“中央文革小组”。

当王力终于“脱险”飞回北京，江青动员了20万人去机场欢迎，然后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大会。江青把怒火转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一时间，“打倒陈再道”、“绞死陈再道”的大字标语贴满全国城乡。

林彪微笑了，又是天赐良机！林彪借题发挥，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以此开展他的“第三战役”。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军队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要借助于这一口号，清洗军内一大批政敌。

[image]

■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编委林杰的近照（叶永烈 摄）

康生、江青、陈伯达当即赞同林彪的意见。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这篇社论由林杰[23]执笔。

1988年12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王力家中采访时，适逢林杰在座。林杰为《红旗》编委。我请王力、林杰一起回忆。此外，1988年12月20日我在北京林杰家中采访了林杰的夫人。2001年6月1日我在北京林杰新居里与他长谈。

我问起社论的起草经过。林杰说，“最初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

当时关锋是《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主持工作。那时，关锋找林杰谈话。关锋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红旗》杂志要发篇社论，由你起草。这篇社论，要强调毛主席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社论可以点彭德怀、罗瑞卿的名。

我问，关锋有没有要你写“揪军内一小撮”？

林杰回答说，没有。

林杰起草的社论的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林杰起草好社论之后，关锋看了，大体上满意。关锋又加了几段。关于“揪军内一小撮”，是关锋在修改社论时加上去的。

林杰说，关锋在修改社论时加上这样一段话：

> 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我在访问关锋时问他为什么在修改社论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段内容？

关锋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的百万人大会上就讲，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内容。

社论由关锋审定，再交到总编辑陈伯达手中。本来，社论由陈伯达签发就行了，跟王力无关。王力虽然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平时并不审看社论。

据王力告诉笔者，当时他在武汉事件中被打伤，正住在钓鱼台。

王力说，也真是巧合，社论清样送到时，陈伯达与他正在一起。陈伯达当即读了一遍给王力听。王力没有表示异议。

此文由陈伯达签发，发表了。

林杰说起关于“军内一小撮”的来源，那是当时关锋主持《解放军报》工作，王力、关锋等四人根据林彪1967年1月8日在军委常委会上关于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写了《军报宣传方针》，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军内一小撮”，于1月10日上送“全军文革并林副主席”。林彪批示“完全同意的《军报宣传方针》”。这清楚表明，林彪是同意提“军内一小撮”的。

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外地见了，深为震怒。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这是毒草。”

思索了一下，他又用笔大书四个遒劲的大字：“还我长城。”[24]

长城，向来是人民对解放军的赞誉。“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乱军的口号。毛泽东怎不心急似焚？

毛泽东下令追查这篇社论。

在毛泽东追究“揪军内一小撮”时，林彪装聋作哑，江青、康生、陈伯达朝“秀才”们一推了事。王力、关锋、林杰成了替罪羊。

“秀才”们急于补救。林杰回忆说：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12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捕。

当时，一起被追查的还有《红旗》杂志编委林杰。1987年12月21日，已经恢复自由并正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林杰，从中国北方某地给本书作者来信，除寄赠他以笔名发表的新作《王清任的脑髓说及其哲学贡献》之外，还在信中回忆往事：

> 对于姚家父子，我只知蓬子是叛徒，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是从鲁迅书中看到的。文元为人，正如你所写的，眼很高，是看天的。我这种人，不在他的眼下。《红旗》发了他交来的几篇文章，是通过关锋给我的。陈伯达对我说，文元的文章，一个标点也不能错。我只有听命照发。从未与之作个别交谈过。虽然当时穆欣曾开玩笑说，我和他是一对：个子高低、年岁都差不多。正是他和陈伯达、戚本禹于1967年8月30日夜2时来《红旗》，宣布将我关起来的。过了一个星期，他发了《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一段关于“五一六”集团两大罪状：反对军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暗指我。从此，我的罪就定了……

在王、关、林写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时候，姚文元正在上海，和张春桥一起陪同毛泽东巡视上海，未参与社论的写作，幸免于纠葛。

到了1968年初，戚本禹也站不住脚了，终于被江青从“中央文革小组”中“端”了出来。这样，“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支秃笔倒了三支。这样，

姚文元安然无恙。

当姚文元听说王、关、戚成了阶下囚，又喜又惧：喜的是一下子除去三个劲敌，惧的是日后自己会不会也步王、关、戚的后尘？

从此，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唯一的“组员”。整个小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权威的“大手笔”。他不再写《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不再写《算命摊旁的杂感》，不再写《折卖行中的声音》，不再写《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他不再一年发几十篇“千字文”了。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一整版、几大版；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两报一刊，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成为全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学习文件”。

1967年，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新的“两评”：

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他声言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历史”。其实，这恰恰是姚文元的精确的自我写照；

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称陶铸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兼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其实，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称自”。

[image]

■ 成为“中央首长”的姚文元

仔细研读姚文元的“四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相关定律”：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他所“评”的对象也在逐步升级，从吴晗，而邓拓，而周扬，而陶铸。

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成为“中央首长”，他的文章少了，话却多了。

本来，他有着“结巴”的“后遗症”，何况老是戒不掉口头语“正是这样”，因此，他总是以笔代言，不大在群众场合讲话。

无奈，他成了“中央首长”之后，而领导“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长讲话”，他不得不向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众组

织”发表即席讲话。“接见”刚一结束，各式各样的油印机便开动起来，《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笔者翻阅着几十册厚厚的《中央首长讲话选》，读着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讲话记录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张永生、杜英信的讲话纪要，颇能反映姚文元当时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进张春桥家中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了，居然跟江青像唱双簧一般，江青说几句，姚文元便插一句，处处“紧跟”。

以下是当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的传达记录：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间：1968年5月19日9时20分至20日凌晨1时整。

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福建厅时，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萧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引者注）同志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萧力同志非常非常关心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们十分亲切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给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美术学院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在这里，姚文元充分显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

姚文元同志补充说：“黄胄这个人也很坏。”（在那种年月，姚文元这样说一句话，便意味着“中央首长点了黄胄的名”，给黄胄带来一场大灾难。——引者注）

我们要求江青同志给我们革命委员会作指示，江青同志说：“不要我指示了，你们是革命委员会嘛！”

姚文元同志插话：“革命委员会就是搞革命嘛！你们去干嘛！”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戏剧界的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浙江有个问题，旧的剧种都有问题。绍兴大班武功基础好，样板戏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移植是很艰苦的改造工作。”

江青同志：“越剧要改造。越剧是资产阶级的。越剧音乐很消沉。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讨厌透了！”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从此全部结束了！”

江青同志说：“你们浙江演古戏、鬼戏，演到出奇的程度，甚至棺材里出僵尸鬼。还有《庵堂认母》到处都演。”

姚文元插话：“那时还美其名曰‘抢救遗产’。”

当我们汇报到胡乔木到杭州活动时，江青同志说：“胡乔木还与

陈冰搞了一个‘辛文兵’！”

姚文元同志插话：“胡乔木到杭州去了好几次！”

当我们汇报浙江省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姚文元同志说：“浙江复杂！”江青同志说：“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嘛！”

凌晨一时，接见结束了。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萧力同志一直亲切地把我们送到大厅门外，握手告别。

我们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说：“谢谢同志们！”

姚文元同志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

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革命青年和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

这次接见，是37岁的“中央首长”姚文元在他的同乡们面前的精彩亮相。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如影随形。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姚文元讲话记录。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虽说是“管窥一斑”，倒也可见全豹之貌。

三个多月之后——1968年8月25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从此，“文化大革命”揭开新的一页：成千上万名工人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戴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袖章，步入“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这一回，不再是“评”，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笔杆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狐假虎威，威风显赫，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震动着中国！

尽管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免费地发给每一个公职人员，但为了显示他今日的炫目光彩，姚文元还是不忘当年整过他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喜欢写长句的他，在一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上题词：“赠给现在仍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卢湾区委的同志们并向你们问好！姚文元。”

[1]从1988年11月3日起，叶永烈采访王力达十多次。

[2]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3]1988年8月2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戚本禹。

[4]1988年3月3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关锋。

[5]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289页。

[9]据马铬、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10]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1980年12月5、6、8日《工人日报》。

[11]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13]引自《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14]《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5]《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17]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5辑。

[18]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5辑。

[19]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5辑。

[20]叶永烈：《1969—1972：陈云在江西》，《知音》1992年第3

期。

[21]爱泼斯坦：《宋庆龄》，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1页。

[22]1986年4月17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常溪萍夫人陈波浪。

[23]本书初版误为关锋。

[24]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却无记载。或是当时误传，或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未收，尚待考证。

第十六章　疯狂的复仇

“不知名的红卫兵”夜半敲门

子夜，万籁俱寂。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谁呀？”保姆披衣起床，问道。

“开门！”命令式的男声。

“你是谁？”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约莫十几个人。一律便衣，男青年居多。进屋之后，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1966年10月8日午夜。

地点：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寓中。

郑君里和夫人黄晨[1]都被惊醒。一人看管一个，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没有任何证明，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他们拉上窗帘之后，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端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年轻人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屉。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语言不多，动作熟练；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

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

括一空。

直到清晨6点，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蹊跷，去得突兀，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

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很快地，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显然有来头。

然而，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99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刊载《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

文静急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也愕然，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文静1977年2月28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1966年10月8日晚赵丹、郑君里等人家被抄，我们认为事关重大，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未回信，仅叫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

文静答复电影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

“夜半鬼敲门”，这“鬼”来自何方？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同蒙在鼓中。

1969年4月23日，受尽凌辱的郑君里，死于危难之世。

一年之后，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也饮恨而逝。

他俩至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1976年10月，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那个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法网。

“十八”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这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歼七”追抄一封信

一位军人领着我，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儿是空军招待所——巨鹿路869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写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另一幢小楼说道，当年“十八”抄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通宵坐镇指挥的，便是江腾蛟。

江腾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1981年进行公审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20年，江腾蛟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这个县出生了223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改名红安县。江腾蛟本是这223名之一，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1971年9月8日，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谕，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江腾蛟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得意地斟满一杯酒，对“三国四方”——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沪的林立果狂笑道：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

江腾蛟成为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江腾蛟的形象，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而戴上那副黑框眼镜则像文人。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家住离巨鹿路不远的高邮路。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他已是个“老上海”了。

1964年，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此后不久，林彪之妻叶群来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四清”蹲点，亲手树起那个闻名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江腾蛟侍奉叶群左右，忠心耿耿，被叶群看中了。以致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林彪唯恐子女在北京不安全，秘密地派人把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如此推心置腹，江腾蛟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

1966年10月初，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的江

腾蛟，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16号楼。车上坐着吴法宪和江腾蛟。他们刚刚进楼，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使江腾蛟不由得挺直胸膛，大声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叶群马上压低了声音，悄然在江腾蛟耳边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

原来，就这么一桩小事，江腾蛟不由得感到轻松起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光是抄郑君里一家，目标太暴露了。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

叶群不由得拊掌而笑，她也早已虑及这一点，只是故意不说出来。果真，精明的江腾蛟，也想到了这一步棋，跟叶群不谋而合。

于是，增加了四家，以便遮人耳目——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江青曾说起，这些人也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斩”。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发明了“陪抄”。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抄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其余“陪抄”的四家，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蛟不敢怠慢，唯唯领命。

翌日，江腾蛟就神秘地飞回上海。

后来，1980年12月9日上午，江腾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如

下供认：

“1966年10月初，吴法宪打电话叫我来北京，还说叫我保密。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吴法宪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叶群，……叶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这封信在哪个人手上不清楚，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叶群说要绝对保密。”

教导队冒充红卫兵

朝沙发下看看，拉开茶几瞧瞧，江腾蛟在仔细检查着巨鹿路那幢小洋房，生怕暗藏着窃听器。

江腾蛟的干将——上海空军部队文化处长张彪，奉命来到。紧接着，组织处长袭著显、秘书处长刘世英、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赶来报到。

六个脑袋，几乎凑在一起。江腾蛟轻声细语，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但是，江腾蛟只说"首长指示"，并未讲明"首长"是谁，也不点明真正要追抄的是什么。江腾蛟又增添了于伶、周信芳两家，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按照江腾蛟的部署，张彪负责侦察七家地形。虽然张彪的脚有点瘸，行动却疾如电，迅如风。只花了半天时间，他就把这七家周围地形、出入路线查个水落石出。神不知，鬼不觉，他的侦察不露形迹。

袭著显奉命组织抄家队伍。江腾蛟决定，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袭著显从警卫排里挑了二十多名战士，假装红卫兵。不过，清一色的男青年，未免太"整齐"了。于是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选了二十多人。

就在这时，张彪侦察回来了。他附在江腾蛟耳边，建议减去于伶、周信芳两家，原因是于伶家就在空军招待所对门，挨得太近容易暴露自己，而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上疏》，被当作"南方的吴晗"，不知抄了多少次家，已经没有"油水"了。

江腾蛟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假红卫兵，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其实，那儿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来上海，常住那里。后来，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敢死队——"教导队"，就住在新华一村，在那里进行格斗、捕俘和各种特殊训练。

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夜里，那儿无人问津。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下达"战斗任务"："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查，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

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据张彪1980年9月18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江腾蛟作了如下五条规定：

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疾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两人带队。

“一号”郑君里家，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袭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江腾蛟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99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10月9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

世英、袭著显飞去。“上面”交代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44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见不得光。1966年10月12日夜9时许，上海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黧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九楼六号门前，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

据当事人张彪回忆：“晚上9点多，江腾蛟把我的房门推开，叫我出来。我出来一看，是叶群、吴法宪、林豆豆，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未看清，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我估计是林立果。送走叶群、吴法宪等以后，江腾蛟回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我进去一看，那麻袋东西没有了。”

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及：那几辆轿车的车牌，全用纸糊上了！

那几个麻袋，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事，当事人、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在1980年8月8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谈得十分详细：

> 回到了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在分类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郑君里等。
>
> （大约过了三天）叶群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
> 过了将近两个月，1967年1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去。过了一会，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我一看原封未动，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也到后院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炉，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记得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30年代丑史材料。

她渐渐舒心，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当她一想及那封落到郑君里手中的信，并没有抄来，不由得又双眉紧锁。

郑君里手中，究竟有什么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1986年6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丁。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40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50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60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image]

■ 著名电影演员、导演郑君里。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1936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钧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1951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士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30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1966年6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30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线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1966年6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image]
■ 王洪文密藏的有关江青的历史材料

[image]
■ 张春桥密藏的有关江青的历史材料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30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1936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27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150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10月8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稿、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1967年9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1958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1959年4月25日至27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1957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1933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1933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荀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荀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原词中个别字，据李求知《忆李淑一老师》修改。——引者注）：
>
>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
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
> 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
> 主席回信是5月11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引者注）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
>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1932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1930年11月14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荀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1958年写给郑君里的信。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1980年12月1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待，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1958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1958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1958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1958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20世纪30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

王莹惨遭江青迫害

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炫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出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

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

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致置于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于是，发生了本章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蛟，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

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查！玉莹在1954年底从美国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查！王莹自1958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

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

果真，1967年2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

“中央文革小组”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30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玉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筋疲力尽。

1967年7月1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于死地。

“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1970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1972年11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1974年3月3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2]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那个华旦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记得，华旦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旦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虽然史东山在1955年已经死了，可是，华旦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旦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账，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1937年2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
>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伶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30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有仇报仇，有冤申冤。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1957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1975年2月4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3]。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文革”之祸，本来不会烧及秦桂贞。

可是，在1968年2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

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image]

■ 张春桥写给江青的信

江青明白，当年，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她跟章泯的同居，阿桂亲眼目击，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这一回，江青不必再通过叶群了。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江青向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30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

“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可以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

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秦桂贞来上海后，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1967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上海南京西路一条弄堂的一座两层小屋的楼上。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的名人容易打听。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1968年3月2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

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

“是的，我叫秦桂贞。”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

信。”

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什么事？”秦桂贞问。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

秦桂贞已经54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

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想必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不过，秦桂贞又一想，也许是彭真夫人找她[4]。因为彭真夫人曾希望她去他们家烧菜，当保姆。只是由于秦桂贞以为在他们家中，进进出出极不方便，所以不愿去。消息很不灵通的她，当时连彭真已经被打倒，都不知道。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

“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就走！”

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

“陈阿姨是谁？”

“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

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

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秦桂贞。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江青当年从重庆寄给秦桂贞的两张照片，也被抄走了。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这是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除了押送者之外，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作家峻青。

作家峻青也是江青下令秘密逮捕的。

那是1968年2月27日傍晚，峻青在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里干完活，拖着疲惫的身体，沿着巨鹿路往家中走去。

峻青，本名孙俊卿，作家，写过小说《黎明的河边》、《胶东纪事》等，也写过许多散文，如《秋色赋》、《雄关赋》等。1955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代理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笔者曾与峻青有过许多交往。

当峻青走到巨鹿路与常熟路的交叉口的时候，一个戴着大口罩、穿蓝棉衣的男子走近了他。

"你是峻青同志吗？"显然，对方有备而来。

峻青点了点头。

此人自称姓张，说是有要事找他，请他一起走一趟。

峻青不知对方何意，当然不肯。来人只说吴法宪要找他。

峻青很惊讶，那位空军司令干吗要找他呢？

那人请他上车，说是到了空军招待所再详谈。

峻青上了车。后来，峻青才知道他叫张彪，空四军文化处长。

峻青随张彪到了空军招待所，见到了吴法宪，此外还有戴眼镜的人在侧。后来他才知道那人就是江腾蛟。

吴法宪要峻青上北京："有什么事，不必问。"

峻青则坚持必须通过组织，他才去北京。

几天之后，3月2日，上海作家协会群众组织的头头通知峻青："中央有个专案，要你去北京。"

当天夜里十时，一辆白色"伏尔加"轿车接峻青直奔上海西郊虹桥机场。到了那里，峻青非常吃惊，一架三叉戟专机在等待他。

机舱里空荡荡，只他一个"乘客"。

飞机起飞之后，峻青听见尾舱里有女人的尖叫声。后来，峻青才知道，她就是秦桂贞。

秦桂贞尖叫，是因为她心中有点害怕。那个姓张的就劝她从窗口看下面。她看见了上海的万家灯火。没多久，灯光消失了，四周一片漆黑。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空军招待所。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睡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服务员见了，只好苦笑。

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连浴缸都洗得干干净净。

她盼望着"首长"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终于，有一天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戴眼镜，讲的话很难懂。那女的讲一口普通话。

从那女的话中，秦桂贞得知，她就是叶群，而男的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们说，是代表江青同志前来看望。这样，秦桂贞才明白，那“想念”她的“中央首长”，确实就是蓝小姐。

据云，叶群和陈伯达回去之后，把见到秦桂贞的情况告诉江青。不久，江青便对吴法宪说：“我不见她。把她监押在北京。防止她泄露我30年代的情况，防止别人向她调查我的情况。”

于是，江青便以秦桂贞“同国内外阶级敌人有联系”的罪名，决定把秦桂贞投入监狱。

秦桂贞记得，3月6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秦桂贞进去后，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后来，她才明白，那在头顶留下的一小撮头发，是为了便于随时“揪”住她的脑袋，进行拷打。

她被单独关进小小的水泥屋里，窗上钉着铁条。

她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关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监狱——关押要犯的场所。

她的罪名，是“首长”定的——“特务”！

天哪，她怎么会成为“特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她，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个。母亲生下她才一个月，父亲就去世了。于是，她被说成“不吉利”，“命不好”，要送给人家。可是，没有人家愿意要她。

她出生的那年，又遇上常州乡下发大水，没办法，母亲到上海给人当奶妈。不得已，母亲把她寄养在一个邻居家，每个月贴补邻居一元钱，邻居用米汤、稀饭喂养她。

秦桂贞五岁那年，被姑妈要去当童养媳。姑妈家也穷。没多久，她又被一家裁缝要去当童养媳。那裁缝每天只有两角钱收入，也很穷。

13岁那年，听人说到上海去做“大小姐”——佣人，可以赚点钱。于是，她就由邻居陪同来到上海，进入“荐头店”——佣人介绍所。秦桂贞刚刚坐下来，就被人领走了。这样，秦桂贞赤脚随那人来到上海宁康里许家当佣人。刚到许家的那天，天那么冷，她却赤着脚，连双鞋子都没有。吃饭的时候，她光吃米饭，什么菜也不吃，使许家惊诧不已——她在乡下向来吃南瓜、山芋当饭，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里打个滚就吞下去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菜？

秦桂贞的运气不错，遇上了好人家。许家小姐许慕贞待她很好，嘱家人给她买了衣裤鞋袜，还给她买了鱼肝油。

从此，秦桂贞安心在许家当佣人。三年之后，婆家要领她回乡下成亲，秦桂贞怎么也不肯。许小姐很同情她，为她请了律师，办了解除婚约的手续，并付给秦桂贞婆家120元银元。

秦桂贞非常感激许家，也就把许家当成自己的家。

许家从上海宁康里搬到安澜路花园村，后来又搬到环龙路上海别墅。当时，许家是租人家的房子住。由于住房还有多余，就把二楼的亭子间租出去。前来租这间亭子间的，便是蓝苹小姐。这样，许家成了蓝小姐的二房东。

秦桂贞跟蓝小姐同龄，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她看到蓝小姐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出于同情，她给蓝小姐送饭送菜。

她万万想不到，这个蓝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后，竟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蓝小姐如今说她是“特务”，她怎么会是“特务”呢？

淳朴、善良的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蓝小姐成为“旗手”，会变得那样心狠手辣！

她记得，当年蓝小姐临走的时候，她送照相册给蓝小姐，蓝小姐曾说：“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

其实，秦桂贞并不要什么“报答”。不过，蓝小姐如今“出头”了，却把她投进监狱，这样的“报答”，使秦桂贞愤怒不已。

秦桂贞记得，在蓝小姐走后，杳无音讯，她很想念蓝小姐。

终于，在1946年2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蓝小姐的照片，还有一张蓝小姐抱着女孩子的照片，高兴极了！

她不识字，请东家念给她听，才知道蓝小姐改了名字，叫江青。那孩子叫李讷。信是蓝小姐从延安到重庆看牙病的时候，从重庆寄来的。

东家读罢信，千叮万嘱，叫她千万别声张，因为蓝小姐已经去了延

安，和毛泽东结婚！

1949年5月27日，当红旗在上海飘扬的时候，秦桂贞在街上看着打着红旗进城的部队，寻找着蓝小姐。

她还记得，1950年，东家的孩子宝宝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

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

那时候，蓝小姐待人还不错，很讲旧情。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是说，记得蓝小姐离开上海时曾说，要为妇女的翻身而斗争。如今解放了，她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干什么活都行。

不久，北京的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这是蓝小姐为她安排的工作单位。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

这个幼儿园非同一般，因为这里离中南海只一箭之遥，许多高干把子女送到这个幼儿园。这样，秦桂贞结识了许多高干的夫人，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彭真夫人张洁清等等。

秦桂贞没有成家。单身的她，在休息时，喜欢到北海钓鱼。钓的鱼送给幼儿园。她的认真工作态度常受表扬。

不过，秦桂贞毕竟是南方人，过不惯北方生活，患关节炎，从1958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自从1950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但是蓝小姐毕竟成了毛泽东夫人，而且对她也还不错。

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在那里，我流的泪水要用面盆装！”

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

精”！

在秦城监狱，每天只有两口杯水，洗脸、刷牙、喝水全在内。她洗衣服，是在抽水马桶里洗的！

每天啃硬窝头。秦桂贞是南方人，吃惯米饭，吃不下那窝头。她记得，五个狱警来了，说是给她“喂饭”。他们把她扳倒在地，四个人分别按住她的双手、双脚，另一个人把妇科检查下身的鸭嘴板塞进她的嘴巴，再把半脸盆的米饭往里塞，说这叫“喂饭”！秦桂贞差一点给咽死。

刚“喂”完，他们就叫秦桂贞站起来跑步，跑得要快，稍慢一点就挨打，据说是为了把“喂”的饭颠下去！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受折磨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她被送进了犯人医院。头一天，她痒得无法入眠。一看，臭虫成队！她不得不用手掐臭虫，手上沾满臭虫血，却无处可洗手。

她向医生说，已经几年没有吃过白菜，很想吃白菜。医院里真的给她吃白菜。可是，那白菜故意不放盐，而且顿顿是这样的白菜。吃了一个星期，秦桂贞毫无力气，起床小便时，无力地倒在地上。

在秦城监狱，她得了腰椎肥大症，这病至今仍每天折磨着她。

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1968年3月6日至1975年5月7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使她举步维艰。

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

她本在1941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屈死狱中

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王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1966年10月3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

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江青曾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

> 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5]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1938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6]

1939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此后，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表演和导演。1946年归来。

1949年12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28岁的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

此后，在1950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孙维世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4—1956年间，孙维世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如米·戈尔卡柯夫《导演教程》等；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主二仆》，作为训练班演出剧目；培训了一批专业导演骨干。1956年夏，孙维世受命与欧阳予倩合作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她导演的《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是在导演艺术上富有创造性之作。

1964年春，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

孙维世曾任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届理事。

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

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

时，14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

二、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

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

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个才子。"[7]

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20世纪30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

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

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1968年10月14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

周恩来闻讯大惊，知道内中蹊跷，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因为孙维世只有47岁而已，何况平时身体是不错的。

不料，孙维世的尸体却被火化，未作解剖！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狱中关了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说了话，他才于1975年获释。他出了监狱，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

江青报复严朴和扬帆

在江青和叶群密谈时，江青还提及一个仇人的名字，那便是严朴——当年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的历史问题，内中的一个就是严朴。

严朴早已去世。1949年6月5日，严朴病逝于北平。在严朴去世后四天，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严朴同志传略》一文。陈云写道：

> 严朴同志一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严朴同志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
>
>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

严朴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陈云送了一个大花圈，上题："魂归江南"。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也献上了花圈。

"文革"的惊雷，连长眠于地下的严朴也不得安宁。他一下子成了两个女人的仇敌：除了江青之外，叶群也对他恨之入骨，因为那个一次次写化名信[8]攻击林彪的，正是严朴之女、陆定一之妻严慰冰！

[image]

■ 陆定一与夫人严慰冰

1968年，一群红卫兵扑向北京万安公墓。那块刻着"严朴烈士之墓"的墓碑，被砸得粉碎！

北呼南应。无锡惠山上严朴的衣冠冢的墓碑，也毁于红卫兵的铁锤之下。

江青和叶群还觉得不解气。她们扬言：严朴虽然已死了快20年，要掘墓鞭尸！

严朴之女严慰冰、严昭等，当时都已身陷秦城。严朴的外孙闻讯，赶紧写信给邓颖超。邓颖超把信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深知鞭尸之言出自江青、叶群之口，不顾她们的纠缠，写下一段近300字的批示，强调："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9]

周恩来提及的"三少爷毁家闹革命"，是因为严朴出身于大地主之家，排行第三，人称"三少爷"。

周恩来的批示，终于使严朴遗骨得以保存。

曾经为项英起草过给中共中央电报，反映蓝苹历史问题的扬帆，亦是江青之仇人。

江青对于扬帆的迫害，远在"文革"之前。

扬帆，是在很偶然的机会，被江青认出来：那是1953年1月，扬帆患目疾，视野缺损，经诊断是由于脑垂体瘤引起，赴苏联莫斯科诊治。在那里，扬帆遇上蔡畅，说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蔡畅要去看望江青，约了扬帆同往。

见面了，江青觉得扬帆面熟，便细问起来，她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当年的殷扬！

江青不动声色，记住了这个仇敌！

扬帆是在1954年12月31日被捕的。那天，扬帆在家中吃过晚饭，接到上海市公安局电话，说是有要事处理。扬帆赶到局里，等待他的是一副手铐！

扬帆被捕的起因，是1952年2月毛泽东来上海视察。2月6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上海。这件事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密报台湾。可是，后来竟被说成是扬帆向台湾提供情报！

不过，在扬帆被捕前，还发生另一件事。

据扬帆回忆："就在我被捕前的1954年3月间，曾经有人向中央写信，揭露江青问题，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而要求布置追查。当时就有人把我联系上了，说：'此信与1939年扬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是同类问题。'而我就在当年12月31日被抓了，这难道是巧合吗？"[10]

扬帆虽说早在1954年底就身陷囹圄，几乎被人遗忘。可是，江青仍一直记得这个仇人。

扬帆回忆道："1976年'四人帮'覆灭前的几天，江青曾常到北京长辛

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去，莫名其妙地突然向该厂党委副书记钱小惠同志（他的父亲为阿英，文学家，本名钱德赋。——引者注），说‘你知道反革命分子扬帆吗？这个人太环了……’可见江青对我是仇恨满腹，耿耿于怀的……”[11]

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的厄运

江青一直没有忘记许建国。在“文革”浪潮中，许建国遭殃了。

新中国成立后，许建国历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

1958年下半年，根据陈毅的建议，中央决定调许建国到外交部工作。

1959至1964年，许建国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65年起，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66年5月，许建国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中国进行访问之后，就留在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的时候，点了许建国的名（许建国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称许建国是“特务”、“叛徒”，并说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

江青一声令下，外交部造反派就对许建国实行“隔离审查”，并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对许建国进行内查外调。

1968年3月11日，许建国被关进秦城监狱，关押达七年之久……

许建国得罪江青，不仅仅是当年江青在许建国手下当“网员”的时候，曾经受到许建国的严厉批评。使江青记恨在心的是，在江青要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就此事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许建国明确表示反对。

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审干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尽管江青已经是毛泽东夫人，也受到审查。江青求助于许建国：

> 有一天，很久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哎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

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12]

许建国当面拒绝了江青的请求，使江青十分难堪。

新中国成立后，许建国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无意之中，又“冒犯”了江青。

那是1953年春，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单独召见了他。毛泽东依然叫他本名杜理卿，说道：“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带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当时，贺子珍住在上海。说完，毛泽东拿了一些钱和物品交给许建国。

不言而喻，毛泽东跟许建国有着多年的友情，正是出于对许建国的信任，才把这样私密的事拜托许建国去办。

此后，毛泽东多次请许建国转交物品给贺子珍。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托付，许建国在上海多次前去看望贺子珍，关心贺子珍的生活。

不料，江青得知此事，对许建国充满恨意。

使江青不快的，还有那起匿名信案件——“18号案”。这一发生于1954年3月的匿名信案件，由于信是从当时的上海寄往江青所在的杭州，而匿名信所写的又是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丑闻，因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把破案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许建国。于是，许建国由于要侦办“18号案”而了解了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种种情况。

1954年11月，许建国调离上海，前往北京出任公安部副部长，“18号案”尚未告破。

后来，许建国的夫人方林回忆说：

> 1967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闹腾着夺权，陈毅副总理处于困难的时候，许建国被周恩来叫到北京饭店，查询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由罗瑞卿部长交办的关于调查江青30年代历史问题的一封匿名信的处理情况。许据实以告，并说问题没有查清他就调离上海，结果如何他不知道。
>
> 在场的张春桥狂妄地责问：“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
>
> 许建国说：“你当时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
>
> 张春桥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
>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点了许建国的名。此后，造反派几次来抄家，索要材料。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为防止意外，他一方面将多年积累的材料及重要笔记忍痛销

毁，一方面嘱咐我说："我可能被捕，而且短期内回不来……要相信党，我总会回来的。"[13]

许建国果真被捕，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倍遭折磨。

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处境有所改善。这一年的5月，被关在秦城监狱七年、年逾七旬的许建国被送往安徽六安"养起来"。

如方林所忆，由于长期的单独关押和摧残，许建国出狱时已身心憔悴，面容枯槁，行动都不那么正常了。

1977年初，许建国查出患未分化型肺癌，已是晚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他在申诉书中写道：

> 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使我至死不能翻身。几年来，由于江青的专权横行，所以我有话不能讲，有话讲不清，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很高兴的，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对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
>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经扩散，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迫切地要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党对我历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现在我虽然病重，但仍在坚决地与疾病斗争，与"四人帮"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许建国在发出申诉书之后，写下一首诗：

> 昨夜沉思未成眠，
> 革命生活忆当年。
> 身患重病何时好，
> 治疗诉书迎春天。

然而当时中央遵循的是"两个凡是"。1977年10月4日，重病中的许建国盼到了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来人，他们带来了中央的审查结论。来人宣布，经"中央三办"[14]对许建国的历史做出审查结论，认为许建国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许建国陷入极度愤怒之中，当场气绝身亡。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众多的冤假错案得以昭雪。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许建国平反。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在北京

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许建国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乌兰夫等中央领导献了花圈，李先念等参加了追悼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致悼词。追悼会后，许建国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专机押送王芳赴京受审

许建国的夫人方林的回忆，提供了追寻“文革”冤案的重要线索：1967年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许建国询问“18号案”时，有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在侧。听到许建国谈及1954年侦查“18号案”时，张春桥说了句：“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

周恩来所以向许建国询问“18号案”这一历史旧案，是因为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受到批斗。罗瑞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江青趁机旧事重提，说罗瑞卿借侦查“18号案”，收集关于她的“黑材料”。

张春桥是否向江青汇报了许建国这次谈话情况，不得而知。但是从以下的时间表可以看出，江青、张春桥当时非常关注1954年侦查“18号案”时所形成的相关档案：

>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办公室保险柜中翻出已封存的有关侦破“18号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张春桥。
>
> 2月23日，张春桥派秘书将“18号案”材料取走，并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说：“我觉得一些不利于他们的材料恐怕早已销毁了。”
>
> 4月21日，江青、叶群派人到上海，将“18号案”全部档案拿到北京。
>
> 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给江青写报告说：“这是上海公安局侦破一个案件的材料，内有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报刊资料和演‘王老五’妻子（江青——蓝苹扮演）的剧照等。”
>
> 江青批示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已自杀身亡，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了。”
>
> 于是，中央专案二办又奉命按江青意旨写了一份请示销毁此案材料的报告，林彪在报告上批：“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负责集体销毁。”
>
> 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谢富治、汪东兴亲自动手销毁了这批查破“18号案”的档案材料。
>
> 就在“18号案”档案材料即将销毁之际，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造谣说：“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一大箱黑材料”。
>
> 9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声色俱厉地指责说：“上海市公安局为什么不追查这件事，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
>
> 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马上行动起来，追查所谓“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内幕”和“幕后指使者”。不久，造反派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报“关于查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颠倒黑白，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黄赤波和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诬为“反党分子”，上挂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黑线”上。

9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6个造反派组织又联名向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李震、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上报了“关于反党黑帮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调查报告”，报告篡改了原办案人员的证词证言，诬陷黄赤波、王鉴、卢伯明、胡志毅（卢、胡都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以“借追查18号案件为名，使用各种卑鄙手段，调查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要求对此案件进行专门审查。

经谢富治、李震、张春桥等无限上纲，说什么“他们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案件涉及面逐步扩大，上海市委副书记梁国斌被关押。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案，由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查。[15]

王芳告诉笔者[16]，“文革”初期，他就被“打倒”，失去人身自由，不断遭到批斗，不断转移关押场所。1968年2月28日，他正关押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据点。突然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来人通知，要他把东西收拾一下，立即转移。王芳以为，大约又是搬到杭州的什么地方。没想到，他被押上车之后，汽车直奔笕桥机场。在那里，他被押上一架空军专机。

王芳后来回忆说：“我上了飞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常。座位的前后左右都用白布隔离开来，除了看见几名神情严肃的军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员互相不能见面，不能说话，我不知道那白色围布里到底还有那些人。大概我是最后一个到机场，我一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直到七年后我从狱中出来才知道，同坐这架飞机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同志，警卫处长王济普同志，还有浙江公安厅吕剑光、丛鹭丹。”

这架空军专机，总共解押17人飞往北京。这17人都是与侦查“18号案”相关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相关人员。一到北京，全部被关押，并由中央专案组进行审讯。

王芳回忆说：“在北京，由中央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样，要我交代在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至此，王芳明白了把他用专机押送北京的原因了。

王芳说，自从“文革”开始之后，江青怕暴露她的历史问题，遂将在查破匿名信案件——“18号案”过程中积累的材料，诬陷为“反革命黑调查”。江青把当年参与“18号案”侦查的相关公安人员，打成“反革命”。

王芳回忆说：“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

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朱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王芳在狱中受到严酷的折磨：

> 我在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饿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国庆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顿饱餐。
>
> 还有一些监规，例如每半个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时放风，就是轮流出来，在天井里走动。规定关在这里的人，谁也不能面对面见到谁。就是上厕所也一样，先敲门报告看管的战士，战士再报告班长，允许了，亮起红灯，才可以去，看管的战士就在厕所门口守着。便后解除警报，方可返回房间。[17]

据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后来告诉王芳：1970年冬，她在北京大学蹲点，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小报，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毛泽东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

从毛泽东对谢静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王芳是非常信任的。

可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拖着，没有释放王芳。

1973年7月，毛泽东又向汪东兴查问王芳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释放王芳的指示。

1973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可是，王芳依然被关在狱中。

据王芳妻子刘馨告诉笔者[18]，她忍无可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

要求释放王芳。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把刘馨写给毛泽东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呈报毛泽东。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9月28日给毛泽东的原信。

1974年10月28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19]："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在签了日子之后，又补写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就在毛泽东亲笔批示的翌日，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向王芳出示毛泽东的批示，王芳终于获释。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关心，王芳比起许建国要幸运，在"文革"之后还能出任公安部部长。

王芳对笔者说："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独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革'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

毛泽东儿媳刘松林上海蒙尘

当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点了张文秋、张少华的名之后，幸亏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信，才算使母亲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

不料，江青“盯”住了刘松林，找“岔子”整她，把她投入了监狱！

自从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把刘松林当作自己的女儿。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1961年秋，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毛泽东劝她再婚，要把她当女儿一样出嫁。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这样给刘松林写信[20]：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
6月13日

知道毛泽东劝刘松林结婚，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

毛泽东让刘松林跟杨茂之见面。一来一往，刘松林满意于这壮壮实实、朴实直率的飞行员。1962年，刘松林和杨茂之结婚，住在北京南池子，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

刘松林已经再婚，已不再成为江青心目中的“杨家将”，离开了中南海，原本可以“太平无事”。

无奈，在刘松林的母亲和妹妹遭到江青的公开点名之后，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那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1971年10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

我于1990年7月15日在北京访问了杨茂之。他身材魁梧，军人气派，非常直率。

他回忆那苦难的岁月：

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同一模式。

[image]

■ 刘松林与丈夫杨茂之（叶永烈摄）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50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把桌上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

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

比如，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同志”，江青当场感谢“林副统帅”的“鼓励”，叶群则领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

老杨听罢，直摇头，说他们在“唱双簧”。这句话，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杨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气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的话，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于是，作为“严重问题”，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

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1979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1986年12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1971年10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

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泾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泾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image]

■ 刘松林重访“文革”中被关押的监狱（现为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叶永烈 摄 ）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这次在上海拍的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1970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糨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21]，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生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1956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1956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

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闵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泾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1956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子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17个月，直至1972年4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1973年7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开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1976年9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粉碎“四人帮”后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

1986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

谁泄露了狄克的秘密

我埋头于小山一般的“文革”档案之中，终日阅卷，感到有点倦怠。正在这时，信手翻开的一卷档案中，那短短的几行字，使我忍俊不禁，倦意顿消。

那是上海师范大学在1976年9月21日向中共上海市委文教组送去的《情况反映（五）》，内中写道：“……我校分部附小二年级学生（八岁）在看电视时说：‘张春桥参加追悼会时，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要复辟’。”

这里所说的追悼会，当然是指1976年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的大会。按规定，连小学生都必须收看现场转播的电视。

一个八岁小学生在看电视时说的一句话竟会印在呈报中共上海市委的内部文件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的三个头目，居然在这份文件上，为小学生的一句话写下三条批示：“继续追查，并报公安局。”“对传谣攻击者，应当严肃批判。”“严防扩散，进行追查，严肃批判后处理。”

随着这“追查”，我看了一卷又一卷“炮打张春桥”的档案，进而又查阅了有关张春桥的档案。我走访了众多的“炮手”，也走访了当年张春桥的亲朋故旧……

1968年4月12日。清晨。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民们，惊喜地发现，一夜之间，街头巷尾刷出了许许多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标语：“揪出叛徒张春桥！”“打倒臭名昭著的老牌叛徒文静！”

文静何许人也？上海人人皆知，文静乃张春桥之妻。文静是叛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至于张春桥是叛徒，小道消息亦有所传闻，甚至说某人敢以脑袋担保等等。

然而，如今用比斗还大的字，写在要道通衢，众目睽睽，人们个个称快。

谁都明白，刷出这样的“炮打”大字标语，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在那年月，张春桥是上海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用手轻轻一指，

就可以把人碾得如同面粉。他的头上，闪耀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之类炫目的光圈。“炮打”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那还得了！

早在1967年1月28日，正处于“一月革命风暴”之中，张春桥尚未夺得上海的领导权，立足未稳，以复旦大学年轻学生为主，曾经掀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被称为“一·二八事件”。不过，那一次的“炮打”，还只是低水平的，只不过向张春桥提出一连串为什么：既然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是“革命”的？既然上海文艺界“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是“干净”的？……

“一·二八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张春桥残酷地镇压了那些年轻的“炮手”。

这一回“炮打张春桥”，事先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炮火比第一次要猛烈得多，被称为“四一二”事件。真是历史的巧合：41年前——1927年，也是在4月12日，上海人民跟独夫民贼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张春桥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上海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地火在运行。张春桥如同坐在火山口上。

地火终于在“四一二”喷发了！上海在怒吼！

徐景贤紧急电告张春桥。

张春桥强装镇定，复电：“要沉着，不反击”，“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要压，不要整人，有些材料也不要紧。”

张春桥真的如此“虚怀若谷”？如此“大慈大悲”？

不，不，我在197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上，看到如下惊人的数字：“张春桥对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的人，要搞所谓‘秋风扫落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者作检查、写鉴定的达三千多人……”

我又从档案中，查到徐景贤当年在“四一二”事件发生后的讲话记录稿，切齿之声，跃然纸上：

> “四一二”事件的发生，是蓄谋已久的。去年（指1967年——引者注）就有一批人，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斗争形式虽有所改变，但更加隐蔽，而且外地也时有谣言。他们选择了张春桥开刀，正是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4月11日，正是在贯彻最新指示时，他们在夜里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这不能单单看成炮打张春桥一个人，这是直接破坏了党中央伟大的战略部署……

事件发生后，春桥很关心，文元也很关心……

“四一二”事件，是适应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和牛鬼蛇神的利益。有人不是说，“张春桥倒了，你们也要倒。”这是反动思潮向我们反扑。这次进攻，是不折不扣的右倾翻案风，右倾分裂主义，分裂中央文革小组，分裂市革会，分裂革命造反派，是右倾投降。有人说，对张春桥“吃不准”。实际上是对中央讲话“吃不准”，而对反动言论吃得很准。

现在，我们已处于掌权地位，要慎重。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复旦的右派又动了（指参加“一·二八”第一次“炮打”的复旦大学师生——引者注）。

“四一二”事件，检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立场。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是坚定的。文教系统不坚定，到现在还有人提出“为什么”。

总之，有人灰心，有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幸灾乐祸。要总结教训。犯错误的人，要找到错误的根源，要进行阶级分析，要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找根源——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好家伙，炮打张春桥，还得从那么多“主义”中“找到错误的根源”！

在“四一二”事件中，有一颗“杀伤力”颇大的“新式炮弹”，不仅引起了上海全市的注意，而且使张春桥颇为惊慌——揭了张春桥的疮疤！

那大字标语的内容，是前所未闻的：“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打倒狄克！”“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说实在的，狄克就是张春桥，连张春桥的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张春桥也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一“机密”。

是谁泄露了这一重大“机密”？主炮手何在？

显然，这主炮手深知内情，而且必定是“长胡子”的家伙！

此人不除，乃是隐患。

一道密令自京来。张春桥要查明主炮手究竟在何方……

鲁迅当年曾痛斥“狄克”

文化革命，革尽文化。

好在鲁迅的书未在革除之列，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起，站在各个图书馆的书架上。

忽然，许许多多的人，拥进平日冷冷清清的图书馆，目光都投向《鲁迅全集》。

因为“狄克＝张春桥”的大字标语，使人们记起了《鲁迅全集》，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鲁迅先生仿佛抽着烟，满脸严肃的神情，在那篇《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着狄克：

>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地说道——
>
>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
>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
>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
>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忒拉（即希特勒——引者注）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鲁迅先生提到的田军，读者们熟悉——田军就是萧军。

鲁迅先生提到的《八月的乡村》读者们也熟悉——那是萧军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推荐它，称赞它，为它写序。

然而，唯独那个骂田军，骂《八月的乡村》，进而骂鲁迅的狄克，读者们向来不知是谁。就连《鲁迅全集》中，对狄克也未加注释。

如今，读者们忽然得知，“狄克＝张春桥”。

哦，那个穿上一身军装、戴着黑框眼镜、神气活现的“中央首长”张春桥，原来就是30年代的文坛小丑！

“狄克＝张春桥”，其实，等于掀开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那很不光彩的老底。

张春桥焉能不恼羞成怒？

须知，上海市多少个单位的《鲁迅全集》忽然被争借一空。好事者甚至刻印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大量散发，名曰“学习鲁迅，捍卫鲁迅”。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一二”炮打的硝烟还未曾散去，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的S忽然都收到一封检举信，内容相同，都是1968年5月7日寄出的。这一式四份的信，告发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炮弹来自上海图书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急如星火。上海市革委会马上派人前往上海图书馆调查，写出了报告。

报告马上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微微一笑，提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句话：“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多妙，既要“查清”，又不要“扩散”，张春桥滴水不漏，把“攻”与“防”都作了安排。

5月22日，王承龙一接到张春桥的手谕，立即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一个很不醒目的所在，成了“查清”、“抓紧”的目标。

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离那座在当时被砸去尖顶的天主教堂不过一箭之遥。它犹如陶渊明当年隐居的田庄，“门虽设而常关”。即使是大门旁那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边门，你刚一进去，便立即自动关上。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鱼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清末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徐家汇藏书楼创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

最初书籍不多，书库只有三间而已。到了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藏书楼开拓新址，移至不远的徐家汇肇家浜，建造了新书库。据

考证：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书籍收藏大增，原有的书库又不够用了，于是请设计建造了一幢二层上下共十二间。上房仿建成具有梵蒂冈风格的西文书库，下层改建成中国古典式的中文古籍书库。现代藏书楼建成以后至1906年才将中外书籍全部移入新库。

藏书楼的创始人为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到上海的南格禄，然扩充其图书事业确定其基础的是晁德莅、夏鸣雷。臂助晁、夏二位发展此钜业者，为晁德莅高足马相伯与李问渔。继马、李二公管理藏书楼的还有徐励、茅本荃、徐允希、张若虞、张渔珊、杨维时等。二十年代末由徐若瑟、徐宗泽主管。徐宗泽乃徐光启之十二世孙，生前计划建造图书馆大厦，开放藏书楼部分图书，未能实现，生病逝世。

上海解放以后，市文化局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命令，将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藏书楼全部图书文物及专用器具征用。

市文化局接管以后，交上海图书馆进行管理，然后成为上海图书馆的组成部分，名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书楼开放以后，市政府又将“上海鸿英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等八个各有特色的小型专业馆全部并入藏书楼，使藏书楼馆藏增至一百余万册。其中收藏解放前出版的旧报纸三千六百多种，居全国第一。[22]

矗立在上海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自1997年起已迁往上海淮海中路），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漕溪北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步入那扇狭窄的边门。

其实，徐家汇藏书楼所拥有的众多的发黄了的报刊，是一面清澈的历史的镜子。美即美，丑即丑，善即善，恶即恶，一切都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易，一笔不改。公安人员那敏锐的目光扫过镜子，从那些“脱离共产党声明”、“反省宣言”中，查出叛徒的真面目。文学史专家、历史学家也都从中探究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当奉特殊使命的上海市革委会的专员进入这座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里记载着蓝苹当年的丑闻；

那里记录着狄克当年的劣迹；

那里刊登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那里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

除了王洪文太年轻，还不够格之外，那面历史的镜子，如实地映出了江青、张春桥当年的真实形象。

麻子怕镜子。经过初步清查，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于1968年5月24日，迅即草成《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确实“紧急”。再晚一步，如果让徐家汇藏书楼里的一篇篇文章变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后果不堪设想！

5月25日，王承龙“紧急”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紧急”批转：“拟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考虑得更加周全，作了如此“紧急”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最后拍板的，是张春桥。他在5月31日“紧急”批示：“同意。”

张春桥为了掩藏狄克，也为了替同党江青、姚文元、徐景贤遮丑，开创了查封一座图书馆的空前纪录！

1968年6月6日，由上海市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杀气腾腾进入幽静的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

这些资料被搬入指定的房间，加锁，贴上封条，在查封时，就连查封专员也未敢翻开这些报章看一眼。

查封专员当众宣布了如下规定：“未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查阅这些资料。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也不得进入书库。”

真是难得，从查封专员口中，居然说出如此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话：“对这些材料，看一眼就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手中拿着《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仿佛了结一桩心事。从此，狄克那篇发表于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火炬》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封入“冻土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30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1968年9月20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8月25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22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6名，工人27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且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30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眼，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30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1977年3月2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9人扩大到20人、30人、40人以至50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37人，军宣队员增至9人。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张春桥继续说："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1970年2月9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唯其"防扩散"，故曰"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
罗良健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
施龙生　1970年2月至1972年6月。

任光亮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

刘萱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

于为刚　1970年2月至1970年4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1971年4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1971年4月28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蒙尘，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1971年5月16日，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雷米封”，自杀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引者注）“红影组”为了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来借30年代电影杂志，由他经办；他，只不过在“四一二”炮打的时候，说过“张春桥是叛徒”、“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他被定为“清查重点”。

1970年2月13日，袁嘉锡被送入“学习班”；

1970年4月24日，袁嘉锡被隔离审查。

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1970年11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

他锒铛入狱，直至1973年3月才被释放。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斗换星移。

和风吹拂的日子，我推开那扇灰色的边门，步入藏书楼。

院子里的水泥路，扫得干干净净。草地上绿草茵茵，彩蝶翻飞。

楼下的阅览室里，日光灯通明，白发银须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干部，戴着眼镜的中青年学者，正在灯下翻阅那些用繁体字竖排的旧报章。照相机在咔嚓作响。复印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那些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封条，早已无影无踪。

我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楼，那里静寂无声，我在书堆里找到了费毓龙[23]。他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国善本书籍。

他，年近花甲，文质彬彬，正襟危坐，说话慢条斯理。他被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七个月。旧事重提，他黯然神伤，如同做了一场噩梦。

他，195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来到上海图书馆以后，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书籍。他懂英语、俄语、法语、拉丁语。本来，他一向在总馆工作，跟徐家汇藏书楼毫不相干。

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进那可怕的政治旋涡。一向做人小心谨慎的他，居然也给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书楼所藏的中文旧报刊，本来根本用不着他这个英语系的毕业生去当管理员。

“文革”开始，藏书楼原来的一些老管理员靠边了。他这个既无政治问题，又无“反动言行”的人，被临时派往那里工作。他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从不去翻看那些30年代的旧报刊，况且他对那些内容也毫无兴趣——当他见到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蓝苹剧照时，他还好心提醒他们，不要看这些，免得招惹是非。

1970年2月9日，当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大会”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异常，因为他一走进会场，就有人跟着他。他坐下来以后，前后左右马上有人坐下来，不时用目光扫视着他。

徐海涛坐在台上，逐一念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个，揪一个。

突然，徐海涛念到了“费毓龙”！那几个事先坐在他旁边的人，马上

把他的手臂拧到背后，按下了头，来了个“喷气式”。

他，一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就在当天被隔离审查。

他，单独隔离。隔离室在上海图书馆主楼的三楼。这座楼原本是旧上海跑马厅的“摇彩间”，他所住的隔离室是原先的厨房间。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24小时开着电灯。看守不时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窥视。冬日，冻得发抖；夏天，热得像蒸笼，坐在那里不动也出汗。

吃着食堂的剩菜。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许洗澡。尿盆在封闭的小房间前发着熏人的臭气。

他想念着妻子、父母和两个孩子。音讯全无。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最可怕的，莫过于孤寂。面壁而坐，终日无言无语，不许与人说话，生怕“扩散”。

人有思想。思想关不住，锁不上。只要他活着，他总是在思想，想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两声鸟鸣，也会激起他思想的涟漪：“鸟儿能自由翱翔于蓝天，我连鸟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楼死一般的寂静，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那是看守来提审同楼的审查对象。他这一层楼里，关押了好多个“炮打”者。声声脚步，由近而远，迈过一级一级楼梯。声声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产生恐惧的感觉，仿佛每一步都是从他的身上踩过。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竟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应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得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待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待什么？

他无法交待，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就算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也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待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待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待，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字。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1972年9月2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还患上了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顾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善本，1706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1682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骊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中的是“士可杀不可辱”；

在“文革”在后，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1970年2月26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1975年4月26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在家中会客。如不事先去信预约，他是不接待的。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怪癖。但是，他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大家都体谅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愿意接待你，那会非常热情的。

狄华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一见。我不忘狄华的叮嘱，在信中写明，他的通讯处是狄华告知的。

信寄出以后，好几天不见回音。

我决定上他家去拜访。

他住在上海市区一幢三层楼房里。我是在早上8点到达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已经外出，往往夜深方归。

他的房间在三楼。从外面望过去，有一扇窗斜开着。一只猫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着好几盆花。

老邻居们告诉我，葛正慧住在那里好多年了。本来，他跟母亲一起住。1962年，母亲去世之后，他一直独居。他的生活很简单，买点面包、罐头，炒盘青菜，如此而已。

来了客人，一向在楼下弄堂或公用灶间里谈话。即使是上海市统战部来人，也如此。

来访者写信预约，他答应了，到了预定时间，才能在楼下见到他。邻居们把他的邮件，或者放在灶间，或者从房门的缝里塞进。

邻居们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图书馆造反派来抄家，他的书真多，装了一卡车！

过了五年多，邻居们终于又见到他。他变得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双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独进独出。偶然，他说过一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果真被他说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帮”垮台了！

邻居们都说，他很有学问，埋头看书、写作。夜深了，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我从他家回来，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应与我长谈，我才有可能了解这位当年“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信。

信中说：

> 我因高血压多年，说话时间一长，血压即升高，就头眩。馆内我不常去，现抽暇参加编辑会刊《图书馆杂志》，有时出去组稿、看稿、就诊（坐“四人帮”黑狱多年的后遗症，病较多）往往不在家。
>
> 我准备送一些参考材料给你，以便你写作。但我手头的一些剪报已散失了，这几天我到亲友处寻索。

读罢来信，我甚为欣慰。虽然我未见其人，却已见到一颗赤诚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为他在帮助我寻找写作资料。

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拜访）。我在上

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1976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在信中，他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四人帮”兴亡》的镜鉴。我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我期待着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

他查出“狄克”是谁

暮霜降临。

我徜徉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注视着每一个从跟前走过的行人。

一个头发谢顶、戴着眼镜的老人，双脚边走边拖，发出声。尽管我从未见过葛正慧，但是根据邻居们所说的特征，我猜想是他，上前问道：“你姓葛？”

果真是他[24]！

我领着他，来到我家。他前庭开阔，头发灰白，热忱而健谈。他生于1924年，屈指数来当时已六十有二。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宁波口音。

他一口气谈到将近深夜12点。未能谈完，过一星期他又来了两次。他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上海人民反“四人帮”的斗争。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他对“狄克”的研究。

“文革”前，他担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虽然他不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但常常去那里查阅资料。

他早在50年代初，便查证了“狄克＝张春桥”这一公案。

他怎么会研究起张春桥的笔名来的呢？

其实，这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书目参考部工作，就要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则必须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则必须研究作者的笔名。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

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笔名学”。

笔名，看似简单，其中学问颇深：隐士、战士和暗奸，都爱用笔名。

隐士与世无争，只求发表作品，却不愿让读者知道作者是谁，于是取个笔名，隐去真名实姓。

战士要冲锋陷阵，把投枪和匕首掷向敌人。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也用笔名。

暗奸当然对笔名有着特殊的“爱好”，射冷箭，放暗枪，是他们的看

家本事。这种勾当本来就见不得人，于是笔名便成了他们的隐身术。暗奸们往往有许多笔名，甚至写一文章化一个笔名。他们的笔名，真是弃之如敝屣，极难考证。

当然，细细探究起来，种种作者还有种种缘由采用笔名。

葛正慧做了三千多张卡片，查明了许多作者的笔名，张春桥，只不过是他所研究的众多作者中的一个。

一天，他在细阅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于1937年2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这是一本只有164页的小册子，很不起眼。

读到该书第104至105页，忽地眼前一亮。哦，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狄克”是谁。

鉴于这段文字是“狄克＝张春桥”的铁证，又从未向外透露，故引述于下：

> 这一节的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　田军在墓前焚烧〈作家〉〈冲流〉》。
>
> 读者诸君，鲁迅先生死后我们已陆续报告了你们很多趣事了。现在再报告一点。那是关于田军的。
>
> 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间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田军这名字也很快的给一般人知道了。
>
> 《八月的乡村》是奴隶丛书之二，第一册是叶紫的《丰收》，于是许多人就说田军是叶紫。其实，田军是哈尔滨的一个青年，道地的东北作家也。《八月的乡村》也是东北被压迫的民众和义勇军的描写。
>
> 《八月的乡村》虽则并不写得十分好，但是田军是东北人，见闻较切，比之一般未离上海一步而大写东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头子”（指鲁迅——引者注）一看就很激赏，作序印行。
>
> 《八月的乡村》因为鲁迅一序而销路甚佳，田军一举成名，那么，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是当然的。
>
>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文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
> “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受批评家的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唯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

[image]　　[image]

■《鲁迅先生轶事》封面　　■《鲁迅先生轶事》版权页

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是狄克，《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说《三月的租界》批判的是张春桥，不言而喻：狄克＝张春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出版于1937年，当时张春桥不过20岁，文坛小卒而已，谁也不会预料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上的记载，当是可靠的。

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又多了一张，写明“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何书。

葛正慧写这张卡片，是在1953年。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

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与鲁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却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他的依据。

不料，魏金枝拊掌笑道：“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跟鲁迅唱对台戏，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如此说来，魏金枝深知张春桥的底细。葛正慧赶紧跟他细细攀谈，方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子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待吧！交待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葛正慧度过五个酷暑，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体内居然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天，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上从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待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

群蚊围攻的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象，“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行踪诡秘的“扫雷纵队”

坐在上海兴国招待所宽敞的套间里，脚下是一片厚厚的紫红色的地毯。刚刚洗过热水澡，张春桥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严实地密封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只写着一个“张”字，字迹是那么的熟悉。

张春桥每隔几天，就要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封。他关照过秘书，只写一个“张”字的信封，必须由他亲自拆看。

这一回，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最新一期《扫雷》。标题一下子就把张春桥的目光吸引住了：《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从何而来？》。

《扫雷》写得有声有色。据“调查”，上海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是由北京“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5日成立，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译者注）所策划的，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子，乌兰夫的外孙，邓颖超的秘书的儿子……

虽说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传单成千上万，《扫雷》却属“绝密”的简报式内部刊物，每期只印几份而已。有时，干脆不印，用复写纸复写。这份《扫雷》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每期必看的。自从发生“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之后，他便下决心，建立一支“扫雷纵队”。《扫雷》，便是他的“扫雷纵队”不断编发的情报刊物。

张春桥的“灵感”，最初得自林彪在1967年1月的一次讲话：“要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

张春桥首先要扫除的，便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张春桥的“地雷”。

一个32岁的青年，被张春桥看中了。

张春桥最初注意起这个青年，那是在1966年10月。一个名叫游雪涛的人，自称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给张春桥写信，反映上海青年话剧团某女演员因“造反”而处境维艰。

当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正要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张春桥正需要在上海树一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而游雪涛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张春桥“送”上了这么个“典型”。

趁着回上海的时候，张春桥让秘书调来游雪涛档案——这是张春桥

的习惯，先要摸一下“底牌”。

牛皮纸大口袋，上面印着“干部档案袋”，用毛笔写着“游雪涛”三个字，很快送到张春桥手中。

> 游雪涛，1935年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 此人家庭出身填“城市贫民”，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父亲，母亲当时只28岁，拉扯几个子女长大，家庭确实常常揭不开锅。他是长子，16岁就进入上海绒布厂当工人，以分担家庭重担。靠着自学，靠着苦读，学会了写作，终于成为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又进一步成为文艺组的副组长……

虽说张春桥自己的历史不干不净，但是他却尽量要用一些历史干净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免被人揪住小辫子——他已经吃够了妻子文静的苦头！

看来，游雪涛的历史是清白的，何况是个党员，头脑灵活，笔头也可以。

于是，“面试”开始了。

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对于游雪涛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意识到，他要交红运了。

平常，张春桥跟陌生人见面，先要“嗯”、“喔”一阵，让人家说够了，这才开口讲那么几句。这一回，跟游雪涛握手之后，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很快就发觉，这个年轻人是块料子，头脑里充满政治细胞。年纪轻轻，对上海政界人士，有着清清楚楚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张春桥认识了游雪涛，游雪涛也敏锐地认识了张春桥——这个“大人物”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情报！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界秘密情报！

聪明的年轻人投其所好。他常常给张春桥写信，那每一封信，就犹如一期《扫雷》简报。他是个小人物，而小人物有着大人物所缺少的方便之处：他可以随意在各处串连，可以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以记下每天街头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去摸一些政界人士的“底牌”……他在上海滩上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何况，他手中有记者证，在三教九流之中活动是很方便的。

这样，小人物的眼睛成了大人物眼睛的延伸，小人物的耳朵成了大人物的耳朵的延长。张春桥对于上海滩上的一举一动，都随时获知。

最初，只有游雪涛单枪匹马在干。他不断给张春桥写信。每一次接到张春桥托秘书打来的电话，每一次的约见，都使他备受鼓舞。

张春桥意识到，偌大的一个上海，只有一个“包打听”太不够了。于是，游雪涛扩大为“游雪涛小组”，亦即“扫雷纵队”。

游雪涛以“捷尔任斯基”自居，把他的小组喻为“契卡”。他只效忠于一个人——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之后，便任命游雪涛为这个“市革会”的“群运组”副组长。

特务机关，从来都是有着堂而皇之地名称。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是“调查”又是“统计”，多么动听。张春桥给游雪涛挂了个“群众运动组”的名义，何等迷人！

张春桥给“扫雷纵队”安了秘密基地——上海永福路244号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从此，“扫雷纵队”的代号取为“244”。永福路是一条临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那里离张、姚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盘踞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之内均能到达。

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扫雷纵队”。笔者查阅了“扫雷纵队”全盛时期的名单，全纵队共计35名队员。这些“侦探”的职业，五花八门，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复旦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等等。队员之中，还配备了打字员、司机。全队拥有四辆汽车，四支手枪，一颗美制手雷，三架微型录音机。经张春桥批准，这支队伍直接向“市革会”领取经费，但从不说明用途。

在35个人之中，只有游雪涛与另一个头头夏某有“市革会群运组”的工作证。游雪涛自称，这是一个“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组织！

游雪涛在献给张春桥的一份《一年工作总结》中，曾写及这支特殊队伍的不为人知的心态：

> 我们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
>
> 我们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诽谤。
>
> 一年多来……极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员在上海活动，同志们冒着倾盆大雨，二十四小时不断地轮班守候大旅馆门口，以便知道他们究竟与上海哪些人对口……

什么“老人串连会”？哦，哦，游雪涛一口咬定那是“走资派”搞的。

“听说”——仅仅是听说，“江苏老人串连会”有那么个姓李的来上海，又听说，这个人是“厅局级干部”。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成了游雪涛

小组追捕的对象。

“注意！注意！此人坐了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扫雷纵队”紧急动员起来，那辆“华沙”在雨中开出“244”号；那辆“本茨”轿车也出动了；十多辆两用车，在雨中急驰。

外滩查过了，中百一店查过了，九站也查过了，没有发现“米黄色的伏尔加”。

对了，对了，听说那人住在淮海路——他们称之为“淮海路老李”。

集中兵力细细在淮海路搜寻。

像大海捞针一般，好不容易，在锦江饭店的车库里，查到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一看汽车车牌，正是江苏的。

虽说“淮海路老李”查到了，游雪涛却不急于逮捕他。队员们在风雨交加中，躲在角落里，监视着锦江饭店，以求查明“淮海路老李”跟上海哪些“走资派”联系。

很遗憾，并没有“大鱼”上钩。

“扫雷纵队”动手了。他们戴着大口罩，在墨黑的深夜突然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把他蒙上双眼，架走，塞进汽车。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当遮眼的黑布被取下之后，他才知道，已被押进一个地下室。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凶神恶煞；“迎接”他的，是木棍皮鞭。

“淮海路老李”无端蒙冤。他，竟不明不白地被“扫雷纵队”关押了几个月。

“淮海路老李”只是受到“扫雷纵队”迫害的众多的无辜者中的一个。

“扫雷纵队”的宗旨，是张春桥定下来的，即“挖出陈、曹埋下的第二套班子”。其实，“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扫除张春桥的一切政敌”。

游雪涛“忠诚”地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工作着，实现着张春桥定下的宗旨。游雪涛所编的《简报》、《动态》、《动态增刊》，达300期之多，密送张春桥的情报达100万字！

无孔不入的“福尔摩斯”

据游雪涛自云，那300期简报，“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笔者在上海档案部门细细阅读了厚厚的案卷，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读后感：触目惊心！

“扫雷纵队”是张春桥手下的“福尔摩斯”。翻阅着案卷，他们的“丰功伟绩”历历在目。

江苏宜兴西侧，有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县城——溧阳。一天，两个35岁上下，干部模样的男子，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出现在溧阳县公安局。介绍信上写明来者政治面目，均系中共党员。有着这样完全合乎外调手续的介绍信，当来者提出要求查阅敌档，县公安局理所当然地同意了。

来者并非一般人事外调，介绍信上写着：“准备汇编中统特务组织的敌情材料。”

来者在敌档中，终于查到一份当年中统特务机关拟定的在新四军中进行策反的人员名单，如获至宝。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来者压制着内心的欢欣，装成若无其事一般，又翻拍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敌档，这才离开溧阳。

照片冲出后，游雪涛大大表扬了那两个小头目：“这一回立了大功！”

照片迅即送到张春桥手中：那策反名单上，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张春桥对陈毅早就恨之入骨。游雪涛心领神会，偶然听说溧阳县敌档中有陈毅材料，急急地派人前往外调。

遗憾的是，本以为这下子抓了个重磅炮弹，谁知是个空壳：唉，那陈毅非此陈毅，只不过同名同姓而已！

一场空欢喜！

在所谓“二月逆流”发生之后，张春桥恨透了那个拍桌大骂他的叶剑英。

游雪涛闻风而动，马上为张春桥提供炮弹：钢琴家刘诗昆之父刘啸

东在上海。当时，刘家是叶剑英的亲家。显然，从刘啸东身上，可以找到进攻叶剑英的材料。

很快的，“扫雷纵队”把刘啸东作为侦查的重点。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详细材料，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获知，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曾经抄过刘家，立即派人到上海音乐学院。那人从“抄家物资”中，查到一包刘诗昆与叶剑英女儿的通信，当成了不可多得的“炮弹”，送到游雪涛手中，而游雪涛马上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亲笔批示：拘留刘啸东！

不久，叶剑英会晤外宾来到上海。叶剑英成了“扫雷纵队”窃听、监视、跟踪的目标。

那几天，《扫雷》简报频频编发，不断向张春桥密报，叶剑英在上海会见了谁，谈了些什么。

紧接着，“扫雷纵队”又扫到一颗重要的“地雷”：

这颗“地雷”，是在上海一所不大的学校——化工某校。校党委书记，是一个深知张春桥历史的人。他，便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张春桥在自己的“简历表”中写及的那个人：“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吴成志，亦即宋振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的组织者。这个非法组织成立不久，被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去宣布解散。张春桥所谓“入党”，是入这个“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

1967年5月，宋振鼎在学校里受到审查。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委员会”，谈到了他曾介绍张春桥加入这个非法组织。

该校专案组获知张春桥这一历史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和“上海市革委会”写了报告。这报告，落进了张春桥妻子文静手中。

张春桥大吃一惊，下令“扫雷纵队”前往扫雷。

擅长于“上挂下联”的游雪涛，居然查出化工某校的专案组“背后有一双黑手”！因为专案组中某人的父亲，“与叶剑英关系非常密切”！

这还得了！那个专案组的六名成员，马上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遭到了反审查，蒙冤受屈达八九年之久。

遵照张春桥的叮嘱，“扫雷纵队”曾秘密监视离“244”并不太远的一幢小楼。

那幢小楼的女主人，深居简出，在上海鲜为人知。不管“文革”浪潮

怎样卷过来、翻过去，那幢小楼依然安安静静。

然而，来自“扫雷纵队”的消息，不仅惊动了张春桥，而且当张春桥转告江青时，江青也很当一回事：小楼门口，常常停着一辆小轿车，从车号判断那是上海警备区的。

小楼的女主人究竟是谁？

贺子珍——毛泽东的前妻！

对于江青的心态，张春桥一清二楚。早在1964年中秋节，“女客人”来沪。在中秋晚会上，上海文化局安排的节目单上有上海评弹团赵开生、余红仙的评弹新曲《蝶恋花》。张春桥看到节目单，立即把《蝶恋花》一笔勾去。市文化局哪知其中原因，张春桥怒斥道：“还问什么？这还用问！”因为“女客人”要出席晚会，虽然《蝶恋花》是毛泽东写的词，但那是为思念杨开慧而写的，唱给“女客人”听，岂不是自讨没趣。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要“扫雷纵队”注意那幢特殊的小楼。

1967年12月16日，游雪涛致张春桥的信中，这样写道：“就拿最近调查（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来说吧，夏某某深知廖政国的为人，以及进行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的风险，他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

于是，一份份《扫雷》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最令人震惊的是，“扫雷纵队”以20多期简报，5万多字，向张春桥密告了“上海警备区14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简报中甚至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廖政国将军受尽张春桥的排斥、打击，忽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廖政国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写下七言一首明志：

征战何止千百次，此次进京最无底。
人生自古谁无死，愿留正气飘天地。

过度的忧虑，随之而来的是癌症伴生，廖政国将军离开了人世。

游雪涛一手伸进上海警备区，一手伸进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他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便是编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他把原华东局的97名干部列为“黑线人物”，一个个贴上标签，诸如“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敌情”：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

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文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

中，是这样的：“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1968年3月14日下午2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54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上海藏书楼里的斗争

“狄克”，一直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每当他的轿车驶过离他家并不太远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如同驶过一座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的军火库。

《大晚报》一张也不缺地收藏在那里。

他曾做过一个梦：雷电交加的夏夜，一声霹雳响过，徐家汇藏书楼火光冲天，一张张《大晚所》顿时化为灰烬。

可惜，梦只是梦。徐家汇藏书楼装着避雷针。

后来，曾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那是1966年8月下旬，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各地图书馆，都成了红卫兵“铁扫帚”进行清扫的目标——因为图书馆几乎集“旧思想、旧文化”之大成。

我查到戚本禹在当时接待各书店、图书馆代表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大革文化命”的活生生的见证——

[image]

■ “文革”的重灾区——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叶永烈 摄）

新华书店代表：“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8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书店里的古旧书被查封了。有些造反派来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出版的书，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外，都要鉴别后再发售。”

中国书店代表：“中国书店现在不收古书。有些学校在烧古书，认为古书没有用了。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满楼道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不少人家在烧字画。”

造纸厂代表：“我们已收来了不少古书，有些已经化浆造纸。还有很多古书堆在那里，当作造纸原料。北京师大刘盼遂的古画，也送进了造纸厂。通县纸厂已收到几千吨线装书！”

北京图书馆代表：“我馆清理了书库，已有不少书送入造纸厂。”

红卫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写的书都毁之一炬。毁之一炬，就是烧书！”

戚本禹："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们代表新生产力么！他们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

戚本禹的话，为焚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红卫兵们壮胆。

北京吹什么风，上海掀什么浪。

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红卫兵高举红色大旗，杀进"封资修大本营"，勒令上海图书馆领导交出所有书库的钥匙。他们拿钥匙干什么？为的是要杀进书库"扫四旧"——烧书！

张春桥得意了。他推波助澜，说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动性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真正有用的不过一架子！"

北京一批红卫兵杀进上海，冲到徐家汇。他们看见徐家汇大主教堂尖屋顶上的十字架，气急败坏："红彤彤的上海，怎么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们冲进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机当成"间谍"的"发报机"！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

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1967年4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烧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查阅发黄了的报纸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都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各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1966年9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文革”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61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61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61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有22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61人定为“叛徒集团”，就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借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61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露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1936年3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妻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得到鲁迅的推荐、支持，才出版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鲁迅全集》，那上面有鲁迅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葛正慧耐心地“辅导”着西安交大的红卫兵。

当红卫兵读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写的序言，葛正慧又进一步“辅导”他们读《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

自然而然，红卫兵们问：“狄克究竟是谁？”

葛正慧轻声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

“真的？”

“千真万确！”

红卫兵们第一次听说，张春桥原来是这么个人！

他们从多次的“辅导”中，知道葛正慧颇有学问，相信他不会说假。

红卫兵们的本意，是要在徐家汇藏书楼抓“叛徒”，不料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狄克”。

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全文抄录了关于“狄克”的材料。葛正慧在微笑

中，把“炮弹”交到了红卫兵手中。

“狄克＝张春桥”，悄然在红卫兵中“扩散”。

另一支兵马杀进藏书楼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另一支兵马杀进徐家汇藏书楼。

虽说也是年轻人，戴着“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鲜红袖章，但显然要比西安交大的红卫兵的水平高得多。用不着辅导，他们就已经知道“蓝苹＝江青”。

这支兵马来自邻近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名唤“红影组”。他们怀着一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赤诚忠心，前来查阅20世纪30年代影坛报刊，编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

他们在穿过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之前，对于“英勇旗手”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他们的心目中，将要编写的《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红线的代表人物是江青，黑线头目则是“四条汉子”。他们步入徐家汇藏书楼，就是为了查找“红线”怎样斗“黑线”的历史资料。

他们几乎已经能够熟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在《纪要》中，对江青作了高度评价：“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

他们也记得，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中，对江青的赞扬：“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面对这样的权威性评价，他们心目中的江青形象，如同他们厂里巨幅宣传画所画的那样：穿着军装，手持鲜红的语录，背后是哗啦啦飘着的革命大旗。

然而，这群年轻人在藏书楼里晕头转向，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查到江青30年代鲜红的历史。

他们请求葛正慧当书山报海的向导。

葛正慧当然满口答应。

不过，对于这几位读者，用不着像对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那样的辅导。葛正慧不动声色，只消把一颗颗“炮弹”搬出来，放在他们的面前，就可以了。

《电通画报》、《大公报（星期影画）》、《大晚报》、《申报》、《青春电影》、《时事新报》、《民报》、《中央日报》……葛正慧来回搬运“炮弹”，忙得满头是汗。

初是惊讶，继之疑惑，进而沉思，终于怒形于色。“红影组”的年轻人们，万万料想不到，蓝苹当年竟然是那样的角色。

历史最诚实，历史无法用油彩化妆。那些20世纪30年代众多的报刊，活生生地勾画出当年的蓝苹形象。

“红影组”恍然大悟：30年代的电影演员蓝苹，才是本色本貌，60年代的“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倒是浓妆艳抹的演员！

蓝苹在30年代的上海，曾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红影组”的年轻人们只是看看那些报道的大标题就已触目惊心了：

《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
《为来为去为了一个宝贝的蓝苹，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
《唐纳蓝苹交恶原因：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
《悲剧闭幕　喜剧展开　蓝苹章泯　蜜月旅行》……

哦，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真实形象！

“红影组”的组员们面面相觑，那本《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不知该如何下笔！

有人秘而不宣，有人避而不谈，也有人挺身而出，准备“炮轰江青”。

就在这时，北京电影学院司徒某某一彪人马，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藏书楼。他们也是为了收集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光辉事迹”，把照相机对准一页页发黄的电影画报。也就在这个时候，游雪涛小组的触角，伸向了徐家汇藏书楼。

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刚刚过去，游雪涛的眼睛，便盯住了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班人马到得最晚，却最早被“扫雷纵队”发觉——因为“扫雷纵队”的密探进入藏书楼之际，司徒某某一伙正在那里翻拍照片。

紧急情报立即送到游雪涛手中。

这一回，游雪涛并不急于下手抓人。他派出一个姓朱的密探，与司徒等人混在一起，朱某是上海电影界人士，很快就跟司徒混熟了，想弄清他们的背景。

朱某密报：司徒一行，住在上海越剧院学馆，在住处大声地讲江青坏话。

游雪涛向张春桥密报。

“抓！”张春桥下达了命令。

就在游雪涛带领队员们扑向上海越剧院学馆时，却扑了个空——司徒一行已经走了。

“上哪儿去了？”他们打听着。

“听说去杭州了。”

急急赶往上海北站，游雪涛亲自出马，带着朱某等五人，风风火火前往杭州。

游雪涛求助于王洪文的把兄弟——翁森鹤，这个31岁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造反起家，已成为浙江一霸，人称“浙江的王洪文”。

待到翁森鹤带着游雪涛查出司徒一行的踪迹，司徒一行已经返回上海了！

游雪涛双手空空回到上海，好不懊丧。赶到上海越剧院学馆，又不见司徒一行的影子。

朱某到底有办法，居然查明：司徒一行匿居在上海成都北路四七一号的成都第二中学。游雪涛带人去抓，逮捕了北京电影学院五人。唯司徒漏网——他已逃往南昌。

游雪涛把捕来的五人，投入上海漕河泾看守所，关押了五年！从被捕者那里得知，他们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得的资料，分藏于他们在上海的四个亲友家。

“扫雷纵队”兵分四路，同时抄了这四家。没有证明，没有手续，说抄就抄，他们如同当年的“盖世太保”。

在闸北某家小阁楼里，终于抄得两卷尚未冲洗的胶卷。显然，那是重要的“罪证”。不料，被游雪涛的女儿拿着玩，打开来看个究竟，全部曝光！

幸亏这是游雪涛的女儿干的。要是别人，说不定会因此被投进铁牢。

就在这时，一封告密信从上海图书馆寄出。

主炮手被关进秘密监狱

主炮手葛正慧落网了。

徐海涛得知葛正慧是说出“狄克＝张春桥”的“主犯”，亲自带队前往抄家，抄得片纸不留，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唯恐留下一颗“炮弹”。

紧接着，他奉张春桥之命，提审葛正慧。

一场唇枪舌战，在徐海涛和葛正慧之间展开。一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一个微言大义，不乱方寸。

“葛正慧，你老实交待你的‘炮打’罪行！”

“我没有罪！”

“你没有罪？‘狄克’不就是你说的吗？”

“狄克是张春桥的笔名。说了一个笔名，怎么能说是炮打呢？”

“混蛋！你到了今天，你在我的面前，还敢炮打？”

“狄克是鲁迅批判的。如果说炮打，只能说是鲁迅炮打狄克！鲁迅炮打张春桥！”

“你今天还在‘扩散’！”

“《鲁迅全集》今天还能买到，还能借到。《三月的租界》谁都可以看。这能说是在‘扩散’吗？”

“你干吗往《鲁迅全集》上扯？《鲁迅全集》上并没有写狄克是张春桥。分明是你在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谣！”

“我造谣？我是研究笔名学的。我说狄克是张春桥，我有根有据。你不信，你去问问张春桥，狄克是不是他的笔名。如果他否认，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混蛋！十足的混蛋！在你的大量罪行中，只要随便抽出一条，就够得上枪毙！”

葛正慧沉默不语，冷眼以对。

徐海涛恨不得一口吞掉他，把双拳攥得紧紧的，说道：“枪毙，还便宜了你！我们要把你关起来。你如果拒不交待，就把你永远关下去。”

在葛正慧被押走的当儿，徐海涛忽然又叫住了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图书馆里还有谁知道张春桥的化名，向谁扩散过，只要你交代出来，你就可以立大功，受大奖，可以立刻释放……"

葛正慧被押走了。

手上戴着锃亮的铁铐，坐在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上。他的旁边，坐着看守，他被"勒令"低着脑袋，不许朝窗外看一眼。

汽车在疾驶，不知驶向何方。

开了很久，汽车才停下来。这时，听得一声"下车"的命令，葛正慧终于抬起头来。

奇怪，这儿一点也不像监狱，倒是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

葛正慧被独自关进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空荡荡的，没有桌椅，没有床。窗敞开着，窗上没有玻璃，却横着装了一根根铁条。朔风从窗口呼呼灌进屋里，水泥地变得像冰一样冷。窗外，穿便衣的看守在监视着。

葛正慧意识到，这儿是秘密监狱！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五年多，竟不知秘密监狱究竟坐落上海何方。他只是偶然从看守们的对话中，隐隐约约得知，这儿是"三所"，仿佛是在上海西郊虹桥的沈家宅。

三九寒天，睡在水泥地上，手脚冰凉，彻夜难眠。

一日三餐，不过是冷饭、霉干菜、山芋之类，从车门上的小窗口塞进来。

大抵是生怕他在里面写什么，连草纸也不给。屋里放着马桶。大便之后，只好从棉胎上扯下一点棉花当草纸。

看守昼夜守在窗外、门口，身佩短枪，来回踱着。进进出出，看不见一个穿公安警服的。

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上面装着铁丝网，乌云低低地压在铁丝网上。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沉闷，那样的暗淡。

这时，葛正慧的耳边响起徐海涛的那句话："你如果拒不交待，就把你永远关下去！"身陷囹圄，意识到那句话的分量。确实，他会被"永远关下去"，直至无声无息地死于这秘密监狱。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耳边响着凶神般的责骂声。

“你交代，你为什么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造谣？”

葛正慧明白，所谓造谣，就是指他讲出了“狄克＝张春桥”。他立即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造谣，我有根据。”

“什么根据？”

“一本书上写着。”

“哪一本书？”

“不记得了。”

“你再想想看。”

“真的不记得了。”

“你要明白，这是事关你的‘定性’的问题：你讲出了出处，那么，你只是‘传谣’；你讲不出来出处，那就说明你是‘造谣’。造谣比传谣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其实，葛正慧心中也明白，审讯者为什么反反复复追问根源：因为他一旦讲出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马上就会被销毁。在上海图书馆，只有一册《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当时印数很有限，流散在社会上的，恐怕早已荡然无存。上海图书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已成孤本。口说无凭。即使有魏金枝（受“四人帮”严重摧残，于1972年12月17日含冤去世）、于黑丁作证，张春桥也可矢口否认，反诬他们为“造谣”。唯有那本1937年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白纸黑字，印得一清二楚，张春桥无法抵赖。纵然葛正慧死去，只要那本书还在，后人依然能够查清“狄克＝张春桥”这一公案。

一次又一次提审，焦点越来越清楚：要他交代出那本书的书名。

葛正慧，人们称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活字典”。他的记性甚好，他清楚记得《鲁迅先生轶事》放在哪个书架上。但是，他也清楚，这本书是没有卡片的，属于“非流通书”，即不外借的。它混在数以万计的“非流通书”之中。不谙内情，想找到这本书，犹如大海捞针。

他咬紧牙关，以生命来保护那本书。

他像放录音似的，总是这么说“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我看过的书那么多，哪里能记得起是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但是，我确确实实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这一点没有记错，绝对不会记错。”

啪，一记耳光。他的牙齿也被打掉了，鲜血从唇间汩汩而出，染红了他多日未刮的胡子。

“扫雷纵队”游雪涛自食苦果

上海高邮路。

灯下，游雪涛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案卷，以至当子夜悄然到来，他也未察觉。

下午，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王承龙说是有事找他，他就赶到了“康办”。

“有个案子，你把案卷带回去看看。”王承龙的话很简单。

刚刚把徐家汇藏书楼案件脱手，游雪涛一听说来了新的案子，不由得又兴奋了起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尔摩斯”，没有案子仿佛就感到空虚。

王承龙把一个牛皮纸大口袋给了他。他的视线只注意那案卷，并没有注意王承龙的表情。

回到家中，游雪涛就从牛皮纸口袋里，取出厚厚的案卷。

案卷上写着一行字：“纪某自杀案”，旁边打了个问号。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子。

此人的经历很曲折，跟游雪涛有点类似，也从事着秘密工作，但那是在“文革”之前。

在“文革”中，纪某受到了冲击，受到了审查。此人属要犯，隔离室的看守十分严密。

突然，砰的一声，纪某从楼上摔下，虽然身穿厚厚的棉衣，仍当即死亡。

据说是自杀。

可是，纪某是从二楼厕所窗口摔下，那窗口又高又窄，下有水斗，很难爬上去。可能是他杀——有人要杀人灭口。

自杀？他杀？他杀？自杀？游雪涛像遇上一道数学难题，在那里反反复复捉摸着。他把案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画出了地形图，排出各种可能性。

第二天，游雪涛带着案卷，来到“康办”。他找到王承龙，正想把自

己的办案设想说出来，不料，王承龙一把夺过案卷，嗤之以鼻："谁要你办案？"

游雪涛顿时像被浇了一盆冷水。须知，他的满眼红丝，全是昨夜看这案卷熬出来的。他惊诧道："不是你把案卷交给我的吗？"

王承龙的脸，布满了乌云："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你回去吧！"

游雪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中。他的耳际，一直回响着王承龙刚才的话音："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

游雪涛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王承龙给他看那个案卷的含意：你跟纪某一样，不得好死！放聪明点，自己结束自己吧！

"大难临头！"游雪涛意识到，王承龙脸上的乌云，很快就会化为倾盆大雨。

他拿出手枪，压弹入膛，插在腰间，他把胶卷埋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早就提防着张春桥会有朝一日翻脸不认人：他把一期期简报上张春桥的手迹，都用照相机拍下来。如果张春桥赖账，他就把铁证掼出去！他深知张春桥是一只狡黠多端的老狐狸，他不能不防他一手……每一回，他从张春桥那里回来，也总是随即把张春桥口头指示立即记下来，同样是为了日后摊牌时甩出去。

我看到他的红色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第24页写着一段重要的话："1967年10月26日：王少庸同志传达张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张春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扫雷纵队"的工作清清楚楚地说成是"特务活动"！

游雪涛仿佛觉得，每天都在深渊上空走钢丝，迟早有一天会摔下去。

"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人家"，不仅仅是陈丕显、曹荻秋，也包括张春桥的同伙。因为张春桥不仅要战胜政治上的对手，也要监视着自己的僚属！

张春桥所绝对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在张春桥指使之下，游雪涛所进行的"绝密"的特务活动，日渐被张春桥的伙伴们所察觉。

密报！密报！"赤卫队"这组织是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拉起来的，连这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有一回，游雪涛在王少庸家喝酒，王少庸酒后吐真言。这番话，游雪涛立即向主子张春桥报告。

密报！密报！王承龙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反对徐景贤，连张春桥也不放在眼里。

密报！密报！王洪文丑事种种……

游雪涛甚至对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姚文元，也打上一个大问号。他密告张春桥，姚文元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后台，“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真正策划者可能是姚文元！于是，张春桥停发了给姚文元的《扫雷》简报。

上海“五王”——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承龙、王秀珍，都上过《扫雷》简报，充满对游雪涛的愤怒。

衡山饭店。“司令”王洪文设宴款待“福尔摩斯”游雪涛。酒过三巡，“司令”说出了本意：“游雪涛，你我有数。日后，你的简报，每期送我一份！”

“简报？什么简报？我们群工组不印简报呀！”游雪涛假装糊涂。

“别给我来这一套！”王洪文提高了声调，喷着酒气说，“就是你给春桥同志的简报！”

“那……”游雪涛无法支吾了，便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搬了出来，“那我得请示一下春桥同志！”

此后，王洪文依然看不到《扫雷》简报，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却又无法迁怒于游雪涛——也许，真的是张春桥不让他看简报！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244”实行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扫雷纵队”的名声渐渐外传。

有人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告：张春桥在上海搞特务机关、特务活动！

有人称游雪涛那“244”，是上海市“革委会”的“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中！

江青紧张了，当即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的伙伴们，也纷纷发话了。

姚文元皱着眉头，问徐景贤：“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句

话，充满着对“244”的疑虑之情。

朱永嘉对徐景贤说的话，更加直截了当：“像游雪涛这种搞法不行，这种搞特务的方法很危险，将来要把你牵进去的。”

徐景贤只得出面，向张春桥反映来自伙伴们的担忧。

张春桥说什么呢？他，简直像泥鳅一样的滑：“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搞情报系统，这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用，而且搞的还是苏联‘格伯乌’的一套……”

还是由徐景贤出面，找游雪涛谈话，发出了警告：“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作法上有点像‘内务部’，办下去的话谁领导你们？……对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就大了。”

游雪涛感到不妙。

夜深人静，已经睡熟了的游雪涛，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从枕头下拿出了枪，一个箭步冲上阳台。

妻子困惑不解。

半晌，游雪涛才说：“刚才，我梦见王洪文带着‘文攻武卫’来抓我！”

最使游雪涛心寒的，是主子的冷漠：几天前，听说张春桥和文静在“康办”看大字报，游雪涛赶紧跑过去。当他喊着“春桥同志”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居然毫无反应，仿佛不认识一样！

其实，张春桥是一个走一步、算十步的人，他早就给自己留好退路。

一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过游雪涛：“永福路的情况讲出去，是要杀头的！”

此人在给游雪涛写下种种批示时，也都给自己打好埋伏，以便日后可以覆手为雨：“游雪涛同志：把这样一套东西编起来作什么？不要保存了。”“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他十分警惕。”

在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张春桥要秘书把游雪涛写给他的几十封密告信，全都付之一炬。张春桥一边看着秘书烧信，一边解释说：“没有用了，烧掉算了。”

文静也耍滑头了：“我与游雪涛没有工作关系。只是作为熟人，有时在一起吹吹。”

她说得多轻巧，把游雪涛向她密告和她代表张春桥发布“指示”，全

说成了“吹吹”而已。

说实在的，从心底里，张春桥对“扫雷纵队”视若明珠。迫于种种舆论压力，何况张春桥已经度过了两次炮打的“非常时期”，在上海扎稳了根基，他不得不解散那个“244”。

1970年8月，由徐景贤出面，代表张春桥约见游雪涛：“从明天起，你下工厂劳动！”

那时，盛行“劳动惩罚论”。堂堂的“扫雷纵队”头头“下工厂劳动”，意味着一切完蛋！

游雪涛气急败坏，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文静同志收”，由吴某送交上海外滩“市革会”大楼收发室。

那信，是写给张春桥的。

游雪涛发泄心中的愠怒：

>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身要枪毙的地步？
> 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树林，舔干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 上海“四王”抓“五一六”是“五一六”！……

他的前两句话，意思清清楚楚，第三句却近乎绕口令。此处的上海“四王”，是指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另一“王”——王承龙，已被张春桥于1969年11月所剪除。“五一六”即“五一六分子”。1970年1月24日起，全国开展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海的清查运动由“四王”抓，游雪涛则骂“四王”是“五一六”。

游雪涛的信，迅即由文静转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看完信，勃然大怒：“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

完了！完了！走狗从此完了！

张春桥生怕游雪涛反叛，在外面泄露天机，就由“司令”王洪文亲自出面，秘密逮捕了游雪涛。

面对铁窗，游雪涛这才猛然醒悟，长叹一声：“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将”当然指张春桥，而“万骨枯”则包括他自己！

毕竟游雪涛跟张春桥关系太密切，对于如此“忠诚”的“战士”倘若处罚太重，未免会使自己的伙伴们寒心，何况既然已把他抓起来，也就达到了封住嘴巴的目的，于是张春桥提起笔来，写一段关于游雪涛的“批示”：“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

好个“大家主动”！张春桥分明是在向手下的伙计发出警告：你们恨游雪涛，可别逼他太急，弄得不好，他会把你们也一起卷进去！

明明是游雪涛的主子，张春桥又装出一副受游雪涛“蒙蔽”的姿态，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游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他搞的材料水分太大，有的情况说得很玄，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再相信了。这种人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思想变了，后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从极左到极右，就犯错误了。”

妙，真是妙极了！这样的语言，才是张春桥“正宗”。

张春桥是个云里来、雾里去的人物。他的形象最清晰的曝光，莫过于对待游雪涛的前前后后。他的奸雄，他的阴险，他的狡诈，他的两面三刀，暴露得清清楚楚。

张春桥妹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了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

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遐迩闻名。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写在大门口的招牌上：“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974年3月30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33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11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3点20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康办”是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的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柄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文静的时候，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

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1928年3月，山东济南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1970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46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12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1976年12月1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

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蹿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一、调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244”。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天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春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之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46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15人，一般审查31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之于众；

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之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猝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1974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1955年5月9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1974年3月27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2月2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3月30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3月12日、3月27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会诊中的每一句话，都详细记录下来。

3月27日下午，由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亲自主持，举行了张佩瑛手术的准备会议。16个人出席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周全备至的“手术方案”写出来了，“手术前小结”写出来了，“手术前后护理计划”订出来了，“手术组名单”终于确定了。

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钾、血钠、球蛋白……一项又一项测定、化验，都做好了。

就连手术后的护理计划，也有条有理，如水银泻地，那般周密。

引述以下十条“术后护理计划”，足见条条都是耗费心血写出来的：

一、建立专人护理班，日夜各一人，详细记录护理单；

二、手术当天回病室，注意脉搏、呼吸、血压，半小时测一次；

三、注意保证导尿管通畅，预防尿路感染。术后每天更换导尿接管及接瓶（密封）；

四、术后每天用1：5000PP揩洗会阴，更换导尿管上的纱布、橡皮膏；

五、鼓励并协助翻身，促进术后恢复。术后第二天半卧位；

六、注意饮食护理，鼓励多进食，避免吃肠胀气类的食物；

七、术后的基础护理：口腔护理，全身的清洁，注意保暖，预防并发症；

八、详细记录出入液量；

九、预防术后肠胀气，术后第二天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每日二次，一次半小时；

十、每天按摩脚部（左脚）二次，术后左臀部热敷，促进恢复脚的活动力，防止肌肉萎缩及血栓性静脉炎。

此外，还规定“物质环境准备”，共五条，也极为周到：

一、注意室温调节，准备电炉一只；

二、术前室内大扫除，并用乳酸进行消毒；

三、严格执行探望制度，保证充分休息。一周内，除家属探望外，其他一律婉言谢绝；

四、准备好一切消毒物品及敷料；

五、晒草垫或调换草垫。

够得上天衣无缝，称得上无懈可击。

一条又一条，送到张佩瑛手中，请她和张春桥之妻文静过目。

她微微地笑了，说了声：“谢谢！”

然而，当人们走开，她的笑脸转为阴郁。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悄然暗语：“我担心！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个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3月30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天刚蒙蒙亮，护士已经进入经过严格清洗的手术室——一切就绪。就连病人搁脚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规定的地方。

妇产科医院麻醉师叶景馨，也早就在手术室里忙开了。这位护士出身的麻醉师，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两台麻醉机擦得干干净净，放置在手术台旁。本来，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机就可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人以为还是用中山医院的麻醉机更保险。昨天上午，她特地赶往中山医院，借来一台最好的麻醉机。

预定手术在上午8点开始，张佩瑛在7点半就进入手术室。当她在手术台上躺好，手术的主持者、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就来到了。随即，外院的、本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络绎步入手术室。

万事俱备，唯不见方兆麟医师。

方兆麟[25]，何许人也？

那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订“手术组名单”时，发觉麻醉师一环太弱——叶景馨恐怕难以独力挑此重担。党总支向一医党委提出：“希望中山医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术上都比较可靠的医生。”他们还指名道姓点将，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何况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三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为柯庆施、刘亚楼等许多高干治病。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请他出师，可以确保张佩瑛手术麻醉工作万无一失。

方兆麟医师向来准时。面临这次重大手术，时钟已经敲过八下，怎么还不见他的影子？

一辆自行车在肇嘉浜路匆匆东行。骑者左手握龙头，右手扶书包架——架子上横放着一只蓝色的钢瓶。钢瓶太滑，虽然骑者不时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钢瓶从车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车链条又滑了下来，又延误了时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蓝色的钢筒里，装着麻醉剂——笑气。

方医生临时被点将调来。他没有参加最初的大会诊。会诊确定的麻醉方案是“硬膜外局部麻醉”。方医生看了张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发生左下肢坐骨神经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发生别

的问题。出于一片好心，方医生建议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医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会在手术后带来肺部并发症。方医生觉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后输入一部分笑气，以减少乙醚的用量，预防手术后肺部并发症。

这一方案，得到了手术负责人的同意。

不过，这一方案在手术前一天才确定下来。3月30日一早，方医生到上海中山医院库房领笑气。领了一瓶，拧开开关，发觉瓶内剩气不多。他又返回库房，换了一瓶，拧开开关，发出“嗤”的一声，他满意了。然而，钢瓶上落满灰尘，他用水冲净，这才放上自行车。

如此这般折腾，加上肇嘉浜路正在挖防空洞，到处堆着土，道路坑坑洼洼……

终于到了斜桥。自行车一转弯，方医生看见了“红屋子”，舒了一口气。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双眉紧皱：8点10分。

他风风火火跑上三楼，已有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口等他了。天气尚冷，他的前额却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医生，你怎么迟到啦？”

一听这话，他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进更衣室换衣服，入洗手间洗刷双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手术室，递给叶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在洗手间门口问了一声。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当方医师洗好手，叶医师已经把笑气钢瓶装上了中山医院的那台麻醉机。

尚未动刀，患者突然死去

“手术未动，麻醉先行”。麻醉师历来是“先行官”。

方医生洗好手，上阵了。8点20分，他从叶医师手中接过装好镇静剂“硫苯妥钠”的注射器，对张佩瑛说：“老张，我给你打针了。稍微有点痛，不要紧的。”

张佩瑛点了点头，说：“打吧，没关系。”

方医生熟练地把针头刺进张佩瑛的静脉，缓缓地推进药水。他一边推进药水，一边注视着张佩瑛的表情。没一会儿，张佩瑛闭上双眼，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按照操作规程，叶医生给张佩瑛戴上了面罩，输入氧气。

方医生拿起装有司可林的注射器，又开始注射，做全身麻醉前的诱导。按照操作规程，在注射司可林之后，才往面罩里输入乙醚。

就在司可林刚刚射入张佩瑛的血管，一个护士吃惊地说道：“方医生，病人的手指甲发紫！”

方医生也为之一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满脸惊讶。

当他打完司可林，张佩瑛在颤动着，皮肤渐渐青紫，嘴唇乌黑。在场的一医党委、妇产科党总支领导脸色发白。

方医生以为输氧不够，当即决定：“插管输氧！”

叶医生拿定面罩，方医生以熟练的动作，把氧气管插入张佩瑛气管，开大了氧气开关。

奇怪，患者青紫有增无减，呼吸停止！

这时，心率每分钟88次，血压也正常。

患者怎么会停止呼吸？医生们急促地交换着意见。

手术室里顿时骚乱，人们惶惶不安。手术主持者，决定施行人工呼吸。

方医生遵嘱开始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不久，血压剧降，心跳难以听出。

就在这时，上海中山医院所有的广播喇叭，响起了急找司机的声音。

著名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匆匆坐上小轿车——几分钟之前，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负人从妇产科医院来电话，要他火速赶到。

当石美鑫奉召赶到之后，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陆续驶入方斜路。

名医们在研究着抢救方案。人多嘴杂，意见纷纭。犹如一条船上，忽地来了众多的“老大”。真的有点像张佩瑛在手术前所担心的那样：“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紧皱双眉，有人托着下巴，有人踱着方步，有人闭口缄言。

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出了一身冷汗，内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这次张佩瑛手术，他是总指挥。这些日子里，请专家，大会诊，订措施，做准备，忙得他连睡觉都不安稳。方医生就是他亲自点名请来的。他本来想立个大功，而眼下却闯了个大祸，他怎不六神无主，大汗涔涔？他，呜呜咽咽，不由得哭了起来！

方医生也一身水湿，白大褂上满是汗液。一则心慌意乱，二则不停地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滴，冷汗跟热汗混流在一起。

抢救措施逐步升级：注射麻黄石碱。注射地塞米松。体外心脏按压。大隐静脉切开。颈外静脉穿刺输液……上午11时，终于决定由石美鑫教授开胸，做心脏按摩。

方兆麟从手术台旁退了下来，让位给石美鑫。这时，他才缓了一口气，绷紧了的神经松弛了一下。

方兆麟的目光无意之中，投射到那台从中山医院借来的麻醉机上，顿时像触了电似的……他欲言又止，终于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忙乱之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方医生那忽然变得惨白的脸。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血压＝0，抢救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电击。一次，两次，三次，毫无反应。

用尽了一切抢救措施。直至下午3点20分，疲惫不堪的“白大褂”们这才离开了手术台。

当晚，经过“白大褂”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市委：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3月30日）上午8时20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此后，所有关于张佩瑛猝死的文件中，再也未见过“春桥同志的妹妹”字样。心照不宣。谁都明白其中的含义，谁都不在白纸黑字上表露。

徐景贤在这份报告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对张佩瑛同志的死因要调查弄清。”

翌日，3月31日，星期天。

4月1日一上班，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C出任调查组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出任副组长。调查组的级别如此之高，原因同样在于那句被删去了的话——“春桥同志的妹妹”。

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雷厉风行。一组快节奏的短镜头。

4月1日夜。一医。

在征得张佩瑛的丈夫和张佩瑛的三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张铁桥的同意之后，张佩瑛的遗体被送上了解剖台。

作为紧急任务，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

解剖结论：“病理检验发现内脏瘀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严重扩张，管腔空虚，含血量少。上述变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环衰竭的存在，并由此而促进了休克的发展和脑疝的形成，以至抢救无效死亡。”

4月2日。上海药物检验所。

紧急任务。查验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术所用葡萄糖复合液。

结论：“均未检出氰化物、亚硝酸盐、巴比妥类，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4月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紧急任务。已用过的一支硫苯妥钠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残液与未用过的同类注射剂比较。

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层析法分析。

结论：“药品性质一致。”

4月3日下午。

专家云集一医，讨论、分析张佩瑛死因。出席者有中山医院内科，华山医院皮肤科、内科，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内科，新华医院麻醉科，瑞金医院病理科，一医教育革命组……

会议记录：众多的专家反复讨论药物过敏的问题，但是新华医院麻醉科医师提及了可能是笑气中毒导致死亡。

4月6日晚。妇产科医院三楼手术室，灯光通明。

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张佩瑛，而是兔子。

调查组正、副组长及组员在一旁仔细观察。

兔子戴上面罩，输氧。一分钟后，兔子全身青紫，与张佩瑛死亡过程酷似。

结论：“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4月7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方兆麟谈话。

4月8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检查：“我在心脏按摩后，在一旁休息，突然见到麻醉机上笑气筒下部四周有湿与霜，感到奇怪。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必有漏气。我再看一下麻醉机，原来是一台单向的，只能用氧气的麻醉机，我顿时大吃一惊，几乎瘫掉了！”

根据方兆麟的检查，不妨重演3月30日上午的镜头：

方兆麟满头大汗，赶到妇产科医院手术室。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去换衣服，洗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去，交给叶景馨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问。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叶医师未用过中山医院那台麻醉机，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机不能用笑气。她把笑气瓶装了上去，而且打开了开关。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96%，而氧气仅占4%。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1986年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12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image]

■ 叶永烈采访方兆麟医生

4月11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

>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1958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干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

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的政治事件的依据。"

调查报告上报上海市委，还附了方兆麟医师的检查。

方兆麟写道："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历来，人们总是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然而，更危险、更可怕的莫过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有人向张春桥家属偷偷报告调查组“右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飞到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徐景贤之妻葛蕴芳手中，要她转交徐景贤。鉴于张佩瑛之丈夫，乃葛蕴芳之表兄，葛蕴芳表示“回避”不肯代为转交。

很快的，这封密告信又飞到徐景贤保健医生手中。于是，便展现在徐景贤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于那堆秘密档案之中，摘录原文于下：

徐景贤同志：您好！

> 我们想就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向市委领导同志反映一点情况，提出一点意见……
> 我们参加调查工作过程中，感到上医党委Fe和中山医院总支态度暧昧……
> 我们的想法是，就目前的材料看来，不能用“粗枝大叶”来解释。政治疑问不少，应当趁热打铁，搞得水落石出。
>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 我们恳切希望市委领导同志组织适当人员，继续深入调查。

信末，签署着两个人的姓名，写信日期为“1974年4月21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对调查结果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鉴于两位写信者是调查组的组员，熟知内情，而且提出的十个问题，个个在“纲”上、“线”上，理所当然引起了“马徐王”的重视。

“马徐王”当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来了。

王秀珍最为起劲，提笔批道：“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彻底查清，查个水落石出。”

马天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过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同意秀

珍同志意见，一定要抓紧弄清这些问题。”

徐景贤写道：“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见。”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1977年1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待：

>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
>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
>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个阶级报复案，给这个案子定了调子。调查组就是按这个框框和调子去调查的。

徐景贤在1977年10月31日，也作了类似的交待。其中谈及：“成立调查组时，马天水说：‘这件事张春桥不好表态，我们决定算了。’但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都由我送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由他转给张春桥看。”

就这样，本来已经闭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开。秘密调查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剧。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1974年2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些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文静手中，请她“审阅”。

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是他当场痛哭不已。

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1966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瑛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1974年4月19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已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4月21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转给张春桥……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4月25日的“向家属汇报会”，张的家属公开亮相、施加压力了。

在上海卫生局大楼213室里，根据家属的要求，调查组向他们汇报着调查情况。

大抵由于张春桥惯于特务伎俩的缘故，他的儿子张旗也学得一二。他把一只微型录音机放在包中，步入213室，悄然录下了调查组的汇报。

调查组的汇报，不断被张的家属粗暴地打断，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在会上重申，“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

张月桥当场质问她：“什么替死者负责？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张佩瑛的丈夫唱的“调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谋害”张佩瑛。

他说“Fe事先计划周密，手法极为阴险，手术‘杀人不见血，事后无证据’就连解剖尸体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e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杀人方案！”

他——这个1946年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这次，Fe害死了张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伙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阴谋所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仗张春桥之势欺人，那么嚣张，那样凶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了，张月桥冷冷地说：“我们认为这不是Fe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再多流泪了，我们要起来斗争，一定要把问题彻底查清！”

终于，调查组被迫改组，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调查。

“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目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被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不料，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1957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1974年3月15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4月24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到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4月28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部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借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他们进行了种种大胆推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

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1973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1967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钰也帮我打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字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约莫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嘀、嘀”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嘀、嘀”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嘀、嘀”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

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嘀、嘀’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1967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调记录如下：

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嘀、嘀、嘀"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

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鱼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3月30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待"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待"，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 1969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1970年底或1971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待”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史”。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待”大黄鱼问题：

> 去年（1973年）10月，我脸上生了一个东西，慢慢大起来了。我想他们都是医生，想托他们找熟人开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点。我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一点。万廷钰和上电医院龚医生很关心我，曾替我介绍女朋友。由万医生和龚医生当介绍人，我认识了那个女朋友。见面以后，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时间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在方医生出事情前一个月左右。
>
> 虽然女朋友不跟我来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谢万医生。3月30日，正好是方医生出事情的那天，我买到几条大黄鱼。我就在下班之后，晚上七点钟，送到方家。当时，方医生还没有回来。万医生叫我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也在家。万医生说，女朋友的事，我以后替你再留意，你脸上的皮下囊肿还是要抓紧开刀。我问起方医生怎么还没有回家，她说“方医生今天为张春桥的妹妹开刀，忙得很。”

调查至此，大黄鱼的来历已经一清二楚，大黄鱼与本案无关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调查组还要查下去，继续盘问虞国夫。无奈，虞国夫只得再作“交待”：

> 大约8点钟以后，方兆麟回来了。万医生问他，手术怎么样？方说，很不顺利。万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方说：司××针（对不起，我只记得“司”，讲不出名字来）打下去以后，就不来事啦。关于开刀的事，他们讲了一会儿，我听不大懂。我见他们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里觉得不自然。我对万医生说，我该走了。万医生说，不送你了。
>
> 我在他家，总共只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时候，我和万医生坐在沙发上，方医生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调查组并不轻信虞国夫一面之词，又分别审问了方兆麟和万延钰，口供相符，这才排除了虞国夫是“同案犯”的嫌疑。

不过，虞国夫在谈到万医生为他介绍女朋友时，另一个介绍人为“上电医院龚医生”。看来，龚医生跟方家关系密切。调查组对于这条缝，又要查一查！

大胆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审查！

“上电医院龚医生”，调查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电业职工医院麻醉护士龚雅琴，女，40岁。

调查组火速赶往上海电业职工医院，与龚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调，调查组便发现，龚雅琴确实跟方氏夫妇关系密切。

与方兆麟的关系——龚雅琴早在1953年入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业务时，就认识方兆麟。1973年8月，龚雅琴调往上电医院之后，一直把方兆麟当作“业务靠山”，遇到疑难便向方兆麟请教。

与万廷钰的关系——龚雅琴1953年进中山医院时，万廷钰是开刀间护士，彼此相识。这些年，一直有来往。1974年2月，龚和万曾一起到长宁电影院看电影。为了替虞国夫做媒，又和万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

在调查组的眼中，“关系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龚雅琴比虞国夫更不幸。虞国夫送了两条大黄鱼，遭到审查，而龚雅琴替虞国夫作伐，竟被调查组立案审查！

在调查组的绝密档案中，有一厚册便是龚雅琴立案审查材料，总共收入33份材料！

翻开案卷，首页标题，赫然入目：《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龚雅琴的审查结案报告》！

报告居然振振有词地开列了三条“审查理由”：

一、发现龚雅琴在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后与方兆麟及方妻万廷钰来往密切，活动频繁。

二、据揭发方兆麟的材料提供：“怀疑方兆麟于3月29日晚（事故前一天）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龚家也住在淮海中路×××弄××号。

三、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鉴于上述理由，认为有必要对龚雅琴的政治面貌、龚雅琴在“张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咄咄逼人的口气，几乎欲置无辜的龚雅琴于死地！

调查组居然开列了龚雅琴的“五大问题”，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例举调查组对那“五大问题”的种种审查，这里仅以调查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后与方兆麟的联系为例，便可见调查组曾花费了多少气力！

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一天及当日的活动：“3月29日，龚雅琴上午在手术室，做腭裂手术。下午在科内业务学习。晚，科内政治学习。然后值夜班。没有发现调班或有人代班等情况。也没有发现龚雅琴与院外有电话联系。”

以上情况，有五份旁证，一份本人交代，还附上电医院工作人员值班表：“3月30日，龚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起到瑞金医院观看阑尾针刺麻醉手术，11时结束。下午在本院参加一例头皮再植手术，五时离院。”

又是三人旁证，本人交代。

最为详细的调查，要算“考证”龚雅琴何时获知“张死”消息。

据龚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4月8日，亦即“张死”之后第九天，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调查组认定，龚雅琴在耍花招！因为“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有着“同案犯”的极大嫌疑，怎么可能直到“张死”之后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里里外外地查，一个一个地问，调查组把上电医院搞得人心惶惶。

卖身求荣者虽有，但毕竟不多，上电医院的医师、护士们，在审查面前不说假，不诬陷加害于人，使调查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写出如此曲折、如此烦琐的查证：

标题——《龚雅琴如何获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证——“据查，在上电医院内第一个说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医务组副组长邵幼善。他的消息来源是通过其子邵元麟在瑞金医院外科进修的机会，从那里听到后，向其父转告的。4月8日，邵幼善进手术室时，将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诉护士赵影，要她在麻醉用药时多加小心。当时还提到，‘不要给龚雅琴听见’。同时在场的有外科主任黄士勤等。同一天，黄士勤遇见龚雅琴就问：‘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龚雅琴一呆，回答：‘没有听说。’黄士勤就把从邵幼善那里听来的情况告诉龚雅琴，并说明是‘听邵幼善讲的’。”

附件——（1）外科主任黄士勤旁证；（2）手术室赵影旁证；（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证；（4）方兆麟交代；（5）万延钰交代；（6）龚雅琴交代。

就这样，一个与“张死事件”风马牛不相干的女护士龚雅琴，遭到无端“立案审查”！

调查组的成员们忙得“废寝忘食”。像他们如此这般的荒唐调查，即便是福尔摩斯，恐怕也会累得倒下！

大胆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谋”！

关于龚雅琴的“立案审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据揭发，“怀疑方兆麟于

3月29日晚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在调查组的眼里，这是极端重要的“敌情”！

须知，方兆麟在“蓄意谋害”张佩瑛的前夜，骑着自行车外出，必定是进行“预谋”！尤其是晚九时左右还骑车外出，行踪蹊跷，值得打上个大问号。

龚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牵连。方兆麟的妻子万廷钰，竟也受此连累。

本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年月，方兆麟成为“政治谋杀犯”，理所当然，妻子万廷钰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谋”。调查组对万廷钰进行“立案审查”，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万廷钰在“张死”前夜于上海耳鼻喉医院值班，而这家医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调查组调查了万廷钰开出的处方、病人病假单，查阅了病人病历，证实“张死”前夜，万廷钰确实在上海耳鼻喉医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9点去医院找她，那必定与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里来过耳鼻喉医院，给万廷钰送过东西！

“重大线索！追！”调查组死死抓住这一问题，要万廷钰“交待”。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绝密档案中，有一厚本《万廷钰谈话记录》。仅1974年6月24日至9月11日不到三个月内，调查组便审问万延钰达23次之多。每一次审问，都作了详细记录。其中有一次审问记录，竟达19页！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实，在“张死”前夜，万廷钰自早上8点至下午2点，在医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与方兆麟见过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医院，从晚6时至夜9时，在一医党委办公室出席针刺麻醉会议。万延钰则从晚7时至次日晨8时在耳鼻喉医院值班。妻子根本没有与丈夫照面，毫无“预谋”的“迹象”。

可是，调查组一口咬定，有人见到方兆麟连夜去过耳鼻喉医院，送过东西。

“方兆麟真的来过吗？他送过东西，送什么东西？”妻子苦苦思索，回忆。

幸亏她的大脑记忆仓库之中，还储存着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她终于写出了“交待”，标题就叫《关于方兆麟到医院里送蛋糕一事》：

“今年2月6日前后，有一天晚上，我在汾阳路耳鼻喉医院值急诊夜班（晚上7点至次日晨8点）。7时许，我女儿来医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诊室来梳头，约8时回家。到家后洗衣服，发现一只塑料梳子不见了，便对方兆麟说：‘我刚才在妈妈急诊室里还梳头，不知会不会丢在急诊室？’方兆麟说：‘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饭盒，装了一个蛋糕，放在网袋里，骑自行车来医院……”

纯属家庭琐事，只是阴差阳错，被调查组误接镜头，接到了“张死”前夜！

调查组向万廷钰的同事调查，向万廷钰的女儿调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待，直至确证“送蛋糕”不在“张死”前夜。

万延钰无端遭到审查还不算，甚至牵连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亲友。调查组到处查“缝”找“洞”，随意整人，大有株连九族的势头。

大胆推理之五：姐夫几乎成为“杀人凶手”！

调查组从万廷钰身上没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证据，依然紧抓方兆麟“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这一“重大线索”不放。

他们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带的亲友名单、地址，都一一开列出来。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号××室，一下子就引起了查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闻，光凭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审查”对象！

这一查，不得了，从李精武身上撬开了一条缝，差一点把他打成“杀人凶手”！

我翻阅着厚厚的《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李精武审查报告》，整个案卷收入37份审查材料。我一边看着，一边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介方兆麟被诬为“谋杀”张佩瑛之际，调查组查出了李精武“谋杀”华汾的重要“证据”。虽说张佩瑛之死与华汾之死毫不相干，但是，调查组的“阶级斗争觉悟”甚高，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谋杀”了华汾，势必会参与“谋杀”张佩瑛！

调查组在“立案依据”上，便明确写着：“为查清李精武是否参与谋杀

张佩瑛同志的嫌疑问题，特立案对李精武进行审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谋杀”，何等惊心动魄的字眼，怎么会落到李精武头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学数学教师。华汾，女，身材高大，与李精武同校，也是数学教师。

李精武怎么会“谋杀”同事华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虽然案卷上清楚地写明反映者的姓名，本书暂且略去。此人说得有声有色：1967年4月19日下午，华汾来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边请她喝茶，一边谈着。李与华在“文革”初期，本属一派群众组织，后来产生分歧。华汾到李家，劝说李精武不要分裂。华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发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翌日凌晨，华汾身亡。死者浑身青紫。

这句“死者浑身青紫”，使调查组顿时联想到张佩瑛死时也浑身青紫。他们猜测，李精武会不会是“主谋’，以同样的“毒药”毒死了华汾和张佩瑛？

这是“重大发现”，这是“重要线索”，李精武差一点被押上断头台！

千幸万幸，面对如此重大的“嫌疑”，许多被调查者根据事实说真话——如果有人落井下石的话，李精武就不堪设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董兴康医师，当年曾负责抢救华汾。董兴康医师明确指出，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绝非被人谋害致死。华汾个性好强，除了向要好同事讲起过自己有妇女病之外，从未谈及高血压症，加上她身材高大，于是给人以身体健壮的印象。其实，据病历记载，她怀孕时便查出血压极高。她的父亲高血压，亲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压。她自己也时有心跳过快、头昏的感觉，甚至曾突然晕倒在地。根据这些情况，可断定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则解释了“死者浑身青紫”的原因：华汾死于凌晨，而同事们来看她遗体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时，遗体当然会发青发紫。

调查组以丰富的想象力，对李精武提出新的怀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华汾患高血压症，于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种药物，使华份的血压猛然升高，达到“谋杀”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和上海药品检验所的答复，既严肃，又幽默：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从未发现用药使血压上升导致死亡的谋杀案件！

科学从不与荒唐为伍。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那个草包调查组。

在李精武身上，他们本以为可以撬开一条大缝，无奈，撬断了棍子，白费力气！

我看罢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庆幸：他总算没有被那个发疯了的调查组置于死地。

大胆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帮凶”！

祸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调查组的注意，是因为他和妻子孙用余在“张死”之前，于3月27日、28日两次来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间，有来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况大哥、大嫂两次来访，是因为大嫂孙用余准备到中山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医院医生，找他了解一些手术情况，更是极为正常的来往。

不料，调查组把这也作为“重要动向”：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在“张死”之前频频而来？何况夫妻双双同来，必有阴谋！

显然，这又是一条“缝”。“查！”调查组扑向方兆祥的工作单位——上海制药二厂。

说实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说既无“缝”，又无“洞”：他，生于1912年。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54年入党。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仍任上海制药二厂厂革委会常委、技术组负责人。

调查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到该厂，就查方兆祥的干部档案。方兆祥的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么问号。

陡地，方兆祥自传上一句极其平常的话，被调查组那灵敏的嗅觉闻出了问题：“1956年左右，在五洲制药厂工作时，曾与开明化学厂朱先生联合试制过笑气。”

好家伙，你原来试制过笑气！你一定深知笑气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气毒死张佩瑛——你显然是“帮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兴奋，以至近乎发狂。调查组以为能从方兆祥的自传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线索，陷入极度的亢奋之中。

于是，调查组挥笔疾书，写下了对方兆祥“立案审查依据”：“方兆祥系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1956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

等问题，为弄清其是否参与谋害张佩瑛同志，于1974年5月28日开始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最使人惊心触目的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以预谋来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气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3月27日、28日连续两次到方兆麟家。又据万廷钰交代，出事后的3月31日方兆祥夫妇也来过。他们很有可能在笑气瓶中加进其他药物而促进死亡，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如果调查组的这“推理”得到“证实”，非但方兆麟要判处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头难保。

调查组又开始“求证”这样欲置人死地的命题。

他们详尽调查了方兆祥当年参加试制笑气的过程。

笑气其实是俗名，化学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无色而微臭的气体。早在1799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首先发现，人一旦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边吸入少量笑气，一边疯疯癫癫地在实验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维牙痛，吸了点笑气就不痛了。从此，笑气成了牙科医师常用的麻醉剂。后来，越用越普遍，成为外科手术中常用的气体麻醉剂。

这种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气体，一直依赖从国外进口，我国不会生产。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医郭星孙，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行医之外，也喜欢骑摩托车、打猎，还爱做点化学实验。他居然把家里一间亭子间作为化学实验室，自己动手，制成了笑气。为此《人民日报》在1954年11月作了报道。

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医学院吴珏教授表示愿意合作，把郭星孙的笑气用于临床。

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读报后大惊，因为笑气易燃，会惹出火灾，就发出通知，禁止郭星孙在亭子间里试制。

上海制药专业公司来找郭星孙，希望转让技术，由他们投入生产。

调查组从上海第五制药厂的技术资料中，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当年试制笑气的技术档案：

（科NO. 5）
试制笑气（N2O，Nitrous Oxide）

日期：1956年1月25日至4月25日。

地点：租借上海虹桥路九六一弄四号企中化学社之一幢红砖房（经市公安局消防处同意试制三个月）。

组织领导：上海市制药专业公司。

技术小组名单：

组长——高福为（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副组长兼顾问——郭星孙医师。

组员——朱吟龙（开明化学工业社负责人），倪关清（企中化学工业社负责人），方兆祥（五洲药厂生产技术和科长），傅伍尧（五洲药厂总工程师），吴珏，章开平。

产量——每月七十公斤，总共生产二百公斤

……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表明，方兆祥是我国第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18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笑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却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1956年11月22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五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16个姐妹（她排行15）和八个兄弟。这24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至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嘀、嘀、嘀”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在“嘀、嘀、嘀”，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1974年7月19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呐。

调查组忙得很呐。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古、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看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

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看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破。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柯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何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相同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柯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调查组查访了参加抢救柯庆施工作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不怕压力，忠于事实，写下一份份外调材料，证明方兆麟无罪，使调查组找不出一条“缝”。

其中以华东医院院长、抢救柯庆施医疗小组负责人薛邦琪写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权威性：

> ……柯庆施夫人反映柯庆施非常烦躁，我和林、董、陶、崔等医师商量以后，考虑用硫苯妥钠，并提出请方兆麟参加讨论。方兆麟来后，我请他考虑用硫苯妥钠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说：“小剂量是安全的。”于是，决定用此药。药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制。方兆麟说，用小儿科剂量。配制时还戴口罩。配好药，由陶、方、我、胡一起进入柯庆施卧室。方兆麟打针，我们看着。他打得很慢。打完以后，病人打呼噜了。观察了一会，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庆施身旁。约半小时后，柯庆施手脚动了一下，但人未醒……柯庆施死后，我们在成都分析死因，对利用硫苯妥钠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打了硫苯妥钠后，人会动，呼之也能答应，话也会说。
>
> 讨论由吴阶平主持。

调查组本来把柯庆施之死当作王牌，不料调查一番之后，方兆麟依然打不倒。

大胆推理之九：查出“后台”王维国！

调查组的小楼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的烟头，跟双眉紧锁的调查组成员所绞的脑汁成正比。

桌上，摊着那封他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徐景贤转来的密告信。

蓦地，其中的一段使他们产生灵感：“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e是空四军的……”

哦，“空四军”，意味着什么？

调查组飞快地联想到空四军头目王维国！

王维国，林彪死党也。中山医院的军宣队，是空四军派出的。调查组把空四军跟王维国画上了等号。尽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王维国早已锒铛入狱，何况空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并非“王家班子”。但是，调查组却把张佩瑛事件跟“十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跟王维国联系起来，跟空四军联系起来，追查方兆麟的“后台”。

这么一联系，这么一追查，又产生一连串奇奇怪怪的“精彩”故事。

奇怪故事之一："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这句话，是调查组查阅中山医院会议记录时，查到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调查组如获至宝，立即上报"康办"。很快的，张春桥也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

这句话，其实颇为令人费解："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是张春桥过去到中山医院验过血，所以那里有张春桥是什么血型的记录。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是什么，这又有什么了不起？

不，不，调查组一追查，查到了"空四军"头上，觉得问题的性质越发严重了。因为调查组核对了几份会议记录，发觉那句没头没脑的话是记录者偷懒而省略的，全文应为："1971年11月，妇产科军宣队副组长S交代：'支左办公室知道，中山医院有张春桥同志的血型材料。'"

是呀，问题怎么会不严重：空四军的"支左办公室"从中山医院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材料，可见中山医院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情况多么复杂，怪不得会发生"谋害"张春桥之妹事件！

查！这样重大的问题，岂可放过？

带着"敌情观念"，开调查会，查线索，查来查去，这才查明：原来，在1967年国庆节前后，华东化工学院的学生Y和Z，参加了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后来，受到追查。他们把一份材料交给一医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后来在中山医院血库工作，便把材料藏在血库里……

辗转传言，犹如通过一面面哈哈镜似的，使事实完全走样、变形，以至成了"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查了半天，跟方兆麟无关，跟空四军无关，跟张佩瑛死亡事件无关，只得作罢。

奇怪故事之二：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住处地形。

这件事当然非同小可。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家的地形，意味着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这件事也意味着："谋杀"张佩瑛，由来已久。方兆麟的"后台"，就是王维国！

然而，这又是一个辗转"翻印"、完全走样了的故事。

那是在1971年7月，张佩瑛因乳房出现肿块，在中山医院开刀之后，住在12病房。一天，张春桥之妻文静来到病房探望，被军宣队得知。于是，军宣队向上汇报，很快传入王维国的耳朵。

8月中旬，张佩瑛出院，在家休养。

一辆浅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驶过大世界时，停了下来。车上坐着三个军人，两男一女。他们商量了一下，在食品店里买了两瓶橘子水。

轿车驶入高安路。三位军人步入张佩瑛家。他们放下橘子水，说道："首长对你的病很关心，他特地派我们前来看望。"不言而喻，这"首长"是王维国。

那位女军人，乃空四军模范军医。她说出了首长的意思："空四军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欢迎你到那边住院！"

客套一番，小轿车扬长而去。

这就是"侦察地形"的经过！

其实，这只是一次"友好访问"，联络感情而已。王维国听说派去的使者，竟然只买了两瓶橘子水为礼，曾大发脾气，责怪他们太寒酸！

至于"侦察地形"，用得着派三个人坐小轿车去惊动张佩瑛？这是极普通的军事常识。然而，调查组偏爱上纲上线，故弄玄虚。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经调查组汇报之后，曾使张春桥暗暗吃惊：王维国曾秘密调看了张佩瑛的档案，不仅从中知道了张佩瑛过去曾隐瞒政历、虚报学历、风流韵事等等，而且知道了张春桥父母张开益、宋蕙卿的种种情况。

从此，张佩瑛的干部档案被张春桥下令封存、调走，不许任何人查看！

于是，中山医院党支书记Fe受到了调查组秘密审查。

上挂下联，审查面越来越宽，打击面越来越大。

王洪文重申“此案要严肃处理”

绝密档案里的一份《情况汇报》：

“1974年6月24日上午7时半左右，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放在工作服袋里的钥匙不见了，到处寻找。这时，方兆麟声称在上厕所时，在那里地上拿把钥匙，交了出来。

“经追查，昨天下午五时左右，方兆麟上厕所时，从挂在门后白大褂的衣袋中，拿走实验室的钥匙，偷偷放在洗澡间门框上方。准备要寻死时，用钥匙打开实验室煤气间，以煤气自杀……”

方兆麟被关押在中山医院的动物室里，欲死未成。

十几天后，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监狱。

那里是一幢幢花园洋房，谁也没想到竟是秘密关押重要犯人的所在。

单独隔离。看守透过门上的小洞，随时监视着方兆麟的一举一动。

偶然，他在每天十分钟的放风时间里，有一次看见一个女人走进他对面的监房。

又很偶然，从对面房间传出的审讯声中，他得知那女人是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妻子。

他明白，他落到什么地步——他确确实实成了要犯！

11次，12次，……17次，18次……调查组一次又一次前来审人。今天审讯这个问题，明天审讯那个问题。

他们仿佛要用显微镜把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查一遍！

调查组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上中学的时候，骑的那辆英国力士牌自行车，从哪儿来的？你跟英国有什么关系？”

唉，他还吃过美国奶粉，用过日本牙膏，穿过印度绸、苏联布，调查组怎么忘了调查？

“你家厕所的灯，为什么一会儿红，一会儿绿？那是什么信号？”

唉，厕所里点的是一盏经济灯，本来用红色灯管的，坏了以后换上绿色灯管，难道这也是“特务活动”？

……

面对神经质的调查组，方兆麟的神经也被扰乱得有点不正常了？

他被投入秘密监狱，急坏了妻子万廷钰。如果不是因为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照料，妻子也要遭到囚押。

妻子不知丈夫在何方，甚至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

最令人寒心的是：调查组要方兆麟揭发万廷钰，要万廷钰揭发方兆麟。

调查组在方兆麟家安排了秘密监视者。谁来万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一记录在案。一有要紧情报，用电话通知调查组。

叶景馨在妇产科医院，大会批，小会斗，白头发骤然增加，她从18岁起做护士，29年来，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大揭大议”中，调查组又查出“张死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在“张死”之前，护士葛微君为张注射庆大霉素，“发生损伤下肢神经，造成活动障碍事故”；护士范宏茅为张灌肠，“发生烫伤黏膜事故”……于是，这两位护士被免去护士职务，一直做勤杂工……

“张春桥妹妹之死事件”波及面越来越广，调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档案中，有一份华山医院的情况反映材料，内中写道：

“在华山医院，要在揭医疗事故，大抓医务人员中的事故、差错，这是一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事故不仅医生有，护士有，公务人员有，行政人员有，连食堂炊事人员也有，到处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坚决斗坚决批。”

弄得医务界人人自危，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面对调查组的淫威、高压，方兆麟始终没有承认过“谋害”张佩瑛。

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调查组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表白，在张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绝对没有故意去陷害她。请审查……

他写了申辩信给徐景贤——因为他在为高干治病中认识徐景贤，托调查组转交。

调查组冷笑了：“你写信给徐景贤？告诉你，我们就是他派来的！”

原来如此！

调查组深知方兆麟认识的高干颇多，生怕他还给别的高干写信，搞了个突然袭击——搜查隔离室。

他们查到了方兆麟写给妻子的一封无法寄出，近乎遗嘱的信——

钰：

我没有故意去陷害张佩瑛同志，这是肯定的。处理是组织上的事。

要注意身体。对不起您。

孩子设法培养大，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有困难找兄姐帮忙一下。

我办公室右手抽斗信封中，有一百三十元，是我平时积下的（钥匙在学习班处，大麻醉科柜子短白大衣里。）

把业务书和杂志都卖掉罢！剩一些政治书就行。

兆麟

一双擦得乌亮的皮鞋，在地毯上缓缓来回移动。秃亮肥硕的脑袋耷拉着，陷入沉思。马天水一言未发。

徐景贤歪着脑袋。

王秀珍竖着浓眉。

眼看着张佩瑛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调查组忙碌了快一年，仍未查到方兆麟“谋杀”、“政治陷害”、“阶级报复”的证据。照此下去，怎么向张春桥交代？

“康办”、“马徐王”又一次召见那个秘密调查组的头目。

他们在密谋：纵然查不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证据，也要给方兆麟判刑！然而，判几年呢？

听完调查组的汇报，过了半晌，徐景贤终于开口了：“看这个情况，判个七、八年吧！”

王秀珍一听，摇头道：“照我看，判十年徒刑也不算多！”

徐景贤马上把难题转移到马天水那儿，说道：“马老你以为怎样？由

您定吧！”

马天水不吭声，面有难色：判少了，得罪了张春桥，非同小可；判多了，将来医务界再出医疗事故，就不好处理了。

马天水踱着方步，慢吞吞地从牙缝中挤出一个个字眼：“情节是恶劣的，问题是严重的……”

沉默。

照理，下文该是说说判多少年了。不料，老奸巨猾的马天水，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却道：“如何处理，你们打个正式报告，提个建议，我们再研究，然后送法院判决。”

这么一来，判刑的事，要转往法院。

一听说要转法院，消息马上传到张春桥那里。很快，通过家属之口，说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此案绝对保密；第二，判刑后方兆麟要单独关押。”

既然要“绝对保密”，法院不能看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怎么给方兆麟判刑？

至于单独关押，法院也以为很难办到。

于是，判刑之事就拖了下来。方兆麟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秘密监狱之中。

调查组经过一年的秘密调查，终于定出了“结案报告”，虽然开列了方兆麟的一系列“罪状”，但是毕竟无法证实王洪文在“张死事件”发生时所写的“批示”：“这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反革命的破坏。”

结案报告送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调查组等得心焦——“中央首长”对结案报告不作表态。

1975年7月，姚文元来到上海。马天水向他当面“汇报”了张佩瑛案件及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姚文元只是听着，不作明确答复。

8月，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徐王”一起赶去，向王洪文当面“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方兆麟？王洪文气呼呼地说：“对此案要严肃处理！”

就在“马徐王”按照王洪文的“指示”，要严惩方兆麟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周总理当面质问张春桥

1975年11月7日，被关押了18个月零四天的方兆麟医师，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东西！

方兆麟一边迈着浮肿的双脚，开始收拾行李，一边心中疑惑，不知是要拉去枪毙还是转移到别的监狱。

万万想不到，一辆汽车来了，竟把他送回家。他，见到了久别、消瘦的妻子，见到了大女儿和他心爱的那对双胞胎！悲喜交集，他仿佛身在梦中。

虽然在他获释之际，看守板着铁面孔对他宣布："出去，不等于解放！你要继续交代罪行！"然而，此时此刻，他毕竟与亲人团聚了，毕竟自由了。

三天之后，方兆麟被送往位于上海郊县奉贤的上海市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虽然连一名"五七战士"的资格都够不上，被迫"边劳动，边交代"，但是终究比秘密监狱囚笼生活要松宽得多。

方光麟在奉贤劳动了近一年，直至他听说张春桥倒台，才欢天喜地回到了上海。

方兆麟为何能够逃脱"四人帮"的罗网，突然获释，一直是个谜。

"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很想了解其中的奥秘。

经过多方寻访，我终于获悉：当时，此事惊动了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总理！

方兆麟曾见过周总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4年，柯庆施要做肺癌切除手术，周总理过问治疗方案，并接见了医疗小组。方兆麟当时担任手术麻醉师。

周总理很快就发觉，医疗小组中有的医生情绪紧张，生怕在手术中出半点差错。

像聊家常似的，周总理跟医生们说起看似平常的小事："我的理发师跟我很熟，给我刮胡子的时候，又轻松又快。""有一次，一个陌生的理发师给我刮胡子。大概他知道我是国务院总理，拿起刀的手都有点发抖，面色挺紧张。我就跟他聊天。一会儿，我们就熟悉了，他也就一点也不紧张了……"

医生们明白周总理话里的意思。

方兆麟多年参加高干医疗小组，结识了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当这位保健医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调查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况如实向周总理汇报。

一次，周总理跟副总理张春桥谈完国务院的工作之后，顺便提及了张佩瑛事件。周总理说：“在医务界，出医疗事故是难免的，医生要吸取教训。但是，因为死者是你的亲戚，你就那样，恐怕不妥。”

周总理的三言两语，分量不轻。张春桥的脸上，露出惊惶的神色。他颇为吃惊：调查组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工作，怎么会让周总理知道了？

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读罢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绝密档案，我发觉，秘密调查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最后的结果等于零！

张佩瑛遽然而亡之后，第一个调查组依靠科学、尊重事实，只花了十来天就把事情的真相查清。后来那个秘密调查组，尽管“来头”那么大，上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下至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发了那么多的“指示”，查了那么多的缝，钻了那么多的洞，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结果枉费心机，还是回到第一个调查组所做的结论上来。历史是那样的蔑视权势，那样的尊重客观事实。谁想开历史的玩笑，就会受到历史无情地嘲弄。

我忽地记起《红楼梦》中的两句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用这两句诗来概括那一大堆秘密档案，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当然，那些密告者、诬告者，迄今一提及张佩瑛事件，就眼跳心惊，生怕揭了疮疤——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

至于那几位“秘密福尔摩斯”，如今旧事重提，脸上也火辣辣的。那个Q，晃着脑袋，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荒唐！荒唐！现在想想，那时候真荒唐！”

张佩瑛一案是“四人帮”苛政的形象写照。

姚蓬子戴起“工总司”袖章

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像“火”焰一般光彩“炫”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1966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里发的，唯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26]。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止一个人向他发问了。

“孙女儿给的！”他得意扬扬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章，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寄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唯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吗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那个“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派不像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蓬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

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的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1967年2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唯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荻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那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

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彩”。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27]。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1965年12月15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1966年6月2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拣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

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28]！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叫唤声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里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里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里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

当她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儿媳妇——姚文元之妻金英，儿媳妇倒有点着急了。

金英劝她：“里委会的图章拿不得，赶紧送还吧！”

真可惜，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的“木头疙瘩”，不得不拱手交还给里委会。

她的“夺权”闹剧，不得不匆匆闭幕。

“太岁头上动土”——抄姚蓬子的家

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系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像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20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愠怒喷泻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1967年1月19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上午，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主持[29]。他操一口“绍兴官话”，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申冤，批斗着系党总支的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发出如雷鼾声。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着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虽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申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的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小组！”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着：“我已经写好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1966年10月20日下午4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30]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上海师范学院　中文系领导收”。

不敢怠慢，办事员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极蹩脚：“姚蓬子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

办公室里，几个青年教师传阅着这封信。

“去查一查！”四个青年教师召来四五个大学生，匆匆吃过晚饭，从教师通讯录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发了。

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遗憾的是，不像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们。

他们闯进了里委会。里委干部看了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也以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层楼房，那便是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当年用金条买下的私宅，响起了敲门声。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姚蓬子面前，声言前来“扫四旧”[31]。

姚蓬子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一双金鱼眼瞪得大大的。

无奈，他只得接受这群年轻人的指挥，“协助”他们“扫四旧”。

年轻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扫四旧”，眼睛却盯住屋檐、墙洞、床下、皮箱之类容易藏匿手枪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够乱的。横一本，竖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处是书。

查过底楼。那里是姚蓬子的书房，没有发现枪支，只查到一些属于“四旧”的书。

查过二楼。那里是姚蓬子夫妇的卧室。在箱子里，查到周修文的尖头皮鞋、旗袍之类——这在当时是属于“四旧”。周修文连声喏喏：“该扫‘四旧’！该扫‘四旧’！”

查过三楼。那里本是姚文元夫妇的卧室。当年，姚文元和金英结婚后曾住在那里。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跟老子“划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着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儿。在三楼，年轻人们细细查过屋檐，似乎没有任何藏枪之处。姚蓬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如同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到屋檐之下去“扫四旧”？

几个小时过去，不见手枪踪影，年轻人们只得作罢。他们把“四旧”物品集中在底楼书房里，关照姚蓬子道：“你自己处理！”

于是，年轻人们双手空空，离开姚家。

这便是抄检姚蓬子家始末。

没有核实，没有证明，光是凭着一封“红小兵”的检举信，就到姚蓬子家“扫四旧”——这在今日听来仿佛如同神话一般，然而，在当年却确实如此。“破四旧、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轻人们却到他的老子家“破四旧、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于怀。“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借助于儿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有“后

台”，受人指挥去“抄中央文革小组”的“家”！

非常遗憾的是，那群年轻人“办事不牢”，在姚蓬子家抄家（严格地讲是“抄检”）之后，随手一丢，把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丢了。

这下子，姚蓬子更来劲了，说年轻人们在编造谎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检举信”，完全是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虽然，将近十来个年轻人，还有那位系党总支书记和里弄干部，都证明看过“红小兵”的检举信，都说信是确实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说这些人都在那里“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扬扬，一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就在“劲松”和另一个战斗队召开“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翌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上红纸头，醒目的标题三个字：《道歉书》！

姚蓬子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红纸头前嘟道：“哼，连锣鼓都不敲，算什么‘平反’？人家贴红纸头，都是敲锣打鼓的！”

自从“平反大会”旗开得胜，“劲松”战斗队军威大振。姚蓬子益发趾高气扬，动不动斥责党员干部是“特务”、“狗腿子”、“国民党”。

“劲松”战斗队的油印机也哗啦啦地印得欢，传单的印数与日俱增。前来索取传单的，交换传单的，门庭若市，其盛况不亚于当年作家书屋的门市部。

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1967年3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组”，他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噩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1955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说实在的，在上海师范学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细的人倒并不多。

认真点讲，姚蓬子并非上海师范学院的正式职工。他只是那里中文系的兼课教师而已，主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文革”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上海师院也就不给他发工资了。他不属于上海师院教师编制之内，没有“教授”头衔，连“讲师”职称也没有。上海师院没有姚蓬子档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说是个无职无业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他本是作家书屋老板。如果说，他有什么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作家书屋。自从作家书屋在新中国成立后关闭之后，他就靠定息和存款过日子。也写点文章，译点书，不过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

自从1963年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以来，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那里并不过问他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审查过他的历史——因为他不属于那里的编制之内。

他的一位学生以笔名“依仁山人”写了一篇《忆姚蓬子先生》，回忆在1965年下半年听姚蓬子的课《中国古代作品选》，描述姚蓬子上课的“风格”，倒是十分生动：

> 姚老先生上李白、杜甫诗时，自带线装本书用。上课后粉笔灰满书，就随手拍书。书旧，一拍，纸屑散落。先生大笑，曰：“片片如落叶化作蝴蝶飞”。我们说书损坏了很可惜，先生曰：我上课用的东西全都是自己的，粉笔也是自己买的。李、杜的诗，我还有好版本。确实，我们从不见姚先生去中文系办公室的。上完课，先生提着人造革的包与我们一起缓步走到大门口，我们与先生道再见，去西部食堂吃饭，先生说“我到桂林公园（邻近上海师范学院的一个公园，因位于桂林路而得名。——引者注）去吃饭。”
>
> 曾聊及其子姚文元的学历，先生曰：“他高中未毕业就立马路去了。”即指上街迎解放军进城。问及姚文元的藏书，先生曰：“他都是洋装书”，指铅印新版书。
>
> 问先生书上怎么没有藏书章？姚先生说“我的书都堆在三楼，章是有几个的，可哪有时间去一本本盖？”后来听去过先生家的同学说，当时先生家住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工业展览馆）旁的铜仁路。
>
> 问及轰动当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生笑曰：“犬子瞎弄的。”
>
> 问及当时北京正上演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先生曰：“无非是安娜携子自日本回国罢了。”

问及鲁迅题送他的诗，先生大笑，曰："都是年轻时的事了。"

作品选考试，我写了篇评《洛阳伽蓝记》的文章，先生用红笔挺仔细的批阅了。文后写了几句赞扬的话，提了点希望。分数打得挺高，是八十五分。我知道自己的文章不怎样，先生是在鼓励我。

先生声音洪亮可气管不好，上课常咳嗽吐痰，我班曹阿芳同学每当先生来上课，总事先把走廊里的痰盂捧到讲台边，课后再捧出去。

文革初期，听说姚先生家被抄。当抄出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服、指挥刀时，质问先生，先生说"这是我朋友叶挺将军送的"，于是哑然。文革中期，先生曾以造反派的身份主持过中文系的大会。以后先生被保护起来了，不再在学校露面。

姚蓬子引起上海师院红卫兵的注意，那是在1967年3月。

那时候，上海师院五个群众组织——"红师院公社"、"千钧棒"、"东方红联络站"、"红卫战斗队"、"二二〇起义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上海师院一个老教师的30年代历史问题。

红卫兵们来到离上海师范学院只有几站路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收藏着大批20世纪30年代旧报刊。

物理系的一个女红卫兵埋头查阅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页又一页，细细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紧了，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1934年5月14日的《中央日报》，赫然登载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姚蓬子是资本家，这，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红卫兵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他们全文抄录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于是，红卫兵们组成"姚蓬子专案组"。

于是，上海师范学院里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惊肉跳，肉跳心惊，蜷缩在小楼里的姚蓬子，意识到大事不妙。

消息马上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

上海师范学院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一切群众组织，都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外调姚蓬子，必须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姚蓬子历史材料，列为"防扩散"材料。

“康办”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额，松了一口气。

然而，1968年4月，从青海省公安厅打来的长途电话，不仅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连江青都过问此事了。

西宁。青海省公安厅。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外调介绍信，提审那里在押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写了外调证明材料。按照规定，外调材料要经青海省公安厅盖上公章。

就在盖公章之际，两个年轻人受到盘问。因为青海省公安厅公安人员看到外调材料上，写着这么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

“你们为什么要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员扣留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的！我们是经公安部同意到这里外调的。”两个年轻人挥动手中的介绍信。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电话中明确地答复：“这两个人是经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调的。”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答复：“派往青海外调的杨、刘二人，确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成员。”

青海省公安厅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知道这回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头头，虽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马上回上海。他们到重庆、武汉避风头。过了好一阵子，才悄然返沪。

青海公安厅的电话，惊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谢富治怒气冲冲地问那位副部长：“他们去青海外调，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长答道，“他们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是符合组织手续的，何况外调的是姚蓬子问题。”“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谢富治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训斥副部长道：“你敢答应人家外调姚文元的父亲，你的胆子不小哇！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谢富治当即报告江青。

江青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江青转告汪东兴，要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电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赴京，责问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调姚蓬子？

与此同时，谢富治下令：“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带着文件，飞往北京。

他当面把文件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文件说明了来龙去脉：

1967年10月，由中共中央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厅周扬专案组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议，应对上海的30年代文化界人物进行审查，以便为周扬专案组提供材料。这位负责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三十多名审查对象，内中包括姚蓬子。这份报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审阅。他批了“同意”两字。于是，在1967年12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姚蓬子专案组”，该组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第六组。张春桥曾三次听取过“姚蓬子专案组”的汇报。到青海外调的两个人，确系上海“姚蓬子专案组”成员。

原来，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是姚蓬子的保护伞！

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有如下“保密”规定：

“姚蓬子专案组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办公室要单独，不准与其他30年代专案组交流材料”；

“有关姚蓬子问题的材料不准外泄，一律交市专案办公室”；

“通知上海师院革委会，不准任何群众组织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不准批斗”；

“不准上海师院、上海作协的组织组接待外调人员直接找姚蓬子谈话，调查提纲要经市专案办公室审批后方能叫姚蓬子写证明材料”；

“对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单位人员要注意，要详细登记，严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发现问题要马上报告市专案办公室处理”；

“对姚蓬子的审查不能像其他专案对象那样搞，不能搞隔离。让他在家里，用不着到学校去”；

“专案组要与姚蓬子家所在的里弄党组织联系，要他们做好对姚蓬子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有人问姚蓬子家住在什么地方，回答不知道”；

“专案组对姚蓬子的问题作些外调，也要叫姚蓬子交代自己的问题，但目的不是为了定姚蓬子的案，而是通过他了解30年代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一些情况。”

如此这般，专案组对姚蓬子实行保护，那是最清楚不过的。专案组成立之际，一位“领导”便定下了调子：“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有谁能定他的案？”

就是这么个“专案组”，江青也还摇头。

1968年6月10日，“姚蓬子专案组”接到王少庸的“四点指示”：

一、姚蓬子专案组不搞了，专案组人员解散。

二、调查材料集中，登记造册，上缴市专案办公室。

三、不准对姚蓬子搞批斗。如一定要搞，必须打报告，经上海市委批准。

四、不准接待外地的外调。如一定要了解，须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

好家伙，姚蓬子从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属下的“保护人物”，谁也不能碰，谁也不能查。

姚蓬子专案材料到哪里去了呢？

王承龙把全部材料密封，送交张春桥，锁入保险箱。

逍遥，安乐，从此姚蓬子躲在小楼里，万事大吉。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乐了姚蓬子，苦了“姚蓬子专案组”成员们。

当“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到来的时候，“姚蓬子专案组”的成员们成了“审查对象”。这，叫作“反审查”！

罪名是明摆着的：“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扩散‘防扩散材料’”。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上海师院中文系几位研究鲁迅著作的老先生，也成了“一打三反”的对象：因为鲁迅著作中多处提及姚蓬子，他们曾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过研究。不料，那也被视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幸鲁迅先生早亡。倘若鲁迅先生健在，势必会被拖到隔离室，勒令交代其“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之累累大罪！

下面摘录“姚蓬子专案组”组员之一沈震璐在1976年12月23日所写的揭发材料，足见当年的“反审查”何等酷烈：

>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红卫兵。因为我参加过姚蓬子专案组，掌握姚蓬子的叛徒、特务罪行，“四人帮”竟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
> 我原是上海师院中文系六七届毕业生，于1968年分配到解放军六三四一部队所属的泰州红旗农场劳动锻炼，原已宣布1970年2月回上海安排工作，忽接上海市委命令，全体锻炼学生留农场参加一打三反运动。于是，2月下旬，上海师院派来的郁某、周某，宣布经市委、师院批准，对我进行审查。从此我受到了三个月的隔离审查，以后又监视审查两个月。7月中旬，宣布回上海工作并继续接受审查。1971年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审查。
>
> 在农场五个月的审查过程中，上海来人对我进行了逼供、套供、诱供，手段极其卑劣，从精神上对我进行极大的摧残。他们一再逼问我，为什么参加姚蓬子专案组？是谁指使我参加的？把材料扩散给谁了？为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提供过什么材料？在审姚过程中搞过哪些其他活动？妄想逼我承认参加专案组是为了要收集姚文元的材料。他们骗我，说我接触的几位红卫兵负责人有的已经畏罪自杀了，有的已经被捕，有的已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说我是红革会头头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了（后来回上海才知道，当时他们并没有受到审查）。又威胁我，再不按他们的要求交代，就要以反革命论处了。因为涉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要累及父亲弟妹的政治生命，更不用谈自己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了。

每天从清早到深夜，在昏暗的小草棚里，几个人不停息地对我搞车轮大战，轮番训斥，逼写材料。要我把从1966年下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起，直至审查前的一切行动回忆出来。晚上最多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常常指着外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要我想想还要不要自由。每隔一个多星期，连里就要组织一次对我的批判会。

由于他们长时间的摧残，在第三个月我病了，风湿性关节炎发得很厉害，又出现了严重的血尿。尤其是精神上感到控制不住了。我要求治疗，要求给点安眠药，使大脑有所休息，避免精神分裂。市委派来的人竟然以防止搞阴谋为借口，不予治疗。后因我精神确已陷入紧张、恐怖状态，双眼日夜不能闭合，学生中的卫生员李婷婷不忍看着我变成精神病，向他们提出由她担保不出事，才批准我每天服一粒海拉明，略以镇定。其他疾病未作任何治疗。我幸好没有变成精神病，但记忆力丧失了，甚至连前两个月中自己回答的问题和写过的材料也记不起来了。所谓的专案组这才被迫暂时不隔离我，但仍不许与任何同学接触、讲话。那时，同学韩晓明看我病得吃不下饭，就趁我不在时悄悄在我床上放了一包廉价的香脆饼，竟被连夜召开全连批判大会，批她包庇反革命沈震璐。逼得这个同学连夜出走，经过同学们四出找寻，半夜才从荒野的河畔找回来，没有造成不幸……

对我的审查，前后竟进行了三年半……

这就是“反审查”——审查者受审查！

诚然，沈震璐等还算是“市革会专案组”成员，命运尚且如此。至于原先红卫兵们成立的那个“姚蓬子专案组”，更是遭到了严厉的“反审查”。

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头上长了几处癞疮疤，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扩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对于姚蓬子来说，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如同头上的癞疤。对于成了“中央首长”的姚文元来说，父亲的癞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本来，父是父、子是子，父亲的癞疤，与儿子何干？偏偏在“文革”中，流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红卫兵们叫得震天响的口号。

显然，照此推理，姚蓬子反动，姚文元混蛋了。于是，姚文元千方百计要为父亲遮丑——其实，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首长”的“光辉形象”。

上海人笑称：“江青的‘蓝苹’，张春桥的‘狄克’，姚文元的‘蓬子’，是三块揭不得的癞疤！”江、张、姚这伙“上海帮”的三块癞疤，都与上海滩紧相连。

江、张、姚既成一帮，也就互遮“癞疤”。为了包庇姚蓬子，江青下过“指示”，张春桥写过“批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出过力气。

1972年2月4日上午9点15分，上海师院的武保组里火光闪耀。有人清点，有人监视，有人点火，一举烧毁了九份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这是遵照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亦即“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头目徐海涛的“指示”办理的。

1975年3月1日，又是一把火，烧毁了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17份。

原上海师大清队复查人员何家余，曾这样谈及销毁姚蓬子“防扩散材料”的经过：“大约在1972年五校合并前不久，原师院工宣队政委张某某送来一张已销毁的材料清单，是双线格纸一张，最后有张某某和军宣队负责人刘某某的签名。销毁的是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对象审查材料中剪下来的涉及姚蓬子的材料。通过原清队办公室负责人洪某某告诉我们，在清队复查中也要注意把涉及姚蓬子的材料，都要剪下来。说这些材料虽不属‘防扩散’，但‘不宜扩散’，‘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这是一办徐海涛来师院时个别作的‘指示’。在清队复查中也照此办理。在1975年清队复查告一段落，我离开武保组时，由洪某某主持销毁

了第二批。包庇姚蓬子，就是为了包庇姚文元。”

在这两批销毁的“防扩散材料”中，有姚蓬子在“文革”中写的检查、大字报底稿，也有别人揭发姚蓬子的材料。此外，在别人的交代、检查中，凡涉及姚蓬子的，也一概销毁。

于是，在上海师院，再也没有“整”姚蓬子的“黑材料”了。

我追寻着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的材料。

一纸公文，道明了这批材料的去向。那公文上方，印着一行鲜红的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公文的右下方，盖着这个委员会的红色大印。

公文全文如下：

春桥同志：

十一月九日静安区公检法军管组，送来有关姚蓬子的材料一袋共两本。现送上请查收。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章）

1968.11.9

[image]

■ 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关于姚蓬子材料给张春桥的请示信

公文的右上方，写着张春桥的亲笔“批示”：“何秀文同志存，勿扩散。春桥十一月十日。”

何秀文，即张春桥秘书。张春桥在收到这一袋姚蓬子材料之后，迅即“批示”“勿扩散”，何秀文遵嘱把材料锁进了保险箱。

如今，这锁进保险箱的姚蓬子专案材料，又到哪里去了呢？

甚费周折，在一个重要的档案部门，笔者总算在一堆“文革”的“核心”材料中，找到牛皮纸封皮的卷宗，上面有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姚蓬子专案”字样。打开一看，却是个空心汤圆，里面放着的，只是几份销毁姚蓬子专案材料的请示报告、销毁材料目录、销毁经办人的签名之类。卷宗中原有的数十份外调材料以及姚蓬子写的自传，全部销毁！

其中的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市委：

最近，我室十四组在清理防扩散材料过程中，发现一份姚蓬子于（19）67年8月18日写的材料。这份材料是这样形成的：在（19）67年7、8月份，红卫兵小将配合刘少文（刘少文在解放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引者注）专案组调查刘少文历史问题过程中，通过姚蓬子了介（解）刘少文的有关方面问题，做了笔录，姚蓬子亲手写了这份材料（详见附件）。现请示这份材料如何处理。

附：材料共拾壹页。

（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1973年5月15日

天头上，写着“绝密”、“急”字样。姚蓬子在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到了1973年有什么可“急”的呢？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也确实“急”。就在翌日——5月16日，王少庸便在这一请示报告上“批示”道：“天水、景贤、秀珍同志，此件拟销毁，妥否？是否需报洪文同志并请阅示？”

按照当年的习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圈，这叫“圈阅”。一旦“圈阅”了，也就表示同意。

于是，姚蓬子亲笔所写的长达11页的材料，被销毁了。

又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市委：

原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在结束专案审查时曾将姚蓬子的有关材料移交给我室文艺专案组（即当时的30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引者注），最近该组在全面清理专案材料时，对这部分材料提出要求处理，鉴于去年我室十四组清理出有关姚的材料已报请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销毁，因此对这批材料，我们意见也予以销毁。

当否，请审批。

（附材料目录一份）

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image]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关于销毁姚蓬子材料的请示报告

王少庸于7月28日作了“批示”：“拟同意。请天水、秀珍同志阅批。”

在马天水、王秀珍画了圈圈之后，这批总共32份、108页的重要材料，付之一炬。

这批重要材料中，包括姚蓬子在“文革”中所写的三份交代、周修文写的一份材料，此外还有知道姚蓬子30年代情况的文艺界人士和原国民党中统特务写的材料。特别是姚蓬子所写《我所知道的叛徒》，长达22页，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自己叛变的经过，被化为纸灰！

我来到姚蓬子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因为户口档案上有着姚蓬子在1955年被公安部逮捕的记录，竟然也被抽走、销毁！本来，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户籍资料是永久保存的档案。姚文元凭借手中的权力，生怕父亲被捕那一行记录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就来了个销毁！

最令人震惊的是，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那里保存的姚莲子档案，即《沪公侦H叁（54）第7315》和《沪公侦H秘（55）第38140》，只剩下档案卡片，而档案不知去向——须知，这是在1954年和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审查姚蓬子时的档案材料，居然也因属“防扩散材料”而被抽走。

然而，火焰只能吞没档案，无法改变历史。每一个人留在历史上的足迹，如铁铸刀刻一般，无法任意涂抹。

何况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犹在，何况当年的公安办案人员犹在，何况印在《中央日报》上的《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犹在，更何况姚文元无法一手遮天——他可以在上海为所欲为，尚不能把手伸进公安部，公安部档案室所保存的姚蓬子的档案犹在，姚蓬子在1955年所写下的《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仍然完好无缺地锁在那儿的档案柜里。

姚蓬子之死

一辆车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只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

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抬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掉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掉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海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屈，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像幽灵一样晃来荡去。他用“阶级斗争”的眼睛审视一切，用“阶级斗争”的嗅觉辨别一切。

他暗中调查了那几个“积极”得过了头的“造反派”，查档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现。他还拜访了离姚家不远的那位江青心腹、后来当上“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本来住在那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

主任李翠贞教授[32]，自从1966年9月9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杀身亡，于会泳便抢占了她的那套舒适的公寓住宅。

过了半个多月，那张瘦长的马脸才在林村消失。他，实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阶级敌人”。不过，那几位“造反派”战士已察觉幽灵的存在，吓得魂不附体，后悔当初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

收音机里播送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必须洗耳恭听。姚蓬子在胸科医院单间病房里听着广播，枯黄的脸上泛着笑容。他本来期望儿子成为一个作家，不料这么有出息。想当初，当儿子神秘地要他帮助查《明史》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批什么《海瑞罢官》纯属多管闲事，如今他方知儿子确实“先知先觉”，青胜于蓝。

1969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往看望、慰问。姚文元派来专人，在床前聆听姚蓬子对后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着为林彪起草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无法分身。

1969年2月17日，肺癌终于结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辆大卡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驶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军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众多的藏书，运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车，搬了过去。

几天之后，周修文回林村取点衣服，见到了邻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货，别人还没问，她就先吹了起来：“哎哟哟，康平路那里真好，连东西都不用自己买。你只要开一张单子，过一会儿，有人就会替你买好，给你送来！”

刚说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脸，摇头了：“哎哟哟，那里就是有一点不好——前前后后，都有警卫员站岗。这么一来，你们就没办法来看我了。那个地方，‘外头的人’是进不去的！”

她吹嘘一番，抬着头、挺着胸，一副“革命妈妈”的标准姿势，开步走了。

邻居们望着她的背影，有点糊涂起来：她刚才说的康平路“有一点不好”，究竟真的“不好”，还是假的“不好”呢？

不过，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决定不开追悼会，以免太招惹别人的注意。虽说周修文对此曾有些不满，无奈儿子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于是，姚蓬子的遗体被悄然送进火葬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消失，结束了他的错综复杂、曾“红”曾“黑”的一生。

姚蓬子安葬在杭州南山公墓。现在的墓碑是2008年11月重立的，墓

碑上刻着“子文元，媳金英”。

看到姚蓬子的墓，不由得令人记起他在诗集《银铃》一书《自序》中的话，他认为“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而他是一个“睡在坟墓中的人”，所以这些诗是他“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1]1986年6月16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了黄晨。

[2]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3]叶永烈于1986年7月26日、1995年9月30日、1995年10月3日及4日多次采访秦桂贞。

[4]笔者在1995年10月对秦桂贞再度作了采访之后，曾写成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当时文章中写成“秦桂贞又一想，也许是彭真或者是鲁迅的儿子找她。因为彭真以及鲁迅的儿子都曾希望她去他们家烧菜，当保姆。”文章发表后，1996年3月23日，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给笔者写了一封信，通过丁言昭女士转来。周海婴先生针对上面一段文字，在信中指出：“鲁迅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作为唯一的我，可以确切地肯定，不论直接、间接，都不认识她，也没有需要请她来我家当保姆、烧菜。因此，请先生今后出版此书时（或转载）把涉我的一句予以删去。谢谢。”

笔者接周海婴先生来信后，即查了采访秦桂贞的录音带，她当时确实是那样说的。于是，笔者于1996年3月29日给秦桂贞打了电话，她作如下答复：“当时，我在北京北海幼儿园工作，鲁迅的孙子在这个幼儿园。我认识鲁迅夫人。她曾对我说，希望到她家烧菜、当保姆。”

笔者在当天给周海婴先生复信，除了说明了秦桂贞的意见外，还表示：“我尊重先生的意见，删去有关先生的那一句话。”

1996年4月6日，周海婴先生又写一信给笔者。信中说：“昨天我请教了陈明先生的妹妹，她在北海幼儿园工作几十年，现已退休，住在楼下哥哥家里。她说记得很清楚，秦桂贞调入和调出。她说秦是1953年离开的，在园里时间很短。调出调入都是江青那里办的。我的孩子是三岁以后才能进北海幼儿园，那已经是1957年之后的事情了。”

笔者在4月9日收到周海婴先生来信，又打电话给秦桂贞核对。秦桂贞告诉笔者，她是在1958年离开北京北海幼儿园的。她说，这有档案可查，上海的她的许多同事也都可以证实她是在1958年回到上海的。所以，她说，她绝不是“1953年离开”北京北海幼儿园的。事隔多年，陈明的妹妹可能记错，而她作为当事人不会记错自己调离的日子。

笔者经过与秦桂贞多次核对，以为她的回忆是可靠的。如果她早在1953年就离开了北海幼儿园，她怎么可能知道鲁迅之孙周令飞在这个幼

儿园呢？周海婴先生的指正也是正确的，因为她所说的“鲁迅之子找她”不确，应是“鲁迅夫人找她”。

虽说以上只是一件小事，笔者很感谢周海婴先生的认真指正。1996年4月13日晚，笔者在与丁言昭女士通电话时，她建议笔者写一段注释，说明核对事实的经过，附于书中。笔者以为她的意见很好，所以写了这一注释。

[5]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3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6]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3册，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7]据黑雁男：《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版。

[8]过去常说成是“匿名信”，实际上严慰冰寄给林彪的信署化名，如“基度山”，应为“化名信”。

[9]据严怀瑾（即严慰冰）：《严朴生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0]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1]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2]经盛鸿：《演员与“网员”：江青在延安鲁艺的双重身份》，《粤海潮》2008年第1期。

[13]方林：《怀念许建国》，《人民公安》2002年第8期。

[14]即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

[15]《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6]2003年10月31日，叶永烈在杭州采访王芳。

[17]《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18]2004年3月26日，叶永烈在杭州采访王芳的夫人刘馨。

[19]《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20]据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21]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夏其言。

[22]黄志伟：《徐家汇藏书楼》，《鼎》第12卷。

[23]1986年4月11日，叶永烈采访在“上海藏书楼事件”中深受迫害的费毓龙。

[24]1986年5月11日、16日、23日，叶永烈三度采访葛正慧。

[25]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叶永烈在上海两度采访方兆麟医生。

[26]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27]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28]1986年7月1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周士奎及姚蓬子家的里弄干部。

[29]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30]当时上海市信件邮资为4分人民币。

[31]1986年7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师大采访张根生、沈舟根。

[32]1986年5月9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李翠贞教授的胞妹李孝贞。

第十七章　王洪文横行上海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1967年11月9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5月9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的标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

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

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陈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

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

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

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image]
■ 叶永烈从王秀珍人事档案中查到的王秀珍的照片

[image]
■ 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

[image]
■ 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

[image]
■ 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

[image]
■ 王洪文的“小兄弟”马振龙

[image]
■ 王洪文的“小兄弟”叶昌明

1967年4月11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

1967年10月26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1968年6月12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致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站”，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1966年9月15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1966年9月22日宣告成立“串连站”。1967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1966年11月22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入“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

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1月24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200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1967年2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钩。“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

充满辣味的“全向东”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1962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等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〇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1]。早在1957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 2月19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4月26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4月29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5月7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5月31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6月10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6月24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器：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7月16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7月22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7月25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

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静坐于上海市公安局前

1967年3月23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

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4月24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2]，于4月26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戴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戴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5月20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

件”。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成员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

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王洪文后发制人

“小兄弟”们摩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军帐中，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对手了若指掌。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6月23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26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7月5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6月28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 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
>
>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

当天深夜12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6月29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

“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彩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震动上海的解福喜之死

上海进入7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都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过去20天，7月18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标语是7月13日上午8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7月18日上午8时02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司”的大标语。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东方红”以为，从13日上午八时至18日上午8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18日上午8时02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13日至18日，保留期应当是到18日夜12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8时02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糨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糨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致铁块，代替了墨汁和糨糊。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7月21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7月18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令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

“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7月20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

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押了王力。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7月21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大会”。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

“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一幕惨剧在武汉发生了：因“七二〇”事件，武汉被打伤打残的达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的达六百多人！

冒出了“压勿煞战斗队”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联司”在7月21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备忘录》全文如下：

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5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账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〇）、“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炮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1967年7月21日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500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17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

一、贴标语，发传单；

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

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撒传单；

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

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支联站”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

> 我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坏头头。
> 今年2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运动，要争名争地位，保住自己的那个山头，实现他的野心。就在2月中和其他组织一道搞了个分裂主义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大反工总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革命群众都一致起来反对，并要求把这些坏头头揪出来。在3月中的一个晚上，戴祖祥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了起来，现在仍在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

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7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也在大世界对面贴了《评“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毒害，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

“888”秘密会议

一辆辆轿车驶过华山路，浓密的法国梧桐遮住了骄阳。当王洪文来到“888”，他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已在那里吹牛了。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1967年7月29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春桥同志20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

“小兄弟”们兴奋起来，因为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无疑如同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

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

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8月5日。”王洪文抽着烟，像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我们的人，打进了‘联司’和‘支联站’。据他们传出可靠的消息，‘联司’和‘支联站’在8月5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我们必须在8月5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就像武汉的‘工人总部’消灭‘百万雄师’一样！”

“先打‘联司’，还是先打‘支联站’？”又有人问“王司令”。

“‘联司’好打，‘支联站’难打。最好先干掉‘支联站’。”王洪文答道，“从‘解福喜事件’之后。‘东方红’已经退出上柴厂，住在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和外滩的市革会大楼。上柴厂成了‘联司’的统一天下。这样，只要把上柴厂一包围，‘联司’就成了瓮中之鳖。麻烦的是‘支联站’，东一个、西一个。我想，最好等‘支联站’开会的时候，一举歼灭。我已经关照了混进‘支联站’的我们的人，一有开会的消息，马上报告我。所以，也请各位随时作好准备，随叫随到。最理想的方案是先干掉‘支联站’，再吃掉‘联司’。另外，考虑到‘工总司’的战斗力、机动性不够强，我已请‘上体司’的‘胡司令’协助，请他们作为‘工总司’的‘尖刀班’！”

“这个主意好！‘胡司令’厉害！”王洪文的话，立即受到“小兄弟”们的一致赞同。

大抵因为《沙家浜》里有个胡传魁“胡司令”的缘故，所以胡永年也博得个“胡司令”的“头衔”——认真点讲，胡永年并非“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司令”，只是一名“常委”而已。

胡永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运动员。他喜欢踢足球，进入上海一家钢铁厂之后，成为上海工人足球队的队员。

此人在“文革”前因打群架之类流氓行为，受到过领导批评。“文革”一开始，他便扯起了“造反”的旗号：不久，他当上了“上体司”的“常委”。

“上体司”的造反队员们与众不同，个个身强力壮，有举重大力士，有武术高手。哪里有武斗，这支队伍便在胡永年率领之下冲冲杀杀，出现在哪里。在“一·二八”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被“红革会”围困于锦

江饭店。胡永年率“上体司”杀进重围，救出张春桥。张春桥马上夸奖胡永年“粗中有细，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办法”。于是胡永年声望陡增，成了“胡司令”。

“胡司令”抢了一批摩托车，使“上体司”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虽说这支队伍不过千把人，可是个个身手不凡，一顶十，“战斗力”比“公革会”还强。

“王司令”预料到与“联司”、“支联站”之间会有一场恶战，于是上门向“胡司令”求助。

“好说，好说！”“胡司令”一口应承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兄弟，打一个电话过来，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摩托车就出动！我手下的‘搏斗兵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果真，7月31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

大战的前奏

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民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泰安路120弄31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7月31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联”情况。

在这三十多人中，唯有一人显得坐立不安，眼睛不时往窗外瞟。因为他事先给王洪文挂过电话，密合今晚“支联站”会议的时间、地点，怎么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司令”。他的一声令下，“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便冲进小洋房。

“支联站”的头头们束手就擒。

几辆冷藏车来到小洋房前。“支联站”的头头们，被押上闷罐一般的冷藏车——几个月前，王洪文抓马骥[3]，用的也是冷藏车。“王司令”以为，冷藏车的“保密”性能好，而且不会引人注意。

冷藏车在上海市区兜了几个圈子。直至确信后边没有别的车子跟

踪，这才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胡司令”的协助下，王洪文没有费多大气力，一下子便把全市“支联站”的一批首脑人物抓获了。

不过，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清点“俘虏”名单之后，王洪文有点后悔：他太性急了，下手太早，以致使一批晚到的“支联站”头目漏网！

原以为这次可以逮住“全向东”，可是，据“内线”告知，“全向东”非常“敏感”，这几天行踪诡秘。虽然“全向东”每天都对“支联站”的工作发表意见，可是，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支联站”头目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尽管“全向东”成为漏网之鱼，正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张春桥得悉一举捕获“支联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还是嘉许了王洪文。

意气正盛，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一伙“小兄弟”围着，计议着。直到这时，他的“司令部”才有了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像“司令”的样子了。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厂详图上画了一个圈，说道：“对于‘联司’，要先围后歼。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

“公革会”、“消革会”的头头，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公革会”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颇有战斗力。那“消革会”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已经“改行”，并非致力于救火，却是武斗的一支特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阀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而今，50年之后，这一“经验”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于是，8月3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

影记者。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押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

“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打倒臭‘联司’！活捉杨仲池！”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

上海血泪横飞的8月4日

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是美国、苏联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中国，本来已是经济落伍的国家，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困难”的挫折，东方巨龙已经远远地被抛到后边。然而，一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1967年8月4日，在“总指挥”王洪文指挥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所发生的一场血战，是“文革”灾难的一场缩影。

在“工总司”大旗指引下，上海24万产业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用最原始的弹弓、砖头、铁矛，冲进上海柴油机厂，“踏平”“联司”！

两架直升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记录着王洪文的“丰功”。

这天的气温，高达摄氏39度。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当年“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所载《8月4日上柴战地目击记》，虽然处处为王洪文的“伟绩”大唱赞歌，但是字里行间，毕竟还是记下了当年的疯狂和残忍。

兹摘录若干原文于下：

> 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上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放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们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引者注）、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坏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像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的请战，决定“消革会”、“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联司”一小撮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撑着。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像“落水狗”。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了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冲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后，就兵分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联

司”老巢彻底完蛋了！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令”，“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于7月29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8月2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入王洪文的网里。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8月14日在那里被捕，18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4]。

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王洪文所踏平！（杨仲池、“全向东”在当时都被王洪文投入狱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杨仲池成为中央某部的处长，“全向东”则作为访问学者于1988年夏飞往美国。）

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

臭“联司”，
“支联站”，
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
残杀革命派，
殴打解放军，
配合刘少奇，
紧跟陈丕显，
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
同心干，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
砸烂“支联站”，
打倒刘少奇，
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8月4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张春桥“完全支持”王洪文

1980年12月6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1967年8月4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

> 1967年8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1967年7月31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8月3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8月4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1977年10月的证词、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的证词、叶昌明1978年11月22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1967年8月4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

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8月4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8月5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

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像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9月1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

> 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张春桥在8月4日那天，全身神经像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毛泽东决定在1967年7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1966年7月，“文革”如火如荼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传遍全国：“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当1967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然而，1967年7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

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7月14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7月20日——“七二〇”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分赴武汉和上海。

前往武汉的专机里，坐着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临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下午2点10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邱会作心如火燎，要求见毛泽东。下午5点多，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拆阅了那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信，淡然一笑。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要搞政变”的流言，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4点20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场。坐在专机里的大员，便是张春桥。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张春桥奉江青之命飞往上海，以便作好准备，迎接毛泽东来沪——因为林彪、江青都以为武汉不安全。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当毛泽东住进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正处于“工总司”与“联司”、“支联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张春桥提心吊胆。他不公开露面，让“造反司令”王洪文冲在第一线。这样，万一毛泽东批评砸“联司”，他可以往王洪文身上推。

8月4日，王洪文在上海东北角指挥砸“联司”，毛泽东在上海西南角不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来的消息。

毛泽东对于“八四”事件，说了些什么呢？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上海街头的红色号外像雪花一样散发。

那是9月25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的“号外”。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9月24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

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9月26日的《文汇报》上：

> 清晨四时许（指9月25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
>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11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9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

“王司令”乔迁“上只角”

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一下从上海的“下只角”升入“上只角”。

从此，“王司令”家的地址严格保密，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和几个亲密的“小兄弟”才知道。

“夫荣妻贵”。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育员，后来调到大连路印刷厂当临时工。这时，被安排到市西区徐家汇附近上海无线电四厂当干部了。

当王洪文乔迁之际，叮嘱岳母道：“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

“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

“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岳母是文盲，不明白女婿所说的“派大用场”的含义。

不过，王洪文搬走之后，那小屋白白空着，岳母总觉得可惜。

她喜欢养鸡。干脆，就在那小屋里养起鸡来。

鉴于鸡、鸭会招引蚊、蝇，鸡、鸭又会到处拉屎，因此上海市区向来禁止居民养鸡、养鸭。

王洪文岳母在那小屋里养鸡，使居委会干部左右为难：不让她养

吧，她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不敢得罪她，也不敢得罪她的鸡；让她养吧，居民们有意见，为什么她可以闹特殊？

有人气不过，拿起一把刀，冲入那小屋，抓起一只鸡要杀。

马上有人赶来劝阻：“杀不得呀——那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的鸡呀！”

大抵因为那鸡具有特殊的身份，杀鸡者的手只好松开，刀下留鸡！

岳母再不骂女婿是“小侉子”了，逢人夸起“小王有出息”。

每当她拎起菜篮子步入菜场，营业员们向她点头哈腰。每一回，拿出同样的钱，她的菜篮子总比别人的要沉得多。虽然她并没有开口要营业员给她一点“实惠”，但营业员知道她的女婿如今红得发紫，乐于拍她的马屁。

至于她的女婿“小王”，那种飞黄腾达的气派，更是甭提了：进出轿车，抽“中华”烟，喝“茅台”酒……

马天水卖身求荣

在踏平“联司”之后，王洪文总算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的“工人领袖”的地位已经牢固了。虽然还有一些老对手在暗中活动着，毕竟无法再形成“赤卫队”、“二兵团”、“联司”及“支联站”那样的庞大的反对派。何况，“文化大革命”已转入“斗、批、改”阶段，要想再度成立全市性的反对派组织，已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在“市革会”中的权力斗争，却日益变得激烈起来。

“张老大”、“姚老二”，这两把交椅是铁打的。不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随着他们在中央的地位的提高，到上海来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

徐景贤成了“徐老三”。虽说他只比王洪文年长两岁，但官场经验比王洪文要丰富十倍。想当年，王洪文在安亭闹事的时候，徐景贤还是“老保”，还是一个替陈丕显、曹荻秋起草检讨书的角色。如今，徐景贤超过了王洪文。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三”。

不久，又有人要挤到王洪文的前面来，使王洪文的排名地位往后移了。

1967年10月12日，上海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虽然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当时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

张春桥、姚文元专程返沪主持欢迎仪式。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的电讯中，以这样的次序提到出席欢迎仪式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的名字：张春桥、姚文元、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王少庸、马天水。

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是驻沪三军负责人，出现在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理所当然。那王少庸、马天水是当年的“走资派”，眼下也成为上海的党政负责人了。

名单中没有提及王洪文。

两天之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上海。新华社电讯中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仍与两天前一样。

王少庸，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马天水，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获得“解放”之后，不再是“走资派”了，而是作为“革命的老干部”，成为“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结合”对象。他们一经“结合”，便坐到王

洪文的前面去了。

一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成了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王洪文。

王洪文成了“王小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不断“跃进”，越过了王少庸，越过了廖政国，后来以至越过了徐景贤。

马天水这人，论资历，比张春桥还深得多。马天水曾用名马登年，他出生于河北唐县，早在1931年12月便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比江青入党的时间早。解放初，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业部部长。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一直分管上海工业生产工作。当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张春桥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马天水曾作为上海赴大庆学习代表团团长，到大庆参观访问，返沪后在上海工业系统全面执行“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推广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三老”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四严”即“严肃、严密、严格、严谨”）。

平心而论，马天水的前半生确实是不错的，是一个为革命建立过功勋的人。上海数千家工厂，他亲自到过的不下千家。他能随口报出上海各大厂的厂长名字、主要产品、生产特色。他不愧为上海的“工业通”。正因为这样，他在上海工业系统有着颇高的威信，人称“马老”。

马天水与江青原本并无瓜葛。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的许建国在1977年接受马天水专案组调查时，实事求是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没有上调之前[5]，马天水还没有同江青勾结。因为当时马天水是书记处书记，而张春桥只是宣传部副部长，马天水无论资格还是别的都比张春桥高得多，但是那时张春桥就已经有意识地向江青靠拢，而江青也有意识地拉拢张春桥，两个人走得很近。张春桥很快当上了市委常委，马天水对此很不满意，还当着我的面发过牢骚，后来张春桥知道了，就告诉了江青。江青对马天水是有些不满的。”

“文革”开始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王洪文的“工总司”的炮轰目标。

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时候，一天听说马天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便赶往那里，要求马天水予以承认这个组织。马天水打着官腔道：“这个么，还要研究、研究……”

差一点使这匹“老马”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他在北京“乱放炮”。

那是1966年11月下旬，马天水前往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马天水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去的，他以为红卫兵的大串连以及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严重干扰以至破坏了上海的工业生产。

马天水到了北京以后，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求他们收集“工总司”的材料，马上告诉他。上海市委办公厅杨慧洁根据马天水的意见，派人下去调查，规定只查11月9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工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

不久，马天水又来电话，要求收集“造反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材料”。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报了一批上海“工总司”绑人、打人、私设公堂的材料。

有了这批材料，马天水便在北京放炮了，指责上海“工总司”破坏上海工业生产，狠狠批评了“文革”。

马天水的话，传进了“副统帅”林彪耳中。林彪大骂马天水老糊涂，斥责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副统帅”的震怒，使马天水吓破了胆，丢魂落魄。虽然他过去在上海跟张春桥并无太深的交往，此时此刻，张春桥在北京荣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不能不求援于此人。

张春桥正在为轰不开上海市委而发愁，如今马天水主动前来求救，乐得拉他一把。于是，便向这位“老糊涂”作了“路线交底”：“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一句话——改朝换代。你想不犯错误，关键在于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毛主席算起，到姚文元为止，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共八个人！”

张春桥一席话，使马天水悟明真谛。

果真，在“一月革命”时，上海造反派集中火力炮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虽然也受到“火烧”，毕竟没有吃大苦头。就连他和陈丕显、曹荻秋一起落到耿金章手中时，他也还提出，不愿与陈、曹一起关押！

1967年2月23日，张春桥为马天水开脱，说道：“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

翌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当着上百万上海市民的面，在说到“三结合”时，着重提到了马天水：

> 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副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知

> 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张春桥的这番话，已经非常明确地暗示，马天水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铁板一块”，他可以“解放”。

马天水，这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可惜脊梁骨太软了。他听到张春桥的这番话，刻骨铭心，竟从此跟定了张春桥。

果真，1967年4月，马天水得到了“解放”，立即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去。

从此，马天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老、中、青”三结合中的“老”。

毕竟“老马识途”，由马天水来领导上海工业生产，远远胜过“造反司令”王洪文。马天水手中的权，日益扩大了。

1968年4月12日，上海爆发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高潮。马天水作了“精彩表演”。他以“老干部”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张春桥打保票。他说：“我与春桥同志共事多年。我对他的历史很清楚，他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他还拍着胸脯道：“有人说我马天水死保张春桥，说得对。我就是要死保春桥同志。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春桥同志一边。”

经历这番政治危机，张春桥越发欣赏马天水的“忠诚”，夸奖他是一匹“好马”。于是，张春桥越发倚重马天水了。

上海“市革会”的“三驾马车”

马天水的“复出”，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了三股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

第一股势力，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以“工总司”的那班“小兄弟”为核心人物。

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算是“英雄”。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像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像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

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两派不断地发生摩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场。马天水对双方都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帖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1968年4月12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

“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住。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

“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

王洪文的“小兄弟”成了“纳新”对象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省、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1968年10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1968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不久，1968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
>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入党，对于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王洪文当年正凭借着他是党员，成了“工总司”的“司令”。耿金章能

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也借助于他的党员身份。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紧锣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选工作开始了。刚刚结束会议，张春桥便飞抵上海。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推选中共九大代表的标准：“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所谓“九次路线斗争”，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错误路线分别是：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三次“李立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第六次，“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八次，“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照毛泽东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路线”的批判。

按照张春桥提出来的“标准”，理所当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

张春桥细细审看了内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内定名单。

张春桥依然不满意，问王洪文道：“你们‘工总司’的常委里，难道只有你和王秀珍两个人才能当九大代表？”

王洪文回答说：“‘工总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里却没几个党员。”

“你们为什么不抓紧‘纳新’工作？”张春桥直截了当地点名道，“像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真是“史无前例”，当张春桥说出这句话时，陈阿大还不是中共党员，居然已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

“好，好，我马上抓紧‘纳新’工作。”王洪文连声答应。

“除了陈阿大之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

紧。”张春桥用很明白的话，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保’字号在党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那就是坐失良机！九大代表，一定要选我们的人！”

“先进典型”陈阿大入党

“小兄弟”们的入党工作，王洪文早就在抓了。只有“小兄弟”们一个个入党，“王司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才足以压倒“秀才帮”——那些“秀才”们，倒差不多个个是党员。因为“秀才帮”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非党员进不了这个写作班。

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之中，张春桥最关心的，要算是陈阿大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已在为陈阿大入党作舆论准备了。

那是1968年9月15日，坐落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的良工阀门厂，一反往日进进出出的都是运货大卡车，这天忽地来了许多小轿车。

从轿车里出来两张熟面孔——虽说他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工厂，人们却早已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照片上认得他俩。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光临！他俩在王洪文陪同下，在一片掌声中，步入厂会议室。

良工阀门厂是陈阿大的老家。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来此，为的是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

> 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
>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
>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没有入党，就进不了“核心力量”。在所有的权当中，党权是最核心的。你不是党员，怎么掌党权？你夺的权，就不稳固，迟早会落在别人手中。
>
> 吸收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 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

> 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造反者，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都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1968年9月29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陈阿大是王洪文“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

和厚爱。

陈阿大其人

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此“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18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22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32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炊事员，做门卫。

1942年5月2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18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1957年，15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1958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是1958年8月15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我在陈阿大的人事档案里，见到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1958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1961年8月，19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414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710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1962年8月21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做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

> 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
>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1965年3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

申请书

> 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
>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

1965.6.29

1966年1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

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炼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

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入，总是用脚把门踢开；

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

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

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

“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

“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

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1917年才发生，袁世凯在1916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陈阿大板起面孔，像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

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

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1977年11月20日上海《文汇报》披露：

> 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间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
> ……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1967年1月6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7月31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有他，8月4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10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1968年10月10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才九天——1968年10月19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稀奇的是，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别人代填的！然后，陈阿大照抄，填了另两份。这三份“入党志愿书”，他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里。直至他锒铛入狱，这三份“入党志愿书”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斗中查出。

王洪文手下，有五员大将，人称“五虎将”。陈阿大是其中一员“虎将”。另四员乃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在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35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1966年11月9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1967年3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1968年5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1938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1968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猷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1984年3月12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〇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〇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1968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13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聿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代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

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

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5点一直抄到深夜12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入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单位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根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1944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1940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入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

王洪文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1969年4月1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天下午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

两年多以前——1966年10月18日下午1时20分，在北京和平门大街上，王洪文拥挤在成千上万的大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之中，远远地见过毛泽东一眼，曾为此而“激动万分”。

然而，中共九大拉开帷幕，在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之际，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毕竟只是“地方粮票”，从未在中央抛头露面。这次，他不仅当上九大代表，而且一跃成为主席团成员！

主席团成员共176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　汪东兴　温玉成　董必武　刘伯承
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于会泳　王体　王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画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image]

■ 王洪文在中共九大上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座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像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下午5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造反起家的“司令”，如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认，变成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会议进行到半途——4月14日，王洪文头一回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这天，举行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林彪讲话之后，依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是作为工、农、兵、妇女和干部代表发言的。

34岁的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王洪文在毛泽东的记忆屏幕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破天荒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洪文成为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4月24日，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170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09人。这是一次“大换血”式的选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仅53人继续当选。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入中央的起点。

与他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还有王秀珍、徐景贤。作为老劳模，上海国棉一厂女挡车工杨富珍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马天水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中。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人比王洪文大一岁，原是上海电机厂副工段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

大会期间，发过三回新闻公报。不过，这三份新闻公报对于上海组的爆炸性新闻，却只字未提。虽然出自上海组的新闻，九大代表人人皆知，而且会后又通过层层传达向全国扩散。

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任主要演员的闹剧。

张春桥拿“上海党”炮轰陈毅

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选”，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乱上纲，有的则是陈毅说出了真理而被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诸如：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上海组把如此不伦不类的小册子，在中共九大上散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党批臭陈毅，批倒陈毅。

张春桥发动了这场攻势。

对于上海人来说，陈老总光彩夺目的形象是无法从心头抹去的。

1949年红色的5月，是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15300余人；

1949年5月27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百废待兴的上海，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振兴，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

豪爽，直率，真诚，磊落，陈老总与上海人民肝胆相照，赢得上海人民的崇敬；

虽然他从1954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58年——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九年。

张春桥忌恨陈老总，还不仅仅因为他对上海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因为在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他与张春桥抗争，而且还在于阿丕（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张春桥把他视为陈丕显的“黑后台”。

“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傲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诡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同时又对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68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进行了批判。陈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钉，“新贵”张春桥又恨透了他。

陈毅眼看着九大将是林彪、张春桥之流的“胜利的大会”，便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批判’，我当九大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听罢，说道："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张春桥马上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拟就了那份公函。经张春桥阅定，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陈毅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1968年11月，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编造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快人快语，陈毅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他敢怒敢言，难得的直性子，难得的坦诚。他的种种"反动言论"，常常是从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头去尾而编造出来的。在"文革"中，面对大闹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词，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即席答辩。这篇讲话曾被斥为"大毒草"，许多话被断章取义作为"反动言论"加以"批判"。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根据陈毅讲话录音整理的记录全文，深为陈毅赤炭般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不已。兹把《我这个外交部长》照录于下，通篇激情澎湃，没有半点"反动"色彩：

>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
>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中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
>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蘑菇，明天来跟你蘑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
>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

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引者注）。如果外交人员都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引者注）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引者注）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引者注）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小组”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指江青——引者注）躲在背后，教娃娃们（指红卫兵——引者注）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引者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

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引者注）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引者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分组讨论的头一天，陈毅刚刚步入上海小组会场，正笑吟吟跟代表们打招呼。他发觉，人们视他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几个老熟人走过来，跟他亲热地握手。

突然，徐景贤振臂领呼口号：“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

讨论会一下子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王洪文担任华东组的召集人，主持着会议。在会前，他本来已布置好围攻陈毅的发言。此时，见陈毅“跳”了出来，心中暗喜。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陈毅经历过许许多多“批判会”，不过，这一回他发觉有点奇怪：“上海党”的代表们一个个手中都拿着一本小册子。发言时，看一下小册子，便会熟练地说出陈毅的一段“黑话”，然后加以“批判”。陈毅不知道那小册子是什么东西——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陈毅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

两个多小时过去，“批判会”算是结束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这才拿起一本小册子，送给陈毅。

陈毅一看封皮，哦，原来是《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海党”编造的！

在1980年12月6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时，法庭记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 审判员审问王洪文：“1968年11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1980年8月22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1981年9月9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徐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也许，毛泽东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1972年1月6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

王洪文成为上海“中南海”的新主人

中共九大闭幕之后，4月28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5月1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标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像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入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嘁嘁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嘈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

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

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64元，后来厂里每月给10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18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耀；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踌躇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喻，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1967年1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

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1957年10月28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取“曹老头儿”而代之！

上海国棉十七厂成了“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1969年6月20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

“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1968年9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1969年初，署名为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

的“丰功”：

> 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
>
> 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红色堡垒’。在这个‘红色堡垒’里，王洪文、唐文兰、孙一中、董秋芳、孙德永和徐玉起等六名共产党员，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大风大浪中，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群众称他们是‘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

这篇通讯，赞扬了王洪文作为“革命火车头”在“红色堡垒”里作出的一系列“贡献”。这是在上海报刊上，头一回如此详细报道王洪文：

“在（1966年）6月12日，联名贴出了《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的响亮口号，并用大量事实责问旧党委：你们为什么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搞阶级斗争？你们推行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不是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又是为什么？你们要把整个厂八千多个职工引向什么地方去？这张大字报冲破了一度‘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旧党委的心脏爆炸了开来。……”

接着，描述王洪文“走路有人盯梢，说话有人偷记”，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嫌疑。又描述了王洪文与“灭火队”（即“工作队”）的斗争，如何遭到“长时期围攻”，“被毒打吐血”，但是他“没有退缩，没有被压垮”。

“1966年8月，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串连了三十多人，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在厂里无法活动，就到家里和公园里去，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报刊社论，经常

到深夜二三点钟才稍稍休息一会儿，第二天照常上班工作。……”

“在这六个共产党员的带领和影响下，不少革命造反派战士在严峻的阶级大搏斗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团结了一大批群众，形成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革命造反派队伍，成立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这篇通讯还历数王洪文的“红色堡垒”的“战绩”：

“冲破重重阻挠，串连了两百多家工厂，得到了兄弟工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和支持，共同发起筹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在‘八·四’行动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第二线指挥部，担负着保卫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煤气厂、上海炼油厂等单位的重要使命。”

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号召下，“他们派出了六百十九名优秀工人，进驻高等院校和一些‘老大难’单位”。

没多久，在上海报刊上又冒出一篇歌颂“红色堡垒”的文章：《朝气蓬勃，勇敢战斗——上海国棉十七厂党的队伍一派新面貌》。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中共九大之后的新面貌。文章一开头便写道：“被称为‘红色堡垒’的上海国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异常激烈。……”

这么一来，“红色堡垒”的美誉，仿佛成了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定做”的光环。一提及上海国棉十七厂，就马上称一声“红色堡垒”。

这篇通讯用反衬法歌颂王洪文，把王洪文的形象“拔”得更高了。

通讯中写了上海国棉十七厂“不少党员原来对自己站错队很不理解”，“存在着三股气：怨气，泄气，不服气”。他们说：“造反派额角头（意即额头高，给碰上了。上海土语——引者注），阿拉触霉头（意即倒霉——引者注）。以后你们抓革命，我们促生产。”

可是，这些党员后来想通了，转变了，其中的关键是——

“很多党员把自己同王洪文、唐文兰等老造反党员对照，深深觉得惭愧：‘他们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他们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他们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我平时也讲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可是我们只热爱在嘴巴上，没有热爱在心坎里，只忠在嘴巴上，没有忠在行动上。’……”

找着了与王洪文之间的“差距”，这些党员的觉悟也就“提高”了！

“红色堡垒”的名声越来越大。“秀才”们也深入上海国棉十七厂，接二连三写出关于这个“红色堡垒”的整党建党的“经验”，见诸于《文汇报》、《解放日报》以至上了《红旗》杂志，上了《人民日报》。

中共九大闭幕后一周年——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整党建党座谈会。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主持座谈会，政治局常委康生、陈伯达作了讲话。在这次座谈会上，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整党三人小组，这三人是康生、张春桥和谢富治。

北京树立的整党建党“样板”是“六厂二校”。那是“毛主席亲自指导”的。

张春桥呢？拿出了上海的整党建党“样板”——上海国棉十七厂。

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向全国各级党组织转发了北京大学、北京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等单位整党建党经验。于是“红色堡垒”名噪全国。

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有些什么“重要经验”呢？

“秀才”们妙笔生花。那些“重要经验”，近乎玩弄辞藻：“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就要‘举旗抓纲’”；“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党就要管党”；“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就要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设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就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

此外，还有：“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教育党员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彻底改造世界观”；“根据党组织就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根本原则，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建立忠于毛主席的领导班子，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如此空洞的“经验”，并无“重要”可言。不过，郑重其事地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下达，大大提高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声望。不言而喻，也就大大提高了王洪文的声望。王洪文一直兼任着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兼任着厂党委委员。

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掌管着上海的日常工作。虽说他有野心，企望着进入中央，不过，上海已有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做“中央首长”，看样子已不大可能再把他调入中央。至多，或者到北京当个什么部的部长之类。

然而，王洪文却突然受到提升，如同坐火箭似的飞速上窜，成为“火箭式干部”。这，连王洪文自己，都感到惊讶、意外。

[1]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孙详海谈“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邵世民、顾其昌谈“全向东”。

[2]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孙详海谈“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邵世民、顾其昌谈“全向东”。

[3]1986年10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采访马骥。

[4]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孙详海谈“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叶永烈请邵世民、顾其昌谈“全向东”。

[5]上调，指许建国调离上海，到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

第十八章　与林彪又握手又踢脚

与组长陈伯达的争斗

江青的权力不断膨胀。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

她这个“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在陈伯达晚年，笔者多次访问了他。陈伯达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烈争斗，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

> “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
>
> 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
>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
>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
>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
>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能，

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待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
>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此时陶铸同志也在，我还要陶铸同志帮腔。后来听说有人批评我，听说有同志还帮我说话，说我就要到天津去重新学习。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
> 江青插进一脚，解学恭应该是会觉得到的，在北京解决天津问题的会议上，戚本禹来了，一晚，在会上发号施令，要大家把材料都送给他。这时我就离开会场，在会场外找人聊天，让戚本禹去发威风去。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

陈伯达说：

>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
> 江青提出：“你要迫死《人民日报》一个文艺编辑。”
>
>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主意，怎么会是我要迫死他？
>
>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
> 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
>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 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

样的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蹋。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

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

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座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

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不断与江青对吵。但是，陈伯达不能不容忍江青，这全然是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

《人民日报》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相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成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有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相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迫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以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相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陈伯达还回忆说：

在"文化革命"中，一回在碰头会上，江青突然问我是否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北方局整过她。

王、关、戚倒台后，江青自称她有功，她不是从此收敛些，而是更狂妄了。据一位同志给我说过，她自称她保护了“中央三个常委”。当然，这是很可笑的。

到了后来，陈伯达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形同虚设，江青成了实际上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所以，连陈伯达都称江青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首长”：

自此，除了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中央文革小组”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明，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但过了不久，不知怎样的，她跟她的女儿也搞翻了。

当江青造成上述局面，在她女儿还未离开的时候，曾公开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说陈伯达已不住钓鱼台，已不要她们母女，她们愿意回中南海给毛主席当秘书。

江青（忘记是在什么场合）讲，毛主席说过（大意）：“给陈伯达很多工作位子，他都没有拿住……”毛主席这话看得很透彻，中央文革小组的例子，是最后的一个证明。

此外，笔者也采访了陈伯达的两位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据他们回忆：

1967年2、3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严厉地批评过：“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

“四一二”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物理学上有一条这样的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

其实，物理学的定律不只适用于物理学。张春桥的高压政策、倒行逆施、特务统治、残酷迫害，骑在上海人民头上拉屎撒尿，那强大的反作用力早已形成。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以仅仅两小时的时差，被张春桥用“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用“工总司”压了下去。

15个月过去。1968年4月12日，上海爆发了更为猛烈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

《文汇报》突然成了脱缰之马。在“一月革命”中“新生”的《文汇报》，本来成了张春桥手中的舆论工具，这天却脱离“张春桥轨道”，成了炮打张春桥的“舆论大炮”。

这天的《文汇报》，打的是“拐弯炮”。今日的年轻人，倘若重读1968年4月12日的《文汇报》，会如坠云雾之中。那是在特殊年代用特殊方式进行的“炮打”。第三版，印着这样的通栏标题：“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忽然来了这么五个“誓死保卫”，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哦，“注释”就在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这年4月7日《北京日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不知内情者，把《北京日报》的社论读了一遍，仍不得要领。

当然，如果把《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印发的传单《十个为什么？》读一遍，那就会明白一些：

一、最近上海市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什么新华社不发报道？

二、《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什么一连三个月不转载、转发上海的社论？

三、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之后，上海3月28日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亲自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四、前几天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里（江苏省“革委会”于1968年3月23日成立，3月25日见报。——引者注），张春桥的名字为什么放在最后，又不加“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

五、北京“三二四”会议，为什么姚文元不让驻京办事处把消息捅到上海？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六、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即“红色造反纵队”的简称——引者注）为什么在沪特别吃香？他们公开反邱会作（邱会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为林彪死党。——引者注），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上海市革委会为什么没人去碰一下？

七、张春桥原在石家庄报社当社长，杨、余、傅都是晋察冀那个山头的。

八、张春桥在市革会扩大会上呼叫打倒杨、余、傅时，为什么紧张到把“傅崇碧”叫成了“邱会作”？

九、《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为什么张春桥提出要合并成一家？

十、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愿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

这份《十个为什么？》传单，当然要比4月12日《文汇报》说得明白得多。

不过，“三二四”是什么样的会议？“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又是怎么回事？跟张春桥又有什么关系？

事情的突然爆发，是在3月22日，林彪发布两项命令：一项命令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项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当天夜里，余立金被捕，杨成武、傅崇碧遭软禁。

当时，杨成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4日，林彪召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林彪作了长篇演讲历数“杨余傅”之“罪状”：“……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还说，“杨余傅”是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

反扑”。

对于“杨余傅”的“批判”，在三天之后——3月27日，又升级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涌入十万之众，倾听着“中央首长”对于“杨余傅事件”的说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登台，作了极为“精彩”的演讲。

陈伯达这位“哲学家”，着眼于事物的“彼此联系”，作了如下推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

你看，陈伯达一下子就把杨余傅、王关戚、刘邓陶串连在一起。

康生主管组织大权，此人最擅长于“揭老底”。他仿佛忘了王、关、戚一直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却翻出了陈账烂芝麻：

“钻进中央文革小组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1964年1月27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说：‘初次到您的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瞧，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您平易近人！有善于诱导的作风。’……”

康生的话，令人大惑不解。既然王力的事发生在1962年，关锋、戚本禹给彭真的信写于1964年，你康生怎么到了1968年才“揭老底”呢？

江青呢？她扮演了一个“受蒙蔽”的角色：

“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被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中造成中央文革小组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小组，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的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上海市民议论纷纷。经过将近两年的“文革”锻炼，人们也变得聪明起来：这样再次大动荡的时刻，岂不是揪出张春桥的良机！

于是，《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中提出的口号——“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马上在上海产生了反响。人们巧妙地把这句口号移用到张春桥身上：张春桥就是“杨、余、傅的黑后台”！

借助于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超手法，上海街头陡地冒出一批大字标语：“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

还有的标语真微妙，特地加了“上海”两字：“揪出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

真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都明白，这“上海的黑后台”指的是谁。

张春桥哭笑不得。派人去撕标语、覆盖标语吧，这不就等于自己承认了是“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由它去吧，这些大字标语把上海闹得满城风雨，他成了人们暗中议论的中心话题。

正因为这样，4月12日，《文汇报》突然转载了《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怒潮，磅礴于上海……

也就在这一天，张春桥的“老底”被人揭穿，在张春桥的脚下响起一声炸雷。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多少年来，一直用浓发遮盖着的张春桥头上的这块癞疤，被用大标语、大字报公诸于睽睽众目之前。

林彪救了张春桥

上海永福路344号。4月12日清早，“扫雷纵队”全体紧急集合。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

“誓死保卫春桥同志！”

在领着呼喊了口号之后，游雪涛沉默了半晌，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用低沉的声音发表“训话”：“同志们，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到了！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最敬爱的春桥同志。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了春桥同志，我们要豁出去了！”

稍停一会儿，他拿出了笔记本，轻声地说：

“刚才，我接到文静同志的电话，她要我向全体同志交底，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同志们。”

“文静同志说，春桥同志的历史完全清白，一点污点也没有。这样干净的历史，在老干部中是少见的。任何关于春桥同志的谣言，都是最恶毒的攻击和最无耻的捏造。”

“文静同志还指出，春桥同志说话，总是引用毛主席的原文，很少发挥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他对毛主席非常忠诚。春桥同志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他曾说过，他平生的夙愿，就是用全部精力写出一部《毛泽东传》，此外一无所求。”

“同志们，我们一直在为捍卫春桥同志而战。春桥同志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幸福。在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文静同志亲自给我们这个小组打来电话，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

“今天，各种各样隐藏的‘雷’，都抛头露面了，正是我们‘扫雷纵队’的扫雷最佳时机……”

游雪涛一声令下，“扫雷纵队”全体出动，在上海那滔滔人海中游弋。

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一切有关“炮打”的标语、大字报、动向，都纳入“扫雷纵队”扫雷范畴。

面对张春桥写下的“谢谢同志们”五个字，“扫雷英雄”们是当之无愧的。

早在1967年11月21日，“扫雷纵队”就已经向张春桥密报了《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那“三驾马车”（也有人称之为《文汇报》“造反三巨头”）的“反叛”动向。为此，张春桥要秘书何秀文在暗中调来了“三驾马车”的人事档案。张春桥已做好了整人的准备。

神通广大的“扫雷纵队”还获得重要情报：1967年1月，“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一兵团”曾包围了张春桥家，准备抄张春桥的家，被张春桥发觉，调来王洪文的小兄弟解围……是谁把张家的地址泄露出去？这个哑谜被“扫雷纵队”查明，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

“原来，郭仁杰这小子背有反骨，忘恩负义！”张春桥听了游雪涛的报告，把牙齿咬得嘣嘣响。

张春桥记得，过去看过郭仁杰的档案。那是1964年，是他亲自点将，把郭仁杰调入市委写作班的。调动前，他查看过郭仁杰档案。那时，他以“十”的目光看郭仁杰。如今，郭仁杰反了，他以“一”的目光看郭仁杰。于是，他再一次调看郭仁杰的档案。

郭仁杰的历史，倒是无可挑剔的：一个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很早就参加解放军，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1957年，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

在翻阅郭仁杰档案的附页时，张春桥看到了一份外调材料，笑得眯起了眼睛。原来，此人也好色！

张春桥给游雪涛下达了“特殊任务”：抓住郭仁杰在男女关系上的小辫子！

张春桥深知，这类桃色新闻，在“文革”中只消用大字报一公布，很容易就可以把一个人搞臭的。

果真，“克格勃”游雪涛弄来了极为详细、具体的情报。

就在郭仁杰忙着与复旦大学“红革会”的那些红卫兵们频繁来往，筹划着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突然，受游雪涛暗中指使的华东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在一天深夜把他抓了去。

郭仁杰被关进了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在二楼的囚室里，红卫兵们逼问着他，要他交代“男女关系”问题。

秀才最爱面子。尤其是像“男女关系”之类隐私，一旦公诸于众，已经跻身于“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之列的郭仁杰，脸往哪儿搁呢？

据当时的档案记载：“郭仁杰要看守的红卫兵给他倒一杯开水，把红卫兵诓出室外，立即把门碰上，从窗口跳下……”

地上顿时溅满一摊鲜血。

从此，张春桥少了一个政敌。

“杀一儆百。”消息传出，那些已经扯起造反旗号的原市委写作班的秀才们人人自危，深知张春桥不是好惹的。

郭仁杰之死，在反张之心早已坚定的人们那里，产生的不是畏惧，却是更深刻的仇恨。“四一二”一把火点起了堆满上海的干柴。

《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真个是星火燎原，那《十个为什么》传单已经一再加印，仍是上海的“抢手货”。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揭老底”战斗队，刊印了鲁迅批“狄克”的《三月的租界》和“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刊印了李淑芳——当年的文静怎样成为“东方的摩登女士”……上海人民也学会以张春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揭起张春桥那“老底”来了。这些“揭老底”传单，一时风靡上海。

不可一世的张春桥，仿佛成了泥足巨人，风一吹，就要倒了。

一连串的新消息，通过“244”，传入张春桥耳中：《文汇报》印的《十个为什么？》已发向全国各地；华东六省的省报都向《文汇报》看齐，要在4月13日头版头条转载《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而且《解放日报》居然也要同步行动。

这一回“炮打”来势，比15个月前要凶猛得多。眼看着，张春桥会成为“王、关、戚”第四了，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端出来”的第四个恶棍。

张春桥毕竟还是张春桥。他紧急召见王洪文。“工总司”上街了。王洪文率队冲进《文汇报》社了……15个月前，张春桥打退“一·二八”的“红革会”，靠的是“工总司”，这一回又甩出这张在安亭结下“火线友谊”的王牌。

张春桥又一次拨通了北京钓鱼台的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是不是再给上海发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江青问道，“你现在就把电报内容告诉我，我马上发到上海！”

江青倒也痛快，她请张春桥自己拟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

“不，这一回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恐怕还不行。”张春桥说道。

“‘中央文革小组’的牌子还不响吗？”江青一听，怔住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张春桥连忙解释道，“因为这一回的主要的

炮打口号，说我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杨、余、傅都是军人。只有以林彪副主席或者中央军委的名义，给上海发紧急电报，才能最有效地制止这一次的炮打……”

“好吧，我马上转告林副主席。”江青明白了张春桥的用意，挂上了电话。

张春桥与林彪之间，本来连话都说不上。“文革”前，林彪身为元帅，来来去去上海，从不把柯庆施的那个“政治秘书”张春桥放在眼里。自从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林彪才注意起张春桥其人。不过，这时的林彪居高位，住深院，张春桥难以接近他。虽然张春桥借助于江青，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赖，但是他为了能在中央牢牢扎根，不能不企望着巴结林彪——因为林彪已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号人物了。

1967年11月，毛泽东的一句话，无意之中为张春桥搭起了与林彪高攀的梯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了，他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应当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明白的聪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后，便放出风声：“上海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

于是，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所有中共党章上未曾有过的词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马上“回赠”张春桥一个军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从那以后，张春桥跟“林副统帅”之间，架起了热线：张春桥借口汇报南京军区工作情况，常常给林彪挂电话，向他请示这，请示那。林彪呢？也拖着腔，拿着调，跟这位秀才说上几句“热络”话。

在“四一二”这风雨飘摇之际，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发出了“SOS”讯号。

果真，林彪伸出了救援之手。

那个在“杨余傅事件”中红得发烫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4月12日下午飞抵上海。

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当年“狄克”曾在那里度过不平常的

岁月，如今上海党、政、军、文各界头目急急赶往那里的“市革会礼堂”。

中央军委吴法宪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公文。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气敛息。对于吴法宪从天而降，许多人曾作了美妙的推测：一定是来宣布当场逮捕“杨余傅”黑后台张春桥的命令！

[image]

■ 1968年10月1日，张春桥（前右）与林彪死党黄永胜（前左）交谈。（孟昭瑞 摄）

吴法宪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四点指示：第一，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第二，张春桥同志仍然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第三，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第四，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完了！完了！这四个“仍然是”，顿时把一场如火如荼的“炮打”，降到摄氏零度！

印刷机在飞速运转。印着四个“仍然是”的传单，撒向四面八方。

“一·二八”炮打，被“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所吹灭；这一回，“四一二”炮打，又被来自林彪的“四点指示”所压服。

张春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哦，“仍然是”长在脖子上！

张春桥笑了，哦，“仍然是”胜利者的微笑！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权力不断膨胀，取组长陈伯达而代之；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本身的权力也在不断膨胀之中。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小组”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销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1967年1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当即取而代之。

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小组”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1967年1月11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

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小组”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倒台，1968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小组”扩大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12人。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196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小组！”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其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9、12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27日）。

从1967年1月起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的机要秘书叫阎长贵。阎长贵大学毕业，能写文章，江青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江青调来一位新的机要秘书，名

叫杨银禄。

1998年，杨银禄在第五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我给江青当秘书》一文，回忆了初见江青时，亦即1967年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给他的印象：“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一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五十四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姿势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江、张、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道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最初，从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排名第25位。那篇报道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25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一年多以后——1967年10月2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道中，江青升至第17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到了1968年5月2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道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道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报道是这么写的：“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

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报道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对于江青来说，1969年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虽然那“按姓氏笔画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1969年4月14日、24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30年前——1938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30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30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

计。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小组”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

“中央文革小组”，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小组”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江青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翼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

中共八大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五位副主席。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

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

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1]

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的排名顺序是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这么一来，叶群排在江青之前。

江青看了这排名顺序，极为不满。江青对秘书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

江青果真“跟林副主席去谈谈”，林彪马上指示，今后在所有的文件中，江青的排名应在叶群之前。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image]

■ 1966年10月1日，江青与林彪相见甚欢。（孟昭瑞 摄）

林彪跟江青之间的联系变得频繁。不过，林彪几乎很少直接给江青打电话，江青与林彪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林彪办公室主任、林彪夫人叶群。叶群是江青那里的座上宾。她们之间也常用电话联系。

林彪对江青非常“关心”。林彪知道江青怕风，就让叶群带上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房子的设计师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2]，拟订了建造从车库直达楼房的通道方案。然后派出部队，只用了五天，就建造好这一通道。江青表示对林彪深为感谢。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林彪在1967年1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9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968年3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

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最初，“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样的情况：“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1968年10月27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

张耀祠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么写及江青提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的？
>
> 我问汪东兴同志，我说：“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议的？”
>
> 汪东兴说：“是江青提的。”
>
>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
>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
>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
>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极力吹捧林彪，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又说，"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

之后，起草报告的人对毛主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假话。他们对主席讲："大部分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在吹捧林彪时，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搞无记名投票时，康生少了几票，他当天晚上就追查汪东兴，汪东兴说："谁没有投票，我怎么知道？"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

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

因为江青的好多事情不得不倚重于林彪。但林彪虽然在许多场合也在吹江青，可他眼睛盯着的还是主席这里。于是二人总是在"换手搔背"，相互利用着。

多少年来，林彪既用语录、口号和"天才"吹捧毛主席，又跟叶群一起在各种不同的会上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以许多桂冠。这对于想当副主席的江青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加之主席又在会上讲她不能当副主席，她非常需要林彪和叶群这样为自己"提高威望"。可作为林彪来说，他并不认为江青有多了不起，只是看到主席这里的分量太重了。

说实在的，江青并不希望林彪当副主席。但是林彪还是当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在很多场合支持林彪了。所以，她的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

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江青与林彪尽管在相互支持，都不公开他们各自心中的账。

江青好事可以做，但坏事做起来特别心狠手辣，林彪对此是很害怕的。[3]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陈伯达倒向了林彪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小组”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1966年7月9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7月9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道，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中央文革小组”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1982年9月26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姚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

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image]

■ 1968年10月1日，陈伯达（左一）与林彪（右一）亲密交谈。（孟昭瑞 摄）

陈伯达板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

“中央文革小组”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1959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1970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175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4]。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175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1920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664平方米。1924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大搞突然袭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175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

据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

> 江青一上庐山就给了我一个惊愕：作为毛主席的夫人却不与毛主席住在一起，毛主席住芦林别墅，江青偏要住到1959年毛主席住的“一八〇”去，两地相隔近十来里。

其实，芦林别墅有她的住处，而且靠山临水，清静优雅，远胜“一八〇”。在建造这座别墅时，考虑到毛主席的工作特点，曾向中央有关部门征求过意见，并参考了兄弟省市的同类建筑，一切都有两套。西边是毛主席的卧室、办公室、会议室、文娱室；东边也同样有卧室、办公室、会议室等等，只是西边的房子略大些，东边的房子略小些。她一切都要和主席一模一样，房子小一点都不满意，所以就独住“一八〇”了。当时有关设施，都分两组，毛主席用的称甲组，江青用的叫乙组，一提到甲乙组江青就有气，说：“我是主席夫人，什么都应该跟主席一样的，为什么要分甲乙组呢？”主席喜欢坐列车巡视各地，所以他的专列其实是个流动办公室。主席路经南昌，要尚奎坐他的专列到浙江开会，我们就住在那个乙组，卫士长说，乙组虽是为了江青而做的，但江青从未住过一次。

江青总想和主席“平起平坐”，这不仅给主席造成不少麻烦，也给她自己招来很多不快，有位夫人告诉我，因为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所以卫士是二十四小时值班，而江青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晚上自然不会“加班加点”，可她也提出，白天晚上也要有人到她室外坐班。毛主席知道后非常恼火，指示有关部门，决不能迁就这种无理要求。江青为此闹得很凶，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自然很不满了……

主席夫人当然和主席关系密切，不同一般，但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江青却硬要使之等同起来，无其功而受其禄，这就使自己老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经常性的“越位”，一方面积累了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而在江青来说，却渐渐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视之为“必须”。正是循着这条邪路，江青写完了她的人生悲剧。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

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伦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5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功勋：

“这个《通知》（指《五一六通知》——引者注）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

两度“庐山会议”，都风雷激荡，震撼着中国：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场“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纲》，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圈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词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圈去这三个副词；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三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1970年3月8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

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1970年2月8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1970年4月11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11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1959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1969年11月12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11年，已经77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旋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

标——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8月24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道：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

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image]

■ 林彪和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右二）、吴法宪（左二）、李作鹏（左一）、邱会作（右一）在一起。（杜修贤 摄）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朱永嘉后来曾经这样谈及庐山会议对于张春桥的教训[5]：

> 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
> 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指张春桥——引者注）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其实，在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便已经对这一形势了然于胸。据姚文元日记记载，在八月十五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同志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姚文元从五个玉米之中，觉什么味呢？

姚文元在日记中没有说。

江青当时把玉米送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据康生秘书黄宗汉后来对江青秘书杨银禄说：

> 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

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6]

那五个玉米的含义是否如同康生所言，不得而知。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原以为华东组大抵会太平无事，谁知冒出了另一个“王”，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林彪。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在上海，此人既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无瓜葛，也与徐景贤手下的“秀才帮”从无来往，更与马天水那样的“老干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见不到此人踪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过陈丕显、曹荻秋。他是军人。他能够成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因很简单——他宣誓忠于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他只比张春桥小两岁，河北省元氏县人，有过不短的革命经历——1938年3月入伍，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向来在军内任职，与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他担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人称“王政委”。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左”，驻防上海的空四军派出“军宣队”随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队”一起“进驻”上层建筑时，王维国才与地方有些来往。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是接见王维国，于是宴请王维国，于是合影，于是送礼……一个想巴结，一个想利用，一拍即合，挂上了钩，拉上了线。

林彪跷起大拇指：“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一下子使王维国乐得合不拢嘴巴。

林彪的那只“老虎”——林立果，也给他来了三顶高帽子：“王维国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

自从1969年10月17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变成了王维国的上司。林立果的一句话，便使王维国俯首帖耳：“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

王维国也够机灵的，马上给林立果送上三顶高帽子：“林副部长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王维国也给林彪写信，表露一颗忠诚之心：“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

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王维国的年纪比林立果大三十多岁。然而，当王维国、江腾蛟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陪年方二十的林立果游长城时，竟一左一右搀扶着林立果！

王维国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奴性。他张口便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脸不发红心不跳。诸如，坐了林立果开的车，那是坐“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1969年6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一个稀奇古怪的“找人小组”在王维国领导下成立了。“找”什么“人”？为林立果“找”女“人”！

这个“找人小组”共八名成员，又称“八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在上海，又得名“上海小组”。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1970年5月，这个“上海小组”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除了王维国之外，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7350部队政委、浙江的陈励耘，也在华东组向张春桥放炮。

华东组是张春桥的天下。王维国和陈励耘打起林家大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之中。

毛泽东无法容忍林彪的放肆攻击。8月25日，毛泽东撩开庐山云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作检查。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陈伯达狠狠的一击。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下山那天，林立果垂头丧气地对王维国、陈励耘说道：“这次把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陈伯达遭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在庐山，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批驳了天才论。毛泽东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小组”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终于打倒了陈伯达，江青非常得意。就在这时候，江青到海南岛去“度假”了。据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7]：

>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
>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
>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
>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
> 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
>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做梦在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所以我说她是特殊人物。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197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

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日、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引者注）。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陈伯达的倒台，使江青十分得意。就在这个时候，在湖南衡东县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出现了一张“炮打”江青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颇有资历——乃陈云夫人于若木也。她见到江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便对江青开了一“炮”：

于若木先写了一份交给党组织的揭发材料《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接着，她又于7月3日贴出一张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以她1962年在上海所见江青腐朽的生活作风，来揭露江青的丑恶本质。

196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于若木随陈云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所房子。刚一进门，就感到异常豪华，尤其是清一色的绿颜色，别具一格：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桌子也是用绿绒布包了的，连厕所里马桶的盖子和坐圈也用绿丝绒包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是三米多高的落地窗，每扇窗都是两层窗帘，且系用高级质料做成，仅窗帘布就不下几十匹。陈云同志说："这房子过去我住过，怎么现在全变了？"

一问，才知道专为江青整修的。现在江青不住这里了，才让陈云夫人来住。在上海，像这样布置的江青住所还有三处，陈设更是豪华奢靡……[8]

于若木的大字报，表明了广大老干部对于江青的强烈不满的情绪。不过，此时江青正红得发紫，没有理会于若木的"炮轰"。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为这样，1970年9月6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1971年3月18日至24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订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1971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8月1日出版》。消息说：

>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

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峻岭”何人？江青也！

[image]

■ 江青拍摄的林彪学《毛选》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1971年6月9日亲自为林彪拍摄的。

当时身在现场的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说：

> 1971年6月初，江青叫谢富治给她在钓鱼台17号楼精心布置了一个照相室。
>
> 6月9日，江青特邀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当时，我们看林彪并没有照相的思想准备，连胡子都没有刮。江青为了给林彪照好，使他满意，就把他带到10号楼刮胡子。
>
> 林彪说：“年龄大了，有胡子没有关系，我不想刮。”叶群忙劝说：“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不刮了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
>
> 江青也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有领袖气派。”
>
> 两个女人都在劝说，林彪也就勉强同意刮了。
>
> 林彪刮胡子和通常人刮胡子不一样，既不用热水湿一湿，也不用热毛巾敷一敷，更不用香皂、肥皂和剃须膏，而是干刮（林彪刮胡子用的是我的刮脸刀，我现在还保存着。“飞鹰牌”双面刀架）。林彪刮完胡子，在江青、叶群的陪同下，又回到17号楼的照相室。
>
> 江青一会摆弄照相机，一会搬弄着灯具，还对林彪吹捧说：“广大党员和广大群众都知道林副主席跟毛主席跟得最紧，对毛主席的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最高。”
>
> 林彪端坐着，江青调整好了焦距和灯光，马上就要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了。
>
> “请林副主席把帽子摘掉，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相。”江青说。
>
>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看样子他很不想摘掉帽子，但是，在那种场合又不好说什么，于是，不好意思地把帽子摘掉了，扔给他的工作人员。
>
>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按动快门的时候，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真的是在看书，因为你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孜孜不倦的。”

叶群称赞说："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

江青叫我跑回10号楼把《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去，交给林彪（那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也是我自己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67年7月济南第一次印刷，书号1001.750，定价每册5.5元。这本书现在我也完好地保存着）。

林彪被几个大灯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擦了擦，摆弄好姿势以后，终于按动了快门。

《样板戏出台内幕》一书则这样记载：

摄影在唯精神至上的年代里，是个非常让人眼热的"爱好"。林彪夫妇尽管出头露面的机会很多，闪光灯亮个不停，但那都是大众场合，完全是新闻照片。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没有这等高档的消费，中央领导人里面，有消闲时间照相的人也寥寥无几。

1971年春（应为初夏——引者注），江青要在十七号楼（指钓鱼台——引者注）小会议室里为林彪照相，这又是她的一处兴趣活动中心。她的那间颇有照相规模的会议室，平时可以休息，也可以会客，高兴起来还能照几张人物像。会议室里不仅装了固定摄影灯，还配有移动的灯具，照人物像时，光从几个方面射来，照片出来有立体感，有层次。江青照相比较讲究运用光线，喜欢用逆光、侧光。她的所有的灯具都是从新影厂搞来的，江青这个人确实有点创造"才能"，她异想天开搞成的摄影室，竟然效果不错，比中南海里毛泽东的书房还强。为毛泽东摄影，用的都是记者手里的摄影灯，直到1974年春天，通过江青推荐，才在毛泽东会见外宾的书房里安装了固定摄影灯。

江青叫卫士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她要为林彪照艺术照。

叶群接到电话后，也不管林彪愿意不愿意，就满口答应了。

林彪和叶群第二天来到江青的水银灯下，江青先照了几张林彪侧面照，觉得空洞洞的，没有含意，太单调。江青站在林彪对面想了一会，觉得拍林彪就要有林彪的特色，不能指望像年轻人的脸庞那样显示出男人的英俊。

她对着镜头愣了愣，突然找到了感觉。她叫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同时摘掉他几乎永远不离头的绿军帽，让人深刻体会林彪的好学，即使工作繁忙，仍在孜孜不倦学习毛泽东著作。

林彪这时闷声不响，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叶群在一边，使劲说这样好，林彪也不好说不好，更不能拉下脸子。

到了七八月，《解放军画报》的扉页上出现了一张令人惊奇的照片，不是惊奇林彪学毛选，而是他半秃的油光大脑门和作者峻岭的名字。江青也由此被人们发现原来还会摄影，这大概是第一次引起人们如此注意的照片。以后人们一见峻岭，就知道是江青的作品。[9]

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字，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叛离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林彪集团要作最后的拼搏。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1971年3月21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十天之后——1971年3月31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7341部队政委王维国、7350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

——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12人。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1971年9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毛泽东是在1971年8月14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8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9月3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9月7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箭在弦，弹上膛，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9月8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

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二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9月8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到绍兴！”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那是9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9月10日下午6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8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1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9月12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终于，1971年9月13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噩梦连连

就在“九一三”事件前夕，1971年9月8日，林彪还让叶群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就在9月12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然而，翌日林彪就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1969年到1971年9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470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林彪事件之后，江青的话少了，精神恍惚，睡眠不好，噩梦连连。

江青曾经对秘书杨银禄说起自己的噩梦[10]：

> 她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眯缝着眼睛，靠坐在沙发上，指着她旁边的一个沙发，说：“请坐。我昨天想对你说的话没有说完你就走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做噩梦，有一天晚上梦见死有余辜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了，他那被烧焦的尸体，在大漠中站立起来了，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两只眼睛闪着蓝光，他一边走，一边操着浓浓的湖北口音说：‘我们都变成了烧死鬼，你怎么还没有死呀？’他说着说着，叶群从一个沙丘里也钻了出来，她赤身露体，披头散发，青面獠牙，大声喊叫：‘姓江的，你今天可跑不了啦，跟我们一起走吧！’她伸出两只大黑手，指甲老长老长的。我真有点害怕了，于是，就跑啊跑啊。可是，怎么拼命也跑不动，喊也喊不出声音来，可把我给急死了。我被噩梦惊醒，发现出了一身大汗，被子都湿了……”
>
> 江青说完，两手紧捂着胸部，哭丧着脸，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希望这样的梦可不要再做了。”
>
>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不希望做噩梦，可是，与我的希望恰恰相反，非做噩梦不可。有一天晚上做梦，说是解放军出了大问题，有一位军队的干部指挥几个战士来绑架我，有端着冲锋枪的、步枪的，有举着手枪的，一齐向我冲过来。我对他们说，我是忠于

毛主席的，你们不能抓我，战士同志们，指挥你们的这个干部他背叛了革命，你们受骗了，不能听他的，你们应该反戈一击呀！真奇怪，这些战士不听我的，还是听他的。他们说抓的就是你。我想，坏了，这是原来忠于林彪的部队。我用尽全力喊叫：警卫部队快阻止他们的犯罪行为。我突然看见你们几位站在一旁，可是，任凭我怎么喊，谁也不理睬我，也不说话，像一尊尊泥塑，我真的感到孤立无援的可怕。我拼老命也得跑，不能束手就擒，刚要跑，就听到嘭嘭两声枪响，我就倒下去了。我还在想，这一次兵变，我真的死啦，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生命。我醒来以后，一摸心脏还在跳动，我没有死，我还活着，刚才是在做噩梦，虚惊一场！”

江青连做这么多噩梦，恐怕是她从林彪、叶群之死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担心自己也有朝一日重蹈林彪、叶群的覆辙，才会这样坐立不安。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人们百思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中共中央在1971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

> 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这几年，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

——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1966年7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另外，在毛泽东于7月8日写好信后，并没有通过机要发给江青，而是先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然后才由周恩来带信到上海给江青看。毛泽东这样做，表明这并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而是一份党内文件。正因为这样，在林彪事件之后，此信会作为中央文件印发。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据传，在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时，江青曾经要求毛泽东把信的开头称谓“江青”改成“江青同志”。但是毛泽东没有同意。后来采取折中的办法，即在印发此信时在标题上加了“同志”两字，即变成《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信》。

江青得意起来，便筹划着举行自己的摄影作品展览会。然而，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反对，使江青的影展梦化为泡影。

江青从1962年开始学摄影到1972年，正好十年。这时她萌动了办个人影展的想法，她把想法告诉了石少华。江青要办影展！谁能说不行，老师当然只能赞同。

石少华像接力赛那样把江青办影展的事情交给了摄影部主任杜修贤筹办。展出地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大家对江青影展的事情还是很认真的，精放了一百多张照片，又做了精致的镜框，连夜运到大会堂的展厅。新闻机构也做好了报道的准备。

就在影展筹备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却是江青影展美梦化为乌有之际！

人民大会堂从建成到现在，几乎没有办过什么展览，除1963年办过一次“周恩来访问十四国”的影展外，一直为中央召开会议的场所。这次江青把影展的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也是有一番用意的，既不混同艺术馆的纯艺术展品，又不失艺术作品的风雅；既有艺术馆的档次，又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地位。行家分析，江青的个人摄影展一定会有轰动效应的。一是江青的作品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再加上江青的政治身份，如果开幕，展况必盛！

大家翘首以待，等候江青一声“开幕”令下，影展的“盛况”马上会席卷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

这对江青来说是多么激动而辉煌的时刻！比发表一百次讲话还要奏效！就在江青为影展而自鸣得意时，无风不起浪！——毛泽东出乎意料出来讲话了，这次他不是支持江青，而是阻止。以前请摄影老师是为了江青的身体和精神，而现在江青不再为身体烦恼，所谓的影展也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名气。

晚年毛泽东仍然心明如镜，洞察秋毫。

毛泽东对江青越来越强烈的表现欲十分恼火，他把江青找去，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注意政治影响！

负责筹办影展的工作人员最后等到的不是“开幕”而是“撤销”的通知。

大家空忙了一场，只好将江青的摄影作品搬回钓鱼台——江青的住所，像货物一样堆放在一间空房里。转眼间，一场大出风头的辉煌突变为落满尘埃的寂静，如此巨大的落差，让江青心灰意冷了好一阵子。[11]

姚文元取代陈伯达成为“舆论总管”

陈伯达垮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从此，姚文元手中的笔，非同凡响，具备了“多功能”：

他的笔，成了指挥棒。他用笔指挥着全国所有的报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各省、市报刊，总编们的眼睛无时无刻都要盯着姚文元手中的指挥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违怠，不能奏出一个越轨的音符。

他的笔，成了权杖。大大小小“写作组”，从丁学雷、罗思鼎、石一歌到后来的梁效、池恒、初澜、唐晓文……全都归顺于姚文元麾下。他是这支无耻文人大军的统帅。人们冷笑着，讽之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梁效听命于姚文元。

他的笔，还成了魔杖。他的笔伸到哪里，可以使哪里燃起一场“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里的反抗的火焰立时烧灭。他的笔能使“造反英雄”青云直上，他的笔也能使“走资派”人头落地。

舆论一律，一律舆论。说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马。在姚文元主宰中国笔政的年月里，报刊变得清一色，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话，说得空空洞洞；调，唱得难以入耳。江青的“文艺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是：“八亿人口看八个‘样板戏’。”姚文元成为舆论总管的“辉煌”成就是：“读者‘看报看题，看书看皮’！”

沉闷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大地。万马齐喑，思想被锁上镣铐，言论处处受到审查。在19世纪，当欧洲盛行舆论专制之时，一个名叫沙飞的作家曾辛辣地讽刺道：“只有做梦时无审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如果把这句妙语移来形容姚文元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真是像“定做衣服”一般贴切。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曾这样揭发“舆论总管”姚文元对广播事业局的控制：

> 姚文元对广播局进行控制，主要是利用他在中央窃取的权力和地位，打着中央的旗号，发号施令。最基本的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大量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给我以影响。而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分不清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斗争的是非界限，更识不破他们玩弄的阴谋诡计，加上又有怕挨整、官迷心窍的私心杂念，这是我接受姚文元控制的错误思想基础。

姚文元对广播事业局的事情管得很宽，宣传、外事、新闻、业务、政治思想、保卫工作他都过问。我错误地把他看成是代表中央来分管广播局工作的，凡是重大事情向中央的请示报告，都经他转报中央。他的黑指示，我也错误地把它看成是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我们给中央的许多重要报告，在他批了意见以后，才送政治局传阅，有的还送毛主席圈阅后才退给我们，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迷惑（此句不通，原文如此。——引者注）。

姚文元控制广播局的具体渠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面谈话，下达黑指示。

我来广播局两年，两年多，当面同姚文元直接谈话的次数不是很多，核心小组其他成员同姚文元谈话的更少。

谈话的场合比较多的是陪见外宾之后，我和张振友、王寿仁（核心小组成员，副局长）等都是这样。如我刚到广播局，姚文元就利用我参加陪见外宾的机会第一次单独和我谈过一次话。不久，又同我和张振友一起谈了一次。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时间也比较长，对控制广播全局起了很大作用。其他也还有几次，主要谈话内容是要我们召开一次全国电视工作会议。他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反对经验主义，至于如何联系广播局实际，你们先出一个题目，过几个月再回答。他还批评我们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的宣传有模糊阶级界限的倾向，提出中央几个新闻单位的外事活动可以成立一个协作小组，搞一个统一计划报批等等。但他并不是每次陪外宾后都找我们谈话，每次谈话也不都是单独同广播局的同志谈，更多的是同时和参加陪见的几个新闻单位的同志一起谈，我也不是每次谈话都参加。姚文元每次同我的谈话我都在核心小组传达或讨论，有的还向全局作了传达。姚文元还规定，他同外宾的谈话记录，整理以后，清样都要先送他亲自审阅修改后才准打印，这也是一种控制。

[image]

■ 姚文元（前左二）接见外宾

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场合，姚文元也直接同我谈过几次话。一次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总理的灵堂里，姚文元向我下达不准第三遍播放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不准电视记者拍摄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机关里不准搞计划以外的大型悼念总理的活动等黑令。还有一次是在1976年4月7日把鲁瑛、解力夫（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同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列席政治局会议，听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参加《人民日报》炮制的那篇有关天安门政治事件黑文件的定稿，在此过程中，姚文元同我们谈了一些话。还有一次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办公厅通知鲁瑛、解力夫和我到怀仁堂去值班，姚文元在那里也同我们谈了一点话。以上几次的谈话主要内容我已根据回忆写了交待材料。

……

我同姚文元私人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和交谈。

二、通过新华社对宣传报道的方针和口径严密进行控制。

新华社记者遍布国内外，每天编发大量新闻报道，担负着向国内外宣传和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处于宣传第一线。电台广播的新闻节目，稿源主要来自新华社。姚文元控制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渠道是向新华社下达黑指示并审阅新华社的稿件。姚文元对新华社的黑指示传到广播局以后，同样起了严密控制广播、电视宣传的作用。姚文元直接给广播局的黑指示并不多。

为了加强宣传业务上的联系，了解中央宣传意图和精神，广播局总编室一直派人每天晚上参加新华社总编室的汇报会。批林批孔开始后，一度中断。我来广播局后，感到广播局了解情况太少，宣传上不好掌握，经征得朱穆之同志同意，并报告姚文元批准，又恢复了这种联系。总编室每天去参加新华社汇报会的同志，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新华社的宣传意图，主要是姚文元对新华社的黑指示的精神，写成书面记录材料供核心组、总编室和各宣传口的领导同志传阅。我对姚文元在宣传上向新华社下达的那些黑指示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了解中央宣传方针的主要来源。有些还作了批示，要总编室讨论研究，贯彻执行。两年多来，广播、电视的宣传完全纳入了“四人帮”另搞一套的轨道，如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不断升级；突出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不准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都是从这条渠道来的。总编室存有参加新华社汇报会的记录档案材料。组织上可查阅。“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曾整理了一下，摘记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已上交专案组。

我来广播局后，还曾想同《人民日报》也建立这样的业务联系渠道，同样是为了想从那里更多地了解姚文元黑指示的精神。经过几次交涉，鲁瑛不同意，没有搞成。现在看，倒是一件好事。否则，我的错误会更大。……

姚文元还规定，中央电台转播《红旗》的文章，每期都要交报目录，经他审批决定。

三、直接电话联系。

姚文元（或经他的秘书郭文）通过电话向广播局发号施令，有直接打给我的，有打给总编室和局办公室的。打给总编室和局办公室的，当时都有电话记录。打给我的，凡是重要的，我也有简要记录。遇有重要事情，我和总编室也直接用电话向姚文元请示报告。张振东、王守仁是否同姚文元直接打过电话，我记不清楚。

我来广播局后，到1976年9月，直接同姚文元的电话联系不多。经回忆，还能想起来的大致有以下几次：

1. 1975年评论《水浒》开始时，姚文元给我来电话，说主席最近对《水浒》有个重要评论，新华社和广播局没有宣传任务，所以没有告诉你们。但还是送给你们看一下好。过了几天，朱穆之同志就把姚文元送给我们看的主席的批示和姚文元关于评论《水浒》问题给主席的一封信在看过以后就转给了我。我看后退给了姚文元。

2. ……

3. 1975年9月15日，为纪念毛主席为广播题词十周年和广播局成立三十周年，我们准备开一个文艺晚会，除请中直单位、新闻单位和与广播局工作有关的一些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外，还准备请江

青、姚文元和登奎同志、东兴同志参加。在事前报批的计划上，姚文元在他的名字下批了“到时再看”。9月13日，我打电话给姚文元，问他是否能来？他考虑了一下，要我们把晚会日期推迟几天。我照他说的，改到9月18日。当天上午又联系，姚文元说可以来参加，登奎同志也说可以参加，东兴同志说不来了，江青找不到（后来才知道到大寨去了）。可到了晚上，姚文元又来电话说，政治局要开会，不能来了。我们瞎忙乎了一顿。

4.　1975年10月。我在上报的准备召开全国电视工作会议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有“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姚文元看了之后，第一次并没改，第二次改掉了，退给我重新打印上报。我当时不了解背景，没有引起重视，在同时批发的另外一个有关农村有线广播工作的通报中，仍然有“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总编室根据这个文件编发了一期工作简报，也是我批发的。姚文元看到后大发雷霆，要郭文打电话找我。当时正是晚上，我有外事活动，在饭店陪外宾吃饭。郭文把电话通到饭店，说你们报告上“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文元同志已经给你们改过了，那是认真考虑过的，怎么在广播工作简报上又出现了？这时姚文元接过话筒对我说：“我那样改，你们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不想一想？广播工作简报要立即全部收回。”他把我批了顿，第二天我向核心小组说了此事，仍然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将简报收回，我并向姚文元写了一个检讨，才算了事。

……

8. 毛主席逝世后准备追悼大会期间，技术处干扰科忽然收到一个可疑的新的干扰频率讯号。当时我们估计可能是苏修为干扰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搞的。我当即先在电话里向姚文元作了报告，接着又写了书面报告。姚文元要我们继续注意。并说已报告了华国锋同志。

9. 毛主席追悼大会结束后，第二天姚文元来电话问广播和电视的实况转播情况。我说转播情况良好，未发现干扰。电视实况的转播录像已在审看，不大理想，主要是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的镜头偏向东侧，我们准备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如问题不大，打算重播。电视片正在洗印编辑。姚文元表示同意。

据我再三回忆，在这次电话联系之后，姚文元就没有再来过电话，我也没有向姚文元再打过电话。

……

姚文元通过各条渠道控制广播局，首先是控制我。为了达到控制我的目的，他甚至采取极其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手腕。有关情况，我过去已有过详细揭发，这里就不重复了。

邓岗

1978年5月25日

说明：有些事实的时间已记不具体，确切，因手头材料都已上交，请组织上查对。

姚文元“左”眼看画

做了“京官”，回上海就像走“娘家”似的。不过，他在上海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拿着小本本，不断记下他的“指示”。

他呢？也拿腔作势，对这发“指示”，对那也发“指示”。

我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1970年春节前——1月20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一店时的“指示”。那是张、姚当年趾高气扬的真实记录，现照录于下：

> （在玻璃、搪瓷部）
>
> 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
> （在布匹部）
>
> 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铁梅、小常宝分别为“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引者注）穿了，像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
>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
> （在毛巾、手帕部）
>
>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
>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进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
>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像林风眠的黑画！

[image]

■ 姚文元（前排左一）、张春桥（前排右一）在一起。

两位“大批判专家”，居然在百货商店里批这批那，简直是乱批一气，近乎胡闹！

其实，他们并非信口雌黄。两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1973年11月26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不由得勃然大怒。

张春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

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一个多月后——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学着张春桥的腔调，对外贸部作为出口画广告的《中国画》册，进行“批判”：“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

《中国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这幅《迎春》画，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

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于是，一个“黑画展览”在北京举行，一个“批黑画”浪潮推行全国。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编”之中。

这位“左家庄”的“大将”，即便就《诗刊》复刊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也不忘对1957年曾经“大批判”的流沙河的“大毒草”《草木篇》，“捎”上一笔：

主席：

> 送上要求《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请阅。我赞成《诗刊》重新出版，并有个想法：新出的诗刊可否兼登一些歌曲、歌词、民歌，以促进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主席曾经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且还说过，“新诗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大意）现在诗歌集子出得不少，但内容深刻、能唱、能被人们记住和背诵的好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
> 鲁迅对新诗的意见，我觉得是正确的。他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
> 白话诗要这样做，当然很不容易。要在百花齐放中，逐步总结经验。但就进一步发挥诗的战斗作用、真正能更好为广大工农兵所利用来说，就向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目标前进来说，是应当这样去努力的。
>
> 《诗刊》刊登歌曲、歌词，包括某些戏曲曲调的歌词，刊登新

民歌，是促进新诗顺口、易记、有韵、能唱的方法之一。真正优秀的革命曲子甚至可以据以新作歌词。中国古典诗词有诗和音乐相结合的长处。革命诗歌如《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都可以谱曲，并更加广泛流传。

是不是因此而排斥只能看而不易记和不能唱的诗呢？并不。这类诗还将是大量的，包括散文诗，即使是很不整齐的楼梯式的诗，真正写得好，还可发表。

编辑部的组织也不太难，老、中、青三结合，并吸收几位音乐工作者参加就行了。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如同意，可否将来信及此信印送有关部门与政治局同志参阅。

此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

9月19日

毛泽东在1975年9月19日批示“同意”。这样，《诗刊》在1976年1月，出版了复刊号。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2]江青最初住在钓鱼台11号楼。后来由于她怀疑11号楼被安装了窃听器，于1969年2月令人对11号楼进行大检查。虽然在检查中没有发现窃听器，江青仍然不放心，迁至钓鱼台10号楼居住。

[3]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115页。

[4]1991年5月19日，叶永烈在成都采访张耀祠。

[5]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6]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7]杨银禄：《江青的“女皇”生活》，《百年潮》1998年第6期。

[8]据经盛鸿：《于若木勇斗江青》，《周末》1988年5月14日。

[9]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

版，第208—209页。

[10]杨银禄：《林彪与江青的你来我往》，《中国改革》，2011年第3期。

[11]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

第十九章　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

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8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image]

■ 1977年3月21日《时代》杂志封面上的毛泽东和江青

此人堪称老奸巨猾。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21岁，比周恩来小16岁，比康生也小16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峰巅。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个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因为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在他们看来，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毛泽东突然休克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时30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指周恩来——引者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
>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
>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至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那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时候，八宝山公墓礼堂气温很低，尽管临时安放了一个废旧汽油桶，里面装满烧红的煤块，但是礼堂那么大，无济于事，很多出席追悼会的人都感到寒气逼人。毛泽东从温暖如春的中南海卧室，突然来到那么冷的八宝山公墓礼堂，感到不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肺炎加重，发低烧。肺部的感染又使心脏受到损害，发生肺心病。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79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次休克，是毛泽东身体从健康走向疾病缠身的转折点。从此他每况愈下，步入多病的晚年。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

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晤。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张玉凤眼中的江青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24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据刘松林告诉笔者，有一回毛泽东乘坐专列外出，正值张玉凤在专列上当服务员。毛泽东问起张玉凤的姓名。回到北京之后，汪东兴在毛泽东书桌上看见一张纸，上面写着“张玉凤、张玉凤、张玉凤”。汪东兴心知肚明，便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一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image]

■ 江青与张玉凤（杜修贤 摄）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旁。

前已述及，中南海原本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冬天无法游泳。中共中央管理局后来决定在中南海建造一座室内游泳池。这个室内游泳池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据中直修建处的田恒贵回忆，整个建筑的中央是游泳池，一进门有个门厅，里头两边是更衣室、淋浴室，南面是一个大厅，可以用作会客，东南角是一间住房，是供毛泽东休息的地方。

毛泽东很喜欢这座游泳池，不仅来这里游泳，还时常在此留宿。1958年8月，毛泽东就在中南海这个室内游泳池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田恒贵说：“毛主席特别喜欢中南海这个室内游泳池，一是那里的房间比较高，起码有五六米高，二是房间前面全是大玻璃窗很有气派，特别敞亮，相比之下，菊香书屋的房间就感觉有些憋屈。毛主席后来时不时就住在那儿，因此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有幸多次在这里遇见他。游泳池这边的建筑内没有厨房，毛主席住在这里的时候，还在原来住处的厨房

做饭，再给把饭送过来，我多次看见毛主席身边的服务人员往这里送饭。”

从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整整住了十年。毛泽东喜欢在那里的书房会见重要客人。所以那间放满许多古书的房子，常常出现在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悉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战士的陈长江曾回忆说：

>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
>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代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
>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
>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
>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
>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
>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1]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

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

难理解”的关系。

秘书眼中的江青

江青从1938年8月起就是毛泽东秘书，最初的名分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而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秘书。从1956年起，江青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成为毛泽东当时的五大秘书之一，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并没有秘书。

在“文革”中，随着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从1967年1月起，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江青配备了专职秘书：第一任为阎长贵，第二任为杨银禄，第三任为刘真，第四任为刘玉庭。

其中，阎长贵担任江青秘书一年，而第二任秘书杨银禄在江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到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赶出钓鱼台，前后五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

杨银禄这样描绘了江青一天的生活[2]：

>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
>
> 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
>
>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
>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数据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
>
> 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
>
> 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三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
>
> 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乒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
>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

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等。

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

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杨银禄曾经回忆，毛泽东是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疏远江青[3]：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小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杨银禄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

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杨银禄还回忆说[4]：

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江青秘书杨银禄和阎长贵特别强调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在私生活方面她不敢胡作非为，还有她的生活一步、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工作人员。说她养“面首”云云，完全是胡编乱造，人身侮辱。

杨银禄和阎长贵还说，有人讲江青养“面首”，指浩亮、庄则栋等。杨银禄和阎长贵问过浩亮、庄则栋，他们都说江青在我们面前是长辈，我们对她很尊重，她在钓鱼台住哪个楼我们都不知道。

杨银禄还忆及，江青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最使杨银禄感动的是，江青曾经热心救助过处于困境之中的数学家陈景润。

杨银禄记得：“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杨银禄回忆说，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杨银禄记得当时的情形，江青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杨银禄说，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

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杨银禄记得，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杨银禄说，半个小时后，迟群风风火火地来了。

杨银禄回忆道：

> 江青对迟群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
>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
>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
>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
>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应当说，江青对于陈景润的关心，为陈景润艰难的生活处境流泪，表现出她既有在政治斗争中冷酷无情一面，也有富有人情味的关心人的另一面。

江青看电影

江青喜欢看电影，她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看电影。每星期往往看两三次。

江青看电影，喜欢一个人看，看电影时聚精会神，不愿有任何杂声干扰她。也有时她跟身边两三个工作人员一起看，那些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的脾气，看电影时静静地看，不讲一句话。

在“文革”中，江青在钓鱼台宾馆看电影，则往往通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谁有空而且有兴趣，就过来一起看。放映什么电影，由江青指定。

江青看电影时，总是在脚下放一张小凳，膝盖上放一块小毯。

江青住在中南海的时候，在丰泽园西北的春耦斋看电影。春耦斋在颐年堂旁边。颐年堂是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型会议的地方，而春藕斋则是中南海举行周末舞会的场所。江青喜欢在春耦斋的放映室里看电影。那里的电影放映机是1960年从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进口的，在当时的北京算是很好的放映设备。

在“文革”中，江青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钓鱼台国宾馆，就改在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

江青爱看电影，有几方面因素：

一是为了欣赏——当年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而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出于职业习惯，她当然喜欢看电影；

二是为了休息——她在20世纪50年代患病之后，医生嘱咐她进行“文化疗养”，看电影就是“文化疗养”之一；

三是为了批判——她为了“批判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黑线”，看了大量的国产电影；

四是为了借鉴——为了把“样板戏”搬上银幕，她请电影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跟她一起看外国的参考片。

在1963年、1964年这两年里，江青看了大量的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国产片。看完之后，江青通常一言不发，谁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看这么多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产片。

直到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里举行的那“一人谈”座谈

会——所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这才一语惊人：“近期以来，我有系统有目的地看了一百多部电影，发现问题很严重。长期以来我们被一条资产阶级黑线统治着……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这种情况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岂能容忍！必须砸烂。”

在“文革”中，江青以看外国影片为多。那时候，有所谓的“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指从香港路过的外国电影，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临时借调，三五天就送回去。笔者当时在上海的电影制片厂工作，常常有机会在上海指定的内部电影院——新光电影院观看“过路片”。据说，这些“过路片”往往是江青在北京先看，如果认为有艺术参考价值，就“过路”上海，上海的电影制片厂组织主要创作人员观看。

据江青秘书阎长贵说，江青看什么电影是由身边工作人员选的。江青有交代，她有“三不看”——第一不看恐怖片；第二不看黄片，有下流动作、床上动作的，她不看；第三不看软体动物，如蛇、蛤蟆等，她看了恶心，不舒服。

外界传说江青经常看黄色电影。阎长贵说，至少我在的那一年，她没看过黄色电影。有部日本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头就是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一看就急了，起身就走。

江青秘书杨银禄则说，有一次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正在选电影，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去了，李选了一部《格林的故事》，里面有些镜头很恶心。江青看了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滚，打铃叫我们上去，问是谁挑选的电影？我们说是李志绥。她生气了，说：“李志绥把我害了，他故意害我，我看他就是美国特务。”

杨银禄回忆说：“她喜欢美国电影《红菱艳》，看了好几次，后来又看了《冷酷的心》，还有一部《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为什么看这些电影，她主要是看色彩，看镜头、灯光、演技。如《红菱艳》里一个情节，男主角发火打碎玻璃的一瞬间。她说演得好，光这镜头就看了很多遍。她看电影，有时就看一小点。时间长了，钓鱼台电影放映员的技术都很高，成百上千部电影，江青要看哪一点，很快就能找出来。”

前面已经提及，江青看了电影，通常不语。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有时候她看完电影之后会说一些话，秘书就赶紧记下来，成了江青对电影工作的指示。

[image]

■ “江记”文化部部长于会泳

1975年8月11日，江青秘书刘真向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传达了江青谈影片《简爱》的记录稿：

《简爱》这部电影，内容是很反动的，这部小说在英国文学史

的地位也不高。

但是，这部电影在制作上是严谨、细致的。从改编剧本看，除了后边简爱出走那一段有某些多余以外，其它都还是可以有所借鉴的，因为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一部一小时半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事。

导演不错，细致、严谨，给演员以充分的表演过程和作戏的机会。因此画面上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是不错的，它的画面也不乱蹦乱跳，对话比较少。

演员我不太喜欢，但是他们演这个戏，还是称职的。

这部电影的摄影技巧，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部分。它拍的早上是早上，中午是中午，黄昏是黄昏，采光技巧是相当高明的。例如：简爱的到达是黄昏，画面上没有说，但是可以直接看出是黄昏。罗杰斯特的摔马那一段，一看就知道是傍晚。接着就是晚上，第二天简爱在户外画画是早上，使人感到清晨的清新，颜色极为丰富，特别是绿色。又例如：疯子伤了她的弟兄，是深夜，接着是拂晓的外景，简爱在平台上来回焦虑地走着等待罗杰斯特，一直到后来两个人见面，这一场戏的摄影技巧了不起，我还没有看过像这样的电影，拍拂晓一看就懂，丰满的绿层次间以暖色的小花，沉浸在朦胧的晨雾中，很好地衬托出这一场戏的内容，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相当吸引人。选景也好，使人总是感觉到面前是个大花园，其中有座古堡。内外景配合得好，例如：简爱坐在窗子旁边，望着窗外，窗外在下雨，但是使观众能隐隐约约地看到窗外茂盛的树木郁郁苍苍。

这一部电影我推荐给春桥同志看，暂留钓鱼台。你们四位要想这几天看，可以到这儿来看。以上意见，只是提供你们几位参考。如果你们这几天能有时间看，可以打电话找17楼的康玉和同志。

于会泳当即于翌日——8月12日晚，赶往钓鱼台看《简爱》，以求“深刻”领会江青的指示。

护士眼中的江青

1974年3月起，马晓先担任江青的护士。

马晓先听说江青脾气大，所以不大愿意到江青那里去。

正巧，那时候马晓先的丈夫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她就以此为理由，说是到江青那里工作不合适，以免传染给江青。

起初，汪东兴也同意马晓先的意见。可是过了十多天，汪东兴还是来找马晓先谈话，要马晓先到江青那里当护士。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马晓先曾经在江青的女儿李讷那里做过护士，李讷的脾气也大，她挑了好多护士都不行，最后还是要马晓先。当时李讷就对马晓先说："你可以，你在我妈那可以。"大约是江青从李讷那里听到对马晓先好评，所以非要马晓先当护士不可。

果真，尽管江青脾气大，马晓先在江青那里一直工作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在江青被捕之后，马晓先还作为江青的看管人员，在地下工程里看管江青达半年之久，直到把江青送进秦城监狱。

马晓先知道，江青患有肾功能失调[5]，容易出汗。马晓先说，给江青想了个钉小毛巾的办法，帮她在每件圆领汗衫上都钉两个子母扣，每条小方毛巾也钉上，跟汗衫的子扣一摁，这样出汗后可以经常更换，免得着凉。那些毛巾很多都是人民大会堂里用过的，都是特别旧、起了毛的毛巾，经高温消毒后，我们就给她用，但非常软。

马晓先注意到，江青的衣服、睡衣都是她自己裁的，她心灵手巧。马晓先说，江青自己用那种棉卡布做睡衣，裙式的，特漂亮，又朴素。

马晓先说，江青口味很淡，不喜欢大鱼大肉，吃的都是活鱼、淡水鱼，荤素搭配。她喜欢吃洋葱头，也喜欢吃苹果。有时提出吃点粗粮，吃点青菜。江青的内衣，喜欢棉布的，还不要新的，要旧的。其实这都很符合科学。

马晓先说，江青化妆品都不抹。江青没有描眉、涂口红、抹化妆品的习惯。江青的头发又黑又亮，67岁的时候头发还是黑黑的，没有染发。有人说江青的头发是假的，那是相声演员讽刺她的时候编的段子。江青也有假发，但只是为了装饰，比如说那次马科斯夫人访华，因为马科斯夫人比她年轻些，她就弄了个像辫子盘起来的假发，增加点装饰。

马晓先说，她喜欢摄影，钢笔字写得很好，也喜欢写毛笔字。马晓先看到江青批文件写的钢笔字很漂亮，很有劲。江青学毛泽东签字，也学得挺像。

不过，江青有明显的权力欲。比如有的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马晓先说，江青一天要按时间吃几次药，我们的手表都要跟她对时，不能跟中央电视台对，她的表快我们就得快，她的表慢我们就得慢。有时候提前了一点到，她一看表还差一分钟，“啪”就吐出来，那你就得等。但等你再拿回去的时候，时间可能又过了。江青的难伺候，就在这种地方。

马晓先说，有次江青要接见外宾，她那肾功能失调症一紧张就出汗，穿衣服时系扣子手都有点不听使唤，她便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这时候江青的情绪就不太好。她很怕风，出去之前我们都要先看好风向，不能让风冲着她，怕她着凉。钓鱼台一座楼的顶上有一面旗子，马晓先平常就是看旗帜判断风向。但是这风向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有时风从这边刮过来，但在楼里拐个弯风向又不一样了。那次遇上江青一着急，又被风一吹，她就说：“不去了，你们怎么看的这个风向啊？你们这是软刀子杀人！”可是她不出席这个会，政治影响很大。那次马晓先就被停职反省了。江青那里一共就两个护士，马晓先被停职，另外一个就得累死。支部书记来做工作，马晓先总算又回到江青那里工作。从那以后，遇上江青要外出，马晓先点香来测风向。

美国总统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image]

■ 江青和尼克松在一起看样板戏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
>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
>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
>
> 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
>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
>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

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6时30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模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模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1917年中秋那天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

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被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1942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image]

■ 叶永烈采访韩素音，她差一点成为江青的“斯诺”。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6]：

> 在1971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
>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
>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
>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
>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生气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1956年5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他们是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于7月18日飞抵香港，取道九龙、深圳和广州，来到北京。

内中有一位34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末在台湾做过研究工作，197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露克珊·维特克自述：

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作《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引者注）。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

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露克珊·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露克珊·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做些采访。

其实，那天露克珊·维特克就谈及了江青：

我提到在结束两年的亚、欧学术研究后，我在1967年秋返回伯克利，期间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我对她很感兴趣。这位曾经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泽东夫人，突然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发号施令，四处攻击老一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她的故事。直到1966年公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中央的这种沉默使中国观察家们作出了各种各样轻率的猜测，他们对出现一位操纵大权的中国女性感到既惊讶又兴奋。

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良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

就这样，露克珊·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露克珊·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我又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学，并继续192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写作。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一本清除掉曾去过台湾的记录的新护照——送去即可。

几天之后护照就被送了回来，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签证也附在一起。

就这样，露克珊·维特克的访华请求，得到了批准。

露克珊·维特克继续叙述说：

> 1972年7月18日，我飞赴香港，在启德机场我受到了“我们的朋友”友好协会和蔼可亲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的领导赖先生，和其他偷偷跟着我的两个人，陪同我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站在一种文明的边缘，对它，我仅仅知道一些历史，几乎想不出现实的景象。从深圳我继续坐火车到广州，我被交给地方友好协会的两位女成员，一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是中年妇女，都特别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午睡（这是她们强加给我的习惯——我只有假装睡觉）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后，我继续坐飞机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们极其谨慎的飞行员接到了危险天气的预报，随后突然决定在郑州停一个晚上，……早上继续完成了飞行，到达了北京。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露克珊·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露克珊·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露克珊·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 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
>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露克珊·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露克珊·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

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露克珊·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露克珊·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露克珊·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露克珊·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露克珊·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34岁的露克珊·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巧真巧，露克珊·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晚上，一起会见露克珊·维特克女士。

《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

1972年8月11日，忙了一天的露克珊·维特克到凌晨才睡。第二天，即8月12日上午她还将访问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朱德夫人康克清。

露克珊·维特克回忆说：

回到北京饭店后，我第一次睡了一个中国式的午觉。后来被于世莲（露克珊·维特克的中国陪同人员——引者注）叫醒了，令我很是迷惑不解，因为每天那个时候都是她和其他人打瞌睡的时间。于压低声音对我说："今天下午一些年轻同志们可能会到你房间来拜访你。""谁？""我也不知道。"她推托地回答。刚过一会儿，她又出现在我的门口，告诉我年轻同志们很有可能就要来拜访我，"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会准备一些好茶叶和干净的杯子。"

我整理桌子上的纸和书的时候，茶杯的托盘、矿泉水和一盘堆着像金字塔的新鲜水果也送了进来。于又回来了，眼里闪烁着激动和兴奋，"她们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似乎她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

三点整，两名具有严肃的革命风格、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站在了我的门前。徐尔维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后，带着高层党务工作者的诚恳作了自我介绍。我用汉语向她们问好，她们用标准的英语作了回答，带着上层英国人的口音。"江青同志想让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沈开始谈话，"她指示我们把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次讲话读给你听。""为什么这么急？"我问道，觉得很奇怪。"我们对此也不知道。"她们微笑着回答，然后开始工作。

在那两个半小时里，期间仅仅因为喝水而中断了一次，她们用英语读着江青同志1966年2月在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一篇冗长的讲话稿。

他们告诉我，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认真地听，而且要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大胆地写。在听这些辞藻华丽的或重复的篇章过程中，如果我的笔停了下来，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就会盯着我，直到我重新写下去为止。

"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看这些原文呢？""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听。"那时我的预感——后来在我回到美国能够研究江青讲话的记录时得到了证实——是原始的印刷版本，大多数在中国是严格限制发行的，其中还战友般地提及到林彪、陈伯达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领航人，他们后来都被驱逐出革命队伍。

他们继续读，我继续记，一直到于向她们示意为止，已经五点半了。她们立即拾起她们的黑色塑料包（象征干部地位的包）和江青未经审查的讲话稿，然后和我作了一个迅速的告别。

于告诉我说最好洗一洗，收拾干净。但是我和缔造了这个特别

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在一起谈了一个上午，然后又在热浪中写了一个下午，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告诉于，晚上我想静静地一个人吃一顿晚餐，写下我的一些想法之后早点睡觉，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样，”她坚决地回答道。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会有时间会见你，所以动作快点吧！”

一会儿工夫，“有可能”变成了“很可能”，接着变成了“肯定”。

对这次会见的性质，地点、甚至目的，我都一无所知。

“20分钟后出发！”于匆匆对我说。

我赶快脱掉从早上五点就一直穿在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和裤子，冲进浴室洗了个凉水浴，吃了双份剂量的头痛药后，钻进于选中的我的两套旅行服中的一套，她说“黑色的比红色的好一些。”

我们的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中国人的好客是闻名四海。还有就是他们能够通过纵容客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控制客人，从而使客人放松警惕。随着我们的车慢慢靠近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领导人组织重大政治活动和娱乐表演的地方，那晚看起来好像是试探性的安排，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江青向一个外国人发出了邀请，这是很少有过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由她来决定一切。媒体被动员起来制造一种官方的气氛。我们登上台阶的时候，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摄影师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跑前跑后地用电视摄影机摄像。到了大厅里面，我飞快地向江青的众多随从点头致意，互相介绍姓名，其中包括毛泽东很有名气的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

穿过好几个厅之后我们被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巨大门廊里停了下来。有一个人清了清嗓子，抬高声调宣布江青同志就在旁边的房间里面……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露克珊·维特克，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江青。

露克珊·维特克继续写道：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image]

■ 江青接见美国作家维特克。左二为姚文元。

露克珊·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露克珊·维特克出现了；露克珊·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行成功。

露克珊·维特克这样记述对于江青最初的印象：

>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从一些照片里看，她似乎从六十年代初起，就戴着这副眼镜。她的保养得很好的皮肤，由于天气的炎热而微微泛光。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相像。鼻子尖上和右嘴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
>
> 站直了的话，她的身高有五点五英尺，她说自己的身材很高（大多数山东人身材都很高）。和我站在一起时，她要矮几寸，于是她抱怨说我占有了高跟鞋的便宜。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显得十分轻柔端庄。她的手指纤细，恰如古代诗人所形容的"纤纤素手"。做手势时，她用手在空中划出弧形的线条。
>
> 她的衣着很保守——珠灰色的裤子，与之相配的束腰上衣，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丝衬衣。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只是她的是白色的，这一点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与鞋相对应的是一只白色手提包。这些东西倒真像是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和邓颖超的一样，她的衣服式样、做工都要比普通人好多了。同时，她们的衣服在边角的地方都有些微的磨损。莫非她们就是把这当作无产者的象征？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露克珊·维特克深为喜悦。

姚文元则为江青敲边鼓。姚文元用曹操晚年的诗《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句子来形容江青：“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江青很高兴，接过姚文元的话说，“这首诗前面几句也不错。”江青接着念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江青又说，“后面还有四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江青称曹操的诗“其中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她一边用筷子敲打着面前的一排冷盘，一边说：“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今天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得不来。我身体状况不怎么好，最近睡得也不好。我需要治疗和休息，还要锻炼。”

“你做什么锻炼？”露克珊·维特克问。

“游泳、骑马、散步，有时弄弄园艺。”她回答道，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在中南海自家种的茉莉花来。

但是江青强调，“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露克珊·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江青非常明确地对露克珊·维特克说：“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

姚文元掌控着媒体。在姚文元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对江青接见露克珊·维特克一事进行了专门报道，并配发了照片。

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露克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已经从北京来到上海的露克珊·维特克接到陪同人员的通知：“江青同志已秘密飞往广州，她要在那里思考一下有关她的生活和革命的一些

问题。她要在那里见你。你最近几天提的有关她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答复。你明天将乘一架由北京派来的飞机飞往那里。除了我们这些陪同人员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露克珊·维特克平生第一次坐上专机。

露克珊·维特克说，与她同行的有“张颖，一位负责宣传事务的高级官员；翻译沈若芸；唐龙彬，礼宾司的副司长，他同时也将是我们这一行程中唯一的男性”。

露克珊·维特克还说：“这架飞机内舱宽敞，装饰豪华，远超过普通的中国飞机。有人把我和张颖领到前舱，这里面有写字台和餐桌，一些电器，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精织的绸子床单，一只很相称的粉白色夹白色的枕头。我们俩人单独待在那里……”

在广州，江青告诉露克珊·维特克，为什么选择广州？为了从日常工作脱身，休几天假，同时也为了治病。没有了北京那种压力，她吃睡都比以前好多了。近几个月来，她的记忆力时好时坏，这几天里也得到了恢复。

江青猜测，露克珊·维特克更多地想了解她的个人生活。江青保证，她的讲述肯定不会乏味。她从童年开始，谈她的个人故事。

露克珊·维特克说，此时已是夜里9点。我们中间休息了一次，吃了一顿饭，并换到另一个空气清新些的房间。江青不停地讲，一直讲到次日早晨三点半。随着时间流逝，她的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充沛。听的人已经疲乏不堪，甚至因酷热而昏昏欲睡，可她对此似乎根本就未曾留心。每天晚上，江青都是在卫兵、护士的一再催促下，才肯停下来。她的两位保健医生有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从屋子角落里静静地看着她，他们也不时地向她打手势，让她去休息……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露克珊·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60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露克珊·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7]

露克珊·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在跟露克珊·维特克谈话时，露克珊·维特克当场做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露克珊·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露克珊·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过露克珊·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露克珊·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露克珊·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露克珊·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露克珊·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露克珊·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露克珊·维特克认

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露克珊·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露克珊·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露克珊·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露克珊·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image]
■ 维特克所写《江青同志》一书的封面

[image]
■ 江青所摄、以琅琊台名义发表的《庐山汉阳峰》。

据日本NHK电视台导演山田礼於先生告诉笔者，他于2011年4月6日在美国纽约采访了露克珊·维特克。露克珊·维特克出示江青赠给她的庐山汉阳峰照片。山田礼於先生在写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称：

看见那张庐山的照片很是吃惊——
一是因为照片尺寸很大（A3，30cm×40cm）；
二是题诗和签名都是用的红色铅笔。

在中国人的习惯中，用红笔写字是很不礼貌的，除非是表示皇帝御笔批示。江青用红色铅笔题词赠露克珊·维特克，大约是表示"御批"。

有人曾经猜测这首诗是毛泽东写的。但是，在1974年夏，江青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琊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倘若是毛泽东所写，不可能署名"琅琊台"。这清楚表明，诗是江青所写，"琅琊台"是江青的笔名。

1974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

据露克珊·维特克称，她在1972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与她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露克珊·维特克所关注的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一直没有交给她。

1973年5月，露克珊·维特克正式接到何理良的通知，称江青的谈话记录“太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这样，中方也就不向露克珊·维特克提供江青的谈话记录以及相关的录音带。

何理良还说，露克珊·维特克可以出版自己的记录，但最好不要写成“江青传记”形式。可以用毛泽东的观点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

这使露克珊·维特克感到为难，因为她很难完成一部以毛泽东的观点写成的中国革命史。

露克珊·维特克隐约感到中国高层内部关于江青有着复杂而尖锐的争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同事直接或间接地向露克珊·维特克索取她在采访江青时的记录的完整复印件。

露克珊·维特克说，她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一是在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把她当作一个美国政府政治信息的管道，谈话里面不涉及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二是作为一位曾去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除了她自己以外她不代表任何人，在她亲自检查、确保准确和慎重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会让公众理解江青的不平凡生活及其与革命历史的密切联系的书之前，我没有义务把我的原材料交给他人。

露克珊·维特克说，她从中国回来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待了一年，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待了两年。她对江青进行访谈的情况，仅仅只是其中某些部分，在学术圈中和部分公众中流传，因为她曾经与他们大体上谈到过江青的生活、她的同志们以及中国的一些情况。

露克珊·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露克珊·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

《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露克珊·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

《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露克珊·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露克珊·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我经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不过，陪同露克珊·维特克会见江青的张颖却说：“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8]

《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40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露克珊·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我读了露克珊·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一书，以为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作者直接采访了江青本人，有不少第一手资料（虽说内中有些是江青吹嘘自己之话）。但是也有三点明显的缺陷：

一是江青在自述中回避了许多重要问题。比如，《江青同志》一书无一处提及江青的前夫俞启威（黄敬），而俞启威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曾经给予江青以深刻影响，怎么可以回避俞启威呢？同样，《江青同志》一书也无一处提及江青的前夫唐纳。

二是露克珊·维特克在采访时，起初做了详细的笔记，但是后来江青

要她集中精力听讲，不要做记录——反正有记录员在场，将来可以送露克珊·维特克一份记录以及录音带。由于后来周恩来不同意把江青的谈话记录以及录音带送给露克珊·维特克，所以露克珊·维特克在回到美国之后只能依靠记忆来记述江青的谈话，可以看出《江青同志》一书后半部的内容很多内容松散，没有多少第一手的可参考的价值。

三是没有涉及江青在“文革”中的罪行以及江青的被捕、受审直至自杀身亡。

香港的评论也以为：“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除了江青在做“主席梦”之外，张春桥也自我感觉甚好，在做着“总理梦”。

江青和张春桥向周恩来发动了挑战。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以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报告，写了批示：

>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
> 周恩来
>
>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张春桥在报告上写道：“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在这一行字下面，张春桥又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

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江青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在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最高的裁决是毛泽东。

正在这时，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12月17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

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毛泽东在这时又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中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其实是因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许多极左的成分，批判极左也就触动了“文革”，触动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与周恩来的这一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天平最后向他们倾斜，越发趾高气扬了。

然而，毛泽东尽管不同意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他并不准备把江青、张春桥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没有选择江、张、姚接班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
>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
>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
>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
>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
>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
>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调，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引者注），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毛泽东不得不第二次选择接班人——按照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体制，跟苏联共产党一样，接班人是由最高领袖指定的。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总是由个人决断，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然而，毛泽东恰恰选定了“喊万岁”的人作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14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开始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因为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

就连张春桥本人，在当时也俨然以“接班人”自居。张春桥比毛泽东小24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目标，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张春桥为接班人。

关于张春桥没有成为接班人，有人猜测可能由于张春桥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为，毛泽东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一下子战胜了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便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会过于强大，以致难以控制、驾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1972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1969年10月下旬起，一位65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

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

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9]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image]

■ 邓小平夫妇与秘书在江西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

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

>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
> 4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10]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20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37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51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8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参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中了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

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11]。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9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9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9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

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

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79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3时出去，夜里3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2时30分至6时40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
>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
>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
>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
>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

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王洪文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11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13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1980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一——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46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5月20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引者注）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1972年9月7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42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

者，那便是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52岁，他比毛泽东小28岁，比王洪文大14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1952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0年10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13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全国举办的34个“学习班”，都是从8月12日开始，为期一周，19日结束。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8月8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8月20日，104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王洪文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24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75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38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image]

■ 毛泽东（中）、周恩来（右）、王洪文（左）在中共大十主席台上。（杜修贤 摄）

[image]

■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会议上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1200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49天，八大开了12天，九大开了24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工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8月24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

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20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8月28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73年3月10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1971年11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引者

注）‘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王洪文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1971年在第4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

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作陪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跷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1973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image]

■ 1975年4月，王洪文（前右一）陪同朱德（前左二）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前左三）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16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1974年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

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就在“王洪文失宠了”的日子，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刘盆子原本是一个放牛娃，但是跟汉朝皇室有点血统关系。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为了师出有名，号令天下，竟然把15岁的什么也不懂的刘盆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号建世元年。后来赤眉军大败，刘盆子也就随樊崇成为阶下囚。

《后汉书》是用古文写的，王洪文读不懂，不得不请教朱永嘉。后来，朱永嘉回忆说[12]：

> 毛泽东让他（指王洪文——引者注）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
>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
>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

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1]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党史博览》1994年第1期。

[2]杨银禄：《江青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3]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4]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5]田炳信：《红墙内的护士长——访“文革”期间中南海保健组成员马晓先》，2005年4月27日《新快报》（田炳信于2005年1月2日在北京建国饭店9009房采访马晓先）。本文引述马晓先在接受采访时的口述。

[6]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叶永烈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7]《〈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8]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第707—708页。

[10]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1]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12]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第二十章　四人结帮斗“周公”

江青“迫不及待”攻击周恩来

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机构中，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21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擢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而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们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其实，就在毛泽东第一次休克之后的四个月，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也亮起了红灯。那是在1972年5月12日，医生在周恩来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中，发现了四个红细胞。这引起医生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次化验尿样，确诊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从此，周恩来也像毛泽东一样，步入多病的晚年。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仍把周恩来视为攻击的第一目标。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中央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1]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了！

[image]

■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杜修贤 摄）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2]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12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跟党政主要领导人会面的特殊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3]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王海容、唐闻生成为特殊的“桥梁”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当时，人们把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称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

在这“五朵金花”之中，由于王海容、唐闻生的特殊身世，成为两朵最引人注目的“金花”。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又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1972年夏王季范病故时，毛泽东所送的花圈上便写着“九哥千古”。

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她的名字是爷爷王季范取的，取义于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王海容在长沙读完初中，于1952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57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11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

1970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翻译的，便是王海容（后来，在1974年11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1984年，王海容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

王海容早在1967年，就已经为毛泽东“传话”。

那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外交部的工作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讲话被印成传单，到处传播，人称“王八七讲话”。王力在讲话中，称外交部“运动阻力太大”，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矛头直指外交部部长陈毅。

王力的讲话发表后，外交部的“保陈派”们要弄清毛泽东对王力讲话

的态度，便派出王海容去毛泽东那里“摸情况”。

据刘华秋回忆：

> 我们请王海容尽快设法摸清毛主席的反应。（1967年）9月24日凌晨4点，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试探他老人家对陈毅同志及王、关、戚的态度。当王海容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针对王、关、戚问题，只援引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并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
> 早上6时多，王海容回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我们焦虑地询问她毛主席究竟讲了什么话？她说：主席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引用了两句古诗。我们立即翻阅唐诗、宋词，一时没查到出处。我们认为这两句诗很重要，关系到王、关、戚的定性，无论如何要把意思搞明白、搞准。我提议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毛主席的表兄及国文老师王季范先生。
>
> 上午10时，我们骑车跟随王海容到她家，将已准备好的白纸黑字向王季范老先生展示，请教“时来天地皆同立，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出自何处。王先生拿起铅笔，将我们抄写字条中的“立”字改为“力”字，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唐诗，向我们指明了出处。我一看，原来出自罗隐的“筹笔驿”，全诗是：
>
>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
> 我一看全明白了，匆忙抄下了罗诗，告别了王先生，风驰电掣般骑车回到办公室。
>
> 我们一致认定：毛主席援引罗隐这两句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给王、关、戚作了“盖棺定论”。意思是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但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结论只能是：王、关、戚快完蛋了。[4]

后来，“王、关、戚”果真下台了！这表明，王海容所传的毛泽东的话，非常准确！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71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唐明照原名唐锡朝，1910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1927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1940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斯诺夫人曾称张希先是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

1943年3月，当唐明照从外地回家之际，他的女儿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产科医院，“闻父归而生”，取名唐闻生。正因为唐闻生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1971年，唐闻生接待第一次秘密踏上中国国土的基辛格博士时，基辛格调侃她“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1950年7岁的唐闻生随父母回到中国，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她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当周恩来的英语翻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为外交部挑选高级翻译人才时，一眼就选中了她。从此，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并迅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为周恩来、毛泽东当译员，成为继冀朝铸之后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

1971年，唐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8岁。不久，唐闻生出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两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唐闻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王海容和唐闻生几乎参加了这两位伟人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还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82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闷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1966年4月4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4月28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逾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image]

■ 郭沫若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说，《十批判书》中批判了秦始皇，这是极其错误的，是与毛主席的意见背道而驰。

不过，郭沫若顶了他一句："我那时骂秦始皇，是针对蒋介石！"

郭沫若此言，顶得张春桥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2月10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钩”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5]，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指郭沫若、范文澜——引者注）、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

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6]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话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7]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8月7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30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200多篇文章，内中有30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

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把手伸进部队

197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4）3号”文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中共中央
1974年1月25日

附件：《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最近，江青同志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于1月13日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赠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二百份。随信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一份；（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并派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到防化连。谢、迟二同志1月15日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发了江青同志赠送的学习材料。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正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学习。二十军党委除帮助防化连搞好学习外，并要求部队把学习江青同志的信，深入批林批孔，作为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大事来抓。

1月16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同志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议军、议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的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林批孔作为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掀起一个新的批林批孔高潮，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我们打算通过二十军防化连和南京路上好八

连，并要求各军、师都抓一个连队，先学习江青同志送来的材料，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努力克服不善于抓典型，工作一般化的毛病。我们已将江青同志的信和我们的上述认识，向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的同志通了个气，要求他们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提出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军区定于2月4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给防化连的信，认真讨论深入批林批孔的措施，抓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好反修防修教育，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示。

南京军区党委
1974年1月20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1月13日写给我部防化连全体同志的信和赠送的两百份批林批孔材料，已由谢静宜、迟群同志于到达军部的当天晚上面交防化连。收到您的信和材料后，我们和防化连全体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党委常委对您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鞭策，它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深入批林批孔，抓好部队的思想建设。

江青同志，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的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防化连在我们身边，他们对批孔问题的反映，我们都看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军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对批孔的意义和批孔与批林的关系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去抓，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为了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认真解决部队在批孔问题上遇到的困难，经常委研究：

一、已将您的来信印发到全军各连，把您赠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除防化连人手一册外，分发给各师、团。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带动部队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意义的认识，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

二、军、师、团各级党委都要对部队的批林批孔形势作一次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措施。

三、各级在批林批孔中都要深入实际，抓好典型。军党委拟在2月份由负责同志率领机关干部，深入一、两个连队，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进行批林批孔教育，认真抓好防化连这个点，总结经验，做出实际成绩来，向您汇报。

谨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
1974年元月17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来的信和材料都收到了，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决心反复学习您的来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把批孔作为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知难而进冲锋陷阵，争当闯将。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防修反修的自觉性，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以基本路线为纲，以您的来信为动力，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致以

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
1974年1月16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的下发，不仅给批林批孔添了一把火，而且大大提高了江青的威信。这时候的江青，处于异常得意之中。

江青把手伸进了部队。

1974年6月发生的一件小事，显示了她在部队中的胡作非为。

后来，据《军事博览报》所载《中国水兵飘带上的一场闹剧》一文揭露：

1974年6月的一天，舷号为“211”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出厂才九天，就突然接到一纸紧张命令：迅速赶往天津塘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当这艘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以二十八海里的时速驶抵溏沽港后，舰长、政委才被告知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是：江青要乘该舰视察大港油田。

彩旗满挂，江青在纪登奎、于会泳等随从的陪同下登上了“211”舰的舰首。为表示“中央首长”对舰员们的最大关怀，江青发话要分三批与“211”舰的全体官兵合影。大家迅即做好了合影准备。参加第一批合影的水兵中有一个名叫张建华的，小伙子长得很帅，被安排在江青的身旁。如同其他水兵一样，张建华也非常喜爱自己水兵帽上的两条飘带。照相前，他悄悄将一条飘带拽到胸前。这条飘带不知怎么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忽然皱起眉头，顺手将张建华的水兵帽摘下，指着帽子上的飘带说：“这玩意儿是拿破仑搞的，是纪念诺皮尔的。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边说边将飘带弄到水兵帽里边，然后敲到小张头上。

江青的话使准备合影的官兵个个目瞪口呆，但不管如何，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对飘带下的“指示”如此明确，而且亲自动手“果断”地处理，这无疑就是命令。可想而知，在这张摄于6月26日的照片上，“211”舰数百名水兵的飘带销声匿迹了。

很快，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无飘带水兵帽”问世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蒙冤两载有余的飘带才被“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中国海军的水兵帽上。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子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琢磨“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就在这时，江青求见毛泽东，希望从毛泽东那里能够得到支持。毛泽东在1974年2月9日复函江青，要她有事去找中共中央政治局[8]：

>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
> 毛泽东
>
> 九日

发表在1974年第4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

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两首七律给毛泽东，承认错误。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郭沫若在另一首诗中则称：“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

即便郭沫若这么步步后退，江青仍不放过他。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压，他自己也终于病情日见沉重。

1974年3月11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15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3月20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9]：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

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3.20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大约是毛泽东意识到3月20日给江青的信，口气太严厉了些，又于4月17日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10]：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
74.4.17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毛泽东
74.4.17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4月28日，发生缺氧病状；

5月19日、23日、25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1974年1月至6月1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13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左右的有5天，连续工作30小时的有1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305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6月22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1]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版。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3]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页。

[4]刘华秋：《忆毛泽东主席援引罗隐诗》《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5]1988年11月3日，叶永烈采访王力。

[6]《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1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374页。

[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人帮”兴亡（4）：覆灭/叶永烈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54-0409-7

I．①四…　II．①叶…　III．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IV．①K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0526号

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未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特向未署名的摄影者致歉；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与本社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克　川　陈立旭　柯琳芳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胡志华　袁又文　章文岚　叶敏娟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旗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97印张　9插页　插图253幅　2168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平全四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转出版部。

目录

第二十一章　与邓小平对着干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江青盘算着“组阁”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王洪文长沙告状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
王洪文“接班”告吹
“张春桥思想”
“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周恩来反击张春桥
康生也来个“反戈一击”
张天民告“老娘”“刁状”
突然发动“评《水浒》”
毛远新当毛泽东的联络员
王洪文花天酒地回上海
“旧居”·“圣地”·大事记
王洪文重逢“小兄弟”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二十二章　“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
王洪文从上海飞回钓鱼台
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
“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
“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借《园丁之歌》批华国锋
江青高举“批邓”大旗
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
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
丙辰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斥“秃子”》怒斥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
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副主席王洪文成了公子哥儿
“四人帮”再揪“走资派”
“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第二十三章　末日的疯狂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四人帮”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
江青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狄克”穷途末路
第二十四章　抓捕“四人帮”
以“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
9月11日：华国锋找李先念密商
9月13日：李先念突访叶剑英
叶剑英眼中的华国锋
“四人帮”暗中调兵遣将
9月21日：叶剑英看望华国锋
9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
10月2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
10月3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10月4日：事态严重化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10月6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
张春桥第一个落网
王洪文被捕时挣扎了一下
姚文元束手就擒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将军说出“拘江”内幕
吴德回忆粉碎“四人帮”的内情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邓小平说“可以安度晚年了”
郭沫若欢呼“大快人心事”
“四人帮”的“地下生活”
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
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
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
“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第二十五章　押上历史审判台
原本是由王芳审江青
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江青在宣判时的闹剧
唐纳的后来
徐明清为江青吃冤枉官司

刘志坚和秦桂贞“翻身”
江青的铁窗生涯
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王洪文死于肝病
张春桥的狱中生活
江青以自杀告终
姚文元刑满出狱
张春桥因癌症病故
姚文元的离去
附录
一　江青著作及报道目录
二　张春桥著作目录
三　姚文元著作目录
四　王洪文著作目录
返回总目录

第二十一章　与邓小平对着干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1)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2)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image]

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1974年4月10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

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1974年3月27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3)：

江青：

>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4)

[image]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握手。中为邓小平。（杜修贤　摄）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一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1974年6月15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7月5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1974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

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1988年1月自述：

> 说起来话长，那是50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
>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
>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
>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
>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
>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
>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

纪登奎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据陈冀德回忆(5)，“萧木告诉我，毛主席提醒王、张、江、姚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姚文元就主动搬出钓鱼台了。”

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每当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3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6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一共住了114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名做了许多文章。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咯咯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10月4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当天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王洪文长沙告状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毛泽东这一句话，引起“四人帮”的震惊。

幸亏，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这位年迈的主席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救。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10月18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四人帮”感到紧张：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10月17日深夜，钓鱼台17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提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毕竟王洪文太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他蒙在鼓里，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9时起飞，下午2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1980年11月24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 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钓鱼台17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

毛泽东的态度，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还给江青以书面批示，要求她“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6)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1974年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17号楼，江青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17日发起挑战，在18日、20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就在这时候，江青遭到又一次打击：

钓鱼台18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单调的墙面有了清新高雅的点缀，显得生动活泼多了。江青经常出入18号楼，那些大幅山水画和精致的花鸟小品，江青不会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赏心悦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这幅画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江青的举动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18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78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1005元的制作费。因为影展除了有一笔门票收入外，各报刊都要选用照片，还要支付作者稿费，所以江青完全可以用这几笔收入支付照片制作费。可是摄影师将照片送给江青才知道，放大照片是为了取而代之18号楼的国画。这种别出心裁的展览欲，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这席话符合江青的个性。她就是借反对墨守成规，使得文艺界百花凋零，文艺家纷纷倒台。如今她又反对国家级宾馆的“墨守成规”。

她的13张20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三天，就神出鬼没地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已经原封不动地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胆战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10号楼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处来人，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她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的风度。

> 江青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反对她的人，这次怎么变了？大家议论纷纷，这事情变化得太蹊跷，除非毛泽东才能制止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效阻止江青无限扩大的欲望。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气得训她：你有什么权力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统统取下来！
>
> 江青毕竟是江青，没有几天，她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一千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一堆焦黑的废纸，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照片已经化为灰烬。(7)

尽管这只是小事一桩，却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江青那膨胀的权欲的强烈反感。

此后不久，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只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并转达要王洪文当副委员长的提议。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同时，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了那著名的“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的批示。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写这一批示时，正值他在侧。毛泽东写到“至嘱”之后，搁笔问汪东兴，对江青还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答道：“她没有自知之明。”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加上那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表面上是“检讨”、实际上是要官的那封信。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

江青：

>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1974年11月20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才前往京城。李固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1964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11月12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前面提到的分量颇重的批示。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
> ……
>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1974.11.19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像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1974年12月23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8)。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獗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24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6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自从7月17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

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周恩来重病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25日返回北京。

25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蜡梅和纯白茶花。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哦，12月26日——毛泽东81岁寿辰！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毛泽东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26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

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1975年2月18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概括为“三项指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12月23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12月24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毛泽东极度不悦。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像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灯下，王洪文提起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主席：

>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
>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
>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

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7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王洪文“接班”告吹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1975年1月5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给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1月13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是历届人大会议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1月9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拒绝。

王洪文忍气吞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达21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里呱啦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转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像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1975年2月20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江青同志：

> 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

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

2.20

[image]
王洪文写信提醒江青不要给人以“上海帮”的印象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114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1975年5月3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说起不久前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认为文章中的反经验主义的提法不妥。毛泽东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

接着，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1975年5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

>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
>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日）两次大会（指1974年1月24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

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张春桥思想”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114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2月11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

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1975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5年春，在公开报刊上已经多年未发表署名文章的张春桥、姚文元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1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姚的文章，是由毛泽东的一段话引起的。

如前所述，在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谈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后，又谈了另一个问题，即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这话，是指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经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接着对周恩来、王洪文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9)

这就是说，毛泽东出了题目，要张春桥、姚文元做文章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先是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经毛泽东圈阅，于1975年2月18日发出。这一通知，向全党公布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既然毛泽东指示"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张春桥、姚文元就组织班子，编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阅。

说实在的，自从陈伯达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论天才的几段语录》遭到毛泽东痛斥之后，谁都不敢编什么语录了。这一回，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张春桥、姚文元编语录，他们这才编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经毛泽东同意，在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发表。

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毛泽东的授命，使张、姚得以重操旧业，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指示作了解释。

张春桥非常露骨地向周恩来发起挑战，针对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道："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对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张春桥在讲话中，强调了"反对经验主义"。张春桥引用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毛泽东那次讲话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把毛泽东1958年8月15日的讲话搬来，应用在当前，作为反对经验主义的理论依据：

>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
>
> 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
>
> 主席写于1958年8月15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第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在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
>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
>
> 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
> 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
>
> 下面一段话很重要。

>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
> 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
>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
>
> 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

张春桥还说：

> 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而身为中国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此前在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导演着幕前的一切舆论风浪：

1972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8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1973年8月10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1973年12月28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1974年2月28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1975年1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1975年2月28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间，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三年多，“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

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于1973年搬进这个大院。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

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锯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上，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汀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200元，一个冬天要花2.8万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于北京八中全校2000多名师生花的取暖费的4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姚文元文章的“主题”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的文章，除了逐段解释毛泽东的一系列关于“工资制度不平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最新指示”之外，主要便是重弹他1958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旗帜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

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张春桥指出：

>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像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在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值得在这里提一笔的是，在陈伯达晚年，笔者曾多次在北京访问他。陈伯达曾这么谈及张春桥和张春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陈伯达说道：

> 至于张春桥"能写几篇文章"这事，我不知道他写过一些什么。我看的东西之少，这也是一证。据我所知，林彪在九大念的"政治报告"，是他写作有份的。我被"四人帮"押在监狱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横贯第一版的大篇文章，题目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没有细读，似乎其中点了刘少奇同志和我的名字。这是我知道张春桥"能写文章"的唯一的、独立署名的一篇。当然，文章不在多少，有"好"的一篇，也就可独树一帜，独立千古。唐朝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不是到现在还可吸引人一看吗？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

陈伯达虽然与张春桥同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但是陈伯达对张春桥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真妙，这家创办于1973年9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旦大学学报"。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已作出的理论上的"重大发现"。

1975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宣传劲头真大。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

表了15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价”。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从不收购“牛皮”。虽然氽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分。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笞，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分挤得一干二净。

“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

1975年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
>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然而，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正在他们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以“大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全中国的时候，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使刚刚掀起的“张姚热”迅速降温。

事情的转折是这样发生的：邓小平注意到江青等人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一新动向。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金日成，邓小平在座。邓小平借用这一机会，向毛泽东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讯号，从毛泽东那里发出。

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定，报送毛泽东。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示：

>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
>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
> 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
>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

毛泽东所说的“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人们并不健忘，在近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抨击陈伯达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中，有着非常相似的话：“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那时候，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的倒台。

如今，毛泽东又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这不能不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陈伯达的覆辙，成为“陈伯达第二”！

根据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在从长沙回到北京之后，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这是他离京休养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

会议在毛泽东中南海住处召开。知道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后，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不仅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张春桥，而且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是会议记录原文。可能由于记录速度跟不上毛泽东讲话速度，有些地方显得前后文不接，或者断句，均照录原文。

毛泽东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员们寒暄。毛泽东照例保持着他那不时出语幽默的风格。

毛泽东一进来，第一个是与周恩来握手：“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过。”

毛泽东跟叶剑英握手时，说了句：“喔，老帅！”

毛泽东跟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句：“小平呀！”

毛泽东跟吴德握手时，说了句：“哦，吴德有德呀！”

毛泽东跟谢静宜握手时，话说得最多：“小谢，你当了大官啦，不谨慎呀！”

显然，毛泽东对谢静宜紧跟江青，早有所闻。

谢静宜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到北京大学“支左”，“当了大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谢静宜连忙回答说：“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却越当越大。”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谢静宜说：“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江青来到会场时，比别人稍晚。她进来时，见毛泽东正在跟别人打招呼，她就在一旁坐下。

在经过一阵子寒暄之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言归正传，进入会议主题。会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毛泽东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我在外面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紧接着说的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召集会议的目的：“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我给文元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说“对不起春桥”，这话有两层含义：

张春桥文章，毛泽东“只听了一遍”，没有看出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张春桥的文章，毕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表的，如今发现问题，毛泽东当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说“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发现的问题，那就是“讲经验主义的问题”，亦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以为，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就新华社的请示报告，“我给文元写了”——也就是4月23日的那段批示。

毛泽东接着说：“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

条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上海机床厂是上海的“样板”，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样板”，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样板”。

毛泽东批评上海机床厂，等于批评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又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批评教条主义：“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回过头来批评“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接着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说：“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们两个是知识分子，你们自己也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在“文革”中盛传的“最高指示”“老九不能走”，就“出典”于此。后来，邓小平曾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江青反而说邓小平“造

谣”。其实，毛泽东确实说过这话。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插话问道：“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的这一句插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面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路线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又针对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提到“帮”，不言而喻，指的是“上海帮”、“四人帮”。他明确地说“不要搞什么帮”。

毛泽东由“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说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湖南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随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从“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弃疾《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背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背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夸叶剑英说：“此人有文化。”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笑风生，但是，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千钧。当年，他一篇2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700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他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在“炮打”林彪的时候，也是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紧紧抓住机会，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强大东风”，

从1975年4月27日起，一连主持召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5月8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周恩来反击张春桥

这时候，周恩来“主动出击”，在5月21日写了一封致王洪文转政治局传阅后给毛泽东的信。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虽然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但是实际上是张春桥提出来的！

周恩来的这封信，击中了张春桥的要害。

当时，王洪文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出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并不是出在张春桥的文章中。王洪文此言，是为张春桥遮掩——因为姚文元的文章是明摆着的，赖不掉的，就把责任推到姚文元头上。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实际上，“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是张春桥在1975年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上提出来的，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这个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的讨论情况中也可看出来。

周恩来的这封信在政治局传阅时，传阅到邓小平。邓小平在信上加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江青也说过。

周恩来的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加了一行批注：“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这封信在政治局经过传阅之后，又退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到张春桥写的批注，十分气愤。5月27日清早5时，周恩来给张春桥直接写了一封信，展开正面交锋。

周恩来尖锐指出：“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我这段回忆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

[image]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信，直逼张春桥，使张春桥无法躲闪。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写道：“不再改了。”

就这样，周恩来这封信，报到了毛泽东那里。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无可奈何，只得一一作检查。

张春桥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圈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image]

张春桥阳奉阴违写下不搞“四人帮”的话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1975年6月28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
>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年6月28日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至于王洪文，早在1974年12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如履薄冰，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她们一谈。

康生也来个“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77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前文说过，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垂危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24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image]
康生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30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江青的叛变情况，在30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10)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患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前文说过，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清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清的引见，蓝苹才受到红军驻西安联络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清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但是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

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在1975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值得提到的是，“叛徒”这一罪名，是“文革”期间整人的“杀手锏”。康生临终前向毛泽东爆料“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康生本人在生前也颇受“叛徒”罪名之扰。

揭发康生是“叛徒”者，是卢福坦，此人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迅即叛变，并成为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11)：

> 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
>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

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曾经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待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据称，在康生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之后，79岁的卢福坦是用酒灌醉之后被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执行死刑。

康生究竟是不是叛徒，如同他所“揭发”的江青、张春桥是不是叛徒一样，后来并无定论。但是康生亲自下令秘密处死卢福坦，这表明年已79岁的卢福坦如果不死，在康生看来，确实构成了对他的巨大威胁。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以后，一年多来，中央纪委做了大量工作，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现在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人的《悼词》，并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关于康生1930年前后在上海秘密工作期间，有被捕和出卖同志的嫌疑，但是由于很多历史档案，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康生个人历史的有关档案，被他们一伙所破坏，有关人员大都下落不明或死亡，海外书刊材料又无法查证，因此，这些问题还不能做出结论。

张天民告“老娘”“刁状”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2)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13)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7月18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1969年6月9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7月21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7月25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7月27日以中共中央（1975）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
> 毛泽东
>
>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1975年2月10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
>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1975年9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46岁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1975年9月14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突然发动“评《水浒》”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1975年5月26日，一个44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荻。笔者在1990年6月22日在北京与芦荻作了长谈。据她说，她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荻。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image]
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叶永烈　摄）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个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他长谈。

1975年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谈起《水浒》的(14)：

>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

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荻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15)：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image] [image]

芦荻回忆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原委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

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8月14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
>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
>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
>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
>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16)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17)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干什么呢？

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阻止了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呢？

吴冷西曾回忆了内中曲折的一幕：

> 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
>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18)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image]

姚文元亲自修改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毛远新当毛泽东的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摩，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摩对了，那揣摩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话记录》，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非正式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入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101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话记录》，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记录》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待，说得十分清楚：

>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
>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
>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

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王洪文花天酒地回上海

1975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他，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

"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一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

[image]

王洪文在中南海骑着玩的摩托车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20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
>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100多天之内，看了80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筐浮在水面，筐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橘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
>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image]

王洪文在中南海打鸟用的猎枪

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环，悠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
>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20只，王仅选去2只，耗费国家资金1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7个工厂、一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1000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1600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旧居”·“圣地”·大事记

1975年9月30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image]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办公室被他的“小兄弟”作为“圣地”保存下来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

> 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
> 1975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

> 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

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

> 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
> 1974年1月9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12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19)
>
> 1975年8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10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20)，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21)，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200处却一声不响。还提出1966年6月19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1967年1月29日改为1966年11月4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
>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

> 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这份大事记经王洪文审定，曾打印过。后来为了“保密”，又一一收回，销毁，只剩下两本。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之后，王洪文的亲信曾打算把那两本大事记“塞进铁管，两头焊死，埋到地板下或黄浦江防汛墙内，永久保存”。

本书作者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终于见到了这藏之密室的大事记。王洪文精心炮制的大事记，成了作者写作《“四人帮”兴亡》时的重要采访线索和参考资料。

王洪文重逢“小兄弟”

在上海“调查研究”的一百多天，朝朝夕夕，王洪文和“小兄弟”们“酒肉穿肠过”，喜相聚，庆高升。

鸟枪换炮。今日的“小兄弟”们，来来去去，轿车进，轿车出，个个都成了“领导干部”。

当年，在“安亭事件”“胜利”之际，王洪文已夸下海口：“我当上市长，你们也弄个‘长’当当！”如今，王洪文成了党的副主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小兄弟”们怎不攀着高枝儿向上爬！

就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就叮嘱过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

1973年10月，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上海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开办了。这个学习班，是为了向中央“输送”干部而准备的。

1974年3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嘱她：“上海要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小兄弟”们当然很起劲。王洪文说是要20名，而上海市委组织部在1974年4月底上报给王洪文的中央各部长备选名单上，开列着88名！

1974年10月，王洪文明确地告诉上海：“要准备把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

于是，一张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拟订的名单，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上报王洪文了。

在这张名单中，内定了“上海牌”的部长或副部长的人员：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陈佩珍去商业部，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东亭去邮电部，沈鸿、张秀清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那个陈阿大，不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届人大代表，以至成为四届人大常委。不过，陈阿大讲究“实惠”，他伸手夺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调配大权，当上“房总统”。

自从陈阿大当上“房总统”，“小兄弟”们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这位“房总统”不断地批条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园洋房，批给“小兄弟”们。

那些花园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资本家，也有的是“走资派”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对象。赶走了他们，“小兄弟”们便成了花园洋房的新主人。

关于“房总统”本人，那就甭说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后来迁入瑞华公园，又调到新康花园，霸占了23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

他跟纺织局的某人打了个招呼，他的妻子便入党了，成为上海一家棉纺针织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

王洪文也不忘拉那些摔了跟头的“小兄弟”一把。当年，他的“副司令”潘国平，能言善辩，冲杀在前，在上海的“知名度”曾远远超过王洪文。一度，人们只知“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有个“王司令”。

潘国平曾出尽风头：带头冲上北站列车；在安亭出面与张春桥谈判；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际，担任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的执行主席……

用当年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潘国平属于“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寻花问柳，蹂躏妇女；他成为打、砸、抢的先锋；在经济上，他也不干不净……

从1968年踏平“联司”之后，潘国平下台了。他被“下放”，回到原单位——上海玻璃机械厂劳动，从此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造反司令”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造反副司令”却重新成为普通工人，“反差”未免太大了！

倒是张春桥提醒了王洪文：“‘工总司’发起时的常委，现在还剩几个？连毛主席都下令查一查，‘长征老马还有几匹’？你要注意保护老造反。要不，人家会说你这个‘司令’下边，怎么尽是乌龟王八蛋。否定了他们，连你这光杆司令也迟早保不住！”

王洪文连声称是。他佩服张春桥看问题总是高人一筹。

1972年底，张春桥趁着回上海，突然在康平路小礼堂召见潘国平和几位“工总司”的老造反。

张春桥的几句话，使潘国平受宠若惊：“小潘，你知道吗，主席还一直记得你小潘呢，前不久还跟我提起你！我和洪文同志，对你总是抱着希望。”

张春桥夸奖几句潘国平之后，开始“指点”他：“小潘，你别想来想去就是个谭元元（潘国平千方百计追求的女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引者注），你要想想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你要向洪文同志学习。路线斗争一次又一次，还会不断地来的。第十次，第二十次，第三十次，都会

来的。主席不是说过，七八年要来一次吗？你小潘年纪轻，起码还可以活50年，经历十次路线斗争，你要想得远一点，看得远一点。”

张春桥鼓励潘国平道：“你犯了错误，只要你把尾巴夹起来做人，那就行啦！谁不犯错误？就拿马老来说，他很有体会。他对我讲起过，在1965年以前，他是不大学习的。在1965年，全国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他看了一点书。但是，真正认真开始学习，是在他犯了错误以后。犯了错误，才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张春桥还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初中文化水平，看不懂书。其实，初中水平不算低，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当然，初中水平也不算高。字是可以认识的嘛，不认识的还可以查查字典。洪文同志的文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很注意学习。”

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关心下，潘国平在1973年4月，结束了“下放劳动”，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当起常委来了。

1974年1月17日下午4时半，姚文元趁回沪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们。以下是当时的记录中涉及潘国平的部分：

姚文元：小潘同志最近还好吗？

潘国平：还好。

马天水：胖了一点。

潘国平：胖是胖了一点，腰不大好。

姚文元：你的学习怎么样？

潘国平：我学得不好。我是想学一点的。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总是关心的。最近，报上在批孔。我在加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姚文元：小潘，你要争气呀！你是老造反，你一定要争气！你有三十岁了吗？

潘国平：虚龄二十九。

姚文元：你以后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你一定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潘国平：我记住了。

张春桥的接见，姚文元的接见，使潘国平又“抖擞”起来。不过，此人如同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居然又干起偷鸡摸狗的事。他并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对这位“副主席”说了许多不逊之词：“王洪文算什么！

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

这些话，很快就有“小兄弟”向王洪文报告。潘国平攻击“中央领导”，这还得了！于是，当王洪文回上海“调查研究”时，对潘国平问题作了“指示”。

以下是1975年10月16日叶昌明关于潘国平的审查报告的原文：

天水同志：

> 送上洪文同志对潘国平问题的两次指示，请阅。关于我和沈涵同志报告中提出拟对潘作留置审查一事，我又请小廖同志（即廖祖康——引者注）向洪文同志请示，据小廖昨天下午电告洪文同志的意见，对潘要批判从严。可把潘的材料整理一下，向常委介绍一下。批判先在常委中进行，以后再扩大。对潘的问题的材料，虽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可能有些部分或有不确实的地方。为防止被动，所以对潘的批判从严，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指不要在民兵指挥部留置）。小廖向洪文同志请示可否采取把潘留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便于他一面交待问题，一面学习，洪文同志同意这个意见。
>
> 根据这些精神，今天下午，我又找部分总工会常委研究了实施办法，经大家讨论提出下列意见：
>
> （1）先在部分常委的小范围内与潘接触二、三次，追查他的问题，要潘老实交待自己所有的问题。拟在下星期二（21日）上午开始与潘接触，一星期内告一段落。
>
> （2）再下星期起在全体总工会常委范围内对潘进行批判。也批二、三次。潘有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此处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王洪文），不在这个范围内批判，以免扩散。
>
> （3）与潘开始接触后，即把潘留宿在总工会。允许他自己去食堂吃饭，不允许外出，请民兵指挥部派七同志分三班看护（不以民兵名义），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材料，并去潘家，在他老婆在场下作适当的检查，获取有关材料。
>
> 待对潘的审查结束时，再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市委审批，特此报告。如有不当请批示。

马天水看毕叶昌明的报告，在上面写了批示：“请秀珍同志审阅。”

王秀珍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儿，算是“圈阅”。

看在当年“副司令”的面上，潘国平还是被保下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对潘国平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说：

“小潘，我们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一直劝你。直到现在，我对你还抱有希望。

“你过去没有受过严格的无产阶级教育。就是在部队里两年，也是不怎么样。这次大浪潮把你推到前面，但你没有懂得什么叫革命，就觉得了不起了。想想在安亭的时候，你是‘工总司’的首席代表，来跟我谈判的。当初造反的时候，在‘工总司’创立的时候，你是有功劳的。这跟陈独秀一样，主席说在写党史的时候，还得把他写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尊重历史的。希望小潘也能自重，爱护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也恨铁不成钢似的说了一番话：

“小潘，你的坏习气太深了！你的旧的习性，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春桥同志的讲话，我是同意的。

“小潘，我们是把你当作体现政策的人。对于你自己来说，还有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却常常发生。”

张春桥意犹未尽，补充道：

“在‘文革’初期，那些围攻‘工总司’的人，总是集中力量攻击你们两个司令，说潘国平是阿飞，王洪文是坏人。当时，我曾一再为你们辩护过。现在，洪文同志很争气，成了党的副主席，没有谁再敢对他说三道四。你潘国平要争一口气！你的堕落，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也影响‘工总司’的声誉，甚至影响洪文同志的声誉！”

又是“批判”，又是劝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潘国平真的是“仁至义尽”！保这个“副司令”，也就是保“工总司”的声誉，保王洪文的声誉。

对于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王洪文本来就恨透了他。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曾设下圈套，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抓捕了耿金章，在杨浦区公安分局关了两个多月。张春桥下令释放耿金章，王洪文这才不得不把耿金章放掉。耿金章在砸“联司”时出过力，一度与王洪文的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耿金章稍稍恢复元气，又要与王洪文为敌。于是，王洪文第二回定计捉耿金章。那是1967年秋，忽然来了两辆大卡车，坐满了“工总司”造反队员，前来接耿金章，说是“工总司”要成立党支部，王洪文要

他去开会。会议地点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

就在这时，王承龙打电话密告耿金章：王洪文要抓你！

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处长，也把紧急情况报告了张春桥。

当耿金章来到会场，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电话，不许他动手。耿金章在那个处长保护下，从后门出走。

不久，耿金章又一次被王洪文派人绑架，抓到浦东去了。消息传出，耿金章那“二兵团”的常委范建华坐小轿车赶去，说是“市革委”要开紧急会议，耿是委员，务必出席，这才把耿拉上小轿车溜走。耿金章躲到上海漕河泾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里，伪装成病人，这才把王洪文派来追捕他的人甩掉了。

王洪文三抓耿金章的消息，传入张春桥耳中。张春桥劝王洪文对耿金章实行怀柔政策，给他一官半职，不要弄得太僵。

王洪文听从了张春桥的意见。于是，从1968年11月起，耿金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科技组里弄到一官半职。

耿金章对王洪文毕竟耿耿于怀。到了1971年5月，王洪文把耿金章“下放劳动”，让他回上海纸浆厂去。

1973年初，在落实“老造反”政策时，张春桥说了一番话：“耿金章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主要是犯了像王明、陈独秀那样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这几年，他通过劳动、学习，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他属于‘知名人士’，不用不行。……”

好在王洪文已在中央立足，小小的耿金章再也构不成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于是，给了耿金章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的头衔。

这时的耿金章，早已失去当年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的那股犟劲儿。

1973年4月23日，耿金章给王洪文、王秀珍写了一封充满忏悔之意的信：

洪文、秀珍二同志：

> 你们好。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
> 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

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　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11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11月2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82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1975年11月2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即11月1日——引者注）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
>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
>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1932年。1968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8341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1937年。1953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23)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1975年12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张春桥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

---

(1) 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2页。

(2) 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3、1674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5) 陈冀德：《生逢其时》，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7) 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3页。

(8)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9) 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3—1714页。

(1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11) 据王学亮：《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令》，《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

(12) 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13) 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14) 1990年6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芦荻。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458页。

(16) 姚文元：《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载《上海文学》1961年第11期。

(17) 姚文元：《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见《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8) 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19) 1974年12月9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20) 大事记初稿于1975年11月4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11月5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

(21) 即1975年11月6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

(22) 指王洪文1966年11月应王秀珍之邀去上海国棉三十厂介绍赴京串联情况。

(2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1983年1月5日。

第二十二章　“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

王洪文从上海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像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1975年9月18日晚10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1975年9月18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露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9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11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忡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

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肓。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起住进了305医院。这是一所位于北京北海公园西墙外养蜂夹道的新建小型医院。这家医院属于部队编制，按编制序列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305医院在1973年底完成主体结构，1974年春装修待用。

305医院底楼主要作为中央领导人治病、住院之用。底楼设有病房以及办公室、会见外宾的大厅。周恩来住进305医院之后，在那里办公，并多次接见外宾。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305医院写下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 今年开会（指四届人大——引者注）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引者注）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305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55年光荣历史、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305医院手术室。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在305医院共经受了大小手术13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100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

接见外宾63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17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20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20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7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北京305医院病故。这位78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像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据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
>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image]
周恩来去世（杜修贤　摄）

张耀祠也对笔者回忆说：

> 总理去世的消息，是我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听后，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等了许久，我见主席轻轻地朝我挥一挥手，赶紧退了出去……(1)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是否需要出席？由谁来致悼词？姚文元曾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这“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没有出席。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去世不久，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萧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萧木，1961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写过多部小说。在“文革”中，徐景贤向王洪文介绍了萧木(2)：“这是萧木同志，工人作家，曾做过铁路工人。”这“工人作家”身份很是受王洪文看重，而王洪文身边正缺“秀才”，后来就被调到王洪文那里工作。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萧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1976年1月23日、1月28日、2月4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1976年1月31日。

萧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2月3日——正月初四，萧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

[image]
毛泽东与华国锋（杜修贤　摄）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
>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又一名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
>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
>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指周恩来年龄大了——引者注）。
>
>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

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指周恩来去世——引者注），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他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

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赵紫阳、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他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

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

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阴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34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土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image]

华国锋与夫人在中南海划船（杜修贤　摄）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

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的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1971年，华国锋调入国务院工作。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但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就在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
>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橘子也是皮厚、不甜。
>
>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
>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
>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
>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竿，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
>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

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12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3)，连他也摇头：

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嘭、嘭、嘭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像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恣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真是历史的巧合，197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image]

张春桥“1976年2月3日有感”手迹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1976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76年2月3日有感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趁着大字标语糨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其实，张春桥这么“强烈”地“要求当总理”，是有“充足”的理由的。

曾经有人传说，华国锋当总理是毛远新推荐的。

据担任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说(4)，他在2009年曾经打电话给毛远新

询问此事，毛远新说这是瞎编的。毛远新说："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

但是，毛远新提到了张春桥。他说："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主席曾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这样认为，但我说不足的是他不能团结干部，城府太深，有点儿阴。当时主席在几个副总理中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了华国锋。"

毛远新还说，"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

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达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5)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

等等。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1976年3月2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

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一开头，就说邓小平“斗”她，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都睡了。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望同志们。……
>
>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
>
>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
>
> 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还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

江青接着谈到了文艺问题：

> 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呵，多了，你们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
>
> 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
>
> 连《创业》也是他授意的，作者那封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得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指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
>
> 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

员都要去看《海霞》。

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泳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骊、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结果失败了三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24本，看多少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讲话，那我保留评论权。

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还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部电影，谁敢批呀！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

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

江青接着讲到了她和邓小平在政治局内的斗争，自称是“过了河的卒子”，要吃掉邓小平这个“反革命老帅”：

4月开始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指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

5月3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

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是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要首先打我。

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4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了。他还不甘心，还要弄。

主席在5月3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邓小平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他也不提。主席说不要搞广东帮、四川帮、上海帮，结果他只提上海帮。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江青甩出了手中的"王牌"——毛泽东。她哭着说，邓小平"欺负主席"：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

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个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想拿出去，我写了一个报告给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呵！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邓小平不仅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案都要翻。完全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暴露得比林彪还快。……

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残忍呵！法西斯呵！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像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呵。

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的保护呵！

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不说了。（抽泣、哽咽）同志们哪，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是觉得应该想一想呵！

江青居然骂起邓小平是“大汉奸”来了，而且说自己准备“杀头，坐牢”：

>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
> 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头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
>
> ……
>
>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我想在座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
>
> 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
>
>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
> 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有的没有谈。
>
>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
>
> 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我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必须要有护士，因为我每天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特别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不需要服务员。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
> 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呵！确实有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

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

江青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红都女皇”：

> 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吕后又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不知道了。”
>
>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也可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给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徒子徒孙们专门攻击这样的人。
>
>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
>
> 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借《园丁之歌》批华国锋

1976年3月2日，江青在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讲话，在直攻邓小平的时候，也拐弯抹角给华国锋一点“颜色”看看。

在会上，江青居然当众点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的名，“批判”《园丁之歌》，甚至追溯到“文革”之初湖南没有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旧事，对他进行了批评。

明眼人谁都知道，华国锋当时身兼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江青批评张平化，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华国锋。

在会上，张平化当场据理反驳，一时间会场上好不“热闹”：

江青：湖南的那个张平化来了没有？

张平化站起身：来了。

江青：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是不是你搞的？

张平化答：是。

江青：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你还说“初烂”（即“初澜”，当时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的笔名，江青手下的笔杆子之一。——引者注）就让他“烂”了吧。你让一个服务员造那样多的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和春桥、会泳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

意见最多、最深刻的是春桥同志。

你是搞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了。后来是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

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太小，不看。……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

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

江青：你是完全搞翻案！

张平化：不是。

江青：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

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

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哩。你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

江青对于张平化，早就看不顺眼。前文已经述及，早在1968年3月30日，江青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代表时，就对张平化说了一段“狠话”。江青说：

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后又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恶劣极了。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

但是毛泽东对张平化仍留有余地，所以在1968年4月6日毛泽东批示说，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不要点名批判张平化。

正是有毛泽东的保护，张平化在1971年被重新起用，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张平化被调回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

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忽然要张平化站起来，要“批判”的是《园丁之歌》，矛头则指向华国锋。

《园丁之歌》这一“公案”，说来话长……

《园丁之歌》是湖南地方戏——湘剧高腔。1972年下半年，已经晋升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湖南省文艺汇演期间看了一批文艺节目，其中的《园丁之歌》、《两张图纸》、《送货路上》反响热烈，给华国锋留下了很深印象。

《园丁之歌》最初是长沙市碧湘街小学创作的，原本是花鼓戏，剧名为《好教师》，经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改名《园丁之

歌》，参加了省文艺汇演。

《园丁之歌》的剧情是这样的：

女教师俞英一心要搞好教育革命。她来到工厂征求如何搞好教育，工人们告诉她，“人从心上育，水往根上浇”，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和孩子们交朋友，和他们交心。男教师方觉对陶利这样出身于工人家庭、调皮贪玩的孩子，不去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而是没收他的小玩具火车，甚至粗暴地不让他进课堂。方觉认为对陶利这样的孩子，不管怎样做都是“挑沙填海空费力”。为此，俞英与方觉之间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俞英对陶利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不但没有没收陶利的玩具小火车，还与他一起修理小玩具火车。她启发陶利，要学会开火车，就必须学习好功课，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俞英耐心的说服教育下，陶利转变了。男教师方觉在工作中感到俞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是正确的，他决心改掉自己简单粗暴的缺点，和俞英一起把孩子们教育好，让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戏剧受舞台限制，影响毕竟有限。华国锋知道，在1965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曾把湖南的两个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拍成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影响。1973年3月，华国锋对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负责电影工作的狄福才，说起了《园丁之歌》等节目，以为也可以拍成电影。

吴德、狄福才很快就落实了华国锋的指示，把拍摄任务交给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影厂组成了以沙丹为导演的摄制组。沙丹在1972年执导过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乐《沙家浜》，对于拍摄舞台剧很有经验。沙丹率摄制组赴湖南，只用了三个多月就完成了《园丁之歌》的拍摄。

那时候，电影在上映之前，要由国务院文化组审查。向来以“文艺革命旗手”自居的江青，常常对电影、戏剧横加干涉。听说《园丁之歌》是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拍摄的，江青更是要看一看。江青当时和张春桥、姚文元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973年7月28日，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的小放映室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审看《园丁之歌》影片，国务院文化组陪同审查。

江青看毕，对《园丁之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首先，江青抨击了《园丁之歌》这一剧名：“《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

接着，江青抓住《园丁之歌》中的一句台词上纲上线：“‘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什么没文化就不能干革命。简直是反攻倒算！”

江青说，影片中的女教师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

奶”，而男教师“活像个油头粉面的二流子”！

从江青如此严厉的抨击，可以看出她对《园丁之歌》全盘否定。

张春桥也说，《园丁之歌》宣扬学生要受教师的摆布，是典型的“师道尊严”。

姚文元则三句不离本行，声称一定要对《园丁之歌》进行“大批判”。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狠批《园丁之歌》，那潜台词就是，你华国锋不懂文化，连这部戏的严重问题都看不出来。

四天之后，江青又对《园丁之歌》说了一番尖刻的话：

> 《园丁之歌》牵涉到教育革命的问题，究竟教师和共产党谁是园丁的问题。戏里的那两个一男一女的教师，到底是什么出身？有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为什么故意隐瞒个人成分？
>
> 培养青少年一代，是靠共产党还是靠教员？你们想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子？是让他们规规矩矩的听教员的话而俯首帖耳？还是让他们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谁说没有文化就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现在是读书无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戏中的主题完全与党中央背道而驰！

不言而喻，影片《园丁之歌》被江青“枪毙”，打入冷宫，再也没有上映的希望。

影片《园丁之歌》在冷宫中待了将近一年，在1974年6月14日忽然获准走出冷宫，在全国上映。

《园丁之歌》怎么又可以上映了呢？那是因为江青在这天指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在上演的同时发表批评文章”。

原来，上映影片《园丁之歌》，是为了“供批判用”！

为什么江青在将近一年之后，又记起影片《园丁之歌》呢？那是因为当时正在全国批判晋剧《三上桃峰》，要把《园丁之歌》也拿出来批判，以表明这样的“黑线回潮”现象不是单一的。

晋剧《三上桃峰》是根据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报道《一匹马》改编，讲“四清”时河北省抚宁县某大队，卖了—匹病马，支书知道后将病马赎回，并用好马支援友队春耕。

1974年1月23日，晋剧《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在北京二七剧场彩排。江青手下的得力干将于会泳审看这一节目，在大幕落下之后一言不发就走出去了。显然这是一个不祥的讯号。

经于会泳向江青汇报之后，把晋剧《三上桃峰》定为“大毒草”：因为《三上桃峰》初名《三下桃园》，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四清”时正是在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尽管《三上桃峰》与王光美毫无关系，却被安上了为“大叛徒刘少奇歌功颂德”的罪名。

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以初澜名义写的《评晋剧〈三上桃峰〉》，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11处之多。姚文元称：“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此文发表之后，全国掀起揭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高潮。

也就在这时，江青决定在全国也掀起批判《园丁之歌》的高潮。

1974年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通知》，通知内容说：“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为批判《园丁之歌》定调。于是全国许多报刊相继群起攻之，发表对《园丁之歌》的批判文章近百篇。

没有想到，《园丁之歌》在遭到如此密集的“大批判”之后，居然有峰回路转之日。

那是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达长沙。81岁的毛泽东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往，所以他声称，这次来湖南是休养。

人在北京的华国锋，关心着毛泽东在湖南的休养。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特地从北京调来一部电视转播车，为“九所”6号楼转播电视节目——那时候中国各电视台还没有卫星电视，所以要靠专门的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转播各地电视节目。

中共湖南省委还为毛泽东提供电影。在1974年11月，毛泽东从省委提供的电影名单中，圈定要看湘剧《园丁之歌》。

毛泽东很高兴看了电影《园丁之歌》。看罢，毛泽东鼓起掌来。当时在场的服务员曾彩谋连忙告诉毛泽东，这是一部正在受批判的片子。毛泽东问着：“受批判？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讲看。”曾彩谋回答说：“听说教育界争论很大，我们是外行，看不懂。”毛泽东肯定地说：“我看这是一出好戏。”

在那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这句“我看这是一出好戏”，一下子使中共湖南省委扬眉吐气，使华国锋笑了。

这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的耳朵。江青没有想到，中共湖南省委居然借助于最高权威毛泽东来“制服”她，非常生气。

有了毛泽东那句“我看这是一出好戏”的“最高指示”，1975年8月29日，湖南省文化局向国务院文化组报送了《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强调指出，“《园丁之歌》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戏”，要求继续上演、放映、出版、发行。

国务院文化组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副组长刘庆棠（江青的干将）大为震怒，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翻案，气势汹汹，最后通牒！”

在江青的支持下，湖南省文化局的《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被压了下来。

也正因为这样，1976年3月2日，江青在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上讲话时，就叫张平化站了起来，当众对《园丁之歌》再度进行“批判”，而且说“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你在那里搞翻案，你就是执行邓小平的那一套。”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园丁之歌》才终于得到平反。

1976年12月6日，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振军同志转平化及省委书记各同志”。他在信中说：转上《解放军报》、《北京日报》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文章，“建议省委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会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大会，省委书记李振军、省文化局长王庆章等十多人先后发了言。最后，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作总结讲话，他说：“‘四人帮’为什么扼杀《园丁之歌》？是为了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到湖南想看湖南地方戏，圈定看《园丁之歌》，看戏中鼓掌，说这是出好戏。今年3月中央‘打招呼’会后，江青又召集十二省市领导开会，点名批评湖南为《园丁之歌》翻案，把状告到毛主席那里了。这就说明她已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戏是好戏，她还要批判。她的矛头是指向谁，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写的文章《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并配发了编者按指出：“‘四人帮’反党集团还利用他们的喉舌‘初澜’评论班子，在1974年8月4日本报抛出的一篇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毒草文章，把《园丁之歌》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肯定了这个戏以后，仍负隅顽抗，封锁消息，继续玩弄诡计。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阴谋篡党夺权的狰狞面目。”

《园丁之歌》公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江青高举“批邓”大旗

[image]
毛泽东批评江青的手稿

江青在1976年3月2日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毛泽东于3月10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尽管毛泽东批评了江青，江青仍我行我素。在3月26日，江青又提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邓”。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如下交待：

审判员：姚文元，上次提的问题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姚文元：这几天我仔细回想了一下，1976年3月26日政治局的确开过一次会，地点好像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内容是听取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人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审判员：会议是谁主持的？

姚文元：是华国锋同志。

审判员：是谁提议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

姚文元：是江青。是她提出来后经主席批准的。

审判员：你事先不知道吗？

姚文元：不知道。就是江青提出要两校来人汇报，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审判员：他们汇报时，你们有插话吗？

姚文元：有。政治局的人都有插话，江青、张春桥讲得最多。

审判员：你有插话吗？

姚文元：我也有插话，但很少。可能在他们讲到邓小平副主席在人大的报告时，我插了一句：那个报告反个人迷信，当时效果也不好。还有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插话，是科学方

面的。

审判员：在这一次会议上你讲没讲过：“社会上的许多谣言都是从政治局传出去的。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这样的话？

姚文元：不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我讲了社会上谣言多，要追查这类的话，但诬蔑邓小平副主席那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江青说的。关于这一点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作证。

审判员：江青还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哦，江青的插话很多，也很杂乱，具体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她和清华、北大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加以发挥。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的讲话你还记得吗？

姚文元：因为都是插话，没有完整的发言，时间又太久了，准确地回忆起来很困难。

审判员：你想起多少讲多少。

姚文元：好。王洪文的插话不多，好像讲了一下1975年给老干部开追悼会太多了，贺龙的追悼会连总理也去了。张春桥的插话比较多，也非常尖刻，主要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批判邓小平副主席。我记得他好像说了邓副主席是“典型的洋奴买办”、“连托洛茨基都不如”这样恶毒的话。别人的情况我也可以说吗？

审判员：可以。

姚文元：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有过一个尖锐的发言，中心论点是邓小平老犯错误老不改，这次搞右倾翻案风，是旧病复发。他还把邓小平副主席1972年写的检讨拿出来，念一句批一句。

审判员：你只交待“四人帮”诬陷邓小平的罪行。

姚文元：好的。在批邓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个是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毛主席过去有个讲话，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后来查到了这段讲话。我把毛主席这段话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把这段话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头上，和党内资产阶级连在一起，这样又强加到一部分老干部头上，所以我发表这段话

是不适当的。

审判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张春桥提出这个问题的？

姚文元：是在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用检讨的口气说：我原来搞不清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看不见资产阶级了。后来毛远新把李先念同志这个发言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主席的这段话经毛远新整理后，也作为“重要指示”公开发表了。

审判员：在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中，你们“四人帮”还有哪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言论？

姚文元：政治局开始批邓时，王、张、江、姚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有一些插话。有一天，毛远新在政治局传达：毛主席说，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我原来想毛主席不点名，我就不发言了。我觉得当时在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之后，假使我在批邓当中发言不恰当，回过头来还是要受批评，担心再犯错误。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毛远新整理“毛主席重要指示”之后，要分批向全国传达，每次来一批省委书记，由华主席给他们传达，讨论两三天就回去。有一次张春桥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书记会上去了？我说，不知道。张春桥说，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那个会上胡讲一通，诬蔑邓小平副主席如何迫害她，打击她，搞得她生病，混不下去等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严厉批评了她。

审判员：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后，你发言了吗？

姚文元：这个，在毛主席点名让我们几个人发言之后，我经过准备，也作了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发言，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说邓副主席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端正，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才会积极支持右倾翻案风；我还说到邓副主席这种思想有历史根源，在“人大”报告中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效果不好等等。我攻击的话还有不少，一时想不完全，我可以再想想，以后想起来再补充交待。

审判员：江青发言了吗？

姚文元：江青也讲了一篇，她的发言是激烈的，说前一时期为什么全国刮右倾翻案风，现在搞清了，风口就是邓小平；她还说为什么去年7、8、9月谣言那么多，现在也查清了，根源就在邓小平，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谣言公司的总经

理。

审判员：你和江青的发言是在什么时候？

姚文元：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在毛主席点名之后不久，是在同一次政治局会上讲的。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也发言了吗？他们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张春桥也讲了一篇，现在记不起具体内容了。王洪文没有系统的发言，他有很多插话，也给毛主席送了好几批材料，如电影《春苗》的材料等等。

审判员：你接着讲吧。

姚文元：批邓刚开始我是没跟上去的，后来却是很积极的。这都是事实。对于我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我都要继续反省。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关于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姚文元从他的视角作了交待。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在1980年8月3日，也作了交待：

1976年3月中旬，江青对我说，她找外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谈过（话），他们反映，清华、北大去参观学习一下效果比较好。江青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都去两校参观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会后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

过一两天，谢静宜打电话给我，说市委通知他们作准备，中央最近要听一次两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的汇报。我对他[她]说，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你们要认真准备一下。

3月下旬一天政治局会上，清华、北大来的几个人对邓小

平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用恶毒的语言进行了诬陷、诽谤。中间江青还作了一些插话，煽风点火，无限上纲。事后，我把这次会议情况报告了主席，我还向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不好，说他一句话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对于列席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迟群、谢静宜，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在1980年8月20日作了如下揭发，从中也可以看出会议的若干情况：

2月6日，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五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同志。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接着狂叫：“宁可掉脑袋也要一斗到底。”

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五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要层层揪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迟、谢公然对抗，叫嚷：“这是与清华唱对台戏！”并于3月22日，在校党委书记碰头会上抛出了“揪一层人”的反动口号。他们说：“搞右倾翻案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和邓小平共鸣的，差不多的闹得凶的有一层人。”“这一层人不是一般的干部。”并扬言“要通过批邓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所谓的批邓其罪恶目的是要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人帮”及毛远新于3月24日晚，秘密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准备到政治局，“面对面批判邓小平”，狂妄叫嚣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谢静宜连夜赶回清华，召集张凤瑞、荣泳霖、夏镇英、周家嵒及党办副主任吴敏生进行部署。

3月25日上午，迟、谢又召集他们几个人，并加上胡健，进一步密谋策划，确定由周家嵒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人插话的内容。迟群鼓动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谁也不要怯阵，发言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迟群还授意“汇报的内容要以对外接待提纲为基础，把接待介绍的第三人称‘他’，一律改为‘你’，‘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他还讲：“汇报时要考虑到还有一层人，要突出揭发、批判、剥画皮，重点是经济问题和经验问题。”迟群还导演说：“主要由你们讲，我们俩见机插话。……”

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及迟、谢一伙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谣言公司总经理”，攻击邓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是“败家子”，“洋奴买办”，“全盘西化”，“转嫁经济危机”！还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

论的报告”，“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放出来向党进攻，使得清华五七年出现了560个右派”；他们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搞复辟倒退”等等，对邓小平同志竭尽诬陷打击之能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

“三·二六”大闹政治局之后，迟、谢一伙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在会上“没怎么发言”，“被动”，别有用心地攻击叶副主席没有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谩骂邓小平同志对他们的这种诽谤攻击不予理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

迟、谢一伙大闹政治局的反革命活动，受到“四人帮”的特别赏识，直到8月26日，江青来清华大学时，还称赞荣泳霖说：“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并要迟群、谢静宜代她向大闹政治局的夏镇英、周家臶问好，鼓励他们继续向党进攻。

1979年12月3日，当年曾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家臶，这样描述他的所见：

1976年3月26日，“四人帮”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同志的情况是这样的：

3月24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我记得当时去的人有张凤瑞、胡健、荣泳霖、夏镇英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在会上，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张凤瑞、胡健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去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作面对面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3月26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

一贯搞复辟倒退，我还把他七五年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说成是“败家子”，是“洋奴买办”，是“转嫁经济危机”。

胡健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把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说成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报告”，“大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全放出来向党疯狂进攻，使得清华大学五七年就冒出了560个右派分子”。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张凤瑞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他把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说成是邓小平同志找人谈话后写的，目的是要打倒江青，否定文艺革命；他还公然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只有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谢静宜在插话时说：“七五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32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两眼，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尖着嗓子喊道：“他们这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翻案的典型！”

在这次会上，“四人帮”也都表现得非常疯狂、恶毒，他们不时插话，攻击谩骂邓小平同志。

张春桥阴森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者，连托洛茨基都不如！”

王洪文说：“邓小平去年6月到上海，私自找马天水谈话，让他有事不要找市委，要直接请示他，搞得我们几个市委书记都不管用了。”

姚文元说："去年主席批给政治局的几条指示，怎么那么快就传出去了？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到底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肆无忌惮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搞得揭发批判的人尴尬。

迟群恼羞成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固对抗！"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在胡健发言的时候，姚文元被值班秘书叫了出去。不一会，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返回来，和王洪文、张春桥低语了一阵，没等胡健讲完，王洪文就急忙宣布散会，让我们先离去，政治局的同志留下有重要事情研究。

于是，迟群、谢静宜就带着我们离开了紫光阁。政治局又研究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得知了。

江青高举起"批邓"大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如此激烈地"批邓"。

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

真的，“凡事有三”。继1967年的“一·二八”、1968年的“四一二”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忍耐了八个春秋，第三回炮打张春桥在1976年春天开始了，到了清明节那天，达到了高潮——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第三回炮打张春桥，不光发生在上海，而是席卷全国，声势浩大。

说实在的，两个“一号文件”上，都没有张春桥的大名，明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要不，为什么一回提名邓小平，一回提名华国锋，偏偏不提似乎注定要当总理的张春桥？

炮口，再次对准了张春桥！

街头流传新编儿歌：

三人十只眼，
阴谋篡大权。
唯恐天下还不乱。
同志们，怎么办？
就是要和他们顶着干，
要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所谓“三人十只眼”，谁都明白：江青、张春桥戴眼镜，两人八只眼，加上姚文元，不就“三人十只眼”了！

另一首新儿歌，也够辣的：

蚍蜉撼大树，
边摇边狂叫：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嗷叫。”

这里的“一张报”，指的便是上海的《文汇报》；“两个校”则是“四人帮”当时的据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常用“梁效”这笔名发表大块文章，攻击周恩来，批评邓小平。至于“几个小丑”，指的便是“四人帮”。

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导火线，就是那“一张报”。

3月5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

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报差不多都在3月5日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3月5日的《文汇报》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于会泳手下那个文化部写作组以“初澜”笔名所写的大块文章。这“初澜”是于会泳挖空心思才想出来的，取义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萍也；青，江青也。“初澜”即“出蓝”的谐音。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据说，因“版面不够”，删去了电讯中周恩来的那四句题词。可是，也就在这个版面上，居然腾出位置，刊登了吹捧毛远新在辽宁“政绩”的两部电影的广告。

3月5日《文汇报》一发行，《文汇报》社不断接到读者质询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三五”事件尚未平息，“三二五”事件又风波迭起。

那是20天后，《文汇报》头版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

文中有一句话，深深激起了读者的震怒。那句话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所谓“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当时对邓小平的“专用代词”，谁都一看就明白的。至于“党内那个走资派”，显而易见，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骂周总理是‘党内走资派’！”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众多的读者反反复复琢磨着《文汇报》头版的那句话。短短几天之内，《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420多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

“《文汇报》如此狗胆包天，后台是张春桥！”本来，愤怒的汽油早已撒遍中国大地，《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事件的火花，点燃起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张春桥的神经，像二胡的弦，一下子拧紧了。

张春桥的眼睛，天天盯着《内参》；张春桥的耳朵，夜夜听着各地爪牙从长途电话中传来的密报。

3月11日，福建省中部并不很出名的三明市，街头突然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作者是三明市农机公司的赵大中。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3月25日晚，南京大学有30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轰动了！

这时候，来往于南京站的一列列火车，成了大学生们刷大字标语最集中的地方。因为火车一开动，刷在车厢上的大字报便成了“流动标语”，北上北京，东进上海沿途点火，全国轰动。

大学生们最得意的一条大字标语，便是：“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驴头”是谁？一想到张春桥那如驴之头，个个哑然失笑。

其实，前文已经说过，姚文元在1976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就有预感：

>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姚文元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
>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
>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
>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
>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
>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姚文元日记中所谓“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这“上海”其实应写作“上海帮”！

3月30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

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3月31日，南京人民对“驴头”指名道姓了。南京市中心一座大楼上，醒目地挂出大字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4月1日，南京铁路中学校园水泥地上，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

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张春桥惶恐不安。他无法稳坐钓鱼台了。姚文元不时从《人民日报》那里，把“炮打”的消息告诉张春桥。张春桥忽地问姚文元：“你读《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

[image]

张春桥与姚文元

姚文元茫然，不知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红楼梦》。

张春桥自己答复了自己的提问：“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罢，一声长叹！

张春桥的话，倒使姚文元记起《红楼梦》中的另一句格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姚文元在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
>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
>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姚文元和王洪文给南京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

于是，南京广为张贴《“四·一”电话通知》。这一电话通知，便是姚文元起草的：

中共中央电报通知

>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

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语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的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1日

不言而喻，所谓“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亦即“炮打张春桥”的文绉绉的代用词。在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紧急局势。

4月2日凌晨，联络员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主席：

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

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4月2日

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炮打之中。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已经横下一条心。

1974年4月20日，张春桥在写信给儿子张旗（小名毛弟）的信中，透露过自己的心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

此后，在姚文元面前，张春桥曾露出一句真言：“爬得高，跌得重哪！”

前两回的炮打，他靠江青、林彪替他解围。这一回，怎么办呢？

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

4月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
>
>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就在姚文元希冀“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尚未扑灭，蓦地，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烈火升腾，在丙辰年清明节总爆发了。

红色的广场，英雄的广场。1919年5月4日，3000多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聚集，燃起了五四运动革命烈火。如今，四五运动又在这里爆发！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五，阳历4月4日，正值星期天，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达200万人次！一个又一个白色花圈，郑重地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无限哀思，一片深情，献给离世三个月的周恩来总理。据统计，从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花圈，至4月4日深夜，共有1400多个单位献上了2073个花圈！

银花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诗如潮，歌似海。这一回，人们用一首首诗歌发出了心底的吼声，作为一发发炮弹，射向江、张、姚（当时王洪文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一首《读3月25日〈文汇报〉有感》，斥责张春桥为“伪君子，卖国贼”：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卖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对！

令人捧腹的是一张题为《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的大字报，署名“赤脚医生”。人们拥着挤着，围在大字报前。于是，不得不由一个小伙子高声朗读。一边读，人群中一边发出轻蔑的哄笑声：

给《文汇报》开的诊断书

《文汇报》负责人：

读贵报3月25日奇闻，真为你的身体担心，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哦，原来发了高烧，发烧引起神经错乱。建议赶紧治疗，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治疗方法：

一、把你们的意图写到题目里去，大张旗鼓地讲嘛！古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死到临头便发狂。可以再发表令人一目了然的文章。那时人们的眼睛就会闪光——红光。同时你们的眼睛也会闪光——绿光。这样会收效如神。除不如仙人之外，自然病除。以为上策。

二、停刊万年吧。大为遗憾，不能除根，引为下策也。

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见笑，见笑。

赤脚医生

思念总理，总是伴随着斥责奸佞之辈。一首《斩河妖》，锋芒直逼江、张、姚：

斩河妖

读3月25日《文汇报》翻案奇文，怒火满腔，挥笔疾诗。

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
浦江摇桥闪鬼影，誓斩河妖红霞现。

诗中“浦江摇桥”，指的便是“江”青、“摇”文元和张春“桥”。

悼总理，斥妖魔。人们用诗痛斥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又有诗道：

前番悼念，又哄又压。
今朝扫墓，变本加厉。
言称四旧，用心毒辣。

还有的诗，诅咒姚文元道：“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他死定无花！”

更有“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从南京传至北京，痛快淋漓地斥骂江青和张春桥：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蜮，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江青笔名“李进”的谐音——引者注），
化名蒋亲（江青的谐音——引者注），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妖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她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春桥”谐音——引者注），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除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16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竿、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庇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image]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山，人潮如海。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丙辰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4月4日——星期日的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主持者是华国锋。谁都心中明白，要对正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摊牌。

华国锋两道浓眉仿佛拧在一起。往日，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大开腔。眼下，他是代总理兼公安部长，是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工作，把他推到第一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无法再保持“中立”。

1976年2月25日，在党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作了一次表态：“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会议开始不久，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报告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姚文元的秘书匆匆进来，递给姚文元一张纸条。姚文元看了一下，马上就说话了：“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来念一份大字报。这是刚刚在纪念碑前贴出来的，许多人围在那里看。《人民日报》记者也在现场，抄了下来，打电话传录，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标题叫《大事记》……”

姚文元念起了《大事记》：

> 一、1974年1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
> 二、1974年2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污蔑文化大革命，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
> 三、1975年1月，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
> 四、1975年7月，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民心大快。

1976年4月4日

江青听罢，拍案而起，像扫机关枪似的，冲着华国锋说道："这种大字报，贴在天安门，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你管不管？中央的人身安全还有没有保证？是谁把党内的机密，泄露出去，要不要查？写大字报的人，要不要抓？天安门广场闹得这个样子，你这个代总理、公安部部长，还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去找主席去！"

江青从姚文元手中，夺走那张《大事记》，站起来要走。

华国锋连忙请这位"第一夫人"坐下来。

江青气鼓鼓地坐下，朝毛远新说道："远新，你好好记一记，回去向主席汇报。尤其是华代总理的话，你一句一句都要记清楚！"

华国锋一脸尴尬地坐着。

姚文元这么一煽，江青这么一问，"军师"在节骨眼儿上说话了。张春桥的话不多，他的一句却起码顶江青十句。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天安门闹事，使我想起了20年前的匈牙利，想起了那个纳吉。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给赶下了台。他在1956年就煽动闹事，发动叛乱，当上总理。我看，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中国的纳吉！"

王洪文马上附和道："春桥同志说得对。天安门闹事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刚才文元同志念的大字报上，那些家伙不是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锋同志，政治局该对天安门闹事采取强硬措施了......"

华国锋终于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以下是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抄自毛远新的记录本，文中的错别字是毛远新记录中原有的：

> 华（国锋）：
>
> 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
>
> 很严重，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
> 吴德：
>
> 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二千零七十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3号五百零七个单位送八百多个，4号四百二十个单位送四百五十个，大的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
> 3号有二十万人，4号有七八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去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有的煽动、讲演，反动的实质很清楚。

诗词、悼词、小字报，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是一样的。

1.采取的措施：

1）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人员被打。

2）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

看热闹的人是多的。有的坏人来送，带一帮打架的人。

基层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下去了，今天明显减少了，向群众说明是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主席、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群众还是听的，很多人明白以后说不能去上阶级敌人的当，很多单位把花圈折［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通知的，知道所谓“总理遗嘱”是敌人造的谣，广大工人说不能上敌人的当。

投入了五千民兵，三千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

对外部（地）进入北京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19）74年——（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与［舆］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与［舆］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

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

明显地［的］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有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是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华：

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的3月6日、24日来骗人，说是《文汇报》实际上是攻击中央的。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的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

即便在那样忙碌的时刻，姚文元仍不忘写日记。他在4月4日——清明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

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

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

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斥“秃子”》怒斥姚文元

联络员毛远新也很忙。4月5日，毛远新就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4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文中错别字是原件中原有的，笔者以中括号注正确的字：

主席：

> 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
>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
> 北京市委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很多人，公安派出所也要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
>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在群众中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话［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全文背下来，还边读边流眼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万人）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8341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三个营（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至］目前（5日晨五时）在五万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传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至［致］战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退毛远新

4月5日晨

4月5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一双三角眼在望远镜后面窥视。张春桥看毕，颓然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湿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另一首题为《斥“秃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1976年2月6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载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

2月6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璧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又有一首《秃儿想掘坟》，怒斥姚文元：

神州欲变，
风雨已弥天。
昏星暗月，
红日当空已难显。
自从总理别世去，
灰撒锦绣江山。
百花痛，含悲念，
声泣语更咽，
人心皆怀念。
秃儿想掘坟，

悲剧又重演。
妖婆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还有一首《三人只是一小撮》，诗中暗藏“桥”、“摇”、“江”，谁都明白所指何许人：

断桥飘摇春寒冷，浦江浊水走鱼精。
挥的撒下铺天网，刀下鱼精现原形。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他所“目睹”的“天安门广场的表演”——4月5日日记：

>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
> 下午2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万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
>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
> 3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

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

我同意。终于，在6时25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人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北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9点25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

在“四人帮”之中，姚文元处于最前线。这位“舆论总管”每天都要发布消息，指挥舆论工具。

姚文元尤其严密控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叫鲁瑛。姚文元不断给鲁瑛发出指示……

1998年11月25日，笔者在北京人民日报社采访了鲁瑛。

鲁瑛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硬朗，居然还在上班！

据鲁瑛说，他1927年10月3日出生于山东黄县。黄县位于渤海之滨，烟台之西，招远之北。黄县当年是山东的富县。谚云：“山东一百〇八县，饿死一百〇七县，饿不死黄县。”

鲁瑛说，尽管如今连他的身份证上都写着“鲁瑛”这名字，其实他并不姓鲁。他原名刘殿松。现在除了档案上的记载之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image]

叶永烈采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

鲁瑛这名字，像女性的名字。他这么个七尺男子，怎么会取了个“鲁瑛”的名字？面对我的提问，鲁瑛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起了“鲁珉”，我马上记起这十分熟悉的名字。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担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曾是重要的人物之一：1971年9月11日晚，林彪之子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向鲁珉出示了林彪的手谕，要鲁珉驾机炸毛泽东专列。鲁珉深知此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把眼睛弄红肿了，第二天住进医院，躲避此事……紧接着，便发生了林彪在蒙古“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

我问鲁瑛：鲁珉是不是你的兄弟？

鲁瑛笑道，鲁珉其实也不姓鲁，原名刘振渊，只是他的中学同学而已，不是兄弟。

原来，鲁瑛和鲁珉在中学里，都是“展扬户”——也就是“冒尖户”。不仅成绩优异，而且体育运动也很突出。那时，不论是篮球、排球、马拉松跑、撑竿跳高、徒手跳高，鲁瑛都是全校第一；鲁珉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是样样在行。

此外，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名叫曲道原，在美术方面是“冒尖户”。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三人都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想去报考设在根据地曲阜的山东大学。不过，生怕去了根据地会连累家人，他们三人决定改名换姓。

换什么姓呢？他们三人都一致同意改姓鲁，因为鲁是山东的简称。至于名字，都用“王”字旁，起好三个名字：“瑛”、“珉”、“琦”。谁叫什么名字，以抓阄来定。

刘殿松第一个抓阄，抓了个“瑛”字。他很不高兴，觉得这名字像女人的名字。但是这名字已经抓在他手里了，不肯也得肯。刘振渊抓了个“珉”字，从此叫鲁珉。曲道原则从此叫鲁琦。

不过，临出发之前，鲁琦给家里拉回去了。鲁瑛和鲁珉进入了根据地，进入了山东大学……

在山东大学，鲁瑛分配在第四班。那时候，条件很差，学生们睡地铺，挤在一起。鲁瑛传染上疥疮。

就在这时候，部队来挑人进空军。鲁珉身体棒，被选中了，进入空军。照理，鲁瑛也完全可以进入空军，只是那讨厌的疥疮，使他在体检时遭到否定！

后来，鲁瑛被分配到文教部门：先是到山东《渤海日报》当记者，后来进入山东《大众日报》。接着来到上海《解放日报》，担任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

1966年6月初，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党委书记马达突然找他谈话，要他前往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后来他才知道，当时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社，急需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工作组。原本是要调马达去人民日报社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不同意，于是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调鲁瑛和邵以华赴京。

鲁瑛以为是临时出差，翌日带了一个小包飞往北京。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在人民日报社“扎根”，再也没有回上海工作。

[image]
《人民日报》原总编鲁瑛所作姚文元电话记录之一

[image]
《人民日报》原总编鲁瑛所作姚文元电话记录之二

刚去的时候，根据陈伯达的意见，鲁瑛担任《人民日报》党的临时工委秘书长，主持《人民日报》常务工作的是唐平铸，被任命为《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以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先后被“打倒”，鲁瑛担任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虽然论资历、水平都不及《人民日报》前总编辑邓拓、吴冷西，但是鲁瑛来自上海，对张春桥、

姚文元言听计从，所以倒是坐稳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这个位置，直至与“四人帮”一起下台……

在电话里，姚文元一道道指令，通过鲁瑛之后，很快地就在《人民日报》上体现出来。

姚文元通过鲁瑛，还紧紧抓住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在4月5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情况汇编》。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在姚文元看来，比《人民日报》还重要。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无法像过去那样走遍山山水水，只能靠一纸《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作出决策——发布“最高指示”。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同样也影响着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视听。

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

4月4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
>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阕。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变成了“志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本来，那首《满江红》纪念周恩来、斥骂“四人帮”是很鲜明的，经姚文元一删、一批，变成了“反党”、“反革命”。

4月5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一首五言诗，把“四人帮”比做“闹鬼”、“豺狼”：

>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
>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姚文元拿到抄件之后，竟把“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光是这么改，意犹未尽。他从探子们抄来的许多诗中挑选了一下，

选出另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拼接”。虽说一首五言，一首自由体，“拼缝”非常明显，“舆论总管”也不管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期《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首诗，也就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交公安部门立即作为要案加以侦查。

姚文元的造谣“想象力”异常丰富，以至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他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哪里是在给周总理献花圈，那分明是在祭奠蒋介石！

怎么会扯上蒋介石呢？原来，姚文元从港台报道中见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举行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纪念典礼——蒋介石是在1975年4月5日去世的。姚文元移花接木，把与此毫不相干的天安门事件，硬跟蒋介石之死扯在一起。

其实，这位“舆论总管”，早就精熟“移花接木”术：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际，新华社要发出一张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交谈的照片，姚文元“审查”时，认为应当“加”上王洪文。于是，从别的照片上剪下王洪文，“移”入毛、周之间。

江青见到记者拍的她与许世友在一起的照片，便给“舆论总管”打来

电话："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于是，姚文元下令，把照片上的许世友头像换上了张春桥的脑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新华社选了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毛泽东、朱德到机场欢迎的照片，准备发表。姚文元一"审查"，下令剪去毛泽东和朱德，顿时，变成了周恩来独自一人在机场。

当年，希特勒德国有位大名鼎鼎的"舆论总管"——宣传部长戈培尔，以撒谎、造谣著称于世。姚文元居然成了"戈培尔第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将军在1976年12月10日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揭发材料：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社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 今年3月底，清明节前，许多群众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花圈。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南京事件后，姚文元两次指令鲁瑛："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并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鲁瑛秉承姚文元的黑指示，派记者日夜轮流守在天安门广场，收集情况。根据有关记者的揭发，并查看了姚文元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编发的十二期《情况汇编清样》（这是专送姚文元看的，经他修改、同意后，才能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清样》）的亲笔修改件，证实"四人帮"在处理材料中耍了许多阴谋，搞了不少假情况，蓄意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
> 一、扣发或删去有关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内容。
>
> 例如：4月1日和4月4日上午的两期《清样》，除有一部分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外，主要是反映群众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规模，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切悼念周总

理的情景，姚文元全部扣住不发。……

二、对广大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内容，姚文元作贼心虚，大砍大删。

4月3日的《清样》，反映了一份《倡议书》的下列内容：“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者们，凭说共产主义的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灵魂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清样》还反映了一些诗词的内容，如：“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桥红霞现。”这些内容，都被姚文元一笔勾销了。

4月4日的《清样》上，刊登了署名“首都几名红小兵”的一首诗：“怒恨国贼，又刮黑风，正告你们，小小一撮，人民威力，不要小看。”还刊载了署名“北京地安门中学学生”写的题为《承志捉鳖》的诗：“何惧寒风刺骨，誓把妖叛全消灭，敢翻怒涛下海洋，捉贼鳖！”姚文元也全部删掉。……

三、肆意删改，颠倒是非，给群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例如：4月3日的《清样》上，刊载了一首诗：“丹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强加了如下罪名：“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4月4日《清样》刊载的一首题为《清明节呐喊》的诗写道：“……‘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姚文元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段话，恶毒地叫嚷：“这除了上海之外，还把矛头指向辽宁，暴露了策划者的一部分意图。”

4月5日的《清样》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许多人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删去了“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句。经他这样一改，是非完全颠倒，对诬蔑周总理的坏蛋表示极大义愤的革命群众，却成了无缘无故要“打死人”的“暴徒”。

4月5日的同一期《清样》说：“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有了，便聚众‘抗议’。”姚文元把“有人”改成“一小撮坏人”，把“聚众”改成“煽动一伙人”。经他一改，那些送花圈悼念

周总理的群众竟变成了“一小撮坏人”。

4月5日的《清样》上，姚文元把一首新体诗怒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全部删去，印发《情况汇编》特刊时，把剩下的半首诗同另一首旧体诗拼凑在一起，手段极其卑劣。

四、蓄意收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联系”的材料。

天安门广场绝大多数悼词，都是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因此，4月初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上都没有反映出天安门广场事件与邓小平有“联系”的内容。4月4日晚，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份材料，文中写道：“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如获至宝，等不及编发《情况汇报清样》，立即用电话向姚文元报告。姚文元听后说，他要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还让鲁瑛把这份材料送给毛远新看。

鲁瑛还根据姚文元要派记者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了解一下”的黑指示，在4月3日和4月4日连续编发两期关于半导体所的《情况汇编》特刊，反映该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中一期特地指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所在的科技处做了什么样的花圈。其用意是说：这花圈是邓小平煽动做的。

4月中旬，鲁瑛等人又编发了一期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行”的《情况汇编》特刊，其中刊登了几张照片。姚文元看后大为恼火，责问：“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是与邓小平有联系的。”一语道破“四人帮”迫切需要同邓小平有关系的材料。

五、反映4月5日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经“四人帮”一伙改编后，成为《人民日报》4月8日刊登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四人帮”不仅对鲁瑛面授机宜，出了许多黑主意，姚文元还自己动手增删，塞进了不少私货。

鲁瑛在主持改编的过程中，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蓄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把文中的“这伙人”一律改为“暴徒”；把“一小伙闹事的人”改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鲁瑛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在这篇报道中写了下面一些话：“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

动。’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姚文元在改编过程中，还亲笔加了：“吹捧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是暴徒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 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四人帮”十分活跃，同鲁瑛联系密切。
>
> 4月5日凌晨5时，王洪文窜到天安门广场工人民兵临时指挥部的小楼上，对张世忠、马小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他们坚决顶住，并大谈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鲁瑛把这当做报纸宣传的新精神。王洪文还曾专门打电话给鲁瑛，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有人要冲人民日报社，并要鲁瑛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
> “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里偷看天安门广场情况时，用望远镜看不清纪念碑前人群中的情况，姚文元马上打电话叫鲁瑛派记者到纪念碑前看情况，然后回来报告。
>
> 4月7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和几个记者，赞扬他们反映了重要情况，还同鲁瑛等人碰杯，饮酒祝贺。……

1980年5月12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曾这样回忆“四五”情况：

> 4月4日晚，政治局在人大会堂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没有发生大问题。我要求把花圈多放几天，作好群众的工作，再送八宝山烧掉。大家也都同意这样做。
>
> 这时，人民日报的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份报告，讲在纪念碑西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姚文元读了这个报告，“四人帮”就闹了起来，质问我知道不知道。江青还骂我是“老右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并通知我马上去抓这个人（演讲者），她又蛮横地说：现在清明节已过了（夜里12点），要把花圈全部搬走。我提出是否再放两天，不然群众不答应。江青说不行，闹得气氛很紧张。这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又改变了大家原先的意见，同意了“四人帮”的意见，拍了板，让我马上执行。（当夜抓了388人）所以，5日群众就火了，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烧了汽车、小楼。
>
> 4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烧、打，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于是，政治局决定：
>
> 1.调动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由×××同志指

挥。（原定要调十万，实际调了三万多）并指定晚八时动手。

2.先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开始拟以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后来政治局又批评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要我广播讲话。

会未散，我和×××就赶回市里布置。吴忠同志（卫戍区司令）对我说：不要急着出动民兵和部队，要等广场上的群众走得差不多了才能下命令，不然会出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向后拖的办法。我同意了，并让他去掌握。

晚6点半，发表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但我的许多话是错误的，如提出“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反革命破坏”等。我们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广场人少了，才出动民兵。在此之前，部队已包围了纪念碑。4月8日，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仍是毛远新传达的，主要是布置抓人，追查。

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同志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情况，不时用电话催促布置和出动民兵，进行指挥。我执行了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决定……

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4月6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在日记中所记毛泽东的话“士气大振，好！好！好！”是毛泽东在4月6日与联络员毛远新谈话时说的。

4月6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报告：

主席：

> 5日夜到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
>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
> 今天（5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
>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
>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
>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
>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
>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
>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轻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支。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退毛远新

4月6日三时

4月7日上午8时5分至9时15分，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远新整理的谈话记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我汇报了4月5日、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虽然批判了林彪所谓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话，仍处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

然而，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期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他终日卧于病榻之上，与外界隔绝，甚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极少交流。联络员毛远新，便成了毛泽东与外界、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唯一通道。

联络员是毛泽东病重时出现的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据，是联络员的汇报。

联络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于联络员本身具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时，又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了进去。

正因为这样，联络员的出现，使得本来已经很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生活，变得更不正常。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实地记述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
>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
>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 1976年4月5日上午，8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
>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
>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
>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听了毛远新所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舆论总管"姚文元变得异常忙碌。他在4月7日所写的日记，是他那天在"关键时刻"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的详尽记录：

>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道，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
>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
>
> 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
>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萧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

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8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6时40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

7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8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洪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成“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

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

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纪念。（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二六五期等四期简报订在日记中，留作“纪念”。——引者注）

姚文元日记中所写及的“8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是指4月7日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项决议。

那是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7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两项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姚文元曾回忆说，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姚文元说，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姚文元还回忆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王、张、江、姚对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然而，他们忧喜参半，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1975年12月16日病死，李德生于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

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翌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中共中央两项决议。

从1976年4月8日起，姚文元开动造谣机器，在全国各报刊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长篇文章，对革命人民极尽污蔑之能事。

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在4月8日的日记中居然还“作词一首”：

>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
>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
>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
>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工农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
> 霹雳震，怒涛涌，扫黑风。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写着：“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背面却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4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着那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刊头，那“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加了正气凛然的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舆论总管”见到了人民日报社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一个多月以后——5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琢磨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以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一句，变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晖吹嘘成灿烂的朝霞。

[image]

在“舆论总管”姚文元领导之下各报刊所发表的“与走资派斗争”的许多文章

越近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张春桥在1976年4月18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 4月5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
>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4月4日的危机，到了4月5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四人帮”，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

副主席王洪文成了公子哥儿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1976年5月27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1976年7月6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4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
>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7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气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7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30度，他们不肯烧。

8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5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3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

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四人帮”再揪“走资派”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1976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
>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
>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12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

迟群此人，原是8341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1976年5月2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5月3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6月23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

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1976年5月13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老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1976年7月16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干，还是照老样子干”。
>
>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

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1976年7月20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甫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搞掉李先念。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7月20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远新同志：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
>杨春甫
>
>7月20日晚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甫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待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今年7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像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甫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拿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丁。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得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提醒华国锋：“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1976年8月10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丁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竿，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1967年8月7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1967年9月，在上海外滩32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〇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234辆，摩托车438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1970年6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1973年9月18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1973年国务院162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

人帮”的帮派武装。

1974年3月20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1975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9月18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
>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
>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〇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

脚了！比一〇〇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〇〇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20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免。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1976年4月8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像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像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
>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
>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1976年6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马天水所供认：

> 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8月10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
>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市委、市革委会：

>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
>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一三〇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干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干排，

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1976年7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萧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萧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萧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萧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
>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
>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萧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萧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

“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1976年2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
>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6)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1976年6月26日，毛泽东发生第二次休克，病情转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在毛主席住地游泳池轮流值班，以应付紧急情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华国锋和张春桥一班，王洪文和汪东兴一班。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重病之中的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据芦荻回忆，当时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7)：

>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在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7.8级强烈大地震。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众多楼房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唐山距北京只有200多公里，北京和天津也有强烈震感。就连毛泽东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都发出哗哗声响，毛泽东的病榻也摇晃起来……

这天，在毛泽东身边值班的是王洪文和汪东兴，张玉凤也参加了值班。他们赶紧跑进毛泽东卧室，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俯下身体挡在毛泽东头部之上，以防有什么东西掉落伤及毛泽东的头部。

汪东兴走到毛泽东的床前说："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后再向主席报告，请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汪东兴出去一了解，得知是唐山发生大地震。

华国锋也在睡梦之中被地震惊醒，连忙赶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天亮之后，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防震的房子——游泳池南的"202"。

"202"是专为毛泽东新盖的房子。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考虑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房子，原本并不是为了毛泽东居住而建造的，担心抗震等性能不好，不安全。经过再三说服，毛泽东才于1974年同意把游泳池南面几处旧的小平房拆掉，新盖一座房子。这一工程的代号为"202"。建成之后，也就用惯了"202"这一代号。

乘着毛泽东离京巡视外地的时候，"202"工程加紧施工，于1974年底完工。"202"房间宽敞，高大明亮，而且抗震能力强。

毛泽东在长沙住了114天，于1975年2月3日离开长沙回北京。当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时候，"202"早已经完工。但是毛泽东仍住原先的房子，不愿意迁往"202"。

直至这次发生唐山大地震，毛泽东这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劝说下，搬到"202"去住。"202"主要是三大间，即卧室、书房、会客厅，另外还有几间附属用房。"202"有宽敞的走廊连接室内游泳池。

毛泽东一生的最后43天，是在"202"度过的。"202"是毛泽东最后的住所。倘若不是唐山大地震，毛泽东还不肯搬进新居"202"。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

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8月26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8月28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双关语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9月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

同意。江青这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9月3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拍了许多照片，内中既有骑马的照片，也有拿着青草喂鹿、逗兔的照片。

毛泽东病情转危。9月5日晚9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返回北京。

大寨交通不便。夜11时，江青从山西阳泉上火车，两个多小时之后到达石家庄。一路上，江青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

一架专机在石家庄等候江青。

上了专机，飞行20多分钟，这才赶到北京。

毛泽东是在8月下旬病情加重的。8月28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image]

江青在大寨骑马上虎头山（杜修贤　摄）

[image]

江青在大寨打谷场

[image]

江青在大寨养殖场蚕房

[image]

江青在大寨养殖场喂鹿（杜修贤　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

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9月7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江青赶到的时候，毛泽东虽然神志还清醒，但是双眼紧闭，已经气息奄奄。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2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 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的使用，张玉凤处还存有上一章讲述的江青1975年1月7日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向来办事不后悔的毛泽东，却对于自己与江青结合感到后悔。然而，他又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对卫士长李银桥以及汪东兴透露自己心中的烦闷：

> 他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

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而他最大的后悔是看错了一批人，用错了一批人。

汪东兴曾经介绍过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泽东异常痛苦，他说："是我瞎了眼。"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下来。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50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8)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9月初，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9月2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大约是叶落归根之意，毛泽东在病危之际，对华国锋说，希望回到故乡韶山滴水洞静养。

华国锋当即从命，进行安排。

9月8日上午，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9)突然接到中央紧急通知，要他前往韶山滴水洞管理处进行检查，以尽快安排接待毛泽东回家休养的各种准备工作。

张平化当即电话通知了滴水洞管理处管理员廖时禹，做好一切接待准备工作，“北京客人”要到那里住。张平化还说，他将在当天晚上赶往韶山滴水洞检查。

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江青虽没有参加值班，但她不住钓鱼台，而是住在中南海。她在中南海的住处，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

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 9月8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
> 8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
>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

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载入中共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9月8日下午6时多——离毛泽东去世只有五个多小时，江青却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据说，江青获得“情报”：有“特务”在那里搞她的“情报”，搞中共中央的“情报”！江青所说的“特务”，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

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在新华印刷厂排印。

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为的是在那里“查特务”！

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韩致仁、李同彦、赵家玉、伊淑珍、姜信之、张世忠、葛运通、罗孟琦等九人在1976年10月30日所写的材料说：

江青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

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连秀荣同志赶来时，江对连发脾气。江说：“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我从大寨来。”

当迟群、谢静宜来了以后，江急着问迟群：“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江青拿过材料批划。江与迟、谢三人低语一阵子。

后来，江突然问：“小谢，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答，你知道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监视我，搞我的情报。”

又说：“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谁是特务，站出来，自首，保护自首的。”

又问迟、谢说：“你别急，会弄清楚的。”

江又说：“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这天，江青还请工人们吃文冠果。江青说：“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夜深离去。

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

医生们忙于抢救濒死的毛泽东。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忙着为毛泽东再来滴水洞做准备。当天夜里12时，张平化又电话通知滴水洞管理处管理员廖时禹，说“北京客人”不来了。

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

当9月9日0点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报告噩耗。

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迅速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

后来，姚文元曾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

> 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
> 她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姚文元所述，应当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

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离世。他，终年83岁。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1976年，长达41年。

这“83”、“41”，恰巧构成“8341”——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尽管这是偶然的巧合，却也是太巧的巧合！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甚至不是不久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image]

毛泽东逝世（杜修贤　摄）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以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

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虽然毛泽东曾被不适当地夸大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而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3名代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应该是“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张闻天是中共中央“负总责”，而实际上的“负总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前身）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以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十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共。随着中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的撒手西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中共41年最高领袖命运的结束。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混乱与灾难。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因此，在中共中央9月9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响当当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

(1) 1991年5月19日，叶永烈在成都采访张耀祠将军。

(2) 萧木：《忆老友徐景贤》。

(3)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4) 向继东：《江青秘书阎长贵眼里的江青》，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5) 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404页。

(6)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

(7) 1990年6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芦荻。

(8) 据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67—268页。

(9)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仍由华国锋兼任。

第二十三章　末日的疯狂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士奇电话。

米士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第二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笔者在1990年7月15日访问了米士奇。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24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米士奇来到紫光阁休息室，用那里的两部电话——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17部电话机”），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

委打电话。内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1)，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 9月10日晚7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27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他不是高干子弟，也向来没有跟中南海沾边。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2)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从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选中了！(3)

米士奇确实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他被查过“三代”——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没有很复杂的

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

像米士奇这样“根正苗红”的应届毕业高中生，最初选了八人，后来筛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四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当速记。米士奇还负责整理过毛泽东讲话的录音带——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录音，大约二三百盒录音带。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是四名速记员中第一个入党的。此后，他一直在中办工作。

1974年，他担任中办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2月1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刻，虽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进驻”紫光阁，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写了揭发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发的文件上，称他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为“老米”。当我来到他家，他和妻子张素花（当年在钓鱼台工作）笑谈往事，颇为感慨。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
>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

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这些信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上海的“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四人帮”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对于江青来说，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1985年接见美国作家、《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R.特里尔时，曾这样深刻地评价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
> 毛主席同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
> 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
> 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
>
> 假如要写个人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
>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4)，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0日，写了以下材料：

>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
>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张春桥所说的“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5)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1895—1974）死于任内。

摄影记者杜修贤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他这么回忆道：

>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
>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三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
>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

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儿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得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外，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6)

[image]

毛泽东追悼会。左起：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杜修贤　摄）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就要到了末日。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前文已经交代过，其实，毛泽东的原话为“照过去方针办”，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答复华国锋汇报的几项工作时表示的意见。另外两句话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当时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9月29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9月19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image]

毛远新在毛泽东遗体前（杜修贤　摄）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1984年6月15日，当时的会议参加者汪东兴在医院接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采访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9月29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研究毛主席刚逝世，国庆节怎么过。他们（‘四人帮’）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去开学习会，我们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会，请各方面代表参加。结果按前种意见办了。”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曾详细回忆他1976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情景。以下是秦城监狱的笔录：

审判员：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姚文元：下面我想交待一下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审判员：好，你说吧。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以后，除了讨论两个文件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就是国庆节前一两天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医疗小组的医生报告毛主席的病情。因为有一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医生汇报完了之后，又讨论了一个外交部的文件。

审判员：是什么文件？

姚文元：就是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一个发言。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对这话，没有提不同意见，我只提出要加上中央的两个文件。

审判员：哪两个文件？

姚文元：即《告人民书》和华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也同意，后来就加上了。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接着华主席宣读了一封毛远新的来信，大意是：我是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来工作的。毛主席逝世后，我要求回辽宁。当然中央如果有新的指示要我留下来，我服从决定。李先念同志说：“还是让他回去吧，有事还可以再来嘛。”张春桥说：“他的事还没有完，办完了再走。”所谓事情没办完，是指整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当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提出戴黑纱的问题。先是张春桥提出政治局委员有的戴黑纱，有的不戴，这样不统一，群众看了会有意见。江青说：“黑纱统统拿掉，毛主席逝世不再戴黑纱了，我带头，我第一个把它拿下来。”她说完就把自己臂上的黑纱拿掉了。并让其他人也拿下来，还站起身一个一个把别人的黑纱给摘下来。她摘了一部分。这也太过分了。后来，张春桥提议国庆节天安门开座谈会，由吴德准备发言。江青还提议要参加象征性劳动，大家没有同意。这时已经很晚了，江青又讲了很长一篇话。

审判员：江青都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讲话的大意是，大家要团结，要同心协力，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她还没有讲完，许世友同志就站起来责问她：“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江青解释说：“我并没有说你嘛。”许世友很愤慨地批评了江青一通。有些老同志就劝说。江青还在那里讲。我看到老同志很疲劳了，就说：你们先走吧，让她一个人去讲吧。叶剑英副主席就先走了，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在那个会上，江青骄气是很大的，盛气凌人。

“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跳动。而“舆论总管”姚文元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姚文元在毛泽东主席刚去世时，就已经担心会发生“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这样的事——言外之意，会发生突然事件！

鲁瑛这样写道：

> 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毛泽东逝世）任务后，把我留下来单独密谈。
>
>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
>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
>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
> 他还指使我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
>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我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舆论总管”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1976年9月16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么写道：

>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

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9月19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9月19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关于三要三不要（指1975年5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引者注），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9月20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30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为什么如此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呢？

1980年9月4日，姚文元接受审讯时，曾这样交待：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

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7)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

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翌日——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淼的发言：“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叶剑英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4月30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了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

等于零？

江青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9月28日，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分校的试验化工厂。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退休干部时友人先生1996年3月28日给笔者来信说：

> 9月29日（应为28日——引者注），江青到昌平县南口镇附近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俗称清华200号，即现在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引者注）。因当时我正在该厂工作。江青那天来时兴师动众、戒备森严，迟群、谢静宜亲临现场组织全厂教职工夹道欢迎江青，又选少数人陪她到该厂附属的果园散步、摘苹果，后又到办公楼听汇报和休息，听说原打算晚上还安排了活动，后因中央通知晚上开会才提前返城。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当天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0月1日，活动频繁的江青又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引者注），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引者注），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还说：

>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嘛。(8)

10月2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1969年3月2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一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28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1973年，32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10月4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

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image]

“四人帮”炮制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10月2日，华国锋在审阅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10月5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0月6日，据摄影师杜修贤回忆，江青那天下午是这么度过的：

>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我，从我的家找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顺藤摸瓜找到了国务院的办公室，当别人告诉我是江青处的电话，我还不相信。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电话千真万确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点到毛泽东的故居——游泳池。
>
> “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我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明明我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义，“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
> ……
>
>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
> 合影时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中间。我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

游泳池拍摄后，我以为没事了，提着摄影箱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我，“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9)

[image]
江青末日——1976年10月6日傍晚，江青还摘苹果。（杜修贤　摄）

江青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回到中南海，天色已晚。

就在江青吃过晚饭之后，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狄克”穷途末路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
>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
>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9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11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
>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
>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

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几点说明：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居然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用铅笔写的，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10)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只是徐景贤没有遵嘱烧掉来信，而是把它保存下来了。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

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据文静在1976年12月10日接受审讯时说：

> 1967年张曾提出离婚，但同时又说，你还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1968年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以后，张春桥去北京回来，就不再提离婚问题，而是想办法把我包庇下来。后来，姚蓬子死了，张春桥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谈姚母的安置问题，他叫我一起听听。他说：还是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当时意识到对我也可能采取这个办法。有一次他又对我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在整党期间，张春桥又包庇我，叫我请假休息，逃避整党。有一次王洪文对我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

在1968年之后张春桥不再提与文静离婚之事，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在筹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张春桥曾经向江青透露了要跟文静离婚的打算，但是江青的那句话“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使张春桥又暂时打消了与文静离婚的念头。江青对于文静的叛徒问题，一清二楚，因为据徐景贤在1977年2月7日称，“据马天水说，他早就看过文静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交代文静自己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1971年1月6日，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曾经致信姚文元，请示如何安排文静工作问题：

文元同志：

> 前天向你请示，到你那里去一次有一件事当面请示汇报，主要是趁你来上海向你请示一下关于文静同志的问题。
>
> 就是文静同志的工作问题，我有个想法：文静同志能否继续到市革会调研组工作。因为这些问题不便向春桥同志请示。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请文元同志指示。

洪文6/1

随着张春桥的地位不断升高，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越来越疏远文静。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即便如此，文静仍享受着高级干部待遇。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秦根富在1977年1月29日说：

>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包庇，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称调研组）工作，她虽没有职称，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并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发给她中共中央文件，市委、市革委会文件，市革委会各组办、报社和各区、县、局的情况报告、简报等重要文件、材料。有的不发给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而由徐景贤提出，经张春桥同意，也照发给她。1968年，文静的叛徒、特务问题被群众揭发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秉承张春桥的旨意，为了掩人耳目，让文静称病不工作，长期躲在家里，但仍照发给所有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直到1976年10月14日，上海传达党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后，才停发。
>
> 多年来，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文静有时坐在后台听，有时给她放会议录音，或者给她看会议文件。

给张春桥莫大刺激的是在1973年9月20日。

那是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上海是最后一站，周恩来夫妇陪同蓬皮杜总统来到上海。在送走法国总统之后，9月20日邓颖超抽空到上海康平路看望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家属。邓颖超走访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王少庸几家，却没有去张春桥家看望文静，虽说张春桥家就在王少庸家隔壁，何况文静又称病在家。

邓颖超不去看望文静，知情者心里明白。

姚文元在1973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 20日，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引者注）告诉我说，邓妈妈去了我们家，还去了徐叔叔（指徐景贤——引者注）、王叔叔（指王洪文——引者注）的家，没有去毛弟（毛弟即张春桥之子张旗——引者注）的家。我就想这一定是因为她的历史问题，邓所以没有去。

姚文元日记中所说的“她的历史问题”，不言而喻是指文静的叛徒问题。

康平路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邓颖超没有看望张春桥妻子文静，这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不胫而走，震惊了文静，更震惊了身在北京的张春桥。

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下决心要跟文静离婚。张春桥的离婚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1974年，王洪文陪外宾来到上海时，就张春桥离婚之事向中共上海

市委的三位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打了招呼：

> 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

与文静离婚之后，张春桥虽然身居高位，然而在北京却孤身影只。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59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

9月21日，徐景贤带着上海的医学专家飞往北京，出席保存毛泽东遗体研讨会。徐景贤趁此机会在北京当面向张春桥介绍了“对象”情况。张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徐说：“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10天之后——10月1日，张春桥在圈阅一封关于电影《反击》信后，退还给徐景贤，在信的右上角写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11)

10月6日，徐景贤把这位“对象”的档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让中共上海市委机要交通员送往北京。

当晚，张春桥就在怀仁堂就擒。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
>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
>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19）76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
>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12)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
>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

(1)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2) 1992年11月24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机要秘书罗光禄。

(3) 1990年7月15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米士奇。

(4) 1992年4月2日至3日，叶永烈在西安采访高智。

(5)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6) 顾保孜：《红镜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

(8)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9) 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之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273页。

(10)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2—403页。

(11)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8页。

(12) 据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第二十四章　抓捕“四人帮”

以“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四人帮”必须解决。

解决“四人帮”有两种方式：一是正常的党内斗争方式；二是采取“非常手段”，又称“特殊手段”。

第一种方式，那就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罢免“四人帮”所担任的一切职务的决定；

第二种方式，那就是采取“非常手段”，把“四人帮”先抓起来，“先斩后奏”，然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得以确认。

关于这两种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华国锋在1976年9月26日与吴德、李先念密商时，做了这样的分析：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四张半票，而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共中央全会投票决定。由于“四人帮”在“文革”中提拔许多造反派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之列，因此华国锋能否在中共中央全会占上风还很难说。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认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他们经过反复分析，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叶剑英机要秘书曾回忆说：

> 1976年9月21日杨成武前来看望叶帅。当时，这是很机密的事情，谈话内容不可能让秘书知道。
>
> 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帅告诉我们，他对杨成武说，考虑到江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要采取非常手段。用党内正常斗争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
> 叶帅叮嘱杨成武同志要注意安全。

又据《解放军报》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回忆(1)，叶剑英曾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这一“非常手段”，理所当然高度机密。就像挤牙膏一样，关于这

一“非常手段”的内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一点点“挤”出来的。

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的绝密军事行动，确实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决策的。

但是，筹划粉碎“四人帮”，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便已经在进行了。

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

> （1976年）9月21日，聂荣臻从城里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请他赶紧拿主意，早下决心。否则，“四人帮”这伙反革命要先下手，把叶帅搞掉了，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叶剑英对杨成武说：聂帅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这时，叶剑英经过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触、交谈，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心里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继续做华国锋的工作。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经过观察思考，觉得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应当取得他的支持，要争取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因此，多次试探，主动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谈，逐渐使他明确态度，坚定信心，从而共同采取行动。
>
> 叶剑英继续约请一些老同志探讨解决“四人帮”的办法。不久，李先念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非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虑之贵详”。后来，叶剑英为了不受“四人帮”的监视，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在这里，叶剑英等同志，再次审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2)

另一本《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透露了华国锋曾想通过召开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国锋，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 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进一步感到了问题严重性，他开始想召开扩大的三中全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等则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华国锋同意了叶剑英等同志的意见。他到了李先念家里，同李先念交换看法，接着，写了一张纸条，请李先念送给叶剑英。
>
>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 要当机立断！李先念点点头。两人经过交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
>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3)

按照《叶剑英传略》的说法，拘捕“四人帮”是叶剑英主动找华国锋而得到华国锋支持。

9月11日：华国锋找李先念密商

然而，曾经在李先念身边工作十年之久的秘书程振声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程振声说："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三次去他家访问过。"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刊登程振声的《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一文，指出：

> 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是华国锋先下决心，通过李先念找叶剑英，得到叶剑英的支持。

请注意9月11日这个日子，那时离毛泽东去世只有两天！也就是说，华国锋在毛泽东刚刚去世的时候，就着手解决"四人帮"。

然而据华国锋的老朋友张根生1999年3月9日上午访问华国锋(4)，华国锋说是9月10日找李先念谈粉碎"四人帮"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去世的翌日，华国锋就开始着手解决"四人帮"！

华国锋所以找李先念，有双重原因：一是华国锋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李先念则是副总理。华国锋与李先念有过很多接触，深知李先念与"四人帮"势不两立。二是李先念与叶剑英有着多年深厚的友谊。

吴德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5)，也写及此事，跟程振声所谈大致相似，只是吴德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之前，给李先念打过电话，约定见面。

笔者在写作陈云长篇传记时，注意到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提及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

> 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6)

陈云的文章表明，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和陈云本人，也都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1998年8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六集，内中有陈云之子陈元的回忆，谈及叶剑英和陈云见面的情形：

>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
>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
>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
>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
>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

>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

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按照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则应是9月11日，依据华国锋的回忆应是9月10日。而李先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月24日”，应是9月13日。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

9月13日：李先念突访叶剑英

吴德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节：

>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
> ……
>
>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
>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
>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
>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
>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
>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
>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7)

不过，吴德回忆之中，也有出入。吴德所说，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其实，李先念担心电话受到监听，事先并没有从城里给叶剑英打过电话。

据云，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顺道”去了西山15号楼，看望叶剑英。

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卫士从西山突然打来的电话，说是李先念要登门拜访，叶剑英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这清楚表明，李先念事先没有给叶剑英从城里打过电话。吴德回忆李先念、叶剑英在电话中的对话，其实是他们见面之后的对话。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的回忆，相对比较准确：

>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父亲："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父亲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
>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
>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
>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
>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
>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8)

不过，叶剑英的警卫参谋马锡金回忆说："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

李小林提及，叶剑英在陈锡联的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是因为陈锡联的政治态度。

陈锡联上将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叶剑英虽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部队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陈锡联手中。

叶剑英对陈锡联打问号，是在于不清楚陈锡联与"四人帮"的关系：到底是支持"四人帮"，还是反对"四人帮"？

李先念敢于向叶剑英打保票，陈锡联"完全可靠"，是因为李先念跟陈锡联交情非同寻常。据李先念之女李小林说，李先念、陈锡联是同乡，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才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李小林提到的陈锡联两次同李先念的谈话，其中一次是在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他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陈锡联所说的"那几个人"，指的就是"四人帮"。

李先念看望叶剑英，最重要的是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叶剑英向来谨慎。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诚如吴德后来回忆所说：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回来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了叶、李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

种种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表明，扫除"四害"，最初是华国锋提出的，而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这一重要信息。

华国锋能够在毛泽东去世的翌日，就着手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充分显示了华国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的魄力。须知，在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能够做出那样果断、充满风险的决策，是华国锋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叶剑英眼中的华国锋

华国锋找叶剑英，表明他对叶剑英是高度信任的。

据华国锋自述，在“文革”中，叶剑英曾经被“疏散”到长沙，那时候主持湖南工作的华国锋开始与叶剑英有了直接的交往。

华国锋听说，在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中，在京西宾馆，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老干部，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文革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叶剑英一怒之下拍桌子，把左手小拇指都拍骨折了。(9)

华国锋还听说，在“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贴叶剑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办公室连窗户上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照明。在叶剑英的子女之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

不言而喻，叶剑英对于“文革”、对于“四人帮”，深恶痛绝。

给华国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9月8日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当时华国锋正守在毛泽东卧室那里。他深知，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仍是那样看重叶剑英。

据吴德回忆：

>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0)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叶剑英对华国锋的了解，则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华国锋毕竟不是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那样的几十年的老战友，华国锋是从湖南上来的新干部（虽说华国锋的资历也不算浅），叶剑英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跟华国锋有所接触。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张春桥以为新总理非他莫属。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所谓“在叶剑英生病期间”，是因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叶剑英也受到“批判”，打报告给毛泽东主席“请病假”，获准之后“称病不出”。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出，虽然打破了张春桥的总理梦，但同时也使叶剑英失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在政治上形成半靠边状态。

果然在1976年2月16日，亦即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的第14天，中共中央又发了第三号文件，经毛泽东主席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讲话的通知”。这个第三号文件，等于对叶剑英进行点名“批判”。

正因为这样，叶剑英不能不怀疑陈锡联究竟是不是跟“四人帮”坐在一起的？当然，叶剑英对于华国锋也产生是不是跟“四人帮”一伙的怀疑。尤其是经毛泽东主席提议，1976年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总理”），同时又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如此迅速的擢升，出乎绝大部分人的意料。加上华国锋为人稳重，凡事不轻易表态，所以老干部们一时摸不清楚华国锋的政治态度，到底是倾向“四人帮”，还是反对“四人帮”。

为叶剑英与华国锋之间牵线搭桥的人，是熊向晖。

熊向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周恩来的秘密安排之下，居然担任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长达13年，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战略情报，使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当胡宗南发现他是“匪谍”的时候，他已经去美国留学了。所以毛泽东曾经说，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则称赞说：“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是后三杰。”

熊向晖于1949年从美国回国，他的“人生轨迹”也是令人眼花缭乱：他先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接着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在“文革”中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任周恩来总理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访华会谈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会谈。1972年8月，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当了一年多大使之后，于1973年末回国，出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依旧是做老本行——情报工作。中共中央调查部是新中国一个时期以来情报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为叶剑英、华国锋牵线时，正是任职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时候。

熊向晖在“文革”之后的“人生轨迹”也耐人寻味。他在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接着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他还兼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熊向晖于2005年9月9日去世。

熊向晖跟叶剑英有多年的交情。在周恩来总理去世不久，1976年1月21日下午，叶剑英约熊向晖到他那里谈心。(11)当时，叶剑英已经成为“四人帮”攻击的主要对象。江青几度扬言，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小平，一个是广东——指叶剑英。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叶剑英不愿在政治局开会时老是遭到“四人帮”的纠缠，他告诉熊向晖，家里人劝他回广东休息，而他自己则打算到广西去住一段时间。这时候，熊向晖力劝叶剑英不能离开北京。熊向晖建议叶剑英“称病不出”，可以避免出席政治局会议，但是目前形势多变，你坐镇北京，可以静观其变。

2月8日，叶剑英又约见熊向晖。叶剑英告诉熊向晖，已经按照他的建议，向毛泽东请了病假，从此“称病不出”（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的重要会议，叶剑英就“出”来了）。

4月2日晚，叶剑英约见熊向晖，谈起当下的形势。叶剑英说，聂荣臻元帅以为，跟“四人帮”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熊向晖建议，现在该用毛泽东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不过，熊向晖一次次去见叶剑英，毕竟目标太大。叶剑英对熊向晖说，还是让侄子叶选基去他那里更加方便些。

于是，叶选基开始充当叶剑英与熊向晖之间的联络人。据叶选基告诉笔者(12)，他曾经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而熊向晖是副部长，原本就跟熊向晖熟悉，所以叶剑英让叶选基充当联络人。

在5月底，叶选基来到熊向晖家。由于华国锋在4月7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同时又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所以这次熊向晖跟叶选基着重谈及华国锋。熊向晖说，根据他跟华国锋的接触，华国锋不是极左派，跟“四人帮”不是一伙人。

熊向晖从两件事向叶选基谈起对华国锋的印象。那是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来访，由熊向晖负责相关接待事务。

第一件事是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向华国锋汇报杨振宁来访的情况。熊向晖对华国锋说起来杨振宁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跟他大谈“批邓”，还送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自己的箱子满了，装不下。华国锋听到这里，说道：“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熊向晖从华国锋这句不经意的话中，听出华国锋并不热心“批邓”。

第二件事是4月17日晚，华国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杨振宁，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从头至尾没有谈及“批邓”。

做过多年情报工作的熊向晖，善于从细微处判断人。他以为，在“四人帮”高调“批邓”的时候，华国锋如此跟“四人帮”不协调、不同调，足见华国锋跟“四人帮”并非一伙。

叶选基回来之后，向叶剑英汇报了熊向晖对华国锋的评价，引起叶剑英的关注。于是在6月7日晚，叶剑英让叶选基把熊向晖接来，详谈华国锋。

叶剑英如实地对熊向晖说，他跟华国锋只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有备而来。熊向晖给叶剑英带来两个文件：一个是4月17日华国锋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另一个是1975年9月26日当时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的插话记录稿。熊向晖说，这两份材料表明了华国锋的政治态度，明显有别于“四人帮”。

熊向晖还讲了一个关于华国锋的故事：在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有一次华国锋和熊向晖结束了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一起往外走。华国锋叫住了熊向晖，问道：“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华国锋所说的“老罗”，指的是罗青长，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熊向晖的老战友。

熊向晖回答说：“他病了。”

华国锋问：“住在哪里？”

熊向晖说：“在阜外医院。”

华国锋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

熊向晖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只能到阜外医院就医，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熊向晖向叶剑英讲述了感人的一幕——

> 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13)

就这样，罗青长住进了北京医院。

由于熊向晖向叶剑英力荐华国锋，叶剑英也在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述了自己对华国锋的观察。

7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主席病况。考虑到会议重要，叶剑英接到通知之后去出席会议。

叶剑英说及，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剑英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剑英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剑英看到那天凌晨2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14)

正因为这样，7月28日下午，叶剑英通过叶选基来告诉熊向晖，叶剑英主动跟华国锋见了一次面，彼此谈得很融洽。

那天，叶剑英给华国锋打来电话，说是要去看望他。华国锋喜出望外，立即说："叶帅，我去看你！"

叶剑英年长华国锋24岁——当时叶剑英79岁，而华国锋只有55岁，何况叶剑英正"托病请假"。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坚持他去看望叶剑英。

可是叶剑英却坚持他去看望华国锋。叶剑英在电话中说华国锋工作忙，还是应当由他来看望。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华国锋只得说，有劳叶帅。

当时华国锋在东交民巷15号的住处，轿车无法进院。叶剑英的轿车到达时，华国锋已经早早在大门口等候了。当叶剑英的轿车到达之后，华国锋为他开车门，扶他下车，走进院子，走进家中。华国锋充分显示了对叶剑英的尊重。

叶剑英在华国锋家的客厅落座之后，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则回答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接着，叶剑英与华国锋首次进行深层次的谈话。叶剑英试着向华国锋提出两个重大的问题，而华国锋的答复使叶剑英感到满意。熊向晖之女熊蕾记述了叶剑英后来对熊向晖谈及的这次见面的情况，并加以解说：

>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
>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
>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

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接着，华国锋向叶剑英请教：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指熊向晖——引者注）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

——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15)

通过这次见面，叶剑英对华国锋投了信任票。

叶剑英称赞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

正因为叶剑英在毛泽东去世前夕去看望过华国锋，彼此建立了信任感，所以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的翌日，就通过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要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然而，在叶剑英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周密地加以研究。正因为这样，叶剑英没有当场答复李先念，也没有很快回答华国锋。

向来谨慎、缜密的叶剑英，在思索着。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也在思索着。

汪东兴后来也曾经这样回忆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

另外，他们在谈及"四人帮"的时候，大都用代号：称江青为"三点水"，称张春桥为"眼镜"，称姚文元为"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称呼他们四个。

“四人帮”暗中调兵遣将

针尖对麦芒，“四人帮”也在暗中调兵遣将。

1980年7月12日，王洪文在审讯中供认：

> 我得到许世友儿子的信后，首先找到毛远新，把这封信给他看了。
>
> 我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
>
> 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真的要有人闹事，我们就被动了，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
>
> 我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
>
> 毛远新说：“我给孙玉国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
> 我点头表示同意，又担忧地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
>
> 于是，我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和张世忠，让他们连夜调集三千名武装民兵，秘密驻进中南海东侧的中山公园里，待命行动。同时，我又向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和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通报了这个情况，指令他们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逻车，对钓鱼台、中南海、人大会堂等几个重要场所进行重点守卫……

王洪文所说的“许世友儿子的信”，是他以非正常手段，截获许世友儿子写给北京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

> 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
>
> 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

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

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16)

这封被截获的信，使王洪文心惊肉跳。他不仅把信给毛远新看了，而且还给张春桥看了。

无独有偶，姚文元也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不同的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便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夹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

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
>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
>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
> 晚上，同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
>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
>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四人帮”都预感末日的来临。王洪文和毛远新都把希望寄托在孙玉国身上。

后来，孙玉国在检查中这么写道：“‘四人帮’为了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搞封官许愿，让我到总参当副总长。1974年3月，在中央读书班期间，王洪文在读书班负责人会议上利用集体封官许愿的阴谋手段，拉帮结伙说：‘在座的先给你们打个招呼，现在了解情况，将来调你们来工作方便，到时候调你们来，不来可不行。’”

此后，王洪文几度提议孙玉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孙玉国与毛远新、王洪文过从甚密。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和毛远新把孙玉国看成在军队系统中能够“调得动”的人……

9月21日：叶剑英看望华国锋

华国锋也在积极准备，跟“四人帮”对着干。

华国锋开始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在会议中间，华国锋试探性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华国锋刚说完，纪登奎就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这么一来，别的政治局委员就不便说下去了。

从那以后，华国锋改变了策略，即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个别串联，分头做工作，而不是一起开会。另外，华国锋把纪登奎也排斥在外。

华国锋当时着急的是，自从9月13日李先念去看望叶剑英之后，一天天过去，没有来自叶剑英的回复。华国锋深知要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必须得到叶剑英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支持。华国锋很想去看望叶剑英，当面深谈，但是在叶剑英没有明确答复之前，华国锋不便于给叶剑英打电话。

9月21日，对于华国锋来说，是重要的一天。叶剑英打破沉默，亲自来看望华国锋。叶剑英很谨慎，让司机开着轿车兜了几个圈子，然后从华国锋家运煤的后门进去。

叶剑英明确表示支持华国锋的计划，与华国锋联手共同粉碎“四人帮”，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华国锋与叶剑英初步确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华国锋还倚重吴德，因为吴德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可以掌控首都局势。

华国锋不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的政治态度如何。吴德告诉华国锋，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绝对可靠”。对于华国锋来说，有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

华国锋秘密召见了吴忠，向他进行了政治交底。吴忠当即表示：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华国锋之前，叶剑英也通过吴忠的老上司、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做通了吴忠的工作。吴忠请苏振华转告叶帅：只

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有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作为后盾，华国锋的信心倍增。9月22日，张春桥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写信：

马天水同志并市委有关同志：

>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
>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
>
> 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视上海为“基地”。他把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带给马天水，提醒马天水要做好准备，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

1976年9月26日晚，在国务院小礼堂审查关于纪念毛泽东的电影之后，华国锋把李先念和吴德留下，在中南海武成殿会议室一起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实施方案。华国锋指出：“早比晚好，越早越好。”这一次，华国锋明确地说，要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把“四人帮”抓起来再说。吴德也表示赞成。他们商定，在国庆节之后，花十天时间做充分准备，然后就伺机动手，把“四人帮”抓起来隔离审查。

华国锋请李先念把他的意见转告叶剑英。华国锋请吴德在北京做相关的准备。

9月27日，张春桥在给上海“基地”的指示中说：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

9月28日，张春桥再度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

>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人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

量，问题是谁挂帅。

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现在批文件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人把关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9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

1月8日，失去了周恩来。

7月6日，失去了朱德。

9月9日，失去了毛泽东。

三颗巨星的陨落，使1976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27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看不见。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于国庆的前夜，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7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41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1976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1月15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7月11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4月7日被撤职）。

9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

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image]

1976年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紧张的气氛下举行。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叶剑英在出席这次会议之前，曾致电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叶剑英得知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东兴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当时，叶剑英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20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55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10月2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

[image]
王洪文准备上台用的标准照（杜修贤　摄）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在10月2日，王洪文忽然急于拍摄“标准照”。

据1977年3月2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总共拍了114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53张，穿军装的16张，办公照片21张，室外单人相24张！

一口气拍了114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这位奉命为王洪文急拍标准照的摄影师，便是杜修贤。

二十多年之后，杜修贤作了如下真切的回忆：

>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叫我立即去钓鱼台那里一趟，也没详细交代是什么事情。反正我也习惯了几十年不分节假日的工作日程，别人安睡休息的时候或许正是我紧张工作的开始，别人工作的时候没准我缩在那呼噜声正浓哩。
>
> 我们的汽车离王洪文的住宅楼还有百米远的时候，就看见王洪文穿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装，笔挺地站在楼房外面。见我们的汽车开来，他朝着我们的方向迎了几步，我心里微微地波动了一下，他难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摄？因为这几天王洪文几次叫我为毛泽东遗体拍摄重要照片，我一听是他的电话就

条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摄。

王洪文和我握了一下手，就带我大步往楼里走。走进楼里，他才站住对我说："老杜，今天请你来是为我照几张相。"

"噢……今天？"我一愣，"我没有做准备啊，没带灯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为然，"没关系，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摄当然比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帮忙，光线不好啊。"我望望门外的天气，觉得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态度很坚决，俨然是摄影行家。

……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态急切地要拍标准照，这能不叫我纳闷吗？再说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标准像也不太合适呀！我不由得好奇地问："怎么这个时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声，隐秘的眼神飞快地望我一眼，头扭向一边，用似乎开玩笑的轻松语调说："开追悼会用啊！"

"啊呀，追悼会用也太年轻了嘛。"我也用开玩笑的口气回敬了一句，但是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这话什么意思？多叫人胆寒！

王洪文带我走到二楼，他没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么急用，只是问我楼上的光线是不是比楼下好一些。我连测光表都没有带，大体目测了一下，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行，就点点头。

……

那天王洪文的标准照拍了好几种，先是穿中山装的，后又换上军装照了几张。

这次拍摄，我觉得我差不多被折腾得散架了。因为我拍摄从来不用三脚架，又没有带闪光灯，每张照片我必须按动四分之一秒的快门，才能保证彩色胶卷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秒，这几乎是快门档次里最慢的瞬间了，按快门时人的手是很难端得纹丝不动，稳如泰山。只要有一丝摆，照片就虚了。等将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我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没知觉了。

王洪文一反常态急着要拍标准照的内幕，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步披露出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

“开追悼会用”道出了他篡党夺权而不惜破釜沉舟的决心。(17)

当摄影师杜修贤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18)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工总司”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10月7日举行。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也就在10月2日王洪文忙于拍摄“标准照”的时候，这一天对于华国锋、叶剑英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下午3时左右，叶剑英来到中南海南船坞一栋汪东兴家。叶剑英已经从政治局的多次会议上，看出汪东兴鲜明地站在“四人帮”的对立面，何况叶剑英对汪东兴早在延安就认识，有着多年的了解。

汪东兴曾经再三向叶剑英表示，应当是由他去看望叶帅，但是叶剑英说，还是中南海南船坞这个地方比较隐蔽，他去汪东兴那里比较好。

叶剑英非常细心，他叮嘱警卫参谋马锡金，到中南海汪东兴家，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比如从中南海西门进，出去时就要走中南海东门。

叶剑英与汪东兴商议扫除“四人帮”的行动计划。

据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 叶帅对汪东兴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叶帅坚定地说：“对！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19)

紧接着，叶剑英又看望了华国锋，告诉他重要动向——汪东兴支持粉碎“四人帮”，希望华国锋能够尽快联合汪东兴，解决“四人帮”。

据武健华后来回忆：

> 送走叶帅之后，汪东兴召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我来到南楼办公室，指示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我们在汪东兴的办公室一直研究到10月3日凌晨4时，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初步行动方案。这个方案设想，在中南海怀仁堂采取行动拘押“四人帮”，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就地“保护审查”。(20)

当天晚上，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国锋要求汪东兴尽快制定解决“四人帮”的行动计划。

也就是说，在10月2日这天，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金三角”。这个“金三角”的形成，意味着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了。

在10月2日这天，华国锋还来到吴德住处。吴德与华国锋同住东交民巷，来往很方便。吴德提出在解决“四人帮”时，应同时解决“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华国锋表示同意，并

委托吴德、吴忠这“两吴”对“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采取行动。

这样，华国锋手中有了两支至关重要的可靠的力量：汪东兴掌控的中央警卫团，吴忠掌控的北京卫戍区部队。

10月3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10月3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打倒！”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

“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词，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国家的一把手，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华的讲话对右字号的人是个鼓舞。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27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在那些特殊的日子，“四人帮”活动频繁。除了王洪文去平谷县活动之外，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陪同之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张春桥去了通县驻军某部，王洪文还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

张春桥还曾两次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

叶剑英还提醒华国锋，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北京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10月3日，汪东兴向华国锋汇报了行动方案，得到了华国锋的同意。

10月4日：事态严重化

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

这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在诸多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报道、回忆文章中，都回避、“屏蔽”李鑫的名字。李鑫曾任康生秘书，后来又犯了错误，但是笔者认为不应抹杀李鑫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李鑫给华国锋送来当天的《光明日报》，是因为在9月29日下午，华国锋曾经约李鑫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李鑫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

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李鑫正是根据华国锋的指示，马上赶来向华国锋报告报纸舆论重要动向。

华国锋一看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21)，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此前，在10月2日，华国锋已在批语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10月3日，姚文元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讲到姚文元与他密谈的情况：

>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我找到他家中对我说：
>
> “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作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
>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
> 为了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姚文元还指使我：一方面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让我通知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把好关；一方面又让我派人搞反调查。
>
> 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我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刘湘屏（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四下活动，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但是10月4日《光明日报》那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在10月4日清早，李鑫还向华国锋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原

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22)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异常动向。

“四人帮”不光是从东北调动部队向北京进军，而且“四人帮”的“基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21年前——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1930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10月4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10月2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毛远新，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对于华国锋来说，10月4日是活动频繁的一天，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天。

由于李鑫报告了“四人帮”的重要动向，华国锋意识到必须先下手为强。

那天下午，华国锋约了吴德商议行动计划。下午5时，吴德刚从华国锋那里回家，又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要他马上再来一趟。吴德随即赶去，原来是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

汪东兴说，叶剑英接到华国锋的电话之后，在下午又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进一步商量了拘捕“四人帮”的方案。

汪东兴提出，动用8341部队解决问题。叶剑英向汪东兴详细询问了8341部队的情况，完全赞同依靠这支部队来解决“四人帮”问题。汪东兴谈了具体行动方案之后，得到叶剑英的支持。

汪东兴随即来到华国锋家，转达了叶剑英的意见之后，与华国锋、吴德细细商讨。这样，10月6日晚上动用8341部队解决“四人帮”的行动方案浮出水面。

正因为这样，后来汪东兴回忆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是10月4号下午决定的”。

当天深夜，华国锋又悄然来到汪东兴家，密商10月6日行动方案的种种细节，谈了四小时之久。他们甚至连拘捕“四人帮”之后关押的地点都商量好了。通常，在北京关押重要犯人之处是秦城监狱，但是且不说秦城监狱远在昌平，而且在拘捕“四人帮”之后押往那里，那里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必须就近在北京城内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关押场所。华国锋和汪东兴不约而同地认为北京一处地下工程是最合适的关押“四人帮”的场所……

汪东兴说，10月4日上午，他已经让武健华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随同他以检查战备为名检查了拟作为隔离“四人帮”地点的地下工程，并进行了安排布置。

也就是说，在10月4日，连关押“四人帮”的地方都准备好了，足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计划之周密。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10月5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道。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40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9月23日，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15号庭院的一座25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六年之后——1982年，《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纪希晨为此专门采访了叶剑英。纪希晨这样写道：

>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1982年11月24日上午9时多，我们走进西山脚下一座幽静宽大的庭院。院内果园茂密，青松挺

拔；院外群山起伏，枫叶红漫，天高地阔，气象万千，雄伟的气势，使人感到心胸开阔。

稍停，叶帅来了，尽管他坐的是轮椅，但气色很好，穿一套蓝色海军便服，被人推进会客室。叶帅坐在轮椅上，他那安然的神态，红润的脸容，稀疏如雪的银发，宽阔而突出的前额，白眉下炯炯发光的眼睛，显示出一个将帅刚强的性格，果断、机智的气质。我们拥上前去，向这位86岁的老帅问好，祝他健康长寿。

叶帅仰靠在轮椅上，拉着我的手，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人民日报的同志，日夜辛劳！”

记者问：“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里，为党为人民立下了大功，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叶帅笑了，谦虚地说：“我没有做什么。”

记者问：“叶帅曾讲过，粉碎‘四人帮’如同下一盘棋，请叶帅谈谈您是怎样走这一盘棋的？”

叶帅听了秘书小张的“翻译”，脸微微向上仰望，雪白的长眉下，他那两只深深的眼睛，在珐琅质眼镜下闪动着熠熠的光亮。这双善于观察风云的眼睛，看去显得特别机敏、刚强，蕴藏着深沉博大的思想，烈火似的力量。他闭目想了想，神情激动地回忆道：

“那个时候李先念同志来咧，讲现在的形势是你死我活。那时候确实是你死我活。敌人也是一样，只有我们死，他们才能活。（叶帅感情激动，声带泣音）所以王洪文直接从城里搬到西山，住在我的隔壁。王洪文住25号楼，我住15号楼。我感到我们危险时刻到了。王洪文把我当作跟踪对象，他来是专门对付我的。……

“那时候，我经常朗诵《放鹤亭记》：‘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后来，我就搬到玉泉山。过了一天，王洪文又质问汪东兴：‘汪东兴！你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玉泉山？’汪东兴说：‘那是他自己的房子，主席给他的。’有一次，我病了，要清静环境，主席在机场对我说：你搬到玉泉山。

“我搬到玉泉山9号楼，王洪文很警惕，对我很注意。我到玉泉山后，得到我们自己的情报，说上海的红纸已经卖光了。他们在迎接伟大的节日。

“这是说瞎话。有些找他（王洪文）的人，也向我汇报。当时我没有讲什么话，只讲了一句：哎呀！我不知道他们来得这

么快呀！我想：要快打慢！一下决心就干，就把他们抓起来。抓王洪文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对他们的活动我早有察觉，但没料到他们要在十号搞政变。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当时我念这一句诗，我的机要秘书张燕还没有什么体会。她后来说：‘我这会儿才知道你为什么老念这一句。’因为王洪文来了，我不可久留呵！”

张燕在一旁帮助解说，引起一阵笑声……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据聂荣臻在198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像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

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叶剑英在西山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

王洪文在北京西山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强调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王洪文要上海搞40万民兵，而且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不久，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叶剑英搬到了玉泉山9号楼。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到玉泉山9号楼去了！

王洪文气急败坏，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

汪东兴告诉王洪文，玉泉山9号楼是周恩来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代让叶剑英住那栋房子。

王洪文无法“盯梢”叶剑英，无可奈何。

“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在叶剑英离开了西山之后，“盯人”的王洪文讨个没趣，也离开了西山，搬回钓鱼台。这时，叶剑英却又不声不响回到西山！

10月5日，是粉碎“四人帮”的前夜，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最后拍板10月6日行动方案的日子。

此前，先是叶剑英与汪东兴研究行动方案，然后是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讨行动方案，虽然方案已经大体决定，但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尚未当面一起确认行动方案。

最初商定是在国庆节之后经过10天的准备然后动手，由于时势紧迫，在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定提前到明天——10月6日晚上行动。

这天上午，先是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商谈，确定行动小组的分组名单以及行动纪律等。

这天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之下，来到秘密的地下工程视察。按照事先商定的行动方案，在拘捕“四人帮”之后，要把“四人帮”关押在这里。细心的华国锋，连关押“四人帮”的地方都要亲自过目，看看是否安全，能否做到万无一失。

检查了地下工程之后，华国锋对汪东兴说，经过这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另外，在10月4日、5日，汪东兴还与武健华一起，对实施拘捕“四人帮”的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

10月5日下午3时，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的陈锡联，突然接到华国锋要他立即回北京的电话。下午3时45分，陈锡联乘飞机抵达北京。

陈锡联匆匆回到家里，然后直奔离他家不远的华国锋家。华国锋正在等他，告诉他：“四人帮”已经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他们也要赶紧动手。华国锋还说：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经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华国锋做了一个抓的手势。陈锡联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去做相应的准备工作。

接着，华国锋、汪东兴分别乘车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

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聚首在西山，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10月6日晚上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

挽救人民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尽管在毛泽东去世后，要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早已在中共高层开始酝酿，但是，作出在1976年10月6日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的决定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中央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笔者采访过叶剑英之侄、当时生活在叶剑英身边的叶选基。

叶选基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作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性格。叶剑英又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叶选基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三足鼎立”，构成“金三角”，缺一不可。

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华国锋的参加，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

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叶帅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

[image]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右）与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

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汪东兴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者缺一不可。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汪东兴说，在拘捕“四人帮”行动中，叶剑英和华国锋是“导演”，他是“主角”。

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负责毛泽东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之一，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

关于拘捕“四人帮”，汪东兴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过两次谈话，一次是1984年6月15日在医院里谈话，另一次是在1985年6月。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有重复之处，又有互相补充之处。为了读者阅读方便，现根据两次谈话的原文，调整顺序，删去重复，加以整理。下面所引汪东兴关于拘捕“四人帮”的谈话，均出自这两次谈话，不再另注。

汪东兴说：

> 这件事是10月4号下午决定的。
>
>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11时至5日凌晨3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
>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
>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
>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
> 5日上午9时30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海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9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为了避人耳目，华国锋驱车来到北京医院，在院子转了一圈，又从后门出来，直奔城外。在西山脚下第一道哨卡处，华国锋追上了正在路旁等候的我，在我身旁还站着一位体魄魁梧的年轻军官。我介绍：“这是张参谋，是叶帅派来接我们的。”

张参谋向华国锋敬个礼，也不言语，转身上一辆车窗上贴着张白纸红字“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上。华国锋和我的车紧随其后，沿着岗哨森严、蜿蜒寂静的山路徐徐而上，不一刻，便来到9号楼前。

华国锋下车，见穿着军装的叶帅手持竹杖，站在台阶上迎候。

华国锋忙上前，一面握手，一面关切地问：“听说叶帅病了，要紧吗？”

叶帅说：“山上风大，昨夜着了点凉，体温有些高，医生不许乱动，只好劳你跑一趟。”

华国锋笑容满面，真诚和恭敬地说：“叶帅是老前辈，我来看你也应该的。”

接着，我们一起走入客厅。

叶帅入座后，问华国锋：“你来这里别人知道吗？”

华国锋说：“叶帅放心，我是秘密行动，绕道而来。”

叶说：“那伙人眼睛多得很，只怕你是绕不过他们的哟！”

这样，5日下午4时，华国锋和我带着行动方案，一起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家，与叶帅反复讨论后，三人作出决定明天（6日）晚上8时就动手。

叶剑英所说的“昨夜着了点凉”，恐怕是遁词。这次谈话极度机密，把华国锋和汪东兴请到玉泉山，相比来说，比北京城里安全。

关于这次三人会谈的具体内容，汪东兴所说不多。

笔者还曾与《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交谈(23)。纪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采访过叶剑英。纪希晨后来在《十月春雷》中这样写及华国锋、汪东兴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与叶剑英密谈的情形：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们这是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毛主席的遗志。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交代。"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命运的决战，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10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明天动手！

就这样，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玉泉山决定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日子——1976年10月6日。

10月6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

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

10月6日下午，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梁效”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人帮”手下干将迟群，在清华大学说：“形势大好”，“肯定在某一历史阶段，可能出现反复，无非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了。”“我们很有希望，大有作为，因为有年轻一代。”“如果邓小平还在挂帅，主席逝世了，那不更复杂吗？”

就在迟群吹嘘“形势大好”的时候，“四人帮”的末日来临了。

汪东兴回忆说：“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
>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
>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
>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发出会议通知，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汪东兴依靠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即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完成一系列绝密的工作：

调兵遣将，宣布纪律——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参加行动。进行战前动员，宣布纪律，进行宣誓。

人员分组，明确任务——负责抓捕王、张、江、姚各一组，每组三四人；拘捕江青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这一小组还负责拘捕毛远新。

踏勘现场，模拟练习——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灯的开关在哪里，都要一清二楚。捕人时如何格斗，也进行了模拟练习。

这四个行动小组的成员是：

第一组：组长李广银，组员霍际隆、吴兴路、王志民，负责解决王洪文；

第二组：组长纪和富，组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张春桥；

第三组：组长高云江，组员黄介元、马盼秋（女）、马晓先（女）(24)，负责解决江青；

第四组：组长滕和松，组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负责解决姚文元。

另有李连庆小组负责就地隔离毛远新。(25)

为了保密，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分四批召见行动小组成员，各个小组互不见面，互不知道。

汪东兴分批向各行动小组下达任务，并宣布三项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泄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第三，明确任务，严守纪律。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联系，包括家人、亲人在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据武健华回忆：

> 10月6日中午，经汪东兴同意，我到中南海内外观察动静，察看有无可疑征候。我先从南海走到中海，着重看了中南海大西门到怀仁堂一带；又骑上自行车环绕中南海外围转了一圈，特别对中南海周围的几个制高点，如电报大楼、景山、白塔等处进行了观察，一切如常。回来后，我报告汪东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汪东兴说，按照计划进行。(26)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

>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

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

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

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一位在叶剑英身边担任多年贴身卫士的张参谋，参与了这次行动。在1982年11月24日上午，他回忆10月6日的准备情形：

我是执行具体任务的。是叶帅派我去的。那时叶帅决心大，行动快，“四人帮”准备10号搞政变，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8点（行动），名义是开政治局常委会，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事先都做好了准备。因为是突击任务，要绝对保密。早上把我从家中叫来，集合到中南海一所院子里。临走时，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时间可能长一些，几个月，半年说不准。我不能给你们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不要找领导打听，也不要告诉孩子们。我这次是秘密行动。

等我赶到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每个人都带着武器，神情也特别严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所有到场的人，都立即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走动。

不一会，汪东兴来了。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说江青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政权。

随后，他就领着我们宣誓。誓词很短，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保守机密；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中央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宣完誓，汪东兴又进行了具体分工，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

汪东兴布置完工作，问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有人问：“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

汪东兴非常明确地回答：“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一问题呢？

这主要是针对王洪文来说的。张春桥、姚文元是“秀才”，不会动手开枪。但是，王洪文那时身边常带短枪。他经常到靶场练枪，据说枪法还可以。

另外，还考虑到毛远新。那时候，毛远新也身边带短枪。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都有警卫，警卫都带枪。

各个行动小组除了配备手铐之外，还都带了毛巾。那是防备拘捕的对象倘若叫喊，就用毛巾堵他们的嘴巴。

根据汪东兴的命令，警卫们分三批秘密开进了怀仁堂，悄悄埋伏下来。

叶剑英那天在玉泉山9号楼。尽管叶剑英是当天的行动的“导演”，但是他不露声色，连他的机要秘书、警卫参谋都不知道这一绝密行动计划。

10月6日上午，叶剑英的工作一切照常。他像平常一样听秘书汇报，批文件，读书，看报，甚至还照常学英语。

在这大决战前夕，叶剑英守口如瓶，处之泰然。

据叶剑英的机要秘书王文理回忆，约13时，华国锋总理办公室曹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晚上8时在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帅提早一些时间到达。王文理当即向叶帅作了汇报并告警卫参谋马锡金准备。

在10月6日下午3时半，红机电话响了，意味着有重要的电话进来。

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通知“叶办”：“晚上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

当机要秘书向叶剑英报告了这一电话内容之后，叶剑英说：“准时赴会！”

这时候，“叶办”才开始着手晚上赴会的准备工作。

下午3时多，司机赵绍贤开来“红旗”牌大轿车，叶剑英动身从玉泉山的住地来到他的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

6时一刻，警卫参谋“马头”护送叶剑英上车。“马头”就是马锡金，是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喊他“小马”，后来因为又来了一个姓马的女护士，于是叶剑英就喊他“马头”。叶剑英喜欢取绰号，叫他身边工作人员“old王”(27)、“老和尚”、“teacher-蛐蛐”等等。“马头”也是叶剑英给马锡金取的绰号。

红旗轿车驶出军事科学院，坐在后排的叶剑英问道："'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

那时候，从西山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西郊机场停机坪。"马头"数了一下，整整18架三叉戟飞机。叶剑英一听就明白，所有的飞机都在那里，没有人乘坐飞机外出。因为那里原本有20架三叉戟飞机，自从1971年林彪叛逃时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温都尔汗，另外还有一架出了事故，所以从20架减少到18架。

叶剑英怎么会关心起西郊机场的飞机呢？"马头"不明白。

据"马头"回忆：

> 车子开到木樨地的时候，叶帅问："'马头'，你注意一下，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
>
> 开到六部口的时候，叶帅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不熟？"
>
> 我说："熟呀！"
>
> 他问："怀仁堂有没有后门？"
>
> 我说："有后门！"
>
> 他又问："能进车吗？"
>
> 我说："能进车！"
>
> 我当时觉得，今天怎么啦？叶帅怎么提出这么一大堆的问题来？(28)

怀仁堂地处中南海的西侧，距中南海西门不过200米。怀仁堂有两扇大门，进入正南面的大门，迎面是一幅特大雕花屏风，屏风之后便是前厅。前厅东西狭长，从前厅两头转弯向后，分别是东、西休息室。前厅和东、西休息室中间，是舞台和大礼堂。在大礼堂北头，是怀仁堂正厅，正厅有一扇大门。会议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将在正厅召开。

晚7时20分，叶剑英到达怀仁堂。

平常叶剑英来怀仁堂开会时，总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这一次叶剑英的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指定到另一处停放。

叶剑英在下车时，他关照司机赵绍贤说，他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务必坐在车内等候，不要离车。叶剑英如此仔细的关照，使司机老赵觉

得有点不同平常。

这时候，怀仁堂里早已森严壁垒。三个行动小组已经各就各位。

在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警卫参谋“马头”按照惯例，在叶剑英下车之后，手持叶剑英的公文皮包，紧随其后，步入会场。

往常，“马头”随叶剑英进入会场，待叶剑英坐定，他把公文包放在叶剑英面前，然后退出会场。“马头”随叶剑英到过各种会场，都是这么个“程序”。不光叶剑英如此，其他中央首长也是如此。因为首长几乎不自己拿公文包的，总是由警卫参谋、警卫或者秘书持包。持包者护送首长进入会场，给首长放好包之后退出会场。这也是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出于对公文包中重要文件的安全的考虑。会场往往设有专门的警卫、秘书休息室。当首长们在会场开会，警卫们、秘书们便在休息室里恭候……

然而，今天的怀仁堂却有点反常：当“马头”随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却被守在门口的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挡住！

原来，汪东兴作了特殊规定，除了首长本人之外，任何警卫、秘书不得入内。不言而喻，这一规定出自今天这一特殊情况的安全考虑。

正因为这样，连“马头”也被拒绝入内。

“马头”并不知道今晚的特殊情况。他坚持要进入怀仁堂，便与警卫科长发生争执。“马头”无奈，只得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而叶剑英怕耽误时间，没有接过公文包便径直往怀仁堂正厅走去。公文包一滑，从“马头”手中掉下，啪的一声落地，顿时惊动了里面执行埋伏任务的人。

这时，丁志友只得随机应变，让拾起公文包的“马头”进入会场，并叮嘱他一放好包马上退出会场。

“马头”照办了。他意识到今天的怀仁堂情况异常，但是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张春桥第一个落网

就在“马头”悻悻地退出怀仁堂的时候，在门口遇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便对他说：“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当即对“马头”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

于是，武健华带着“马头”进入怀仁堂的正厅，把他交给汪东兴安排。

[image]

逮捕“四人帮”的地方——中南海怀仁堂

武健华回忆说：

> 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大厅，南向木门打开可与大礼堂成为一体，北向木门敞开又与后花园贯通。往日的正厅独具风韵，但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汪东兴亲自指示对厅内布置进行了调整。正厅的北侧原来设有一扇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增加了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搬掉。场内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在桌子北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具、文具等全部被撤掉。(29)

早早在怀仁堂正厅等候并指挥现场警卫的是汪东兴。

在叶剑英到达怀仁堂之后20分钟——7时40分，华国锋抵达怀仁堂(30)。

当华国锋、叶剑英先后来到怀仁堂正厅坐定，他们请汪东兴也坐下来，汪东兴摇了摇手说：“我不是常委，我就不坐了。”

那天晚上，挂帅是华国锋、叶剑英，做具体工作的是汪东兴。

汪东兴隐蔽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动静。

“马头”与另外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跟汪东兴一起，隐蔽在屏风后面。

7时55分，第一个来到的是张春桥(31)。他一进入怀仁堂正厅，顺顺当当，立即被捕……

就在这天上午，一份从上海送来的“张春桥同志亲启”的“绝密”件，

到了张春桥手中。那是徐景贤派交通员乘飞机送来的。那“绝密”件与当时的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无关。那是张春桥飞黄腾达之后，他的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便成了他的政治包袱。张春桥决定与文静秘密离婚，并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遴选才貌双全的女秘书。这天送到张春桥手中的，便是一位被徐景贤选中的女秘书的档案。后来徐景贤说道：“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据叶剑英秘书王文理回忆，在10月6日上午，他一上班，就接到张春桥办公室严某电话，称张春桥要来看叶帅，经请示叶帅之后婉言回绝了。(32)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

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面对审判员的提问，谈了10月6日下午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时的情况和谈话内容：

> 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
> 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
> 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
> 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
>
>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
> 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
>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
>
> 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
> 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国锋）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讲这番话是攻击华主席批邓不积极。这正说明了华主席对批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
> 另外，我们还谈到江青。
>
> 问：你们都谈了什么？
>
> 答：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问：内参是怎么回事？

答：毛主席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是给毛主席送的），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了，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随后，张春桥又攻击叶副主席。

问：他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我问：“是9月27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我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叶帅过去（1973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我的意思是说叶帅太强调海军的作用了。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我并没有提出具体对象。现在看来，我的后一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当时政治局首先应该增加老同志。张春桥对我提的这两条没有什么反应。我当初还想谈社论问题，但他总是谈别的事情。后来我把那封信（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引者注）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引者注）。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次我同张春桥的议论是“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天晚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张春桥和姚文元谈毕，吃过晚饭，前往怀仁堂。

张春桥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走下车，朝怀仁堂走去。他的警卫“大熊”，紧紧跟随在张春桥后面。

在研究抓张方案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张春桥本身，却是在反复琢磨如何对付张春桥身边的这只“大熊”。

“大熊”是跟随张春桥多年的贴身警卫。此人人高马大，腰圆臂粗，会几套拳脚，三五个人难以对付。另外，此人双枪，左右开弓，枪法娴熟，十发九中。

“大熊”对张春桥忠心耿耿。

据云：

> 在1967年春天，张春桥被数万造反派围在一幢小楼里，两天两夜出不来。他闻讯带领一班侦察兵连夜赶去，将张春桥往掖下一夹，从二层楼破窗而跃，只身杀出重围，救了张春桥一条性命。从此，他深得张春桥的信赖和宠爱，成为张春桥的警卫参谋，日夜不离左右。他对张春桥也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
>
> 据说1970年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有一天晚上林彪找张春桥谈话，久去而不归。他不知听谁说林彪有暗算张春桥之心，一时性急，挥拳击倒四个卫兵，硬是破门而入，冲进客厅，搞得宾主好不尴尬。张春桥嘴上虽严厉痛斥，心中却大加赞许。
>
> 十大以后，张春桥升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两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张春桥都坚决不同意，一直将“大熊”留在身边。
>
> 国庆节前夕，汪东兴经与华国锋、叶剑英多次密谋，决定采用武力手段除掉“四人帮”。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汪东兴主动批准“大熊”回老家探亲。
>
> 不料，“大熊”才离开几天就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来。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暗中加强了戒备。
>
> 这只“大熊”的意外出现，不能不引起汪东兴的忧虑，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觉，后果不堪设想。(33)

当张春桥的轿车一到，负责抓张的第一行动小组，马上开始行动。

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个礼：“首长好！”

据纪和富回忆，当时张春桥上下打量着他，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

纪和春说：“到了，正在会议室等您。请随我来。”

这时候，“大熊”紧跟在张春桥后边，想跟着进去，被两名卫兵拦住了。

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 汽车响了。张春桥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在他身后紧跟着警卫员“大熊”。
>
> 张春桥好像察觉有点不太对劲，两眼盯着纪和富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
> 纪和富解释说：“首长的随行人员都在外面大厅里休息。”
>
> 张春桥迟疑了一下，对“大熊”摆摆手：“你就在这里等我吧。”说完，就随纪和富朝里走去。

这样，终于把“大熊”甩开了。

张春桥失去了“大熊”的保护，抓他就易如反掌。

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正厅的东侧门，进了小门，刚拐了两个弯，走廊的灯便突然灭了。

在黑暗之中，徐金升、纪和富从左、右两侧立即扑上，把张春桥两臂扭住，把头按下。蒋廷贵、任子超也上前帮忙。张春桥一见势头不对，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惊恐地连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一只大手把他的嘴也捂住了。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行动小组的纪和富、徐金升两人把他左右双手挽起，架到大厅里。

据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所载行动小组的回忆是这样的：

> 我们把张春桥架到里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志坐在那里。
>
> 张春桥眨巴眨巴眼睛，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上，目光威严地逼视着他；汪主任握着手枪站在屏风后，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
>
> 张春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一梗，恶狠狠地问：“你们凭什么抓我？”
>
> 华国锋起身，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
>
> “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

> 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
>
> 华国锋念完，纪和富就给张春桥戴上手铐，把他从后门押走了。

又据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一文，参加拘捕张春桥的徐金升（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蒋廷贵（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回忆说，华国锋当场向张春桥宣读的命令是这样的：

> 张春桥，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武健华回忆华国锋当时对张春桥所宣读的决定，与徐金升、蒋廷贵的回忆一致。

就这样，张春桥第一个落网。张春桥被从怀仁堂东门押出，坐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到地下工程的隔离室。这是临时关押处，是汪东兴想出来的主意。

汪东兴对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后门，秘密地建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样，在面临特殊情况之际，可以把毛泽东安全地转移到这里。

这是一个长期空置而又人们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帮”临时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好的去处。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听不见。何况把“四人帮”关进去之后，插翅难逃。

张春桥第一个被押进了地下室。

就在顺利地解决张春桥之后，差一点出了大娄子！这娄子便出在张春桥的警卫“大熊”身上。

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 就在抓张春桥的同时，在前大厅还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被拦后，有人把他领到一侧耳房休息。
>
> 他进去后，见屋里还有几个警卫团的同志，因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没介意，随便打个招呼，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闲聊。
>
> 这个“大熊”别瞧他长得五大三粗，人还特别机警。他嘴巴哼哼哈哈应酬着，耳朵却紧听着外面的动静。可能是抓张春桥

时有些响动，他忽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便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小伙子刚要扑过去缴“大熊”的枪，没想到这家伙眼疾手快，抢先拔枪在手，猛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众人：“不许动！谁要过来我就打死谁！”

大伙一下全愣在那了，谁也不敢动。

副团长就说：“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要逮捕张春桥。”

“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把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大熊”。

只听汪东兴大声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

“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从命令。”

随后，“大熊”就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倘若当时“大熊”开了枪，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枪声马上会惊动正朝怀仁堂赶来的王洪文和姚文元，而且会惊动住在中南海的江青和毛远新。一旦他们有所戒备，那就会发生流血事件了……

顺利解决了张春桥，士气大振。

王洪文被捕时挣扎了一下

在张春桥之后，第二个到来的是王洪文。

1990年7月15日，笔者在北京曾采访了“王办”工作人员米士奇。

米士奇，常被人说成是“王洪文秘书”。他再三向笔者声明，他当时只是“王办”的工作人员。据他回忆，王洪文在落入法网之前在干什么？他在看电视！

米士奇说：

> 10月6日晚上，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住处。电视室在王洪文办公室旁边。本来，我一个人在看。王洪文从办公室里出来，看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就坐下来跟我一起看电视。
>
> 看了一会儿，快8点了，警卫员王爱清对王洪文说：“王副主席，该走了！”
>
> 王洪文站了起来，我看着他走出去……

就这样，王洪文坐着轿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从米士奇的回忆可以看出，王洪文在来到怀仁堂之前，一点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什么……

比起张春桥来，王洪文年轻力壮，而且身边可能带枪，不那么好下手。所以，行动小组在对王洪文下手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据汪东兴回忆：

>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
>
> 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
> 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
>
> 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
>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

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

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

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

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武健华回忆，华国锋当时对王洪文所宣读的决定，与对张春桥所宣读的决定一样："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又据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一片中，行动小组成员面对摄像机回忆：

"到了7点半，粉碎'四人帮'的战斗就开始了。王洪文来了，和我正好相遇。我扫了他一脚，把他压在地上。"

王洪文的警卫，被挡在怀仁堂正厅之外。

王洪文的警卫刚被领到警卫休息室，还没有等他坐下，就被下了枪……

这样，王洪文第二个被押进了中南海地下室。

王洪文被捕之后，钓鱼台并不知道怀仁堂里的剧变，"王办"还以为王洪文正在怀仁堂开会呢！

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到了夜11时左右，他吃了夜宵，洗过澡，正准备回家。这时，他忽然见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来了。往常，邬吉成跟"王办"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他来干什么？

邬吉成发出通知："王洪文办公室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16楼，出席紧急会议！"

等到"王办"人员到齐，邬吉成宣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命令，米士奇才知道王洪文已经被捕。

命令说："王办"工作人员要参加学习班进行学习。全体留在钓鱼台，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

米士奇当即表态："拥护中办命令，执行中办命令。"

就这样，米士奇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米士奇就写了一份揭发"反党分子王洪文"的材料，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姚文元束手就擒

在张春桥、王洪文被捕之后，最后一个在怀仁堂落网的是姚文元。

为了拘捕姚文元，事先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通知姚文元来怀仁堂开会，现场解决；二是姚文元如果不来怀仁堂，就让北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带领行动小组去他的住地解决。姚文元当时住在北京西城区按院胡同，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某部担负。

在两套方案中，力争用第一套方案，因为在怀仁堂解决比较方便。考虑到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汪东兴在起草会议通知时，特地加了一句："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由于不知道姚文元是否会到怀仁堂出席会议，所以解决姚文元的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待命(34)，做好两手准备。

很多人以为，姚文元是与张春桥、王洪文同时收到汪东兴奉华国锋之命发出的关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通知，只不过姚文元的身份是列席会议。

然而，武健华回忆，那是在10月6日晚上拘捕了张春桥、王洪文、江青之后，才由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通知他马上来怀仁堂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研究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姚文元接了电话，当即说："好的，我马上就到。"

这是姚文元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有什么接触？
>
>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相。
>
> 问：去照相的都有哪些人？
>
>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

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相？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相。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相。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相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就这样，10月6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获知姚文元离家的消息，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的第四行动小组的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立即驾车到达怀仁堂东厅埋伏。吴忠司令员则回北京卫戍区。

当姚文元在晚上8时25分来到怀仁堂时，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但是姚文元全然不知。

姚文元一下车，第四行动小组的康海群就跟随姚文元进了怀仁堂，而滕和松则在怀仁堂里示意他到东休息室。姚文元一进东厅的门，埋伏在门的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立即上前把姚文元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押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面前。

比起张春桥、王洪文来，姚文元的“待遇”差了些，不是由华国锋亲自向他们宣读隔离审查的命令，而是由武健华代为宣读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是因为在解决了张春桥、王洪文之后，华国锋对叶剑英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剑英说：“免了吧。”于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定，此事由在场的武健华来代为宣布华国锋手令。

华国锋的手令全文如下：“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

姚文元一听，大声喊道：“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

武健华置之不理，很干脆地说：“押走！”

第四行动小组员架着姚文元朝东厅的北门走去，姚文元依然大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

姚文元还喊他的秘书兼警卫：“小朱快来呀！”

第四行动小组的高风利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进姚文元的嘴巴，这位“舆论总管”才没了声音。这时是1976年10月6日晚8时30分。

出了怀仁堂之后，姚文元同样被押上一辆红旗牌轿车，驶向那个地下室，隔离起来。

汪东兴是这样说起抓姚文元的过程的：

>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
>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
>
> 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
> 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
> 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

就这样，姚文元也被顺利解决了。

“舆论总管”在覆灭前夕，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光明日报》在10月4日发表的“帮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10月8日《人民日

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10月8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他成了阶下囚。

据武健华回忆，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从7点55分抓捕张春桥，到8点30分。拘捕姚文元，前后只用了35分钟，就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中的三个。

姚文元这位“舆论总管”刚刚被捕，叶剑英便选派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耿飚，去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

>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代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哪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
> 近10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

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20名战士，10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10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与此同时，第三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第三行动小组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三位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的率领下，直扑毛远新和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武健华是在怀仁堂拘捕张春桥、王洪文之后，奉命赶去参加执行拘捕江青的任务，在拘捕江青之后又返回怀仁堂拘捕姚文元。

1984年4月，汪东兴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采访时，曾讲了这样的话：

> ……中央能顺利地解决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有一个人是立了大功的，那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同志。当时，张春桥、江青密谋篡党夺权，采用封官许愿的手段拉拢他，妄图控制中央警卫团，搞反革命政变。李鑫同志冒着危险，及时把“四人帮”的阴谋告诉了我；我又连夜报告了华国锋同志。促使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6号那天晚上，李鑫亲自带着几名战士冲进中南海“201”号，强行逮捕了江青和毛远新……

除了李鑫之外，完满执行拘捕江青这一重大任务，张耀祠也是立了大功的。

张耀祠，早在他16岁——1932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1953年5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升为少将。2010年10月30日，张耀祠在江西南昌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95岁。

张耀祠将军是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四川成都，采访了调往那里工作的张耀祠将军。

[image]
张耀祠将军（叶永烈　摄）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35)，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

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汪东兴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8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

张耀祠作为8341部队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当然，他对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春藕斋西侧万字廊201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第三行动小组事先隐蔽在春藕斋后院东门外。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晚上8时30分(36)，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那时，毛远新和他的两位从沈阳带来的警卫一起，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那本是毛泽东接待客人以及开会的地方。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所以住在这个外人难以涉足的地方。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这联络员名义上只是联络联络而已，实际上权重一时，因为联络员成了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靠毛远新来发布，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靠毛远新向毛泽东传达。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当时在沈阳。笔者后来在上海采访毛远新时(37)，见过这位秀丽的纺织女工。

10月6日，吃过晚饭之后，毛远新给妻子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

就在这时候，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

汪东兴选派了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

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

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

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张耀祠等人就一拥而入。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而是"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张耀祠将军说出“拘江”内幕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李鑫、武健华带着中央警卫局处长高云江、行动组员黄介元以及女警卫马盼秋前往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住处。

张耀祠先去找马晓先。马晓先是江青的护士。1962年马晓先毕业于护士学校，被分配到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工作。1968年2月17日，中南海成立保健处，马晓先从北京医院调往那里。她先后担任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的护士。从1974年3月起，担任江青的护士。

那天晚上，马晓先已经下班，穿着拖鞋，正在洗衣服，张耀祠来找她，要她换一双鞋，一起到江青那去一趟。事后才知道，张耀祠在拘捕江青时，把马晓先带上，为的是万一江青晕倒或者发生急病，马晓先可以施行急救。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张耀祠对那里很熟。在路上，张耀祠遇见江青的卫士周金铭（警卫科派去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已经事先得知要拘捕江青。这是因为江青打算翌日——10月7日去清华大学之后要去天津，所以在10月6日晚饭后周金铭去中南海南楼准备向汪东兴汇报，并为江青备车。在那里，周金铭遇见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孙守明说，汪东兴正好有事要找他。汪东兴把当晚要拘捕江青的决定告诉了周金铭，并要周金铭严守机密，监视江青，并配合行动。周金铭在见到张耀祠及第三行动小组之后，马上主动交出了武器。

张耀祠问周金铭：“在不在？”不言而喻，这是在问江青在不在屋。

周金铭回答说：“在。”

于是，张耀祠让周金铭带路，一伙人走向201院。张耀祠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周金铭、马晓先带着张耀祠、武健华、李鑫以及第三行动小组进入201院。

当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腿上盖了一条小方毛毯，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文件、文具。

在张耀祠刚进来的时候，江青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但是江青一看张耀祠身后还有那么多人，事先没有向她通报就进来了，生气了。她意识到情况异常，便对面前以半圆形队形围着她的张耀祠等人质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要求张耀祠把刚才宣布的隔离审查的决定，再讲一遍。张耀祠再一次当着江青的面讲了一遍。

江青听后，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武健华说：“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你难道不明白？”

江青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当即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奉华总理、叶帅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

江青恨恨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

张耀祠要江青交出文件柜（也就是保险柜）的钥匙。江青起初不肯交。磨蹭了半天，说不能交给你们。

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说：“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说：“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

她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下方写了“江青托”。

江青还写了一封信给华国锋(38)：

国锋同志：

> 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

江青，十月六日

然后江青把短信以及钥匙放入牛皮纸信封，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这才交给了张耀祠。

一切都很顺利，也很平静。有的报道曾经描述江青被捕时的场景：江青听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宣读的命令之后，忽地跳下床，手指向张耀祠，横眉瞪眼骂“滚！你给我滚出去！警卫员！来人哪！快来人哪！”接着江青又指责这是在“搞阴谋，搞政变”，并反身抓起床头的一只瓷瓶，奋力朝张耀祠砸去。张耀祠闪身躲过，猛扑过去一把将她按住……

显然，那些报道纯属胡编。

江青对于她有一天被赶下台，早就有思想准备。马晓先说，她刚到江青那工作时，江青就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小马，你到我这工作，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说什么准备，她说将来“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

在准备押走江青的时候，江青提出来要上卫生间。马晓先知道江青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让她上卫生间。这时候，马晓先把江青随身要用的物品收拾好。似乎江青在卫生间磨蹭的时间长了点，生怕有什么意外，马晓先进去了一下，江青这才赶紧出来。

押走江青的时候，没有给她戴手铐。她请马晓先把她常穿的深灰色披风带上。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红旗牌防弹轿车。武健华、马晓先上了车，第三行动小组的黄介元也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江青轿车前、后的卫车是警备车。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

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在如此紧张、重要的时刻，居然也发生幽默的小插曲：江青在车上见到黄介元，误以为他是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陈长江，就跟他套近乎说：“你是长江啊？”黄介元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是黄河！”(39)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是在中南海丰泽园后面的地下室里度过的。

武健华重新回到怀仁堂，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江青已被顺利拘押。”于是，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通知姚文元立即到怀仁堂“开会”。

“四人帮”顺利地被一网打尽。

当天夜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押在中南海丰泽园后面的地下室，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由8341部队严密看管，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震惊中外的10月6日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晚上9时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离开中南海怀仁堂，前往玉泉山。

晚上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准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

吴德回忆粉碎“四人帮”的内情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40)

我说：当然知道。

吴德回忆道，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吴德说，他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张春桥、王洪文已解决，江青由张耀祠负责，让卫戍区派人抓姚文元。吴德当即要吴忠亲自去解决。“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想听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

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

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张根生与华国锋接触比较多。

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

此后华国锋到广东一次，张根生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比较多。

1999年3月9日上午，张根生问及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由于是老朋友，华国锋详细向张根生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以下是张根生记述的华国锋的回忆，虽说缺乏细节，显得粗略，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image]

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钱嗣杰　摄）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

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邓小平说“可以安度晚年了”

曾经有过诸多报道宣称，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过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
>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
> “常去。”
>
>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
>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
>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
> “身体怎么样？”
>
>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 ……
>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
>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
>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
>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41)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邓小平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书报上的描写：

>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

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42)

处于软禁之中的邓小平，究竟是怎样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的呢？2012年10月9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了叶剑英元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吕正操将军的女儿吕彤岩。

叶选基说，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夜11时。那是叶剑英的警卫长马锡金奉叶剑英之命打电话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他。

吕彤岩说，她获知这一重要消息是在10月7日中午。那是当时担任铁道兵政委的父亲在上午出席了陈锡联主持召开的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回家之后显得异常兴奋。吕彤岩问他什么事情这样高兴？吕正操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

[image]

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在一起（钱嗣杰　摄）

当天下午3时，叶选基来到岳父吕正操家。吕彤岩问叶选基，这一消息要不要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说，你赶紧给邓家报信。由于邓小平处于软禁之中，他们担心邓家电话受到监听，于是吕彤岩乘公共汽车前往和平里，来到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值得提到的是，吕彤岩对笔者称当时叶选基并不在场，是她自己决定去贺平那里，而叶选基则坚持是自己在红星胡同提议吕彤岩去贺平家。叶选基与吕彤岩两人当面对质，各持己见。考虑到叶选基通常对自己经历的细节记得比较清楚，所以笔者倾向于叶选基的回忆。）

叶选基为什么让吕彤岩给邓家报信，而不是自己去呢？那是因为吕彤岩跟邓榕以及邓榕的丈夫贺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吕彤岩告诉我，她跟邓榕很早就认识。在“文革”中，邓榕在陕北插队落户，而她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也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很巧，跟邓榕所住的村子只隔5里路，所以过从甚密。她甚至

还为邓榕介绍对象，把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将军的儿子贺平介绍给邓榕，她成了邓榕的“媒人”。正因为这样，贺平听到吕彤岩告知的重大消息之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骑车飞快地从和平里赶往宽街邓府。

如同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所记(43)：

> 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的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部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的烟火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面，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这样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关于拘捕“四人帮”的提问：

>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
>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44)

走笔至此，还要提一下，我在北京还采访了万里委员长的长子万伯翱、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45)，得知发生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的另一幕——

叶选基在10月7日早上7时多，赶往北京翠家湾王震家。王震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立即驱车前往陈云家报告，他又派儿子王军赶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作为邓小平的两员“黑干将”的胡耀邦和万里以及廖承志正在那里住院。自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万里便以患脉管炎为由，住进北京医院。当王军告诉他们特大喜讯，非常兴奋的胡

耀邦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

当时，乔冠华也在那里住院，就住在万里病房对门。万里与乔冠华是老相识，但万里那时候是“批判对象”，不便去看望乔冠华，而乔冠华居然一次也未曾去拜访咫尺之内的万里。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之后，乔冠华的病房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谢绝探视！”

郭沫若欢呼“大快人心事”

10月7日，《光明日报》按原计划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标本——批判〈论总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卑劣手法》。这是华国锋、叶剑英为了迷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而故意刊登的。

10月7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得知粉碎“四人帮”之后，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总理：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陈云得知“四人帮”被捕，连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徐向前获知喜讯，高呼：“好得很，好得很！”

聂荣臻则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

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提法。

10月12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毛的遗孀被捕》，公诸于世。

16年之后，张耀祠在与笔者的长谈中，首次披露了他当年拘捕江青的详细情况。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image]

首都人民载歌载舞庆祝粉碎“四人帮”

汪东兴后来这么回忆：

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

这次行动从8点开始，到9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

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都解决得很顺利。当时都是先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了罪，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问题解决后，当晚10点，在京的政治局成员都集中到玉泉山叶帅住的9号楼去开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叶剑英宣布，在一小时前，没费一弹，没流一滴血，就清除了“四人帮”。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个小时，一直开到天明。

当时不在北京的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同志，是由我打电话通知的，告诉他们政治局的决定，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为主进行的。我只做了一点具体工作。主要是华、叶当时决心下得透，也很果断。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出，全国振奋。

85岁高龄的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激情满怀，作《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庆贺：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四人帮”的“地下生活”

“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那个难忘的夜晚，被押进神秘的地下工程之后，就被关押在那里，过着“地下生活”。

陪同江青进入地下工程的护士马晓先，很注意观察。她记得，红旗牌轿车在地面上行驶一段路，便进入地下。先是驶过一条地下通道，然后才进入地下室。也就是说，地下室离地下入口相当远，与外界完全隔开。

马晓先还注意到，地下工程里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觉得眼熟，不由得记起，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1976年9月18日结束群众瞻仰之后，9月20日凌晨3时50分，毛泽东遗体由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离开人民大会堂，被送到地下室里去保存，直到水晶棺做好、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建成，才移往那里。由于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这个地下室的代号为“769”。

当毛泽东的遗体保存在“769”地下室的时候，马晓先曾跟随有关的人员到过那里看过毛泽东遗体。当时“769”地下室警卫与医务两套班子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从大门口到“769”地下室设了四道岗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张耀祠等领导轮流带班。为了确保“769”地下室环境不受污染，中央规定汽车不准进入。中央领导人来此，即使是华国锋，也必须在外面下车，步行进去，沿地下通道走100多米，才来到“769”地下室。“四人帮”中除姚文元之外，都来过“769”地下室。

她记得，“769”地下室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也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判定，如今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可能也就是“769”地下室。

不过，据1976年9月20日凌晨护送毛泽东遗体到“769”地下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忆，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穿过长安街，朝西四方向的毛家湾驶去，进入一家医院。“769”地下室在北京某医院的地下，原本那里是一个地下手术室，是医院为备战而设立的。难道“四人帮”是关在那里？

很可能“769”地下室的装饰，与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一样，所以“四人帮”未必是关押在“769”地下室，而是中南海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工程，原本是战备工程，按照毛泽东“深挖洞”的指示挖的战备指挥部。由于是供领导人在发生战争时进行指挥的地方，所以地下工程里的房间都比较宽大。

在关押“四人帮”之后，地下工程外边有警卫，门口有警卫，屋里有警卫。

“四人帮”在地下工程里，名副其实地受到隔离审查。

说隔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监禁，由拘捕他们时的行动小组负责看管。“四人帮”被隔离在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有谁也关押在那里。地下世界一片寂静。他们不准看报纸，也不准看电视，完全切断了外界信息。

说审查，在那里“四人帮”确实受到审查。但是“四人帮”在刚刚被打倒的日子里，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持顽抗的态度。

“四人帮”虽说处于“地下世界”，但是住宿条件都还是不错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套间，除了卧室之外，还有客厅以及卫生间。每个人都有桌椅，有纸、笔，另外也都有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每天都通风除湿，并且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四人帮”在隔离室内不戴手铐，可以自由行动。当然，为了防止他们寻短见，他们一举一动24小时处于看管人员的监视之下。

不过，看管人员只对“四人帮”实行监视，对他们不虐待，不侮辱。为了防止他们自伤自残，对每个人都进行了搜身，收缴了尖利器具。上级明确指示，“四人帮”在地下关押期间，不能逃跑，不能死亡。

在地下室里，“四人帮”的伙食也还不错。他们的伙食跟看管人员一样。当然，饭菜不能在地下室里烧，而是由地面上的机关食堂做好，以专人、专车送到地下室。早餐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餐、晚餐两菜一汤，一荤一素，肉、蛋、鱼不断，主食大米、馒头，经常变换花样。面食也有水饺、面条、大饼、油饼等花样。

江青吃了一段时间后，要求给她增加吃点粗粮以及带粗纤维的蔬菜，工作人员报告上级之后，满足了她的要求。

张春桥吃了几天突然不吃饭了，受到看管人员的批评。张春桥解释说：“我不是绝食。你们年轻，不知道，我吃多了身体不舒服，难受。”

姚文元在被隔离的第一周，态度比较差，摔东西，而且还骂人。他还总是打听，自己究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姚文元在受到批评教育之后，态度才逐渐好转。

江青在地下室很仔细阅读《毛泽东选集》。坐着累了，就躺着在床上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很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一边阅读，一边还用笔在书上画道道，有时还写下眉批。张春桥还要求给他《列宁选集》，看管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姚文元看书看累了，会站起来甩甩

手，弯弯腰。

只有王洪文显得差一些，不大看《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一边看书，一边不停地抽烟。地下室里的通风条件毕竟比地面差，所以张春桥的烟瘾把地下室弄得乌烟瘴气。经过看管人员提醒之后，张春桥这才尽量少抽几根香烟。

江青在地下室里，曾经写了几封信给中共中央领导人。这些信件都由负责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取走上交。看管人员记得，江青曾经在纸上写过两句话，一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句是“枪打出头鸟”(46)。

处于信息封闭状态的江青，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马晓先记得，江青曾经问她：“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你们这样，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

可以看得出，江青心中是很不服气的。

在关押期间，“四人帮”都是自己洗衣服，自己打扫房间，自己擦桌椅。

江青不知道怎么样用洗衣粉，把洗衣粉撒在衣服上。经过马晓先指点，江青才知道应当先把洗衣粉溶解在水里，再把衣服泡在水里，过些时候用手搓洗，就把衣服洗干净了。从那时候起，江青学会了用洗衣粉洗衣服，每一次都洗得很认真。

“四人帮”生活在“地下世界”，看管人员也陪同他们生活在“地下世界”，终日不见阳光。他们回忆说：

> 长期不见阳光，空气湿度大。晚上盖上被子一会儿一身汗，被子稍露缝隙就冷气刺骨。不少同志都烂裆了，有的患了高血压、关节炎。长期在地下，连夜宵一天四餐，又没有地方活动，有的发胖，觉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个月后才用车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没一个叫苦的，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再比如，长期少眠的考验。工作人员24小时在灯光下值班，“四人帮”的一举一动都要在值班人员的视线内，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紧张。开始时每组仅四个人，两人一班，每天两班倒，时间长了就严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员值班时困了，就用手拧大腿，有的咬舌头。一个多月后，上级又从警卫局和警卫团抽调了一些干部来帮助看押。这样人多了，两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47)

在“地下世界”生活了半年，1977年4月9日，武健华通知各组，晚上执行重要任务。原来，那是中央决定把“四人帮”押送秦城监狱，交由公安司法机关拘捕关押。押送路程约一百多华里，必须保证一路安全。

“四人帮”是分开押送的。在4月10日凌晨，先是押送王洪文，然后押送张春桥。接着押送江青，最后押送姚文元。

押送“四人帮”时，都是用防弹红旗牌轿车，前有开道车，后有后卫车。上级指示，如果在途中遭遇武装拦截、劫车等意外情况，由前后卫车负责反击，载有“四人帮”的防弹红旗牌轿车不开枪反击，而是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快速前进。

从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进入“地下世界”，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押送秦城监狱，“四人帮”在“地下世界”前后关押了六个月零四天。

负责拘捕“四人帮”的行动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其他看管人员，“陪”着“四人帮”在地下生活了半年。为了保密，这半年之中，他们没有跟家人联系。随着“四人帮”被转移到秦城监狱，他们也“解放”了。

197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次参与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并宴请他们。祝酒时，华国锋说：“大家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剑英则说：“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综上所述，可以排出一张粉碎“四人帮”日程表如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1976年9月10日：华国锋通过李先念找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同日，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密商，汪东兴坚决支持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976年9月13日：李先念到北京西山看望叶剑英，转达华国锋的意见。

1976年9月21日：叶剑英前去看望华国锋，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与叶剑英初步确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案，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的高层同盟者中秘密征询意见。

1976年9月26日晚：华国锋与李先念、吴德一起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实施方案。华国锋明确指出：“早比晚好，越早越好。”他们商定，在国庆节之后，花十天时间做充分准备，然后伺机动手，把“四人帮”抓起来隔离审查。

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左右，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家中，商议扫除“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紧接着，叶剑英又看望了华国锋，希望华国锋能够尽快联合汪东兴，解决“四人帮”。

当天晚上，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国锋要求汪东

兴尽快制定解决“四人帮”的行动计划。

华国锋还来到吴德住处。吴德提出在解决“四人帮”时，应同时解决“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委托吴德、吴忠对“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采取行动。

1976年10月4日：当天下午，华国锋约了吴德商议行动计划。下午5时，吴德刚从华国锋那里回家，又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要他马上再来一趟。吴德随即赶去，原来是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汪东兴转达了他与叶剑英商讨的拘捕“四人帮”的方案，然后与华国锋细细商讨。这样，10月6日的行动方案浮出水面——

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

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北京卫戍区部队支援；

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汪东兴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是10月4号下午决定的”。

当天深夜，华国锋又悄然来到汪东兴家，密商10月6日行动方案的种种细节，谈了四小时之久。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另外安排一个行动小组解决毛远新、江青。

1976年10月5日：上午，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商谈，确定行动小姐的分组名单以及行动纪律等。下午4时，华国锋和汪东兴分别乘车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

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聚集在西山，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10月6日晚上8时动手，逮捕“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汪东兴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通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从7点55分抓捕张春桥，到8点30分拘捕姚文元，前后只用了35分钟，就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中的三个。与此同时，第三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晚上9时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离开中南海怀仁堂，前往玉泉山。

晚上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

1977年4月10日：从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进入地下工程隔离审查，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押送秦城监狱，“四人帮”在地下前后关押了六个月零四天。

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1976年10月7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10月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这一“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6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

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飚，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10月7日上午9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萧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2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

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四人帮”被捕之后，由于封锁消息，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的真实情况。

尽管马天水和周纯麟突然奉命前往北京，曾引起徐景贤和王秀珍的怀疑，但是他们到达北京之后，并未发来异常的信息。

10月7日晚，王秀珍打电话给北京京西宾馆，找马天水。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的。房佐庭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其实，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对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当王秀珍要房佐庭找马天水直接通话时，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

由于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接的，所以没有引起王秀珍的怀疑。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个电话。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刘湘屏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尽管于会泳和刘湘屏的答复隐含着异常情况，但是还不足以使徐景贤对于北京局势作出发生异常的决断。

这样，10月7日那天，上海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上海陡然紧张起来！

发现北京动向异常，是从10月8日清早开始的。

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徐景贤作为证人出庭。徐景贤在证言中，详细叙述了当时发现北京动向异常的过程。

>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老婆）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

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引者注）……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当时萧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引者注）……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引者注）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48)

廖祖康的这一估计(49)，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

徐景贤听了，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就这样，“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上午作出了北京“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判断。

但是，这一判断，还只是“极可能”而已，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尽管尚未得到最终证实，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们以及上海的重要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做好应付突变的种种准备。

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在1976年11月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10月8日下午在上海康平路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的情形：

> 8日下午3点，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50)

为了摸清北京的真实情况，王秀珍派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在8日下午飞往北京，打听消息。王秀珍与他约定了暗号，如果北京果真发生“右派政变”，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

确证北京动向异常，是在10月8日晚上。

朱永嘉这么写道：

> 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51)

当时，确证北京动向异常，除了缪文金的电话之外，还有两个电话。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来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调入公安部，准备安排他当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三句话清楚表明，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

紧接着，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刘庆棠所说的“我们文化部几个人”，无非是指于会泳、浩亮(52)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动自由。

这三个电话，最终证实了北京发生了“天大的事”！

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

由于已经确证北京的“右派政变”，在上海康平路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便变成了一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后来，朱永嘉是这么描述的：

>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53)，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还说舆论工作叫我去准备。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
>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54)

1980年12月13日上午，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王洪

文、张春桥时所作证人证言中说：

>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就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
>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

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55)

这时，法庭投影和宣读了这个手令。原文是："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徐景贤："这是你写的吧？"

徐景贤答："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好，你说。"

徐景贤："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法庭又投影和宣读了徐景贤写的第二个手令。内容是："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指挥。"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答："这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你继续讲。"

徐景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56)

10月8日午夜，上海的疯狂之夜。

关于一号指挥点，徐景贤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

10月9日凌晨1时，那里灯火通明。应召赶来的有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57)、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

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10月8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

> 在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在10月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
>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一〇一号武装巡逻艇、十五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施尚英原在上海造船厂工作——引者注）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
>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引者注），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7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10月9日的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10月8日之夜——“四人帮”被捕48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1000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

10月9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陈玉芬(58)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陈玉芬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陈玉芬家。

厂医陈玉芬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陈玉芬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陈玉芬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陈玉芬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10月9日上午10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的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在1977年5月27日受到审讯时，曾这么说：

> 9号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样紧张了。中午，萧木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讲他可能马上要走了。我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他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萧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在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我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萧木情

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59)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 10日下午3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9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1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60)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
>
> 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

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61)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62)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 10月12日晚上8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
>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
>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

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引者注）

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引者注）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引者注）。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萧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6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引者注）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20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10月13日晚大干！

10月13日凌晨1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63)，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虽然朱永嘉力主10月13日早上6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11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10月13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

“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10月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陈冀德记述道：

> 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
> 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不通，慢慢会通的。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站起身就走了。我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10月13日晚，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403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10月14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萧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萧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

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为之一扫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10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17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

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10月22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10月24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上海军民大会

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10月27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

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10月30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待——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待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里顺便提一笔马天水的下场。1998年安徽《党员生活》杂志发表《马天水的暮年》一文，现照录于下：

>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
>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已经一年了。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决定派员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
>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
>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对抗日战斗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革”，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

马天水的精神病，属于偏执型。1988年12月，马天水病故，终年

76岁。

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笔者曾在上海市监狱见到正在服刑的徐景贤和王秀珍。后来，笔者又在上海多次见到获释的徐景贤。年逾花甲的他，居然没有一根白发，他对笔者笑称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好，因为他父亲上了年纪时一头乌发。他依然思维敏捷，谈吐逻辑严密。

---

(1) 1996年5月27日，叶永烈采访姚远方于北京。

(2) 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略》编写组：《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290页。

(3)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45页。

(4) 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5)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6) 原文载1992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收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7)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8) 李小林：《借口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半途突然转道——父亲与叶帅在西山有次特殊“笔谈”》，载张黎明主编《我的父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 这常常被传说成右手手指骨折。其实叶剑英是“左撇子”，是用左手拍桌子。

(10)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29页。

(11)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2) 2009年5月31日，叶永烈采访叶选基于上海安亭宾馆。

(13) 据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4) 据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5) 据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6) 据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17) 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坛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之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264页。

(18)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19)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20)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21) 根据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原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的审查做出的结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的。另外，莫艾专案组成员王忠人先生也于2005年12月9日给笔者来信，说明这一点。

(22) 吴江：《十年的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2版，第9页。

(23) 1990年7月16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

(24) 马晓先是江青那里的护士，参加了拘捕江青的行动，但是没有参加汪东兴召见第三行动小组的活动。

(25)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26)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27) “old王”即老王，“teacher”即教师。

(28) 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6集，中央电视台1998年8月6日播出。

(29)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30) 武健华回忆说是叶剑英先到，华国锋后到。叶剑英的警卫参谋“马头”说：“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31) 笔者这里所依据的是汪东兴的回忆。但是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认为第一个落网的是王洪文。另外，武健华也称第一个被捕的是王洪文。武健华还说，王洪文是7时55分被捕，张春桥是7时58分被捕。

(32) 王文理：《叶帅与粉碎“四人帮”》，《时代潮》2000年第12期。

(33)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34)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35) 关于拘捕江青的情况，主要依据张耀祠将军1992年10月9日、10日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36) 据马晓先的回忆说是“下午4点多”，显然马晓先的回忆有误。

(37) 1991年7月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毛远新。

(38) 据田炳信：《红墙内的护士长——访“文革”期间中南海保健组成员马晓先》，2005年4月27日《新快报》（田炳信于2005年1月2日在北京建国饭店9009房采访马晓先）。

(39)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40) 指赫鲁晓夫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41) 范硕、高屹：《肝胆相照，共解国难——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危难时刻》，《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42) 《邓榕同志致本报编辑部的一封信》，1997年6月20日《作家文摘》。

(43)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350页。

(45) 2012年10月1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万里委员长的长子万伯翱，10月14日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

(46)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47)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356页。

(49)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50)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51)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52) 浩亮在“文革”后受到审查，重新恢复原名钱浩梁登台。1992年在山东演出时，钱浩

梁突然摔倒在舞台上，之后被诊断为脑溢血。此后无法再上舞台。

(53) 据徐景贤当时的手令为3500人集中。

(54)《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5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360页。

(56)《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57)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58) 1986年10月27日，叶永烈采访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陈玉芬。

(59)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60)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61)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62)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63)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第二十五章　押上历史审判台

原本是由王芳审江青

江青被捕，在地下工程关押之后，转往北京远郊昌平的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直接管理的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13个省抽调了近300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

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秦城监狱中的代号为“7604”。她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她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笔者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多次采访了参加审判“四人帮”工作的王芳，并协助整理了《王芳回忆录》。王芳长期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当时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3月底，中共浙江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封绝密电报，内容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指名要王芳去公安部参加预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工作，并可带五名助手。密电还规定，在预审期间，此事对外要绝对保密。

王芳在4月6日到京开会，彭真对他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需要从两个方面作出总结：一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解决敌我性质的问题；一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并解决党的领导上的是非功过问题。对组织审判的工作，正在研究，想从地方抽调一些同志参加，王芳也在考虑的人选之内。

4月19日，王芳带五名助手去北京，正式开始参加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王芳回忆说，林彪、江青“两案”原由中纪委二办牵头审查，中央决定公开审判，移交公安部和总政军保部门进行预审。考虑到这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复杂的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等七人组成。下设审判工作小组，由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等同志组成。刘复之、凌云，后又增加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

王芳说，根据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六个预审组审讯“四人帮”集团主犯：

一组组长洪沛霖（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负责审江青；

二组组长王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责审张春桥；

三组组长卫之民（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负责审王洪文；

四组组长白钧（时任河南省公安厅长）负责审姚文元；

五组组长左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长）负责审毛远新；

六组组长王文同（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负责审陈伯达。

原本按照彭真的意见，要王芳审江青，王芳说自己跟江青太熟悉了，她耍起赖来不方便对付。于是改由江苏组洪沛霖审江青，王芳带领浙江组审张春桥。每个预审组都配有副组长，浙江组（二组）由黄荣波担任副组长。

当时，公安部把大院内东侧的5号楼作为审理“两案”的预审组办公室兼住所。那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是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来，由于当时北京交通状况不好，从公安部到秦城监狱乘车要一个多小时，有时还常常遇上堵车。为了方便工作，预审组工作人员迁往秦城监狱，住进监区的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王芳说，为利于弄清案情，对在押的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七名嫌犯同时开展了侦查预审。另外还把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二名嫌犯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萧木、廖祖康、缪文金四人也进行了审查。

王芳还说，在审判“两案”中，没有去纠缠历史问题。十名主犯当中，江青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张春桥、陈伯达也有不光彩的历史，这些都放在一边，没有去查，因为即使查证核实，也是历史问题，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16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3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3时15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image]

江青被法警带进审判庭（孟昭瑞　摄）

据副庭长伍修权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1)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image]

198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江青。（新华社记者刘少山　摄）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

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

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嘁嘁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1980年11月20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11月26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12月3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12月5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12月9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12月12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12月23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12月24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12月29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1981年1月25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过程中，对“四人帮”出示证据统计如下：

被告人	出示证据（件）	出庭证人（名）	合计
江青	86	16	102
张春桥	59	5	64
姚文元	35	4	39
王洪文	33	2	35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答话的十之七八。偶然，她也答复：“是事实。”

1980年12月24日，法庭进行辩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知道她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礴”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1979年11月至1980年5月，江青写了份长达34页的“交待材料”，题为《我的抗议与更正》，详尽描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辉斗争历程”，如“我同刘少奇的斗争”，“我同林彪的斗争”，“我同邓小平的斗争”，并历数了她的这些“斗争”如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与赞许。

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宣读了这份“交待材料”。另外，她还“精心”写了《我的一点看法》。

1980年12月24日上午9时整，值庭法警拉响了开庭铃。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长和17名审判员出庭。曾汉周主持法庭辩论。

出庭的检察人员有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五名检察员。

[image]

江青在法庭上听公诉员发言（孟昭瑞　摄）

曾汉周：“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值庭法警将江青带至法庭被告席。

曾汉周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的犯罪事实，本庭于11月26日、12月3日、5日、9日、12日和23日上午，先后六次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检察员江文："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公诉人请求发言。"

曾汉周："公诉人可以发言。"

江文："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罪行，经过六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出示和宣读了证据、证言，听取证人出庭作证，播放了江青的讲话录音，完全证实了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确凿无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现在，经过调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勾结林彪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承了林彪的衣钵，继续进行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勾当……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构成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鼓动罪，非法拘禁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从重判处。

"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调查时拒不认罪，公然多次继续诬蔑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员，肆意扰乱法庭秩序，已构成继续犯罪行为。请法庭在量刑时从严判处。我的发言完了。"

曾汉周："被告人江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那就请你们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曾汉周："是不是枪毙你，法庭将根据你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判决。"

江青："你不要装腔作势演戏了。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胆量就把你的后台导演请出来。我要和他当面对质。"

曾汉周："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律……"

江青："我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

曾汉周：“法庭调查了大量事实，给了你充分的辩护时间，你反而利用法庭进行反革命宣传。……”

江青：“你才是反革命哪！……”

曾汉周：“你侮辱法庭，这就构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大不了杀头。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你多砍几个，我多长几个……”

曾汉周（按铃警告）：“你再扰乱法庭，就取消你的辩护权利。”

江青：“对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吗？”

曾汉周：“带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起身）：“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点看法》，你不反对吧？”

曾汉周：“你可以念。”

于是，江青拿起了两页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据说，那是因为她要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只写了一篇八百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陈伯达打倒了。如今，她写的《我的一点看法》，总共不到两页，用钢笔竖写，还没有八百字哩！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是“浓缩的精品”：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
要害问题，两个纲领：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
穷凶极恶，大现原形。
掩盖罪恶，画皮美容。
树立威信，欺世盗名。
标新立异，妖言惑众。
弥天大谎，遮瞒真情。
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
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
转移人民视线，栽赃嫁祸他人。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
罗织诬陷中央文革小组，迫害灭口有关知情；
双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辈。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

1979年10月26日稿

1979年11月8日交侦查审讯员（两页）

此稿略有修改，1980年10月9日于秦城监狱

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

[image]

1980年12月24日，江青在法庭上宣读《我的一点看法》，为自己辩护。（孟昭瑞　摄）

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一案），我的意见已经说过多次了，你们爱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吧，这个我也没什么。你们现在翻刘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都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康老，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能答应你们吗？……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江青质问法庭：“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江青又说：

清君之侧，目的在"君"。
罗织陷害，血口喷人。
利用专政，搞法西斯。
精神虐待，一言难尽。
破坏政策，凶悍残暴。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image]

法庭上江青表情丰富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江青的最后陈述，历时近两个小时。

曾汉周："被告人讲完了吗？"

江青："讲完了。"

曾汉周："请把你的原文交给法庭。"

江青："可以。"（将原文交给值庭法警）

曾汉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已经累了，到此为止吧。"

曾汉周："把被告人江青带下去。现在休庭。"

此时已是上午11时38分。

12月29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24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说："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忽地提出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江青的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发怒，说审判长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她谩骂法庭，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你在法庭辩论中，对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不是进行陈述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辩论的机会，进行诽谤、谩骂，法庭一再警告你，你不服从法庭的指挥，违犯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咒骂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她攻击邓小平，咒骂华国锋是"叛徒"。

在十名主犯之中，江青民愤最大。在进行判决前，曾听取各方意见，在部队代表中做过"测试"：

> 被邱会作陷害打倒、复出后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的李耀文将军发表意见："江青和张春桥起码应判死刑，王洪文可判15年，姚文元和陈伯达应分别判处无期。黄、吴、李、邱、江应判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
>
> 接着，海军、空军等单位分别拿出判刑意见。普遍认为江青、张春桥应判死刑或死缓；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比"四人帮"好，因此判的最高刑应比"四人帮"低。"四人帮"是靠"打、砸、抢"起家的。
>
> 正在这时，全军几百万名指战员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十名主犯量刑进行了投票表决。参加投票的88名代表，有近10种意见。
>
> 江青：死刑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
> 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
>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20年11人；
>
>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20年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20年27人，死缓15人；

黄永胜：无期徒刑43人，20年22人，死缓11人；

吴法宪：无期徒刑15人，20年35人，15年24人；

李作鹏：无期徒刑10人，有期徒刑11人，20年38人，15年11人，7年1人；

邱会作：死缓13人，无期徒刑11人，有期徒刑12人，20年28人，15年21人；

江腾蛟：死缓25人，20年39人，15年13人。(2)

江青在宣判时的闹剧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十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

这天，江青是十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个。显然，出于对最后判决的关注，她一夜没有睡好。

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达1.6万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然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十名主犯“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

在“个人罪”这一部分，江青名列第一位。关于江青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7年7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自1967年5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image]

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在被告席上听候判决。（孟昭瑞　摄）

> 1968年7月21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88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
> 1966年至1970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24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
> 1966年12月14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

> 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12月27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
> 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
> 1976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3月，江青在对12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
>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
>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江青戴着耳机，侧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伍修权宣读的关于她的“个人罪”的部分。

最后，由庭长江华宣布判决，他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念道：“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顿时，全场寂静无声。江青伸长了脖子，屏息敛气，侧过了耳朵——她预料，排在第一名的，一定是她。

果真，江华提高了声调，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江青一听，顿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乱喊乱叫起来：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坚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image]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图为法警为其戴上手铐。（孟昭瑞　摄）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江青在“文革”中，曾出席各种群众集会，领呼过各种口号。所以，她对于喊口号颇为“熟练”。

此时，看到江青这般狼狈，万众欢呼，人心大快。

随着伍修权的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将耍赖的江青，拉出了法庭。

到了外边，法警一松手，江青干脆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吵、大闹，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时一位法警对她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就像吃了“止哭剂”似的，江青一听，不哭、不吵、不闹了，马上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

原来她太沉不住气了，刚才她在法庭上只听见“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就闹了起来，没听见后面的一句话——“缓期二年执行”。

江青，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精彩的一幕闹剧——她太沉不住气了！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本书初稿中，是写成伍修权宣读对江青的判决。这是依据伍修权的回忆：“后半部分由我接着宣读。这一部分的最后，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期二年’，她就慌忙叫喊起来……”(3)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对于江青的判决，是他宣布的。

当本书初稿《蓝苹在上海》在1988年第七期《法制文学选刊》发表后，收到江华秘书张维1988年8月16日的来信。他提出相反的意见。他指出：

《法制文学选刊》编辑部：

看了贵刊1988年第七期上登载的报告文学《蓝苹在上海》，觉得此文结尾部分“精彩的最后一幕闹剧”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的宣判情况，与事实不大相符，我向江华同志作了了解，并查阅了审判记录。现将事实真相寄上，请予登载，以正视听；并请转告此文原载刊物《青春丛刊》以

及作者叶永烈同志。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被告公开宣告判决，判决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由江华庭长宣读，伍修权副庭长只宣读了判决书中属于个人罪的部分。对十名主犯的判决是由江华庭长而不是由伍修权副庭长宣读的。

在宣判时，江华庭长有意地放慢速度，想使这举世瞩目的严正判决更加凝重。当念到“判决被告人江青死刑……”时，作了一个停顿，此时法警准备给江青戴手铐。但江青一听到死刑两个字，便歇斯底里地发作了，她边喊叫边往下溜，法警好不容易把她拉起来铐上手铐。

江华庭长继续宣读：“……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江青这时什么都听不进了，她继续哭闹，并喊口号，扰乱法庭。

为了不影响整个判决，副庭长伍修权责令江青退出法庭。由两名法警将江青押出法庭，带到候审室。

在押解过程中，江青作了最后的表演，她边走边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等口号。

到候审室后，她还赖在地上耍泼。直到法警告诉她“缓期二年执行”时，才安静下来。原来江青听到“死刑”二字后，乱了方寸，处于高度紧张和疯狂状态，根本没有听到最后的判决，当她知道并不立即执行时，便老实了。

叶永烈同志的报告文学，说对江青的判决是伍修权同志宣读的。当然，他是根据郑君里夫人黄晨的回忆，但黄晨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去年，我在《大千世界》的一篇文章里也看到了这样的错误的说法。如不纠正，将来还会进一步流传。

关于特别法庭的审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中央电视台作了录像，还有许多新闻单位进行了录音记录，有案可查。而且这一案件的判决到现在还不到八年的时间，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照说是不应该以讹传讹的。

希望贵刊依照事实对错误的说法予以澄清。请回信。

此致

敬礼

江华同志秘书　张维

1988年8月16日

关于江青的判决，伍修权回忆特别法庭反复研究的情况：

> 这次判决，在国内是大快人心，国际上的反应基本上也是风平浪静，各方都认为我们判得还是合理的，没有发生什么异议。在宣判以前，国际上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当时我们已经看出苗头，如果立即杀了江青，反映可能很坏，有的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有的外国人到我国驻外使馆去请愿保护江青，并且国际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虽然我们是独立审判，不应受外国的影响，但这些情况在判刑时也不能不予考虑。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原来估计国内可能会有人不满，现在看来也都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了。

在判决后的第二天——1月27日，特别法庭派出司法警察，向江青送达了判决书。

在判决后一星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正义路一号，逐一会见十名主犯。江青见到彭真时，骂他是“邓小平的走卒”，她要“见华国锋问个明白”，并要求“见邓小平一面”。彭真见她毫无认罪的表示，谈话也就不了了之了。

唐纳的后来

走笔行文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本书前文提及的、与江青关系颇为密切的几个人物后来的命运。

幸亏唐纳在“文革”岁月，身居海外，“旗手”鞭长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虽然由于他跟蓝苹有过那么一段关系，他的名字是人们熟知的，但是他与蓝苹离异之后的经历，他怎样来到海外，他的后来情况如何，却是鲜为人们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

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1981年出版的《报海旧闻》中，这样提及唐纳：“……正好这时（指1945年——引者注），英国大使寇尔从重庆来到上海。原在《大公报》编过副刊的马季良（唐纳）兄，那时在英国新闻处(4)工作，我们找他商量，他对我们的打算，极表赞成。于是，我们写好了一份‘请帖’请他代为递交寇尔。”

[image]
唐纳与蓝苹离婚之后与陈璐结合

唐纳受徐铸成之邀，在上海出任《文汇报》总编辑。

后来，唐纳来到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5)。

1948年12月，唐纳以香港《文汇报》驻联合国特派员的名义，离港赴美(6)。

1951年他来到巴黎，定居那里。

他的挚友笑着告诉我，唐纳为什么会离沪前往海外？原来，这是与他对妻子陈润琼的一片痴情有关。

当唐纳与陈璐离异，他一直独身，忙于写作。

1946年，唐纳在上海记者协会的活动中，见到一位女记者操流利英语，谈吐非凡，举止端庄，才貌双全，顿时引起唐纳的爱慕，居然一见钟情。

这位女记者，乃国民党政府前驻法大使陈箓的三女儿陈润琼，福州人，不仅英语娴熟，而且法语纯正。

唐纳有意，陈润琼却并未首肯。

陈小姐后来到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所以唐纳亦随往美国。

陈小姐发觉，唐纳为人善良，富有才华，富有人情味。据云，唐纳每天给陈女士献上一束花，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陈小姐终于为他的痴情所感动。1951年，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婚后直至唐纳去世，漫长37年，夫妻白头，恩爱如初。

唐纳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饭店来了。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后来的京华饭店，到后来的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

陈小姐为人能干，善于经营，成为唐纳的贤内助。自1979年起，唐纳退休，饭店交给夫人经营。

陈小姐生一女儿，唐纳为之取名马忆华，想念祖国之意。马忆华大学毕业，亭亭玉立，成为唐纳夫妇的掌上明珠。

远在异国他乡，唐纳过着小康生活。

据说，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美国露克珊·维特克女士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曾两次前去找他，愿以20万至30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唐纳坚决拒绝。

也有的海外报纸曾载唐纳在饭店二楼举办江青照片展览，以招徕顾客。唐纳断然否认。唐纳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才得以几度返回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他热爱祖国，在海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笔者看过他在各地旅游时所拍的照片，他的交际圈仅限于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唐纳虽然身在海外，仍挂牵着红儿。每年5月1日，唐纳总是给红儿寄来或者托朋友带来生日礼物。红儿记得，有一回生日，父亲寄来一套小西装，使他兴奋了好多天，逢人就说："这是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还给红儿寄来钙针。

最初，唐纳是从香港给红儿写信。后来，红儿收到父亲从美国寄来的信。父亲在信中鼓励红儿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新中国的英雄"。

1953年，红儿收到父亲从法国寄来的480万法郎（旧法郎），给他买自行车。

唐纳托他在上海的老朋友们照料红儿。夏其言、许怀沙等老朋友，共同负担红儿的生活费。后来，叶露茜自告奋勇，挑起照料红儿的担子。当时，叶露茜照料着她和赵丹所生的两个孩子以及她和杜宣所生的七个孩子，加上红儿，总共有十个孩子。红儿在上海长宁中学上学。叶露茜担心他年纪小，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每月把30元生活费交给学校的教导主任。红儿要钱用，写“条子”向教导主任领取。

红儿成人后，到上海文汇报社工作。唐纳曾担任《文汇报》总编辑。所以，红儿在文汇报社，得到唐纳的老朋友们的多方照料。红儿说，在《文汇报》，上从总编辑，下至排字工人，一说起唐纳，都很尊敬。后来，红儿转到安徽工作。

陈璐与唐纳分手后，仍活跃于银幕与舞台。1948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解放后，她在天津演出《千年冰河开了冻》、《乌鸦告状》等话剧。后来，她回到故乡武汉，在武汉“歌话二队”担任演员。在1965年，陈璐演出《送肥记》之后，结束了演员生涯。

在“文革”中，陈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攻击中央首长”——所谓“中央首长”便是江青。其实，那是因为一些文艺界朋友知道她是唐纳的前妻，问起唐纳与蓝苹的往事，这就成“攻击中央首长”了。在武汉人民剧场，曾召开了两场“批斗”陈璐的大会。陈璐被下放到湖北襄樊农村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陈璐没有工资，却带着两个孩子——红儿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在农村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陈璐才从襄樊农村回到了武汉。红儿也从安徽调到武汉。从此，陈璐和红儿在武汉开始安定的生活。

[image]

叶永烈与唐纳之子红儿合影于武汉

如今，红儿在武汉一家公司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他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也事业有成。

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终年74岁。

据云，他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他曾找人寻找当年他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只是他未曾写出这部自传，便病重了。

徐明清为江青吃冤枉官司

徐明清也是与江青有过密切关系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徐明清担任中央某部人事司副司长，跟江青没有什么来往。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住在中南海，门卫森严，再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可以串门似的步入毛泽东的窑洞。

黄敬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他遇见徐明清，还是亲热地喊她“阿徐”。

在“文革”中，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政治舞台上“露峥嵘”。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恶风。于是那些过去曾被捕、坐过牢的老干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专案组”审查对象。徐明清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

徐明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1973年6月2日、6月19日、11月16日，三度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申辩，推倒不实之词。徐明清在信中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徐明清本来以为，江青会如实为她作证。不料，江青不予理会。那些日子，徐明清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王观澜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到几十次的批斗。1972年4月13日，他参加陈正人追悼会，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说道：“身体不错，没有浮肿。能工作！能工作！”紧接着，周恩来便安排王观澜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观澜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农业部顾问组组长。

然而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际，徐明清却蒙受了一场历史的误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

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立即开始了。

一查江青的档案，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30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诚如所有的江青传记都要提到徐明清。

于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10月10日，中央专案人员便来敲徐明清家的门了。

在作了审讯式的谈话之后，便要徐明清写材料。徐明清所谈、所写，大致上跟在延安时所写的材料差不多。专案人员看了以后，认为徐明清写的是“客观主义”，“不深刻”。何况，她当时头上还戴着“叛徒”的帽子，专案人员认为她在“包庇”江青。

于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关押在一个至今不知地点的房子里，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要她交待，要她写材料，弄得她的神经有点错乱了。

1976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监狱。在那里，徐明清受到更加严厉的审问。当时，就连王观澜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撤消了！

在逼供信的情况下，徐明清于1977年1月8日写了一份交待。徐明清说，这份交待是由审问者口授，由她执笔写成的。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被逼而写的这份交待，在两个月后——1977年3月6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之中，印发全国。文件中所加按语说：

>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真实情况的老同志开始自觉反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手调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从胡耀邦的一次报告中发出的。那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批评了乱抓人的问题，一口气点了二十多个遭到乱抓人的名字，内中提及了徐明清。这表明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注意到徐明清冤案。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江青的历史问题，事关重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徐明清带来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中央组织部着手认真调查徐明清的历史情况。

1979年4月，秦城监狱的看守忽然通知徐明清，说是要她进城看病。她觉得奇怪，说自己没有生什么病。看守说反正有车进城，你随车去检查检查身体也好嘛。既然如此，徐明清答应了，准备进城检查身体。可是看守又通知她，把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走！

徐明清心中纳闷，不知究竟，只得照办。

进城之后，她被安排住在一家监狱系统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原本憔悴如鬼的她，经过一个多月休养，算是有点人样了。

一天，她正躺在床上，监狱长忽然进来，通知她："赶紧起来，回家去！"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快，快，王观澜同志派车来接你啦！"监狱长说，"他和孩子们在外边等你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翻身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一定要把问题讲清楚，我才能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你们逼我写的，我不承认！"

于是，请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调查了解，不久就会对你的问题作出正式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王观澜以及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不过，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的。正因为这样，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得到了认真、坚决的贯彻。她的"通天"案子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

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这样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后来因江青问题蒙尘，风风雨雨14年，徐明清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艰难的日子。

她与笔者长谈。最后，她谈及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人是会变的。江青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了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等等问题……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徐明清于1990年1月12日给笔者来信，感慨万千地写道：“十四年，对一个人来说，太长了！”“路线偏差造成对革命同志的精神、肉体的摧残、折磨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内耗！”

刘志坚和秦桂贞“翻身”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是被江青打倒的，遭到了长期监禁。

那是1974年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秘书念着长长的名单。他从这年春天起，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渐衰，不能亲自阅批文件，要靠秘书念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庆典即将举行，有关部门报来了出席国庆招待会并拟见报的2000多人名单。

毛泽东主席听毕，提出要增加萧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名单进行讨论，“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见周恩来1974年9月29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的小胡同——拐棒胡同，那里的一座四合院在沉寂了七个春秋之后，忽地热闹起来。

29日那天，一辆轿车停在四合院门口。来人奉中央之命，正式通知软禁在那里的刘志坚(7)：“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明天，你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

喜讯来得那么突兀，刘志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急急如律令：洗澡，理发，赶制新军装……裁缝在给他量了身材之后，当天就做好一套崭新的军装送来，以便他翌日能出席国宴。望着那红的帽徽和领章，刘志坚百感交集，泪水模糊了视线。

奉命监禁他达七年的部队撤走了，换上了原来的警卫员为他警卫。炊事员回来了。久别的那辆吉姆牌轿车，又回到他的身边。夫人刘莱瑛，也和他团聚了。一夜之间，他从“囚犯”跃为首长，可谓天渊之别。

翌日傍晚，吉姆车送他来到熟悉的人民大会堂。年逾花甲的他，穿着一身新军装，步入宴会厅，见到抱病前来主持国庆招待会的周恩来总理，屏息聆听周恩来致祝酒词。许多人对于曾被“打倒”的刘志坚突然“亮相”公众场合，投来惊讶的目光。

10月1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在报道昨晚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大名。全国各大报所载国庆招待会出席者的名单中，也都印着“刘志坚”——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第一副主任的名字。

“哦，刘志坚出来了！”这，成了当时全国关注的新闻。

10月3日，叶剑英元帅召见了刘志坚中将，详细询问了他的种种情况，特别问及了他的身体状况。

四个多月后——1975年1月13日至18日，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刘志坚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3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当时的院长为宋时轮上将。

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召见刘志坚。不久，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从此，他在西南边陲这一重要的军事岗位上，干了七年多。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刘志坚冤案才得以正式平反。在正式平反后，年已古稀的刘志坚，被从昆明调回北京。

他的三个子女，在“文革”中曾受他株连，天各一方：

长女原在中央美术学院学国画，被调离北京，到兰州那山沟里的“五七”干校劳动；

二女儿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文学理论，被分配到东北一所中学教书；

小儿子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煤矿当工人。

随着刘志坚正式平反，一家五口人分处五个地方的局面总算结束。

年近八旬的刘志坚将军，住在北京西城。在宽敞的客厅里，我与他以及他的夫人刘莱瑛长谈着。客厅里，挂着舒同题赠的李白的诗。他的记忆力仍很不错，往事历历在心头。

回顾“文革”初期的往事，他感叹道：“当时，虽然自己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想不通，但是也并不很清楚。我主管军队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我当时对毛泽东主席处于迷信状态，所以对‘文革’的错误也不是一开始就看出来的。对于‘文革’，我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秦桂贞受江青迫害，也吃尽苦头。她骂江青是“妖怪精”。她恨透了江青。

终于，1976年10月，她听到了“妖怪精”给抓起来的消息，兴奋得失眠了！

终于，她请人代笔所写的关于她受江青迫害的材料，上了揭发江青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终于，1980年11月，她登上中国民航班机，飞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她住在北京当时第一流的京西宾馆。

一天，法官忽然来到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对她说：“秦桂贞同志，在公审江青之前，我们请你协助完成一项任务。”

“什么事？”她连忙问。

“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作了交待。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法官说道。

秦桂贞一听，怒火顿起，说：“这妖怪精……”

“我们想请你辛苦一趟，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法官说，“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想赖账！”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剧照，秦桂贞一眼就认出，这是她当年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贞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照片。

秦桂贞马上站了起来，跟着公安人员离开京西宾馆。

汽车驶出北京城。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一片熟悉的景象：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秦桂贞兴奋起来：“哈，妖怪精，我们‘对调’啦——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今天你来住！”

随着公安人员步入秦城监狱，秦桂贞见到一个女人裹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翻起海虎绒衣领，倚墙坐着，在那里晒太阳。此人面色白里透红，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养神哩。

秦桂贞细细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妖怪精”！

秦桂贞怒不可遏，对着“妖怪精”大声喊道：“蓝小姐，我来了！”

江青一听这熟悉的声音，立即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终于喊了出来：“阿桂！”

江青居然伸出了手，想跟她握手哩。

秦桂贞才不会跟“妖怪精”握手。她义正词严地对江青说：“我对你那样好，你对我那样狠！你是一条毒蛇！”

这位普通的妇女，用这样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回敬了“旗手”。

江青顿时脸色煞白。

秦桂贞一扭头，理都不理，走了。

秦桂贞大约走了十几步，忽然听得背后传来一声狼一样的尖叫，令人毛骨悚然：“阿桂——”

那是江青拖长声调，在那里喊她。江青的声音中，仿佛闪现了一丝负疚、羞愧之意。

秦桂贞连头也不回，上车去了。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到京西宾馆，笑着对秦桂贞说：“那天你去了以后，江青承认了对你的迫害，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

秦桂贞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她说出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终于时候到了！”

在我访问秦桂贞的时候，她伸出双腕，上面还留着当年手铐的凹印。她说这是蓝小姐留给她的“纪念”。

今日的秦桂贞，依然一人独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园洋房的底楼居住。她告诉我，这是老东家许慕贞小姐的房产，免费给她居住。

她说，许慕贞小姐和丈夫郑汝顺先生对她极好。她指着屋里的电话对我说，这电话就是他们给我装的。许小姐、郑先生现在香港，每隔些日子，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寒问暖。她生病，他们汇钱来给她。她指着屋里的微波炉说，那是许小姐和郑先生的孩子宝宝送的。宝宝，如今的大名叫郑丽波。她在美国学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叹地说：“这才叫好有好报！”

她还说及，北京的中共高干夫人们也很关心她。内中特别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璐琳，对她最为关心，曾帮助她解决了医疗转院等问题。

当我跟她作了长谈，回到家中，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要补充一句：“我跟‘妖怪精’同岁，我看到她死在我的前面，我好开心！”

1998年8月20日，我去看秦桂贞，开门的是一位20多岁的姑娘。我以为姑娘是秦桂贞的亲戚，一问，才知道是秦桂贞的保姆。当了几十年保姆的秦桂贞，如今也有保姆照料她！

她前些日子因糖尿病住院。她说，幸亏有保姆照料。不然，她这样的孤老太婆，真不知怎样生活下去。

她告诉我，当时正在香港的宝宝，专程赶往上海，看望她，使她非常感动。

如今，每天清早6时，她就由保姆陪着前往花园走走，到8时回家吃饭。身体还可以。

她从冰箱里取出冰西瓜、冰淇淋招待我，看得出，她的晚年生活过得不错。

她拿出当天中午收到的从美国寄来的宝宝的信。信中有十几张照片，既有宝宝半个多月前看望她时的合影，也有重新放大的宝宝小时候和她一起拍的照片，还有宝宝作为“票友”演出京剧《宇宙锋》的剧照。

我回到家中，接到郑汝顺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电话。郑先生说，秦桂贞刚刚给他去电话，说是我去看她。我说，郑先生一家这样多年无微不至照料秦桂贞，真是难能可贵。郑先生马上说，秦桂贞在他们家多年，已是他们家庭的一员。所以，关心她、照料她，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可惜的是，他们夫妇远在香港，女儿又在美国，只能在经济上帮助秦桂贞，不能亲自照料秦桂贞，所以拜托我有空常去看看她。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那位与秦桂贞同机被秘密押往北京的作家峻青。

峻青被江青投入监狱达五年半，精神受到极大的损伤。经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多方奔走，1973年7月的最后一天，峻青在北京突然接到通知，说是经过“审查”，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当天，全身浮肿的他，来到北京平安里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见到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妻子于康，以及上海作家协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丁师傅，还有他在北京的弟弟孙海峰。

翌日下午，他在妻子和“工宣队”丁师傅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回上海。

然而，江青为什么要下令逮捕他，他却始终不清楚。

1980年12月10日，峻青从电视中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讯吴法宪的情形，内中涉及他在“文革”中无端被捕。

据吴法宪交待：

1968年2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开会。散会时，手里拿一本书，问吴法宪：“吴胖子，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吴法宪见到书名《黎明的河边》，作者峻青。吴法宪对江青说：“我不知道。”

江青指着书的作者说：“这人在上海，是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你给我到上海把他捉到北京来。”

吴法宪有点为难：“我不认识他，怎么捉来？”

江青声色俱厉道：“怎么捉来，你自己想办法嘛！”

吴法宪不敢再问了。

就这样，吴法宪在上海抓了峻青，并押送到北京，但是连吴法宪也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抓峻青！

峻青说，他与江青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他至今还没有弄明白，江青为什么要抓他！

江青的铁窗生涯

江青在1981年1月25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到了1983年1月25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用词讲究而巧妙的理由为她改刑：“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

其实，在1981年1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时怎么处理。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江青，上面写着：

>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
>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
>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
>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期间，无抗拒改

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不过，当江青接到改刑判决书时，她半点也没有欣慰之感，反而大喊："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呢？"

从江青的呼喊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的内心世界：她已经穷途末路，希望早一点结束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囚徒生活！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她的伙食还可以，因为毛泽东过去说过，对于犯了严重错误以至罪行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上还是给予照顾。她的伙食，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要好。特别是在审判期间，伙食更好一些。

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庭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不由得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最令她兴奋的是，有几次她从电视上看到播送"样板戏"，脸上露出"旗手"的笑容！她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样板戏"。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闲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然而，当她织完一件之后又拆了，然后再另织一件。就这样拆了织，织了拆，消磨着她的时光。

另外，她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她获得允许，从她的藏书中，选择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江青曾说，在她一生中这一时期看书是最多的。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

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应当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江青在秦城监狱还记日记。她的字近乎“毛体”。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日记中写道：

> ……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楼的四周土地甚多，管理人员业余生产蔬菜。★★（字迹不清）他们学习一点生产蔬菜的知识，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那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
> 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

江青毕竟是“四人帮”之首，虽然身在狱中，但仍为中外新闻界所关注。海外报刊上，不时登出关于江青狱中动静的报道，内中有不少只是猜想、传闻而已。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报道：

>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
>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
>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1988年3月24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曾涛还提及，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医。邱会作于1987年9月刑满释放。黄永胜于1983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帮”那四人仍在狱中。

1988年12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这位官员说，现年74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据云，江青在公安部的医院里住院时，用的是“李润青”这化名。“李”是她的本姓，“润”是毛润之的“润”，“青”不言而喻是江青的“青”。

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李讷在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了六年，于1959年毕业，考进北大历史系。当时，笔者也在北京大学上学，有人指着在大饭厅外自来水龙头那里洗碗的一位女同学说，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李讷也跟大家一样，在北京大学吃着普通的饭菜。在1960年，李讷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病倒了，不得不在1961年休学一年。

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8)，没有分配工作，就去参加“四清”运动了。

1966年，父亲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母亲江青一马当先，成了“文革先锋”。那大浪大潮，把李讷也卷了进去。从1966年7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此时，她化名“萧力”，亦即“小李”的谐音。

后来，她担任父亲毛泽东的“观察员”、“联络员”，去各大专院校了解“文革”运动情况。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1966年11月份李讷到《解放军报》工作，成为军报的编辑和记者。当时《解放军报》代总编辑是胡痴，后来曾回忆说：

>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中午，杨成武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间到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才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萧力，你们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9)

不久，《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党委书记赵易亚先后被打倒，凭着李讷那“响当当”的背景，才26岁的她，擢为《解放军报》总编领导

小组组长(10)。

据阎长贵回忆(11)，李讷曾经告诉他，林彪为此还接见并鼓励她："你都27岁了，还没信心搞好一个军报吗？我25岁就当军团长了，29岁担任军政大学校长。"

1968年3月，江青又调回李讷，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

"萧力"不堪工作重负，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70年初，经毛泽东和江青的同意，让"萧力"到江西进贤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炼，使她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在江西，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30的李讷，跟"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小徐是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江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1970年8月，江青上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特地把李讷叫上山，劝说李讷，结果无效。后来，江青对人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一样。我把李讷叫上山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

李讷知道无法说服母亲江青，就写了一份要求与小徐结婚的报告给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计较小徐的"身份"，应允这门亲事，在报告上写下批示(12)："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同意，转江青阅。"

这下子，江青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李讷和小徐在"五七干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

不过，婚后不久，由于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李讷回到北京。从1973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小院里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1985年，经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介绍，她和王景清结婚。王景清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来他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跟妻子离异。王景清为人憨厚、善良，细心地照料李讷，使她在孤寂中得到了安慰。

李讷把儿子改名王效芝。芝，即毛润之之意。她要儿子效仿外公毛泽东。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尤其是王景清也喜欢书法，跟江青有着共同的爱好，江青跟他见面时往往探讨起书法艺术来，反而把李讷撂在一边。

江青是从1984年5月4日起保外就医。但是她在1988年12月企图吞50多片安眠药自杀，被发现之后，于1989年3月30日重新送回秦城监狱看管。

李讷和王景清每次去北京远郊昌平的秦城监狱，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发火。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李讷很少跟朋友们谈起江青在狱中的情况。偶尔，在一般朋友面前，李讷提到江青，总是称之为“我们家的那一位”、“家里的大人”；在很熟悉的朋友面前，她才称江青为“我母亲”、“我妈妈”、“我家老太太”。

王洪文死于肝病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	“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	王洪文	诬陷陈毅；指使鲁瑛

		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image]

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副本送达书上签字。（新华社记者齐铁砚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
>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91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650人。
>
>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
>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
>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

罪行：

>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image]

王洪文在被告席上（孟昭瑞　摄）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
>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20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42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于1983年1月25日，对两案主犯宣判整两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发表了一项“裁定”，宣布“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张春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并说他们在“死缓”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其实，还应该说“也无接受改造实际表现”，但为了给他们减刑，也只能那么说。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弟、妹妹曾经获准赴京看望王洪文(13)：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

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四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待了一天，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总共四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58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张春桥的狱中生活

对于张春桥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张春桥概况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7日	张春桥	“长沙告状”；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
1980年12月4日	张春桥	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张春桥	张春桥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播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拉碴，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面对提问，不答；送达文件，不看；要他签字，不签！

王芳是张春桥预审组组长，他回忆说：

> 对张春桥的提审，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条和第六十四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

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image]

1980年11月10日，司法人员向张春桥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副本。（新华社记者齐铁砚　摄）

我向他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这时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期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一句以外，即不吭声。

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

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在审问过程中，什么时候宣读证词，什么时候出示证据，什么时候证人出证等等，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

对于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多个经查验确凿的证据方可，对原始书证、笔记，要经过技术鉴定，以证明确凿无误；对证人的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

从6月2日到9月中旬结束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一共进行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尖分叉，
喷吐谎言的瀑布，
每一星唾沫，
都是杀人的蛇毒；
而今哑口无言，
滔滔雄辩已冰封，
你的心冷到零度。

正因为张春桥“而今哑口无言”，问他不答，所以审讯张春桥比审讯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要快得多。

[image]

法庭上的张春桥（孟昭瑞　摄）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1983年1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是：“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张春桥，上面写着：

>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
>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比他们当初对我们要好得多。
>
> 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去采访他们？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一点老年病。

1988年1月15日，新华社北京英文电，又透露张春桥的一点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83年72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74岁，张春桥现年71岁。

在劳改医院，张春桥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报纸。他仍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心，看报纸极为认真、仔细。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时候，张春桥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张春桥极少与监管人员说话。

据云，当他得知江青自杀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脸一直阴沉着。

尽管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得知他倒台而在1977年4月1日自杀，尽管他的同伙江青也选择了自杀，但是，张春桥声称：“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张春桥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张春桥改刑后判的是无期徒刑，因此他不会像姚文元那样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江青以自杀告终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一个角落刊载了这一消息。

[image]

《人民日报》刊登江青自杀身亡的报道

江青终年77岁。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周刊文春》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能说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然而，在漫长的监禁中，江青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不想再活下去了！

生不如死。江青曾经三度自杀未遂：

1984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8周年，江青要求去毛泽东纪念堂遭到拒绝，便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企图自杀；

1986年5月，江青曾经用几只袜子结成绳套，打算上吊，被人发现；

1988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9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江青提出在26日全家聚会纪念毛泽东，没有获准。江青一气之下，吞下多粒安眠药片自杀，被看守及时发现，抢救脱险。从那以后，医生不再给江青安眠药片。

原本江青已经监外就医，但是1988年12月的这次自杀使她重新回到秦城监狱。不过，毕竟江青年事已高，而且又患咽喉癌。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决定还是让江青监外就医。

江青偏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人，竟然提出要回到中南海毛泽东旧居丰泽园去住，或者回到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钓鱼台去住。她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否定。江青把右手往脖子上一抹，做了个自杀的姿态。

中共中央办公厅最终为江青在北京市区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作为江青监外居所。在那里，配备了护士，照料病中的江青，并定期陪她到公安医院治疗癌症。

1991年2月15日，由于江青高烧不退，公安部决定送江青到公安医院住院治疗。江青在办理住院手续时，用了“李润青”这样的名字。

经过治疗，江青的高烧在3月18日退了，医生建议给她做咽喉癌切除手术，江青坚决反对。她担心手术会影响声带，手术之后她不会讲话了。

江青在病床旁的床头柜上，放了一张她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表示对于毛泽东的怀念。她在衣服上别着毛泽东像章。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

4月5日清明节，江青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瞻仰毛泽东，并要求李讷带一卷白纸给她，她要亲手做一个花圈献给毛泽东。她的这两项要求都未能得到满足。

江青埋头写自己的回忆录，书名叫《毛主席的忠诚战士》。

5月10日，江青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为了安定江青的情绪，而且考虑到她的病情已经稳定，监护人员陪同江青回到北京酒仙桥住所。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一角，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25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据云，江青还念念不忘在25年前——1966年5月16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日子，是“文革”开始的日子。

江青还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5月14日凌晨1时30分，护士离开江青卧室。3时30分，护士发现江青趁她离开之际，自杀身亡。江青把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套在卫生间浴盆上方的铁架上，把一个枕头放在浴盆里，她踩在枕头上把头钻进绳圈，然后用脚踢掉枕头自缢。

护士急忙报告上级，医生迅即赶到，江青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江青被送往公安医院。

当天下午，李讷接到江青死亡通知书，前往公安医院探视母亲遗体。

5月18日，江青的遗体火化。李讷没有到场，江青的亲属也都没有到场。火化之后，江青的骨灰盒由李讷保存，存放在家中。

当然，如果细细“考证”起来，早在她当年与唐纳吵翻了的时候，1937年5月31日写了《一封公开信》，内中谈到自己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

> ……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遽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14)

在54年前，23岁的蓝苹没有自杀，是因为“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

54年后，77岁的江青再也没有“一线希望”了，她自杀了。

江青也曾对她的护士马晓先多次说过：“将来我是准备杀头的、坐牢

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对于江青的死，当时中国报刊除了发表新华社消息之外，没有再说什么。笔者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杂文家何满子的《江青为何自杀》一文，指出：

> 江青自杀当然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布告天下咸知这个十年灾难的祸首终于恶贯满盈，下地狱去了。
>
> 这妖婆是自杀的。自杀有种种动机，种种情况：有被迫害悲忿而自杀的，在江青的淫威下，当年有不少人走了以死作抗议的路。江青当然不属此类。她本死有余辜，还只判了个死缓转无期徒刑，后又让她保外就医，可谓宽大之至，谈不上迫害；有畏罪自杀的，江青也不属此类。如果畏罪自杀，她早该在公审前就自去地狱了；有绝望而自杀的，大势已去，往昔天堂梦已彻底破灭，等了十年，没指望了，于是了此残生，江青自杀庶几属于此类。
>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毅然宣布“文革”要彻底否定，但百脚之虫，死而不僵，失去天堂之徒并不彻底死心，妄图还潮者有之；化身变色，忍辱图存者有之；变个法儿，新瓶子卖旧药者有之；不能登大雅，于是搞小动作者有之；风风雨雨，花样繁多。幸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局铁定，人心不可侮，恋恋于老调子，终于不能成气候而已。
>
>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孑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曾经是蓝苹在20世纪30年代的好友，后来又遭受江青迫害、投入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她听到江青自杀的消息，心境芜杂，以冷峻的笔调写下对于“蓝苹·江青”的中肯评价：

> 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
>
> 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从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

> 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有看出来。然而，江青毕竟就是蓝苹。即使她后来忌讳，最好不承认这个名字。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应为1938年——引者注）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15)

江青的遗体火化之后，骨灰盒老是放在女儿李讷家中，终非长久之计。江青在狱中曾经说及自己的后事，希望故后归葬故里。在江青去世之后，山东诸城方面也表示妥为安排江青的安葬之事。然而李讷觉得江青葬在诸城有诸多不便，因为江青的墓在诸城将非常显眼，而江青生前树敌太多，万一有人在诸城砸江青的墓，那等于自取其辱，不如低调葬在北京公墓之中。

2002年3月，李讷和丈夫商议把江青骨灰安葬在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的福田公墓。

墓碑上刻着江青的本名：“先母李云鹤之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一年，女儿、女婿、外孙敬立。”女儿、女婿、外孙不具名，为的使墓碑不引人注意。

就这样，江青经过大起大落、大喧大闹，终于归于平静，归于平凡，她的墓与普通百姓并无二致。

纵观江青的一生，我以为我的文友、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对江青的评价，颇为中肯：

> 她出身贫寒，年轻时还是奋斗向上的，她到延安，不可否认是进步之举，她在上海“失足”，是无心之过。她对老人家，显然有过不少的关心和照顾。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因此养成了她暴戾的性格。她心中有太多的怨恨，她受过几个男人的欺侮，她要报复，她有变态心理，她怕人害她，疑神疑鬼。她也有近人情的一面，如她同意了李讷晚年的婚姻。她自知不容于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断然了却自己的生命。(16)

戚本禹对于江青的评价则是：

> 她就是小心眼，好报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够格，但没有现今人们普遍所说的那么坏。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17)

姚文元刑满出狱

1980年，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进行反革命宣传；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诬陷群众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待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45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65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微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2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的遗产？

[image]

姚文元被押上法庭（孟昭瑞　摄）

[image]

姚文元在法庭上（孟昭瑞　摄）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100元工资。“文革”开始

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30元存款。

30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在狱中的时候——1985年，虽然他的父亲姚蓬子已经在

1969年因癌症去世，但是他在上海林村的房子的产权，曾经打过一场官司。那里原是哈同花园，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当年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解放前，姚蓬子以及李斯棣向哈同公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按照与哈同公司签订的合同，到1954年12月31日，房子应归哈同公司所有。姚蓬子、李斯棣等认为原合同不合理。经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合同“不符合当时处理外侨不动产政策，应认为无效”。但是所建房屋，应归国家所有。因此姚蓬子、李斯棣等必须向国家缴纳房租。

李斯棣等人借“文革”之机拒付租金，进而在1981年提出房屋产权应当归属他们。

为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85年7月26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83）沪高民字第49号《关于李斯棣等人为房屋产权申诉请予批复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4月3日作出批复：

> 经研究认为：上海市人民法院1950年度民字28205号判决，虽然认定双方订立租地建房期满移转房屋无效，但并未将该地建房判归姚、李等人所有。1958年上海市房地局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该房产的实际情况，宣布归国家所有。这是在28205号判决后，根据国家不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有土地所有权的政策决定的，与28205号判决的内容并不抵触。因此，李斯棣等人以28205号判决主张产权的申诉无理，应通知驳回。

这样，李斯棣、姚蓬子等提出的房屋产权应当归属他们的要求以败诉告终。

姚文元在监狱里，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18)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1日中所写的“精辟之言”：“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20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关于姚文元，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3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image]
陈伯达最后的照片（叶永烈摄于陈伯达去世前七天）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张春桥因癌症病故

张春桥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19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77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

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1998年1月保外就医之后，张春桥与文静及三女一子生活在一起。虽然张春桥曾经与文静正式离婚，并经中央同意。那时候，张春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怕文静连累了他的政治前途。然而在张春桥倒台之后，已经无所顾忌，所以也就与文静共度晚年，直至离世。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58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

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30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11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17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笔者读到当时已经80多岁的俄罗斯汉学家杰柳辛回忆张春桥的文章，杰柳辛曾经与张春桥有过多次接触。杰柳辛这样评价张春桥：“张春桥是一名教条主义者，思想极左，比较古板。但与此同时，张春桥又是

一个学识很渊博的人，他对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理论都非常了解。”

杰柳辛回忆起这样一个细节：“陪同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即今圣彼得堡——引者注），参观在十月革命时炮轰过沙皇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我们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张春桥立刻跪了下来亲吻阿芙乐尔的甲板，他是唯一的一个亲吻甲板的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这样做。”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姚文元的离去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从1996年10月刑满释放之后，住在浙江湖州、上海，后来住在离上海甚近的江苏省昆山市。不过，姚文元毕竟是“四人帮”之一，他出狱之后的行动仍受上海市公安局的监视和限制。笔者曾经多次与出狱之后的徐景贤见面，并向上海市公安局负责管理姚文元出狱生活的戚先生申请采访姚文元。戚先生虽然与我熟，但是无奈地说，可否采访姚文元不在他们的权限之内，必须向公安部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而这种申请通常难以批准。

在1998年6月，姚文元曾提出有生之年的两个愿望：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

对于姚文元的“重新入党”，理所当然遭到拒绝。然而他要求出版回忆录，有关部门倒是认为可以考虑。于是，姚文元送交了42万字的回忆录，由于内中涉及尚未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至今未能出版。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40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40周年祭，粉碎“四人帮”30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第二”、“姚文元第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香港《亚洲周刊》也报道了我关于姚文元之死的谈话：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年轻人不了解中共史，这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姚文元去世后，作为具体的个人，“四人帮”可以说是全部消失了，但“四人帮”的历史是不能抹去的。

我在上海郊区寻访了姚文元的墓。

姚文元的墓，坐落在一群普通的墓之中。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而只是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是在1996年8月19日病逝的。由于同名同姓叫金英的人颇多，所以金英安葬在那里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有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

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姚文元刑满只有一个

多月。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她的墓上刻着“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女金虹丽群继红 婿浩岐 殷伟 圭章 孙颖婷 沐春 冰聪 金星”。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用金字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然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

从词意可以看出，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

从这首词中也可以看出，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于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的晚年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迭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才得知，在姚文元生前，曾经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

(1)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 萧思科：《超级审判》，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

(3)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4) 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称，“1945年抗战胜利，唐纳从重庆回沪，即任《时事新报》主笔；根本未去英国新闻处工作。”见1995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5) 本书作者曾误写为副总编辑，现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更正。

(6) 本书作者曾误为1947年8月，现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更正。

(7) 1990年7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

(8) 当时北京大学的文科学制为五年，理科为六年。

(9) 胡痴：《萧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百年潮》1999年第2期。

(10) 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是“文革”期间特殊的职称，相当于总编辑。

(11) 阎长贵、王广宇：《李讷在“文革”初期》，2012年7月19日《南方周末》第23版。

(12) 据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3) 峻宏：《王洪文胞弟谈家事》，《家庭》1998年第12期。

(14) 上海《联华画报》1937年6月5日9卷4期。

(15) 郁风：《蓝苹与江青》，收入《巴黎都暗淡了》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 王年一2005年10月15日致阎长贵信。

(17) 据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枫华园》第432期（2004年1月9日）。

(18)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附录

一　江青著作及报道目录

江青著作目录

1．《宝宝的爸爸》（张淑贞），《新社会》半月刊七卷三期，1934年8月1日。

2．《王秘书的病》（张淑贞），《新社会》七卷四期，1934年8月16日。

3．《催命符》（张淑贞），《新社会》七卷六期，1934年9月15日。

4．《拜金丈夫》（张淑贞），《新社会》七卷八期，1934年10月16日。

5．《还我和珊》（淑贞），《新社会》七卷十期，1934年11月16日。

6．《读书杂记》（云鹤），《中学生》五十五期，1935年5月。

7．《为自由而战牺牲》（蓝苹），《电通》半月画报六期，1935年8月1日。

8．《我与娜拉》（蓝苹），《中国艺坛画报》，1935年9月13日。

9．《垃圾堆上》（蓝苹），《大晚报》1935年10月19日。

10．《我的职业经验》（淑贞），《青年界》九卷一期，1936年1月1日。

11．《随笔之类》（蓝苹），《大晚报》1936年1月1日。

12．《农村演剧生活》（蓝苹），共16篇，连载于《时事新报》1936年5月20日—6月6日。

13．《儿呀，快长快大吧》（蓝苹，抄录任钧的诗），《大公报》1936年10月10日。

14．《悼鲁迅先生》（蓝苹），《大公报》1936年10月25日。

15．《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蓝苹），《绸缨》月刊三卷三期，1936年11月15日。

16．《家庭里的事》（蓝苹），《大沪晚报》1936年11月17日。

17．《三八妇女节——要求于中国的剧作者》（蓝苹），《时事新报》1937年3月8日。

18．《关心于白薇者的提议》（蓝苹），《妇女生活》四卷六期，1937年4月1日。

19．《从〈娜拉〉到〈大雷雨〉》（蓝苹），《新学论》一卷五期，1937年4月5日。

20．《〈大雷雨〉中的卡嘉邻娜》（蓝苹），《妇女生活》四卷七期，1937年4月17日。

21．《我们的生活》（蓝苹），《光明》二卷十二期，1937年5月25日。

22．《一封公开信》（蓝苹），《联华画报》九卷四期，1937年6月5日。

23．《收获的季节》（江青），《东南日报》1946年9月7日。

24．《新时代的彩车——赠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李进），《新华日报》1964年11月19日。

25．《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解放军报》1966年5月8日。

26．《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江青），《红旗》1966年十五期。

27．《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江青），《红旗》1967年六期。

28．《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红旗》1967年六期。

29．《江青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8月出版。包括——

《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为人民立新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6月26日。

《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9、10日。

《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27日。

30．《林彪（整版照片）》（峻岭），《人民画报》1971年七至八期及《解放军画报》1971年七至八期合刊。

31．《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峻岭摄影》，《人民日报》1971年8月9日（又载《人民画报》1971年七至八期合刊及《解放军画报》1971年七至八期合刊）。

有关江青的报道目录

1．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广告（王泊生昆剧团），《北平晨报》1931年1月22日。

2．《中宣会召集电影谈话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23日。

3．《中宣会昨召开电影座谈会》，《中央日报》1934年3月24日。

4．《郑正秋先生在大夏大学讲中国电影教育之各方面观察》，《民报》1934年3月24、31日。

5．《电影谈话会昨日闭幕》，《中央日报》1934年3月25日。

6．《费穆打圈的温，凑成两打》，《影迷周报》1934年10月17日。

7．《费穆为联合导演辞职后贺孟斧将任联华导演》，《影迷周报》一卷十二期，1934年12月12日。

8．《西席地米尔与电影清洁运动》（费穆），《电影画报》十七期，1934年12月23日。

9．《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本届年会在杭举行》，《晨报》1935年3月16日。

10．《中国教电协会年会在京等会谈话》，《晨报》1935年3月23

日。

11．《中宣会在沪召集国产电影二次谈话会》，《晨报》1935年4月15日。

12．《为自由而战自由神之剧照》三期，《电影半月画刊》1935年6月15日。

13．《娜拉的演员》，《民报》1935年6月21日。

14．《业余“雷雨”散记》，《民报》1935年6月11日。

15．《王莹与蓝苹在〈自由神〉中》（剧照），《中华日报》1935年6月21日。

16．《娜拉剧照》，《申报》（增刊）1935年6月26日。

17．《看过“娜拉”以后》（海士），《民报》1935年6月28日。

18．《随笔——看“娜拉”后》（白康），《中华日报》（上海）1935年6月30日。

19．《观“娜拉”演出》，《晨报》1935年7月2日。

20．《业余剧人公演“娜拉”》（剧照），《申报图画特刊》一百三十三期，1935年7月11日。

21．《蓝苹剧照》，《申报图画特刊》1935年7月11日。

22．《电通演员蓝苹》，《电影漫画》一卷四期，1935年7月15日。

23．《论〈娜拉〉的演技》（尤娜），《申报·自由谈》1935年7月22日。

24．《电通》，《大美晚报》（影剧特刊）1935年7月24日。

25．《“娜拉”剧照二张》，《中华图画杂志》三十六期，1935年8月。

26．《“自由神”中之要角蓝苹剧照》（自由神特辑），《电通半月画报》六期，1935年8月1日。

27．《演技变化的程序》（剧照），《时事新报》1935年8月9日。

28．《蓝苹便照一张》，《电影新闻》一卷七期，1935年8月18

日。

29．《舞台上的“娜拉”银幕上的自由神》，《民报》1935年8月20日。

30．《自由神》（附剧照），《时事新报》1935年8月25日。

31．《都会风光之肖态》（蓝苹三帧剧照），《电通半月画报》八期，1935年9月1日。

32．《都市风光中之蓝苹等剧照二张》，《良友》一卷九期，1935年9月。

33．《自由神》（广告），《中央日报》（南京）1935年9月4日。

34．《自由神最后的一页》，《电通半月画报》九期，1935年9月16日。

35．《被缴械的女兵》，《电通半月画报》九期，1935年9月16日。

36．《我们的女明星》（照片一帧），《电影漫画》一卷五期，1935年9月20日。

37．《“都市风光”中蓝苹剧照》，《申报本埠增刊》，1935年10月10日。

38．《陈波儿、蓝苹合影，唐纳、蓝苹、金山合影》。

39．《“都市风光中”之蓝苹》（剧照），《民报》1935年10月15日。

40．《都市风光之最后一幕——糖》，《电通半月画报》十一期，1935年10月16日。

41．《钦差大臣》（蓝苹剧照），《中华图画杂志》三十九期，1935年10月。

42．《台上的娜拉——银幕上的蓝苹》，《时代电影》复刊号1935年10月25日。

43．《蓝苹与唐纳同居，在北平的丈夫怎样表示》（三友），《娱乐周报》一卷二十三期，1935年12月7日。

44．《求婚》（凤翬），《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八期，1935年12月9日。

45．《〈艺人随笔〉执笔者签名》，《大晚报》1936年1月1日。

46．《〈大雷雨〉中的赵丹和蓝苹》（剧照），《时事新报·新上海》1936年1月28日。

47．《电通舞台人排演柴霍夫三大名剧》，《民报·影谭》1936年1月14日。

48．《蓝苹便照五帧》，《时代电影》二期，1936年2月25日。

49．《蓝苹与陈波儿》（照片），《申报》（本埠增刊）1936年3月2日。

50．《影人集影》（附蓝苹照二张），《电声》五卷九期，1936年3月6日。

51．《青年妇女俱乐部游艺大会著名电影明星亲自参加》（消息），《时事新报·新上海》1936年3月7日。

52．《青年妇女俱乐部游艺大会花样繁多热闹得很》（丁洁），《时事新报·新上海》1936年3月8日。

53．《蓝苹等三对夫妇结婚》（照片），《大公报》（上海）1936年3月29日。

54．《星光灿烂》（附蓝苹照一张），《电影画报》四十期，1936年4月1日。

55．《费穆拒做参议员》（米子），《东南风》四期，1936年4月11日。

56．《见闻偶记》（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6年4月23日。

57．《见闻偶记》（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6年4月25日。

58．《电影界话剧界三对艺人去杭州结婚》（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6年4月26日。

59．《见闻偶记——蓝苹将演（赛金花）》（消息）（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6年4月29日。

60．《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1936年5月3日。

61．《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1936年5月5日。

62．《艺坛近事》（黑白），《时事新报》1936年5月5日。

63．《八仙桥青年会的狂欢之夜三对艺人招待亲友详记》（丁洁），《时事新报》1936年5月7日。

64．《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1936年5月17日。

65．《六艺人集婚散记》（附婚照）（黄莺），《电影画报》三十期，1936年6月1日。

66．《六和塔下三对艺人新婚丽影》，《中华画报》四十三期，1936年6月。

67．《黄金荣、李大超昨招待电影界商讨推进购机祝寿运动》（消息），《大公报》（上海）1936年6月15日。

68．《银色杂笔》（之尔），《时事新报》1936年6月17日。

69．《在济南，蓝苹和王泊生》（张牛），《辛报》十七期，1936年6月17日。

70．《影星唐纳自杀》（消息），《华北新闻》1936年6月28日。

71．《唐纳旅济服毒》（消息），《大晚报》（上海）1936年6月28日。

72．《明星失恋自杀——唐纳访蓝苹不遇愤而自杀后遇救》（济南二十八日上午零时专电），《大公报》（天津）1936年6月28日。

73．《唐纳自杀有感》（孟公威），《大晚报》1936年6月28日。

74．《〈都市风光〉中一幕惨剧——唐纳复演于济南幸遇得庆》（更生），《大公报》（上海）1936年6月29日。

75．《唐纳服毒之原因系蓝苹重谒旧欢》（消息），《大晚报》1936年6月29日。

76．《唐纳遇救后留济南候佳音》，《时报》三至五版，1936年6月30日。

77．《唐纳来电："蓝苹已来会"》（消息），《大晚报》1936年6月30日。

78．《一对艺人的婚变》（消息），《大公报》（上海）1936年6月30日。

79．《唐纳在济静养对记者谈自杀原因》（消息），《大公报》

（上海）1936年7月1日。又见《大公报》（天津）1936年7月1日。

80．《轰动济南之——唐纳自杀事件》（长篇消息），《中央日报》（南京）1936年7月1日。

81．《已与在济南自杀之唐纳晤面的女电影演员蓝苹》（报头漫画），《立报》（上海）1936年7月1日。

82．《唐纳、蓝苹合离记》（屠雨），《辛报》三十一期，1936年7月1日。

83．《唐纳、蓝苹昨日到沪》（子彬），《时事新报》1936年7月2日。

84．《唐纳、蓝苹昨已携手回沪》，《大公报》1936年7月2日。

85．《表演一幕悲喜剧后唐纳蓝苹昨晨抵沪》，《立报》1936年7月2日。

86．《唐蓝珍闻？》（乔琳），《大公报》（本市增刊）1936年7月4日。

87．《唐纳在济南自杀原因》，《娱乐周报》二卷二十六期，1936年7月4日。

88．《自杀案两主角身世》，《娱乐周报》二卷二十六期，1936年7月4日。

89．《唐纳、蓝苹专页》，《电声》五卷二十七期，1936年7月10日。

90．《蓝苹回乡探母，“两度嫁人行踪飘忽”》，《沪光》四期，1936年7月10日。

91．《唐纳和蓝苹回沪以后》，《娱乐周报》二卷二十七期，1936年7月11日。

92．《蓝苹被除名》，《电声》五卷二十六期，1936年7月17日。

93．《影坛情报》（附蓝苹照一张），《电影画报》三十二期，1936年8月1日。

94．《联华通讯》（消息），《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8月9日。

95．《谈谈费穆》（艾影），《新人周刊》二卷五十期，1936年8月15日。

96．《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1936年8月19日。

97．《联华花絮》（消息），《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8月23日。

98．《关于〈王老五〉》，《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8月28日。

99．《艺坛漫笔》，《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8月29日。

100．《银花·花絮》，《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6月12日。

101．《业余剧人与四十年代不日将同时公演〈赛金花〉》，《电声周刊》五卷四十期，1936年10月9日。

102．《游艺会开幕时，由全体导演演员等合唱党歌》，《良友》一百二十一期，1936年10月。

103．《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10月16日。

104．《蓝苹在〈狼山喋血记〉中的剧照》，《民报》1936年10月30日。

105．《为献机庆祝蒋委员长五旬寿辰告国人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大公报》（上海）1936年10月31日。

106．《费穆〈狼山喋血记〉摄取外景时之艰苦》，《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11月1日。

107．《明星演员蓝苹和女友陈宗娥》，《中华画报》四十八期，1936年11月。

108．《蓝苹在济南大明湖畔》，《申报图画特刊》二百二十六期，1936年11月5日。

109．《〈赛金花〉四十年代剧社公演特刊》，《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11月12日。

110．《〈狼山喋血记〉广告》，《申报》（上海）1936年11月15日。

111．《唐纳夫妇巧克力茶会，蛋糕清茶制造笑料无数》，《电声周刊》五卷四十五期，1936年11月13日。

112．《〈狼山喋血记〉一景》（剧照），《时事新报》1936年11月16日。

113．《剧坛的不幸——谁破坏了戏剧统一战线？业余剧人发表真相书，报告〈赛金花〉纠纷经过》，《民报》1936年11月19日。

114．《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11月21日。

115．《〈狼山喋血记〉的制作》（费穆），《时事新报》1936年11月21日。

116．《我们的态度——推荐〈狼山喋血记〉》消息，《时事新报》1939年11月2日。

117．《业余剧人的阵容》，《民报》1936年11月19日。

118．《推荐〈狼山喋血记〉》，《民报》1936年11月21日。

119．《〈狼山喋血记〉演出广告》，《申报本埠增刊》1936年11月22日。

120．《卡尔登映：〈狼山喋血记〉》，《时事新报》1936年11月22日。

121．《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1936年11月27日。

122．《四十年代与业余剧人赛金花纠纷的经过》，《电声周刊》五卷四十七期，1936年11月27日。

123．《〈狼山喋血记〉评》（未名，弃扬），《大公报》（上海）1936年11月22日。

124．《推荐两部国产电影——〈生死同志〉与〈狼山喋血记〉》（蒲文），《现世界》一卷八期，1936年12月1日。

125．《“联华交响曲”花絮司徒慧敏的〈两毛钱〉——由梅熹，蓝苹主演》（消息），《申报本埠增刊》1936年12月2日。

126．《〈狼山喋血记〉被罚六百元》，《影与戏》创刊号，1936年12月10日。

127．《费穆提出辞职书》，《影与戏》创刊号，1936年12月10日。

128．《联华交响曲》（剧照），《联华画报》八卷三期，1936年12月16日。

129．《蔡楚生选用蓝苹为〈王老五〉主角的原因》，《影与戏》二期，1936年12月17日。

130．《狼山喋血记》广告，《时事新报》1936年12月18—21日。

131．《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1936年12月19日。

132．《赛金花》（蒋醒若），上海演剧出版社1936年。

133．《蓝苹在〈狼山喋血记〉中》（费穆），《联华画报》八卷四期，1937年1月1日。

134．《主角蓝苹饰卡德林》（剧照），《中华画报》五十期，1937年7月1日。

135．《两毛钱》（剧照），《联华画报》八卷四期，1937年1月1日。

136．《典型的北国女性——蓝苹》（附近影一张）（白彦），《大晚报》1937年1月7日。

137．《传称费穆辞职的真相》，《影与戏》一卷五期，1937年1月7日。

138．《联华交响曲演出广告》，《申报本埠增刊》1937年1月8日。

139．《小消息》，《现世界》（上海）一卷十一期，1937年1月16日。

140．《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1月19日。

141．《业余风光》，《民报》1937年1月16日。

142．《蓝苹赵丹在〈大雷雨〉中剧照一张》，《大晚报》1937年1月19日。

143．《业余花絮一束》，《民报》1936年1月21日。

144．《蓝苹封面照片一帧》，《电声》六卷四期，1937年1月22日。

145．《伟大的良心》（丽尼），《申报·文艺专刊》1937年1月22日。

146．《〈大雷雨〉今日公演》（消息），《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1月27日。

147．《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1月24

日。

148．《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1月25日。

149．《〈大雷雨〉业余剧人第三次公演》（莫思），《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1月29日。

150．《〈大雷雨〉观感》（附剧照）（叶蒂），《大晚报》1937年1月28日。

151．《蓝苹在〈大雷雨〉中》（剧照），《民报》1937年1月28日。

152．《〈雷雨〉中之饰卡嘉邻娜》，《天津商报》（每日画刊）二十二卷三十五期，1937年1月29日。

153．《〈醉生梦死〉今日公演》，《民报》1937年1月30日。

154．《〈醉生梦死〉业余剧人第三次公演》（莫思），《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1月31日。

155．《业余剧人第三次公演的批评〈欲魔〉和〈大雷雨〉》（尹子契），《大公报》（上海）1937年1月31日。

156．《联华新闻》（剧照），《联华画刊》八卷五、六合期，1937年2月1日。

157．《艺坛漫笔》（么哥），《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2月2日。

158．《业余剧人旅京公演之前》（子彬），《时事新报·新上海》1937年2月6日。

159．《〈醉生梦死〉今日起公演》（消息），《大公报》（上海）1937年2月3日。

160．《业余社决定进京演出》，《影与戏》一卷九期，1937年2月4日。

161．《业余剧人公演节目之三——〈醉生梦死〉评》（尹子契），《大公报》（上海），《戏剧与电影》二十五期，1937年2月7日。

162．《蓝苹——卡德林剧照》，《影与戏》1937年2月18日。

163．《业余剧人在南京》，《影与戏》1937年2月18日。

164．《业余剧人在卡尔登的演出》，《影与戏》一卷十一期，1937年2月18日。

165．《上海文艺、电影、戏剧、音乐界同人为反对美国水兵暴行宣言》，《民报》1937年2月27日。

166．《蔡楚生访问船户》（消息），《民报·影谭》1937年2月27日。

167．《蓝苹封面照》，《中华画报》五十一期，1937年2月。

168．《蓝苹照片三帧》，《时代电影》二卷四期，1937年4月。

169．《蓝苹便照三帧》，《电声》六卷十三期，1937年4月2日。

170．《蓝苹受伤因〈王老五〉拍失火》（消息），《民报·影谭》1937年4月23日。

171．《蓝苹照片》，《大公报》，《星期影画》，1937年4月25日。

172．《生活与性欲，一个沉痛的暗示》，《民报》1937年4月29日。

173．《艺苑衡才录》（中）（唐汶），《大公报》本市增刊1937年4月26日。

174．《蓝苹照片》，《大公报》（星期影画）1937年5月2日。

175．《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六届年会特刊》，《新民报》（第三版）1937年5月4日。

176．《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六届年会特刊》，《中央日报》1937年5月4日。

177．《教育协会年会今晨举行开幕礼》，《新民报》（第七版）1937年5月4日。

178．《中国教电协会年会今日在京开会》，《新闻报》1937年5月5日。

179．《中国教电协会年会开幕》，《电影时报》1937年5月5日。

180．《第六届年会开幕，大批明星抵南京》，《大美晚报》1937年5月5日。

181．《组织和阵容——介绍业余实验剧团》，《民报》1937年5

月11日。

182．《〈王老五〉草棚失火蓝苹灼伤面部》（消息），《时事新报·市声》1937年5月12日。

183．《大公报戏剧电影读者征求会员》，《民报·影谭》1937年5月16日。

184．《上海各话剧团春季联合公演文献辑要——三〈大雷雨〉》（阿英），《戏剧时代》（上海）一卷一期，1937年5月16日。

185．《业余实验剧团宣言》，《民报》1937年5月24日。

186．《业余实验剧团》（林垦），《时代电影》二卷六期，1937年5月25日。

187．《蓝苹婚变之自白》（冰冰），《晶报》1937年6月3日。

188．《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影与戏》一卷二十六期，1937年6月3日。

189．《唐纳二度自杀的我观谈》（涵涵），《影与戏》一卷二十七期，1937年6月10日。

190．《唐纳蓝苹交恶原因》，《时代报》1937年6月15日。

191．《联华当局召蔡楚生费穆谈话》，《影与戏》一卷二十九期，1937年6月24日。

192．《蓝苹、章泯蜜月旅行》，《电声》六卷二十五期，1937年6月25日。

193．《蓝苹在〈王老五〉中》，《中国电影》一卷三期，1937年6月26日。

194．《费穆——怎样在电影界生长起来，苦难的环境逼着他迈进》（克丁），《中国电影》一卷三期，1937年6月26日。

195．《钱千里发现新大陆，唐纳将作若何感想》，《影与戏》一卷三十期，1937年7月1日。

196．《喜讯——〈王老五〉将完成》，《民报》1937年7月5日。

197．《济南历下亭旁的蓝苹》（便照），《中华图画杂志》五十六期，1937年7月。

198．《影星我闻录——蓝苹》（附照）（子系），《青春电影半

月刊》三卷七期，1937年7月10日。

199．《（王老五）——主题歌》，《民报》1937年7月13日。

200．《电通四演员，而今各自东西》（照片），《民报》1937年7月16日。

201．《蔡楚生最新创作——〈王老五〉全部完成》，《民报》1937年7月20日。

202．《蔡楚生〈王老五〉全部完成》（消息），《时事新报·青光》1937年7月20日。

203．《蒋委员长嘉许精忠报国》，《中国电影》一卷四期，1937年7月30日。

204．《一个天才的演员蓝苹》（丽泉），《中国电影》一卷八期，1937年7月31日。

205．《费穆提议救亡组织原稿》，《中国电影》一卷九期，1937年8月7日。

206．《业余剧人在南京》，《影与戏》1937年10月。

207．《男女明星近况如何——唐纳在战地，蓝苹在陕北》，《创刊号》1938年1月1日。

208．《费穆北战场摄影归来》（李作民），《电星》一卷四期，1938年1月22日。

209．《艺人在陕北》（附剧照），《申报》（增刊）1938年10月15日。

210．《时代的女儿——蓝苹在延安活跃得很》，《香港画报》七十一号，1939年5月5日。

211．《蓝苹在延安颇为活跃》，《电声》八卷二十三期，1939年5月19日。

212．《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电影新闻》二十八卷十一期，1939年5月19日。

213．《唐纳楚材晋用》，《电声周刊》八卷三十期，1939年7月7日。

214．《文明人的玩意儿》（费穆），《影剧》二期，1943年8月10日。

215．《蓝苹的往事》（吾心），《大光明周刊》十期，1946年5月7日。

216．《女明星时代的蓝苹》（雷雨），《海星周报》二十三期，1946年8月6日。

217．《关于梅兰芳五彩电影〈生死恨〉的通讯》（费穆），《影剧丛刊》一期，1948年9月30日。

218．《蔡楚生主编导演的〈迷途的羔羊〉和〈王老五〉》，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466页，1963年2月第一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219．《国防影片〈狼山喋血记〉的摄制及意义》，同上第一卷47—473页，有剧照3张。

220．《沈西苓最后的电影创作〈中华女儿〉》，同上第二卷59—60页，有剧照。

江青传记目录

1．钟华敏：《江青正传》，香港友联研究所，1967。（1967年由同机构出版英译本；Chung Hua min & Author C. *Miller*：*Madame Mao: A profile of Chiang Ching*，1968，Union Research Institute，HongKong）

2．张赣萍：《江青的丑史与艳闻》，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版。

3．老龙：《江青外传》，台湾金兰出版社1974年版。

4．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Ching*，197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U.S．A．（露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

5．陈绥民：《毛泽东与江青》，台湾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

6．Ross Terrill：*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1984，william Morrow & Co. New York．（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7．乐欣：《红都女皇事件之谜》，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8．珠珊（朱仲丽）：《江青秘传》，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版。（1988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书名改为《女皇梦》）

9．魏绍昌：《江青外史》，香港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

11．叶永烈：《蓝苹外传》，大连出版社1988年版。

12．叶永烈：《江青在上海滩》，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版。

13．珠珊（朱仲丽）：《无冕女皇》，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4．林青山：《江青沉浮录》，中国新闻出版社、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15．林青山：《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泥土：《赵丹与江青》，台声出版社1989年版。

17．叶永烈：《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18．叶永烈：《江青实录》，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年版。

19．叶永烈：《末代女皇》（上、下卷），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版。

20．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旅美青年作曲家盛宗亮根据江青生平改编的歌剧《江青》，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露天歌剧院首演，2003年7月。

22．叶永烈：《江青画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版。

23．露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6年版。

24．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25．沙叶新话剧《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上演，2010年1月。

其他

1．《大沪晚报》1936年10月29日刊出署名“蓝苹”的《期待》一文。但1936年11月8日《大公报》刊出《蓝苹启事》，如下：“10月29日本埠大沪晚报副刊载有署名‘蓝苹’之《期待》一文，并非拙作，未敢掠美，特此声明。”

2．《大公报》1937年1月24日《业余剧人们的三言两语》一文，刊载蓝苹之语：“我希望我做一个黛沙而不是卡嘉邻娜。”

3．上海《大公报》1936年7月4日发表乔琳《唐蓝珍闻》一文。文提及蓝苹“时常有稿子在报上发表”，“她到济南去的前后几天，还有好几篇稿子在《时事新报》——《青光》（副刊）上发表。《南行车中》、《农村演剧杂写》是其中的两篇”。经查核，《农村演剧杂写》即《农村演剧生活》，署名蓝苹。阅其文章，确系蓝苹所作。《南行车中》则署名“蓝喷”。在《时事新报》上以“蓝喷”署名而发表的散文、小说甚多，难以确定是否系蓝苹所作，故未列入以下目录。

蓝喷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文章有：

《松江之鲈》，1936年2月19日。

《小酒店》，1936年3月16日。

《登记》，1936年3月25日。

《香市小景》，1936年4月1日。

《余山行》，1936年4月22日。

《渤海之夜》，1936年4月30日。

《探监》，1936年5月6日。

《施医局》，1936年5月14日。

《小轮船上》，1936年5月16日。

《渔汛》，1936年5月25日。

《枫泾布》，1936年6月15日。

《南行车中》，1936年6月18日。

《公墓之夕》，1936年8月2日。

《我做了肉票了》（上、下），1936年8月18、19日。

《在轮埠上》，1936年9月5日。

《旧照》，1936年9月11日。

《生路》（短篇小说连载六天），1936年9月12—17日。

《新谷》，1936年9月23日。

《粉笔字》，1936年9月24日。

《残余的人类》，1936年10月2日。

《小猪的市场》，1936年10月31日。

《秋夜》，1936年11月3日。

《六婆婆上全节堂》，1936年11月7日。

《某晨记事》，1936年11月23日。

《忧郁的调子》，1936年12月20日。

《雨天的旅行》，1936年12月25日。

《余山之行》，1937年2月17日。

《房东的故事》，1937年3月20日。

4．以下目录，收入江青公开发表的文章。在“文革”中，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曾印行各种版本《江青文选》，收入的江青文章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关于“革命样板戏”的一次讲话；二是在“文革”中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综合各种版本《江青文选》，篇目如下：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9月8日。

《在“一般故事片题材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50年10月14日。

《对几个话剧的批评意见》，1963—1964年。

《对京剧〈沙家浜〉的指示》，1963—1965年。

《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

《对〈红灯记〉〈革命自有后来人〉演出人员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同美术学院教员的谈话》，1964年10月25日。

《参观美术展览时的谈话》，1964年冬。

《对沪剧〈红灯记〉的修改指示》，1964年11月5日。

《关于音乐工作的一次谈话》，1964年11月18日。

《审查〈烈火中永生〉样片时的指示》，1964年12月27日。

《对电影〈海鹰〉的指示》，1964年12月—1965年5月5日。

《对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指示》，1964—1965年。

《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指示》，1964—1965年。

《对〈南海长城〉的创作和拍摄问题的指示》，1964—1965年。

《对京剧改编工作的指示》，1965年1月。

《对改编京剧〈红岩〉的指示》，1965年1月。

《对于音乐工作的指示》，1965年1月14日。

《给钱浩梁同志的信》，1965年3月。

《关于〈奇袭白虎团〉给张春桥同志的一封信》，1965年5月27日。

《江青同志就京剧革命问题给云南省京剧团的指示》，1965年6月1日。

《对京剧〈海港〉的指示》，1965年6月11日。

《对京剧〈智取威虎山〉演出人员的谈话》，1965—1966年。

《对京剧〈平原游击队〉的指示》，1965—1966年。

《对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指示》，1965年。

《关于部分影片的批判意见》，1965年。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3月19日。

《关于电影的问题》，1966年5月。

《在北京大学的讲话》，1966年7月22日。

《在北京大学对部分同学的讲话》，1966年7月23日。

《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1966年7月25日。

《在北京大学的讲话》，1966年7月25日。

《在北京大学的讲话》，1966年7月26日。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1966年7月27日。

《在北京展览馆海淀区中学革命学生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8日。

《在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

《对“红旗战斗小组”的讲话》，1966年8月6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讲话》，1966年8月16日。

《在首都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7日。

《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

《在北京市中学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2月16日。

《在全国在京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2月17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等代表的座谈会纪要》，1966年12月18日。

《在人民大会堂讲话》，1966年12月23日。

《接见来京上访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2月26日。

《在接见徒步串连来京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2月28日。

《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讲话》，1967年1月4日。

《在新华社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7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航红旗代表谈话纪要》，1967年1月10日。

《接见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1967年1月19日。

《接见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座谈会纪要》，1967年1月。

《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群众代表的谈话》，1967年2月1日。

《关于新闻片的谈话》，1967年2月4日。

《接见青海八·一八联络站纪要》，1967年3月23日。

《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30日。

《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1967年3月31日。

《同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人员的谈话》，1967年4月25日。

《毛主席和江青同志“五一”节在中南海晚会上的谈话》，1967年5月1日。

《江青同志等接见三军创作人员的谈话》，1967年7月29日。

《对〈红灯记〉的指示》，1967年8月2日。

《对中国京剧院〈智取威虎山〉演出人员的谈话》，1967年8月7日。

《对工农兵芭蕾舞剧团演出〈白毛女〉的指示》，1967年10月22日。

《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9—12日。

《在接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1968年2月21日。

《接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张永生、杜英信同志讲话纪要》，1968年5月19日。

《对交响音乐伴奏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指示》，1968年9月19日。

二　张春桥著作目录

（凡署笔名，在括号内注明）

1．《春雨之夜》，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1932年4月17日。

2．《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1932年4月22日，4月29日，5月6日，5月27日。

3．《这一天》，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5月9日。

4．《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1932年5月15日。

5．《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9月22日。

6．《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1日至23日。

7．《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5日。

8．《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26日～27日。

9．《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8日。

10．《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1932年12月29日。

11．《银铃》，《华蒂》1933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期，1934年3月5日。

12．《秋》，《华蒂》1933年第二期。

13．《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1934年7月6日。

14．《另一个问题》，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7月16日。

15．《济南文艺简报》，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7月2日。

16．《相声》，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8月2日。

17．《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8月7日。

18．《关于拉丁中文》，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9月15日。

19．《论诗意》，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9月28日。

20．《答复》，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9月29日。

21．《印象帖》，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10月1日。

22．《山东底方言》，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10月8日。

23．《回读屋跟文学青年》，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10月13日。

24．《我怎样答复他们》，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11月6日。

25．《关于臧克家》，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11月29日。

26．《折扣的说话》，上海《中华日报》1934年12月10日。

27．《俺们的春天》，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1934年12月16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28．《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上海《太白》一卷八期，1935年1月5日。

29．《济南》，《中学生》一期，1935年1月。

30．《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3月31日。

31．《明湖春色》，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4月6日。

32．《俺们山东人》，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1935年5月。

33．《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1935年4月20日。

34．《半瓶子醋》，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1935年6月。

35．《行之端》，上海《大晚报》1935年6月6日。

36．《林相士》，上海《创作》一卷一期，1935年7月15日。

37．《土枪射手》，上海《大晚报》1935年7月18日。

38．《驱逐》，上海《太白》二卷九期，1935年7月20日。

39．《我控诉》，上海《大晚报》1935年8月15日。

40．《讲故事》，上海《时事新报》1935年9月7日。

41．《明星》，上海《申报》1935年9月18日。

42．《乡愁》，上海《时事新报》1935年9月24日。

43．《诉》，上海《时事新报》1935年10月7日。

44．《晚秋》，上海《时事新报》1935年10月16日。

45．《窘》，上海《时事新报》1935年10月25日。

46．《金线泉边》，上海《申报》1935年10月31日。

47．《老人样的少年》，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1935年11月15日。

48．《作家的生活》，上海《立报》1935年12月17日。

49．《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1936年2月1日。

50．《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1936年2月10日。

51．《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1936年2月20日。

52．《我还有一双眼睛》，上海《申报》1936年2月7日。

53．《草原之歌》，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1936年3月1日。

54．《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1936年3月15日。

55．《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1926年4月8日。

56．《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1936年4月11日。

57．《读者想不到的》，上海《漫画与生活》十二卷一期，1936年

5月。

58．《把孩子领向哪里》（狄克），上海《文学青年》一卷二期，1936年5月5日。

59．《〈光明〉——文艺新刊集评》，上海《东方文艺》一卷三期，1936年6月25日。

60．《纪念高尔基》，上海《生活知识》二卷四期，1936年7月5日。

61．《吃饭之外》（狄克），上海《立报》1936年7月15日。

62．《潮》，上海《今代文艺》创刊号，1936年7月20日。

63．《加速度，列车！》，上海《现实文学》一卷二期，1936年8月1日。

64．《海燕》，上海《文学界》一卷三期，1936年8月19日。

65．《自己与群众——评臧克家的诗》（狄克），上海《立报》1936年8月19日。

66．《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上海《立报》1936年9月18日。

67．《纪念九一八》，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1936年9月。

68．《一个土匪》，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1936年9月。

69．《多作些连续图画吧！》，上海《漫画世界》二期，1939年10月。

70．《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春桥），上海《大晚报》1926年11月9日。

71．《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轿子”和“下等人”》（春桥），上海《大晚报》1936年11月10日。

72．《论通讯员运动》，上海《时论》一卷二期，1936年11月20日。

73．《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记录》，张春桥记录并发言，上海《小说家》一卷二期，1936年12月1日。

74．《要求作品的通俗化》，上海《大晚报》1936年12月8日。

75．《雨》，上海《申报》1936年12月25日。

76．《先行者，你安息吧》，上海《热风》一卷一期，1937年1月。

77．《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一期，1937年1月。

78．《明天的太阳》（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二期，1937年2月15日。

79．《速写红萝卜》（春桥），上海《热风》终刊号，1937年3月。

80．《关于语言》（春桥），上海《语文》一卷三期，1937年3月。

81．《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己》，上海《申报周刊》二卷十期，1937年3月14日。

82．《要有计划地工作》，《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二集，1937年7月。

83．《用武力回答武力——纪念八一反战节》，上海《立报》1937年8月1日。

84．《7月8日晚上》，上海《中流》二卷十期，1937年8月5日。

85．《枪毙间谍》，上海《立报》1937年8月10日。

86．《别动队来了》，上海《立报》1937年8月20日。

87．《怎样对付汉奸》，上海《立报》1937年8月21日。

88．《武装民众》，上海《立报》1937年9月3日。

89．《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上海《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1937年10月4日。

90．《血火中的上海》，山东《民国日报》1937年10月12日。

91．《韩复榘》，汉口《战地》一卷一期，1938年4月5日。

92．《汉奸吉恩恭（延安通讯）》，汉口《抗战文艺》一卷五期，1938年5月。

93．《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78页，1938年延安出版。

94．《秋天在平原上》，《晋察冀日报》1942年11月3日。

95．《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4日。

96．《为王老栓全家复仇》，《晋察冀日报》1946年9月30日。

97．《我所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人民日报》1954年4月19日。又见《新华月报》1954年五期。

98．《报纸是作家接触生活的一个基地》，《文艺月报》，1954年六期。

99．《访苏见闻杂记》，张春桥著，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00．《在红星照耀着的地方》，《文艺月报》1955年二期。

101．《我们的期望》，《文艺月报》1956年一期。

102．《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上海南京路印象》，《人民文学》1956年二期。

103．《数字的诗》，《新民晚报》1958年4月1日。

104．《半夜鼓声》，《处女地》1958年九期。

105．《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上海《解放》1958年六期；又转载于《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106．《今朝集》，张春桥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178页，共收杂文33篇。这些杂文散见于各报刊，主要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07．《新时代的新谚语》，《读书》1959年十期；又见《解放日报》1959年5月1日。

108．《在苏联“造船城市”作客》，《长江文艺》1960年三期。

109．《龙华集》，张春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182页，共收杂文40篇。

110．《赞“南京路上好八连”》，《光明日报》1963年4月5日。

111．《在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1966年10月6日。

112．《在接见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1966年10月7日。

113．《接见清华大学红卫兵谈话纪要》，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1966年10月9日。

114．《在西安地区批资大会上的讲话》，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1966年10月14日。

115．《在政协礼堂的讲话》，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1966年10月28日。

116．《接见北航红旗的谈话》，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集，1966年11月8日。

117．《对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人代表的谈话》，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集，1966年11月21日。

118．《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集，1966年12月6日。

119．《在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首长讲话》第三集，1967年3月12日。

120．《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群众组织的讲话》，《中央首长讲话》第三集，1967年3月20日。

121．《在上海整风运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首长讲话》第三集，1967年3月26日。

122．《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67年版。

123．《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四期。

三　姚文元著作目录

姚文元书目

1．《细流集》（杂文集），姚文元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6月初版。

2．《在革命的烈火中》（杂文集），姚文元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4月初版。

3．《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文学评论集），姚文元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7月初版。

4．《革命的军队　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点》（读书运动辅导丛书），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

5．《兴灭集》（杂文集），姚文元著，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3月初版。

6．《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艺丛书），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9月初版。1964年第5次印刷。

7．《冲霄集》（杂文集），姚文元著，作家出版社1960年5月初版。

8．《新松集》（文艺评论集），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5月初版。

9．《想起了国歌》（杂文集），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10．《文艺思想论争集》，姚文元著，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4年9月新一版。

11．《在前进的道路上》（文艺评论集），姚文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5年9月初版。

12．《为革命而生活》（杂文集），姚文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于1966年4月排出校样本，未出版。

13．《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版。

14．《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4月版。

15．《纪念鲁迅，革命到底》，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

16．《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姚文元著，人民出版社1967年1月版。

17．《评陶铸的两本书》，姚文元著，人民出版社1967年7月版。

18．《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姚文元著，人民出版社1968年8月版。

19．《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

姚文元文章目录

（凡署笔名的，在括号内注明）

1．《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志毅），1949年4月收入《细流集》。

2．《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青年报》1949年6月22日。

3．《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解放日报》1951年4月12日。

4．《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文艺报》五卷二期，1951年11月。

5．《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文艺报》五期，1952年3月。

6．《错误的了解》，《文艺报》十期，1953年5月。

7．《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文艺报》十六期，1953年8月。

8．《路是人走出来的！》（志毅），《展望》四十二期，1954年10月。

9．《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一、二期，1955年1月。

10．《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解放日报》十五期，1955年3月。

11．《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文艺报》三期，1955年3月3日。

12．《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文汇报》三期，1955年3月3日。

13．《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解放日报》1955年5月7日。

14．《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解放日报》1955年5月9日。

15．《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解放日报》1955年5月11日。

16．《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解放日报》1955年5月17日。

17．《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新闻日报》1955年5月24日。

18．《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文汇报》1955年5月29日。

19．《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人民日报》1955年6月1日。

20．《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青年报》1955年6月14日。

21．《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新闻日报》1955年6月18日。

22．《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解放日报》1956年6月30日。

23．《请简单明确的讲话（党员来信）》，《解放日报》1956年7月13日。

24．《和徐中玉先生商榷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56年7月15日。

25．《理论家和墙头草》，《新闻日报》1956年7月24日。

26．《在酷热中战斗的上海》，《解放日报》1956年7月28日。

27．《江水和葡萄酒》，《解放日报》1956年8月19日。

28．《对生活冷淡的人》，《解放日报》，1956年8月25日。

29．《坚持“真理”的火鸡》，《新闻日报》1956年8月28日。

30．《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1956年8月22日作，收入《细流集》。

31．《僮族青年的歌声——读龙金珊的两首诗》，《萌芽》六期，1956年。

32．《刻苦学习，永远前进！——介绍鲁迅的学习精神》，《萌芽》七期，1956年。

33．《“扶得东来西又倒”》，《人民日报》1956年9月14日。

34．《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劳动报》1956年9月23日。

35．《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对宋禾同志一文的意见》，1956年9月24日作，《细流集》。

36．《谈猎奇心理》，《新闻日报》1956年9月25日。

37．《锋芒篇》，《解放日报》1956年10月30日。

38．《关于“名单学”及其他》，《文艺月报》十一期，1956年11月。

39．《致埃及兄弟》，《解放日报》1956年11月6日。

40．《电车上的杂感》，《新闻日报》1956年11月1日。

41．《也谈庸俗社会学》，《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5日。

42．《馆子里的杂感》，《新闻日报》1956年11月18日。

43．《算命摊旁的杂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6日。

44．《碎贝集》，《文汇报》1956年11月29日。

45．《让理想的火焰照耀着你！》，《展望》四十八期，1956年12月。

46．《论对句》，《文艺月报》十二期，1956年12月。

47．《人和钱》，《解放日报》1956年12月4日。

48．《谦虚和圆滑》，《新闻日报》1956年12月4日。

49．《回忆》，《文汇报》1956年12月6日。

50．《漫谈“同”与“异”——读书杂感》，《人民日报》1956年12月7日。

51．《论“为政策去写作”》，《解放日报》1959年12月18日。

52．《“针尖”不要刺错了对象》，《新闻日报》1956年12月20日。

53．《时代的歌手在哪里？》，《文汇报》1956年12月27日。

54．《幸福和享受》，《青年报》1957年1月4日。

55．《未来集——答杜勒斯“1957年幻想曲”》，《文汇报》1957年1月16日。

56．《也谈感情》，《解放日报》1957年1月17日。

57．《谈“一窝蜂主义”》，《新闻日报》1957年1月30日。

58．《量衣台边的杂感》，《大公报》1957年1月30日。

59．《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文艺月报》二期，1957年2月。

60．《论“知音”》，《文艺月报》二期，1957年2月。

61．《艰苦和磨炼》，《青年报》1957年2月5日。

62．《杂谈风格、领导和规格》，《解放日报》1957年2月6日。

63．《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文汇报》1957年2月6日。

64．《〈细流集〉前记》，1957年2月14日作，收入《细流集》。

65．《影评家和英雄》，《中国青年》四期，1957年2月。

66．《奇怪的“逻辑”——仿鲁迅〈论辩的魂灵〉》，《萌芽》四期，1957年2月。

67．《在“奇案”的背后》，《人民日报》1957年3月7日。

68．《拍卖行中的声音》，《解放日报》1957年4月2日。

69．《英国人民的愤怒》，1957年4月3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70．《望洋集》，《文汇报》1957年4月12日。

71．《论辩出真理》，《解放日报》1957年4月18日。

72．《顺流和逆流》，1957年4月25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73．《三则广告》，《大公报》1957年4月27日。

74．《谈称呼》，《解放日报》1957年5月3日。

75．《一点补充——与若望同志交换一点意见》，《文汇报》1957年5月7日、8日。

76．《放下架子》，《解放日报》1957年5月13日。

77．《人的价值》，《解放日报》1957年6月7日。

78．《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文汇报》1957年6月10日。

79．《关于青年的杂感》，《劳动报》1957年6月10日。

80．《敌友之间》，《解放日报》1957年6月10日。

81．《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关于“硬骨头”及其他》，《新闻日报》1957年6月11日。

82．《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解放日报》1957年6月14日。

83．《法国人民的觉醒——介绍苏联电影〈第六纵队〉》，《大众电影》十一期，1957年6月。

84．《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文汇报》1957年6月15日。

85．《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新闻日报》1957年6月18日。

86．《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解放日报》1957年6月21日。

87．《“过去是有功劳的”》，《解放日报》1957年6月24日。

88．《揭露谜底》，《新闻日报》1957年6月27日。

89．《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文汇报》1957年6月28日。

90．《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解放日报》1957年6月29日。

91．《这场“戏”的确“好看”》（文潮），《解放日报》1957年6月29日。

92．《党颂》（尖兵），《文汇报》1957年7月3日。

93．《谈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萌芽》十三期，1957年7月。

94．《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95．《乘胜追击》，《新闻日报》1957年7月7日。

96．《一种右派人物的灵魂》，《解放日报》1957年7月7日。

97．《从“来函照登”说起——对〈文艺报〉上的几篇文章的一些意见》，《文汇报》1957年7月9日。

98．《流沙河与〈草木篇〉》，《展望》二十七期，1957年7月。

99．《温情主义及其他》，《解放日报》1957年7月14日。

100．《丑相》，《劳动报》1957年7月15日。

101．《驳施蛰存的谬论》，《文艺月报》七期，1957年7月。

102．《〈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103．《鲁莽被什么人“利用”？》，《解放日报》1957年7月21日。

104．《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解放日报》1957年7月4日。

105．《走哪一条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文艺月报》八期，1957年8月。

106．《不要同时代脱节》一，《学术月刊》八期，1957年8月。

107．《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解放日报》1957年8月2日。

108．《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文艺报》十八期，1957年8月。

109．《驳徐中玉向党进攻的六个论点》，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10．《从“这是一场革命”来看问题》，《解放日报》1957年8月15日。

111．《重视工农知识分子——支持一个读者的建议》，《文汇报》1957年8月20日。

112．《十个“客观上”》，《解放日报》1957年8月25日。

11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人民文学》九期，1957年9月。

114．《在斗争的风暴中所想到的》，《萌芽》十七期，1957年9月。

115．《摄影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文汇报》1957年9月11日。

116．《平凡的新闻，伟大的道德》，《人民日报》1957年9月12日。

117．《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展望》八十五期，1957年9月。

118．《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文艺月报》十期，1957年10月。

119．《人类的骄傲》，1957年10月6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20．《〈在革命的烈火中〉前记》，1957年10月27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21．《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十一期，1957年11月。

122．《静夜杂感》，《文汇报》1957年11月12日。

123．《新的时代、新的美和新的文学——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文艺学习》十一期，1957年11月。

124．《聋哑人的幸福》，《萌芽》二十二期，1957年11月。

125．《“真理归于谁家”？——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一》，《文汇报》1957年11月26日。

126．《“联系实际”的魔术——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二》，《文汇报》1957年11月26日。

127．《术语·花巧·杀气——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三》，《文汇报》1957年11月29日。

128．《“独一无二”的逻辑——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四》，《文汇报》1957年12月6日。

129．《无产阶级人性最合情理——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五》，《文汇报》1957年12月17日。

130．《徐懋庸提倡的是什么“小品文”？——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七》，《文汇报》1957年12月27日。

131．《几句结束的话——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八》，《文汇报》1957年12月30日。

132．《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艺月报》十二期，1957年12月。

133．《一种应当抛弃的坏作风》，《新民晚报》1958年1月4日。

134．《两条值得注意的消息》，《解放日报》1958年1月21日。

135．《“梦魇般的生活”》，《文艺月报》二期，1958年2月。

136．《从一套照片引起的感想》，《新闻日报》1958年2月6日。

137．《展望未来》，《文汇报》1958年2月25日。

138．《冯雪峰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文艺报》四期，1958年2月。

139．《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收获》二期，1958年3月。

140．《我永远坚持自己的信念——答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文汇报》1958年3月3日。

141．《反对懒惰，发扬干劲》，《解放日报》1958年3月6日。

142．《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文艺月报》三期，1958年3月。

143．《战斗生活的颂歌——读〈在和平的日子里〉》，《延河》三期，1958年3月。

144．《辨毒篇——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萌芽》六

期，1958年3月。

145．《健康·明朗·朝气——介绍〈爱情的开始〉》，《文汇报》1958年3月10日。

146．《亲切而引人上进的书——读〈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8年3月9日作，收入《兴灭集》。

147．《略谈“系统派”和“当前派”》，1958年3月21日作，收入《兴灭集》。

148．《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哪几个方面？》，《文艺月报》四期，1958年4月。

149．《批判文学中的人性论》，《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1958年4月。

150．《谈谈看小说》，《青年报》1958年4月4日。

151．《漫谈大学文学理论课》，《文汇报》1958年4月7日。

152．《略谈“存真”》，《解放日报》1958年4月17日。

153．《并非“偏见”》，《文汇报》1958年4月19日。

154．《鼓掌欢迎》，《新闻日报》1958年4月20日。

155．《为什么人写作》，《劳动报》1958年4月23日。

156．《不要怕》，《北京日报》1958年4月24日。

157．《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学术月刊》五期，1958年5月。

158．《不健康的趣味——评〈球场风波〉》，《中国电影》五期，1958年5月。

159．《照相馆里出美学——建议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汇报》1958年5月3日。

160．《何必害怕》，《解放日报》1958年5月6日。

161．《雄心惊得专家叹！》，《北京日报》1958年5月10日。

162．《“李崴事件”的感想》，《新闻日报》1958年5月18日。

163．《介绍〈大跃进〉之歌》，《劳动报》1958年5月19日。

164．《毒草及锄毒草》，《解放日报》1958年5月29日。

165．《〈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序言》，1958年5月29日作，收入《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166．《评〈早霞短笛〉》，《文艺月报》六期，1958年6月。

167．《怎样看待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从〈红与黑〉谈起》，《中国青年》十一期，1958年6月。

168．《如何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文学青年》六期，1958年6月。

169．《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从张狗丢的创造看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量》，《文汇报》1958年6月7日。

170．《让诗传单飞遍全市》，《解放日报》1958年6月10日。

171．《我们工人骨头硬》（诗），《街头文艺》第一期，1958年6月。

172．《贯彻总路线，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萌芽》十二期，1958年6月。

173．《打倒“假洋鬼子”的派头》，《新闻日报》1958年6月17日。

174．《杂感四则》，《文汇报》1958年6月19日。

175．《英国佬有啥了不起！》，《展望》二十六期，1958年6月。

176．《鲜明、乐观、战斗的文学——推荐〈文艺月报·上海工人创作专号〉》，《文汇报》1958年7月9日。

177．《漫谈杂文》，《新闻战线》七期，1958年7月。

178．《和平出在斗争里》（诗），《文汇报》1958年7月20日。

179．《上游有止境吗？》，1958年7月作，收入《兴灭集》。

180．《我们不怕战争》，《解放日报》1958年7月29日。

181．《提高警惕》，《新闻日报》1958年8月10日。

182．《无耻的骗局》，《解放日报》1958年8月12日。

183．《“爱和美”的人生观》，《文汇报》1958年8月20日。

184．《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文艺报》十六期，1958年8月。

185．《在跃进再跃进的号角下——记诚孚铁工厂的再跃进》，《解放》五期，1958年9月。

186．《伟大的史诗——论新民歌》，《跃进文学研究丛刊》二辑，1958年9月。

187．《最新最美的图画——为邳县农民的画欢呼，并谈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重要性》，《文汇报》1958年9月4日。

188．《自套绞索，自掘坟墓，自我死路》，《文汇报》1958年9月10日。

189．《论〈林海雪原〉》，《新文化报》1958年9月16日、21日、26日。

190．《向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解放日报》1958年9月27日。

191．《论稿费》，《文汇报》1958年2月27日。

192．《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几个特点》，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10月出版（单行本）。

193．《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国青年》十九期，1958年10月。

194．《向广大群众推荐什么东西——简评〈欧阳修词选译〉》，《读书》十六期，1958年10月。

195．《歌颂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简评胡万春同志最近的创作》，《文艺月报》十期，1958年10月。

196．《五星红旗射出万道金光——国庆前夕杂谈思想战线二、三事》，《文汇报》1958年10月1日。

197．《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论〈青春之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色》，《语文教学》1958年10月。

198．《水兵的心，水兵的歌——读〈水兵生活速写〉》，《萌芽》十九期，1958年10月。

199．《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文学研究》三

期，1958年10月。

200．《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文汇报》1958年10月23日。

201．《写在影片〈红与黑〉上映的时候》，《大众电影》二十期，1958年10月。

202．《丑事奇闻》，《新闻日报》1958年10月28日。

203．《文艺界的又一反面教材》（向红），《新民晚报》1958年10月30日。

204．《我们在创造着胜利的欢乐——驳对于全民炼钢的“怀疑论”》，1958年11月4日作，收入《冲霄集》。

205．《兴灭集》前记，1958年11月11日作，收入《兴灭集》。

206．《这些“豪客”是什么人？》，《新闻日报》1958年11月16日。

207．《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该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解放日报》二十二期，1958年11月。

208．《小饭店里的杂感》，《解放日报》1958年11月26日。

209．《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下乡劳动的杂感》，《文汇报》1958年11月27日。

210．《大家动手写文艺评论》，《解放日报》1958年12月20日。

211．《杂谈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文艺月报》十二期，1958年12月。

212．《一幅优秀的照片剪贴》，《文汇报》1958年12月25日。

213．《从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剧本》十二期，1958年12月。

214．《介绍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三期，1958年12月。

215．《利用科学规律一例——鸡也在嘲笑杜勒斯》，《北京日报》1958年12月26日。

216．《巴金作品的讨论，分歧的实质在哪里？》，《读书》二

期，1959年1月。

217．《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介绍〈毛泽东论文艺〉》，《文汇报》1959年1月22日。

218．《他们为什么狂吠？》，《中国青年报》1959年1月29日。

219．《无产阶级的英雄花——论革命传记文学》，《文艺月报》二期，1959年2月。

220．《略论辩证法、片面性和折衷主义——和巴人同志讨论两个问题》。

221．《三种人的三种“冷”》，《中国青年报》1959年2月27日。

222．《永远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解放》四期，1959年2月。

223．《发扬“闲不住”的精神》，《解放日报》1959年2月27日。

224．《百折不回》，《新闻日报》1959年3月2日。

225．《“蛇足”与“议论”——为诗中的“议论”一辩》，《文汇报》1959年3月9日。

226．《论〈白兰花〉和〈丁佑君〉——一个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对比》，收入《新松集》。

227．《重读鲁迅的〈拿来主义〉》（金兆文），《解放》第七期，1959年4月。

228．《漫谈读书》，《文汇报》1959年4月8日。

229．《“罪不在书本”的提法不确切》，《文汇报》1959年4月17日。

230．《点滴集》（六则），《解放日报》1959年4月18日。

231．《外行读报谈“心理”》，《新闻日报》1959年4月28日。

232．《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萧尧），《解放》八期，1959年4月。

233．《春风桃李花开日——谈谈群众业余创作中反映工人生活的一些优秀的小说和特写》，《文艺月报》五期，1959年5月。

234．《一个深刻的悲剧——论鲁迅的〈伤逝〉》，《萌芽》九

期，1959年5月。

235．《多读点理论书还是多读点文艺书？》，《文汇报》1959年5月5日。

236．《这是什么“人道主义”？》，《解放日报》1959年5月6日。

237．《从古人谈读书中得到的“借鉴”》，《文汇报》1959年5月9日。

238．《写声音》（文艺漫谈），《萌芽》十一期，1959年6月。

239．《学而思小札》，《文汇报》1959年6月5日。

240．《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新闻日报》1959年6月7日。

241．《略谈“命题作文”——和徐鳌先生商榷》，《解放日报》1959年6月7日。

242．《鼓劲集》，《解放》十一期，1959年6月。

243．《点滴集》，1959年6月5日作，收入《冲霄集》。

244．《千秋浩气入诗篇——读〈革命烈士诗抄〉》，《解放》十二期，1959年6月。

245．《长江中的一个小片断——读〈虚惊〉有感》，1959年6月19日作，收入《冲霄集》。

246．《论〈风雪之夜〉》，《延河》七期，1959年7月。

247．《“废物”中有奇珍异宝——读书札记》，《解放日报》1959年7月2日。

248．《“想”作用》，《新闻日报》1959年7月9日。

249．《点滴集》，《文汇报》1959年7月11日。

250．《读〈谁是奇迹的创造者〉——给胡万春同志的一封信》。

251．《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支部生活》十四期，1959年7月。

252．《鲁迅论文学——〈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第七、九两章》，《收获》四期，1959年7月。

253．《尼克松的“拿着吧”》，《新闻日报》1959年7月9日。

254．《全》，《解放日报》1959年7月30日。

255．《钢人颂》（向红），《解放日报》1959年8月5日。

256．《特殊性格的人》序言，1959年8月作，收入《新松集》。

257．《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解放》十六期，1959年8月。

258．《一点余文》，《文汇报》1959年8月22日。

259．《人民公社颂》，《解放日报》1959年8月23日。

260．《还有一点余文》，《文汇报》1959年8月26日。

261．《惊回首，喜欲狂》（向红），《解放日报》1959年8月30日。

262．《倒霉的诽谤家》（向红），《解放日报》1959年9月4日。

263．《是满腔热情，还是泼群众冷水？》，《解放》十八期，1959年9月17日。

264．《是谁最热心大跃进？》，《解放日报》1959年9月9日。

265．《童话中的真理——读〈宝葫芦的秘密〉》，《红旗手》九期，1959年9月。

266．《鲁迅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和反动文艺的批判》，《语文教学》九、十期，1959年9月、10月。

267．《论动摇》，《解放日报》1959年10月10日。

268．《这是原则和立场上的分歧》，《文汇报》1959年10月11日。

269．《英雄的梦》（向红），《解放日报》1959年10月16日。

270．《江边断想》，《北京日报》1959年10月18日。

271．《鼓足干劲，乘风前进——从鲁迅先生对培养新生力量的意见谈起》，《解放日报》1959年10月18日。

272．《读列宁给高尔基的三封信》，《解放日报》1959年11月18日。

273．《〈冲霄集〉前记》，1959年10月22日作，收入《冲霄集》。

274．《总路线上群英会》（向红），《解放日报》1959年10月23日。

275．《论辩和推荐——杂感二则》，《上海文学》二期，1959年11月。

276．《不让一个同伴掉队》（向红），《解放日报》1959年11月8日。

277．《老话》，《文汇报》1959年11月23日。

278．《谈标准》，《解放日报》1959年12月7日。

279．《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语文学习》十二期，1959年12月。

280．《评〈草原烽火〉》，《文艺报》二十四期，1959年12月。

281．《响彻云霄的赞歌——读〈红旗歌谣〉》，《安徽文学》一期，1960年1月。

282．《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艺报》二期，1960年1月。

283．《用什么态度去读文艺作品？》，《青年报》1960年2月19日。

284．《在斗争中发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上海文学》三期，1960年3月。

285．《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萌芽》六期，1960年3月。

286．《伟大的“公”字》，《解放日报》1960年3月26日。

287．《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批评——读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论文》，《上海文学》四期，1960年4月。

288．《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的观点》，《上海文学》五期，1960年5月。

289．《冰块挡不住奔流》（向红），《解放日报》1960年5月1日。

290．《前进的“脚印”》，《文汇报》1960年5月8日。

291．《我们绝不能“忘掉”》（向红），《解放日报》1960年5月23日。

292．《走狗显原形》，《解放日报》1960年5月23日。

293．《群众创作的新花——评上海电机厂职工群众创作选集〈大风暴中的故事〉》。

294．《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答陈恭敏同志》，《剧本》六期，1960年6月。

295．《天下无废物》（金兆文），《解放》十一期，1960年6月。

296．《肮脏的自白——斥美国现代反动堕落的“垮掉文学”》，《新民晚报》1960年6月8日。

297．《为人民的幸福而思索》，《解放日报》1960年6月12日。

298．《一个大阴谋——杜勒斯的几笔黑帐》，1960年6月11日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299．《介绍〈萧三诗选〉》，《文汇报》1960年6月15日。

300．《粉碎美帝国主义这个大阴谋》，《解放日报》1960年6月16日。

301．《迅速反映新事物，热情歌颂新事物》，《萌芽》十三期，1960年7月。

302．《奴才哲学——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什么要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解放》十三期，1960年7月。

303．《艾森豪威尔的“非暴力论”》，《解放日报》1960年7月21日。

304．《革命文艺的战斗纲领》，《上海文学》八期，1960年8月。

305．《掌握思想斗争的规律，把兴无灭资的斗争进行到底》，《解放日报》1960年8月13日。

306．《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读〈创业史〉》，《文艺报》第十七、十八期，1960年9月。

307．《努力反映农村生活中的新事物——谈李准短篇小说的几个特点》，《人民日报》1960年11月30日。

308．《这就是主人翁的态度》，1960年12月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09．《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颂歌——评〈以革命的名义〉》，《上海电影》二期，1960年12月。

310．《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上海文学》一期，1961年1月。

311．《论生活中的美与丑——美学笔记之一》，《文汇报》1961年1月17日。

312．《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育人民》，《解放日报》1961年3月24日。

313．《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美学笔记之二》，《文汇报》1961年5月2日。

314．《“红色娘子军”的思想意义》（金兆文），《解放》七、八期，1961年。

315．《艺术的辩证法——祖国美学遗产初探·美学笔记之三》，《学术月刊》六期，1961年6月。

316．《古今谈》，《解放日报》1961年7月22日。

317．《〈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改版后记》，1961年8月作，收入《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318．《艺术的辩证法——美学笔记之四》，《上海戏剧》第七、八期，1961年8月。

319．《“烂桃”和“萌芽”》，《文汇报》1961年8月22日。

320．《学习鲁迅的文风——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解放》十一期，1961年10月。

321．《关于“锥刺股”》，《文汇报》1961年10月13日。

322．《蟹的杂感》，《文汇报》1961年10月12日。

323．《天才与勤奋》（金文），《解放》二十二期，1961年11月。

324．《大跃进的果实》，《文汇报》1961年11月9日。

325．《另一种毒药》，《文汇报》1961年11月14日。

326．《诗的警语》，《文汇报》1961年12月12日。

327．《论艺术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上海文学》十二期，1961年12月11日。

328．《夜读偶感》，《解放日报》1962年1月15日。

329．《〈新松集〉前记》，1962年1月25日作，收入《新松集》。

330．《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解放日报》1962年2月16日。

331．《看花漫笔》，《解放日报》1962年2月26日。

332．《评〈擂鼓集〉》，《上海文学》三期，1962年3月。

333．《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美学笔记之六》，《新建设》三期，1962年3月。

334．《革命志气和踏实作风的力量——1961年短篇小说选评之一》，《文汇报》1962年3月3日。

335．《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形象——1961年短篇小说选评之二》，《文汇报》1962年3月17日。

336．《想起了国歌》，《解放日报》1969年4月9日。

337．《并非“挨批”》（尖兵），《解放日报》1962年4月11日。

338．《第一位的工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山东文学》五期，1962年5月。

339．《黑牢中的红鹰——赞〈红岩〉》，《四川文学》五期，1962年5月。

340．《须要总结文艺工作者成长道路上的经验》，《中国青年》九、十期，1962年5月。

341．《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文汇报》1962年5月13日。

342．《关于郑板桥的“狂”》，1962年5月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43．《郑板桥家庭教育一事》，1962年5月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44．《咏物杂感（江河、红绿灯、像片）》，《解放日报》1962年5月28日。

345．《一点辩证》，《解放日报》1962年6月8日。

346．《从播种到收获》，《解放日报》1962年6月18日。

347．《“七一”抒情》（顽石），《解放日报》1962年7月1日。

348．《革命的传统力量》（顽石），《解放日报》1962年7月31日。

349．《手表和挂表》（何自），《解放日报》1962年8月20日。

350．《找》（顽石），《解放日报》1962年9月13日。

351．《赌棍的自白》（针锋），《解放日报》1962年9月17日。

352．《躲不开，赖不掉，骗不了！》（针锋），《解放日报》1962年9月21日。

353．《读报偶感》，1962年9月20日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54．《蕴藏着无穷潜力的人——谈唐克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上海文学》九期，1962年9月。

355．《不可征服的人——谈杜鹏程短篇小说集〈年青的朋友〉中的人物形象》。

356．《草原在歌唱——读短篇小说集〈遥远的戈壁〉》，《文汇报》1962年9月22日。

357．《“大道理”的力量》（顽石），《解放日报》1962年10月13日。

358．《〈想起了国歌〉后记》，1962年10月18日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59．《生气勃勃的农村图画——读浩然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8日。

360．《革命的“红玫瑰花”——读〈甘蔗田〉》，《上海戏剧》十一期，1962年11月。

361．《垂死阶级的心理》（顽石），《解放日报》1962年11月26日。

362．《反映人民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读〈傲霜篇〉和〈壮志录〉有感》，《解放日报》1962年12月12日。

363．《垂死的阶级心理》（之二）（顽石），《解放日报》1962年12月15日。

364．《“有这样一个党！”》，《解放日报》1962年12月21日。

365．《新年买鬼》（向红），《文汇报》1963年1月5日。

366．《提倡多写一点热气腾腾的短文》，《解放日报》1963年1月5日。

367．《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解放日报》1963年1月21日。

368．《颂“三宝”》（顽石），《解放日报》1963年3月17日。

369．《传播科学　破除迷信》（顽石），《解放日报》1963年3月20日。

370．《〈母亲〉的思想意义——重读〈母亲〉，并以纪念高尔基诞生九十五周年》，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371．《论艺术分类问题——美学笔记之七》，《新建设》四期，1963年4月。

372．《光辉的“灵魂工程师”——推荐〈红色宣传员〉》，《上海戏剧》四期，1963年4月。

373．《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思想阵地》（顽石），《解放日报》1963年4月7日。

374．《手的解放》（顽石），《解放日报》1963年5月8日。

375．《这不仅是家庭问题——读〈家庭问题〉》，《人民日报》1963年5月12日。

376．《为革命而读书》，《中国青年》十一期，1963年5月10日。

377．《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汇报》1963年5月20日。

378．《“和群众一起革命”》（金人），《解放日报》1963年5月22日。

379．《奇解一则》，《文汇报》1963年6月7日。

380．《宣传唯物主义　破除迷信思想》，《解放日报》1963年6月11日。

381．《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文学评论》1963年6月三期。

382．《辩“义气”》（葛铭人），《文汇报》1963年7月3日。

383．《析“苦学”》（葛铭人），《文汇报》1963年7月10日。

384．《“谁该掩鼻？”》，1963年，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385．《谈“化装”》（葛铭人），《文汇报》1963年7月29日。

386．《几句补充的话》，1963年，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387．《无产阶级的父子情》（顽石），《解放日报》1963年8月4日。

388．《防“落井”》（葛铭人），《文汇报》1963年8月11日。

389．《从德彪西讨论想起的》（群山），《文汇报》1963年8月19日。

390．《从德彪西想到星海》（铭人），《文汇报》1963年9月9日。

391．《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63年9月24日。

392．《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春之歌——评〈年青的一代〉》，《文艺报》十九期，1963年10月。

393．《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

394．《为革命而生活，还是为爱情而生活？》，《中国青年》十九期，1963年10月。

395．《爱“未来”》（葛铭人），《文汇报》1963年10月19日。

396．《破“而已”》（葛铭人），《文汇报》1963年10月16日。

397．《〈文艺思想论争集〉再版序言》，1963年，收入《文艺思想论争集》。

398．《这股风和那股风》（闻潮），《解放日报》1964年1月5日。

399．《歌颂为主》（闻潮），《解放日报》1964年1月19日。

400．《破“陈腐旧套”——也算纪念曹雪芹》（葛铭人），1964年2月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01．《首先做革命派》（同期），《解放日报》1964年2月11日。

402．《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收获》二期，1964年3月。

403．《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红旗》六期，1964年3月。

404．《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光明日报》1964年5月10日。

405．《冰山雪岭奏新歌——推荐短篇小说〈迎冰曲〉》一，《人民日报》1964年5月16日。

406．《革命的歌声是千百万群众的歌声》（闻潮），《解放日报》1964年5月28日。

407．《两种“境界”》（闻潮），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08．《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分析几个反映青年生活道路的优秀作品的思想意义》，1964年5、6月，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409．《韧》（闻潮），《解放日报》1964年7月9日。

410．《读〈故事会〉》（金向红），《文汇报》1964年8月22日。

411．《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读〈故事会〉》（金向红），《故事会》九辑，1964年9月。

412．《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解放日报》1964年12月14日。

413．《新事物的灿烂光辉——赞越剧〈春风送暖〉》（闻潮），《解放日报》1965年2月28日。

414．《名词小议》（葛铭人），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15．《驳“写普通人”——对于一种“写中间人物”论点的批判》，《萌芽》四期，1965年4月。

416．《〈在前进的道路上〉前记》，1965年4月作，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417．《向革命故事学习》，《文艺报》九期，1965年5月。

418．《化仇恨为力量》（闻潮），《解放日报》1965年5月3日。

419．《叛徒的逻辑——看戏有感》（永红），1965年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20．《革命辩证法的胜利》（闻潮），《解放日报》1965年5月23日。

421．《赞“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葛铭人），《文汇报》1965年7月4日。

422．《有革命远见的英雄们——谈谈两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几个英雄人物的特色》（葛铭人），《文汇报》1965年7月13日。

423．《敢教日月换新天——影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观后》，《解放日报》1965年9月8日。

424．《写出劳动人民的斗争史——从一位老贫农的批评中得到的启发》（葛铭人），《文汇报》1965年9月26日。

425．《团体操中的真理》（金向红），《人民日报》1965年9月28日。

426．《“君子国”的幻想和共产主义风格》（顽石），《解放日报》1965年10月10日。

427．《这是什么样的“爱”——批判电影中“人性论”之一》（闻潮），《解放日报》1965年10月11日。

428．《虚伪的“良心转变论”——批判电影中“人性论”之二》（闻潮），《解放日报》1965年10月20日。

429．《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葛铭人），《光明日报》1965年10月28日。

430．《高潮后的高峰》（葛铭人），《文汇报》1965年11月3日。

431．《轻装前进》（金向红），《人民日报》1965年11月4日。

432．《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433．《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闻潮），《学术月刊》十二期，1965年12月。

434．《欢迎“破门而出”》（劲松），《文汇报》1965年12月15日。

435．《为革命而生活》后记，1965年12月24日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36．《哪个阶级的立场》（牛子明），《文汇报》1966年1月28日。

437．《“吃人”的“光明面”》（牛子明），《文汇报》1966年2月1日。

438．《“似曾相识”的论调》（牛子明），《文汇报》1966年2月8日。

439．《为谁化装》（伍丁），《文汇报》1966年3月22日。

440．《奇妙的逻辑——录以待考》（伍丁），《文汇报》1966年3月21日。

441．《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伍丁），《文汇报》1966年4月25日。

442．《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解放日报》1966年5月10日。

443．《“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劲松），《解放日报》1966年6月2日。

444．《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解放日报》1966年11月1日，《文汇报》，1966年十四期《红旗》。

445．《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1月。

446．《〈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在上海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汇报》1967年5月24日。

447．《在阿尔巴尼亚共青团“五大”的贺词》，《人民日报》1967年6月29日。

448．《评陶铸的两本书》，《红旗》1967年十四期。

449．《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

450．《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1日。

451．《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三期。

四　王洪文著作目录

1．《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工人造反报》1967年1月7日。

2．《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人民日报》1967年4月7日。

3．《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当前我们头等的大事》，《文汇报》1967年7月3日。

4．《向首都的革命战友致敬》，《工人造反报》1967年4月22日（又见于同日《解放日报》）。

5．《“五一”国际劳动节对外广播讲话》，《工人造反报》1967年5月1日。

6．《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文汇报》1967年5月21日（又见于《工人造反报》1967年5月23日）。

7．《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人民日报》1967年6月18日。

8．《整掉不良的作风》，《人民日报》1967年7月12日。

9．《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坚决反对武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文汇报》1967年8月13日（又见于《解放日报》1967年8月15日）。

10．《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促进革命大联合新飞跃》，《工人造反报》1967年9月17日。

11．《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人民日报》1967年9月20日。

12．《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人民日报》1967年10月3日。

13．《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　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工人造反报》1967年10月7日。

14．《排除干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造反报》1967年10月27日。

15．《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造反报》1967年12月4日。

16．《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工人造反报》1967年12月25日。

17．《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工人造反报》1968年1月25日。

18．《誓死保卫毛主席，粉碎右倾翻案风》，《解放日报》1968年4月12日。

19．《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乘风破浪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造反报》1968年5月7日。

20．《向门合同志学习，攀登“忠”字的高峰》，《解放日报》1968年6月5日（又见于《文汇报》1968年6月6日）。

21．《永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文汇报》1968年7月31日（又见于《工人造反报》1968年8月1日）。

22．《台湾一定要重归祖国怀抱》，香港《大公报》1968年10月11日。

23．《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上海《支部生活》杂志，1969年1期。

24．《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2日。

Table of Contents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1册)
目录
版权页
增订版前言
序
引言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韦德发现中共高层领导人“步调不一致”
“四人帮”中的“四结合”
第一章 江青之初
江青的身世之谜
李家是个不安宁的家庭
李云鹤的学戏生涯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最初的爱侣黄敬
19岁加入中共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黄敬来上海寻找江青
江青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孙达生介绍江青重新入党
第二章 影剧明星蓝苹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崔万秋晚年忆蓝苹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唐纳其人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
婚变使唐纳在济南自杀
王泊生使蓝苹大失所望
蓝苹想以“得脑膜炎死了”赖账
蓝苹的心病所在
蓝苹终于与唐纳重回上海
“唐蓝事件”满城风雨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蓝苹终于告别大上海
第三章 成为“第一夫人”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博古同意蓝苹进入延安
黄敬先去了延安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成为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他乡遇故知”——康生
亮相于延安舞台
指导员兼“网员”的双重身份
从“二姨太”到“大红鞋”
江青初识毛泽东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
风姿绰约的才女吴莉莉
“吴莉莉风波”
贺子珍后悔终生
江青乘虚而入
关于毛、江“约法三章”
江青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生了女儿李讷
整风运动中康生保江青过关
江青变娇变骄了
江青与周恩来的“惊马事件”
江青借牙病飞往重庆
唐纳在重庆拒见江青
江青写信慰问赵丹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第四章 张春桥之初
华蒂社的中坚
“文坛恶少”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崔万秋其人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的真面目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鲁迅再驳狄克
红皮白心的张春桥
第五章 张春桥的发迹
狄克钻进延安
张春桥告了邓拓一状

晋察冀之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取恽逸群而代之
张春桥坐镇《解放日报》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第六章 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姚文元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姚文元结识张春桥
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姚蓬子被捕使姚文元跌入低谷
姚蓬子本是阔少爷
象征派诗人姚蓬子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姚蓬子出任左联执委
与丁玲创办《北斗》
鲁迅写诗《赠蓬子》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转入秘密战线——中共特科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精明的投机商
姚蓬子为姚文元操碎了心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姚文元跨进《萌芽》编辑部
第七章 江青“偶尔露峥嵘”
江青飞往苏联疗养
贺子珍顾全大局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
出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第一次匿名信事件
“游泳池事件”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政治夫妻”

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旁人眼中的江青
“骄杨”风波
“桂花酒”之谜
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
又一封令江青坐立不安的匿名信
江青之兄李干卿惹风波
江青的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跟王光美比高低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2册)
目录
版权页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毛泽东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突然跃为“新星”
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横扫“右派”
姚文元“双喜临门”
“金棍子”讨伐文坛老将
姚文元的“诗传单”
一度“失业”的“棍子”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出任《解放日报》编委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巴金怒斥“姚棍子”
“骆漠”是谁
《杂家》事件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张春桥是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柯庆施差一点取代周恩来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干掉陈其五
第九章 江、张联手抓“样板戏”
江青成了上海的“女客人”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介绍江青结识张春桥

在上海发出“有分量”的第一炮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树《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江青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张春桥成了“两出戏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柯庆施之死
张春桥提携于会泳
江青伸手抓《海港》
第十章 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张春桥介绍江青结识“青年评论家”姚文元
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看中“民间报纸”《文汇报》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张春桥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大学生王复兴奋笔批姚
张春桥终于“引蛇出洞”
“围城打援”——打北京援军
“海瑞热”的来历
毛泽东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
邓拓死于姚文元笔下
田家英为抗争而献身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第十一章 江、张、姚进入“中央文革”
江青前往苏州请“尊神”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
陈伯达、张春桥帮助改《纪要》
北京针锋相对起草《二月提纲》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毛泽东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起草《五一六通知》
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毛泽东坐镇杭州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沉思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江青点火于北京高校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旗手”的登基典礼
第十二章 上海冒出了“造反司令”王洪文

崔家的新女婿
王洪文当过五年半的兵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科长梦的破灭
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保卫科事件
炮轰工作队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北京小将”鼓舞了王洪文
带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洪文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成为“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头头
王洪文结识王秀珍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王洪文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工总司”深夜抢红布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
第十三章 张春桥在安亭“发现”了王洪文
车停安亭
王洪文拦车卧轨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陈伯达发来急电
张春桥从天而降
王洪文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王洪文昆山历险记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王洪文在各派纷争中剪除异己
稳定“后院”
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上海“赤卫队”的崛起
爆发《解放日报》事件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两军对垒争夺上海
急令耿金章回沪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第十四章 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常溪萍终于发出了致邓小平的信
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

"上海不可能属于陈丕显"
张、姚从幕后走到台前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紧急通告》的诞生
上海"工总司"成了全国"光辉的榜样"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二兵团"耿金章宣布上海"夺权"
张春桥软硬兼施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迎接上海"最盛大的节日"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上海，落入张春桥手中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其人
张春桥降服耿金章
张、姚成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人民日报》对"上海人民公社"保持沉默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王洪文吞并"二兵团"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3册)
目录
版权页
第十五章 "得志便猖狂"
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所谓"二月逆流"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怀疑狂·迫害狂
宋庆龄怒斥江青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
触目惊心的一刹那
四支秃笔倒了三支
第十六章 疯狂的复仇
"不知名的红卫兵"夜半敲门

“歼七”追抄一封信
教导队冒充红卫兵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江青追抄什么信
王莹惨遭江青迫害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屈死狱中
江青报复严朴和扬帆
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的厄运
专机押送王芳赴京受审
毛泽东儿媳刘松林上海蒙尘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谁泄露了狄克的秘密
鲁迅当年曾痛斥“狄克”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费毓龙做了一场噩梦
“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安在
他查出“狄克”是谁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行踪诡秘的“扫雷纵队”
无孔不入的“福尔摩斯”
上海藏书楼里的斗争
另一支兵马杀进藏书楼
主炮手被关进秘密监狱
“扫雷纵队”游雪涛自食苦果
张春桥妹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尚未动刀，患者突然死去
一封密告信飞到徐景贤手中
“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王洪文重申“此案要严肃处理”
周总理当面质问张春桥
姚蓬子戴起“工总司”袖章
“太岁头上动土”——抄姚蓬子的家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姚蓬子之死
第十七章 王洪文横行上海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充满辣味的“全向东”
静坐于上海市公安局前

王洪文后发制人
震动上海的解福喜之死
冒出了“压勿煞战斗队”
“888”秘密会议
大战的前奏
上海血泪横飞的8月4日
张春桥“完全支持”王洪文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王司令”乔迁“上只角”
马天水卖身求荣
上海“市革会”的“三驾马车”
王洪文的“小兄弟”成了“纳新”对象
“先进典型”陈阿大入党
陈阿大其人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王洪文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张春桥拿“上海党”炮轰陈毅
王洪文成为上海“中南海”的新主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成了“红色堡垒”
第十八章 与林彪又握手又踢脚
与组长陈伯达的争斗
“四一二”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林彪救了张春桥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江、张、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江青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陈伯达倒向了林彪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陈伯达遭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噩梦连连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姚文元取代陈伯达成为“舆论总管”
姚文元“左”眼看画
第十九章 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
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
毛泽东突然休克
张玉凤眼中的江青
秘书眼中的江青
江青看电影
护士眼中的江青

美国总统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毛泽东没有选择江、张、姚接班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
王洪文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王洪文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第二十章 四人结帮斗“周公”
江青“迫不及待”攻击周恩来
王海容、唐闻生成为特殊的“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把手伸进部队
批林批孔批“周公”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4册)
封面
版权页
目录
第二十一章　与邓小平对着干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江青盘算着“组阁”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王洪文长沙告状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
王洪文“接班”告吹
“张春桥思想”
“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周恩来反击张春桥
康生也来个“反戈一击”
张天民告“老娘”“刁状”
突然发动“评《水浒》”
毛远新当毛泽东的联络员
王洪文花天酒地回上海
“旧居”·“圣地”·大事记
王洪文重逢“小兄弟”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二十二章　“文官”要夺华国锋的权
王洪文从上海飞回钓鱼台
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
“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
“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借《园丁之歌》批华国锋
江青高举“批邓”大旗
爆发第三次“炮打张春桥”
天安门广场燃起反“四人帮”怒火
丙辰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斥“秃子”》怒斥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戈培尔第二”
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副主席王洪文成了公子哥儿
“四人帮”再揪“走资派”
“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第二十三章　末日的疯狂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四人帮”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四人帮”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
江青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狄克”穷途末路
第二十四章　抓捕“四人帮”
以“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
9月11日：华国锋找李先念密商
9月13日：李先念突访叶剑英
叶剑英眼中的华国锋
“四人帮”暗中调兵遣将
9月21日：叶剑英看望华国锋
9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
10月2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
10月3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10月4日：事态严重化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
10月6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
张春桥第一个落网
王洪文被捕时挣扎了一下

姚文元束手就擒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将军说出“拘江”内幕
吴德回忆粉碎“四人帮”的内情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邓小平说“可以安度晚年了”
郭沫若欢呼“大快人心事”
“四人帮”的“地下生活”
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
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
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
“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第二十五章　押上历史审判台
原本是由王芳审江青
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江青在宣判时的闹剧
唐纳的后来
徐明清为江青吃冤枉官司
刘志坚和秦桂贞“翻身”
江青的铁窗生涯
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王洪文死于肝病
张春桥的狱中生活
江青以自杀告终
姚文元刑满出狱
张春桥因癌症病故
姚文元的离去
附录
一　江青著作及报道目录
二　张春桥著作目录
三　姚文元著作目录
四　王洪文著作目录